



# 中梵外交關係史

陳方中  
江國雄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教廷」顧名思義只是教宗的宮廷，以國家的標準來看，梵蒂岡這個教宗的宮廷，並不能算是真正的國家，但卻是中華民國目前在歐洲唯一的邦交國。

從1922年開始，梵蒂岡與中華民國建立了準外交關係；1942年，以中華民國單方通使的方式，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八十餘年中，中梵外交關係脫離不了世界局勢的變化、國共雙方以及海峽兩岸的戰與和，但教廷特別的外交思維與目的，卻使中梵外交關係迥異於一般國與國的外交關係。

本書即是在神聖與世俗混雜的背景下，描述這種特殊外交關係的歷來發展。

# 中梵外交關係史

陳方中  
江國雄 ■ 著

This One



POY5-97N-3QGQ

## 引 言

最早注意於中梵外交關係史的是中華教會人士，羅光總主教在他擔任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教務顧問時，即開始撰寫《教廷與中國使節史》，不過他不便對現況著墨太多，因此數次再版的這部名著，在兩百六十九頁的篇幅中，只有四十五頁是描述近八十年的中梵外交關係。梁潔芬修女撰有《中共與梵蒂岡關係》，這本傑作亦曾再版，但是嚴格說來，這是一本從政治學觀點切入的作品，在時序的表達上與歷史著作不同，且重點放在一九七六年之後的教廷與中共關係。近年顧衛民教授在大陸出版了《中國與羅馬教廷關係史略》，由於大陸政治及宗教的敏感性，顧教授自我設限於一九四九年，雖說有所缺憾，但亦是不得不然的選擇。二〇〇三年二月，一位長期關心中梵關係的記者宋迪尼(Alceste Santini)用義大利文寫了《中國與梵蒂岡——從衝突到對話》(CINA E VATICANO - Dallo scontro al dialogo)，作者基本上並未引用中文資料，而且他的對象是義文讀者，因此必須在其書中對中國政治及社會有更多的介紹。

《中梵外交關係史》這本書的正文有三十八萬字，約有五分之四的篇幅，均在描述自一九二二年建立準外交關係，以至於今日的歷史。就瞭解中梵外交關係的全貌而言，前述諸書均不如本書完整，這並不是說我們自認為超越前人的成就，只是就這本書的完整性而言，我們有足夠的信心。

與一般的外交關係相比，中梵外交關係是相當特殊的。特殊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教廷的性質；

嚴格說來教廷不是一個國家，照戴瑞明大使的說法，她只是一個宗教實體；一個世俗的國家要和一個宗教實體建立外交關係，當然有其與一般世俗國家外交關係間的同與異。其次是中國特殊的局勢，一九四九年後，教廷要同時面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及在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誰代表中國？或是可以有兩個中國嗎？還是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在理想與現實、表面與實際間，中梵外交的定義，以及梵蒂岡對華外交的拿捏，都是頗堪玩味的。最後，教廷的對華外交是以其宗教精神為基礎的，她不能任由中國千萬名天主教徒，仍然處在名不正言不順或是持續被迫害的情況下，因此教廷的外交官員公開表明他們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善關係，但是中共迄今沒有表示改善關係的意願，在此情況下，教廷仍和台灣的中華民國保持外交關係，而國際空間不大的中華民國，在現況中忍耐。

這本書的完成是兩年「中梵外交關係史研究計畫」的句點，這個計畫是由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戴瑞明向輔仁大學李寧遠校長提出的計畫，並由中華民國外交部及輔仁大學合作提供經費支持。由輔仁大學進行這個研究計畫是具有唯一合理性的，在台復校的首任校長于斌樞機主教及次任校長羅光總主教，都是實際參與中梵外交關係的重要人物，而不論是一九二五年北平輔仁的籌設，或是一九六一年輔仁在台復校，都是中梵外交關係中的重要事件。

本書的作者有兩位，以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做為分界線，第一部份由本人負責，主要倚賴文獻檔案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做為撰寫的依據。第二部份由江國雄先生負責，江國雄先生長期擔任梵蒂岡電台中文部的編輯，自陳之邁大使的時代，他即以參與者或觀察者的角色，在他的筆記、剪報、信件、日記中留下了中梵關係的點滴，我個人相信在沒有中梵雙方檔案可依靠的情形

下，很難找到比他更適合撰寫這一段中梵外交關係的作者。

江國雄先生與本人台灣天主教會出身的背景，使得本書難以避免其主觀性；這種主觀性的主要原因是我們所用的資料，或所參與的活動多半是「中華民國」與教廷的外交關係。江國雄先生和本人均認知到了這種主觀性，我們在無法完全避免的狀況中，仍然盡量表現客觀、中立的態度。在此必須讚揚中華民國外交部及駐教廷大使館，雖然這個研究計畫具有其外交目的，但「官方」在研究進行中，從未予輔仁大學或作者任何指示或壓力，對《中梵外交關係史》，戴瑞明大使從未置任何一詞，甚至避免寫序，以維持本書的學術性。他們基本上完全服膺「真實就是最好的外交」，使得本書的客觀性完全保持。

本書的完成要感謝外交部前後任田弘茂部長、簡又新部長的支持，戴瑞明大使實質的參與和推動，輔仁大學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教廷督導狄剛總主教、李寧遠校長的關心與行政支援。以及在過程中給予指導的錢志純主教、施森道蒙席、李震蒙席，經常麻煩的劉嘉甯參事、丁洪偉參事、陳冠中秘書。更要感謝臺灣商務印書館，在很倉促的情形下，同意將本書交由他們出版。此外負責全部計畫執行的朱寅伶小姐，以及擔任主要打字、校對工作的葉宇真小姐，在此均一併致謝。

最後，感謝天主，讓這本書可以順利完成，希望這是一本為公眾有益之書。

陳方中 謹識

# 目次

|       |       |                      |       |                  |               |       |                                       |             |            |            |
|-------|-------|----------------------|-------|------------------|---------------|-------|---------------------------------------|-------------|------------|------------|
| 0 4 8 | 0 3 6 | 0 3 6                | 0 3 4 | 0 3 1            | 0 1 3         | 0 0 5 | 0 0 3                                 | 0 0 1       | 0 0 1      | 0 0 1      |
|       |       | <b>第二章 未建立外交關係時期</b> |       |                  |               |       | <b>第一章 導讀：原則、政策與事件——觀察中梵外交關係的三個層次</b> | <b>第一部份</b> | <b>圖 版</b> | <b>引 言</b> |
|       |       | 第一節 蒙古時期             | 結 語   | 第二節 中梵外交關係的政策    | 第一節 中梵外交關係的原則 |       |                                       |             |            |            |
|       |       | 第二節 葡萄牙保教權時期         |       | 第三節 中梵外交關係中的個別事件 |               |       |                                       |             |            |            |

|  |                                 |       |
|--|---------------------------------|-------|
|  |                                 | 0 8 9 |
|  | 第三節 法國保教權時期                     |       |
|  |                                 |       |
|  | 第三章 準外交關係時期——（一九二三年～一九四二年）      | 1 0 7 |
|  | 第一節 剛恆毅時期                       | 1 0 7 |
|  | 第二節 蔡寧時期                        | 1 4 2 |
|  |                                 |       |
|  | 第四章 中梵外交關係的建立與發展——（一九四二年～一九五〇年） | 1 6 2 |
|  | 第一節 通使交涉與單方通使時期                 | 1 6 2 |
|  | 第二節 中國教會改革與雙方通使                 | 1 8 4 |
|  | 第三節 中梵外交關係轉向渾沌不明                | 2 1 5 |
|  |                                 |       |
|  | 第五章 庇護十二世後期的對華外交——（一九五〇年～一九五八年） | 2 3 3 |
|  | 第一節 教廷駐華公使來台與謝壽康回任駐教廷公使         | 2 3 3 |
|  | 第二節 中華教會及教會領袖的苦難                | 2 5 5 |
|  |                                 |       |
|  | 第六章 若望二十三世的對華外交——（一九五八～一九六三）    | 2 7 7 |
|  | 第一節 出乎意料的當選談話                   | 2 7 7 |
|  | 第二節 提昇與中華民國外交層級                 | 2 8 0 |



|   |   |   |     |                        |
|---|---|---|-----|------------------------|
| 2 | 8 | 5 | 第三節 | 于斌解禁——籌備輔仁大學           |
| 2 | 8 | 9 | 第四節 | 田耕莘任台北署理總主教            |
| 2 | 9 | 2 | 第五節 | 羅光及杜寶晉回台               |
| 2 | 9 | 5 | 第六節 | 台灣教會神職對若望二十三世中國「裂教」的意見 |

### 第七章 保祿六世的對華外交——（一九七一年以前）

|   |   |   |     |                    |
|---|---|---|-----|--------------------|
| 2 | 9 | 8 | 第一節 | 保祿六世對中共的政策：交談      |
| 3 | 0 | 4 | 第二節 | 保祿六世維持及增進與中華民國的關係  |
| 3 | 0 | 7 | 第三節 | 保祿六世的兩個中國政策        |
| 3 | 1 | 0 | 第四節 | 輔仁大學問題             |
| 3 | 1 | 7 | 第五節 | 華理柱主教獲釋與教宗保祿六世訪問亞洲 |
| 3 | 2 | 5 | 第六節 | 聯合國中國問題            |

### 第二部分

|   |   |   |     |                           |
|---|---|---|-----|---------------------------|
| 3 | 3 | 1 | 第八章 |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對中梵外交關係的衝擊       |
|   |   |   |     |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七八年元月（陳之邁大使 |

任期)

3 3 1

第一節 教廷與義大利對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反應

3 3 8

第二節 教廷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的突變

3 4 1

第三節 保祿六世教宗對華的態度與政策

3 4 3

第四節 保祿六世教宗對華的關懷

3 4 6

第五節 陳之邁大使

3 5 0

### 第九章 中梵關係的山窮水盡與柳暗花明

一九七八年元月至一九八四年二月(周書楷大使任期一)

3 5 0

第一節 周書楷出使教廷，呈遞國書，教宗隱約表示對中國的關懷

3 5 4

第二節 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對華政策

3 5 8

第三節 鄧以明主教事件

3 6 7

第四節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向中國大陸表達心聲，為當地教會祈禱

3 7 1

第五節 若望保祿二世在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利瑪竇抵華四百週年紀念會中致辭，勾畫出其中國政策

3 7 6

第六節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天主教主教團對教廷東進中國

大陸政策的納悶與釋懷

3 8 6 第十章 中梵關係的新了解

一九八四年三月至一九九一年四月（周書楷大使任期二）

3 8 6 第一節 方接「橋樑教會」棒，即吹來中梵外交突變風

3 9 1 第二節 教宗與教廷鏗而不捨地向中國大陸敲門

3 9 5 第三節 一九八五年，中梵關係平靜的一年

3 9 7 第四節 龔品梅：若望保祿二世教宗默存心中、十年不宣的

樞機主教

4 0 2 第五節 教廷萬民福音部召開內部高層及專家會議，討論中

國教會問題

4 0 5 第六節 教廷國務卿卡薩羅里樞機主教再次向義大利天主教

企業界領導人士談中梵關係

4 0 8 第七節 馬尼拉總主教辛海綿樞機二度訪問中國大陸

4 1 3 第八節 一九八八年，風暴前的寧靜，靜觀遠處塵埃起

4 1 7 第九節 教宗致函全球主教談有關中國大陸教會的八點指示

4 2 1 第十節 中華民國政府正式邀請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訪問台灣

4 2 7 第十一節 教廷對北京天安門事件的反應

|       |             |  |
|-------|-------------|--|
| 4 3 4 | 第十二節        | 北京天安門事件對教廷與北京關係的影響                     |
| 4 3 7 | 第十三節        | 中國大陸地下教會成立忠於教廷之主教團                     |
| 4 4 7 | 第十四節        | 周書楷大使                                  |
| 4 5 6 | <b>第十一章</b> | <b>中梵外交關係理念的昇華與調整</b>                  |
|       |             | 一九九一年五月至一九九三年五月（黃秀日大使任期）               |
| 4 5 6 | 第一節         | 中華民國李登輝總統任命黃秀日為駐教廷新任大使                 |
| 4 5 9 | 第二節         | 中梵外交關係內容的突破與提升                         |
| 4 6 5 | 第三節         | 教廷國務卿索達諾樞機主教接受德國漢堡世界日報訪問，談及中國大陸教會狀況    |
| 4 6 8 | 第四節         | 台灣花蓮教區主教錢志純談「忠貞教會的見證及教廷的指示」            |
| 4 7 1 | 第五節         | 黃秀日大使                                  |
| 4 7 4 | <b>第十二章</b> | <b>教宗重申中梵關係的本質並積極東進中國大陸</b>            |
|       |             | 一九九三年五月至一九九六年八月（吳祖禹大使任期）               |
| 4 7 4 | 第一節         | 吳祖禹大使呈遞國書，教宗說明教廷在台設大使館的目的，並重申中梵外交關係的本質 |

|     |      |   |
|-----|------|---|
| 478 | 第二節  | 若望保祿二世在利瑪竇家鄉馬切拉塔談中國大陸教會，重申好教友必是好國民                |
| 481 | 第三節  | 教廷正義與和平委員會主席埃切卡萊樞機主教應邀赴北京，參與中國大陸第七屆全國運動大會揭幕禮      |
| 485 | 第四節  | 若望保祿二世視察教廷新聞室談兩個中國問題                              |
| 488 | 第五節  | 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派遣教廷萬民福音部部长董高樞機主教為特使，赴台主持紀念孟高維諾抵華七百週年慶典   |
| 491 | 第六節  | 香港胡振中樞機主教應邀訪問中國大陸                                 |
| 493 | 第七節  | 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蒞臨馬尼拉主持第十屆世界青年日，在真理電台二十五週年慶中向中國大陸教友發表廣播講話 |
| 499 | 第八節  | 若望保祿二世應邀向聯大發表演講，指出同一民族可建立聯邦或邦聯                    |
| 503 | 第九節  | 吳祖禹大使   |
| 507 | 第十三章 | 中梵關係理念趨於一致，共謀人類最高福祉                               |

一九九六年九月至二〇〇〇年九月（戴瑞明大使任內）

|       |      |                                   |
|-------|------|-----------------------------------|
| 5 0 7 | 第一節  | 戴瑞明大使向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呈遞到任國書              |
| 5 1 0 | 第二節  | 若望保祿二世聖方濟各·沙勿略瞻禮致在中國大陸教會文告        |
| 5 1 5 | 第三節  | 中華民國副總統連戰謁見若望保祿二世                 |
| 5 1 7 | 第四節  | 若望保祿二世關懷九七後香港前途                   |
| 5 1 8 | 第五節  | 張春申神父教授評中共「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狀況」白皮書         |
| 5 2 1 | 第六節  | 若望保祿二世擢升高雄教區主教單國璽為樞機              |
| 5 2 5 | 第七節  | 教廷外長陶然總主教向新聞界談教廷與北京的關係            |
| 5 2 6 | 第八節  | 亞洲主教特別會議在梵蒂岡揭幕，教宗誠盼四川萬縣兩位主教前來羅馬與會 |
| 5 2 8 | 第九節  | 教宗向駐教廷使節團表示：欣見台海兩岸中國人努力展開對話       |
| 5 3 0 | 第十節  | 教廷國務卿索達諾樞機主教稱：教廷駐華使館可隨時遷往北京       |
| 5 4 3 | 第十一節 | 中共發出八一七文件，為與教廷建交預舖天羅地網            |
| 5 4 8 | 第十二節 | 台灣天主教團體因應中梵外交關係生變                 |
| 5 5 4 | 第十三節 | 二十世紀教宗致中國大陸天主教徒最後一個訊息：            |

千禧年前夕教宗致中國天主教徒書（聖言成了血肉）

5 6 0 第十四節 教廷外交部次長米廖雷蒙席談對兩岸政策

5 6 4 第十五節 教廷開始公開關懷台灣的天災人禍

5 6 7 第十六節 北京擅自任命並祝聖五位主教

5 7 0 第十七節 北京又將擅自任命並祝聖主教，教廷提出四點警告

5 7 5 第十八節 教廷千禧年中央委員會主席埃切卡萊樞機主教赴北京參加「宗教與和平」會議

## 5 8 2 第十四章 教廷與北京關係急轉直下和極思補救

二〇〇〇年十月至二〇〇三年九月（戴瑞明大使任內二）

5 8 2 第一節 教宗梵蒂岡聖伯多祿廣場為中華一百二十殉道真福宣聖與中共的攻訐

5 9 0 第二節 羅馬額我略大學舉行利瑪竇抵北京四百週年學術會議，教宗向中華民族請求寬恕和諒解

5 9 4 第三節 各方對教宗為昔日教會子女的過錯向中國人民道歉的反應

6 0 4 第四節 北京政府尚未準備好與教廷坦誠對話

|       |       |       |            |                |           |                              |                       |                   |
|-------|-------|-------|------------|----------------|-----------|------------------------------|-----------------------|-------------------|
| 6 6 7 | 6 5 7 | 6 5 7 | 6 4 1      | 6 3 3          | 6 2 2     | 6 1 4                        | 6 0 8                 | 6 0 6             |
|       |       |       | <b>附 錄</b> | <b>參 考 書 目</b> |           |                              |                       |                   |
|       |       |       | 中外譯名對照表    |                |           |                              |                       |                   |
|       |       |       | 中梵外交關係年表   |                | 第九節 戴瑞明大使 | 第八節 游刃在矛盾與困難交錯縱橫中的中華民國與教廷的關係 | 第七節 香港天主教會面臨北京中共壓力的考驗 | 第六節 教廷間接設法恢復與北京對話 |
|       |       |       |            |                |           |                              | 第五節 陷入低迷、膠著中的教廷與北京的關係 |                   |





一九三六年，于斌祝聖為南京代牧主教後  
與駐華宗座代表蔡寧（中坐者）合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于斌總主教（中立者）晉見教宗庇護十二世後，與羅馬華人司鐸杜寶晉蒙席（右三）、羅光蒙席（左三）及潘朝英先生（右二）等人合影。



一九四七年三月，教宗庇護十二世與駐教廷公使吳經熊（右七）全家合影。（田默迪神父提供）



一九四七年，吳經熊（右）任駐教廷公使後，往比利時布魯日本篤會訪陸徵祥（左）。

總主教劉望遠到三教此以能陪侍一週備支教言獲益良多私心  
慶幸 總座離華後以日羅馬共黨報同報登載 總座在玉照謂  
總座之談話以示教廷於總座之言行表示同情也 光一  
句前往謁剛公彼詳詢 總座親見教宗情形 擇要以  
告彼以總座能親向 聖父陳明出國任務深以為幸又囑  
轉告 總座謂回國後即可向 黎公使談首都裏理主教事  
因傳信部長亦讚成此事也 俟 黎公使呈文到部後即可照  
辦云 先又謁孟棟義代理國務卿談廣州新主教人選事以廣  
州於今後抗政期間地位重要急須遴選中國人繼任主教如一  
時尚多困難則請派 總座為代理主教 謂此乃德生公使所  
切望者也 孟公答以即轉傳信部促請辦理此次 教宗聖誕演  
講為年孤立旁現主義實為 總座向美教胞說話奠一基礎  
白國把把被拘禁各國主教似電教宗表示痛憾 總座亦可電手  
國難嚴重 總座為國奔走 謹此傳大華生常以祈禱追隨  
左右敬祝

年禧

光謹上 十二月廿二

一九四八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羅光致于斌函。



駐教廷代辦朱英（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四年），拍攝時間應在一九四〇年左右。



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間，吳經熊（右二）著袍劍御侍服裝與于斌（左二）、羅光（右一）、杜寶晉（左一）合影。



一九五二年十月，黎培理赴台北，祝聖郭若石為台北總主教，並將駐華使館遷往台北。

野聲吾先德之夫 賜登日首日去月  
 六 廣不持志 種白附 分會訪日  
 受登為一呼 亞美或主 不情同人 華德奉  
 已如中 國大會 議野 一 致 熱烈 希生  
 免 近 考 加 乃 達 智 助 人 無 意 阻 碍 洪  
 與 不 測 無 不 憤 慨 同 情 小 乘 亦 未 有 必  
 為 故 言 之 者 去 真 終 誠 誠 在 此 特 有  
 且 前 氏 夫 之 表 示 叩 見 惟 不 能 三 江 時  
 仍 遂 列 之 希 國 以 示 擁 護 以 此 報 答  
 至 若 方 為 多 習 信 蓋 亞 細 亞 封 國 勢 不  
 可 能 但 此 事 決 定 之 時 友 友 亦 以 病 在  
 床 或 是 不 如 之 合 表 示 同 人 事 非 以 此  
 使 中 國 之 信 以 和 家 友 可 以 回 成 命 此  
 次 為 願 學 子 請 史 埃 爾 曼 考 考 考 考 考  
 Conte Galangzi & Prince M. Mellis (為 考 考 考)  
 二 禮 德 信 美 義 義 義 義 義 義 義 義 義 義  
 三 禮 德 信 美 義 義 義 義 義 義 義 義 義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一九五四年二月，謝壽康致函于斌樞機。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剛恆毅（右四）接受謝壽康公使（左一）代表中國政府授予之大綬景星勳章。

（ 第 一 ） 報 文 外

行政院長葉公超向行政院報告邀請田耕莘樞機赴台視察情形。

【中央社訊】行政院長葉公超，於昨日下午，在行政院大禮堂，召集各院廳處長，及各省長官，舉行重要會議，討論邀請田耕莘樞機赴台視察情形。葉院長在會中，首先報告田樞機來台之經過，及行政院之決定。葉院長稱：田樞機此次來台，係受其教廷之命，來台視察，並與我政府商討有關宗教問題。田樞機之來台，對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將有重大之影響。故行政院決定，邀請田樞機來台視察，並由外交部派員陪同。田樞機定於本月廿二日抵台，由外交部派員陪同，前往各省市視察。田樞機在台期間，將與我政府官員商討有關宗教問題，並與我政府官員商討有關宗教問題。田樞機之來台，將有助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並有助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田樞機之來台，將有助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並有助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

田樞機此次來台，係受其教廷之命，來台視察，並與我政府商討有關宗教問題。田樞機之來台，對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將有重大之影響。故行政院決定，邀請田樞機來台視察，並由外交部派員陪同。田樞機定於本月廿二日抵台，由外交部派員陪同，前往各省市視察。田樞機在台期間，將與我政府官員商討有關宗教問題，並與我政府官員商討有關宗教問題。田樞機之來台，將有助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並有助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

【中央社訊】外交部長葉公超，於昨日下午，在外交部大禮堂，召集各處長，及各省長官，舉行重要會議，討論邀請田耕莘樞機赴台視察情形。葉部長在會中，首先報告田樞機來台之經過，及外交部之決定。葉部長稱：田樞機此次來台，係受其教廷之命，來台視察，並與我政府商討有關宗教問題。田樞機之來台，對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將有重大之影響。故外交部決定，邀請田樞機來台視察，並由外交部派員陪同。田樞機定於本月廿二日抵台，由外交部派員陪同，前往各省市視察。田樞機在台期間，將與我政府官員商討有關宗教問題，並與我政府官員商討有關宗教問題。田樞機之來台，將有助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並有助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

田樞機此次來台，係受其教廷之命，來台視察，並與我政府商討有關宗教問題。田樞機之來台，對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將有重大之影響。故外交部決定，邀請田樞機來台視察，並由外交部派員陪同。田樞機定於本月廿二日抵台，由外交部派員陪同，前往各省市視察。田樞機在台期間，將與我政府官員商討有關宗教問題，並與我政府官員商討有關宗教問題。田樞機之來台，將有助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並有助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

【中央社訊】外交部長葉公超，於昨日下午，在外交部大禮堂，召集各處長，及各省長官，舉行重要會議，討論邀請田耕莘樞機赴台視察情形。葉部長在會中，首先報告田樞機來台之經過，及外交部之決定。葉部長稱：田樞機此次來台，係受其教廷之命，來台視察，並與我政府商討有關宗教問題。田樞機之來台，對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將有重大之影響。故外交部決定，邀請田樞機來台視察，並由外交部派員陪同。田樞機定於本月廿二日抵台，由外交部派員陪同，前往各省市視察。田樞機在台期間，將與我政府官員商討有關宗教問題，並與我政府官員商討有關宗教問題。田樞機之來台，將有助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並有助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

田樞機此次來台，係受其教廷之命，來台視察，並與我政府商討有關宗教問題。田樞機之來台，對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將有重大之影響。故外交部決定，邀請田樞機來台視察，並由外交部派員陪同。田樞機定於本月廿二日抵台，由外交部派員陪同，前往各省市視察。田樞機在台期間，將與我政府官員商討有關宗教問題，並與我政府官員商討有關宗教問題。田樞機之來台，將有助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並有助於我政府與教廷之關係。

一九五七年四月、外交部長葉公超向行政院報告邀請田耕莘樞機赴台視察情形。





一九五七年九月，田耕莘樞機（左五）訪台，  
參加歡迎餐會。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五日，教宗庇護十二世接見久違的田耕莘樞機主教。



一九五八年十月廿二日，追悼庇護十二世大禮彌撒在三軍球場舉行，蔣中正總統親臨參加，右一為方豪神父，右二為黎培理總主教，左一為郭若石總主教。



一九五八年十月廿八日，若望廿三世當選教宗後，向輪椅上的田耕莘樞機致意。

一九五九年二月傳信部長雅靜安樞機主教（中立者）訪台，與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左一）、高雄監牧陳若瑟（右一）合影。



一九六〇年或一九六一年，前教廷駐華使館秘書葛理耕（左）往台北拜會田耕莘樞機主教。



一九六一年五月，羅光、杜寶晉、鄭天祥  
晉升主教與教宗若望廿三世合影。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駐教廷大使沈昌煥呈遞國書後偕夫人與教宗保祿六世合影。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三日，教廷駐華大使艾可儀向蔣中正總統呈遞國書。

中華民國  
五十六年  
五月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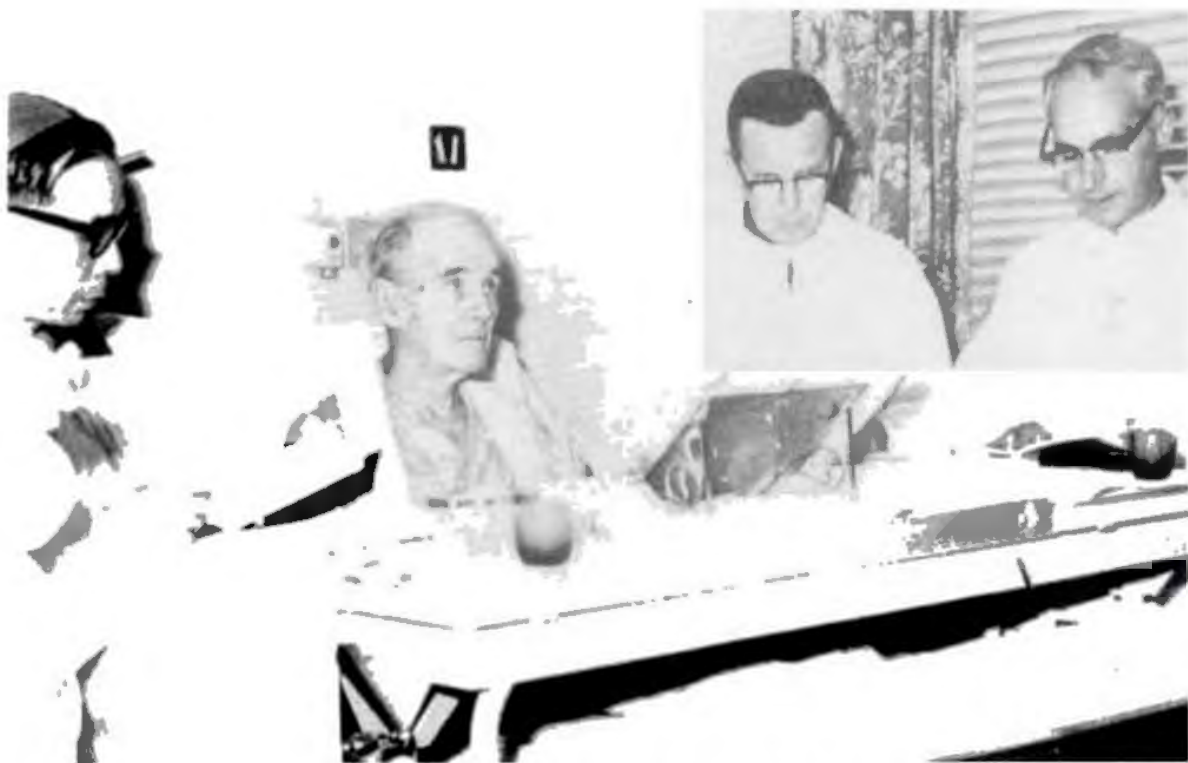
# 教廷駐華大使高理耀與中國主教團合影



一九六七年，教廷駐華大使高理耀（中坐者）與中國主教團合影。



一九六九年四月，駐教廷大使陳之邁（左三）呈遞國書後，與教宗保祿六世合影。



一九七〇年七月，華理柱主教被中共釋放抵港，在醫院中與艾可儀大使（右一）、香港主教徐誠斌（左一）共同舉行彌撒。





一九七六年，教宗保祿六世接見李震神父（右）、錢志純神父（中）。



一九七八年元月，陳之邁大使（右一）卸職離開羅馬，與本書作者江國雄先生在機場合影。

教廷國務院長卡薩羅利樞機主教  
(一九八〇年~一九九〇年)。



教廷國務院外長西爾維斯特里尼（一九  
八〇年~一九八八年）。



香港胡振中樞機主教。



一九八一年四月卅日，廣州總主教鄧以明  
(右) 晉見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一九八四年二月廿八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表「橋樑教會」談話後，與中國主教團成員及華人教友合影。



教廷傳信部部長董高樞機主教（一九八六年～二〇〇一年）。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國主教團（台灣）歡迎廣州鄧以明總主教（前排右五）訪台。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接見龔品梅樞機主教。



教廷國務院長索達諾樞機主教  
(一九九一年迄今)。



教廷中國問題專家切利總主教（右）。



教廷駐義大利大使高樂天總主教（右），及教廷外長陶然總主教（中），至機場歡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訪問歸來。



一九九一年元月，周書楷大使（左一）偕同外交團晉見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七日，黃秀日大使（左）向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呈遞國書。





一九九三年五月七日，吳祖禹大使（右）向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呈遞國書後，偕夫人與教宗合影。



一九九六年十月四日，戴瑞明大使（右）向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呈遞國書。



一九九八年二月廿三日，戴瑞明大使（左）感謝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拔擢高雄主教單國璽（右二）為樞機主教。



二〇〇二年一月十一日，駐教廷大使戴瑞明偕同外交團向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賀年。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由右至左依序為戴瑞明大使、格霖澤代辦、單國璽樞機主教、杜筑生次長、狄剛總主教。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場情形。



二〇〇三年一月，本書作者江國雄（右）與陳方中（左）在義大利江宅合影。

第一部份

陳方中 著

中梵外交關係的  
建立與發展

# 第一章 導讀：原則、政策與事件—— 觀察中梵外交關係的三個層次

「國家」是外交的主體，因此「外交的目的，在實現國家的目的。國家最基本的目的，在保持本身的生存與發展。」<sup>1</sup>而這種國家目的或可用邱吉爾所謂的「國家利益」稱之，所有國家至少都有三種基本利益：(1)維護國家的生存，包括人民的生命安全及領土的完整。(2)增進人民的經濟福祉。(3)維護國家的獨立自主。<sup>2</sup>

由於每個國家間，為保持其國家主權，或者為增進其國家利益，必然存在著競爭的關係。換句話說，由於每個國家各為其本身的目的考量，其外交目標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所謂的國際合作，其實只是暫時國家利益的結合而已。<sup>3</sup>在此前提下，所謂的外交關係經常是依循著兩國不同的國家利益而不斷的產生變化。我們若以這些變化來觀察外交關係，可能只能得到一連串不同事件的描

1 傅啟學，〈中國外交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一年四月改訂一版），頁三。

2 Frederic S. Pearson, J. Martin Rochester 著，胡祖慶譯，〈國際關係〉（台北：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五年初版），頁一二三。

3 陳樂民主編，〈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版），頁二十一。

述，但是對於更深入的關係，則沒有辦法解釋得清楚。那要如何做才能解釋得更深入呢？

為了深入探討中梵外交關係，本文決定借用年鑑派史學大師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的概念，他認為歷史分成三個不同的層次：結構（長時段）、局勢（中時段）與事件（短時段）。越是長時間不變動的因素，它就越具有深入影響人們行為的能力。而歷史的解釋要分別從這三個不同的層面加以思考，才不會僅為單獨的事件所惑。<sup>4</sup>

按照布勞岱爾的定義，中梵外交關係所能牽涉到的時間，就算往前延伸到一八七〇年義大利軍隊佔領羅馬為止，也不過一百多年，稱不上長時段。因此本文並非嚴謹的採用布勞岱爾的方法，僅係借用其概念。觀察中梵外交可分為原則、政策及事件三個層次。所謂原則，指的是一個國家或某種政治實體，依其歷史、地理、民族性、文化生活所自然蘊育而成的國家目的；這種國家目的不會在短時間之內有所變化，而外交基本上應遵循這樣的原則而發展。所謂政策，指的是因世局的變化，以及外交執行者對原則的不同體認，在不同時期所提出的外交方針；在某個時期中，政策也是相對而言有其一致性的；但相較於原則來說，政策顯然就具有變異性。而各個外交事件的發生，驟看之下是單獨的突發事件，但實際上皆有脈絡可尋，這個脈絡就要從原則及政策中去爬梳了。

外交史學者也有極類似的架構。傅啟學稱：「外交原則，係由外交目的確定，乃一國對外行動之準則，一國依其地理歷史政治諸環境，所確定的基本原則。外交政策乃實現外交原則的方略，此種方略因時勢的推移，環境的轉變，利害的取捨，而可以隨機應變。……」例如：英國近五十

4 Fernand Braudel 著，劉北成譯，《論歷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初版），頁一～五。

5 傅啟學，《中國外交史》，頁五～六。



年來外交政策的主流是與美國維持良好的關係；而在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的政策則是避免使法國主宰歐陸，而在這些不同的政策中，可以看出英國維持歐洲均勢及保持本身均勢的原則。<sup>6</sup>

本文即嘗試用此架構，觀察中梵外交關係的發展。

## 第一節 中梵外交關係的原則

### 一、建立原則的歷史背景

#### 1. 教廷

在一八七〇年以前，教宗除了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宗教領袖外，也是同時擁有世俗領土的君主，他的領土稱為「教宗國」(Papal States)。由於擁有領土，教宗國的外交難免需顧及教宗國的世俗利益。另一方面就教宗國的世俗規模言，卻只是歐洲的三等弱國，必須憑藉著精神層面的影響力，周旋於法、奧兩個天主教勢力間；運用這些國家基於某時期政策的支持，對抗義大利，以及教宗國內部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sup>7</sup> 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爆發，長期保護羅馬的法國軍隊撤退，

<sup>6</sup> Robert A. Pastor 編著，董更生譯，《二十世紀之旅》(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二〇〇〇年二月初版)，頁三十八、六十三。

<sup>7</sup> Daniel Rops, *L'Eglise des Révolutions—En Face des Nouveaux Destins*, p.366, pp.461-464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60).

義大利民族主義者藉機進入羅馬，完成了義大利的統一，教宗庇護九世（Pius IX）自我封閉於梵蒂岡城中，自稱為「梵蒂岡的囚徒」<sup>8</sup>。自此以後，除了小小的梵蒂岡宮廷，教宗不再擁有任何世俗土地。沒有實質國土的教廷，她的外交考量遂與一般國家不同，因為她已無一般國家的世俗「利益」需求。教廷乃可將其注意力完全集中於精神層面，回歸其宗教本質。

## 2. 中國

由於中國在亞洲長期政治、經濟及文化的優勢地位，使得中國在與其周圍的國家，特別是與海上國家交往時，保持「天朝」的姿態。在外交形式上，形成一種上對下的關係。各國商人們以朝貢為名，實際上進行貿易活動；中國政府在這種關係中，滿足了心理上的驕傲，但也實際上理解這種外交關係中的牟利特質。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歐洲海洋國家，基本上遵循了這套規則，遂在雙方關係中保持了平衡。

這種平衡關係在十九世紀為歐洲的海上霸主英國打破，自十八世紀中葉以後英國就想要以西方的平等外交概念，加諸於中國，以謀求英國的最大利益。然後從鴉片戰爭到英法聯軍，引起衝突的文化背景是：「中國不願更進一步的加入國際生活，西人則無論如何不得讓中國閉關自守。」<sup>9</sup>然後中國被迫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負責處理和歐美各國的外交。在這個被迫學習的過程中，由於不斷體認到西方各國和中國國力的差距，中國逐漸的接受了西方的外交體系及外交觀念。

<sup>8</sup> 威利斯顿·沃爾克著，孫善玲等譯，《基督教會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一版），頁六五七。

<sup>9</sup> 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各章引論》，《中國近代史研究》（台北：里仁書局，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出版），頁三十一。

可以這樣說，在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件後，中國已在和西方相同的外交平台上，用相同的外交語言，處理外交事務。

歐美各國中最關心宗教問題的是法國。在法國的外交思惟中，當英美等國在中國取得外交利益時，法國必須要與其競爭，以免在外交戰中落後。由於法國在華幾乎沒有商業利益，保護天主教傳教活動，遂成法國對華外交的主軸。一八四四年，法使拉萼尼（Théodore M.M.J. de Lagrené）在中法黃埔條約中，要求中國弛禁天主教，一八五八年的中法天津條約及一八六〇年的中法北京條約，則使得天主教得以在中國自由傳播；法國並聲稱由於中法條約的簽訂，取得了保護傳教的權利。我們一般稱之為「法國保教權」。

## 二、教廷對華外交原則

### 1. 中國教會之自由與發展

「教廷」顧名思義即為教宗之宮廷；教宗擔任全世界天主教之領袖，他所關心的焦點就是普世天主教的教會。因此，教廷這個近似虛擬的實體，與各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目的，主要就是當地教會的福祉。對中國而言，教廷關切的焦點，當然就是中國教會的自由與發展。而中國教會的自由與發展，首要必須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與瞭解。

首任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Celso Costantini）總主教在一九二三年元旦覲見北洋政府總統黎元洪時致詞說：「……鄙人確信全國天主教徒為公益而祝禱，並致力協助社會秩序與福利，以言以行

尊重合法政權與法令。<sup>10</sup>」而一九四三年在謝壽康公使呈遞到任國書時，教宗的歡迎辭中說：「……雙方今天順利開展的關係，來日必續發展、昌盛，而不久在遙遠的中國，虔誠教會兒女們，都可以看到公正且恆久的和平旭陽，在祖國及世界各地昇起，所有民衆如兄弟般合作，建設嶄新及幸福的中國。」<sup>11</sup>在這些冠冕堂皇的言詞中，主要在強調中國教會與中國政府及人民的協和一致，而這正是由剛恆毅延續至黎培理乃至以後，中國教會的首要之務。

一九九六年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也同樣表達：「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儘管放心。一個基督信徒能在任何政權下度他的信仰生活；他所要求的，不過是依照自己良心和信仰而生活的權利，受到尊重。」<sup>12</sup>而在這個最大讓步及最小要求的前提下，教會聖統是教廷不能放棄的底線。中國教會必須明確的屬於普世教會的一員，中國政府不能侵犯中國教會的這個基本權力；因為教宗既無世俗國土，就沒有國家利益；而純粹屬靈的、精神的關係，是世俗政權不應干涉的。

## 2. 大型教會利益優先於小型教會

所謂的普世教會是由各國家或地區的地方教會共同組成，在各個國家或地區，有其不同的政治考量及利益傾向；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間發生衝突時，有時不同的地方教會遂亦處於不協合一致的狀態，教廷在面對不同國家間無法化解的衝突時，她自然會以較重要的教會為其主要考量。何謂較

10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上(台北：天主教徒會，一九七八年出版)，頁六十三。

11 陳方中、吳俊德編，〈謝壽康呈遞到任國書時教宗庇護十二世致歡迎辭〉，〈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台北：輔仁大學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二〇〇二年九月出版)，頁二〇五。

12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致在中國的教會〉，〈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四五七。

重要教會？雖然在信仰原則中應是不分軒輊，沒有大小、強弱之分，但既然教廷外交牽涉到「國家」、「政權」，有時她們就必須做出選擇，而這個被選擇的較重要教會，多半是受迫害較多的地方教會。

例如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六年間，清朝政府與教廷磋商通使，法國政府反對，向教廷表示，如教廷派使赴華，法國政府即撤回駐教廷大使，聲明法國與教廷所訂的條約作廢，同時也停止法國政府給與法國教會每年的津貼<sup>13</sup>。教廷在考量後，決定將駐華大使的派任延期。可以推論教廷決定的主因是中國教會可暫時不通使，而法國教會則會因通使受莫大傷害，而法國教會重要性超過中國教會，因此暫停與中國通使。

此亦可用來解釋當前教廷對待海峽兩岸政府之態度；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持續表現出不友善態度，但基於對中國教會一千萬以上信徒的考量，教廷從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即對其不斷釋出善意。但另一方面，雖然中華民國政府與台灣教會有良好的關係，教廷在考量中國教會的因素下，相對來說在不同階段，對中華民國政府採取了一種較冷淡的態度。

### 3. 照顧所有地方教會

聖經中有善牧的比喻，耶穌基督自比為牧羊人：「你們中間有那個人有一百隻羊，遺失了其中的一隻，而不把這九十九隻丟在荒野，去尋覓那遺失的一隻，直到找著呢？」（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四節）教宗是耶穌在現世的代表，他就是各地方教會的牧羊人。因此擔任一個「善牧」，是對待

<sup>13</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台中：光啟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八月台初版），頁二〇二。

大小教會關係的主要原則。

在現實的外交關係中容或有優先順序，但正如葛錫迪樞機 (Edward Idris Cardinal Cassidy) 所言：「聖座對台灣人民或是中華民國政府福祉的關愛並未因此改變而減少。與一九七一年後其他國家在台北的使館不同，教廷駐台北的使館從未關門，同時中華民國駐教廷的使館則持續正常運作。」<sup>14</sup>

這種「善牧」原則有時亦會表現為看似現實的外交行為，因為既然地方教會才是教廷外交所重視者，各國政府對待教廷的態度就成了次要的問題。教廷公使黎培理 (Antonio Riberi) 總主教在一九四九年駐守南京不去，宗座代表蔡寧 (Mario Zanin) 總主教在抗戰時期發表「勿左勿右」公函，甚至吉林代牧主教高德惠 (Auguste-Ernest Gaspais) 在偽滿州國內擔任非正式的宗座代表，皆可視為這種原則的產物。

#### 4. 依循世界外交主流

教廷不存在世俗的外交利益，但她仍然有外交利益，她的利益是各國的天主教會。在不違背前三項原則的前提下，教廷經常依循世界外交的潮流，不故意標新立異，以免引起各國天主教的紛爭。而世界外交實由強權所操縱，教廷發言權不大，所能影響亦有限。

在中國問題方面，教宗庇護十二世 (Pius XII) 於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間保持低調，係因夾於德義日及英美兩方之間，在不損及中國教會利益的原則下，同意單方面通使。而在海峽兩岸分治的現在，教廷基本上採取名義上「一個中國」原則，因為這是大部分國家採取的態度。地方教會

<sup>14</sup> 葛錫迪，〈序〉，《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十一。

的成員，在其國家認同下，不一定以教廷外交的此種原則為然，此亦無可厚非。但需了解此乃神聖事務進入國際外交，有時必須做的現實選擇。

世界外交迄今為止，主要仍由歐美強權控制，主持教廷外交者絕大部分為歐洲人，甚至可說就是以義大利人為主。因此教廷外交不敢說有一種歐美優先的原則，但至少可說具有這種傾向。

這些不同的原則之間並不具有邏輯上必然的連貫性、包容性或一致性，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矛盾的。這些不同的原則是形成教廷外交政策的基礎，但是也可說這個基礎不盡然是完全合乎邏輯的。

### 三、中華民國對教廷外交原則

#### 1. 中國利益

為中國政府而言，她是站在國家立場考量其與教廷的關係。對被強迫納入西方外交體系的中國政府來說，在外交史中不斷面臨失去各種國家的權利，因此外交工作的主軸，是儘量減少國家權利的損失，或是藉用各種的國際交涉，甚且能爭取到國家權利的恢復。

教廷由於沒有世俗利益，因此至少可扮演著「增加友邦」的角色。另外中國教會的獨立自主，是符合中國利益的；因此從中國政府的想法出發，對教廷外交所長期關切的，是中國教會的獨立自主。

#### 2. 整體外交關係中的次要考量

一九〇〇年時的中國天主教教會人數不足百萬，一九四九年時約三百多萬，一九七〇年時約

四百萬，二〇〇〇年時約一千萬，佔全國人口的比例從來不足百分之一。教友在社會中多非麻煩製造者，亦無強有力的社會組織；就算沒有與教廷的外交關係，基本上對中國亦沒有太大傷害。另一方面教廷在國際間多進行道德勸說，幾乎沒有任何實際政治干預，中國能透過教廷增進國家利益者有限。因此，雖然中國並不反對與教廷建立良好關係，但必須放在整體外交關係中考量；而考量的份量，通常是次要的，並非主要的。以一九一八年中梵通使為例，在法國反對下，雖然中梵雙方已談妥建交條件，但中國政府最後決定延期通使，最主要的考量就是不願開罪法國。<sup>15</sup>而教廷的份量，在現實外交中是次要的。

若中國天主教教友比例不大幅增加，教廷在國際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沒有根本改變，則此種次要原則亦不會改變。

#### 四、中梵外交關係互動的原則

##### 1. 以「中華教會」為焦點

教廷對華外交之最主要重點，在於中華教會之自主與發展；而自主之中華教會亦符合中華民國政府之利益，故中梵外交之重心，乃在中華教會。

在中梵外交史上，重大的交涉事件除了建交及升格問題外，幾乎都與中華教會有關。例如康熙年間教宗欽使多羅 (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及嘉樂 (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

<sup>15</sup> 方豪，〈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下，〈天主教學術研究所學報〉第七期，頁四十三。



來華，主要就是要解決傳教士從屬問題及「中國禮儀」問題。<sup>16</sup>而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教廷建交的障礙，主要仍是中國教會的從屬問題。而從駐華首任宗座代表剛恆毅開始，歷任宗座代表及正式的公使、大使，對中華民國境內的天主教會，均有領導權，並實際參與地方教會事務。

## 2. 雙方外交考量中的次要關係

對中華民國政府言，由於對教廷無太多利害，故其關係亦非絕對重要。對教廷而言，或多或少需依循強權政治軌跡，主持外交者亦以歐洲人士為主，難免有歐洲優先的傾向，再加上中國教會規模不大，故在優先順序上，對華外交並非最重要事務。此所以一九四〇年，當國民政府欲遣使教廷時，教廷婉拒的原因，教廷的理由是：「惟目前國際緊張時期，不容有任何政治表示。」<sup>17</sup>換句話說，對德義英美日外交的重要性，是超過對華外交的。

## 第二節 中梵外交關係的政策

### 一、政策：人與原則的互動

前述的原則，並沒有邏輯上的必然聯繫，每個原則之間甚至還有矛盾，要依據何種原則形成政

<sup>16</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八十三。

<sup>17</sup> 〈對教廷派使來華外交部內意見〉，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二〇。

策，一是看所面臨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則是由外交政策的執行者來決定。也就是說，有能力影響外交政策者，在其個人的主觀認知上，依所面臨的環境，決定其外交方針。因為每個人的主觀認知不同，雖然原則不變，但每個人會依其不同傾向，選擇不同的原則，形成其外交政策。因為人的多變及主觀，也因為不同時期的不同情況，遂使政策呈現出不斷變動的狀況。

從教廷方面來看，主持外交的機構是國務院，國務卿應是外交行動的決策者；但是由於教廷是教宗的宮廷，國務卿較像是教宗的外交幕僚。歷任教宗在擔任教宗前又多有外交經驗，因此教廷外交政策的決定者往往是教宗，這時的國務卿只是教宗外交政策的執行者。因此以不同的教宗來劃分不同時期的教廷對華外交政策，是一個適當的方式。

從中華民國政府架構而言，外交部是負責外交的機構，外交部長也擁有一定程度的外交決策權。但中國現代史中內亂外患不斷，連帶牽動政府人事的頻繁更動，也使政府缺乏連貫性的外交思維。再加上對教廷外交，在外交專業人員看來較次要，多半是配合其他較重要外交關係的附屬品，遂使中華民國對教廷的外交呈現出一種被動、等待的氣氛。而其政策的形成，國家領導者及外交部長多半並無定見，而是依照教廷對華外交政策的變化、時局的需要、國家長期的利益、過去外交政策蕭規曹隨等因素形成因應的對教廷政策。因此中華民國對教廷外交政策的分期，與個別的國家領導者或外交部長較無關係，主要是與中華民國所面臨的國際局勢相聯繫，並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教廷派出駐華的代表或使節，均擁有相當大的權限，他們秉持不同時期的教廷外交政策，代表教宗指揮中國教會，並在關切中華教會發展的前提下，與中華民國政府交涉。他們發回教廷的意見，一般而言相當受到尊重，並能對教廷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派駐

教廷的使節，其性質則與教廷駐華外交人員不同，也與一般外交人員有異，因為教廷無僑胞照顧、經濟往來等一般業務需處理，他們是中華民國就國內教會問題和教廷溝通的管道，也是持續於外交處於弱勢的中華民國，尋求國際支持及透明度的窗口。<sup>18</sup>

在中梵外交關係中，中華教會人士是能影響雙方外交政策的特別人物。中華教會的組成分子是神職人員與信徒，神職人員又可分為本國神職與外籍神職。國籍神職的教會意識不需質疑，但另一方面在近代民族主義的薰陶下，抱持國家意識也是理所當然的；而促進教廷與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是結合教會意識與國家意識的最佳途徑。外籍神職基本上投身於這塊他們傳教的土地，但他們多半仍保持其對母國的國家認同；雖然他們多半不牽涉外交活動，但在現代中國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中，有時他們也被迫必須做出政治選擇。因此在國籍神職與外籍神職間，由於立場不同，遂不時會出現不同的主張。<sup>19</sup>

教廷駐華外交人員從中華教會的不同組成分子中得到各種訊息，做為其處理中華教會事務的依據；國務院根據教廷駐華使節的報告及中華教會中經由各種管道呈上之訊息，決定教廷外交行動的優先順序及合理性；有關傳教事務，教廷有傳信部負責，中華教會各教區的主教每年有定期及不定期的報告，各傳教團體的在華傳教士亦有報告給其羅馬的總部，傳信部亦從各傳教團體了解傳教區的情形；教宗再依據國務院及傳信部的報告，了解中國政府及教會的實況，再據以決定其對華之政

<sup>18</sup> 陳方中，〈于斌與中梵外交關係——庇護第十二時期（一九三九年—一九五八年）〉，〈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出版），頁二八七。

<sup>19</sup> 同前。

策。在這過程中，中華教會的神職人員可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政府官員對中華教會了解有限，與教廷官員亦乏私交，因此在處理對教廷外交時，有時須徵詢教會人員意見，或是要借用地方教會與羅馬教廷的公私關係，以協助外交活動進行。因此對中華教會的領導階層而言，他們是習慣於接觸中梵外交的。特別是國籍神職，他們更衷心期待他所愛的祖國與教會能合作無間，於是國籍神職甚或會主動提出中梵外交構想，然後在教廷與中華民國政府雙方間活動，以促進中梵關係更形緊密。而政策就是在這些複雜的人際關係中形成。

## 二、教廷對華外交政策

### 1. 庇護十一世時期的政策：消除法國在華保教權

從教廷對華外交的首要原則——中華教會出發，庇護十一世 (Pius XI) 秉持其前任教宗本篤十五世 (Benedict XV) 的決心，決定要將扭曲的中華教會現象，逐漸使其往合理、正常的方向發展。而造成這些從教會觀點看來不合理現象的主因，就是法國在華的保教權。

本篤十五世一九一九年頒佈的「夫至大通諭」主要就是針對中國教會之病徵而發；教宗在這篇通諭中特別提醒傳教士：「……當省念爾非傳布世人之邦國，乃傳布基利斯督之邦國者也，亦非為在世之本鄉，乃為在上之天鄉而收錄郡人者也。」「設令傳教士但有幾分參用塵世謀為，並不全以宗徒之為人自處，且示人於本邦國事已亦宣勤，則其種種事功，立即招來萬眾之疑猜，疑猜本易引人到此理想，即以基利斯督之教，為某外洋邦族之私教云，而凡奉此教者，遂見以為服屬於外洋郡

國之保障與權政之下，而反脫離本里郡國之關係也名分也。<sup>20</sup>」

庇護十一世遂以本篤十五世的通諭為依據，在一九二二年派遣剛恆毅總主教來華，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在決定祝聖首批六位中國籍主教之後，發佈了「余即位伊始」通諭，在此通諭中，教宗清楚的分別傳教活動和保教權的關係。他說：「若夫某國政府，在某地方，願負保衛聖教之責，聖教決未恃此保護，損及地方人民，不過妥置自身，及其信眾於安全，以免人之摧殘而已。蓋一國之民，勿論僑居何處，其國家皆有保護其生命權利，及財產之天然名份，此理之當然，不容或疑者。傳教士窘迫之際，乃得享受此保護。故宗座所以未行辭謝此種保護者，祇以免除惡人，對於傳教事業之謀害侵凌而已。至於外國政府，保護僑民，在某種機會之下，或有其他政策，聖教會決不加以贊成也。」「余甚願上述之旨，俾眾周知，使如斯廣大，如斯為余鍾愛之國中，諸種誤會一致免除，仇視教會教士之心，完全息止。<sup>21</sup>」

在教宗庇護十一世力圖消除法國保教權的政策下，前後兩任的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及蔡寧是政策的執行者，教廷在這段時間已與中華民國政府建立起準外交關係，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主教被任命，其中包括中國教會日後重要的人物——于斌。這時教廷的外交顯示出較多的自主性，較少受到歐美外交的牽絆。

## 2. 庇護十二世時期的外交政策（一九三九年—一九五八年）

<sup>20</sup> 本篤十五世，〈夫至大至聖之任務〉，《公教教務公文》（北京：公教教務聯合會，一九二六年六月出版），頁十一—十二。

<sup>21</sup> 庇護十一世，〈余即位伊始〉，《公教教務公文》，頁六十一。

從本篤十五世到底護十一世，國務卿加斯巴力樞機主教（Pietro Cardinal Gasparri）在對華外交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一九二九年接任國務卿的柏徹里樞機主教（Eugenio Cardinal Pacelli），長期擔任教廷外交官，有豐富的實務外交經驗，<sup>22</sup>因此在一九三九年被樞機團選舉為教宗後，他在對華外交上扮演了更直接的角色。由於時局的變化，對國際形勢的變化相當敏感的庇護十二世，在他任期內，其對華外交政策還可分成四個不同的時期：

(1)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四年：審慎觀察、平衡冷靜

庇護十二世就職後面臨的是瀕臨戰爭狀態的歐洲。他積極的呼籲和平，並且提出和平方案，希望能解除歐洲的戰爭危機。<sup>23</sup>因此在庇護十二世的思维中，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要放在這個戰爭的危局中去思考，避免任何不謹慎的行動，引起交戰國中任何均勢的破壞。

由於日本與德義在二次大戰中採取聯盟立場，因此與交戰的中日雙方的關係，不僅是中日兩國，還牽涉及德義與敵對的英美各國。這些國家的國際發言權都高於中國，與中國的外交接觸有可能牽動德義的不滿，有危及任何和平機會的可能性，甚至可能破壞梵蒂岡的安全，因此庇護十二世決定採取較保守的對華外交。不過基於平衡的考量，教廷不能偏向義德，因此對日本之外交政策亦需慎重。

另外一個考量因素是日本已佔領不少中國領土，在佔領區的中華教會，亦有賴謹慎的教廷外交

<sup>22</sup> 黎正甫，〈庇護十二世的生活〉（香港：真理學會，一九四九年三月初版），頁二十—四十三。

<sup>23</sup> Pierre Blet, S. J., *Pius XII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p. 5, pp. 21-25 (Herefordshire (U.K.): Gracewing, 1999).

加以保全。但是另一方面，國籍神職有表達其愛國情感的權利，與合法之中華民國政府關係也應持續；在中日雙方，在國籍神職與外籍神職之間，在「後方」與「淪陷區」之間，審慎而冷靜的外交政策都是有必要的。

(2) 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八年：增進與中華民國政府關係，改善中華教會體質  
義大利法西斯政權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崩潰，然後德軍佔領了羅馬。庇護十二世拒絕離開羅馬，他表示曾命各地主教堅守崗位，而他自己當以身作則。<sup>24</sup> 苦撐待變後，一九四四年六月，英美軍隊進佔羅馬，羅馬脫離了戰爭的苦海。雖然戰爭尚未結束，但庇護十二世已經看出大局已定。

以往必須謹慎在英美德義日間走鋼索的教廷外交，現在面臨了比較清晰的局勢，以往阻礙教廷增進與中華民國政府及教會關係的國際因素也不復存在，因此教廷對華外交現在可以快步向前，單純的以中華教會的發展為最重要考量。

一九四五年以蘇俄為首的共產勢力興起，迅速的與信奉自由經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形成對立。由於共產主義是無神論，是反對一切宗教的，面對東歐國家一個個納入鐵幕，教宗勢須在思想上與其對抗。<sup>25</sup> 反映在中國問題上，在二次戰後迅即展開的國共內戰中，教廷自然是站在反共的國民政府這一邊；而教廷首任駐華公使黎培理，就是教宗庇護十二世反共政策的執行者。

### (3) 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一年：堅守崗位

<sup>24</sup> 黎正甫，〈庇護十二世的生活〉，頁一一九。

<sup>25</sup> 同前，頁一三〇。

在一九四八年底國共內戰的局勢中，已可明顯看出中共佔了上風。在面對中共已控制越來越多中國領土的情況下，教廷對華政策必須考慮面對中共政體之可能。教宗在任駐巴威（Bavaria）王國（現德國南部）大使時，在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的內亂中，他不顧危險、堅守崗位<sup>26</sup>，二次大戰末期他也堅守羅馬不去；面對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國的擴張，他也要求各地的主教們必須堅守崗位，照顧好自己的地方教會，不懼可能的各種挑戰及危險。

一九五〇年教廷駐華使館秘書葛理耕（Martin Gilligan）的一篇演說詞，把這種精神表現得非常清楚：「……傳教人員在接受了他的新國家以後，他就把那國家裡的人民，看做自己的羊群，而和他們建立了深沈和真摯的友情，這友情使他在一切危難中，絕不放棄他守護羊群的責任。<sup>27</sup>」

(4)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八年：擺盪於名義上的中國政府與現實的大陸教會間

教廷禁止中國教會神職「逃難」的作法，並未得到中共的正面回應，一九五一年九月，在歷經兩個多月軟禁後，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仍被驅逐出境。於此同時，中共有計劃的將外籍傳教士陸續遣送出境，大量監禁仍對教宗效忠的國籍神職、修女及教友，並開始推動脫離教會聖統的，所謂自治、自傳、自養的「三自教會」。中共這些持續性的做法，已經撕破了教廷對華外交的底線。在海峡另一邊，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府已愈趨穩定，且已獲美國支持，而這個在過去與教廷友好的政府仍聲稱擁有中國主權，在諸種因素考量下，恢復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關係，就形成了此時期教廷

<sup>26</sup> Nazareno Padellaro, *Pie XII*, p.34 (Sceaux (France) : Imprimerie de Sceaux, 1965).

<sup>27</sup> 蘇若奇編，〈中國近代教難史料（一九四八—一九五七）〉附錄十二（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二月初版）。



對華的外交政策。

但是政策是有延續性的，庇護十二世的堅守崗位政策沒錯，只是他遇見了一個蠻橫的對手。台灣的教會在未復交前也未受迫害，而相對來說廣大的中國教會則大受迫害。因此即使基於國際現實，將中國使館由南京遷來台北，但也不能太過活躍，應該保持低調，以免刺激中共。

黎培理作為庇護十二世外交政策的執行者，對於政策的理念與教宗應是一致的，但在此擺盪而微妙的拿捏中，教廷與黎培理間對於做到什麼程度會刺激中共，顯然已不同調。<sup>28</sup> 教廷的對華政策，不完全聽從黎培理意見，背後應是教廷內同情中華民國政府的力量運作的結果。

### 3. 若望二十三世的對華外交政策：明確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增進台灣教會發展

自一九五六年開始，中共即在中國天主教內部推動「愛國會」組織，另一方面則更進一步逮捕不願加入或組織愛國會的教會人士。在教廷立場看來，成立愛國會，是把「在東歐進行的反對天主教教會的鬥爭的前鋒轉到中國境內了。」<sup>29</sup>「梵蒂岡曾經警告過中國的天主教徒們不要參加『愛國會』，因為他們顯然是受共產黨控制的。」<sup>30</sup>「企圖使中國的天主教會隸屬於『一個由無神論者統治的極權主義國家』之下。」<sup>30</sup>

一九五八年十月，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在這種中梵間極度不友好的氣氛中登基；在他

<sup>28</sup> 黎培理基本上不主張使館遷台，使館遷台後，復不主張中華民國恢復使節派駐教廷。（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六五、一七四。

<sup>29</sup> 羅漁、吳雁編，〈大陸中國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記〉（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初版），頁四十三。

<sup>30</sup> 同前，頁四十九。

看來，短時間之內不可能修復這道鴻溝，過去教廷在台灣方面保持的低調，對中共沒有任何影響。他甚至斥責中共企圖製造裂教，他也指責部分軟弱的神職人員：「他們向迫害者的指令妥協，甚至連褻瀆的主教祝聖亦加以接受。……為了這種完全不合法的行為，他們就算篡奪了看管基督羊群的牧職，況且還在羊群間帶來了恐懼、混亂和惡表。」<sup>31</sup>在這種局勢和思惟中，他的政策轉向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代表中國，並積極扶助台灣教會的發展。

另一方面必須了解，若望二十三世的反共政策主要是針對中國，並不代表他和共產政權劃清界線。在冷戰的衝突中，他曾在一九六二年的古巴飛彈危機時，充當美蘇間的和事佬，並在一九六三年於梵蒂岡圖書館接見了赫魯雪夫的女兒及女婿。<sup>32</sup>而他號召組織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這種和好、溝通的態度，更是若望二十三世「好好教宗」外號的最好說明。

#### 4. 保祿六世的對華外交政策：從名實相符的兩個中國轉向名義上的一個中國

保祿六世 (Paul VI) 在一九五五年以前，有二十二年之久，擔任教廷外交工作；他在庇護十二世的後期，擔任代理國務卿，然後外放米蘭總主教的職務。<sup>33</sup>他實際上參與了非常多的教廷對華外交，在了解中梵外交的中國神職眼中，孟提尼總主教是一個穩健持重但關心中華教會的教廷官員。

他在庇護十二世時期，僅能擔當助手；但他出任教宗後不久，隨即展現出他的新外交思惟——

<sup>31</sup> 同前，頁五十六、五十八。

<sup>32</sup>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列品在即〉，網路資料，無作者及出版資料。

<sup>33</sup> 徐熙光編著，〈保祿六世及其思想〉（台北：新紀元出版有限公司，民國五十五年九月初版），頁二。

由對話導致和平。他在一九六四年主張與共產主義者會談，雖然「他們不單要徹底破壞我們的聖道，並且使用暴力壓迫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進行會談當然是困難的，但是卻不能說這是不可能的。……<sup>34</sup>」他也贊成聯合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會。

聯合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代表應排斥中華民國。在「和平」優先的前提下，他積極遊說主導世界外交潮流的歐美強國，支持他兩個中國的政策；但是他注重實際利害的想法，並未被世俗國家接受，其中包括海峽兩岸的政府。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取得了聯合國「中國」的席位，這代表國際外交主流仍是以「一個中國」政策看待海峽兩岸的政權，於是在考慮主要外交潮流後，保祿六世亦逐漸調整了其「兩個中國」政策，漸向「一個中國」政策傾斜。

### 5. 若望保祿二世的外交政策

若望保祿二世來自波蘭，這位即位時五十八歲的年輕教宗，基本上沿襲著保祿六世的外交政策。不過隨著時間的發展，在中梵外交上，若望保祿二世也愈有自己的意見。大致上而言，若望保祿二世的外交政策，以一九八四年為界，可以再細分成兩個不同的階段。

(1) 一九七八年—一九八四年：降低與中華民國外交層級，積極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接觸

若望保祿二世即位後，外交政策基本上聽從代理國務卿卡薩羅里 (Agostino Casaroli) 總主教的獻策。在保祿六世的外交幕僚中，卡薩羅里原本就是處理中國問題的，他願意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34 保祿六世，〈祂的教會〉通諭，〈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四一二。

展現更多的讓步與善意，以換取教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改善。保祿六世時代，教宗自己拉著這位外交幕僚，不致跑得太遠；但在若望保祿二世的初期，卡薩羅里在外交上，幾乎都是由他自由揮灑。

卡薩羅里在中梵外交上的第一種作法是降低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一九七二年後，雖然實質上在台北已無大使，但葛錫迪總主教名義上仍是兼駐台北的大使。一九七九年四月，葛錫迪奉命來台北辭行，卸下了這個掛名大使；大使館仍然保留，但僅有代辦主持館務。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現在。

於此同時，在卡薩羅里的主持下，各種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公開與秘密的接觸增加，若望保祿二世也藉著各種機會對中國發言。一九八一年二月，在若望保祿二世造訪馬尼拉時，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言最能代表他的想法：「……既然一個道地的忠實信徒必定同時是一個道地的優秀國民，因此我堅信貴國的每位天主教徒一定為中國的現代化貢獻出他的一份力量。……」「教會……並無任何其他企圖，它只是實踐它的創始者天主所賦予它的使命，它並無政治或經濟上的目的，或任何俗世的使命，在中國一如在其他國家，教會只願意是天國的宣講者而已。教會不企求任何特權，它只要求使那些追隨基督的人能自由而公開地表達他們的信仰，並本著他們的良心去生活。」在同年十月，紀念利瑪竇 (Matteo Ricci) 來華四百年的機會，教宗贊賞利瑪竇的貢獻：「他成功地築起一座溝通教會與中國文化的橋樑，儘管誤會和困難曾在過去出現，甚至現今仍在發生，但這座橋樑仍然安全穩固。」然後他藉此提出他對中國的目標：「本人堅信教會正以大無畏的精神，朝著這條途徑走向未來。我們有信心能消除障礙，也能找到適當的方法及妥善的結構去恢復

對話，並使之恆常保持。」

(2) 一九八四年—二〇〇三年：海外華人教會扮演橋樑角色，持續關心中國

在卡薩羅里的主持下，教廷對以往代表自由中國的台灣關心愈益減少，結束大使館傳言也已出現，台灣主教們感受到這種邊緣化的轉變，非常不悅，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趁萬民福音部（傳信部）次長盧杜沙彌（Simon Lourdusamy）訪台北之便，兩天之中，每位主教向其表達不滿。盧杜沙彌回教廷後，轉達了台灣地區主教們的意見，教宗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乃約台灣主教們來羅馬面商。在充分瞭解台灣主教的想法後，若望保祿二世發言，給台灣教會及海外華人教會定位：「你們在台灣和海外的天主教教友，你們的美妙任務是做大陸同胞的「橋樑教會」。……」這個定位可說是對卡薩羅里行動的修正，而這個修正來自於教宗自己。

在同時重視台灣教會的前提下，教廷持續不斷的向中國大陸釋出善意，菲律賓的辛海棉樞機主教兩度訪問大陸，並且選任香港的胡振中主教擔任樞機；在一九九七年二月，教廷國務卿索達諾（Angelo Sodano）甚至聲稱：「教廷駐華大使館，只要可能，不必等到明天，今晚就可以遷往北京。」不過教廷的善意，迄今並未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回應，而這才是教廷與台海兩岸關係維持現狀的主要原因。

### 三、中華民國對教廷的外交政策

基本上，在中梵關係的中方，視對教廷的外交是次要的，要放在整體外交的架構中加以考量。在此基本原則下，在不同的時段，中華民國對教廷仍有其政策；不過這些政策必須考量整體外交政

策，然後決定施行與否。同時中國內部並不穩定，也影響外交的發展，因此感覺起來這些政策似乎並不十分明確。

### 1. 一九二二年—一九三九年：打擊法國在華保教權

為謀國家之獨立發展，中華民國政府亟欲減廢列強在華之特權，而法國在華保教權，即為其中一項。「影響所及，法國既以教會為前驅，協以謀我；又藉教士刺探消息，多所利用，凡此事例不勝枚舉。我國為懲前毖後，計在前清時即欲與教廷通使，而在此國權運動之際，尤當與教廷直接交涉。……<sup>35</sup>」因此與教廷通使，是打擊法國在華保教權的手段，而這正是努力與教廷通使的最主要原因。

但是在現實的局勢中，以中國當時的國力，是不敢有直接而強硬表示的。國民政府曾做了一些換約及建交的準備，但都因國際情勢不能配合而作罷。在一九三九年前，在法國仍不願放棄其在華保教權的情形下，與教廷建交僅只限於紙上談兵。由資料所見，此時期熱衷於促進中梵邦交者，多為中國教會人士，代表人物為陸徵祥及于斌，中國外交官員多採被動配合立場。

### 2. 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五年：與日本進行外交戰

歐戰爆發後，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國向德國投降，德義兩國已控制歐陸，此時國民政府與教廷建交開始轉趨積極。原因一方面是法國干涉的原因不再，另一方面是同年九月，日德義正式同盟，若與教廷建交，至少可維持一在歐陸的據點，方便與各國聯繫並獲得訊息。<sup>36</sup>

<sup>35</sup> 〈天主教會之保護權〉，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五十六。

<sup>36</sup>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一年四月初版），頁九十二。

在這個與日本進行外交競爭的新形勢中，因為中國的需要，對教廷外交的優先遂往前移動。即使在外交不對等的情形下，國民政府仍願積極與教廷進行建交磋商。結果是一九四二年六月，在英美兩國壓力之下，教廷同意戰時的國民政府派使駐教廷，但教廷仍維持非正式的教宗代表駐華。

而在中國境內除了重慶國民政府外，尚有日本控制的偽滿洲國、偽南京政權等，在駐華宗座代表蔡寧選擇隱居北平的時刻。中國教會中親國民政府的神職人員，扮演了國民政府和教廷溝通的另一管道。

### 3. 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擺盪於國家尊嚴與中國教會期望間

教廷在戰時不願派遣正式使節駐華，不論原因為何，在國交平等的原則下，是對國民政府的不尊重。更何況，中國在戰後納入了世界外交體系的上層，因此在外交部看來，維持國家尊嚴，在又退居二線的中梵外交關係中，乃成了首要政策。在短時間之內，不宜對教廷太客氣，不能任其予取予求，只要保持基本對等的外交關係即可。<sup>37</sup>

不過中華教會人士的期望則不止於此，他們希望中梵間能建立更密切、更高層的外交關係。雖然外交部意見不同，但他們可以影響國民政府高層，由「高層」形成另一種對教廷外交的政策。在教廷這邊，透過與教廷使節的溝通，以及與教廷官員間直接的往來，中華教會人士往往可以比外交人員更能影響教廷對華外交。在這種情形下，由中華教會人士所形成的外交政策，就和外交部的外交政策，共同競爭，造成此一時期擺盪的外交政策。

37 〈對教廷派使來華外交部官員意見〉，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二〇、一二四。

## 4. 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二年：恢復外交關係

一九四九年後，中華民國實際治理之地僅及於台澎金馬，初期國際觀感亦不佳，直到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後，基於圍堵共產勢力的需求，在美國的支持下，台灣的地位方轉危為安。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而言，國際支持至關重要，而恢復與教廷的外交關係，即為此類國際支持中的一環。

此時期的中梵外交關係已形成一種三角關係，教廷以教徒人數較多以及受迫害的大陸教會為其主要目標，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主觀意識，不一定能影響教廷之決策，中梵關係需視大陸的政治及宗教發展，以及世界局勢的變化而定。大致說來，中華民國對教廷的外交，此後皆處於被動局面。

## 5. 一九五三年—一九七八年：增進或維持外交關係

在這種被動的情勢中，中華民國對教廷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只能跟隨著教廷對華的外交政策。例如在庇護十二世時期，于斌和田耕莘皆奉教宗命留居在美，不准來台；于斌曾以參加國民大會名義在一九五四年來台，這似乎是中華民國外交的勝利，但此後于斌的行動受到更大的限制。<sup>38</sup> 田耕莘也曾在一九五七年來台，但言明係來台觀光。只短暫停留兩個月。而他們來台的限制是要到若望二十三世的時候才取消。也是在若望二十三世的時候，中華民國駐教廷使節升格大使，這當然是中華民國的意願，但其實現與否，主動權在教廷方面。

同樣是在這種被動的情勢中，當中共進入聯合國，教宗若望保祿六世決定召回駐中華民國的葛

38 方豪，〈于野聲樞機之偉大處〉，〈教友生活週刊〉，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



錫迪大使時，中華民國基於維持邦交國的考量，並未以降低外交層級相應，相反的是以維持駐教廷的外交層次作考量。

#### 6. 一九七八年～一九九六年：維持外交關係，增進國際能見度

在一九七八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與中華民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日漸減少；維持邦交國成了中華民國外交工作的主要考量，在此考量下，日漸具有經濟實力的中華民國，往往願意提供邦交國為數不菲的經濟援助，作為維持邦交的條件，這種作法成效如何值得商榷，至少在對教廷外交上是全然不適用，因為教廷的外交利益全不在此，它全然以中國教會的發展為其考量。

在促進中國教會發展的考量下，教廷偶爾會有主動將駐台北使館撤廢的衝動，面對這種傾向出現時，中華民國政府必須設法遊說教廷外交幕僚中的激進派打消念頭。既無經濟誘因，遊說的基礎只能是宗教性或道德性的；除了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直接與教廷溝通外，往往必須借助台灣教會中的領袖人物，例如羅光，前往羅馬溝通。

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邦交國愈益減少的情況下，與教廷的外交關係，遂又被賦予增進國際透明度的功用。為了教宗一九八九年十月的亞洲之行，一九八八年底羅光總主教銜李登輝總統之命向若望保祿二世請求，在訪問亞洲時順道訪問台灣，教宗沒有答應，其實這根本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 7. 一九九六年迄今：增進國際能見度，配合教廷和平外交

由於考慮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應，教宗訪台的機率甚微，因此換一個方向，為增加國際能見度，教廷遂成為中華民國政府高階層出訪發聲的場所。於是在戴瑞明大使的安排下，一九九七年元月，連戰副總統訪問教廷；一九九八年十月，李登輝總統夫人曾文惠女士訪問教廷；二〇〇二年三月，

呂秀蓮副總統訪問教廷；以至最近二〇〇三年七月，陳水扁總統夫人吳淑珍女士也坐著輪椅出訪教廷。其他部長級，或立法委員等之造訪，更是不知凡幾，雖然教廷與中華民國仍有外交關係，但它的態度很明顯的是一「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有結果以前，不先和中華民國斷交」<sup>39</sup>。面對中華民國政府高層屢屢意在言外的造訪，其實不是十分歡迎，也增加了中華民國在教廷外交工作人員的困難。

除了增進國際能見度的目標外，一九九六年後的駐教廷大使戴瑞明很獨特的掌握到了教廷外交的精髓——和平，以及對華外交的原則——中國教會。在戴瑞明之前，為維護與教廷關係，每有風吹草動，駐教廷大使往往向教廷表示嚴重關切；長此以往，教廷官員愈視中華民國為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善關係的絆腳石。戴瑞明不斷藉著公私場合，贊揚教廷的和平外交，也表示希望台北與北京之間能及早展開和平對話。基於這樣的基礎，在教廷與中共的關係上他甚至表示：「他樂於見到梵蒂岡與中共對話，以促進中國大陸的宗教自由。他也一再表示，只有在中國大陸實施民主政治之時，宗教自由才會真正得到保障，他希望中梵合作共同致力促進大陸的宗教自由。」在追求宗教自由的前提下，戴瑞明對教廷外交政策的認同，使得教廷更尊重這位來自中華民國的大使。

這種外交思惟，目前似乎只是戴瑞明大使的政策，戴瑞明認為教廷與中共的關係，並不因此減慢或加快調整步伐，因雙方仍自有其原則與政策。這種想法是否確定是中華民國對教廷的外交政策，還有待觀察。

39 羅光，〈對中梵關係的努力〉，〈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七三二。

## 第三節 中梵外交關係中的個別事件

事出必有因，任何單獨事件的發生，一定有其背後的原因。從理性的角度思考，每一件單獨的決策，應該有一貫的政策為支持，而這些不同時期的政策，皆應符合外交的基本原則。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否認，歷史中有偶發事件，某些不符合原則及政策的事件，亦會出現在一連串的事件中；本段即嘗試用此兩種角度，觀察中梵外交關係中的個別事件。本文為導論性質，不擬一一詳述各事件之因果，只舉兩例，作為此種觀察角度的說明。

### 一、以原則及政策為基礎觀察事件：以保祿六世時期說明

一九六四年教宗保祿六世即位未久，即發表「祂的通諭」，主張與信仰共產主義者對話。此為單獨事件（一），由此通諭可以了解，保祿六世有與共產主義者和解之誠意，而真正的和解需要有彼此的了解，因此必須先對話。

一九六五年十月，教宗保祿六世應邀在聯合國發表演講，他稱聯合國是世俗理想的極致，「你們要聯合一切國家，把一切民族結合起來。」「前進吧！我們要更進一步，設法將任何離開你們的人帶回到你們中間，並研究一種方法，使那些尚未加入此一組織的人們，榮譽而忠實地加入你們的友愛公約之內。要使那些尚在外面的人，希望而且贏得大家的信任；因此，請慷慨的給予他們這種信任吧。」「這些就是將你們聯合一起的公約的動機，和一個足以改變世界前途的誓詞：不要

再有戰爭，使戰爭絕對不要再現！和平，領導各民族及全人類命運的，只有和平！」<sup>40</sup> 此為單獨事件（二），在和平的前提下，教宗保祿六世要求聯合國接納那些尚未成為聯合國會員的國家，其中暗示包括中國在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經過年餘的磋商，教廷駐華公使升格為大使，由公使高理耀（Joseph Capri-）總主教升任。<sup>41</sup> 此為單獨事件（三），代表教宗保祿六世願意維持乃至提昇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

一九六九年三月，輔仁大學校長于斌總主教被教宗保祿六世任命為樞機主教。這是一九六七年七月田耕莘樞機主教去世以後，中華教會的第二位樞機主教。<sup>42</sup> 此為單獨事件（四），一方面代表教宗對於斌過去工作的肯定，另一方面則代表他對台灣教會的支持。

單獨事件（一）與單獨事件（二），代表保祿六世採取了和若望二十三世不同的對華政策，和中共「對話」是保祿六世的新方針；不過若以此來判斷保祿六世的外交政策則尚嫌不足，因為從單獨事件（三）及單獨事件（四）觀察，保祿六世仍在加強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及台灣教會的關係。面對此種看似矛盾的外交事件，經由訪談一些參與當時外交活動的人士得知，教宗保祿六世當時的對華政策思惟是「兩個中國」，並盡力促使其實踐；連貫這些單獨事件可視為教宗「兩個中國」政策的驗證。

40 徐熙光編著，《保祿六世及其思想》，頁二十三～二十四。

41 《教友生活週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42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頁二七〇。

「兩個中國」政策是符合「善牧原則」的，也符合以「中國教會」為其主要關心對象的原則。但國際間強權政治的現實，使這個政策無法成功。當觀察到這個政策有問題時，保祿六世只有遷就國際現實，以較重要的中國教會為其主要考量，逐漸轉向為名義上的一個中國政策。

## 二、偶發的脫序事件：以一九五四年于斌返台參加國民大會為例

限制田耕莘及于斌兩位中華教會領袖在美住居，不准來台，為教宗庇護十二世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八年間的對華政策之一。<sup>43</sup> 于斌在一九五四年有了訪台的可能，此年為選舉總統、副總統，國民大會將開議，而于斌為國民大會代表，有投票的義務；而教廷使館遷台，代表承認台灣的中華民國，于斌請求返台似乎名正言順，教廷應無拒絕理由。不過教廷在開始時並未准許于斌赴台，以致國民大會開議時，于斌仍留美未行。<sup>44</sup>

在某種外交程序後，教廷突然准許了于斌赴台。於是于斌立即束裝就道，在二月二十八日抵台，參加國民大會。在會議結束之後，于斌至少在台灣各地演講了二十七個場次，還有一連串的參觀拜會活動。四月二十五日于斌離台赴韓，他向新聞界表示，希望在秋天時再訪台灣；<sup>45</sup> 于斌可能

<sup>43</sup> 教廷駐華使館於一九五二年十月遷台後，限制于斌訪台的禁令仍在實施。（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廿一日、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一日。

<sup>44</sup> 〈謝壽康致于斌函〉，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時，謝壽康尚未返任教廷。

<sup>45</sup>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頁一九二—一九四。在缺乏資料的情形下，無法了解是何種機制使得教廷推翻前議，准許于斌赴台。

以為，此後教廷對他不准赴台的禁令取消了。

不過直到一九五八年教宗庇護十二世去世前，于斌再無赴台的行程，一九五五年于斌曾訪菲律賓及越南，但就是未赴台灣；一九五六年于斌僅有訪歐行程，而一九五七年則那裡也沒去。教廷的對華政策在此其間實際上並無太大變化，于斌在一九五四年赴台不過是一單獨的特殊事件。<sup>46</sup>

## 結語

在對中梵外交關係的認識上，最常見的觀點之一是用國與國的世俗外交關係加以看待。不但一般國人如此看待，甚至教徒亦如此理解。在這種認知下，就容易產生一種感覺，認為教廷外交甚為現實，不合宗教正義仁愛的原則。殊不知教廷外交所謂的現實面，正是因為他們不重視世俗利益，反而是以「中華教會」作為他們的首要考量。

第二個常見的錯誤是往往僅看到個別的事件，對個別的事件尋找個別的解釋。但個別的事件應有其脈絡，這種脈絡有其時間延續性及思惟合理性的不同層次，若能找出更具結構性的政策及原則層次，則個別事件的解釋才會更有說服力。

從原則、政策及事件的架構去觀察中梵外交關係，筆者感覺教廷的對華外交大致上是相當理性

<sup>46</sup> 陳方中，〈于斌與中梵外交關係——庇護第十二時期（一九三九年—一九五八年）〉，〈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三一三—三一七。

的、有延續性且符合宗教精神的。在複雜的世界局勢乃至詭譎的兩岸關係所形成的外交環境中，少有脫軌的決策出現。另一方面中華民國對教廷的外交則以追求國家尊嚴及利益為其出發點，此亦無可厚非。但雙方在特定時空因外交原則的差異所產生的衝撞，是發生某些外交事件的原因。

中梵外交關係和各種世俗國家間的外交關係比起來，其實是一種非常簡單的外交關係，因為裡面沒有複雜的利益交換。若能明瞭其原則和不同時期的政策，其個別的決策是可以清楚解釋的。不過本書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若要真正瞭解中梵外交關係的架構，還需解讀更多的公私史料，才能確定更多細微的發展、人與原則的互動、政策的形成及轉變，乃至每個事件的決策過程。而這些都有待於更精細的爬梳史料，訪談更多相關人士，我們期待本書是未來更多中梵外交關係研究的基礎。

## 第二章 未建立外交關係時期

### 第一節 蒙古時期

自十三世紀中葉到十四世紀中葉，教廷與蒙古曾屢次互相遣使往來。不過這時雙方並無正式外交關係，原因是所謂的正式外交關係，是近代外交的產物，不論是教廷或是蒙古，當時都不覺有派使駐對方國都的必要，僅在有事需要傳達時，派遣使臣前往即可。教廷派往中國者皆為神職人員，且往往以方濟會會士及道明會會士擔任，此因二修會皆為十三世紀興起之傳教團體，頗負神貧精神且信仰堅定，符合教廷外交人員之條件。蒙古朝廷或派在朝服務的西方人，或自遣使臣派往教廷；以自遣使臣而言，此後多年皆視為禁忌，直至清末被迫與西方列強國交平等後方始打破此現象。此特殊做法或因蒙古人之遊牧文化，不受中國傳統影響之故。以下略述此時期雙方使臣來往之情形。

#### 一、柏朗嘉賓

中古世紀時，對歐洲天主教國家及教廷而言，除了封建勢力的內鬥外，最主要的問題來自於西亞及非洲北部的回教勢力。十三世紀已進入十字軍運動的後期，十字軍運動固然有其政治及經濟因



素，但其所代表與回教抗衡的宗教熱誠，才是其中最主要的推動力。

除了長期與回教勢力的抗衡外，歐洲人在一二二〇年後，開始面臨蒙古人的威脅；蒙古人的驕悍、殘忍，在口耳相傳後，很快就成了歐洲人的夢魘。面對這樣的威脅，部分歐洲天主教國家的反應是組成十字軍對抗，不過在爾虞我詐的現實情況下，這種十字軍從未組成過。一二三七年俄羅斯被拔都征服，一二四一年拔都在匈牙利擊敗日耳曼聯軍，歐洲人的恐懼在此時昇至最高點，幸好蒙古大汗窩闊台去世，拔都大軍撤離，暫解歐洲危局。

一二四三年就任的教宗英諾森四世 (Innocent IV) 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 II) 不合，被腓特烈二世所迫，無法治理羅馬，逃往里昂。一二四五年他在里昂駐地召開大公會議，由於聽說在蒙古貴族中有基督徒，於是在大會中宣佈以柏朗嘉賓 (Giovanni da Piano di Carpine) 為特使，派往蒙古大汗處。希望能勸說蒙古人停止殺戮，並希望蒙古大汗能信奉天主教。<sup>1</sup> 教廷的這種想法並非空想，因為蒙古皇族通婚的妻族信奉景教，而窩闊台駕崩後，大汗遲遲未能推選出來，由乃馬真后稱制，而乃馬真后係景教徒。<sup>2</sup> 由景教徒轉化為天主教徒，較非基督教徒轉化，自然為易也。

柏朗嘉賓於一二四五年四月十六日自里昂出發，騎驢代步，經波西米亞、波蘭，冬天過後赴俄羅斯，然後進入蒙古軍隊控制區。他先抵達加尼業 (Kariiev) 城，蒙古軍守將彌蓋亞 (Michas)

<sup>1</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台中：光啟出版社，一九七〇年九月再版），頁十七；海脫令著，王維賢譯，〈天主教史〉（台南：微祥出版社，一九六五年七月初版），頁二七一。

<sup>2</sup> 方豪，前引書。

係阿蘭 (Alain) 人，很可能是基督徒。彌蓋亞將其立刻送往其主將處，再層層轉送，在四月四日送到欽察汗拔都的金帳。拔都的祖母、母親都是景教徒。在看過教宗信件翻譯文後，四月七日拔都即決定將其送往和林，四月九日啟程後，日月星馳，當時柏朗嘉賓已六十四歲，且體型肥胖，可以想見馬上顛簸的艱苦。<sup>3</sup> 三個多月後抵達了和林。未久貴由即可汗位，八月底柏朗嘉賓等人晉見了貴由，十一月覆教宗書遂由貴由發出。

雖然母族為景教徒，不過貴由本身很明顯的仍持蒙古人的原始信仰。蒙古人除了歸類為薩滿信仰的原始信仰及景教外，喇嘛教、佛教、道教、回教都是其不同族群或同一族群中不同人的信仰。蒙古的各級領導者基本上對這些宗教都採取兼容並蓄的態度。因此在貴由看來，天主教固然是其母族的信仰，必須尊重，但他自己的信仰也是不容貶低的。

從教宗英諾森四世給蒙古大汗的第一封信，可以看出教宗並不瞭解蒙古人的宗教概況，我們可以推想教宗的世界觀是以歐洲為中心，英諾森四世相信基督信仰的唯一價值，同時獲悉蒙古貴族中有基督徒，因此蒙古領導者應已初步接觸基督信仰。在基督信仰超越任何異教信仰的認知下，他認為蒙古領導人理所當然應改信天主教。教宗的第二封信則是以基督在世代表的身份，要求貴由停止殘殺人民與毀壞城鎮，不然，「天主便在現世給予懲罰，不復遲延，末世更要嚴厲報復，絕不寬貸。」<sup>4</sup>

貴由從其蒙古人的經驗出發，覺得教宗的「基督唯一論」是很可笑的，他認為他的神在現實世

3 張奉箴，〈福音流傳中國史略〉卷一（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一九七〇年二月初版），頁二六六。

4 同前，頁二七三。

界中比教宗的天主強多了，他在覆書裡問教宗說：「你還勸我應當成為一個戰戰兢兢的也里可溫，應當崇拜彌失訶，應該苦修。但是你怎麼知道你說的這些話，長生天氣力裡認可？由東至西，自日出至日末，一切土地都被我統御。這些如果不是長生天氣力裡的意旨，誰能做到這事？」<sup>5</sup>

貴由身為「長生天氣力裡」在世的代表，於是命令教宗臣服於他：「你應當以一切王公巨卿首領的身份，親自立刻前來，事奉俺們，那時我便承認你的歸順，如果你不服從長生天氣力裡的命令，如果你漠視俺的聖旨，俺要看你是仇敵，我要讓你知道我的厲害。如果你真敢相反我的聖旨，長生天氣力裡知道我在想什麼。」<sup>6</sup>

雖然信奉景教的乃馬真太后對柏朗嘉賓相當友善，但現在當家的已換成貴由，十一月十三日在拜辭太后後，柏朗嘉賓拿著貴由的恐嚇國書返歐覆命。在蒙古騎兵陪伴下，回程同樣艱苦。至隔年（一二四七年）六月始抵達基輔，十一月返抵里昂，向教宗報告出使情形。就雙方文書來看，實際上只是各說各話而已；在雙方彼此認識的巨大差距下，柏朗嘉賓的使命並不算成功。但教宗對柏朗嘉賓冒險深入蒙廷，又全身而返，已甚表滿意，隨後命其擔任安提伐里（Antivari）總主教。<sup>7</sup>

按理貴由的覆書應會引起歐洲恐慌或是防衛的態度，不過似乎這種情形並未發生，最可能的原因是歐洲的王公貴族們並不知道覆書的內容，或是覺其僅在虛張聲勢。柏朗嘉賓返歐未久，蒙古攻伊朗的大將伊治加台（Ichigatai）派遣兩名景教徒為使至賽浦路斯島晉謁統帥第七次十字軍的法王

<sup>5</sup> 同前，頁二七七。

<sup>6</sup> 同前。

<sup>7</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頁十八。

路易九世 (Louis IX) 要求合作攻滅回教徒。一二四九年一月，法王遣道明會士龍如模 (Andre de Lonjumeau) 充報聘使臣，回覆蒙古大將，伊治加台送龍如模等往赴蒙古覲見大汗，其時貴由已經去世，由幹兀后稱制，龍如模在一二五〇年夏見到了幹兀后，並有蒙古使臣二人隨往見路易九世，他們在一二五一年在巴勒斯坦沿海的阿克爾 (Acre) 見到了路易九世。一二五三年，有兩名方濟各會傳教士羅伯魯 (Guillaume de Rubrouck) 及克萊莫那 (Bartolomeo da Cremona) 往蒙古傳教，羅伯魯攜有法王路易九世致蒙古大汗的信件，一二五四年一月蒙哥接見了羅伯魯，五月再接受見，未准其在蒙古傳教，但命其攜覆法王書回。<sup>8</sup> 其經過情形，因非教廷使節，不多述。

這個階段來往於歐洲和蒙古之間的使臣，均以拔都的欽察汗國為中介，循陸路來往。

## 二、孛羅父子

孛羅 (Polo) 家族為威尼斯商人，馬飛奧孛羅 (Matteo Polo) 及尼古拉孛羅 (Nicolo Polo) 繼承其兄在克里米亞遺留之商業據點，往其地經商，並進展至撒馬爾罕西南之布哈拉 (Bokhara)，在其地遇蒙古本境遣往伊兒汗國之使臣，該使臣聞忽必烈即大汗位，欲返大都，乃攜孛羅兄弟同行。<sup>9</sup> 孛羅兄弟以經商為生，往中國動機應為謀利。

孛羅兄弟或在旅行途中習得蒙語，一二六五年抵大都，因其歐洲人身份，且能以蒙古語溝通，

<sup>8</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四十六、四十八。

<sup>9</sup>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 (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新一版)，頁五一七、五一八。

頗受忽必烈喜愛，詢問他們不少歐洲的教會、教廷情形，以及風土民性。一年後，即派兄弟二人攜其璽書，充其使臣返回教宗處，請求教宗委派傳教士百多名及通曉歐洲學問之學者來中國服務。<sup>10</sup>忽必烈其時正整理體制，建立政治規模，他雖然崇信喇嘛教，但景教是蒙古統治階層中的重要信仰；同樣屬於基督信仰的羅馬天主教，規模又遠較景教為大，是歐洲人的普遍信仰，忽必烈對教廷採取與前兩代不同之態度，或係因此。另一方面，在中古歐洲掌握知識者為教會，忽必烈欲引進歐洲知識，與教宗通使是很合理的選擇。

孛羅兄弟二人於一二六九年抵小亞細亞，時教宗克來蒙十世 (Clement X) 已去世一年，新教宗尚未選出。教宗派駐小亞細亞的欽使德阿布爾杜 (Theobaldo) 建議他們先回威尼斯家鄉；他們抵家後始知尼古拉之妻已卒，尼古拉之子馬可孛羅 (Marco Polo) 則已年十五歲。<sup>11</sup>年餘後，德阿布爾杜被選任教宗，時孛羅父子二人不耐久候，已在回中國途中，新教宗額我略十世 (Gregory X) 差人將其從旅途中召回，予其致忽必烈國書，同時在考量歐洲的實際情況後，僅派兩名道明會士隨行。不過兩名修士在行抵亞美尼亞後，因回教軍隊正在侵略此處，認為繼續前行有生命危險，於是將教宗覆書、禮物及證件等，交予孛羅父子後返回歐洲。<sup>12</sup>孛羅父子繼續行程，一二七五年抵元之上都，當時忽必烈正在此處，他們呈上教宗的覆書，完成使命。

一二九二年，馬可孛羅藉護送下嫁伊兒汗國之蒙古公主欽使之名義，自泉州乘船離華，一二九

<sup>10</sup> 張奉箴，〈福音流傳中國史略〉卷一，頁三四〇。

<sup>11</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頁二十四。

<sup>12</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四十九。

五年回到歐洲，不久參加威尼斯和熱那亞的戰爭，兵敗被俘，在監獄中完成其遊記。近現代的漢學家已肯定馬可孛羅遊記的真實性。藉此遊記，我們亦可約略了解蒙古與教廷間的往來情形。

### 三、孟高維諾

一二八八年一位方濟各會士被選為教宗，取名尼古拉四世 (Nicholas IV)，次年派遣同會的會士孟高維諾 (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為特使赴伊兒汗國及中國。教宗尼古拉四世致函亞美尼亞王、雅各伯派教會宗主教、喬治亞教會宗主教、喬治亞王、波斯王，以及孟氏沿途所經的各國君主，請他們善待孟高維諾，使能安抵中國。<sup>13</sup>

孟高維諾先抵小亞細亞的安提阿 (Anioche)，送達教宗致雅各伯派教會宗主教的信函，然後離安提阿北上，覬見小亞美尼亞王；孟高維諾原本是在亞美尼亞傳教，小亞美尼亞王派其為特使晉見教宗，教宗讚賞其傳教成果，方派其再充任教宗特使。他將教宗回覆的書信交付亞美尼亞王後，在一二九〇年抵達伊兒汗國，呈上教宗的國書。一二九一年孟高維諾再自波斯動身，與他同行的是位道明會士比斯多 (Nichola da Pistoia)，這位道明會士是否一路與其同行不得而知，但至少赴印度的旅程是同伴而行的。<sup>14</sup> 根據孟高維諾三封現存信函的第二封所述，他在聖多默宗徒的聖堂停留了十三個月，其間應是尋覓赴中國的船隻以及等待季風。然後在一二九二年至一二九三年間離印度赴華，在中國南方某港口登岸，這個港口可能是泉州，最後一二九四年抵大都，晉見元世祖忽必

<sup>13</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頁二十六—二十七。

<sup>14</sup> 張孝箴，〈福音流傳中國史略〉卷一，頁三六六。

烈。他在目前可見的第二封信中說：「我呈上教宗的國書，並且勸皇帝接納耶穌基督我等主的公教信仰，但是皇帝沈溺於偶像崇拜太深。……」<sup>15</sup>

孟高維諾和羅伯魯不同，他得到了忽必烈的准許，得以停留在中國從事傳教工作。來自西方的天主教傳教士得以停留在中國傳教，孟高維諾實為第一人。

根據孟高維諾的描述，他很快的得到了皈依的信徒，這些新皈依者多半是來自於蒙古人及色目人中的景教徒。這種發展也很快的導致了他和景教徒間的衝突，一度被囚，後幸誣告者中一人自承係不實指控而恢復自由。他傳回歐洲的信，一三〇七年終於到達教宗克來蒙五世（Clement V）手中，在此前他差不多都是一人孤軍奮戰，直到一三〇三年才有一位柯隆省（Cologne）的日耳曼修士阿諾德（Arnold），不知是在什麼情況下也來到大都，擔任其助手。<sup>16</sup> 教宗克來蒙五世是第一位遷都亞威農（Avignon）的教宗，看到孟高維諾的信函大受感動，召方濟各會總會長面談，隨即設汗八里（大都）總主教區，轄整個中國，任命孟高維諾為總主教，由於東西方往來隔闕，乃特許孟高維諾有任命主教及劃分教區的權力。同時任命七名方濟各會士為主教，前往中國傳教，並給孟高維諾祝聖。<sup>17</sup> 同行的尚有數十名方濟各會士及道明會士。

七名方濟各會主教中的六人率同其他傳教士們動身，在經過下印度時，可能受到某種傳染病的侵襲，三位主教及為數不詳的傳教士死亡。倖存的三位主教及傳教士們，繼續循著孟高維諾建議的

<sup>15</sup> 同前，頁三六六。

<sup>16</sup> 同前，頁三六六～三六七。

<sup>17</sup> 同前，頁三七七～三七八。

路線，自海路抵達泉州，然後再北上大都，給孟高維諾祝聖。孟高維諾總主教隨即派部分傳教士赴揚州及杭州傳教。孟高維諾總主教及其他的主教們，享有皇帝所賜的豐厚俸祿，而天主教傳播也不再是孟高維諾單獨一人，而有了不少傳教士共同工作。

由於汗八里總主教區的設立，此時教廷對中國問題關注的重點也有所轉移。以前通使的目的是歐洲的安全，或不切實際的期待蒙古帝王改宗天主教；此時則已出現了一個發展中的中國教會，教廷關注的焦點乃放在中國教會中。

一三二八年孟高維諾去世，被派來支援他的傳教士中，三位主教亦僅存其一，其名為安德魯（Andreas de Perugia），這位主教也於一三三二年去世。一三三三年，在孟高維諾去世五年後，教宗若望二十一世（John XXII）得到了他去世的消息，決定派巴黎大學教授，方濟各會會士尼古拉接續汗八里總主教工作。一三三四年尼古拉率司鐸二十人，修士十人前來，但其行踪不明，或有可能遇險，死於途中。<sup>18</sup>

#### 四、元順帝使節團及教宗報聘使節團

元順帝於一三三六年派法蘭西人安德勒（Andrew a Frank）為特使率十五名隨員，至亞維農晉見教宗。為何元順帝會派出這個使節團，他致教宗的書信中可見端倪：「……如今我委派拂朗國人安德魯和十五名隨員，前往日落七海之外的拂朗國土，晉見基督教友之主——教宗。希望在我並教

<sup>18</sup>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頁五五三。



宗之間，開闢互相往來的途徑。」「也請教宗為我祝福並祈禱。」「現在我遣發我的阿蘭臣僕前來，他們是基督徒。我希望我的使臣們，由日落的西方，帶回好馬和別的珍奇什物來。……<sup>19</sup>」這些信奉天主教的阿蘭人，也上書教宗，請求再派專使來華，他們說：「我們渴望一位明智有為，德行出眾的代表，照顧我們的神益，並且迅速地到來。目下我們既缺少神牧的領導，又需靈魂的慰藉。<sup>20</sup>」由此可以猜測，元順帝派使是出自信奉天主教阿蘭臣民的建議，阿蘭人期望的是教宗再派專使前來駐紮，而元順帝的期望則是西方的寶馬及奇珍什物。

一三三八年元順帝的使節團抵達亞維農，晉見了教宗本篤十二世（Benedict XII）；教宗予使節之一教廷衛士之榮銜，此人必定為天主教徒。並修書予順帝、欽察汗及察合台汗，表示不久將派專使報聘。元順帝的使節在一三三八年七月攜帶教宗的信件及禮物離開亞維農，數月之後，教宗的報聘專使馬黎諾里（Giovanni de Marignoli）即啟程來華。

根據元史及其他文獻所記，元順帝至正二年（一二三二—一二三四年），拂朗國使者向順帝貢異馬，馬的身長有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昂高八尺二寸，身純黑，後二蹄皆白。這件獻馬事在當時引起轟動，有不少高官文人為之作詩賦歌贊之類，而元順帝派使教廷之主要動機在此亦可證明係為歐洲馬匹。<sup>21</sup>蓋蒙古人與馬共生，唯蒙古馬身形較矮，步伐較小，輾轉聽聞西方馬之神駿高大，自然生嚮往之情；而教廷亦對元順帝之通使動機有充分了解，故千里迢迢送馬而來，唯此馬究竟產自何

<sup>19</sup> 張奉箴，〈福音流傳中國史略〉卷一，頁四二六。

<sup>20</sup> 同前。

<sup>21</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頁三十二—三十三。

地則不必深究了。

教宗的報聘使團共有四名代表，馬黎諾里排名第三，使節團所有成員皆為方濟各會會士，首名鮑納 (Nicolas Bonet)，其次名穆拉諾 (Nicolas de Molano)，第三位的名字是翡冷翠人若望 (Giovanni da Firenze) 此人即馬黎諾里，因按當時方濟各會會規，修士皆以地名或修院名加上其聖名稱呼。第四名為匈牙利人額我略 (Gregory of Hungary)。<sup>22</sup>

他們在一三三八年十二月自亞維農出發後，經君士坦丁堡，渡過黑海後改行陸路，經過欽察汗國及察合台汗國的領地；由於是教宗報聘元帝的使臣，沿途並未受到太多阻撓，他們並在察合台汗國的王都阿力麻里停留一年多，最可能耽誤他們行程的原因是在他們抵達阿力麻里前一年，當地的主教及六名方濟各會傳教士被殺，他們藉使節的身分重建當地的教會。鮑納未隨使節團繼續前行，返回歐洲後，在一三四二年五月為教宗任命為馬爾他主教。其他團員在一三四一年底或之後數月啟程越大漠赴中國，是否全部抵達亦未可知，但至少馬黎諾里抵達了北京，並向元順帝進獻寶馬。<sup>23</sup>

按照當時旅行的速度，馬黎諾里等人從亞維農出發時，無從得知尼古拉總主教是否已抵達中國，因此教廷未任命其中成員有擔任汗八里總主教或代理其職務的權力。他們到達後，元朝給予使節團三十二人的待遇，與孟高維諾或安德魯所享有的八人待遇相對照，馬黎諾里的使節團中可能仍有四名比照主教待遇使節身份的成員，但他們都沒有繼承權或主教神品。<sup>24</sup> 汗八里總主教的位置仍

<sup>22</sup> 同前，頁三十三～三十四。

<sup>23</sup> 張奉箴，〈福音流傳中國史略〉卷一，頁四三二。

<sup>24</sup> 同前，頁四三四。

然虛懸無人，馬黎諾里等人可以猜測，尼古拉總主教是不可能出現了。

在馬黎諾里的遊記中說，他們在到了北京三年後決定返回歐洲，並一再向元順帝申請允許他們回國。「皇帝見到無法留我們在北京，便允許我們攜帶他贈與教宗的禮物，和三年的費用，回到教宗那裡去。皇帝希望或者我自己，或者別位樞機，應具有主教神品，從速返回中國。」<sup>25</sup>由這段話可以判斷，汗八里總主教的人選是當時中國教會的最主要問題，而這也是元順帝欲藉馬黎諾里向教宗傳遞的訊息。

從馬黎諾里遊記中使用的複數，可知他是和至少一位具使節身份者一同返歐。因戰事封閉陸路，他們在一三四六年自泉州循海路經印度回國。一三四八年開始歐洲黑死病大流行，使其返歐行程更因而延誤不少。他在一三五三年終於返抵亞維農覆命，教宗英諾森六世（Innocent VI）隆重的接待他，他請求教宗再派更多傳教士前來中國，元順帝國書中亦表明准許天主教徒服從教宗。<sup>26</sup>從馬黎諾里回歐後的描述猜測，似乎只有他一人回到了歐洲。教宗為酬謝其功績，任命他為義大利南部比西尼亞尼（Bisignano）的主教，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亦曾命其擔任顧問及其宮廷的史官。馬黎諾里未再回中國，大約死於一三五九年。<sup>27</sup>教宗為中國傳教事，曾於一三五四年委任主教，擇定傳教士，準備到中國事宜，<sup>28</sup>但此事似乎並未成真。一三七〇年，教宗烏爾班五世（Urban V）亦曾任

<sup>25</sup> 同前，頁四三七。

<sup>26</sup>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頁五二九。

<sup>27</sup> 張奉箴，〈福音流傳中國史略〉卷一，頁四四二～四四三。

<sup>28</sup>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頁五五四。

命巴黎大學教授威廉 (Guillelmus a Villanova) 為大都第三任總主教，率十二名方濟會士來華。但結果如何也不得而知。<sup>29</sup> 此後教廷與中國政府間遂不通問約兩世紀，而中國天主教在元朝的出現也成了曇花一現。

教廷與中國往來的中斷，可能原因如下：首先，教廷此時暫駐亞維農，而從教宗英諾森六世以後，一直在為重返羅馬而準備，注意力較不放在遙遠的東方。其次，黑死病使歐洲的元氣大傷，教會亦不例外，中亞一帶有三分之二的修士染疫而亡，傳教事業必定因此緊縮；因防疫而採取的隔離措施，也會波及交通往來。最後的原因是元帝國崩潰，這些基督信仰的「也里可溫」多半是漢人眼中的外國人，多半也隨蒙古人遠颺塞外；沒有了教友請求，汗八里總主教也沒什麼設立的必要了。

在地理學及精密的測量儀器使用前，西方人僅憑遊記是無法確定中國地理位置的。遊記作者復有可能對某種地名有不同定義，或是同一地方用不同地名，遊記復有真偽，遊記作者記錄敘述也不一定準確。在缺乏往來的情況下，中國 (China)、契丹 (Cathay)、蠻子 (Manzi)、印度 (Indu) 都成了模糊不清的概念，十五世紀末有西方學者置中國於裏海附近，又有置於印度河與恆河之間者。<sup>30</sup> 這些都足以說明此時期雙方往來的空白。

## 第二節 葡萄牙保教權時期

<sup>29</sup> 李少峰，〈方濟會在華傳教史〉，《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台中：光啟出版社，一九六七年一月初版），頁七十三。  
<sup>30</sup>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頁五五四。

### 一、葡萄牙保教權

因著航海技術的日趨成熟，在十五世紀時，大西洋岸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開始積極從事海上探險活動。兩國不久即在大西洋中爭奪航線，因應這些糾紛，兩國同意由教宗擔任調人，在大西洋中劃定發展界線及範圍。在一四九三年，教宗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re VI）將往東的新世界委託給葡萄牙，而往西的新世界則交付給西班牙。一四九四年西葡兩國協議將此界線移至開普維爾群島（Cape Verde Island）三百七十哩以西之處，這使得葡萄牙佔領巴西取得了合法性。<sup>31</sup> 葡萄牙人沿著非洲、印度海岸逐步東進，一五一〇年即控制了卧亞，然後是麻六甲、廣州灣，同時間西班牙人則從墨西哥越過了遼遠的太平洋，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雖於一五二一年在菲律賓為土著所殺，但也象徵西葡兩國一東一西的發展，在繞過地球一圈後，在亞洲又碰了頭。為了解決可能的衝突，兩國遂於一五二九年再簽協定，約定西班牙人放棄摩鹿加群島，兩國以摩鹿加群島以東十七度為界，以東屬西班牙，以西屬葡萄牙。<sup>32</sup>

西葡兩國在長期與摩爾人的對抗中培養了強烈的信仰熱誠；教宗苦於財政困難，不可能自身支持海上探險，於是在新開拓的區域中，教宗將保護傳教的權力（Patronatus Missionum）交給這兩國的國王，看起來似乎是合理的。中國絕大部分地區皆劃在葡萄牙的勢力範圍中，因此葡萄牙保教權是影響中國最大的。一五三四年，葡萄牙國王擁有保教權的卧亞教區成立，葡萄牙國王有權向教

<sup>31</sup> Jean Charbonnier, *Histoire des Chrétiens de Chine*, p.83 (Paris: Coédition Desclée/Bégédis, 1992).

<sup>32</sup> Ibid.

宗提出此教區主教人選，而久未有傳教士進入傳教的中國，也包括在卧亞教區中。一五五八年卧亞教區改為總主教區，下轄麻六甲 (Malacca) 和交趾 (Cochin) 教區，中國應包括在交趾教區中。一五七六年又在卧亞總主教區中成立澳門教區，統轄中國和日本的傳教事宜。<sup>33</sup> 既然葡王擁有卧亞總主教區的保教權，則自然而然澳門教區的保教權也屬其所有。

在葡萄牙保教權控制的地區，不僅傳教活動由葡萄牙控制及保護，教廷派出之使節亦需與其合作。著名的耶穌會士沙勿略 (S. Franciscus Xavierius) 即是在葡萄牙保教權下，一五四〇年由教宗派往遠東地區的傳教士；他同時也具有宗座欽使的身份及視察教務之權。<sup>34</sup> 葡萄牙印度總督、卧亞主教、麻六甲長官，原則上均支持他的傳教工作，在可能範圍內支援其交通及傳教經費。而沙勿略在尊重卧亞總主教權限的原則下，葡國官員亦承認其教宗欽使的地位。當他在日本傳教時，即曾以教宗欽使的身份和日本沿海山口、豐后的諸侯交涉，得到在此兩地自由傳教的許可。<sup>35</sup>

不過葡萄牙國王有其國家尊嚴及世俗利益，立場與教廷常有差異。然後葡萄牙印度總督手握大權，身處海外，也不一定盡遵國王意旨。而在依靠季風航行的帆船時代，身在卧亞的總督對麻六甲長官，其實也是鞭長莫及的。沙勿略從日本人口中得知其文明多半源自中國後，興起向中國傳教念頭；因為需要藉遣使名義進貢中國，乃返回卧亞與總督諾洛那 (don Alphonse de Noronha) 商議，總督及卧亞主教阿爾布奎克 (don Jean de Albuquerque) 皆贊成其議，並將進貢葡使之證書付與葡

<sup>33</sup> 羅光，〈中國天主教歷代分區沿革史〉，〈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頁三〇〇。

<sup>34</sup> 顧衛民編，〈中國天主教編年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四月一版），頁五十六。  
<sup>35</sup> 同前。

商培萊刺 (Diego Pereira)。雖有印度總督許可，但麻六甲長官阿泰德 (don Alvaro de Ataide) 嫉培萊刺獲貢使之權與利，遂限制培萊刺不准離開麻六甲，預備之禮物亦盡遭扣留。沙勿略以教宗欽使名義譴責之，但亦無如之何。<sup>36</sup>

因此沙勿略只能在沒有禮物及身份的情況下，在一五五二年八月由聖十字號 (Santa Croce) 船送至上川島，這裡是廣東沿海中葡商人走私貿易的小島。<sup>37</sup> 他一直希望能搭乘中國走私商人的船隻進入中國內地，然後尋找機會晉見中國皇帝。不過一直沒有人敢帶沙勿略同行。沙勿略十一月患病，十二月三日去世，進入中國的期望只能另待他人。<sup>38</sup>

沙勿略因死上川島即是現實的葡萄牙保教權所帶來的困擾，更別說因為西葡兩國的競爭，凡是進入中國的傳教士，必須宣誓效忠葡萄牙保教權，因此實際上排除了西班牙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可能性。而教廷希望任命的主教，不僅在中國，有時亦被葡萄牙否決，不准赴任。然後隨著時間發展，新教的荷蘭在十七世紀加入了東亞競爭的行列，英法等國的艦隊也出現在各大洋面，而葡萄牙及西班牙國勢陵夷，他們所擁有的保教權看起來就更不合理。

為了解決這些困難，實際面對世界新局勢，教廷在一六二二年創立了傳信部 (Propaganda Fide)，希望對傳教事業更能主動掌握。在葡萄牙不可能放棄其保教權的情形下，教廷在一六五〇年決定採用宗座代牧制來規避，並在一六五九年正式派三位宗座代牧到遠東傳教。所謂宗座代牧的

<sup>36</sup>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頁三。

<sup>37</sup> 同前，頁四。

<sup>38</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頁六十四。

意思，是教宗將某名義上仍存在，但實際其領地已消逝的中古時期主教銜，授予某位海外傳教士，並命其在其新開拓的傳教區中實際治理，以避開西葡保教權的限制。中國在實行之後，葡國僅能維持北京、南京兩教區，而代牧區則愈設愈多。

## 二、卜彌格充明使出使教廷

自利瑪竇開始，在華耶穌會士與中國士紳階層建立了聯繫；利瑪竇去世後，龐迪我（Didace de Pantoja）也非常得到在京官紳的尊重。除了士紳階層以外，由於欽天監曆算知識的明顯缺漏，自一六二九年後，耶穌會士鄧玉函（Jean Terranz）及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在徐光啟的邀請下，參與了修曆的工作，鄧玉函不久去世，龍華民亦因曆法非其所長而退出，一六三〇年湯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羅雅谷（Jacques Rho）入曆局接續其工作。從此之後，耶穌會士就成了中國天文運轉不可或缺的一顆螺絲。由於在宮廷服務，遂有在禁中傳教機會，一六三一年有十名太監受洗，中有名龐天壽者。藉由中官輾轉介紹，宮中妃嬪信教者亦頗不乏人，至一六四〇年宮中婦女信教者已有五十人，皇族信教者亦有一百四十人。<sup>39</sup>

同樣是在徐光啟、李之藻等人的引薦下，為對抗日益強盛的滿洲騎兵，明朝開始自澳門引進葡國大炮；一六三〇年，有澳門公民公沙的西勞（Conzales Teixeira Correa）率葡國炮兵北上抗禦滿洲人，耶穌會士陸若漢（Jean Rodriguez Tuzzu）任隨軍司鐸。<sup>40</sup>此事實可視為澳門葡國當局、耶

<sup>39</sup>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頁一七〇～一七一。

<sup>40</sup> 同前，頁二一六～二一七。



耶穌會中國區會與明朝政府的合作。公沙的西勞在戰役中殉職，這些傷亡葡兵均曾蒙明政府贈恤。

晚明耶穌會士中與官紳、皇族來往最頻繁深入的代表性人物是畢方濟 (François Sambiasi)。除了名士高官外，他和福王、唐王、桂王皆有來往。他曾在開封傳教，故和福王友善；清兵入北京後，福王子由崧在南京稱帝。一六四五年命畢方濟出使澳門，求澳門葡兵援助。畢方濟行至途中，南京已陷，帝崩。畢方濟續前行，至澳門，此時唐王聿鍵立於福州，唐王與畢方濟有十數年交情，一六三六年唐王曾起兵勤王，被疑別有圖謀，尋廢為庶人，禁錮獄中；畢方濟曾為唐王申冤，唐王被禁八年多，至崇禎十七年方獲釋，對畢方濟感念在心，召其至所在，仍命其赴澳門請兵。一六四六年唐王兵敗自殺，桂王仍以唐王使命賦予畢方濟。<sup>41</sup>直到此時，澳門葡人一直與明人朝廷共抗清軍，而澳門耶穌會士亦持相同立場。

桂王朝廷之立，主要係倚靠瞿式耜之扶助；龐天壽亦自北京輾轉南逃，於桂王朝廷中任衆中官之首——司禮太監。瞿式耜及龐天壽皆為教徒，因此桂王朝廷中，對天主教有一種友好氣氛不足為奇。<sup>42</sup>當時耶穌會士瞿安德 (André-Xavier Koffler) 甫入華境，即被龐天壽引入桂王宮廷，在永曆二年（一六四八年）四月，為永曆皇帝的兩位太后及皇后、王子付洗。同年龐天壽亦曾往澳門，教史中記載其目的係為獻彌撒，「一為謝恩，二為求天主眷佑皇家平安。<sup>43</sup>」實則係求澳門葡軍援

41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頁二〇〇～二〇一。

42 黃一農認為瞿式耜為教徒的說法係附會之詞。黃一農，〈南明永曆朝廷與天主教〉，〈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八十六，即使不能明證確係教徒，但與耶穌會士關係密切則不能否認。

43 蕭靜山，〈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河北獻縣：獻縣天主堂，一九三七年三版），頁二三九。

助；澳門總督僅以火鎗百具相贈，並未再派兵協助。可能是因為內戰中的情勢已有明顯變化，澳門當局遂從支持南明朝廷轉為中立。

不過澳門耶穌會士的立場與澳門政府不盡相同；在耶穌會士看來，雖然永曆皇帝並未奉教，但後宮的重要人物皆已為教徒，若能扶助其成功，則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將大有可為。於是命瞿安德就商於龐天壽新領洗之皇太后，告知可遣使教宗聯繫；<sup>44</sup> 此種作法或有可能係得自日本教會的啟發，在天正（五七三—五九一）年間及慶長十八年（一六一三），奉教的大名即曾數次派使赴歐覲見教宗。<sup>45</sup> 龐天壽被屬意為通使教廷之人選，不過龐天壽掌控禁中大權，實不可能擔此遠行重任。耶穌會士卜彌格（Michael Boym）一八四七年入華，在海南島傳教，一六五〇年為了發第四願到澳門，發願完成後，曾德昭神父遣之人內地，協助瞿安德傳教。<sup>46</sup> 另外卜彌格似乎有遊歷中國及海上冒險的經驗，遂成為南明永曆朝廷派到教廷的最適合人選。

一六五〇年十一月初，卜彌格在肇慶取得王太后及龐天壽致教宗及耶穌會總會長的書信，攜往澳門，由主教公證，並由耶穌會中國日本視察員馬雅（Sebastien de Maya de Amaga）付予許可

44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頁二八九。

45 黃一農，〈南明永曆朝廷與天主教〉，〈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八十九。

46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頁二七五。另一種說法稱卜彌格在一六四八年時，來到中國的故都長安，沿途經過了湖廣、河南、陝西三省，回程時則經四川及雲南。而這些經歷是他撰寫「中國植物」及「中華帝國全圖」的基礎。愛德華·卡伊丹斯基著，張振輝譯，〈中國的使臣卜彌格〉（河南鄭州：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五月初版），頁九十七。

證。澳門總督原不贊成其行，但在曾德昭的遊說下，竟准許卜彌格出發。<sup>47</sup>一六五一年一月一日，卜彌格和其中國同伴陳安德，搭乘聖卡達琳那號赴臥亞，在一六五一年五月抵達。

開始臥亞總督並未反對卜彌格的使命，但臥亞的教會人士中，已有人反對卜彌格的使命，並向總督表達意見，這意見不外乎永曆朝廷未經里斯本即與教廷通使，基本上是違反葡萄牙保教權的。而在此同時，里斯本評估了新的中國情勢，認為此刻應避免任何冒險躁進的行動，以免危及其在中國的利益。於是卜彌格的行動遂被視為不適當，在即將出發往里斯本的船上未安排其位置，總督並向里斯本報告卜彌格的行動，他也被限制住居，不准離開臥亞。<sup>48</sup>不過幸運的是，這艘原本有可能載送卜彌格的船在離開臥亞之後沈沒了，再下一艘載送臥亞總督回國的船也沈沒了，可以想見各種報告、信件也都在這連續兩次船難中消失，因此歐洲方面無從得知卜彌格的使命。<sup>49</sup>

卜彌格在被限制行動半年後，決定逃離臥亞，他和他的中國同伴在一六五一年十二月八日逃過了葡萄牙人的監視，為了避開可能的追捕，他們先往內陸的戈爾孔達 (Golkonda) 然後循陸路往歐洲前進。他抵達波斯的首都伊斯法罕時，當地有一個耶穌會傳教團體，其中有兩人是波蘭人，是卜彌格的同鄉，想當然耳他們接待了這位風塵僕僕的耶穌會士。他繼續前行，一六五二年八月到達了小亞細亞地中海岸的重要港口士麥那 (Smyrna)，他搭了一艘威尼斯船，在十二月抵達了羅馬

47 愛德華·卡伊丹斯基著，張振輝譯，〈中國的使臣卜彌格〉，頁一〇五。

48 同前，頁一〇七、一〇八。

49 同前，頁一一一。

北邊的威尼斯。<sup>50</sup>

由於當時威尼斯城並不歡迎耶穌會士，因此卜彌格以中國使臣的身份出現，並設法向法國駐威尼斯的大使取得了保護。在這位大使的積極介入下，威尼斯大公在十二月中接見了卜彌格，他向威尼斯大公呈遞了龐天壽的拜帖，由於不可能事先預料到會經過威尼斯，因此這些拜帖應該都是事先製作妥當，然後由卜彌格的中國同伴填上適當的頭銜。<sup>51</sup>

卜彌格突然以南明使臣身分出現在威尼斯一事，驚嚇到了相關人士。由於他尋求了法國使臣的協助，因此引起了教廷使節的不快，以及西班牙使節的高度關切。耶穌會總會長尼克（Gosvinius Nickl）在此前沒有任何卜彌格出使的訊息，當得知卜彌格竟然以中國使臣的身份出現於威尼斯，直接的反應就是認為卜彌格違反了耶穌會士不追求世職的戒規。總會長認為卜彌格應該不張揚的將信件交到羅馬，然後再透過外交途徑呈送教宗及相關人員。而教宗英諾森十世（Innocent X）在三十年戰爭後的新國際情勢中，基本上是偏西班牙的；對於一位耶穌會士以中國使臣身份，在威尼斯仰仗法國使臣而有所行動，自然會產生疑慮心理。而卜彌格在其時與歐洲著名學府的通信中，高度讚揚中國的孔子及儒家學說，這又在禮儀之爭的長期脈動中，挑起了道明會士的激烈回應<sup>52</sup>。當然他也違反了教宗所賜予葡萄牙的保教權。

卜彌格的使命引發了這麼多問題，幾乎沒有對他有利的因素。他遵總會長命令，靜悄悄的到羅

<sup>50</sup> 同前。

<sup>51</sup> 黃一農，〈南明永曆朝廷與天主教〉，《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一〇〇。

<sup>52</sup> 愛德華·卡伊丹斯基著，張振輝譯，〈中國的使臣卜彌格〉，頁一二一—一二二。

馬，隨即被遣往洛雷托 (Loreto) 候命。傳信部為卜彌格事集會多次，一六五三年三次，一六五四  
年八月一次，他們逐漸形成一種意見，認為奉使之事乃為騙局；另外關注之事項則為中國禮儀問  
題，傳信部的樞機們認為在華耶穌會士有不遵教宗命令的嫌疑，在中國禮儀問題上自行其是。<sup>53</sup>

卜彌格是分裂中國中，南明派往教廷的使臣。但以湯若望為首的北方耶穌會士，則已在滿清控  
制的疆域中得以繼續傳教，並在宮廷中繼續擔任天象觀察工作。在他們看來，滿清控制全部中國應  
只是遲早問題。這些北方耶穌會士在一六五〇年公推衛匡國 (Martinus Martini) 赴歐報告在中國  
傳教情形，很顯然的，他在政治觀察上是與卜彌格相左的，但在禮儀問題上，兩人的基本看法一  
致。

衛匡國自福建登舟，經菲律賓，乘荷蘭船赴歐；從其出發地點、路線及所乘船隻可以判斷，他  
們立場與澳門政府及南方耶穌會的差異。由於在巴達維亞 (Batavia) 耽誤了一年多，衛匡國先發  
後至，大概在一六五三年八月抵達了挪威，他先在出版自由的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其名著《中國新  
圖》(Novus Atlas Sinensis)，同時與歐洲學者來往及頻繁通信，其主要目的應是為中國禮儀問題  
尋求支持，同時準備其他書籍之刊行。當時羅馬傳信部討論中國傳教問題正熾，耶穌會亟需來自中  
國之傳教士說明；卜彌格身份可疑，衛匡國即成唯一適合人選。於是命其速至羅馬，不准逗留在阿  
姆斯特丹。因此一六五四年下半年衛匡國到了羅馬。他在阿姆斯特丹時，已反對過卜彌格有關中國  
情勢的報告。<sup>54</sup>

<sup>53</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頁三〇七。

<sup>54</sup> 愛德華·卡伊丹斯基著，張振輝譯，〈中國的使臣卜彌格〉，頁一二六。

一六五五年一月七日，教宗英諾森十世去世，繼位者為亞歷山大七世 (Alexandre VII)；他與羅馬著名的耶穌會學者基爾歇 (Athanasius Kircher) 是好友，而基爾歇是卜彌格在羅馬最重要的支持者。或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亞歷山大七世採取了與其前任教宗不同的作法，而傳信部對卜彌格的態度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傳信部給亞歷山大七世上了一份報告，承認他是南明派遣的使臣。於是十二月十八日，在卜彌格抵達歐洲三年後，教宗終於接見了卜彌格，並將給皇太后及龐天壽的覆書交給了他，由於對中國情勢已有體認，教宗的覆書只是一些應酬文字。<sup>55</sup>

卜彌格得教宗覆書後，乃立即赴里斯本候船，甚至無暇回波蘭省親。他帶著兩封教宗的覆書，六封耶穌會總會長致明廷中人的信，兩封葡萄牙國王給永曆帝及龐天壽的信。據稱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亦曾致函皇太后<sup>56</sup>。由此看來，歐洲此時對中國情勢的理解，不見得全不利於南明。一六五六年三月三十日，卜彌格與耶穌會士八人一同啟程，準備回中國覆命。

一六五六年十一月三日，卜彌格與同行者到達臥亞，當時荷蘭已封鎖了臥亞一年多，在臥亞與東南亞之間的交通完全中斷。卜彌格乃率柏應理 (Philippe Couplet)、魯日滿 (François de Rougemont) 等人自陸路赴暹羅<sup>57</sup>。一六五八年初卜彌格在暹羅的京城大城府收到了澳門政府的來信，因為他南明使臣的身份，希望他不要借道澳門進入中國。於是卜彌格未能和兩名新耶穌會士自暹羅赴澳門，而是搭了中國船到了歐洲人稱東京的河內。暫時寄身於此地的耶穌會團體，他希望能從廣

<sup>55</sup> 黃一農，〈南明永曆朝廷與天主教〉，〈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一一五。

<sup>56</sup> 同前。

<sup>57</sup> 愛德華·卡伊丹斯基著，張振輝譯，〈中國的使臣卜彌格〉，頁一三〇、一四〇。

西和安南邊界進入中國，安南耶穌會士在卜彌格抵達約半年後為他求得了通過邊境的許可，但此時永曆帝已託庇於緬甸，卜彌格進退失據，徘徊於中國邊境，一六五九年八月病逝。九年多來伴其同行的中國同伴為其營葬，以後不知所終。<sup>58</sup>

### 三、宗座代牧的設立

康熙雖不信仰天主教，但他親政後，他就成了在華天主教傳教士的保護者。這是由於欽天監耶穌會士南懷仁、利類思及安文思等頗得康熙皇帝的尊重及信賴，連帶使得各地的傳教活動亦能平穩進行。另一方面，歐洲傳教士對於效忠康熙皇帝並不會特別感到奇怪，因為在十七世紀的歐洲，神職人員屬於統治階級的一員，而歐洲的皇帝、國王及教宗之間意見不相一致，也是司空見慣的事。

前已提及，由於西葡國勢日漸衰弱，與其保教權不能相稱，於是教廷在一六二二年乃設傳信部，期能直接掌控日益頻繁之傳教活動。傳信部成立之初，除了與西葡等國時有扞隔外，所能直接掌握者有限。直到教宗亞歷山大七世在與葡萄牙決裂後，於一六五九年任命了陸方濟 (François Pallu)、Lambert de la Motte 及 Ignatius Gottelandi 三人為宗座代牧，同時率領傳教士赴安南東京、交趾及中國三個地方傳教<sup>59</sup>。所堪注意者，這些宗座代牧皆為法國人，主因為十七世紀法國所具有的宗教熱誠，在這種氣氛下，一群法國教區司鐸已逐漸形成一個團體，要協助傳信部的海外傳

<sup>58</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頁三〇九。

<sup>59</sup> Jean Guennou,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pp.66-67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86).

教事業，此即「巴黎外方傳教會」(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的雛形。而他們主要是在西葡保教權的空隙，受到交趾傳教報導的激勵而形成團體的。由於絕大多數為法國人，因此雖然協助教宗為其本願，但逐漸引進法國勢力則屬不可避免的現象。

這些宗座代牧中，和中國實際發生關係者為陸方濟，一六六二年他率領七名傳教士從馬賽動身，不過當他在一六六四年到達亞洲後只能停在暹羅，要進入中國還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首先宗座代牧們必須解決管轄區域重疊的問題，這是因為缺乏精確地圖和對遠東實況的瞭解，以致實際地名和想像區域間有不小落差。其次，他們是代表教宗的宗座代牧，和有修會會規約束的會士們，在本質上就有服從權限的問題，會士們會問：修會長上和宗座代牧的命令不一致時，他們該聽誰的？最後，宗座代牧明顯的不會理會葡萄牙保教權，這當然會引起代表或支持葡萄牙保教權的傳教士抗議，甚至不服從。而在這些問題解決前，葡萄牙傳教士們是不會讓他們所控制的進出管道的。

一六八〇年，傳信部將中國和交趾的教務分開，陸方濟以福建宗座代牧的名義兼管浙、贛、粵、桂、蜀、滇、黔、湖、廣等地，這基本上解決了部分管轄區域重疊問題。而在此之前，國籍道明會士羅文藻在一六七三年，已被任命為南京宗座代牧。羅文藻被祝聖的消息傳來，菲律賓道明會玫瑰省的長上不予接受，甚至限制羅文藻的行動，以致羅文藻找不到可以為他祝聖主教的人。<sup>60</sup>終

<sup>60</sup> Jose Maria Gonzalez 著，孫純彥譯，〈羅文藻主教傳〉，〈羅文藻史集〉（高雄：高雄教區公署，一九七三年二月出版），頁四十二～四十五。不接受的理由是多方面的：他的學識不夠；西班牙保教權、宗座代牧與修會權限衝突；中國禮儀問題中的立場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他只是國籍道明會士。傳信部還派他任宗座代牧，未嘗不也是具有象徵意義。



於，一六八〇年傳信部予陸方濟全國教務總理之職，他以傳信部命令，命中國所有傳教士宣誓服從於他，消息傳來，各修會傳教士聞之騷動不已。甚至有因拒絕宣誓而離華者。時義籍傳教士伊大仁 (Della Chiessa) 任其輔理主教，或因宣誓問題與陸方濟意見不合，一六八五年入華後，陸方濟乃命伊大仁至廣州，任其為粵桂蜀滇黔五省署理主教；而另以閩浙贛湘賦予法籍傳教士閻瑞 (Charles Maigrot)，又任其為全國教務副總理。<sup>61</sup> 陸方濟又召羅文藻至其駐地穆洋，欲為其祝聖；一六八四年十一月羅文藻到時，陸方濟已謝世；伊大仁聞訊乃召羅文藻至廣州，在一小堂中為其祝聖，第一位中國籍主教方始在一六八五年出現。

南懷仁是康熙親政後最受信用之耶穌會士，他從法蘭德斯地區出身的背景，使其對葡萄牙保教權的限制深為不滿，在他看來，法國對宗教的熱誠與國力，才是可能協助天主教在華傳播的主要力量。自一六七六年後，南懷仁即與法國政教界人士聯絡，期引進法國耶穌會士。一六八〇年，陸方濟命全國傳教士服從的事件發生，南懷仁乃遣柏應理回歐，設法召集法國耶穌會士來華。<sup>62</sup> 在柏應理奔走於羅馬及巴黎後，五名法籍耶穌會士以「國王的科學家」名義被法王路易十四世遣來中國，他們刻意避開了葡國所控制的口岸，選擇在浙江寧波登岸，當時浙江巡撫金鉉不樂法人脫序之舉，上奏於康熙，欲遣其回國，康熙反命召之人京，由此可見南懷仁已先與康熙妥商，而康熙亦贊成法

<sup>61</sup> G. Mensact 著，施森道譯，〈康熙間我國聖統制度之建立〉，〈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頁二七七～二七八。其時巴黎外方傳教會已正式成立，閻瑞為其中成員，陸方濟為創會者之一，自然對閻瑞較為信任。

<sup>62</sup>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頁三四八、三一二。

籍耶穌會士之行也。<sup>63</sup> 這些法籍耶穌會士來華是為康熙做科學服務的，在康熙看來他們是「遠臣」，既然是臣，即需守臣下規矩，尊皇帝命令；不但法籍耶穌會士如此，在官廷服務的葡萄牙耶穌會士亦然；然後從朝廷擴及地方，賴康熙准允得在地方「自由行走」之傳教士，皆為康熙之遠臣。至於各地傳教士是否有此相同認知，則因人而異了。而法國耶穌會士，由於其在朝廷的服務良好，不久就形成葡萄牙耶穌會士之外，另外一股官廷傳教士勢力。

#### 四、中國禮儀問題

除了葡萄牙保教權、宗座代牧權力及修會間的爭執外，在中國的傳教士們爭執最烈的是中國禮儀問題。所謂中國禮儀問題的焦點是中國人祭祖、祀孔的禮儀，是否具有宗教的意涵？另外就是可否以「天」或「上帝」來稱呼 *Deus*？這些爭論自一六一〇年利瑪竇去世後，首先在耶穌會士之中引發，繼任中國會長的龍華民反對採用「天」及「上帝」兩個名詞，主要是在日本傳教的耶穌會士，認為按照朱熹的解釋，這兩個名詞都不足以代表天主為萬物主宰之意。經過一六二一年澳門會議，以及一六二八年嘉定會議，耶穌會內逐漸形成一種多數意見，認為敬祖及祭孔不是迷信。一六三三年，新任的耶穌會遠東視察員李瑪諾（Emmanuel Diaz Senior）准許並用「天」、「上帝」、「天主」等名詞。<sup>64</sup>

耶穌會內的問題解決後，其他傳教團體意見又不與耶穌會一致。起因是道明會士黎玉範

<sup>63</sup> 同前，頁四二七～四二八。

<sup>64</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二冊，頁三一四～三一五。

(Joannes Baptista Morales) 和方濟各會士利安當 (Antonius de Santa Maria)，在一六三三年到福建的福安地區傳教，他們以迷信為由禁止當地的教友祭祖，並為此問題與李瑪諾辯論。辯論無共識，黎玉範及利安當決定上訴羅馬；一六四三年黎玉範在羅馬提出在中國傳教的諸多問題，其中包括「敬城隍」、「敬孔子」、「祭祖」等，一六四五年九月，教宗英諾森十世，下令敬城隍、敬孔子、祭祖一律加以禁止。消息傳到中國，耶穌會方面乃派衛匡國赴歐說明。南明使者耶穌會士卜彌格在中國政治局勢的立場上與衛匡國不同，但在中國禮儀問題上，兩人並無二致。

一六五五年與耶穌會士友好的教宗亞歷山大七世登基，一六五六年三月，聖職部公布部令，如敬孔、祭祖確如衛匡國及卜彌格所言屬社會禮儀，則自然可以准許教友舉行。此令並由教宗批准。道明會士乃起而反對，一六六九年聖職部遂再頒新令，聲言一六四五年傳信部有關中國禮儀的命令並未廢除。傳教士如何決定，需視情況而定。

因楊光先反教，多數傳教士被逐往廣州，一六六七年底至一六六八年初，二十三名傳教士藉此時機舉行會議，決議遵守亞歷山大七世的命令，僅利安當及道明會士閔明我 (Domingo Navarette) 拒絕簽署，後閔明我至一六六八年九月亦簽字同意。傳教士被釋放後，閔明我改變態度，返回歐洲，著書反對廣州會議之決議，於是在歐洲教會內爭論又起，並成為反對耶穌會的重要論題之一。<sup>65</sup> 反對派認為耶穌會士在教義上鬆弛，不夠堅持原則，對異教文明有過度的讚美。

受到這種氣氛的影響，福建宗座代牧閻璫在一六九三年下令，於其代牧區內禁止教友們祭祖、

<sup>65</sup> 同前，頁三一五—三一六。

敬孔；次年又派兩教士至羅馬，上書教宗。耶穌會士覺得彼此爭論無益，還不如在中國人中取得有關祭祖敬孔的權威意見，這樣或許能化解歐洲人的歧見。一七〇〇年宮廷耶穌會士乃聯名上奏康熙，談到有關祭祖敬孔的意義：「臣等管見，以為拜孔子，敬其為人師範，並非祈福佑、聰明、爵祿而拜也。祭祀祖先，出於愛親之義，依儒禮亦無求佑之說，惟盡孝思之念而已。雖立祖先之牌，非謂祖先之魂，在木牌位之上，不過孖子孫報本追遠，如在之意耳。至於郊天之禮，非祭蒼蒼有形之天，乃祭天地萬物根源主宰，即孔子所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有時不稱上帝而稱天者，猶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類，雖名稱不同，其實一也。前蒙皇上所賜匾額，御書敬天二字，正是此意。」康熙皇帝御批：「此所寫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居親、敬師長者，係天下通義，這就是無可改處。欽此。」<sup>66</sup>耶穌會士遂將康熙意旨分途送往羅馬。

中國的耶穌會士們並不曉得，一七〇〇年在歐洲的教會，正是所有反耶穌會的勢力，對耶穌會聯手出擊的時刻。起因是第一批來華法籍耶穌會士之一的李明（Louis Le Comte），來華未久，一六九二年即被派回歐洲，申訴葡籍耶穌會士對法國耶穌會士之種種限制。不過回到歐洲後，他發現中國禮儀問題更大，一六九六年他在歐洲出版了《中國現勢新志》（*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一書兩冊，該書係書信體，上冊八封信，下冊六封信，內容談論中國之土地、氣候、運河、物產，中國民族之特質、古老、高貴、習俗、優點、缺點、語言文字、書籍、倫理，

<sup>66</sup> 黃伯祿，〈正教奉裏〉，頁一二〇～一二一。轉引自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二冊，頁三一七。

中國人精神方面之特徵等<sup>67</sup>。他的主要目的是使歐洲上流社會相信，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傳教方法是明智的、審慎的，是合乎基督教義的。他極力讚揚孔子，辯護說人們對孔子的敬仰絕不是一種宗教信仰，因為「標有他名字的殿堂不是寺廟，而是學者集合的所在<sup>68</sup>。」他引用康熙和南懷仁的談話，康熙質疑說，為什麼不用「上帝」來稱呼 Deus，「這樣，人們就不會反對你們的宗教了<sup>69</sup>。」

兩年後，一位法國的耶穌會士 Charles le Gobien 出版了《中國現勢新志》的補充作品——《關於中國人敬仰孔子及死者的說明》。李明及 Le Gobien 的作品，必須放在一連串的耶穌會及反耶穌會辯論的脈絡中，才能瞭解其不斷出版類似及補充作品的原因。總之，一七〇〇年在此不斷衝突的脈絡中，巴黎外方傳教會向巴黎大學神學院提出了對李明及 Le Gobien 的控訴，重點不是放在禮儀的本身，而是以為這些作品表現出中國有一個時代久遠超過基督文明的宗教——道德系統，而這個宗教——道德系統是超過基督教的。<sup>70</sup>

在路易十四世第二任妻子曼特農夫人 (Madame de Maintenon) 的支持下，巴黎外方傳教會獲得了勝利，巴黎大學神學院在一七〇一年十月判定兩人的主張有背神學。此時在羅馬，教宗克來蒙十一世 (Clement XI) 也相當注意中國禮儀問題，希望能有定論。經過三年正反方面的反覆辯論，

67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頁四四二。

68 艾田蒲著，許鈞、錢林森譯，〈中國之歐洲〉上冊（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版），頁二八五—二八六。

69 同前，頁二八八。李明應是引用了南懷仁的信件或報告，不然，在他到達中國前，南懷仁已去世。

70 同前，頁二九四—二九五。

一七〇四年十一月，經過投票，聖職部決定不許中國禮儀實施，認定有損及教義的危險，然後教宗批准。為免引起紛爭，不許在歐洲公佈，秘密交予教宗特使帶往中國。<sup>71</sup>

### 五、多羅出使中國

多羅為十七世紀歐洲頂尖的知識份子，專長為法律，在克來蒙門十一世任教宗前，即與其熟識；因此當克來蒙十一世要遣使中國時，多羅乃成第一人選。一七〇一年底，教宗欽點多羅為特使，多羅以身體虛弱婉拒，但教宗不許；一七〇二年七月，教宗命令正式發佈，龐大的特使團由羅馬啟程；為突顯教廷特使與葡萄牙無關，故不從里斯本出發，亦不乘葡萄牙船。特使團先搭西班牙船，後消息傳來，路易十四世提供大船，乃改搭法國船，一七〇三年十一月抵達印度，住了八個月之久，然後轉赴馬尼拉。在馬尼拉時，多羅才知道教廷對中國禮儀的結論。一七〇五年三月十三日，多羅離開馬尼拉，前往澳門。葡萄牙國王雖不悅教宗派多羅出使，但也不願因此與教宗斷絕往來。因此，當多羅在馬尼拉時，已獲悉澳門總督歡迎其前往澳門。<sup>72</sup> 四月二日，多羅抵澳門，未多停留。四月五日即乘小轎，進入廣州。

多羅在廣州首先發函各傳教團體，命遵守一六八八年傳信部部令，宣誓服從教區主教或宗座代牧。西班牙籍方濟各會士不從，為此集體離開中國十五年之久。多數耶穌會士主張，多羅不應公開其教宗欽使身份，免除康熙詢問所可能引發的問題。但部分法籍耶穌會士則希望多羅能公開晉見康

<sup>71</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二冊，頁三一八。

<sup>72</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〇七、一〇九。

熙，藉公開場合，向康熙請求設立法籍耶穌會士的會院。張誠 (Jean Francois Gerbillon) 乃自北京上書多羅，請其以教宗欽使身份求見。傳信部派出的北京主教伊大仁此時又函多羅，稱康熙皇帝有意立耶穌會士徐日昇 (Thomas Pereira) 為全國傳教事務總管。多羅聞訊，認為耶穌會士別有圖謀，於是決定以欽使身份公開求見康熙皇帝，並且選定傳信部派出的遣使會士畢天祥 (Luigi Antonio Appiani) 為翻譯及秘書。<sup>73</sup>

一七〇五年七月，康熙准多羅至京晉見；十二月十四日多羅入京，住進法國耶穌會士掌管之北堂。八日後，團員一人去世，耶穌會士聞訊請葬之於耶穌會墓地，多羅不允。康熙得知後欽賜葬地，藉機觀察使節團之葬禮；觀察葬禮之侍衛奏報，禮節與在華耶穌會士不同，康熙乃對多羅等產生疑心。<sup>74</sup>

多羅雖對禮儀之爭結論了然於胸，但未取得正式命令之前，不願多言。在華傳教士不知多羅已有定見，仍在多羅之前爭論。康熙帝疑多羅來華目的，十二月二十五日遣侍衛詢問是否為禮儀問題而來，多羅不敢稱是，僅稱係代表教宗向康熙問安並巡視教務。十二月二十六日，侍衛再來，稱皇帝准特使巡閱各省教務，但不宜巡視在京之耶穌會會院。十二月二十七日，耶穌會士張誠及徐日昇被召入宮，翻譯多羅奏本。十二月二十八日，侍衛再來北堂，稱康熙耳聞有些傳教士在中國只待了兩三年就回到歐洲，到處說中國人壞話。十二月二十九日，徐日昇及畢天祥送多羅奏本人宮，有太監傳話，問畢天祥曾在四川被地方官驅逐，是否屬實？三十日，全體在京耶穌會士拜見多羅，聲明

<sup>73</sup> 同前，頁一一三～一一四。按伊大仁想法，北京主教應該是有中國教會首席地位的。

<sup>74</sup> 方彙，《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二冊，頁三二〇。

絕對無意擔任在華傳教士總管。

康熙皇帝不許多羅巡閱在京耶穌會士，應該是認為這些耶穌會士屬其管轄，教宗特使無權干涉。然後康熙如何得知有傳教士在歐洲說中國人壞話？畢天祥在四川情形又如何讓康熙得知？諸種跡象都指向在京耶穌會士。在特使團看來，耶穌會士似乎對康熙的效忠還多些。十二月三十一日，多羅入京晉見。多羅請求准許任命一中國教務總管，皇帝答稱此人應在中國傳教多年，並為朝廷效勞。<sup>75</sup> 康熙訂出的資格只有在京耶穌會士符合，而多羅則希望是由傳信部遣派中者出任。多羅又請在京城建堂，康熙未答。康熙問多羅關於康熙對祭祖敬孔的批示，教廷有否收到。多羅不能明白回覆，康熙遂命多羅上書回覆。

因多羅遠道而來，康熙決定派報聘使回覆教廷。多羅建議以特使團副使沙國安 (Martini) 為報聘使，康熙同意，並下旨由侍衛趙昌伴送至廣州。隔日趙昌奏報說報聘使必須通中文，以便解釋皇帝禮物之意，央求改派耶穌會士白晉 (Jochim Bouvet) 為正使，沙國安為副使，康熙同意趙昌所請。康熙改變旨意，應該是在京耶穌會士運動結果。且以白晉為正，沙國安為副，在多羅立場看來，是對特使團之侮。一七〇六年一月四日，為趕上英國船 *Emis* 號，兩人乘驛馬兼程而下，但抵廣州時，英國船已離廣州，於是沙國安遂和白晉在廣州候船。<sup>76</sup>

一七〇六年中國新年（約二月十五日）時，教友按例向神長賀年，多羅由畢天祥翻譯，詢教友家中是否供有牌位？多數教友答稱沒有，僅一教友據實回覆稱有。消息傳出，耶穌會士對教友不

<sup>75</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一八—一一九。

<sup>76</sup> 同前，頁一二〇。



滿，想多羅必定以為贊成祭祖者為少數。教友們亦恐慌不已，認為多羅係來華禁止教友祭祖。三月七日，北京教友們要向多羅請願，申訴祭祖理由，畢天祥將請願書扯碎。三月二十一日，京外教友百餘人向多羅請願，時多羅臥病，無力撕裂請願書，僅將其擲地，畢天祥再怒責教友。多羅必定認為此為耶穌會士的佈置。<sup>77</sup>於此同時，馬尼拉傳來消息，知有關中國禮儀之禁令已下，多羅對此遂不容再做討論。<sup>78</sup>另一方面，康熙亦確定多羅來華要項之一，就是中國禮儀問題。

多羅病體一直未見痊可，又疑心耶穌會士把持宮廷言路，於是情緒逐漸失控。一七〇六年六月一日，耶穌會士紀理安 (Bernard-kilian Stumpf) 同一官員探視多羅；多羅叱退紀理安，面告官員稱有要事向康熙稟奏，因多羅生病不能入宮，六月二十日，皇帝遣官聽取多羅欲奏之事。多羅厲聲稱白晉不能充報聘使；葡萄牙耶穌會士阻止他國傳教士為康熙效勞；葡萄牙國王命傳教士自里斯本出發，阻礙皇帝和教宗的往來使節。隨官員而來之耶穌會士不願翻譯，多羅乃命畢天祥逐句譯明。清朝官員瞭解內容後亦拒絕轉奏，要求多羅書寫奏本。多羅不顧眾人勸阻，堅持上奏。<sup>79</sup>康熙見多羅上奏後批曰：「覽多羅奏，朕知道了，無用再論，但白晉已與沙國安不和，叫回白晉如何？」<sup>80</sup>多羅又表示叫回報聘使，恐教宗不悅，於是白晉繼續與沙國安暫停廣州。

<sup>77</sup> 同前，頁一二二～一二三。

<sup>78</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二冊，頁三二二。

<sup>79</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二〇〇～二〇一。

<sup>80</sup>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一)。其實白晉與沙國安相處情形，康熙早有其他管道得知。

六月二十四日，康熙於赴熱河避暑之前發上諭：「前日曾有上諭，多羅好了陛見之日再論。今聞多羅言，我未必等得皇上回來之話，朕甚憐憫，所以將欲下之旨曉諭。朕所欲發旨意者：近日自西洋所來者甚雜，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借名為行道，難以分辨是非。如今爾來之際，若不定一規矩，惟恐後來惹出是非也，覺得教化王處有關係。只得將定例，先明白曉諭，命後來之人謹守法度，不能少違方好。以後允自西洋來者，再不回去的人，許他內地居住。若近年來明年去的人，不可叫他許住。此等人今譬如立於大門之前，論人屋內之事，衆人何以服之？況且多事！更有做生意，跑買賣等人益不可留住。凡各國各會皆以敬天主者，何得論彼此，一概同居同住，則永無爭竟也，為此曉諭。」<sup>81</sup>

康熙在六月二十四日的上諭中，已暗責某些傳教士不懂中國事務，又論中國是非，這應該是有對象的，但在這篇上諭中尚未明白指出是誰。而所謂「屋內之事」，主要應該指的就是禮儀問題。在赴熱河之前，六月二十九日，康熙第二次接見多羅，再詢問多羅來華目的，多羅稱係向康熙請安而來。康熙顯然並不相信，要多羅呈報教宗，中國人祖傳禮儀不可改，且中國禮儀不反對天主教道理。康熙並邀多羅次日遊暢春園；六月三十日遊暢春園時，康熙再面諭多羅轉呈教宗：中國兩千年來，奉行孔學之道。將來若有人反對祭祖敬孔，西洋人就很難留在中國。<sup>82</sup>七月六日，康熙侍衛趙昌、赫世亨去見多羅，令將康熙旨意寫成書信，待康熙欽定後寄予教宗，表明中國禮儀

<sup>81</sup> 同前，頁二。

<sup>82</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二四。

並非迷信。<sup>83</sup>

在傳教士方面，贊成中國禮儀的耶穌會士與反對者的爭辯中，多羅召福建宗座代牧閻璫至北京與耶穌會士共同審查。真正意思就是讓兩邊辯論清楚。閻璫在六月三十日入京，隨後與耶穌會士間有相當激烈的辯論。七月二十二日，康熙忽傳上諭，命閻璫至熱河行宮面見。康熙先告訴多羅，他不會問閻璫中國禮儀，僅要求其說明如何解釋中國經書；閻璫大怒，認為是耶穌會士勾結內廷太監的佈置。但皇帝召不能不去。<sup>84</sup> 閻璫在八月一日或二日晉見康熙，因閻璫只能說福建方言，遂由耶穌會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enin）翻譯，帝指御座後「敬天法祖」四字，閻璫僅識其中一字；隨行的兩位中國教書先生，又向康熙跪奏，閻璫讀中國經書時，不聽他們的話，而是聽另一個外國人的話。康熙再問閻璫，七月初所寫儒家和天主教教義不同處，究竟意義為何？閻璫不能答。<sup>85</sup> 由這些問題可知康熙已對閻璫有所了解，而這些了解當然是來自於宮廷耶穌會士。

八月二日康熙親筆諭曰：「愚不識字，擅敢妄論中國之道。」八月三日又諭：「諭示多羅：顏璫既不識字，又不善中國語言，對話須用翻譯，這等人敢談中國經書之道，像站在門外，從未進屋的人，討論屋中之事，說話沒一點根據。<sup>86</sup>」八月十日畢天祥回北京向多羅報告覲見情形，多羅

<sup>83</sup> 馮明珠，〈堅持與容忍——檔案中所見康熙皇帝對中梵關係生變的因應〉，《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一四九。

<sup>84</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二五—一二六。

<sup>85</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二冊，頁三二三。

<sup>86</sup> 同前，頁三二四。

感覺無轉圜空間，於是向康熙請求准許離京。康熙應允，但仍派赫世亨、趙昌向多羅明白曉諭：「朕所頒諭旨，及爾所奏行諸事，爾雖隱匿不告之教化王，然朕務使此處西洋人，賚書爾西洋各國，詳加曉諭。」<sup>87</sup>」

一七〇六年八月二十日，多羅離北京，十二月十七日抵達南京。約在此時，康熙下令驅逐閩瓊及多羅派任的浙江代牧主教何納篤（Donato Mezzafalce），並命將畢天祥遣發四川，就地監禁。這些人在康熙看來，都是多羅反對中國禮儀的幫凶。十二月十八日康熙召見所有在京耶穌會士，命均應向朝廷領票，「票上寫明西洋某國人，年若干，在某會，來中國若干年，永不復回西洋，已經來京朝諭陛見。為此給票兼滿字。」<sup>88</sup>」領票的意涵是向康熙皇帝效忠，雖未提到中國禮儀，但言外之意是既然效忠於皇帝，若皇帝要求遵守中國禮儀，則不應違反。

多羅在南京也有強硬表示。他在一七〇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向在中國的傳教士發佈公函，宣佈教宗已經禁止祭祖敬孔，公函在二月七日公佈。「敢有自作主張，不按指示去答覆的，馬上受『棄絕』重罰」<sup>89</sup>，棄絕意即逐出教會。同年，康熙在年初南巡，多羅則南下廣州，做回歐準備。康熙疑心多羅教宗特使身份，命出示教宗任命狀，多羅拒絕，六月中下旬，康熙下令將多羅逐往澳門。因葡萄牙與教廷關係惡化，一七〇六年卧亞總督即宣佈，禁止澳門官民承認多羅教宗特使身份。故

<sup>87</sup> 馮明珠，〈堅持與容忍——檔案中所見康熙皇帝對中梵關係生變的因應〉，《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一五一。

<sup>88</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二八。

<sup>89</sup> 同前，頁一二八—一二九。

一七〇七年六月底多羅抵澳門後，即遭軟禁命運。<sup>90</sup>

#### 六、耶穌會士充康熙使臣遣派教廷

康熙皇帝認為他自己對中國禮儀有充分理解，多羅是「今年來，明年去」的人，受不懂中國文化的傳教士誤導，以致認為敬孔祭祖為迷信，因此他要直接與教宗溝通，講明多羅不願向教宗表達的部分，而他能信任的只有耶穌會士。

一七〇六年十月一日，康熙派龍安國 (Antoine de Barros) 和薄賢士 (Antoine de Beauvoisier) 為特使，攜其詔書赴教廷解釋。於此同時，多羅在北京往南京途中。龍安國為葡萄牙人，薄賢士為法國人，康熙在此派遣中也考慮了不同國籍耶穌會士的問題。兩人自澳門登船，因此康熙派往教廷的使臣，極可能是得到澳門總督支持的，因為康熙既反對多羅主張，則應該是對葡萄牙有利的。他們安抵巴西，可能為安全計，兩人分乘不同船隻赴里斯本，但在一七〇八年一月二十日，皆在葡萄牙外海，遇風暴沈船，均未生還。<sup>91</sup>

在派出龍安國及薄賢士之後，康熙與多羅關係日益惡化，康熙將多羅逐往澳門，澳門總督限制多羅行動，一方面是臥亞總督的指示，另一方面是康熙皇帝的要求。<sup>92</sup> 在多羅困於澳門後，康熙在一七〇七年十一月，又派了義大利人艾若瑟 (Joseph-Antoine Provana) 及西班牙人陸若瑟 (Ray-

<sup>90</sup> 同前，頁一三三—一三四。

<sup>91</sup>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頁四九三。

<sup>92</sup> 艾田蒲著，許鈞、錢林森譯，〈中國之歐洲〉下，頁五。

mond Joseph Arxo) 兩名耶穌會士，攜詔書副本赴歐。<sup>93</sup> 蓋康熙明瞭，遠洋交通風險甚大，另派一組使臣以為保險也。康熙予此四名耶穌會士之諭令，必定是在將國書送達得回信後，立即回返。因康熙此後每年船期之時，均詢是否有教宗信函寄到。<sup>94</sup>

艾若瑟及陸若瑟兩人在一七〇九年到了羅馬，見到教宗，為禮儀問題與反對者有相當激烈的辯論。或因多羅被囚於澳門之訊息傳來羅馬，或因艾若瑟所攜僅為詔書副本，教宗乃限制艾若瑟及陸若瑟二人行動，不准回中國。陸若瑟返西班牙故里，一七一一年病死於其家鄉。<sup>95</sup> 艾若瑟則留居羅馬兩年八個月，後准其返鄉探親，不久有謠言稱其欲偷回中國，於是艾若瑟行動又受限制，在米蘭及都靈各住三年。<sup>96</sup>

在中國方面，教宗在一七〇七年八月一日冊封多羅為樞機主教。<sup>97</sup> 一七一〇年一月傳信部六位傳教士從馬尼拉抵澳門，送來樞機小紅帽，並行接受樞機紅帽禮。當時葡萄牙人懷疑多羅將乘西班牙船逃出澳門，康熙又有令，命多羅在遣赴歐洲的使臣回中國前，不許離澳門，於是葡兵與中國官兵加強監視，甚至連飲食均不令放入。由於情勢日漸嚴峻，一七一〇年二月一日，多羅命沙國安為

<sup>93</sup> 馮明珠，〈堅持與容忍——檔案中所見康熙皇帝對中梵關係生變的因應〉，《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一五七。

<sup>94</sup> 同前。

<sup>95</sup>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頁四八五、四八六。

<sup>96</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三冊，頁三十。

<sup>97</sup> 方豪和羅光均稱係因多羅被囚，教宗酬答其堅貞，故冊封為樞機，但多羅在一七〇七年六月抵澳門後被禁，八月一日，歐洲不可能知其被囚消息。

副使，然後若沙國安不能行使職務時，使團成員依次遞補。三月四日，他又上奏康熙，告以受封為樞機，又奏新來傳教士六人，願往宮內服務。這篇奏章的重點不在內容，而在其格式；多羅故意用五爪龍紙，突顯其教會親王身份，又在提及教宗處抬頭，使教宗與康熙平等。康熙閱信後以其逾矩，大為不悅。<sup>98</sup> 四月二十五日後，多羅樞機病勢加重，臥床不起，延至六月八日，在澳門軟禁處去世。

這時在歐洲，陸若瑟不久後去世，艾若瑟則被教廷限制行動，數年間康熙苦候，並無任何消息傳來。時傳信部傳教士德理格 (Theodoricus Pederini) 與馬國賢 (Matteo Ripa) 亦已入京擔任樂師及畫師，一七一二年，德理格曾面呈康熙教宗詔諭，但因其時間在耶穌會士奉使歐洲之前，康熙並不重視教宗詔書內容，但對德理格則愈加器重。一七一四年十月，康熙自關外打獵歸來，即命德理格將皇帝有關中國禮儀意見，翻譯成拉丁文國書，十二月，因俄國商隊將返莫斯科，乃循陸路送往教廷。不過德理格除康熙國書外，亦曾另寄函教廷，表示康熙被耶穌會士包圍，其祭祖敬孔之意見乃不可動搖。<sup>99</sup>

教宗克來蒙十一世在耶穌會士及傳信部傳教士之間，自然是信任傳信部傳教士；他認為在華耶穌會士不願遵守一七〇四年禁約，造成了多羅出使的失敗。於是在一七一五年二月，發佈了「自登極之日」(Ex illa die) 通諭，嚴令遵守有關中國禮儀相關規定。一七一六年八月通諭寄達廣州，傳信部辦事處負責人龐克修 (Joseph Ceru) 密寄各省教士。九月間康熙已知有西洋書信送到，德

<sup>98</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三七～一三八。

<sup>99</sup> 同前，頁一四〇；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二冊，頁三五四。

理格並告知係教宗有關禁止中國禮儀之通諭。康熙乃在一七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令武英殿監修伊都立及趙昌等擬旨，供職內廷衆西洋人署名，以滿文、拉丁文書寫、雕版，共印了一百五十張，兩廣總督楊琳，稱之為「紅字票」，交予來華回國之西洋人帶回。內容如下：「我等謹遵旨，於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龍安國、薄賢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陸若瑟（亦作盧若瑟），奉往西洋去了。至今數年，不但沒有信來，所以難辨真假；又有亂來之信，因此與鄂羅斯的人，又帶信去，想是到了，畢竟我等差去人回時，事情都明白之後，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無真憑據，雖有甚麼書信，總信不得。因此唯恐書信不通，寫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廣東巡撫院印，書不封緘，凡來的衆西洋人，多發與帶去。<sup>100</sup>」

康熙的公開尋人作法奏效，一七一八年消息陸續傳來，康熙得知龍安國、薄賢士遇風遭難，陸若瑟身故，教宗看到了紅字票，並已傳喚艾若瑟，俟其到羅馬後即會差其返中國覆命。<sup>101</sup>艾若瑟到羅馬後，國務卿保羅琪樞機（Cardinal Paulucci）命其向康熙解釋遲歸原因係因患病，對於中國禮儀問題，不許多言，以免與教廷訓令抵觸，教廷將再派使解釋。<sup>102</sup>艾若瑟當時確有病在身，不顧耶穌會會友攔阻，於一七一九年四月與同伴中國籍耶穌會士樊守義束裝就道，一七二〇年二月船行途

<sup>100</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四一；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三冊，頁三十一。羅光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方豪用教廷傳信部檔案，內容略有差異。

<sup>101</sup> 馮明珠，〈堅持與容忍——檔案中所見康熙皇帝對中梵關係生變的因應〉，〈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一六一。

<sup>102</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三冊，頁三十。



中去世，棺柩運回廣州。康熙皇帝派出的耶穌會士，終究沒有一人返抵中國。<sup>103</sup>

### 七、嘉樂遣使來華

教廷綜合在華不同派別傳教士之報告，以及康熙大動作傳遞的訊息，覺得有必要再度遣使來華，解決中國禮儀問題。由於康熙皇帝的介入，中國禮儀問題的層次並非僅只教會內部的紀律，甚而牽涉到天主教在華傳教的許可。在此僵局中，聽從康熙命令的傳教士，由於教宗再三的禁令，實際上被剝奪了行使聖事的權利。而不遵中國禮儀的傳教士，則將被一一清查，驅逐出境。<sup>104</sup> 傳信部在派使之前，先將各方傳教士的報告交已返回羅馬的兩位中國傳教士，閻璫及余主教 (Juan Francisco de Leonissa) 研究，閻璫雖為禁止中國禮儀的關鍵人物，但是他了解禁令推行後中國教會的慘況，於是建議傳信部在實施禁令時，若干細節可以通融。<sup>105</sup> 於是教廷的方針確定，禁令原則不變，但部分內容，授權使臣可視狀況修正。

一七一九年九月十八日，兩度發佈禁令之克來蒙十一世，乃任命嘉樂加亞力山大宗主教銜，為出使中國及附近國家特使，率特使團出使中國。嘉樂派費理簿 (Philippus Maria Cesati) 及何濟格 (Onorato Maria Ferrari) 二人攜教宗手書先遣，告知中國政府特使團將來訪訊息。<sup>106</sup> 二人於一七

<sup>103</sup> 同前，頁二十九。

<sup>104</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二冊，頁三二八。

<sup>105</sup> 同前。

<sup>106</sup> 同前。

二〇年八月抵達廣州，隨即送往北京，十月時在熱河得知消息之康熙皇帝，即命廣東官員查明二人身份：

「養心殿、武英殿等處管製造、帶西洋人事；伊都立、張常住、王道化、趙昌欽奉上諭，傳與兩廣總督、廣東巡撫：九月十六日到來西洋人費理簿、何濟格二人，稱係教化王所差，併帶來教化王奏帖一件，詢其來由，並無回奏當年所差艾若瑟傳旨之事。但云教化王隨即差人復命，因無真實憑據，其奏帖皇上亦未開看；費理簿、何濟格二人亦不曾著與在京西洋人見面。此二人現留在京等候，此字到日，爾等可即速將此二人來歷問明回奏。又先年自西洋來山遠瞻、德理格、馬國賢三人，自稱係教化王差來之人，皇上待之甚厚，前歲山遠瞻已病故，德理格、馬國賢二人，看其行止，亦不似教化王近使差來之人。此二人果係教化王所差否查明回話。再五十五年曾有教化王帶來禁約告示一件到山東省，因此告示可疑，皇上故發紅票去。此告示果係教化王帶來，或真或假，一併查明回奏。」<sup>107</sup>

一七二〇年十月十二日，在這兩名嘉樂先遣人員候於北京時，嘉樂率特使團進入廣州，十六日拜會兩廣總督，總督詢以五事：特使來華的使命？教化王（教宗）是否有新的奏帖？多羅在華處置各事，是不是受教王的命？康熙所遣往羅馬的四個西洋人為什麼不見回來？嘉樂特使是否另有要事上奏朝廷？嘉樂回答說他來華係為向康熙問安；攜有教化王的信一封，將面呈康熙；多羅乃教化皇特使；四名西洋人中三人已去世，艾若瑟本預備回來，但因病不能行。同時另稱，教化皇有禮物贈

送康熙，也求康熙保護天主教。<sup>108</sup>

對於康熙派出西洋人情形，兩廣總督是明知故問，因為在同年七月，中國籍耶穌會士樊守義已伴送艾若瑟靈柩回到廣州，康熙並命護送樊守義進京，由康熙親自詢問。<sup>109</sup>嘉樂在十月底由廣州動身，十一月二十五日，船過江西安徽省界，有兩官員奉旨來詢問嘉樂：艾若瑟何在？費理簿及何濟格是否為教化王所派？山遙瞻、德理格、馬國賢是否為教化王所遣的傳教士？「自登極之日」禁令是否為教化王的諭令？嘉樂答稱：艾若瑟有病；費理簿、何濟格、德理格、馬國賢皆為教化皇所遣；禁令為教化皇諭令，但譯文是否合於原文，因未看見譯文，不能確定。<sup>110</sup>

在反覆查證後，康熙確定嘉樂率龐大使團是為中國禮儀問題而來，不是只來請安的；嘉樂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抵北京城外，伊都立、趙昌、李國屏、李秉忠四人奉旨前來問嘉樂：「……爾在廣東並在途中，但云教王差臣嘉樂，請皇上安，謝皇上愛養西人重恩，並無別事。語言關係體面，前後不可增減。」嘉樂知此時必須明白回答，即答覆稱：「遠臣嘉樂，實是教王所使。教王使臣請皇上安，求皇上隆恩有兩件事：一件求中國大皇帝俯賜允准，中國人教之人，俱依前歲教王發來條約內禁止之事。」<sup>111</sup>

<sup>108</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五九。

<sup>109</sup> 馮明珠，〈堅持與容忍——檔案中所見康熙皇帝對中梵關係生變的因應〉，〈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一七九。

<sup>110</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六〇。

<sup>111</sup> 同前，頁一六一。

康熙在確定嘉樂為禮儀問題而來後，決定不要跟這位教宗特使客氣，用反諷的語氣下旨說：

「伊都立、趙昌等傳旨嘉樂，爾教王所求之事，朕俱俯賜允准。但爾教王條約與中國大道理大相悖戾，爾天主教在中國行不得，務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國傳教之西洋人亦屬無用，除會技藝的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者仍准存留，其餘在中國傳教之西洋人俱帶回西洋。且爾教約只可禁止爾西洋人，中國人非爾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可依約自行修道，不許傳教。此即准爾教王所求二事。<sup>112</sup>」

康熙又說：「嚴璫原係起事端之人，爾怎不帶他回來。<sup>113</sup>」嘉樂聞後，只能求康熙閱覽教宗表章，並稱閻璫與教宗禁約無關。<sup>114</sup>康熙餘怒未消，隔日又下旨稱：「爾教王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謬；教王表章，朕亦不覽。西洋人在中國行不得教；朕必嚴行禁止。本應命爾入京陛見，因道理不合，又生爭端，爾於此即回去。明日著在京眾西洋人於拱極城送爾。西洋人中有不會技藝之人，爾俱帶去。再爾等問嘉樂帶來會技藝之九人，伊等情願効力者，朕留用；不願在中國者，即同回去，朕不強留。欽此！」

嘉樂保持低調，請來官代奏，因旅途遼遠，身體困乏，請康熙准許在明春河水解凍後，再由水

<sup>112</sup>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十三）。

<sup>113</sup> 同前。

<sup>114</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六二。

路南。115 康熙見嘉樂謙恭，態度遂轉趨和緩，十二月二十八日再傳旨嘉樂，稱中國禮儀的溝通問題是閭瑯及德理格造成，嘉樂再請康熙閱教宗手書及禁約，「其中有合中國道理者，求皇上准令人教之人依行。有不合中國道理者，亦求皇上明示。臣嘉樂係使來之人，不能違教王命，能遵旨改正者，臣即遵旨奉行。臣不能自己改正者，即寄字與教王，明白傳皇上旨意。116」同日康熙即向嘉樂索取了教宗禁約底稿，同時遷嘉樂住較佳館舍。

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京的耶穌會士及傳信部傳教士共同翻譯了嘉樂公佈的准許事項。嘉樂的許可事項是在禁止以宗教形式祭祖敬孔的原則下，准許教徒在改正的牌位前行禮，並且應寫下或聲言是非宗教性質的社會禮節。117 康熙見嘉樂有轉圜作法，於是對嘉樂態度更為溫和，准在京傳教士去拜訪嘉樂，並同意接見嘉樂。

自一七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康熙共接見了嘉樂十三次。其中有數次直接、間接提及禮儀問題。第一次接見時，康熙問嘉樂：「朕覽爾西洋圖畫內，有生羽翼之人。」嘉樂奏云：「此係寓意天神靈速，如有羽翼，非真有羽翼之人。」上隨諭：「中國人不解西洋字義，故不便辨爾西洋事理；爾西洋人不解中國字義，如何妄論中國道理之是非？朕此問即此意也。118」

一七二二年一月十日，第三次接見，康熙命傳其旨由嘉樂差人帶回，康熙旨意甚簡：「一教

115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十三）。

116 同前。

117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六三。

118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十三）。

王遣爾來謝恩朕深嘉念；二教王遣爾來請安，朕躬康健，爾等所目睹；三教王所貢方物，朕念遠人胥福之情，俯賜存留。……<sup>119</sup>」其中無一語及於嘉樂來此真正目的，嘉樂不能讓信差就這樣出發覆命；康熙當然知道嘉樂處境，他如此做的目的，是逼嘉樂攤牌。

一七二二年一月十四日第四次接見，康熙問嘉樂：「有何辯論道理之處，爾當面奏。……朕今日旨意，語言必重！」嘉樂答稱不敢辯論，僅係傳達教化皇旨意。<sup>120</sup>康熙接下去就問了核心的問題：「即如利瑪竇以來，在中國傳教，有何不合爾教之處？在中國傳教之眾西洋人，如有悖爾教之處，爾當帶回西洋，照爾教例處分。爾逐一回奏。」嘉樂即回奏：「利瑪竇在中國有不合教之事，即如供牌位與稱天為上帝，此即不合教處。」康熙回答稱：「供牌位原不起自孔子，此皆後人尊敬之意，並無異端之說。呼天為上帝，即如稱朕為萬歲，為皇上，……必以為自開闢以至今止七千六百餘年，尚未至萬年，不呼朕為萬歲可乎？」<sup>121</sup>嘉樂請康熙准中國的天主教信徒，遵守教宗的禁約。康熙稱：「此等事甚小，只合向該管衙門地方官員處議論，不合在朕前瀆奏。」嘉樂表示不敢在康熙面前辯論，只能囑為康熙効力之傳教士，勿互相傾軋，同心和睦為康熙報効。康熙聽到嘉樂的回覆，再指出他們認定中國禮儀問題之主因：「嚴璫等不通小人，妄帶書信，顛倒是非，委屈當日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羅麗山、徐日昇等舊西洋人，行悖教之事，如此妄

<sup>119</sup> 同前。

<sup>120</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六七。

<sup>121</sup>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十三），康熙稱開闢以來七千六百年，其年代之說或來自耶穌會士。

書妄信，亦當不必再存。伊等負屈，朕深憐憫。<sup>122</sup>」嘉樂即請康熙寬恕過往之事，以後西洋人彼此和睦。康熙諭稱：「好，這事就完了，以後不許再提。<sup>123</sup>」

關於康熙所說「完了」，傳教士們有不同解讀。德理格、馬國賢認為康熙已允嘉樂所請，耶穌會士則認為重點在「以後不許再提」，意即不許教宗禁約在中國實施。康熙聞傳教士爭論，一月十七日命嘉樂交出教宗禁約，然後命傳教士共同翻譯，當日他即閱翻譯好之教宗禁約，硃批：「此條約只可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人等，無一人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條約，竟是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sup>124</sup>」康熙還請太監傳話：「……今鄂羅斯國使臣現在京都，朕必將朕前後旨意，並爾辯論之言，照先樣刷印紅票，付鄂羅斯並廣東船上，俱帶往西洋去傳示，西洋各國自有公論。<sup>125</sup>」

嘉樂見情形惡化，為求轉圜，遂請康熙再考慮禁約所附之八項准許<sup>126</sup>。康熙看後，態度未見和緩，他硃批曰：

<sup>122</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六九。

<sup>123</sup> 同前，有關嘉樂出使，中文〈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太過簡略，另有使節團報告，羅光撰〈教廷與中國使節史〉多所引用。

<sup>124</sup>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十三）。

<sup>125</sup> 同前。

<sup>126</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七一。

「朕理事最久，事之是非真假，可以明白。此數條都是嚴璫當日在御前，數次講過使不得的話。他本人不識中國五十個字，輕重不曉，辭窮理屈，敢怒而不敢言，恐其中國致於死罪，不別而逃回西洋，搬弄是非，惑亂眾心，乃天主教之大罪，中國之反叛。覽此幾句，全是嚴璫當日奏的事，並無一字有差。嚴璫若是正人，何苦不來辨別？況中國所使之人，一字不回，都暗害殺死？而且嚴璫之不通，訛字錯寫，被逼中國大小寒心，方知佛道各種之異端相同乎？欽此。」

#### 同時又命趙昌、伊都立等人傳旨：

「……爾等西人一字不識，一句不通，開口非佛經即道藏小教之言，如何倒指孔子道理為異端？殊屬悖理。且中國稱天為上帝，大小之人，皆一樣稱呼，並無別說。爾西洋呼天主為陡斯，乃意達理亞國之言，別國稱呼又異。況陡斯亦如蒙古語相同。即此一端，敬天之事，孰重孰輕。在中國之眾西洋人，並無一人通中國文理者，惟白晉一人稍知中國書義，亦尚未通。既是天主教不許流入異端，白晉談中國書，即是異端，即為反教。爾係教王使臣著爾來中國辦事。爾即當將白晉拿到天主堂，聚齊鄂羅斯國之人並京中大小人等，同看著令偏信之德理格和馬國賢動手，將白晉燒死，正其反教之罪。將天主堂拆毀。再天主堂內，因當日就西洋人湯若望曾在先帝時效力，因曾賜匾額，朕亦賜有匾額。既是與爾教不合，爾亦當將額毀壞，方為辦事。……」<sup>127</sup>

嘉樂見硃批及聽侍衛傳旨後，知情勢已無可挽回，於是向康熙請求准許返國。康熙見教宗禁約後知嘉樂無權改正，但見八項准許事項，亦知嘉樂有心調和；因此雖對禁約仍屢次表達不滿，但對



嘉樂依然優待。此後接見了嘉樂八次，賜入宮參加辭歲御宴，惟不准其再有所請求，令即返國。<sup>128</sup>

一七二二年三月三日嘉樂出京，五月九日抵廣州，五月二十七日至澳門。他在澳門停留了半年多，臨行前發表公函，表示教宗禁約本已公佈，他不能更改一字一文，僅在一些實行的問題上，他可予以解釋，這解釋事項共有八項，亦即八項准許事項。十二月九日，嘉樂攜多羅靈柩，動身返歐。<sup>129</sup>他這次的使命可評斷為不算成功，但教廷對康熙皇帝的態度，可說有了較清楚的了解。

#### 八、雍正年間教宗遣使來華

在嘉樂仍停留在北京時，一七二二年二月二十日，康熙將其與嘉樂談話，製成「嘉樂來朝日記」，命嘉樂帶回教廷轉呈教宗。覲見過後，康熙命趙昌召集在京傳教士，命他們在此日記上簽名，簽名者共十八人。德理格被召，但他拒絕簽名。<sup>130</sup>觀「嘉樂來朝日記」，德理格甘冒生死，拒絕簽名的原因可能是內容並不完整，而斥責德理格處甚多，德理格認為他被斥責之因果關係並不正確。康熙知德理格拒絕簽名大怒，將其囚入獄中，嘉樂聞訊向康熙求情，康熙遂將之軟禁於北堂。據德理格信件，他在一七二二年五月還隨康熙往關外，回北京後，軟禁如故。除他之外，畢天祥及計有綱（Antoine Guignes）被囚禁於廣州。

一七二二年康熙去世後雍正繼位，德理格獲釋。康熙時代，德理格在禁中曾為諸皇子音樂教

<sup>128</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二冊，頁三三七。

<sup>129</sup> 同前，頁三三七～三三八。

<sup>130</sup> 同前，頁三五九。

師，此或為雍正釋放他的原因。出獄後住在暢春園，亦可見出雍正對他確有私誼。另一名傳信部傳教士馬國賢，在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返歐，到教廷後對中國政教情勢有樂觀報告。<sup>131</sup> 德理格的報告亦稱雍正並未厭惡西教，只是討厭耶穌會士。既然皇帝不喜反對祭祖敬孔之耶穌會士，對德理格又有所禮遇，德理格等遂認為若教廷再要求同意禁止中國天主教教徒祭祖敬孔，中國皇帝應不會有所干涉。<sup>132</sup>

教廷受此鼓舞，遂在一七二四年十月遣聖衣會士葛達都（Gottard Plaskowitz de St. Maria）及易德豐（Ildefonso de Nativitate）二人，及另三名方濟各會士啟程來華，期望雍正皇帝能保護傳教。不過實際上雍正對天主教不抱好感，一七二三年即位之初，閩浙總督滿寶上奏請禁天主教，雍正將此奏下禮部議奏，禮部意見贊成滿寶所請，一七二四年（雍正二年）二月皇帝批准，並命六個月內將各省傳教士集中廣州。<sup>133</sup> 因此當教廷使節出發時，雍正已不保護傳教了。

一七二五年七月，葛易二人抵達廣州，按當時交通條件，此行極速。十月二十二日兩人已達北京，十一月七日雍正召見，兩人呈遞教宗國書

「教化王伯納弟多恭請中國大皇帝安。竊惟無始無終全能造物之天主，照臨下土，眷顧四方，遂使苦樂悲歡並發於一時，蓋因先帝大行之哀詔，忽爾驚傳，中心痛切之至；乃大皇帝御極之喜音，同

<sup>131</sup> 同前，頁三五二、三五九；第三冊，頁三十七。

<sup>132</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八一。

<sup>133</sup> 蕭靜山，〈天主教傳行中國考〉，〈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七月初版），頁二〇〇～二〇一。

日恭聞，又歡樂無限，此誠在天之主預為調劑，以慰此苦也。伏思先帝以至公無私之恩德，賞善罰惡，俾率土臣民，久安長治，俟制作具，然後大行；隨以萬民悅服之聖躬，丕承鴻業，庶幾所得之喜，竟倍於所失之苦焉。若不如是，何以解之？先帝之恩逾于父母，即據西洋修道諸人而論，其多年撫養，言難盡述，區區遠國，適當蒞政之初，追維往事，滿望將來教恩廣益，倘或其時惟知先帝力行不獲，即聞大皇帝踐阼之喜，萬難解此刺心之憂苦。可知明天之上惟一主宰，多方眷顧，不令人久懷鬱鬱也。由此心以觀，仰見大皇帝盛德上智，統馭廣大之幅員，從今瞻望之心，比前更切，故敢竭未盡之誠，獻茲微悃，約有三端：一為表先帝大行，雖屬僻遠之君，而慟悲靡極；更遙憶大皇帝大孝大哀，必然身受難言之慘痛；一為表大皇帝即位臨民，享玉帛冠裳之朝會，居豪華富麗之名都，特申賀敬；一為表教化王之位，本來不願續承，乃勉狗眾請耳。濟陳此意，想睿照之下，未有不樂聞教。三端之外，側聞御極後，即寬釋一西洋人，其餘者俱許專務修道；不容行無益之事。似此仁愛有加，令人愈深企仰也？先教化王之使臣加樂，蒙先皇帝給以寶物，倘獲拜登，必什襲珍藏，以徵曠典；奈因海舶被焚，徒深浩歎。然所失之寶，已珍藏心內，永存而不忘也。今特將些微土物，附陳數語，用達遠懷。每思竭力圖報，維以仰合大皇帝之歡心，而無可是從。所望大恩廣被，凡西洋修道之人在中國者，俱邀庇護，此誠無可報効之恩施，惟有恆求無聲無臭生物生人之天主眷顧聖躬，常享太平之福，使城中臣庶，共凜國威，不忘人物之本原，藉 萬善之根基。不勝幸甚！天主降生一千七百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sup>134</sup>」

這篇國書的重點是「所望大恩廣被，凡西洋修道之人在中國者，俱邀庇護。」數語。雍正覆書亦以此為重點，其文約：

134 〈傳信部一七二六年東方文獻〉，轉引自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三冊，頁三十九～四十。

「朕繼承大統，勉貽前徽。王地處極遠，特遣使賚章陳奏，感先帝之垂恩，祝朕躬行之衍慶。周詳懇至，詞意虔恭。朕甚嘉慰。使臣遠來，已加禮優待；至西洋寓居中國之人，朕以萬物一體為懷，教以謹飭安靜；果能慎守法度，行止無愆，自當推愛撫卹。茲以爾使臣歸國，特頒斯敕，並賜粧緞、錦緞、大緞二十、次緞四十，王其領受，悉朕惓惓之意。又加賜國王貂皮、人參、洋漆器、芽茶、紙、墨、絹、扇，并文綺。」<sup>135</sup>

雍正的答覆以假設語氣，稱西洋人「果能慎守法度，行止無愆，自當推愛撫卹。」這個法度自然包括前朝康熙已定之規矩，而行止無愆則指的是如耶穌會士穆敬遠，行止有虧，則不在其撫卹之列。而決定權自然是由雍正掌握。

教宗的第二封國書是請雍正援德理格例，釋放畢天祥及計有綱二人，雍正亦准其所請，不過實際釋放二人是在一七二六年七八月間，其時教宗使節已在返回歐洲途中。拖延了半年多才決定釋放畢天祥及計有綱，又已在即位四年之後，正可凸顯德理格獲釋並非如其上諭所言：「及朕即位之後，頒降恩詔，凡情罪可原者，悉與赦免，開以自新，德理格所犯，與赦款相符。」<sup>136</sup>雍正即位後畢天祥、計有綱二人仍被羈押，也非如上諭所說。係因「彼時廣東大吏未曾以畢天祥、計有綱之案入于大赦冊內，具題上聞。」<sup>137</sup>實際上畢紀二人遭禁為常態，而德理格獲釋則為特例。賴教宗特使

<sup>135</sup> 《清朝文獻通考》卷二九八（四商考）六，轉引自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三冊，頁四十五。

<sup>136</sup> 《傳信部一七二六年東方文獻》，轉引自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三冊，頁四十二。

<sup>137</sup> 同前。

請求，二人方始得到釋放。

兩位教宗使臣在一七二五年十一月七日首次晉見雍正後，被命返歐覆命。按照之前多羅及嘉樂的慣例，他們必定期待雍正有數次接見，而他們要談的也絕不僅是兩封正式國書的內容，但雍正僅此一次接見。他們在一七二六年一月乘船離華，<sup>138</sup>雍正對於天主教的態度及實際禁教作為，教宗透過他們的報告已經得知；因此，短期內教廷沒有必要再遣使來華了。

### 第三節 法國保教權時期

#### 一、法國保教權的形成及其發展

一七七三年，在歐洲列強的壓力下，教宗撤廢了耶穌會。耶穌會在華傳教的工作至一七八四年由遣使會所取代。<sup>139</sup>遣使會發源於法國，雖亦為一國際性的傳教團體，但會士以法國籍居多。除了遣使會以外，另一重要的法籍傳教團體為巴黎外方傳教會，雖然中國自雍正以後禁教，驅逐傳教士，但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仍不斷潛入四川，培植了不少國籍司鐸。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發生，對歐洲各國天主教的海外傳教活動，都幾乎造成毀滅性的傷害；遣使會與巴黎外方傳教會也不例外，這時期在中國僅剩個位數的傳教士。但一八一五年以後，隨著歐洲秩序的恢復，這兩個傳教團體也逐漸復興或重建；而耶穌會也在一八一四年恢復，由於法國的耶穌會省是發展最蓬勃的，一

<sup>138</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八二。

<sup>139</sup> 樊國樑，〈燕京開教略〉下，〈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頁三九四～三九五。

八四二年耶穌會總會長指派法籍耶穌會士重新來華。<sup>140</sup>於是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天主教教會，法籍傳教士的傳教區佔最大宗，河北、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川、雲南、貴州、廣東、廣西、東北均屬法籍傳教士的傳教區域，而遣使會將河南讓給米蘭外方傳教會，熱河、寧夏、綏遠則讓給了比利時的聖母聖心會。最重要的教友據點：上海、北京、成都，分別掌握在這三個法籍傳教團體手中。

由於中國仍處於禁教狀態，一八四二年以前在整個中國，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六〇年間，在除了開放口岸以外的內地，傳教士均處於「潛伏」狀況。隨著傳教活動的增加，被官府查獲或與外教人衝突的次數均大幅增加，傳教士們不敢寄望於中國政府的立場改變，於是改變方向，希望得到其母國的支持。

鴉片戰爭過後，英美兩國分別與清朝政府簽訂條約，消息傳到法國，基於外交競爭的想法，法國必須在中國設法尋求展示其主權。於是法國乃在一八四三年派拉萼尼來華，一八四四年拉萼尼與耆英簽訂中法黃埔條約，其中與傳教士有關者：「凡佛蘭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佛蘭西人亦一體可以建造禮拜堂、醫人房、周急院、學房、墳地各項。」「凡佛蘭西人在五口地方居住或往來經游，聽憑在附近處所散步，……但不得越領事官與地方官議定界址，以為營謀之事，……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遠入內地，聽憑中國官查拿，但應解送近口佛蘭西領事館收管；中

140 L. - J. Roger. G. De Bertier De Sauvigny, Joseph Hajjar, *Nouvelle Histoire de l'Eglise, Tome 4, Siècle des Lumières, Révolutions Restaurations*, p.324 (Paris: Edition du Seuil, 1963).

國官民不得毆打、傷害、虐待……」<sup>141</sup>

法籍傳教士不滿足於中法黃埔條約的規定，希望拉蓴尼能爭取到更多傳教的便利；由於拉蓴尼是虔誠的天主教教友，願支持傳教士希望，於是再與耆英交涉，要求道光皇帝弛禁天主教，「將學習天主教為善之人，免其治罪。」一八四五年二月，道光准其請；一八四六年二月，道光又同意「所有康熙年間，各省舊建之天主堂，除改為廟宇民居者，無庸查辦外，其原舊房屋尚存者，如勘明確實，准其給還該處奉教之人。」<sup>142</sup>此即所謂的「容忍詔書」。

容忍詔書雖然公佈，但其實具有權宜之計的味道；在中國的法籍傳教士並不感覺地方官府對天主教的态度有何轉變。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有八名主教在上海集會，會後所有主教，包括義大利籍的主教，一致請求教宗將在中國保護傳教的權力交給法國。<sup>143</sup>帶信到羅馬的日本宗座代牧 Forcade 主教，未將信正式呈上；可能的理由是一旦呈上，教廷即需有所回應。但這封信的內容，教廷確已瞭解。一八五二年，八位在遠東地區的法國主教聯名上書拿破崙三世，他們將咸豐年間明顯增多的反天主教事件，歸因於法國對華政策的軟弱。他們並進而指出：「天主教在遠東的影響，永遠是法國影響的衡量。」<sup>144</sup>

這種聲明在法國政治圈頗獲迴響，法國的對華政策也轉趨積極。但很諷刺的，法國國內經常處

141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十三（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五年），頁十三、十四。

142 同前，卷七十五，頁五、六。

143 A. Thomas,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Depuis l'Arrivée des Lazaristes jusqu'à la Révolte des Boxers*, p.326.

144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八五年二月三版），頁一〇三。

於一種與教會鬥爭的狀態，不時剝奪教會原有的權力。但在海外，法國政府卻視傳教士為其向外擴張的有利工具。一八五六年二月底，自貴州進入廣西傳教的首位傳教士馬賴（Auguste Chappellaine）在西林縣被縣官張鳴鳳下令殺害。消息傳到廣東，兩廣監牧主教明稽琦（Pillipe François Guillemin）決定回歐抗議。<sup>145</sup>於此同時拿破崙三世亦以此事為藉口，決定與英國共同出兵中國。

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中國在天津與英法兩國訂城下之盟。在中法天津條約第十三款規定：「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奉教之人皆全獲保護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sup>146</sup>」然後一八六〇年又在北京訂城下之盟，在中法北京條約第六款規定：「應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諭，即頒示天下黎民，任各處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會合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查拏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謀害奉天主教者之時，所充之天主堂、學堂、塋墳、田土、房廊等件，應賠還交法國駐紮京師之欽差大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sup>147</sup>」中法天津條約的簽訂，使法國獲得了保護傳教的權利；而中法北京條約的簽訂，則使得法國保教權獲得了明確的範圍。<sup>148</sup>

<sup>145</sup> 衛青心著，黃慶華譯，〈法國對華傳教政策〉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版），頁六九四。  
<sup>146</sup> 〈通商約章類纂〉卷二十二（台北：華文出版社，民國五十七年），頁二。

<sup>147</sup> 同前，頁三。

<sup>148</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八九。



雖然葡萄牙不願意，但一八五六年教廷取消了葡國保教權管理的南京教區及北京教區；一八五七年廢除了葡萄牙保教權。<sup>149</sup>而法國則自一八五八年、一八六〇年從條約中獲得了在華保教權，並得到教廷默認。就權利而言，葡萄牙保教權超過法國保教權，因法國並未有任命主教之權，也不干涉教士派遣及教會內部事務。但法國保教權的執行，由於法國公使及領事深入內地，實質上更直接而有效。法國政府並有意識的藉行使其保教權，增加其對中國之影響。因此之故，若教廷欲直接與中國通使，就不是受法國歡迎的了。

## 二、教務巡閱使徐類思

徐類思 (Luigi Celestino Spelta) 為義大利方濟各會會士，以傳信部派遣之傳教士身份來華，曾任江南代牧區輔理主教，因與在此工作之法籍耶穌會士有職權上的衝突，一八五六年被調離，任湖北代牧主教。一八五九年被教廷召回歐洲述職，實際任務之一是要透過這名可信任傳教士的判斷，瞭解法國保教權所產生的影響。

一八六〇年一月，教宗予其宗座視察員身份，命其視察中國各傳教區教務，其實他就是擔任了非常駐之宗座代表。一八六〇年七月底他到達上海，當時英法聯軍正在進攻北京，而南方太平天國的內戰也正熾烈進行，要在內地旅行幾乎不可能；在江南代牧區他也只能巡視上海及附近的幾個會口。九月，他巡視浙江，然後往江西、河南、湖南等地視察，一八六二年一月，他回到了自己的湖

<sup>149</sup> 同前，頁一八八。

北代牧區，隨即嘔血病倒，他只得放棄隨後的行程。他的病況日漸惡化，逝世於此年九月。<sup>150</sup>

這位宗座視察員的行程並未及北京，這可能是出於他的謹慎，或是有相關人士表達了不歡迎的態度。實際上他確實攜有教宗致清朝皇帝的一封信，以及準備了一個計時鐘做為禮物。<sup>151</sup>在這封信中教宗請求中國皇帝許可宗座代表有保護傳教士的權力，只可惜徐類思沒有機會向中國皇帝呈上這封信。

### 三、中法戰爭時期與教廷通使的嘗試（一八八五年—一八八六年）

一八八四年為安南歸屬問題，中法發生戰爭。世俗國家間的利益爭奪，明顯的在此時期顯示出與傳教活動間的衝突。在歐洲的教會中產生檢討法國在華保教權的聲音，認為教廷若派使節駐於北京，就比較容易將外籍傳教士和法國分開<sup>152</sup>，在這個中法衝突的時刻，避免在華的外籍傳教士受到牽扯。

為了減少中法戰爭對傳教工作的可能危害，教宗良十三世（Leon XIII）於一八八五年致函光緒皇帝，感謝光緒皇帝對傳教士的保護，並且聲明不論傳教士國籍屬誰，皆為教宗所派遣。擔任教宗信差者是要赴新成立的陝南代牧區的瑞神父（Francesco Giulianielli），他是義籍傳教士，要為成

<sup>150</sup> 史式徹著，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譯，《江南傳教史》第二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出版），頁八十—八十一。

<sup>151</sup> 李少峰，〈方濟會在華傳教史〉，《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頁一一〇。

<sup>152</sup> A. Thomas,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 pp. 609-610.

立新代牧區做準備。<sup>153</sup> 瑞神父的行動非常秘密，未驚動北京的任何外交人員，他請遣使會的北京主教戴濟世 (François Ferdinand Tagliabue) 幫忙，經由中國海關英籍總稅務司赫德 (Robert Hart) 協助，在一八八五年四月，將翻譯成中文的教宗信件呈遞給了總理衙門，並要求接見。

協助瑞神父將教宗信件翻譯成中文的是義籍遣使會士富成章 (Jean-Baptiste Fioritti)，兩人並得到總理衙門短暫的接見，不過見皇帝是不太可能的，因為直到一八九五年以前，中國皇帝是不接見任何外國使臣的。在總理衙門接見兩天後，簡短的覆函回來了，只有一些禮貌性的文字，沒有提及任何實質的問題。<sup>154</sup>

在海關英國人的建議下，一八八五年六月八日，李鴻章的秘書伍廷芳帶著天津海關的洋員敦約翰 (John George Dunn) 去見天津遣使會的帳房神父文和溫 (François Wynchoven)<sup>155</sup>，表示皇帝、總理衙門及李鴻章感謝教宗派瑞神父來訪，對天主教在中國的進展表示欣慰；中國政府願意保護天主教，雖然過去有一些困難產生，而可見的未來，這些困難仍然會有。伍廷芳認為最適當的解決方法，是教廷和中國互相派使，以後遇有教案可直接交涉，別國的外交官和政府即無法干涉，亦不能藉此取利。<sup>156</sup> 伍廷芳並留下了一些問題請教文神父，包括在中國有那些傳教區，主教是誰？在

<sup>153</sup> 羅光在《教廷與中國使節史》中說，戴濟世未協助瑞神父，瑞神父乃轉向英駐華使館協助。A. Thomas 則說戴濟世給予協助。

<sup>154</sup> A. Thomas,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 p. 611.

<sup>155</sup> 若非之前瑞神父事係由遣使會協助，為何此時會請遣使會的文神父幫忙？採信 A. Thomas 說法。

<sup>156</sup> 綜合 A. Thomas,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 pp. 611-612 及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九五。

中國有多少外籍傳教士和本地神父？教廷在那些國家派有大使？又有那些國家在教廷派有大使？<sup>157</sup>

除了文和溫神父外，戴濟世主教也收到了同樣的問題；他在數日後回覆敦約翰，由於沒有足夠的資料，他無法答覆這些問題。<sup>158</sup>這可能表現出戴濟世的想法；他可以協助教宗信差送信給中國政府；但若兩邊開始談通使問題，他的法國人身份就不容許他協助。另一方面文和溫也寫信給法國駐華公使，報告中國擬和教廷通使，他認為此事由英國和德國的駐華公使提出，義大利和西班牙使節從旁附和。<sup>159</sup>於是法國在中國欲與教廷通使之初就已知道消息。

在從各方蒐集到足夠資訊後，李鴻章決定派敦約翰前往教廷交涉。敦約翰為愛爾蘭人，係虔誠的天主教徒。敦約翰前往教廷，除交涉通使事宜外，也順便交涉北堂遷移問題。為北堂遷移的條件，中國政府已與遣使會士有漫長的磋商。李鴻章也希望敦約翰能在教廷使此事有所結果。<sup>160</sup>

中國駐英使館洋員馬加尼 (George Earl of Macartney) 往見英倫總主教馬寧 (Henry Edward Manning) 樞機，表示清廷願與教廷通使，請代為轉達。馬寧樞機遂於一八八五年八月十四日致函教廷國務卿雅各彼尼 (Jacobini) 樞機，轉達馬加尼的談話。敦約翰在同年十一月由上海動身，一八八六年一月底抵羅馬，首先拜見國務卿，呈上李鴻章致國務卿和教宗的信件，李鴻章聲明中國天

<sup>157</sup> A. Thomas,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 p.612.

<sup>158</sup> *Ibid.*

<sup>159</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九三。

<sup>160</sup> A. Thomas,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 p.612.

主教教民人數增長，中國和教廷應建立長久的友誼關係。<sup>161</sup>

教宗良十三世很快的在二月四日接見敦約翰，垂詢清廷對於和教廷通使，理由和目的究竟為何？敦約翰答稱清廷願和教廷直接商談傳教問題，不願再受第三國干涉。教宗對敦約翰表示瞭解及同情，但以事情重大，將請國務卿予以答覆。隨後敦約翰在二月八日上書國務卿，首先聲明中國政府互相通使的意願，未受任何外來政治勢力的影響。中國政府雖欲取消法國在華保教權，然不能因此認為對法國有何敵意或仇視。中國政府瞭解法國政府有保護傳教的好意，但在中國的傳教士卻常因法國的保教權，被認為是法國政府的爪牙，反而受中國人忌視，中梵通使後，這種忌視的心理便可消除，法國政府也當為此慶幸。<sup>162</sup>

教廷國務院樞機委員會在二月中集會討論此事，建議教宗可派大使駐華，同時向法國政府聲明不是要廢止其在華保教權。這種建議在表面看來，與中國政府之目的不同，因法國保教權並未廢除。但實際上，教廷大使到中國後，傳教問題就自然由中國政府與教廷大使磋商，法國保教權將名存實亡。<sup>163</sup>

二月二十六日，教宗良十三世接見法國駐教廷大使，囑其轉告法國政府，教廷無意改變法國在遠東之保教權。在此前教廷國務院已正式行文法國外交部，表示將接受中國所提互相通使的要求，且對法國與中國間，按條約所取得的權利，絕不侵犯。四月二十七日法國外交部回覆教廷國務院，

<sup>161</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九六—一九七。

<sup>162</sup> 同前，頁一九七。  
<sup>163</sup> 同前。

建議教廷按土耳其的慣例，派一不具正式外交身份的宗座代表駐華；假如教宗決定減少法國過去固有的權利，將來因這種變動所產生的後果，由教廷完全負責。<sup>164</sup>

在一八七〇年時，義大利軍隊攻進羅馬，教宗庇護九世逃進梵蒂岡，標誌著世俗的教宗國已從此結束，教廷只剩下精神的層次。就世俗的層面言，教廷本身已無可損失；五月三日教廷答覆李鴻章，同意互派外交使節。五月二十三日，教宗召見法國駐教廷大使，重申前議。七月十日法國大使奉法政府訓令向教廷表示，若教廷派外交使節，即是侵犯法國在華之保教權，而此乃法國與中國訂約取得，不容第三國予以改變。<sup>165</sup>

八月初，教宗任命阿里雅底 (Antonio Agliardi) 總主教為全權大使，來華處理建交事宜。法國政府乃再向教廷提出照會，堅持教廷只能派沒有外交身份的宗座代表。若教廷不接受法國的建議，法國即撤回駐教廷大使。教宗不理會法國的恐嚇，命阿里雅底總主教於九月二十五日自馬賽乘船赴中國。法國政府乃於九月十二日，向教廷發出通牒，如教廷派使赴華，法國政府即撤回駐教廷大使，聲明法國與教廷所訂之條約作廢，同時也停止法國政府給法國教會之津貼。<sup>166</sup>

教廷在法國一八七〇年實施共和體制後，與法國政府間摩擦不斷<sup>167</sup>，教廷會在明知有法國在華保教權的情形下，願意接受中國遣使的請求，一方面是中法戰爭凸顯了法國保教權的不當，另一方

<sup>164</sup> 同前，頁二〇〇～二〇一。

<sup>165</sup> 同前，頁二〇一～二〇二。

<sup>166</sup> 同前，頁二〇二。

<sup>167</sup> 樓均信主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興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四月出版），頁一四一。

面也應該評估過，法國與教廷關係無可再損失之處。就算是撤退駐教廷大使，教廷亦在意料之中，算是可接受的結果。教廷無法料到法國竟以傷害法國教會作為手段，來阻止教廷與中國互相通使。在衡量法國教會的損失後，在照顧當地教會的原則下，與中國建交的優先順序遂往後延。於是教廷發佈訊息，決定阿里雅底總主教延期赴任。<sup>168</sup>「延期」只是一個外交辭彙，實際上教廷暫停了與中國建交事宜。

#### 四、法與教廷交惡時期的通使嘗試（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二年反教權的左派勢力在法國國會選舉中獲得大勝，於是法國天主教教會的處境更為艱困。此時法國與教廷訂有教務專約，規定法國政府可提出主教人選，但需先與教廷商議，但一九〇四年法國總理孔勃（E. Combes）在未經教廷同意下，提出了數個主教人選，教宗拒絕發出任命詔書。<sup>169</sup> 此年四月，法總統魯白（Emile Loubet）到羅馬回拜義大利國王；自庇護九世於一八七〇年喪失羅馬後，教廷不能容忍別國元首到羅馬訪問，因為這是表示承認羅馬為義大利首都。教廷要求天主教國家向法政府抗議，法國政府乃召回駐教廷大使，僅留代辦處理事務。這時教宗庇護十世（Pius X）又想撤換兩個法國主教，法政府聲言教宗無權直接管理法國主教，雙方關係進一步惡化，至此年七月，法國與教廷絕交。<sup>170</sup>

<sup>168</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二〇二。

<sup>169</sup> 樓均信主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興衰史〉，頁二六五。

<sup>170</sup> 羅光，〈庇護第十傳〉（台北：光啟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四月初版），頁一六八。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法國國會通過政教分離法，然後頒佈宗教禮儀社團組織法，由政府津貼列入宗教禮儀社團的教會機構。法國政府的目的，是要將這些教會機構納入法國政府的控制。如果教會同意改變成宗教禮儀社團，一年約可得到四億法郎，按照一般的推測，教宗及法國教會無法拒絕這麼多錢，勢必要與法國政府妥協。不料，教宗庇護十世拒絕了，他在一九〇六年八月，向法國的主教和神父們說：「可敬的神昆們，為你們於今沒有別的生路，只有著手研究按照民法所給每個國民所有的權利，以籌備教儀的費用。」<sup>171</sup>

教廷與法國之間關係的惡化是此時期的重大國際事件，中國也在密切注意其發展，希望此時有可能是解除，甚至廢除法國保教權的良機。中國政府中最注意此問題者為呂海寰，他曾出使德、荷，對外交事務有足夠的瞭解，此時擔任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一九〇五年四月，法使自教廷撤回後，他即上疏，要求派「專使前往羅馬，與教皇議訂條約，或派駐義使臣就近商議。」法國政教分離法自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實施後，其實就是撤廢了法國與教廷的教務專約，如此一來，構成法國在華保教權中法國與教廷的關係已破，一九〇六年四月，在處理南昌教案時，呂海寰因此主張：「近又聞法廷已收回保護教堂之權，將教堂產地歸入國家承業，各教士均向法院求資贍費，似教案不在法國保護之列，……擬請由外務部乘議辦南昌一案，詰問法使，現在法廷既不保護教權，是案應否徑與羅馬教皇直接商議？若仍然照約保護，即與聲明，將來必須派員另行商訂詳細教約，以便彼此

<sup>171</sup> 同前，頁一六〇。



遵守。」<sup>172</sup>

呂海寰認為與教廷直接通使，為解決法國在華保教權的治本之道。而國際間有土耳其之成例可循。他在奏疏上說：「臣又查土耳其國曾因教案糾葛，受制於法，遂遣專使結好教王，通問報聘，彼此密商，推誠相待，互換盟約，設立教使，專理教務；明示寬大之政，陰收自主之權。其教使不用頭二等公使名目，以為區別；一切禮儀，悉從優待，另為一班，不與各國公使並列，亦不與同時覲見。而土廷遣使，並不駐紮羅馬，所有教務章程及教會一切權利，均由其外部與教使直接商訂。自定約後，教士皆秉承於教使，不復受轄於法使。」<sup>173</sup>「呂海寰希望能「援此成例，密為佈置」，達成取消法國保教權之目的。

當時在華傳教士中反對法國保教權的代表人物雷鳴遠 (Vincent Lebbe) 曾參與此事：「他經過《大公報》主編英斂之的介紹，認識了清朝宗室錫鈞，錫鈞是肅親王的姪子，兩人曾商討派遣使者的問題。一九〇七年他為此寫信給他的弟弟伯達：「希望你也能夠替我們找到一些「可靠的」和「考證過」的資料：一、關於公教教義對於那些信奉公教的國家所給予的利益。二、關於羅馬及其各聖部的作用和外交政策，對於不同的國家，在歷史方面和現狀方面（在歷史觀點及現行的外交觀點上，與天主教國家，非天主教的宗教國家，無宗教的外教國家的關係，特別是正式的關係，有什麼條件、

<sup>172</sup> 呂實強主編，《教務教案檔》第七輯第二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月初版），頁七五〇～七五一。

<sup>173</sup> 同前，第七輯第一冊，頁十二。

儀式等等)，一洵無宗教信仰的國家能有教廷大使嗎？是否能派遣無信仰的人作代辦等等……」<sup>174</sup>

這封信僅只在詢問階段，最後似乎是無疾而終，《英斂之日記》中記：「雷司鐸來談遭變事，為之扼腕，無法可施。<sup>175</sup>」或有可能指的即是此事。從整體外交言，此時與教廷建交的重要性，遠不如與法國維持邦交；在日、俄、英、德等國持續不斷的壓力下，若因與教廷建交喪失法國可能的支持，將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利害權衡，暫時將與教廷通使事放下，才是比較明智的決定。此事教廷是否知悉，皆未可知。

##### 五、一次大戰時期的通使交涉（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

這段時期中國有和教廷通使之意，陸徵祥為關鍵性的人物。陸徵祥生於一八七一年，父親雲峰公信仰基督新教。陸徵祥小時讀私塾，十三歲入廣方言館，後赴北京同文館，主要所習之外語為法文。自一八九二年後，隨許景澄出使俄國，自此後終身視許氏為師，從許氏習外交關係及實務作法，受其影響甚大。一八九九年與比籍培德（Berthe Boyv）女士結婚，因培德為外國人，年紀復長於陸徵祥，此婚事非議者甚多。培德為天主教徒，受其影響，陸徵祥於一九一一年亦改宗天主教。<sup>176</sup>他受許景澄的影響，長期浸潤於歐洲外交界，本身復有優於其他外交官之宗教認識，遂覺與教廷建交甚為重要。此種認知與當時其他中國外交官有不大差異。

<sup>174</sup> 〈致胞弟伯達〉，《雷鳴遠神父書信集》（台中：耀漢小兄弟會編譯，民國七十九年六月初版），頁九十三。

<sup>175</sup> 〈英斂之日記〉（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sup>176</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三冊，頁三二六—三二七。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黎元洪主張保持中立，段祺瑞則主張參戰。段祺瑞主張參戰之動機複雜，其中固然有為國家利益考慮的部分，但藉參戰來貸款、培植其私人武力更是其主要目的。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段祺瑞掌控北京政府的情況下，中國參加協約國，對德奧宣戰。段祺瑞的參戰動機雖不單純，但主持外交的陸徵祥主張參戰之動機則甚為單純，他想藉此時機發展外交行動，爭取中國利益。在這些外交行動中，其中一項便是與教廷通使的計畫。大約是估量大戰正激烈進行，法國無暇他顧。

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時的教宗為本篤十四世（Benedict XIV），他任命加斯巴力樞機為他的國務卿，加斯巴力是法律學者，主張廢除法國的保教權，或至少保教權的行使必須經過教廷的同意。<sup>177</sup>一九一七年，北京政府訓令中國駐義大利使館和教廷接洽通使事宜，為免法國發覺然後干涉，中國公使不直接往教廷國務院交涉，而是透過摩納哥代表處。經常由當時的駐義使館主事朱英至此，送交信件或接收訊息。摩納哥親王的代表卡彼羅（Capello）伯爵，則將訊息傳往教廷。<sup>178</sup>

教廷基本上贊成與中國通使，但世界大戰的進行使得雙方的進展不快。不過其中並未遇到太大阻礙，當時似乎曾為使節的層級有所交涉。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日，教廷機關報《羅馬觀察報》公佈消息稱：「中國政府曾經向聖座表示，願意和聖座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聖父教宗欣然接受了中國政府的要求，並同意中國政府派遣前駐西班牙及葡萄牙公使戴陳霖先生為中國駐教廷公使。」<sup>179</sup>為避

<sup>177</sup> 顧衛民，〈中國與羅馬教廷關係史略〉（北京：東方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九月一版），頁一二三。

<sup>178</sup> 綜合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一二五，及顧衛民，〈中國與羅馬教廷關係史略〉，頁一二四。

<sup>179</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二一五。

免法國干涉，教廷此時尚未公佈駐華使臣人選及職務，其實已內定駐菲律賓賓宗座代表白賴理（Giuseppe Petrelli）總主教為駐華大使。這時德法間大戰正殷；七月十八日，慘烈的第二次馬恩河戰役就登場了。

《羅馬觀察報》在七月十一日及十四日都有與中國建交的文章，按《羅馬觀察報》的性質，這兩篇文章都代表教廷立場。羅光認為七月十四日的文章，出自國務卿加斯巴力的手筆，這篇社論第一段說明教廷遣使駐中國的理由，第二段說明教廷駐華大使之任務，第三段說明法國沒有阻止的權利，也沒有阻止的必要。<sup>180</sup>

中國與教廷方面可能都未料到法國會在此時有激烈反應，法國各報都刊載了攻擊教廷的文字，法國政府也向中國政府抗議，認為中國方面接受羅馬使臣，與清咸豐八年所訂中法天津條約內有關保護天主教的情形有所違背。又說教廷通使之議，是由德國外交部發動，教廷內定的使臣有親德傾向，中國既已加入協約國，羅馬教廷與協約國家宗旨不洽，中國竟接待來使，未免有失盟國感情。<sup>181</sup>此時法國與教廷間沒有邦交，因此七月中旬法國外交部副部長高山（Derys Cochin），以國家學會會員的民間身份訪問教廷，他覲見了教宗，拜訪國務卿。他發表談話稱：「我沒有忘記請加斯巴力樞機注意，法國在中國久已取得的權利，這種權利是我們法國傳教士流血換來的。」<sup>182</sup>七月二十六日，法國外交部長畢盛（Stephen Jean Maria Pichon）致函教廷，指出如教廷派使駐華，會使法國

<sup>180</sup> 同前，頁二一六。

<sup>181</sup> 《天津大公報》，一九一八年八月九日。

<sup>182</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二一七。

在華保教權難以維持，法國將中止與教廷恢復外交關係的會談。<sup>183</sup>

不過加斯巴力決心已定，他不準備因任何威脅而改變心意；於是法國乃改向中國施壓，八月十一日，法政府致函中國外交部，用威脅的口吻說：「由於梵蒂岡似乎同情的是敵人而不是協約國，中國政府在交戰期間接受梵蒂岡所任命的官員，將證明中國與協約國很少有什麼友誼。<sup>184</sup>」八月十三日，北京代牧區的法文刊物《北京通訊》(Journal de Pékin) 又指責白賴理總主教有親德嫌疑。加斯巴力樞機不承認白賴理有親德嫌疑，但為避免紛爭，改派教廷駐君士坦丁堡救濟難民專員畢散義(Pietro Pisani) 為駐華大使，已到香港的白賴理總主教，又轉回菲律賓。<sup>185</sup>

不過法國的目的是阻止教廷大使赴華，所謂親德嫌疑只是藉口而已，畢散義又被稱有親奧嫌疑，然後約英、義等國，一齊勸中國外交部勿接受教廷使節。<sup>186</sup> 中國知識份子相當期待與教廷溝通，眼見法國咄咄逼人，有外交學者邵振青投書《大公報》稱：「自宗教之眼光觀察之，因強國肆其陰謀之故，引起弱國人民心理之不平，致有礙於傳教勸善事業之發達，若為世界一般人類幸福計，決非可謂為適當之事；至遣使以專理教案，固應認為最足以祛此弊之善舉矣。……吾人試更進一步研究天津條約之精神，其用意所在不外保護教民；果今後有一專一處理之機關……試問與天津條約

<sup>183</sup> 顧衛民，〈中國與羅馬教廷關係史略〉，頁一二五。畢盛曾任法駐華公使，他的個人因素，可能是造成此時法國強烈表態的原因。

<sup>184</sup> 同前。

<sup>185</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二二一。

<sup>186</sup> 同前。

之精神有何絲毫違反之處，且我政府與教廷，既皆為國際間之一單位，派使實有自由之權，非他國所可侵犯……吾人確信政治與宗教為不相混，我政府與教皇互遣使節乃純為宗教問題之便利，教皇之個人與德奧有關係否，則非所問。我政府與協約國一致對德之行動，既以見諸種種事實，教皇之態度如何，絕不能絲毫影響於我政府。不然現在教皇與他國互遣使節十有餘處（英俄皆在其列），豈能因教皇個人態度之故，概行斷絕宗教事件之關係乎？<sup>187</sup>」對外交相當瞭解的名教友馬相伯，寫信給英斂之：「……教宗被誣庇德，而司牧竟無一敢為之辯；且我使教廷，何礙於法？不聞英向無使，今亦使乎？何曾有誣而阻之乎？」<sup>188</sup>」他心中的感慨是可想而知的。

八月十七日，《路透社》即有消息稱，中國政府將會無限期延遲教廷使節來華事宜。<sup>189</sup>八月二十四日，果然中國政府通知教廷，中梵通使事延期。<sup>190</sup>

187 《天津大公報》，民國七年八月十一日、十三日。

188 馬相伯，〈致英斂之先生書〉，〈馬相伯文集續編〉（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六十一年影印本），頁五十。

189 顧衛民，〈中國與羅馬教廷關係史略〉，頁一二六。

190 方豪，〈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下，〈天主教學術研究所學報〉第七期，頁四十三。

## 第三章 準外交關係時期

(一九二二年—一九四二年)

### 第一節 剛恆毅時期

#### 一、夫至大宣言

從教廷看來與中國建交通使是十分具有合理性的，但一八八六年及一九一八年兩次被法國橫加阻攔；很明顯的，法國保教權的重點不是保護傳教，而是藉保護傳教謀取法國利益，這件事呈現了二十世紀中國天主教的怪現象之一。國務卿加斯巴力樞機主教，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中國已宣佈「延後」與教廷通使的時候，還曾經致函巴黎總主教艾麥特（Léon Adolphe Amette）樞機主教，請他再次向法國政府轉達，教廷大使不會削弱法國之保教權，又大有利於教會。<sup>1</sup>不過法國政府並不領情。

<sup>1</sup> 顧衛民，〈中國與羅馬教廷關係史略〉，頁一二七。

與中國通使受挫確使教宗本篤十五世及國務卿加斯巴力樞機很受傷害，不過這只是浮現在外交層面的衝突而已，在此之前，馬相伯、英斂之在一九一二年聯名向教宗上書，這篇〈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特別提到，在華之基督教已開設多所大學，但天主教竟然沒有設立一所大學。<sup>2</sup>這篇上書頗受教廷的重視，並且了解到正是一種白種人優越感的心理下，控制北京代牧區的法籍遣使會士，不覺得有在中國設立大學的必要；而若其他修會想在北京開辦大學，則會被視為是爭奪地盤之舉。<sup>3</sup>

然後是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發生在天津的老西開事件。這地方是一塊緊臨法租界的沼澤地，天津代牧區成立後，天津主教買下了此地，抽水填土，興建主教座堂，一九一五年，天津法領事藉中國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機會，想將這塊地方納入法國租界；天津民衆乃組成「維持國權國土會」相抗，在天津的比利時籍遣使會士雷鳴遠，開始的時候也率領教友一同抗議，但不久天津的法籍主教禁止他就老西開問題向教友發言，雷鳴遠於是寫信給法國駐華公使孔迪，請其管束駐津領事，他利用法國將剛果割給德國為例，說明引發中國人愛國心的不當，卻因此觸怒了孔迪公使，因他正是法德剛果條約的簽署者。<sup>4</sup>於是公使向天津主教發電報，稱雷鳴遠若繼續從事反對法國的運動，將以武力將所有天津法租界中的教堂及教會房屋遷出。<sup>5</sup>雷鳴遠因此被調往正定、定縣、慶雲

2 方豪，〈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下，〈中國天主教學術研究所學報〉第七期，頁五。  
3 同前。

4 趙雅博，〈雷鳴遠神父傳〉（台北：文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五月再版），頁二一七。

5 Octave Ferreux 著，吳宗文譯，〈遣使會在華傳教史〉（台北：華明書局，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初版），頁四九八。



等地，另一名遣使會神父湯作霖 (Antoine Cotta) 也加入他的抗議行列，在一九一六年九、十月間，他就老西開問題向教廷呈送請願書，在請願書的附件中，湯作霖報告了中國教會的一般情況，他說：「聖部的旨意是教所有的教友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可是在這裡的園地，卻被看成是『精神的殖民地』。」<sup>6</sup>

一九一六年十月十七日，法領事率警察與士兵進駐老西開，並照會中國外交部，要求將老西開劃為法國租界。雷鳴遠不能再忍耐，乃與天津士紳共同集會，決定法租界罷工相應。在這種強力抗議下，孔迪公使被召回國，代理公使允諾歸還老西開土地。中國民衆在這次戰役中獲勝，但遣使會卻決定將雷、湯二人調回國，經過訴願，雷鳴遠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服從命令，被調往浙江嘉興。湯作霖則拒絕接受調往南美的命令，於是被主教停止了神權。

因此在通使案之前，羅馬已經不斷接到來自中國的報告，這些問題主要由傳信部長王老松 (Van Rossum) 樞機負責。他曾派遣獻縣的耶穌會士劉主教 (Henri Lécroart) 及廣州巴黎外方傳教會光主教 (Budes de Guébriant) 進行調查，不過就在光主教調查的時候，教宗本篤十五世的「夫至大通諭」，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公佈，教宗顯然對中國的問題已有定見。

這篇通諭由馬相伯翻譯為中文，起頭為「夫至大至聖之任務，其為吾主耶穌基督，言歸聖父之項……」，按照慣例即簡稱此通諭為夫至大通諭。<sup>7</sup> 通諭是向普世教會而發，但所談的問題有許多是特別針對中國教會。傳教團體視傳教區為其地盤是其問題之一。教宗希望傳教士們能秉除私

6 趙雅博，〈熱愛中國兩神父〉（台北：正統文化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六月初版），頁一六五。

7 本篤十五世，〈夫至大至聖之任務〉，〈公教教務公文〉，頁一。

心，「設或助理之人，同儕之數，不足以應付所事，則取才於本會本團修士之外，固其意所極樂而心所素存者也。」但實際上各傳教團體往往緊握傳教區不放，「反是而以天主之田園，畫歸其經理之一分，竟據為獨有若私產者，至不願有一毫得經他人之手，則其當誚讓為何如耶？尤其教友之數本不多，而四圍錯居之教外則極多，（此余所痛陳者固往往而有也，）職既當訓導之矣，而已與所屬講道人數實不勝任，乃猶不肯徵用他人相助為理，則其當被天主審判之嚴，復何如耶。」教宗再勉這些傳教士，輔佐之人「其為本會本國人，抑他會他國人歟，何足繫念。……」<sup>8</sup>

通諭中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本地神職人員的培育問題，教宗認為這是傳教工作的第一要務。在培育工作上一定要避免，「令其以較卑之服務，輔佐外來之傳教人也；乃令其負荷天主之任命，於管理本籍人民，終有一日確能承受之也。」<sup>9</sup>「……惜乎尚有多處，迄今已數百年為公教信光所朗照，而求本籍之鐸曹，非名次較低者不可得。……又有閱多世紀，為福音與教會超生之道力所薰陶者，然尚不能鄉貢司牧（本地主教）等而受統治。……」<sup>9</sup>「從知各處至今，所習用以陶冶鐸曹，供傳教之職者，其規制不無殘缺不完，謬訛不當之處。……」

通諭中點名的第三個問題是傳教士與帝國主義的瓜葛，他首先提醒傳教士們不要忘記他們是來傳天主福音的，「故洞明『忘爾鄉民忘爾父家』是向爾各人言之者，則當省念爾非傳布世人之邦國，乃傳布基利斯督之邦國者也，亦非為在世之本鄉，乃為在上之天鄉而收錄郡人者也。假如見有傳教之士，竟忘卻本身身分，乃至思維天國，不如世間之母國，母國之威權，出乎中道之外而申張

<sup>8</sup> 同前。

<sup>9</sup> 同前。

之，母國之光榮，加於萬有之上而擴充之，此實為宗徒功用，極猛之疫症。使傳福音之喉舌，於愛靈之筋力全弛，而於民間亦虧損其信用之權也。設令傳教士但有幾分參用塵世謀為，並不全以宗徒之為人自處，且示人於本邦國事已亦宣勤，則其種種事功，立即招來萬眾之疑猜，疑猜本易引人到此理想，即以基利斯督之教，為某外洋邦族之私教云，而凡奉此教者，遂見以為服屬於外洋郡國之保障與權政之下，而反脫離本里郡國之關係也名分也。<sup>10</sup>」

然後教宗又提到傳教士之學識培養、傳教士學習當地語言等問題。這些問題都符合中國的現象，也是教宗從（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從老西開事件後雷鳴遠、湯作霖的一連串報告，以及在一九一八年通使受阻的經驗中所得知的。這些中國教會的問題必須一一按步驟解決，第一個步驟就是派遣一個教宗的代表到中國去。

## 二、剛恆毅總主教奉派來華

剛恆毅的家鄉在義奧邊境的加斯提風（Castions），一八七六年生，家境貧窮，十五歲入修院讀書，一八九九年二十三歲晉鐸，先在洛萊剛特村（Roraigrande）任副本堂，然後到公高爾提亞城任總鐸，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因醉心藝術，已小有名氣，義大利前線指揮官邀請他至阿奎肋亞（Aguileia）任本堂，因當地教堂的嵌石畫為著名古蹟。一九一七年，義軍大敗，剛恆毅家鄉也落入奧軍之手；剛恆毅遂在義軍中任隨營司鐸。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剛恆毅在大戰尾聲時，回到

<sup>10</sup> 同前，頁十一、十二。

了公高爾提亞，當地的主教因親奧，大戰結束後被鄉民趕出了教區，剛恆毅被委任為副主教。但他一九一九年二月即往阿奎肋亞整理古蹟。然後一九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教宗派他往斐烏墨（Fiunne）任署理主教。<sup>11</sup>

斐烏墨為一亞得里亞海岸之港口，原在奧匈帝國境內。第一次大戰後，戰敗的奧匈帝國分家，斐烏墨也在割讓之列。義大利原有意併吞此地，並在一九一五年與英簽訂密約；美國反對戰時密約，建議斐烏墨由國聯託管，義大利右翼激進份子不接受這個協定，在詩人達農濟奧（Gabriele D'Annunzio）的領導下，組成了敢死隊佔領了此地。義大利政府不願因斐烏墨問題，損及其他國際條約的簽訂，因此也不支持這些右翼份子的作法。剛恆毅就在此複雜的情形下來到斐烏墨，他用了半年多時間，穿梭在義軍和敢死隊間，終使敢死隊放下武器。然後又要協助斐烏墨維持和平，特別是化解義大利裔與南斯拉夫裔間的衝突<sup>12</sup>。突然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二日，他接到傳信部長的函件，告以教宗要任命他為駐華宗座代表。這年一月，本篤十五世去世，繼位者為庇護十一世，這是一個讓剛恆毅全然不能理解的任命。

本文之所以特別交代剛恆毅的經歷，主要目的是說明教廷挑選他的原因。在一九一八年，兩位被宣佈將被派往中國的大使，他們是教廷的專業外交官，但先後被法國政府稱他們有親德親奧傾向。剛恆毅是土生土長的義大利人，在一次大戰中表現出愛國的行為，他一直在堂區工作，沒有外

<sup>11</sup> 羅光，〈剛恆毅樞機行傳〉，〈剛恆毅樞機逝世十週年紀念文集〉（台北：恆毅月刊社，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出版），頁一七五～一八三。

<sup>12</sup> 同前，頁一八五～一八六。

交活動，法國政府沒有辦法抹黑他。另一方面在複雜的公高爾提亞，乃至斐烏墨的工作，都讓他甚受肯定，因此這位與中國毫無淵源的年輕主教，就成了教廷派往中國的伏兵。

因為有一九一八年法國激烈反對的先例，因此必須事先保密。甚至他向母親辭行時，也只說要到傳教區去。然後他開始從文件及談話中，設法瞭解完全陌生的中國。他也在思索宗座代表的身份及任務，他從「夫至大通諭」中歸納出一些想法：

1. 宗座代表是純宗教性的，因此不當帶有任何政治氣味。
2. 應當與一切的人表示友善，不論中國官員，不論外交使節；也絕對保持自主，絕不袒護列強的政治利益；只屬於教宗，代表教宗。
3. 聖座不務政治，不過有時政治進入宗教範圍，那不過是偶然的或暫短的。
4. 聖座在中國沒有任何帝國主義的野心，列強的政治政策與聖座毫無瓜葛；教宗關懷中國，切願中國強大起來，主張中國歸中國人的。
5. 傳教事業只是服務，教會所以稱至公的，普通來說，教會由本地人作主教為原則，但初創時期客籍傳教士是不可以缺少的，可是一旦時機成熟，本地聖統建立了，客籍傳教士曉得自己目的已達成，立即束裝他往，開拓主的新園地。<sup>13</sup>

這些思想基本上就成了剛恆毅擔任宗座代表的原則。

在出發往中國前，他先往法國克奴白（Grenoble）小住，他住在一個修院中，有一天院長神父

13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上，頁五。

給他看《十字報》(Croix)，上面登載著他被任命為中國宗座視察員的消息，他否認他是宗座視察員，因為他的確實身份是宗座代表。不過消息已從羅馬走漏了出去了。<sup>14</sup>九月二十二日，剛恆毅自威尼斯啟程，同行者僅有杜里歐(Tullio)博士一人。十月底抵達檳城，當時有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大修院，專為培植本地神職之用。檳城的院長發現了剛恆毅的特殊身份，試想一位義大利的主教，不屬於任何傳教團體，他到中國能做什麼呢？不過消息並未外洩。<sup>15</sup>十一月八日，剛恆毅抵達香港。

在剛恆毅十月三十日離開新加坡後，電報才從新加坡發出，告知宗座代表即將抵達。香港的師多敏主教(Dominicus Pozzoni)將信將疑的迎接了剛恆毅，但他是米蘭外方傳教會傳教士，與教廷關係緊密，且他是庇護十一世的學生，因此他對剛恆毅幫助甚大。<sup>16</sup>剛恆毅在香港時給各代牧區寄發了傳信部將在中國派任宗座代表的公函，原本擔心法國的可能反應並未發生，各代牧區或熱切、或冷靜的接受了首任宗座代表剛恆毅總主教抵達的事實。

剛恆毅在香港時婉拒了廣州法國領事引見廣州軍政要員的安排，他由廣東的魏暢茂(Antoine-Pierre-Jean Fourquet)神父安排，在十二月七日至十一日間，在廣州拜會軍政府二位首長，請求他們保護當地教會。在這個軍閥割據的年代，只跟名義上的中央有所交涉，是沒什麼意義的。<sup>17</sup>十二

<sup>14</sup> 同前，頁九、十。

<sup>15</sup> 同前，頁十六、二十。

<sup>16</sup> 同前，頁二十四。

<sup>17</sup> 同前。

月二十四日剛恆毅抵達上海，略作停留，十二月二十六日啟程赴北京，十二月二十九日抵達，然後是準備覲見總統。

### 三、覲見黎元洪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早晨，剛恆毅與北京的林懋德 (Stanilas François Jarlin) 主教和文貴賓 (Jean de Vieme) 輔理主教晤談。有人建議剛恆毅請法國公使引見黎元洪，這明顯是一種維護法國保教權的想法。剛恆毅拒絕了這樣的想法，他表示他有宗教上的職務及牧靈上的自由，他不會使用任何外國使館的汽車或接受任何宴會的邀請，他請林懋德幫他安排覲見總統事宜。然後他在同一天拜會了法國公使及義大利公使，兩位公使和他談及保教權的行使，剛恆毅答稱他的工作主要為牧靈性質，為尋求傳播福音；他不會干涉法義兩國的保教權。<sup>18</sup> 這個標準答案與一九一八年加斯巴力樞機致法國政府的說帖一樣，一個正式的教廷大使都不會干涉國家的權利，教宗的個人代表又怎麼會呢？不過實際上是，向保教權宣戰的時間還沒到。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由於林懋德長期臥病，行動不靈，剛恆毅在文貴賓的陪伴下，覲見黎元洪。剛恆毅向黎元洪致詞稱：「奉教宗庇護十一世特派為宗座駐華代表，前來覲見總統閣下，甚感榮幸，謹代表教宗向閣下致敬意，並祝閣下身躬康泰，國運隆昌。鄙人確信全國天主教徒為公益而祝禱，並致力協助社會秩序與福利，以言以行尊重合法政權與法令。」總統答稱：「教會元首教宗

<sup>18</sup> 同前，頁六十一。

特委宗座代表，無任欣慰，謹請閣下轉陳謝意，並感激閣下之心願與期望。<sup>19</sup>」當天沒有任何外交使節覲見，剛恆毅滿意這樣的安排，不過北洋政府也有意藉此方式表現出他們對教宗代表的低調。

當時中國教會內傳言，剛恆毅來華時本欲以大使銜覲見。一九二三年三月，馬相伯致函英斂之稱：「茲悉剛總牧以大使銜請見，泥菩薩卻之。所帶教廷之寶星贈予外次長者，及其他之寶星，亦均卻之。先是，東交民巷之使團，已謂大使二字不可用。……此間洋鐸之痛恨雷公者，謂剛之失敗，罪在雷公，蓋亦過矣！大使及寶星等之題贈，豈雷公為之耶？總之，教廷之通使，既屬初次，例當妥為接洽，接洽之不知，誰之罪歟？」<sup>20</sup>不過此僅為傳言，是否確有其事，尚須其他資料加以證實。

#### 四、駐節北京

北京是法籍遣使會的傳教區，公使館多半分佈在北京的東交民巷，為表明他的任務是宗教性質，無意侵犯法國在華之保教權，剛恆毅在抵達香港後即聲稱他不要長駐北京，而是駐在各代牧區的中央位置——漢口。於是在覲見黎元洪後，他自一月四日隨即搭火車南下，經保定、正定、衛

<sup>19</sup> 同前，頁六十二～六十三，從致詞判斷，應為剛恆毅樞機傳譯者的翻譯。

<sup>20</sup> 方豪編，《馬相伯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六十一年影印本），頁二八一～二八三。泥菩薩指黎元洪，寶星為勳章，雷公指雷鳴遠，當時人在歐洲。部分傳教士想當然耳的認為剛恆毅的活動與雷鳴遠有關，但實際上二者之聯繫僅為思想上的，而非行動。



輝，在一月二十三日抵達漢口。他特別避免住在租界中，而是住在過去德國租界的一個別墅中。<sup>21</sup>

駐節漢口的安排是避免宗座代表初入中國時可能遭遇的困難，不過剛恆毅真正的期望是駐節北京，「因為各國使節都在那裡。」外籍傳教士或因國籍不同，或因理念不同，也不一定支持保教權的行使。在這類傳教士看來，教宗使節駐於北京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裡是中國的首都。於是漢口的義籍主教田瑞玉（Graziano Gennaro）即發動全中國主教為宗座代表公署募款。更重要的是北京教友發動了各地教友，捐款為北京的宗座代表公署，其文如下：

教宗代表到中國，使我們感到與教會結合更為密切，更有信心，心中充滿了喜樂與感激，更增加了我們的愛心和責任，希望天主賜給勇氣能堪當接受教宗的恩惠。

為了知恩報愛表示，我們呈獻給宗座代表一所住所，猶如自己擁有一樣，敬請笑納。

總主教，我們所請求的，一定接納，會使我們十分榮幸，使我感到教宗代表到中國，宛如回到自己家中。這一切我們每個人都有點奉獻。

雖然，在北京我們有足夠的款項，但是我們想由委員會向全國教友募捐，依照每人的財力和志願來分享這件恩惠，這座住所好似由各地搬運的石塊而建造成的。這是我們有一心一德同一信仰的證明。

請准予我們開始工作，並不是需要一切的支援，而是自由捐獻的，也不是減少教會的工作，我們也為教會工作。

當然，主教可以自由地在中國遴選住所，我們很榮幸地呈獻這座住所。假若我們能表示一個意

21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上，頁七十四。

願，全國教友也會同意的，是希望主教駐節在北京；北京為我們就如羅馬為教會一樣的重要。不但是我們中國重要城市，也是最早傳教士傳播福音的地方，也在這裡給教會奠定了基礎。

願我們昔日的京都能增加教會的榮耀，以主教的榮耀增加我們京都的地位。

住所雖然窄小，但是應當適合主教地位，敬請主教指示，主教精於此事。「為造聖堂先問本堂意見。」我們願意主教選擇地點與形式，使主教代表的教宗，更能得便利與光榮。

最後，在開始改建時，請駕臨北京，我們會獻出一所庭院，或另尋住宅，作為主教臨時住所。

請原諒我們的冒失。我們為了愛戴，尊敬教宗的代表，請接受我們的心願；請祝福我們全體以及我們的家庭。

劉福仁、魏丕治、李德祿等十六人簽署<sup>22</sup>

剛恆毅把握住這次機會，立刻宣佈接受教友們的捐獻，並且希望這棟建築是一個絕對中國式風格的建築。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八日，他住進了中國教友們為他準備的宗座代表公署，這是一棟兩進四合院的建築，位在定阜大街三號。剛恆毅說：「房舍比起北京主教公署及北堂神父的住所顯得狹小而簡單，但是我覺得非常可愛也適合我的個性。」他一直住在這裡，直到一九二九年教友們購下榮親王府作為正式的宗座代表公署為止。另一點和其他外國使領及北京主教不同的是，他的門口沒有衛兵保護。剛恆毅就這樣進入了北京城。

中國有識教友們對剛恆毅的熱烈歡迎，也正反應出對法國保教權的排斥。在籌備這座公署時，馬相伯致函英斂之，他不但主張應由教友們負責公署建築，甚至剛恆毅在華之生活費，亦應由中國

教友負擔，他說：「遇志堯，言及駐使府價已付，所應籌者府內之基本金耳。……當今教宗庇護十一世，命剛總司牧為中國駐使，代表教宗，使我國教會可以直接教宗，幸何如之！但教宗見困已久，則所以供奉駐使者，非我國教眾之任乎？<sup>23</sup>……」這一段話的重點在「使我國教會可以直接教宗，幸何如之。」中國教友們已經體會到剛恆毅來華的重要性，不過此時中國政府似乎尚未意識到。

### 五、教案交涉

法國在華保教權中最引人詬病者，即是教案交涉的部分；傳教士或教友的死傷或損失，成了外國政府攫取利權的最佳藉口。剛恆毅瞭解中國人因此產生的心理狀態，他說：「他們想到這些基督徒國家的行為，給予他們一連串的損失及侮辱。也看到了教會與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緊密的關係。不幸地，在以後公佈一些使館的文件中，顯然某些傳教士協助使館。」「有些歐洲政府把一些會士驅逐出境，也不承認他們有公民權，可是在中國傳教區竭力保護他們，……如果教會受到了損失或是一位傳教士被害，就強迫中國賠償。<sup>24</sup>」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漢口的愛爾蘭籍神父梅樂道被擄。發生此事與傳教無關，是因為中國持續惡化的治安，使得擄人勒贖成為一種經常發生的事件，而在民國時期以後，原本因怕外國政府干涉，綁匪忌諱的外國人，也成了被擄的對象。綁匪的目的是贖金，一般而言贖金多少可以談

<sup>23</sup> 方豪編，《馬相伯文集》，頁二八五～二八六。志堯，為上海名教友朱志堯。

<sup>24</sup>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上，頁四十六～四十七。

判。因此梅樂道被擄後，漢口代牧區即開始與綁匪接觸；剛恆毅則向當時控制湖北的吳佩孚請求營救，也照會北京外交部。北京政府表示不需外國干涉，他們會立即清剿土匪；於是吳佩孚的軍隊出動，在軍方壓力下，綁匪逃走，因梅神父肥胖，行動不便，或亦因恨梅神父未帶來贖金，反而造成麻煩，於是開鎗射他。拖延數日後，梅神父在九月四日去世。<sup>25</sup>

剛恆毅在梅樂道被擄期間即寫信給漢口主教田瑞玉，要求教會方面不可因梅樂道被擄而要求賠償。田瑞玉接受了這樣的觀點。但剛恆毅不能干涉外國政府，因為這裡是義大利傳教士的傳教區，因此這位去世的愛爾蘭籍傳教士可由義大利與中國交涉；但是愛爾蘭又將保護傳教的權利交給了法國，因此法國也可出面交涉。義大利公使傾向於接受剛恆毅的意見，但法國領事則希望循慣例，要求中國政府賠償，以藉此警告中國政府處理土匪問題的不當。

一位在漢口的猶太銀行家，諷刺的用《聖經》中的語法說：「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後面就有賠款。」<sup>26</sup>這句話聽在剛恆毅耳中是多麼難受；更何況，賠款的一部分將由地方負擔，因此將更增加地方的反感。於是他寫信給傳信部報告此事，他說：「我感覺有關梅神父的事件，不可以要求賠償，這樣一來，教會人士並不和其他外籍人士列為同等，也不會引起反感與因為偏見而受到損害。」

這個教案傳送到教廷後很引起重視，剛恆毅的觀念得到支持，並且由國務院及傳信部舉行聯合會議，將此個案轉化成通案，形成一般的原則，適用在所有教案的交涉上。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三

<sup>25</sup> 同前，頁一四五—一四六。

<sup>26</sup> 同前，頁一四八。

日，教廷國務院發出訓令：

有關傳教士被害被綁架給傳教區帶來的損害，教會當局應採取的態度，現任所在地之宗座代表應注意事項：

- 一、凡傳教士被殺害，不得要求賠償，為死難的血而要求金錢賠償，與天主教會之精神背道而馳。
- 二、若請求補償教區物質之損，應注意以下三點：
  1. 受害的教區要求補償，須先經教區權力人同意。
  2. 必須向實際負責人請求，若為匪徒所傷害不得向中國政府要求，除非因某些因素的存在。
  3. 以所損失之限度內。
- 三、有關向中國官員直接談判事宜，若宗座代牧或監牧向省政府辦理時，應盡可能避免外國政府的牽入。若向中央政府交涉得由宗座代表辦理。
- 四、該地區若需要請求補償時，應有一定限度和愛德，這樣符合由天主接收博愛，和平之傳教任務，於教外人中宣傳福音而犧牲生命。以往以列強之武力所逼之賠款遺留下深痛之血痕，危害教會非淺。
- 五、若被害傳教士之親屬，藉領事及其外交官向中國政府要求適當賠償，聖座不參與這項交涉。<sup>27</sup>

在此原則下，中國的教案交涉開始有了新的做法。梅樂道的事件以在漢口蓋一座紀念醫院作為解決辦法，蓋醫院的經費由中國人籌畫。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內蒙傳教聖母聖心會傳教士宋志仁 (Soenen Achiel) 被殺，剛恆毅也提醒內蒙的主教，不要為傳教士的被殺要求賠償。

<sup>27</sup> 同前，頁一四九。

「不為被殺害的傳教士，向中國政府要求賠償」遂形成一種普遍性的原則，為各宗座代牧區遵守。一九二七年三月，當國民革命軍進入南京時，有兩名耶穌會士屠藝烈 (Dugout) 及翟光朝 (Vanara) 被殺，兩人分屬義籍及法籍，義大利公使及法國公使各為他們求得了三萬元的賠償，但南京宗座代牧區不接受這筆款項。<sup>28</sup> 一九二九年九月，宜昌代牧區主教鄧炳文 (Trudos Jans) 及兩名傳教士被仇教匪徒殺害，法、比兩國公使曾有意派戰艦示威，剛恆毅極力勸阻，使兩位公使打消此意。數月後，廣東韶州主教雷鳴道 (Luigi Versiglia) 及高惠黎 (Callisto Caravario) 也被土匪殺害。剛恆毅向外交部提出抗議，不過他的訴求是積極剿滅地方盜匪。他說：「我當然知道這類罪行皆是出自匪徒之手，……但這並不因此中國政府即可推卸其神聖責任，不去剷除匪徒，讓他們仍然為非作歹。」<sup>29</sup> 剛恆毅採取這麼嚴厲的態度，是因為數月內連續兩位主教遇害，各地騷亂不斷，幾乎無法忍耐，不過當地的副主教在與地方政府交涉時，也很清楚的表明，不會尋求賠償。

## 六、中國教務改革

剛恆毅到中國的首要使命是召開全國教務會議，經過一年多的籌備，他在民國十三年初即將會議的議案分寄給全中國教會首長，並定五月十五日為會議召開日期，梵蒂岡方面將會議命名為「第一屆中國教務會議」。<sup>30</sup> 終於五月十五日在上海「會議開幕，到會的有四十二位主教，五位監牧，

28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零落孤葉》(台北：天主教主徒會，一九八〇年五月出版)，頁三十四、三十五。

29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下，頁一七九。

30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上，頁一六一。

苦修會會長，十三位傳教區代表，在中國傳教的各修會代表二十四名，及中國神職界代表多名，包括籌備人員在內，共有一百零八人參加了教務會議，其中包括了兩個中國教區的監牧。<sup>31</sup>會議主要是依照本篤十五世的夫至大通牒，討論各教區應一體遵守的正確綱要，其中討論的過程沒有公開，所以現在也無法瞭解各教區及修會的不同反應，但從大會議決的條文中，我們可以看到有完整的一章，嚴禁傳教士涉足俗事和政治：「決不可讓腦筋簡單的人視天主教為某一國家的教會，要使得由神聖的創教者所昭示的大公無私的特徵，顯耀於大眾之前。」大會並規定本地神職人員可擔任任何職務，「本地神職人員只要有資格，決不可拒絕他們擔任任何職務。大會且有更遠大的希望，並期望其盡可能早日實現，即由本國神父內選任主教。」<sup>32</sup>

這個會議的召開本身就是具有象徵性意義的，表示宗座代表有權管理中國天主教的內部事務。剛恆毅說：「大家都知道在歷來教務會議，外界的壓力往往干預、困擾專心討論宗教事宜的教長。我應當對中國政府及各國公使表示敬意，他們絕對尊重會議的自由，從來未受到外來的影響。各國公使為了對主教們的尊敬，只是宴請而已。」<sup>33</sup>於是，宗座代表的管理權確定了。

剛恆毅來華的第二個任務是祝聖本地主教。要尋找中國籍神職堪當主教神品者還不困難，但要外國籍傳教士願意服從在中國主教權下，則不太容易。解決之道是設立由國籍神職管理的代牧區，然後任命國籍主教管理。於是剛恆毅在一九二四年召開會議前，先在漢口及保定的旁邊成立兩個國

<sup>31</sup> 同前，頁一六二。

<sup>32</sup> 穆啟蒙著，侯景文譯，《中國天主教史》（台中：光啟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七月初版），頁一三二～一三三。

<sup>33</sup>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上，頁一六三。

籍監牧區。<sup>34</sup>兩位中國籍監牧孫德楨及成和德都參加了上海教務會議，表現也不輸外籍主教。

在剛恆毅繼續自北京劃分出宣化代牧區時，教宗庇護十一世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發佈了「聖教會已往之成績」通諭，再次重申培育本地神職人員之重要，認為各傳教區所做的尚不充足。他重申前任教宗夫至大通諭的訓言，要所有外籍傳教士注意；他駁斥人種優劣的想法，「凡有人說本地人的品格卑下，天資遲鈍，這個見解，實在誤謬。因為經過長久的實驗，知道居於遠東和南方人民，往往毫不亞於我們的人民，而且也能與我們的人民的智力抗衡。……因為即在眼前，多少原籍遠方傳教區的學生，在羅馬各大學內，攻讀各種學問，論學業成績，論天資的敏捷，不但同別的學生可以比肩，並且屢次名列前茅，超人一等。……爾眾當重視他們，為將來有一日當掌管爾眾用汗勞創立的教會和信眾。」<sup>35</sup>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傳信部長通知剛恆毅，稱教宗將在羅馬為中國主教祝聖，「不妨再甄選幾位主教，同時蒲圻、蠡縣兩位監牧也升為主教。」<sup>36</sup>六月十五日教宗再發佈「余即位伊始」通諭，此特別為中國教會而發也。其文曰：「蓋爾眾左右，有許多司鐸，與爾眾同服苦勞，偕爾曹擴充基利斯督之神國，已收實效，而中國司鐸，已有數位與爾眾同執教權矣，故宜深謝錫諸鴻恩之天主，賜余教宗任內，幸逢多數新立教區，付託於中國鐸曹，此實使余至極快慰。且外籍傳教士，已收穫個人及前輩所服苦勞之佳實。本籍傳教士，則渴望之日，曙光已屆，因傳教人士之惠，滿其

<sup>34</sup> 監牧區通常是作為代牧區的準備階段而設立的。

<sup>35</sup> 庇護十一世，〈聖教會已往成績〉，《公教教務公文》，頁四十三～四十四。

<sup>36</sup>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上，頁三二五。



素志。爾眾外籍及中華之傳教士，必不能不踴躍快樂也。際此時會，外籍主教司鐸，與中華主教司鐸，互以友愛結和，同謀聖教之發展，同謀中華之利益，為普世教會，孰有更榮耀，更美善逾於此者乎。<sup>37</sup>」

一九二六年九月三日剛恆毅偕同宣化代牧區的趙懷義，蠡縣監牧區的孫德楨，海門代牧區的朱開敏，汾陽代牧區的陳國砥，台州代牧區的胡若山從北京出發，九月五日抵達上海，蒲圻代牧區的成和德由漢口來會，當時北伐戰事正在蒲圻一帶進行，他在途中曾遭作戰部隊留難。九月十日，一行人搭乘郵輪離開上海，十月十六日抵達義大利的拿坡里，有許多修會會士、傳教士在碼頭迎接。他們乘義大利政府特別準備的專列火車赴羅馬。抵達羅馬次日，教宗即予接見，他們當時還沒能裁製一件教廷習用的服裝，身上穿的還是中國服裝。<sup>38</sup>

祝聖典禮在十月二十八日進行，當日禮儀中，剛恆毅是兩名襄禮人之一，在羅馬唸書的中國修士被安排擔任輔祭，于斌亦在其中，負責協助成和德主教。雷鳴遠與比利時魯汶大學的六位天主教青年，坐在祭台的右側前排，清楚的看著禮儀進行。禮儀從上午八時進行到中午一時完畢，六位中國主教走下祭台，祝福在場的群眾。這是第一次白種人跪在黃種人膝前接受降福，雷鳴遠也跪在宣化主教趙懷義的面前求降福，兩人都感動得淚濕滿襟。雷鳴遠回憶當時的情景說：「這是第一次享受最大的幸福，不會說話，也聽不見人說話，七竅不通，完全變成白癡，想不到享福享到最深處，

37 庇護十一世，〈余即位伊始〉，〈公教教務公文〉，頁五十九。

38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上，頁三四四。

竟什麼也不覺了。<sup>39</sup>」

除了這第一次的國籍主教祝聖外，在回到中國後，剛恆毅不斷的再從原有各代牧區中，劃出一個個國籍監牧區、代牧區及自治區等。至一九三三年六月，教宗庇護十一世再一次親自在梵蒂岡祝聖了五位本地主教，其中包括三名中國主教。<sup>40</sup>藉由這一次次不斷的宣示，剛恆毅逐漸的將本地化的中國教會建立起來。

剛恆毅來華的第三項任務是在北京設立天主教大學。經過近十年的調查及聯絡，一九二三年二月，教宗庇護十一世宣佈捐助北京公教大學的創辦經費十萬里拉，並邀請由本篤會士來華籌備創校。之所以邀請本篤會，是因為本篤會注重學問的傳統，其清修的特質，以及此前不曾在中國擁有傳教區，或能因此減少北京遣使會之阻力。然後在這年八月，美國的本篤會聯合會接受了教宗的邀請。<sup>41</sup>

一九二五年三月，本篤會的籌備建校者，以二十萬美金購得了遜清載濤親王之濤貝勒府為校址，並發表「北京公教大學宣言」，在此宣言中，首先聲明此大學以國學為主，然後聲明此大學無任何帝國主義之野心：「今此大學初創之人，雖皆美產，但來華之意，非仿殖民，吸取人才，造成附屬品也。本會在一國，便成一國之會士，極願同志之人，同力合作，數十年後，會士為中國之會

39 雷鳴遠，〈聽命革命一滴血〉手稿，未出版。

40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下，頁四四四。

41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上，頁四三四。

士，公教為中國之公教，大學為中國之大學，懿歟休哉，而本會之志願方告成。<sup>42</sup>」

剛恆毅雖未直接插手北京公教大學籌設事宜，但他是這件事情最重要的支持者。一九二五年本篤會士來華之後，他才將這件事告知北京的林主教和富主教，「林主教和富主教，雖然心裡不樂意，卻很禮貌的招待了這位總院長和初來的本篤會士。」然後他把事情告訴法國公使，「他表示有點不滿，但是仍不失君子之風，作了一個不得已的笑臉。<sup>43</sup>」

一九二五年七月，北京公教大學按成立步驟，先設立了預科，由英斂之擔任社長。英斂之將其取名為輔仁社，和一九一三年他為培育教中子弟所設之學校名稱一樣。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教育部正式立案，改校名為輔仁大學。九月二十六日大學部開學，當時只有文學院四系。剛恆毅應邀致詞，他以拉丁文演講，先說了希臘箴言，然後用了孔子及孟子的言論，他很清楚的在當時民族主義勃發的中國，說明他對輔仁大學的期望：「我們以基督的情感與基督指示的友誼觀念，使你們能瞭解並重視愛國。我們也以真摯、赤誠的心尊重中國人民，也不願意有任何傷害中國人民的行動。……中國如同其他國家一樣，迫切地需要能幹而清廉的人，來挽救當前危機，走向順利的新生。然而，能幹而清廉的人不是由毫無意義學生示威遊行而產生的，是理智與意志在嚴格紀律而生的。你們中真有愛國的人，應當聚精會神地在沈靜辛勞，從研究中求得學識與技能，這樣，用你們的頭腦，用你們的手服務國家，貢獻給國家。在同學中有不同的信仰，應當互相尊重，互相友愛，

42 〈北京公教大學宣言〉，《馬相伯文集續編》，頁七十、七十四。

43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上，頁四三四、四三五。

這種禮尚往來，是中國傳統的寶貴遺產。但是，對基督的原則不得有所傷害。……<sup>44</sup>」這篇演講很清楚的說明了基督信仰不排斥愛國的態度。

### 七、教宗八一通電

從一九二六年以後，中國的局勢陷入更明顯的混亂和對抗。首先是國民革命軍北伐，但不久國民革命軍就分成南京和武漢兩個系統；不久又有國民黨的「清黨」。北方則是軍閥分裂，張作霖的奉軍則控制了北方，由於國民革命軍清晰的反帝國主義色彩，使得列強駐華外交人員，除了蘇聯大使加拉罕外，普遍具有不喜國民政府的傾向；而國民革命軍中的極端民族主義份子和共產黨員，則在軍事活動中引起了不少次殺害或騷擾外國人的事件，外籍男女傳教士當然也不能倖免。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因為國民革命軍步步進逼，張作霖退出北京，六月四日即在皇姑屯被日本軍方炸死。六月八日和國民革命軍結盟的閻錫山部隊開進北京，這時似乎已經大局底定，國民政府將可成為代表中國的政府。不過基於國民政府鮮明的反帝國主義立場，列強們仍在觀望、期待甚至暗中支持反國民政府的勢力，沒有人立即承認國民政府。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教廷國務卿加斯巴力樞機發了一封電報給剛恆毅，他是代表教宗庇護十一世發的，其文如下：

「可敬的全體中國主教、親愛的神職與全體教友以及中國極崇高的全體國民：

聖父對中國的時局始終極為關懷，（各國中）他不但是以完全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之第一人，而且還以真摯與誠懇的同情，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躬親祝聖首批（六位）國籍主教。今悉中國內戰已經告終，不勝欣慰，不禁感謝天主的宏恩；並殷望中國以仁愛與公義為基礎，能建立一個內外持久而有效的和平。為達到此目的，聖父希望並祝福中華民族的正常要求與權利，都能獲得（列國）圓滿的承認。中國人口之眾超出世界任何民族之上，文化最古，曾有遠大光輝的歷史，如能維持公理與秩序的話，其偉大的未來不久終必來臨。

聖父願中國的傳教事業，能對中國的和平，福祉與進步有所助益，並重申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致中國各教區首長之「吾即位伊始」（*Ab ipsis Pontificatus Primordiis*）通諭所言，天主教會一向主張對合法的政府尊重、服從，並這樣訓誨人。它為其傳教士與教民所希望的，只不過是自由與公民權的保障而已。

聖父為達到宣傳福音的目的起見，曾鼓勵各教區首長成立並發揚公教進行會，以便男女教友，尤其可愛的青年們，用他們的祈禱、善言與善行為祖國的和平、社會的福利以及國運的昌隆有所貢獻，以便使福音中所記載的聖賢和有益原則日益發揚，並常協助主教與神父傳播基督的思想，推行基督的博愛，造福個人與社會。

最後聖父重申他對中國的和平與繁榮之祝福，切望全能上主允准我們的祈求，沛賜宏恩。茲以慈父般的宗座祝福賜給中國全體國民。

國務卿加斯巴利樞機（*Card Pietro Gasparri*）<sup>45</sup>

梵蒂岡，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sup>45</sup> 此八一通電共有外交部譯文、當時報紙譯文、一九二九年《教務雜誌》譯文及《剛恆毅樞機回憶錄》中文譯文四種，作者以為剛恆毅樞機回憶錄之中文譯文最佳，採用之。

這篇通電中最重要的一段話就是「天主教會一向主張對合法的政府尊重、服從，並這樣訓誨人。」其中的含意就是教宗承認國民政府是中國合法之政府，並命中國教友應尊重服從之。因此這篇八一通電展現了教廷和西方列強截然不同的態度，教宗是和帝國主義劃清界限的。

這封通諭在教友中引起了很大的迴響，教友們表示要把它印兩百萬份，免費分送給所有人。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官員也表示了讚許；衆多報刊爭相轉載並加以評論，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王正廷回覆謝函稱：

「遵復者

八月三日來函并附抄羅馬教皇普意士第十一世致中國天主教主教及教友轉告中國全體人民書一件，披閱之餘，至為榮幸。

教皇對中國表示同情，且欲引神教之功，同昌中國復興事業及和平與進步之助，尤所欣感。現在中國統一完成，政府及民眾當本素來和平之精神，躋全世於幸福途徑，以副 教皇祈禱之誠也。特此敬復，即命轉告教皇代表特達為荷

王正廷」 46

#### 八、晉見蔣中正與教約磋商嘗試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張學良宣佈服從國民政府，英美等國也承認了這個事實上已代表中國的政

府；到一九二九年一月，已有十二個國家已與國民政府簽訂新約。在此情況下，剛恆毅決定拜訪南京的國民政府。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剛恆毅孤身一人，著簡單的教士服，搭上火車赴南京，因為王正廷人在上海，剛恆毅遂在一月十四日到上海見這位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剛恆毅表示希望晉見國府主席蔣中正，在王正廷的安排下，一月二十一日剛恆毅由上海的助理主教惠濟良（Augustus Haouisse）、海門主教朱開敏、國籍神父張路加及上海著名教友陸伯鴻陪同，晉見蔣中正，他用拉丁文致詞，張路加用中文翻譯，其文如下：

「主席閣下：本人僅以教宗庇護第十一之代表，向閣下及中國政府表達中國天主教各教區與全體教民的尊重與服膺，感到無上榮幸。全球天主教皆無例外的隸屬教宗管轄。

非常榮幸能在此重申教宗在去年八月一日通電中所陳述之意。

主席閣下，天主教傳教區人士由不同的國籍組成，雖然國籍、語言、風俗不一，但大家共有一條心，一個目標，那就是讓中國同胞認識人類平等博愛的最高經典——基督的福音。

主席閣下，在我旁的一位中國主教，他是教宗在羅馬躬親祝聖的六位主教之一，領導一個教會——海門。他的存在告訴我們在宗教園地中，沒有國籍與種族的區別，而享有絕對的平等。

教會不過問內外政治，不參與政黨之爭，但我們卻極尊重政府。我們誠懇地希望盡我們的棉薄，對新中國的復興有所助益。

我們把願望化為祈禱，呼求天主多祝福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偉大而高尚的中華民族。切望天主使中國和平，秩序與公義能早日完全建立，物質與倫理日趨進步，如此新中國內外皆獲享安樂、統一與富強，能在列國中屹立不搖，享有至高的主權，國民皆能獲享康樂，並且成為締造世界和平的工

具。47」

蔣中正以中文致答辭，由陸伯鴻翻譯為法文，其文如下：

「能接見閣下，我感到非常榮幸，對教宗庇護十一世對我國所表示的一切，及閣下以其名義所表達之一切，深為感謝。茲為表示回敬，我謹祝教宗身躬康泰，希望自此兩國的關係日漸增進，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日漸蓬勃。48」

剛恆毅認為國民政府願意馬上接見他，是因為教宗八一通電表示善意的結果；當然這是一個主要的因素，但另一方面這取決於此時期國民政府的性格。這個「革命」的政府較北洋政府少與外國列強間的包袱及糾葛，具有理想性，想要清理帝國主義的舊帳；而這與教廷派遣宗座代表，想要逐漸結束法國在華保教權的目標是不謀而合的。目標既然一致，要談合作就比較容易了。

這時要談的主要兩項事務為通使及議約。在教宗八一通電發佈後，葡萄牙公使王廷璋首先發電南京外交部，稱：「與教廷議約時機已熟。觀法國駐教廷大使頻來（回）巴黎羅馬，可知內幕。49」這個要議的約，就是廢除法國在華保教權的約，而且新約應由教廷與中國簽訂。外交界大老陸徵祥在夫人去世後，已於一九二七年進入比利時之本篤會清修；但在教宗八一通電後，仍然忍不住以布衣之身，寫信給王正廷，他的重點放在通使。他說：「……羅馬教宗前年既有親手祝聖六位國產主

47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下，頁八十四、八十五。

48 同前，頁八十五。

49 〈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六十三。



教之舉，本年八月，復有致我全國人民表示協助慶祝之通告，近祥又密聞教宗有發表第二批中國國產主教之意（二批發表人數約在二十位左右，惜為駐華法國主教多數反對，暫為擱置），察看大勢，直接派使時機業已成熟，一髮千鈞，似不可失之交臂。<sup>50</sup>」四天後他又寫了一封更正式的信，表達相同的意見<sup>51</sup>，由此可以看出陸徵祥對於教廷通使的急切之情。除了陸徵祥之外，在外交部檔案中還可看到國籍教友及代表本地教會思想的《益世報》，均上書外交部長要求派遣正式使節及廢除舊約，一時之間與教廷關係似有增進之可能。

在這種氣氛之下，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王正廷乃與剛恆毅會談，希望能就傳教事務與教廷訂約。兩人首先訂出一些基本原則，做為以後會談的基礎：

「一、保證信仰自由。

二、承認天主教會置產之權；設法以新規定來處理教會財產；此一新規定不溯既往。

三、承認天主教會創辦學校之權，但需遵守政府有關法令；至論各神哲學院或大小修院的課程，政府則不加干涉。<sup>52</sup>」

雖然雙方還有一次會談，在外交部的檔案中，此年有一件《中梵教約草案》，共有五條，主要內容有兩條：

<sup>50</sup> 〈陸徵祥致王儒堂總長函〉，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六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六十四～六十五。

<sup>51</sup> 〈陸徵祥致外交部〉，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六十七。

<sup>52</sup>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下，頁八十六。

「第一條 加特力教在中國全境內有傳播之自由，惟須遵守中國法律規章。

第二條 中國政府及教廷得互相派遣正式外交代表，嗣後一切教務，均由雙方直接磋商處理。此項代表得享受國際慣例所承認之一切權利、優例及豁免。」

這個草案應該是國府外交部要和剛恆毅進一步磋商時的對案；但還沒有真正的磋商，王正廷即決定暫時中止這次談判，因為消息曝光後，又引起了法國政府的強烈抗議。當時法國駐華大使正與王正廷交涉越南問題，準備簽訂新約。越南條約的重要性超過與教廷建交，因此與教廷通使修約事只能暫緩。

### 九、三民主義與國父奉安大典

國民政府以國民革命為號召，而國民革命的基礎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此一新成立的國家教育體系中，教會學校立即面臨了對國父孫中山的敬禮，以及教授三民主義的問題。某位代牧主教（疑為上海）認為在他的學校裡向國父遺像行禮有迷信之嫌，於是剛恆毅發函教廷，表明他對此事的看法：

「中華民國的創立者已成為一個象徵……他的肖像在所有公共場所懸掛，正如我們（義大利人）懸掛我們國王的肖像一樣……」

僥倖在孫中山先生的書中與行動中，不曾發現有攻擊教會的地方，在其《三民主義》一書中，甚至不曾提過傳教士三字。孫中山是位基督徒，生活嚴肅，僅晚年曾離婚另娶，可謂是其一生中的些微瑕

疵。」

中國革命使我們來到一個緊急關頭：或者採取尊重中國人的要求，擁護孫中山先生的事業，設法把基督徒的原則去協調孫氏的學說；不然就是反對中國人的要求，不承認孫氏的成就，並拋棄他的大作於不顧。

如採第一途徑，我們與中國教友正處於中國革命的潮流之中，這對中國教會的復興不無助益，為傳播福音會有更豐碩的成果。

如採第二途徑，我們將被隔絕於新中國之外，被視為中國的敵人。傳教事業至少目前會全部癱瘓。

我已讀過《三民主義》的法文翻譯本。我以為其中僅有少數主張似乎不太正確，而以天主教的社會原則加以更正就是了。

教宗的八一通電已為我們打開了一條坦途；承認中華民族合理的要求，孫文學說中凡是好的我們接受，錯誤的加以修正或拒絕。<sup>53</sup>

然後在剛恆毅訪問南京時，他曾就此問題和教育部官員表達意見，他說：「我們不反對在我們教會學校裡講解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因為這為開辦學校是不可或缺的條件），但同時我也聲明，我們要以天主教的原則去對證，因為我們不能容忍講授違反天主教義的思想，例如我們絕對反對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sup>54</sup>」教育部官員同意剛恆毅的見解，於是三民主義在教會學校中的講授，

<sup>53</sup> 同前，頁七十。

<sup>54</sup> 同前，頁一〇七。

也不至形成某種違反教義之舉。

國父 孫中山去世後，他的靈柩暫厝於北京香山的白雲寺。國民政府形式上的統一中國後，為孫中山舉辦國葬大典，在南京營造了中山陵，並邀請各國公使前來參加。在外交意義上，十八國使節的參加象徵了列強各國不再觀望，真正的將國民政府視為代表中國的政府。教宗代表在使節團之外，但也在國民政府邀請之列，因為教宗首發的八一通電，對各國陸續承認國民政府有推波助瀾的功效，國民政府對此是抱持好感的。<sup>55</sup>

這個奉安禮儀是完全社會性的，不致造成宗座代表的不便，因此教廷同意接受邀請，並命剛恆毅以教廷特使的身份參加。不過剛恆毅還是先聲明只參加社會性的儀式，不參加任何宗教性的儀式；此外也聲明其參與並不代表完全贊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這些聲明是備而不用，主要是基於剛恆毅宗座代表身份的敏感。

剛恆毅與使節團一同搭車南下，剛恆毅回憶道：「五月三十日特使團拜會外交部長並呈遞國書。三十一日中華民國政府主席蔣中正隆重接待各國特使團，並舉行官方儀式向中山先生的遺體行最高敬禮。對我這位聖座的特使，或為拜謁主席，或為向中山先生的遺體致敬都先約定一個時間為我保留，……這樣就把棘手的優先權問題很適當的解決了。<sup>56</sup>」

六月一日清晨，奉安大典開始，剛恆毅對整個典禮有極佳的評價，他認為他參加這個奉安大典意義深長，他說：

<sup>55</sup> 同前，頁一一三。

<sup>56</sup> 同前，頁一一四。

「三年前中國革命中了共產黨的惡毒，曾高聲疾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被目為帝國主義工具的基督宗教。今日天主教的自由與獨立被中國政府承認與維護。在慶祝愛國運動勝利的行列中——國父奉安大典——教會佔有一個榮譽的席位。……」

「同時也創下歷史的新例。……因為這個奉安大典完全拋棄了所有迷信的色彩，而以莊嚴肅穆純社會性的儀式舉辦。……總而言之，中山先生的葬禮完全是一種新的儀式，一種真的革命，與中國認為古老神聖，牢不可破的習俗相背。<sup>57</sup>」

既然是一個社會禮儀，當各國公使都在中山先生靈柩前行三鞠躬禮時，剛恆毅當機立斷，也在中山先生靈柩前行三鞠躬禮致敬。<sup>58</sup> 懂得中國天主教歷史的人都可以想到，這是和禮儀禁令相反的舉動，也是日後廢除祭祖祀孔禁令的預像。

#### 十、對剛恆毅的抨擊和對抗

首先，擔任宗座駐華代表的剛恆毅，他的身份就足以成為支持法國保教權部分外籍傳教士反對的理由。其後，他抵華後一步步剝除法國在華保教權的作為，當然更會引起這部分外籍傳教士的反感；法國政府對他自然也不抱好感，於是各種抨擊、抵制或對抗的作為遂因應而生。

這些對抗的作為開始時只是耳語，但隨著剛恆毅日益增加的行動，在籌備輔仁大學的時候，北

<sup>57</sup> 同前，頁一一六。

<sup>58</sup> 同前。

京的助理主教富成功尋求法國政府的支持，邀請法籍道明會士，在北京籌備一所屬於法國政府管理的學校，這是一個和北京公教大學對抗的行動。這所「道明學校」在一九二八年九月開學，但不久後就在盛行的學潮中，被學生們嗅出了帝國主義的味道，被迫關門大吉。輔仁大學當時亦受波及，被稱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但靠著教宗的八一通電，輔大的學生澄清了外界的抨擊，也肯定了自己。<sup>59</sup>

一九二九年一月，剛恆毅微服拜訪南京國民政府的舉動，按照剛恆毅的評斷，引發了法國駐華使館、法文報紙以及部分法籍傳教士的不安。二月六日法文的《上海日報》用諷刺的語調說剛恆毅「對越不值得信任之人而越去信任他們」，說剛恆毅的行動錯誤百出，而「這正是義大利人所有的技巧與天真。」而若這樣的政策繼續下去，「最近這幾年的事件已經清楚顯示，他們（按：指傳教士）幕後沒有強有力的支持（按：指保教權），傳教事業已變成了什麼樣子。<sup>60</sup>」

二月二十六日法國公使德馬爾德耳（de Martel）訪問寧波代牧區，寧波主教戴安德（Andrew Defebvre）在致詞時說，由於公使的來臨，「又一次證明祖國關心我們的利益，因為在中國，法國有許多天主教的事業，不斷而慷慨地給予我們協助與福利，也對我們保證為人與財產，提供為傳教工作不可或缺的安定。」法國公使的答詞說戴安德代表了法國傳教士的典範，「您知道如何把傳教士和愛國者結合在一起，因為曾對天主教傳教事業有過卓越貢獻的保教權，最近成為爭執的對象。」「是的，保教權仍安然無恙，我鄭重地向你們保證，當我擔任法蘭西共和國駐華的代表一

<sup>59</sup> 同前，頁四十四、五十一。

<sup>60</sup> 同前，頁九十。

天，我將盡全力維護這保教權所有的效力，……<sup>61</sup>」剛恆毅將此視為法國公使對他的示威。

在法國的運用及部分外籍傳教士的阻攔下，一九二九年的條約乃至通使談判，僅如曇花一現。剛恆毅評估：「某些事就如樹上的果實，在一定時期成熟；假如摘的過早，果實將會酸澀；如果摘得過晚，果實則會落下腐爛。」一九二九年緘口不語的部分外籍傳教士，在一九三三年分別在北京及上海集會，然後上書宗座代表，請與中國政府談判新約，取代法國的保教權，但這時中國政府已無互換條約的打算了。

一九三〇年三月，對剛恆毅最嚴重的攻擊，由法文的《北京日報》(Journal de Pékin)發動，從三月二十日至六月十二日，不斷發出各種批評剛恆毅的言論：「宗座駐華代表已經達成了他摧毀傳教事業的目的。」「教廷受一位義大利籍總主教的影响，用盡辦法，要從我們的傳教士手中奪走教區而轉給中國主教。」「他所致力的政策，甚至不是要中國教友去研讀三民主義，在講授要理問答時，不是要加上孫文思想的條文嗎？」「未來中國神職的領袖已經有了(按：指陸徵祥)，根據教宗的希望，他已注定將成為天主教的領袖。」「梵蒂岡與其代表所玩的把戲為中國天主教是不吉利的，本地神職的觀念根本就是謬論。」「有關教廷的最近通電，全是出自習於幻想的剛總主教之手。<sup>62</sup>」

教廷機關報《羅馬觀察報》在六月二十九日公佈了一個官方聲明，聲言剛恆毅的行動是受傳信部

61 同前，頁九十三～九十四。

62 同前，頁二〇九～二一四。

准許的，教宗的通電出自教宗之手。<sup>63</sup>但剛恆毅卻隱然感受到似乎有一種不利的氣氛。剛恆毅在回憶錄中並未透露那些徵象使他感受到這種氣氛，但可以推測剛恆毅會問：為什麼這個素來被視為與法國使館聯繫密切的《北京日報》，會持續的以駐華宗座代表為目標？在他的背後是否已經有所佈置？然後當剛恆毅向教廷報告時，教廷可能答覆較含糊不清，或是延遲答覆，剛恆毅會再問，這些外籍傳教士報告了什麼？

從《北京日報》透露出的訊息，可以推測外籍傳教士當時對剛恆毅的批評，大概集中在三個方面：首先，對中國政府不夠強硬，以致現在傳教士被搶、被擄甚至被殺的案件層出不窮；其次，在講授三民主義的問題上對國民政府讓步，破壞了教會學校教育內容的獨立自主；最後，剛恆毅協助本地神職搶了傳教士數百年辛苦經營的傳教區。在這些問題上，教廷對他的支持不如以往。而教廷對他支持減少或趨於審慎，可能的原因是教廷國務卿換人，原來最支持剛恆毅的加斯巴力樞機年老退休，由柏徹里樞機繼任。柏徹里是教廷的專業外交官，原擔任教廷駐德大使，在一九三〇年接任國務卿時，教廷與義國剛簽訂拉特朗條約，義國境內法西斯勢力日漸增長，歐洲各國普遍受經濟大蕭條影響，因此柏徹里在外交上的優先是歐洲，一個在中國飽受攻擊的宗座代表，是可能破壞教廷與法國關係的原因。或許因為如此，在中國問題的處理上，教廷的反應就顯得較為慎重了。

剛恆毅寫道：「由於不少人反對我，使我不得不要求傳信部長准我返回義大利。」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剛恆毅離開北京，經香港轉回義大利。他當時的心情是：「目前由於很多動機使

<sup>63</sup> 同前，頁二一四。



我不知是否我的任務就此結束？抑將還要回來繼續這工作。<sup>64</sup>」十二月二十日的深夜，剛恆毅搭乘的輪船抵達了義大利布林地西（Brindisi）港，隨即接到國務卿電報，要他立即趕到羅馬。剛恆毅認為柏徹里樞機必定有重要的事告訴他。

十二月二十二日早上，柏徹里樞機接見了剛恆毅，剛恆毅問及在中國散佈的謠言，「他回答說法國大使並未在聖座前表示我在中國是位不受歡迎的人。他給我打電報要我到他那裡，所要談的事，是有關中國大力消除煙毒的問題。」這個答案間接表示了新任國務卿，如前任加斯巴力樞機一樣，是支持剛恆毅中國政策的，所以不用特別談什麼。接著在同一天，剛恆毅見了傳信部長王老松樞機，剛恆毅說：「他明確告訴我，在中國應當繼續已敞開的途徑。」然後十二月二十三日，剛恆毅晉見教宗庇護十一世，「當我敘述某些謠言教廷有意在中國改變傳教方針時，教宗立刻直起胸膛，清晰且斬釘截鐵地對我說：『要知道開倒車不是我的作風。』<sup>65</sup>」

從剛恆毅的回憶中，他似乎從教廷得到了充分的支持；不過他這趟回來在義大利共待了六個月，當然他要拜訪友人，回家鄉探親等，但他一定也花了不少時間用來解釋和澄清中國的現況和問題。在他的回憶錄中，他這一段在義大利的時間幾乎空白，足以反證其中必定有部分不足外人道之處。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日，他搭船經過美國，拜訪了那裡的天主教會，在八月十七日返抵北平。這時剛恆毅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在美國時他開刀割除了左腋下的一個腫瘤。從美國回到北京後，右腿又生了兩個腫瘤，割除後又罹患靜脈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開始臥病，至一九三三年一月

<sup>64</sup> 同前，頁二五一。

<sup>65</sup> 同前，頁二七一～二七二。

仍未好轉，於是向教廷申請返國休養。二月一日，剛恆毅艱難的離開北京，到上海後又臥床不起，二月九日被抬上返歐的郵輪，他當時設想離開或許是暫時的，但實際上剛恆毅結束了駐華宗座代表的工作。

## 第二節 蔡寧時期

### 一、空窗期

當剛恆毅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離開時，他並沒打算一定不回中國，因此由這段時間到他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向教宗請辭，以迄一九三四年三月新任駐華宗座代表抵香港時為止，實際上在中國是沒有宗座代表的。由於很難明確劃分這段時間屬於那一任宗座代表，因此稱之為空窗期。

首先是剛恆毅在華的最後一段時間，上海市商會發了一個電文給蔣委員長，申說中梵之間應推動通使事宜，理由是：「……舊教教徒散在全球數尚億萬，當此日人專橫驕武，宰割東北之際，倘能得一無政治色彩之有力宗教團體，為我主持公道、仗義執言，雖未必遽有折衝之實效，而亦足以為精神上之聲援。是以我國顏代表惠慶，聞亦曾有請求教廷援助之議。此在外交雖屬旁著，要於國家有益無損。如能即由我國駐義公使兼充此任，則每年所增外交用費，數亦有限。……」<sup>66</sup>

66 〈抄上海市商會電〉，〈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八十四。

上海商會中最關心中梵外交者為陸伯鴻，此封電文疑係其以上海商會名義向蔣委員長發出。在這封電文發出後未久，駐義使館又安排「中華民國考察實業專使」孔祥熙晉見教宗。孔祥熙在一九三一年辭卸工商部長職務，一九三二年蔣委員長即派其擔任此專使；背景是日本侵華日烈，必須在進一步的衝突前，加強中國的國防準備，或許是購買軍火，或許是成立新式軍隊。而所謂考察實業，其實是避免日方疑心的障眼法。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孔祥熙在梵蒂岡晉見了教宗庇護十一世，擔任翻譯者為于斌。根據《聖教雜誌》一九三三年第四期所載，教宗曾好奇的問孔祥熙來歐考察實業之主要宗旨為何？孔祥熙的回答是各國實業的興辦。雙方交談的重心是農業問題及農民生活。<sup>67</sup>不過雙方共談了三刻鐘，應該不僅是針對中國農業交換意見而已。孔祥熙當然也不是來和教宗談軍事合作的，教廷亦無實業可考察，那他去見教宗只有一種可能，他實際上是呼應了上海市商會的意見，與教廷建立非官方的外交聯繫。這次的拜會也不屬於外交部安排的制式活動，而是由蔣中正直接推動指揮，屬於對教廷外交的另一種管道。

然後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以上海北平的教友為主，中國教友們第一次組織了一個聖年朝聖團。在六月七日這天他們晉見教宗，呈現了許多中國式的精美禮品，教宗最欣賞的是兩面巨型的中國公進會旗幟，教宗並決定將其中具有象徵意義的一些禮物收藏於其博物館中。他在致詞中特別祝福中國公教進行會，最後說：「教宗，基督的代表，靈魂的善牧，愛中國，為中國以及全體中國人

67 (建國初期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國大陸參考資料)第四冊(美國加州：中文學者圖書公司編輯，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頁七一五～七一六。

民祈禱。<sup>68</sup>」

在接見中國朝聖團的同一天，教宗接見了五位將祝聖的本地主教，其中包括三位中國籍主教：綏遠集寧代牧區樊安恒、河北永年代牧區崔守恒以及四川叙府代牧區的李瑪竇。六月十一日，教宗親自祝聖了這五位主教，由傳信部秘書長及剛恆毅擔任襄禮，這代表了教宗對剛恆毅工作的肯定，也再次表現了他對中國教會的關懷。

安排中國朝聖團及陪同他們行動最主要的人物是于斌。這位東北吉林代牧區送往羅馬傳信大學念書的修生，在一九二八年晉鐸，以後擔任傳信大學的中文教授，以及梵蒂岡圖書館中文圖書的管員。于斌高大英俊，儀表堂堂，語言流利，早就引起了教廷外交界的注意，一九二九年，曾任教宗派往阿比西尼亞使節團之一員，國務院長柏徹里樞機曾詢問他是否有意擔任教廷外交官，于斌雖具外交官之長才，但主要心願是為中國教會服務。於是在中國朝聖團離開歐洲後，教廷就任命了于斌擔任中華公教進行會總監督，相中于斌的正是剛恆毅。<sup>69</sup>于斌的另一個身份是宗座代表公署的中文秘書。

于斌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離開羅馬，當晚在火車月台上，駐義大使劉文島、使館秘書朱英、剛恆毅總主教均來相送，剛恆毅沒告訴于斌他已辭駐華宗座代表的職務。十二月四日，教廷宣佈剛恆毅辭職的消息，並決定由蔡寧接任第二任宗座駐華代表。

68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下，頁四四四。

69 〈中華全國公教進行會統計冊，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北平：中華公教進行會總監督處出版），頁二十。

## 二、偽滿問題（一）

在日本侵華的過程中，剛恆毅支持中國的立場是很明確的，一九三二年四月，國聯的李頓調查團來華調查，在四月十四日的歡迎會中，張學良希望剛恆毅在義籍代表前為中國說話，剛恆毅答覆說：「我們（按：指教廷）對世界上所有紛爭不加干涉，對中國的內政與外交同樣也不過問，但如果調查團問我，我將以維護真理、公義與和平發言。……我也喜愛和平，贊成你們消極抵抗日軍侵略；我為此也遭受多人批評。<sup>70</sup>」

不過在日本已實際控制東北的情況下，東北教會與關內教會的聯繫已經中斷，日本所控制的偽滿政府也不容許駐華宗座代表對東北教會發號施令；按照教廷的說法，在此情況下，教廷任命了吉林代牧區的高德惠主教，擔任聖座及傳教區派往滿洲國政府交涉的代表。有關這個派遣是由傳信部委託，而非國務院；因此其性質限於宗教事務而非外交關係。<sup>71</sup>

不過這樣的說辭有待商榷，教廷與一般世俗國家間建立外交關係的目的，主要就是處理宗教事務；為教廷而言，在本質上，所謂的外交關係與宗教事務，是不能明確劃分的。不過至少在形式上，教廷注意到了這件事情的敏感性，因此高德惠的身份，甚至不算是由傳信部派出的宗座代表（Delegate Apostolic），他只是吉林代牧區主教，被教廷賦予與滿洲國政府交涉的權力。不過偽滿

70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下，頁三五九。

71 Jean Charbonnier, *Did the Vatican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Manchukuo?* - 〈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一九九。

政府當然會設法增加此事的政治層次，將之擴大為教廷對偽滿政府的承認，於是《滿洲公教月刊》將教廷的委任書發表，其文如下：「羅馬教皇將滿洲帝國領土內之天主教會，所有各教區長代表名義，委託於吉林及新京之教皇代理高主教奧斯定閣下，以辦理關於在帝國天主教教會之關係事項，得與滿洲國政府交涉。吾天主教會，無論在任何國家傳教，對於其國民之幸福，則絕不能付於等閒者，已屬周知之事實，故羅馬教皇廷，常使其傳統忠實之代表，以使之將關於天主教會所有的問題得與既成之國家交涉耳。」<sup>72</sup>

在以後的歷史公案中，中國共產黨政府認為這是教廷承認偽滿洲國的證據。顧衛民教授在其《中國與羅馬教廷關係史略》一書中說：「由此，羅馬教廷在日本之後，第一個承認偽滿洲國。<sup>73</sup>」他是引用顧裕祿教授所編《梵蒂岡對華政策資料百則》中所撰寫的意見。有關此點教廷當然也可以從另一面振振有詞的否認，畢竟教廷從未發表外交文書承認滿洲國，也未派遣任何正式的使節駐長春，甚至沒有派非正式的宗座代表，只是一個當地的主教，被賦予與當地政府交涉的權力而已。

如果比較這篇委託書和教宗「八一通電」的內容，可以問一個問題：如果教宗的八一通電代表教廷承認國民政府，那為什麼有相似內容的這篇委任書就不算？必須理解，一九二八年前的中國是內戰狀態，除了駐紮在北京的使節團之外，駐各地的各國領事，往往必須與反對北京的地方勢力交涉。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國民政府已實際控制中國的大部分地區，教廷用比較審慎的態度表示承認，是不願過於明顯表現出與列強相左的立場，隨後列強也隨之跟進。一九三四年的滿洲國，在國

<sup>72</sup> 《建國初期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國大陸參考資料》第四冊，頁七二〇。

<sup>73</sup> 顧衛民，《中國與羅馬教廷關係史略》，頁一六五。

聯調查團的壓力下，是不太被看好會被國際承認的，教廷的舉動並不具有某種政治投資的意涵。然後剛恆毅雖無正式使節身份，但那是因教廷顧及法國可能反映所做的權宜之計，他實際上是正式由教廷派往中國的代表，這與教廷在滿洲國內選擇一位主教有權與滿洲國政府交涉並不相同。

其實爭論教廷是否承認偽滿洲國並無太大意義，因為所謂的承認或不承認，是一般國與國外交的問題，教廷外交則以宗教問題為主，對教廷而言她在滿洲境內並無一般的世俗利益，她最主要關心的是當地的天主教會。而東北的天主教會，不可避免的必須與控制當地的政府發生關係，而這就是指派高德惠擔任代表負責交涉的最主要理由。不過在現實的外交戰場中，教廷外交缺乏實質的後盾，因此她也必須考慮外交的主要潮流，不能悖離太遠。衡量這兩者，教廷在滿洲國問題上，採取的是一種模糊的立場，而且是蓄意的模糊，好留下最大的彈性和解釋空間。

迫使東北教會當局必須與偽滿政府立即接觸的原因是教會學校的問題。由於偽滿政府宣傳以「王道」治國，因此在學校中心必須實施敬孔祭祖之儀式。有關這個問題，在一七〇四年，一七一四年及一七四二年，教宗均曾下令禁止。但若東北的教會學校不同意實施敬孔祭祖儀式，政府將下令關閉。高德惠無法處理此問題，於是緊急要求教廷遣派代表來處理，教廷拒絕了他的要求，反而命他擔任聖座的代表處理這個禮儀問題，於是才有一九三四年三月的部令。<sup>74</sup>經過高德惠與偽滿官員交涉，得到明確的答覆，稱在學校中實施的敬孔儀式，純粹是表示尊敬之意，不具有宗教性質

<sup>74</sup> Jean Charbonnier, *Did the Vatican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Manchukuo?*, 《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二〇〇。

後，教廷機關報《羅馬觀察報》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刊登了教廷批准在滿洲實施社會性敬孔祭祖儀式的消息，<sup>75</sup>解除了東北教會學校的關門危機。

### 三、蔡寧抵華

蔡寧，一八九〇年生於義大利北部白魯諾（Belluno）省，一九一三年晉鐸，在一九二六年前一直在教區服務，一九二六年調至傳信部，任傳信善會出版處主任。一九三〇年，陞任聖伯鐸善會秘書長，加蒙席銜。該職係主管協助培植本地聖職人員，與當時傳信部次長撒洛提（Carl Salotti）總主教因此相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當剛恆毅決定辭職時，遂被舉薦為第二任宗座駐華代表。<sup>76</sup>他的純宗教及慈善的經歷，可能也是在剛恆毅飽受法義等國抨擊參與政治時，得以被選擇出線的原因。

蔡寧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由傳信部長畢翁地（Fumasoni Biondi）樞機祝聖為總主教。他和剛恆毅請教了一些在中國的事務後，<sup>77</sup>於三月六日從羅馬出發。他在三月三十一日抵達香港，在香港停留了一個多月，五月八日抵達上海。這段時間正是傳信部委託高德惠處理東北與滿洲國政府交涉事宜的時間，似乎蔡寧的行程故意延誤，以避開這個尷尬不便的時期。

<sup>75</sup> 同前，頁二〇六。

<sup>76</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二二二。

<sup>77</sup>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零落孤葉〉中，有一篇署名〈給一位宗座代表的忠告〉，日期為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應為給蔡寧的。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蔡寧先拜會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再由秘書安童儀蒙席、南京宗座代牧惠濟良主教、海門宗座代牧朱開敏主教、陸伯鴻及南京總鐸張運之神父陪同，晉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林森接見時，其禮儀一如正式公使呈遞國書禮，外交部次長徐謨、國府文官長魏懷、參軍呂超分東西侍立，蔡總主教三鞠躬後致詞，其文如下：

「大主席閣下：鄙人此次奉羅馬教皇庇護第十一世特派為駐華宗座代表，前來親見大中華民國政府主席，不勝榮幸之至。謹代宗座恭祝貴主席政躬康健，國運亨榮。鄙人此次親見，亦願代表中華全國天主教會，以及一百二十教區，將一切慈善文化工作，宗教道德，與夫精神上之努力，一併謹呈於貴主席之前。宗座對於貴國之一切國是，極為繫念。貴國天主教會亦切實為本國之和平，之榮華，及全國之進步，竭力工作。……」<sup>78</sup>

林主席致答詞，由翻譯員讀法文譯文。詞云：

「代表閣下：貴總主教今日以教廷代表資格，向本主席申達教皇對中華民國，及其人民所懷盛意，聞之無任忻慰。本主席茲代表中國人民請貴總主教轉陳本國人士，希望教皇政躬康泰，及教廷繁盛之誠意。」

中國與公教之關係，具有悠久之歷史。公教教會人士，遠在中國與各國樹立正式關係之前，已航海東渡，為外人來華之先驅。元代介紹中國文化於泰西者，固係一公教人士。明朝最初予中國人民以西方科學藝術之智識者，亦係一公教教士。公教教會，對於中國和平進步繁榮之貢獻，本主席深表感

78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二三三。

荷。本國政府，仍將廉價保護公教機關之安寧，以利其有益之事業，固無庸贅述者也。……79」

蔡寧這種被國民政府接待的規格，其實是完全與一般使節同等的，所以仍用宗座代表頭銜，主要還是法國的壓力，前任宗座剛恆毅屢次遭受抨擊，主要理由就是認為他超過了宗座代表的界限，實質上已等同於正式使節；國府之接見禮儀，亦在對這種實質關係之肯定也。不過蔡寧之做法較剛恆毅審慎，似乎是要避免引發與法國之間的衝突。

蔡寧來華之首要工作是健全「公教進行會」的組織；公教進行會的概念很單純，只是將傳福音的責任，有組織的放在教友身上。這個概念出現在十九世紀末，逐漸在歐洲普及，而庇護十一世推動尤力。公進會的概念雖然單純，但在義大利，被法西斯黨視為教宗組織群眾與之對抗。在中國的涵意則成了組織中國教友與外籍傳教士對抗。剛恆毅不願這種過度的聯想，積極組織，他回歐洲時念茲在茲的即為此事，蔡寧在抵香港後，也立即宣佈他要繼續推動公進會的工作。<sup>80</sup>

實際上，在蔡寧抵華五個月前，公進會的總監督于斌已以宗座代表公署為基地，在各教區刮起成立公進會的旋風。公教進行會最引人注目的大事是一九三五年九月八日在上海召開的「公教進行會全國教區代表大會」，出席的指導神父、各分會代表共計千人以上，假正修中學為大會會場，會期八天，每天早晨分別在各聖堂舉行彌撒、講道，然後再到大會會場開大會，宣讀論文，下午再分

79 同前，頁二三四。

80 顧衛民，〈中國與羅馬教廷關係史略〉，頁一五六。

別開各小組會議。<sup>81</sup> 會議中國府主席林森致函蔡寧，恭祝大會順利。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並來參加閉幕禮，可見這個宗教活動其效果不僅在宗教上而已。在公教進行會的學術性刊物《新北辰》中可以看到，除了一般性的學術性文章外，中華公教進行會特別注意到愛國及反共的主張，總監督于斌在他往各教區宣傳公教進行會時也屢屢提及。<sup>82</sup> 基於愛國及反共的理念，蔡寧經常對國民政府表達善意，在他第一次視察各地教區時，他曾對記者表示：「所到之處，承中國官兵竭誠接待，極為感謝，且益增本人愛護中國堅決信念。：中國政府係提倡全民合作，與羅馬教廷政見相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以完成此項使命云。」在一九三六年蔡寧亦公開讚揚國民政府剿共的成就，在這一年也由公教進行會發動教友募五萬元，獻救護飛機兩架，參與為蔣委員長祝壽的活動。<sup>83</sup> 可以看出此時期蔡寧與國民政府關係的良好。

#### 四、抗戰初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對日抗戰開始，未久北平陷落。其時蔡寧正在西北巡視教務，乃轉向漢口。十一月三十日，蔡寧發出公函，敦促各代牧區主教，應要求其所屬加強慈善救濟工作。依據公函，各

<sup>81</sup> 牛若望，〈于斌總主教與公教進行會〉，《恆毅月刊》十一卷二期，頁十四。

<sup>82</sup> 《新北辰》三卷一期，有多篇文章與愛國或國家觀念有關，三卷六期可說是反共專刊，在〈于斌主教公進言論集〉中也屢次提到教友愛國。

<sup>83</sup> 《我存雜誌》一九三五年第一期第六十六頁，〈磐石雜誌〉一九三六年第六期第四五二頁，皆錄自《建國初期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國大陸參考資料》第四冊，頁七一七。

地的教會醫院多改為傷兵醫院，上海、南京、漢口、杭州、長沙等地的天主堂，亦負擔收容難民的工作。<sup>84</sup> 然後又發公函，命全中國公教教堂，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八日，舉行追悼陣亡將士彌撒。蔡寧亦在漢口舉行，蔣委員長派代表參禮，並函蔡寧致謝，其中部分內容如下：「中華公教人士，得貴代表之指導，早已致力於慈善教育事業。茲當多數將士，保衛祖國，為國捐軀，而無數無辜民衆，因敵人之侵略，墮於水火之中。貴代表慈善為懷，舉行祈禱，以隆重典禮，追悼亡者，為生者求和平，是誠合理之義舉；且以示公教之仁愛，吾人將念之不忘也。本委以軍事倥傯，不獲抽身親與追思大典，深引為憾，惋惜不置。……」<sup>85</sup>

日軍在其華北佔領區中，邀請日籍神父數人，派往華北各地，負責與教會當局聯繫。代表公署之參贊高彌肅蒙席，命令日本司鐸返回日本，免招是非。至此時為止，蔡寧都表現了堅定支持國民政府之立場。

在此同時于斌被蔣委員長徵召，從事國民外交的工作。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由蔡寧主禮，在北平的救世主大堂，年僅三十五歲的于斌被祝聖為南京代牧區的主教。這位年輕的中國主教鶴立雞群，風采不凡，是一個極易受到注意的對象。他的愛國反共言論，也讓政府官員認識而尊重他；而歐美人士對主教的基本尊重，教會組織所形成的社會網路，更是一般中國人難以碰觸的。而他在擔任南京主教後，與國府高層的互動增加，他愛國的言論及行動，使得蔣介石對他另眼相看，稱

<sup>84</sup> 顧衛民，〈中國與羅馬教廷關係史略〉，頁一七二。

<sup>85</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二三五。

于斌為「我們的主教」。<sup>86</sup>這或許是他膺命遊說各國的主因。當時負同樣使命者有胡適、蔣百里等人。

蔣百里係往德、義宣傳抗日，在羅馬時與時任傳信部秘書長的剛恆毅會面，剛恆毅對他們說：「于主教為國家作政治奔走，在教會本來是不許可的，一則因為他是東北人，他為家鄉淪陷而奔走，我們是同情他的，再則天主教會是鼓勵人愛國的，所以我們為他愛國的行動是許可的。」<sup>87</sup>如果果不是別人有意見，其實于斌的行動也不會被討論說許可不許可，由剛恆毅的話可看出，教會內有大部分的人對他的行動並不表贊同。不過教宗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岡道爾夫行宮接見了于斌，代表了對於斌愛國行動的祝福。<sup>88</sup>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經驗，于斌在一九三九年一月第二次赴歐美進行國民外交，他對記者描述了第二次晉見教宗庇護十一世的過程。「我在正月十八日曾謁謁教皇，他那藹然可親的態度給我印象極深，我除代表中國教友叩問教皇的聖躬健康外，還奉有政府委託，呈遞了一封公函，中國政府對天主教在戰區內所辦的救濟事業，及各籍教士收容老少婦孺的熱誠，特向教皇深致謝意；教皇對政府的這種表示亦甚感動，並給從事救護的熱心善士們加以特別祝福。隨後他又贈給我幾張畫片，上提有「基督的和平實現於基督國內」一段標語。教皇附帶著說：「這就是我的祝福，並願它及早實

<sup>86</sup> 雷震遠，〈于斌總主教小史〉（越南堤岸：越南自由太平洋協會，一九五九年五月出版），頁十。

<sup>87</sup> 蔣復璁，〈于故樞機對天主教及國家的貢獻〉，〈于斌樞機紀念文集〉（台北：康寧雜誌社，民國七十年八月），頁四十。

<sup>88</sup> 于斌，〈公教愛國論〉，〈于斌主教抗戰言論集〉（香港：真理學會，一九三九年六月），頁四十五。

現。」<sup>89</sup>]

其實在這兩次晉見時，庇護十一世均未提及支持中國對抗日本，僅係做一種普遍性的反戰表示；但這接見動作本身，其實就表現了他支持中國之意。于斌在離開羅馬後，搭輪船赴美，二月十日抵達紐約，二月十三日就傳來庇護十一世去世的消息。「中國教宗」去世了！

### 五、偽滿問題（二）

教廷避免在世俗外交中選邊站，這也是教廷外交之重要原則。在此原則下，教廷唯一的利益就是各國家或地區的教友，因此對現實政治，往往抱持接受現狀的態度。在中日戰爭中，教宗第一關心者是中、日及東北之教友，雖然明知偽滿洲國不為國際所承認，但他們所關切者則是在此一事實存在的政府與教會間，建立某些聯繫，以保持東北教會、日本教會乃至日本佔領區內的中國教會的最大自由。

基於上述的概念，教宗於一九三八年九月十日在行宮岡道爾夫堡，接見了由偽滿洲國外交部長韓雲階率領的特使團。在岡道爾夫堡接見，其實即表示是一種非正式的活動，就如于斌主教來見一樣。不過教廷並未否認這是一個特使團，然後庇護十一世也在十月初函覆滿洲國皇帝溥儀：「借此良機，對信仰天主教的信友和教會機構，於滿洲帝國內享有合法自由，向陛下表示我人誠摯的感謝。由此，陛下亦可深信——在其他方面亦很明顯地顯出——關於愛國和尊敬國家權力，天主教友

<sup>89</sup> 于斌，〈對法國十字報記者談話〉，〈于斌主教抗戰言論集〉，頁一二四。

是不甘落在人後的。<sup>90</sup>」

國民政府在當時並未對偽滿洲國在教廷的活動有太多著墨，偽滿洲國代表團的活動是公開的，所以駐義大利的外交人員應該曉得其活動，但似乎並不構成國民政府與教廷間的齟齬；按照沙百里（Jean Charbonnier）神父的意見，庇護十一世接見特使團，以及覆函溥儀只是一種禮貌的行為；庇護十二世上任後予溥儀的信函亦具有此種性質。<sup>91</sup>沙百里神父認為，教廷真正的態度，是教宗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接見已任傳信部秘書長的剛恆毅時所說的：「我們沒有給高德惠主教什麼特別的委託，足以使日本認為教宗立即承認了這個東北中國的新政權。<sup>92</sup>」

不過這也可能只是教廷面對世俗政權更迭的模糊外交的範例。當偽滿洲國藉特使團訪問宣傳與教廷的關係時，教廷並未否認。偽滿洲國政府領授勳章給高德惠，邀請他參加各種典禮、宴會時，教廷也未訓令高德惠不得參加。因此在滿洲國乃至日本方面，當然也可以有一些擴張解釋。

外交可以採取模糊的策略，但有關宗教的原則，則沒有模糊的餘地。既然在東北可以實施祭祖敬孔的儀式，那在日本的國家禮儀——神社敬禮，以及最根本的關於在全中國祭祖敬孔的儀式，應該如何一體加以看待？一九三五年十月，剛恆毅在此等事上已有了明確的原則。他說：「在這思想和社會組織起了驚人的改革時，如果關於某些行動，本來無關緊要的，有了政府當局一個正式的聲

<sup>90</sup> 顧衛民，〈中國與羅馬教廷關係史略〉，頁一六六—一六七。

<sup>91</sup> Jean Charbonnier, *Did the Vatican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kuo?*, 〈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二〇七。

<sup>92</sup> 同前。

名，宣佈這些行動純然是屬於民間的非宗教的儀式，那們我們就不當堅持那些都是久成習俗的觀念，以及宗教殘餘的行動。<sup>93</sup>」當時剛恆毅尚未接任傳信部的秘書長。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剛恆毅接任傳信部秘書長後，即以此種原則處理日本的神社敬禮及私人的喪葬禮儀。「那些經常在由政府主管的神社紀念堂裡舉行的儀式，已由政府當局（如已多次明白的聲言所示），以及一般的知識份子，認為純係愛國的表示，……所以天主教徒可以參加。……必要時，聲明自己的用意，以免曲解了他們的行動。」「……也可以准許信徒們，在參加喪葬、結婚，以及其他在日本的社會生活裡，……參加所有那些儀式，雖然它們起源於迷信，可是由於人地方面的種種情形，以及現在一般人的看法，不復含有迷信的意義，而只表示禮貌與友愛。<sup>94</sup>」

有關中國的禮儀問題，是上述問題的根本與來源，而東北及日本問題的解決，可說為中國禮儀問題的解決奠定了基礎。因此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八日，教廷傳信部發佈命令，將以往禁行中國禮儀的命令，加以廢除，全文如下：

「傳信部關於中國禮儀的有關儀式與宣誓的指令

眾所周知，東方國家的一些禮儀，儘管在早期與異教的禮儀有關，但歲月流逝，隨著風俗和思想的變遷，應被僅僅視為對先人、對愛國主義，或者對其同胞的尊敬的一種民間性敬奉的表示。

因此之故，傳信部經教宗庇護十一世同意，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公布了關於此項事宜的標

93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零落孤葉》，頁一七四。

94 同前，頁一九七—一九八。



準。根據天主教法典第二十二條，這些新標準已經發布給滿洲和日本的各教區長，這些標準與當今的形勢是相適應的。

最近，負責傳信部工作的樞機們，於本年十一月四日召開大會，考慮是否在其他地區，由於時間的流逝也會發生的同樣的明顯的情勢變化，也應支持（贊同）同樣的行動。

在仔細聽取了贊成和反對意見以及謹慎和經驗豐富人士的想法以後，樞機們決定作出如下申明：

(1) 中國政府已經反覆地和公開地說明：所有的人有自由選擇他們願意信奉的宗教。政府無意在宗教問題上發布法律和命令。因此，公共當局任何表演的或規定的尊孔儀式的履行，都不含有宗教崇拜的性質，而是為了這樣的目的：即培養和表達對一位著名的偉大人物的適當的崇敬以及對祖先的傳統應有的尊重。由此，天主教徒可以在孔子的肖像和牌位前，為敬奉他而造成的建築物裡或學校裡，出席尊孔的儀式。

(2) 在當局要求這樣做的情況下，天主教學校懸掛孔子肖像，甚至樹立刻有他名字的牌位，或者鞠躬致敬，都不應禁止。如果有壞表樣，應當明確地表明正確的天主教意願。

(3) 如果信天主教的教師和學生被命令出席帶有迷信表徵的公共禮儀，根據法典一二五八條款的指示，只要他們保持消極的態度，就可以參加。他們所做出的尊崇應被視為僅僅是民間性。有時，出於避免對其行為的錯誤解釋的需要，他們應該陳述上面的話，使他們的意向昭著於世。

(4) 在亡者或其畫像前，甚至在刻有亡者姓名而別無其他內容牌位前，鞠躬或行其他民間性的敬禮，都應該被認為允許的和適當的。

除此以外，樞機們也看到：根據一七四二年七月憲章（*Constitution, Exquo Singulari*）做出的有關中國禮儀的宣誓，曾經對在中華帝國以及接壤的或鄰近王國或省份的傳教士都有約束，已經不再適用於傳信部在最近做出的決定。他們看到，宣誓做為一種紀律的工具，已經不再需要了。所有的人都

明白從前關於中國禮儀的爭論已經結束了。更有甚者，傳教士和其他司鐸已經不再需要由宣誓來強迫他們效忠聖座。為此，不論在中國或其他地方，他們決心要免除仍帶有強制性的宣誓所規定的義務。就最近的部令給他們帶來的變化程度而言，教宗本篤第十四所做的另外一些指令仍未解除，尤其是嚴禁關於中國禮儀的爭論。

在十一月七日的親見中，在下面簽名的傳信部部長樞機，將樞機們討論以後做出的決定提交教宗庇護十二世陛下。陛下屈尊同意並且完全批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 發自傳信部大廳 羅馬，聖母無罪始胎節

傳信部部長畢翁弟樞機

傳信部秘書長剛恆毅<sup>95</sup>

## 六、蔡寧立場的變化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蔡寧自北平發表了一封公函，一般稱之為「勿左勿右」公函。其文如下：

「致最可敬的中國主教  
最可敬的主教：

我信而堅持，負有神聖職務之人中，無一人對於政治願有絲毫之參與，一如教會訓令所嚴禁者。

在目前危險的時局下，是項禁令更極需遵守。因此，請各位可敬的主教鄭重告誡屬下司鐸，常以

<sup>95</sup> 顧衛民編，《中國天主教編年史》，頁五〇七、五〇八。

明智和忍耐，埋頭於神聖事務，不偏右，不偏左，即表面上的行動也當避免。因為，目前最可怕的事例教訓我們，這些行動能給人以攻擊教會住院的報復藉口，尤其在農村地區。

迫切而又迫切地請你們囑咐並注意遵守聖教法典和中國第一次公會議關於這些問題所規定的事項。

在順境和逆境，都要小心翼翼，警惕機靈，對魯莽輕率以致行為不慎的不明智者，應加以訓斥。事關傳教區生命，不要因個人的不明智而貽害整個團體！只有一視同仁的愛德，才能獲生獲

救！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蔡寧<sup>96</sup>」

這份公函引起了國民政府的不悅，認為蔡寧改變了支持國民政府的立場。不過蔡寧也可以說這是教廷的一貫立場，因為在第一任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的公函中也有類似的詞句，例如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在南北內戰的局勢中，剛恆毅在公函中說：「我非常高興讚頌我們的傳教區，遠離了政治的事務，在極其混亂中，極其艱苦中，共同堅持不斷祈禱、傳道、舉辦慈善事業。……」在一九二七年更嚴重的混亂時，剛恆毅在四月二十五日勉勵各地的主教：「動蕩的時期一過，教友與教外人士更清楚地了解事實的真象，看到我們從事的每件事，如聖保祿所說，天主的使者所為的，堅決地忍受了痛楚，我們成了真誠的朋友，不侵犯中國人的合法權利，避免捲入政治的漩渦，以言論及行動，有效地促成中國的復興、和平、進步。」在同一年剛恆毅更進一步地命令：「沒有主教

<sup>96</sup> 顧衛民，〈中國與羅馬教廷關係史略〉，頁一七二。

許可，為反對任何人，不得向地方軍政權力求援。」「禁止傳教士在報章撰寫有關政治文章。<sup>97</sup>」而這些立場是根據夫至大通牒及一九二〇年的傳信部部令，立場並無不妥。甚至在一九二八年的八一通電，原則也是「服從合法的政府」，意即一實際已能控制大局的政府，至於是那一方政府，教廷並無定見。

以此觀之，日軍在一九三九年已控制華北、華中大部分地區，華北已有其扶植的偽政權，而國民黨的第二號人物汪兆銘也離開重慶，逃往河內，有與日本和談之意。在此情況下，遷往重慶的國民政府能代表中國嗎？在這時候抱持著不捲入交戰雙方的態度又有什麼錯？這可能是蔡寧發出此公函時的想法。

無論如何，重慶國民政府的領導者蔣委員長注意到了這個公函，訓令才去羅馬參加庇護十二世就任大典的我駐法大使顧維鈞，向教廷駐法大使提出抗議。顧維鈞請問隱居比利時本篤會的陸徵祥，陸徵祥並與顧維鈞商量說帖內容：原本陸徵祥擬了一個較直接之說帖，但見了蔡寧公函原文後，同意顧維鈞採用原外交部較禮貌之說帖。<sup>98</sup>在說帖送出後，教廷以未接到蔡寧公函，不知內容為何，答覆顧維鈞；實際上教廷應該已經注意到此事引發的效應，於是訓令蔡寧向國民政府解釋。蔡寧在一九三九年年底，或一九四〇年年初時，以巡視教務之名，由安南進入雲南，赴四川抵達重

97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上，頁二九三、三九四、三九五、三九七。

98 羅光，《訪問陸徵祥神父日記》，《傳記文學》十九卷第五期，頁八十三。

慶，在于斌的陪同下往見政府要人，然後再經由西北返回北平。<sup>99</sup>

回到北平以後的蔡寧，非常忠實的執行自己「勿左勿右」的政策，除了教會事務外，他幾乎謝絕了與日本佔領軍及華北偽政府的往來。一九四〇年三月，汪精衛偽政權也在南京成立，汪偽政府欲爭取國際支持，屢次透過日本及義大利政府向教廷施加壓力，希望蔡寧能改駐南京。針對這個問題，當時香港的宗座代牧恩理覺（Henry Valora）主教回了一封信給于斌：「我相信對蔡寧主教是不可能（意指身體上的不可能）離開北京，我覺得迄今為止，他在拒絕與日本政權的官方接觸上，他一直做的很成功。<sup>100</sup>」前面的一封信是于斌在七月二十二日發給恩理覺的。于斌是幫國民政府發這封信，然後請恩理覺轉達予教廷；恩理覺在探過教廷意向後，再以個人名義向于斌表示，實際上是讓重慶國民政府曉得教廷對蔡寧的定位。直至對日抗戰結束，蔡寧就一直在北平宗座代表公署堅守崗位，專注於輔大之司鐸書院。教廷與中國間的往來，基本上此後蔡寧已成配角。

<sup>99</sup> 關於蔡寧訪問重慶的時間無法確定，不過于斌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底自美返抵重慶，一九四〇年五月至貴州、湖南勞軍，蔡寧一九四〇年六月在北平召開教務會議，故其赴重慶時間應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四〇年四月之間。

<sup>100</sup> *Letter of Mgr. Henry Valora to Mgr. Paul Yu-Pin, July 28, 1941.*

## 第四章 中梵外交關係的建立與發展

(一九四二年—一九五〇年)

### 第一節 通使交涉與單方通使時期

#### 一、于斌主教推動中梵建交換使

從民國初年開始，主要推動中梵建交的人物是陸徵祥。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是他在主持外交時期親自推動，以後他進入比利時本篤會隱修，仍不時致函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及相關人員，推動通使事宜。他的文章及發言甚至引發了法國政府的嫉視，發動輿論，點名他是未來中華民國駐教廷的使節。他的確具有足夠的輩份及名望，雖在靜院之中，但一舉一動都引人注意，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他晉升為神父，由傳信部秘書長剛恆毅舉行祝聖儀式，駐俄大使顏惠慶、駐荷公使金問泗、駐西班牙公使錢泰都來參加，駐比代辦李向憲為中國政府代表。更別提前後任政府首長、外交部長、教會人士送的匾額、對聯、屏條、畫幅等等。<sup>1</sup> 不管從這些批評或是祝賀的行為，都可看出

<sup>1</sup> 羅光，〈陸徵祥傳〉（香港：真理學會，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版），頁二〇七。

陸徵祥的影響力不容小視。

雖說如此，畢竟陸徵祥是隱修之人，幾乎不離開隱修之處，在教廷的人際關係中，除了擔任傳信部秘書長的剛恆毅，他和其他的教廷官員並無深交。隨著時間流逝，他在中華民國外交部中的影響力也日益減少；他受人尊重，但這些人不一定會聽他的意見。

于斌在這種環境中，逐漸的取代了陸徵祥的角色。和陸徵祥相較，他在羅馬有有效的人際關係，庇護十一世在他還是修士時就認得他，晉鐸後屢次擔任中國來訪者晉見教宗時的翻譯，還派他擔任往阿比西尼亞使團的隨員。前後任國務卿加斯巴力樞機及柏徹里樞機都賞識他，和剛恆毅的關係更不必說，是剛恆毅推薦他擔任公教進行會總監督。而隨著時間的發展，他的老師、同學、教廷生活圈的朋友逐漸躋身高位，他可以運用的關係就更多了。而在國民政府方面，蔣中正派他擔任國民外交工作，就代表蔣中正對他的信任；他在對日抗戰期間曾四度赴歐美遊說，如果不是著有功績，確有成效，蔣中正也不會如此倚重他。而在這個不斷來往過程中，他和蔣中正夫婦建立了深厚友誼，也和國府大員、社會名流常有往來。不過他代表的是蔣中正的外交管道，和規矩森嚴的外交部則不一定相合。

一九三七年年底于斌第一次從事國民外交工作時，就曾電詢國民政府方面，探詢派遣使節駐教廷的可能性。于斌在離開南京前，曾和外交部人員有所接觸，對於和教廷建交事，當時應是獲有肯定答案。到了教廷後，探詢教廷外交人員意見，也獲得某些有力人士首肯，乃發電報回國，請派員洽談，但他得到的回覆是：「有關在教廷派駐公使的需要，已經知悉，但目前尚未得到決定的消

息。<sup>2</sup>」

外交的習慣性術語，延遲往往是否定答案的禮貌性說法。陸徵祥在一九三九年對此次接觸經驗的評語是：「前年于斌主教來歐，言政府有這種意思：（按：指通使事），可是于主教是第一次同政府人員辦事，不知道中國政府當面常說是，背後實不贊成。<sup>3</sup>」推究不贊成的原因，在於與教廷外交的重要性不如法國。在對日抗戰初期，爭取國際輿論同情，列強支持，為外交第一要務，在外交實務上，怎可能為了與教廷建交事，傷害法國可能的支持與同情？因此于斌僅為一廂情願的以國府外交官的禮貌性說法為真，沒有摸透他們的真實心理。

一九三九年二月，教宗庇護十一世去世，國務卿柏徹里樞機被選為教宗，用庇護十二世稱號。國民政府委駐法大使顧維鈞任特使，參加加冕典禮。三月十一日，顧維鈞抵羅馬。十二日參加加冕典禮，為東亞參禮的唯一特使，次日赴教廷國務院之酒會，然後正式覲見教宗，代表國民政府主席致賀。<sup>4</sup>基本上此時歐洲大局尚與一九三七年年底時類似，在國府外交官眼中，法國重要性仍是遠超於教廷的，於是這就成了陸徵祥再一次不成功的建議而已。

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爆發，教宗庇護十二世以其多年實際參與外交的經驗，積極在各國之中尋求和平，在一九三九年聖誕前夕提出和平五原則<sup>5</sup>，希望各國息爭解紛。在這種情況下，向來不與

2 某國民政府駐倫敦官員致于斌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3 羅光，〈訪問陸徵祥神父日記〉，《傳記文學》十九卷五期，頁八十三。

4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二四六。此事亦由羅光建議，陸徵祥請駐歐各使鼓吹。

5 *The Pope's Five Peace-Points, Catholic Truth*，卷期不詳。



教廷通使的美國，乃由羅斯福總統派出其私人代表泰勒（Myron C. Taylor）往教廷，與教廷共商和平方略。泰勒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七日晉見教宗，呈遞羅斯福總統親筆函。<sup>6</sup>此種方式既經國際報導，於是亦有人主張採取同樣方式，或由國府主席或蔣委員長遣派私人代表往教廷。<sup>7</sup>一九四〇年六月，德軍攻入巴黎，七月維琪政權成立，法國此時自顧不暇，或許是國民政府積極與教廷洽商此種方式的時機，並且應係透過駐義使館傳遞訊息。

關於此次的接觸，方豪在其〈「梵蒂岡一瞥」代序〉中言：「微聞教廷方面亦嘗表示：如國民政府派遣為世界謀和平之使節，則教廷自樂於接受。」<sup>8</sup>以方豪當時的人際關係觀察，他在此時期最可能得到教廷訊息的管道是于斌。因此于斌極有可能是推動此次通使嘗試的推手。雖然國民政府態度轉趨積極，但因時局變化，教廷態度反而趨於保守；從方豪所言內容，可能開始接觸時氣氛還算樂觀，某位教廷相關人士可能有正面表示，但最後結果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傳信部秘書長剛恆毅向中華民國駐義使館人員表示：「教廷極願與我訂約換使，惟目前國際緊張時期，不容有任何政治表示。」<sup>9</sup>剛恆毅應該就是在教廷內鼓吹通使的代表人物，而庇護十二世則是否決這個提案的人，因為此時教廷外交的掌舵者就是教宗本人。庇護十二世並非反對中梵建交，他的理由是「現在國際情勢緊張。」

<sup>6</sup> Pierre Blet S.J., *Pius XII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p.34.

<sup>7</sup> 方豪，〈「梵諦岡一瞥」代序〉，〈方豪六十自訂稿〉下（台北：台灣學生書局，一九六七年出版），頁二二三—二三六。  
<sup>8</sup> 同前。

<sup>9</sup> 〈對教廷派使來華外交部內意見〉，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一〇。

同樣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瑞士之法國通訊社突然傳出日本將派使駐梵蒂岡，教廷亦將以馬來拉 (Paolo Marella) 總主教為教廷駐日本特別代表。其實馬來拉總主教當時已是宗座駐日代表。在消息中並稱馬來拉總主教向教廷提供意見，稱教廷斡旋遠東和平之時機已至。梵蒂岡方面則聲稱馬來拉總主教之談話，純係其私人意見，不具官方性質。<sup>10</sup> 以此電文對照上段剛恆毅的談話，可以推測庇護十二世當時正在與日本交涉通使事宜，日本強而中國弱，庇護十二世之想法或許是先處理與日本通使事宜，再以相同原則處理與中國通使事宜；甚或有機會謀求中日間和談。此一和談必須透過歐美強國的合縱連橫，因此庇護十二世才會說「目前國際情勢緊張，不宜有任何政治表示。」

上述消息傳出後，在國民政府內部必然引起注意，與教廷建交的重要性及急迫性遂更被提升，因此有關建交的努力仍然持續進行，駐義使館的代辦徐道鄰是關鍵人物。他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致電重慶外交部：

「極密。十六號電敬悉。目前駐德桂參謀來義。曾間接向教廷方面表示。我方願派遣特使。或主席或委座私人代表駐教廷等語。頃對方答覆。願與鄰正式商談云云。似教廷始終無意正式（似脫漏派遣二字）使節，而不反對特使。此事應如何辦理。乞電示遵。職徐道鄰。」

附註：十六號去電——與教廷訂約換使事。以後隨時相機進行由。電報科謹註。」

六月十九日，在教廷協助中梵外交的羅光亦致電重慶外交部：「請譯轉于斌主教。教廷特使

<sup>10</sup> 方豪，〈「梵諦岡一瞥」代序〉，〈方豪六十自訂稿〉下，頁二二三—二三六。

事。現可接洽。希即懇 委座派徐代辦進行。羅光叩。」<sup>11</sup>

這是兩封有很多訊息的電報，首先有一封不知內容僅知大意的十六號去電，應該是在六月初自重慶發出，要求交涉與教廷間換約通使事；很快的徐道鄰即回覆，由駐德使館桂宗堯參謀進行；徐道鄰未直接進行的原因是教廷對義大利敏感的關係，不便由他國駐義使館人員出面。於是有一形式上「非正式」的溝通。徐道鄰對此次溝通的評語是：「似教廷始終無意正式使節，而不反對特使。」其實從談話內容中，是看不出這種意義的；因此徐道鄰的評估並非來自桂宗堯的談話，而是他已確知教廷態度，只是用比較不肯定的說法回報給國府外交部。兩天後，再由代表有其他接觸管道的羅光發出肯定訊息，以加強此事的可信度。羅光要求「譯轉于斌主教」，則是于斌為此事幕後策劃者之明證。

從這兩封電文推測，極有可能于斌已經過一些管道，得知教廷同意國民政府可以特使或蔣委員長私人代表方式，派駐教廷。於是于斌乃透過其對國府影響力，由外交部發電子徐道鄰；在此之前于斌早與徐道鄰有所聯繫，只待外交部電文寄到，徐道鄰立即請桂宗堯與教廷「非正式」晤面，這一已安排妥當的形式晤面後，徐道鄰立即將事先已有之結論呈報外交部，再由羅光加以補強，希望說服外交部能派特使或私人代表往教廷，然後一切交涉由徐道鄰處理。

沒有資料足以解釋為何特使或私人代表的進行沒有下文，既然教廷內部已有共識，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來自國府方面，可能外交部設定的目標是正式使節；因為若日本派駐教廷為正式使節，而我

<sup>11</sup> 《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八十四、八十五。

方為私人代表，則中國在外交戰中又輸了一著。于斌當時是國民參政員，他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二屆參政會第三次大會，提出「請外交當局注意與梵蒂岡進一步聯繫」案，以一百四十七票對二十一票通過<sup>12</sup>，可視為于斌在此時期積極推動中梵建交的另一項作為。不過中梵建交還是需要國際因素的配合。

## 二、通使交涉

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十二月九日，美對日宣戰，同一天中國也向日、德、義宣戰。亞洲的中日戰爭，此後正式納入世界大戰的一環。在這新的世界局勢中，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一日，義大利駐教廷使館的參事巴布奇歐（*Francesco Babuscio*）往見教廷國務卿，告訴馬禮庸尼（*Luigi Maglione*）樞機，日本希望派遣一駐教廷的特別代表，國務卿回稱教宗對此一定不會有意見，但正式的要求應經由駐東京的宗座代表提出；馬禮庸尼還表示，希望這是一個永久性任命，這個日本外交官應該僅只被派往教廷任職。庇護十二世同意了這個建議，他說他會高興的接受日本的外交代表，但是他也加上一句：中國也希望派遣代表駐教廷。<sup>13</sup>

在與日本政府的外交部長會面後，宗座駐日代表馬來拉將日本政府給他的備忘錄，在一月三十日傳回教廷。二月四日，馬禮庸尼將這件事秘密的告訴了英美在教廷的代表，很快的就引起了英美等國的強烈反應，認為在這個日本大舉發動侵略的時候，接受日本派使駐教廷，是一個不正義的舉

<sup>12</sup> 方豪，〈「梵諦岡一瞥」代序〉，〈方豪六十自訂稿〉下，頁二二三—二三七。

<sup>13</sup> *Pierre Blet S.J., Pius XII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p. 127.

動，也無法不使人再次相信教廷傾向於軸心國。馬禮庸尼的回答是：日梵建交是自從一九二二年以後就被考慮的事，而現在照顧日本帝國內天主教教會的需要更勝以往；隨著戰事進行，日本進入更多天主教徒增多的區域，使得教廷必須答應日本通使的要求，而這並不能代表教廷傾向軸心國。<sup>14</sup>

美國是支持中梵建交最主要的國際後盾。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華民國駐美使館奉國府命令，向宗座駐美代表齊孔納尼（Amleto Cicognani）總主教，提出通使要求。三月二十六日齊孔納尼將訊息傳往教廷，兩日後馬禮庸尼即做肯定答覆。<sup>15</sup>同日瑞士駐羅馬特派員報告：「梵蒂岡明白表示，日本派遣駐教廷代表，並不能認定教廷正式承認日本在遠東之征服勢力。<sup>16</sup>」由此可看出，教廷與中日建交問題，已形成教廷在同盟與軸心兩者間維持中立的一種表態。

在得知教廷的肯定答覆後，于斌在三月二十九日接受記者訪問時為教廷外交辯護，稱：「教廷雖為國際法人，但從不參與國際鬥爭，任何國家如尊重信仰自由之原則，而願與之發生外交關係，尚無被拒之前例；此次日本與教廷換使，並未超越普通外交關係。但教廷曾公開抨擊納粹主義，故絕不贊成日本之窮兵黷武。……我國因不平等條約作梗，未能及早與教廷發生關係，但深信此事僅時間與手續問題耳。」于斌已在暗示中梵間即將建交。兩日後，三月三十一日中宣部長王世

<sup>14</sup> Ibid., p.127-128.

<sup>15</sup> 《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二十三，外交部文件中並未說明為何中國會在此時向教廷提出通使要求，有兩種可能，一是國府主動，另一是美國授意。

<sup>16</sup> 方豪，〈「梵諦岡一瞥」代序〉，〈方豪六十自訂稿〉下，頁二二二-二三八。

杰宣佈：「中國最近正與教廷磋商互換使節，梵蒂岡並已接受我國要求。」<sup>17</sup>

四月一日瑞士伯爾尼傳出梵蒂岡電訊：「教廷及中國正準備成立設外交代表之協定，該協定與教廷對日本所締之協定相同，規定中國得派代表赴梵蒂岡，但不變更教廷在中國代表之性質。」三日，美總統羅斯福表示「教廷如接受中國派遣使節，美國必甚為贊同」。七日，蔣廷黼向外國記者報告：「中國與羅馬教廷交換使節事，已互商就緒。中國政府即將派代表前往。」同日柏林廣播亦承認此事，謂「教廷方面原則上已允中國派遣外交代表前往，惟教廷方面則不擬另派使節赴華，教廷使節之任務，悉由教廷駐中國代表蔡寧總主教負責。」<sup>18</sup>

日本見中梵通使事，教廷將消息放的沸沸揚揚，頗有後來居上之勢，乃向教廷表示，他們不希望在中國之後才與教廷建交；日本亦向教廷異議，認為汪精衛的偽政權才是代表中國的政府。<sup>19</sup>經過這樣的干擾後，雖然教廷並不否認各國報紙的消息為真，但一直没有正式宣佈中梵通使及通使的層級及方式。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原任日本駐法（時為維琪政權）使館參事的原田健，以大使層級的特使名義抵羅馬。四月二十七日教廷國務卿接見，五月九日向教宗呈遞國書。

於此同時教廷與中國的通使交涉仍持續在美方進行，教廷似乎有意趁此機會解決德義傳教士在國民政府控制範圍內被指通敵、遭監禁甚至威脅判死刑的情形。是否雙方交涉時確實談及此方面議

<sup>17</sup> 同前。

<sup>18</sup> 同前。

<sup>19</sup> Pierre Blet S.J., *Pius XII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p. 131.

題，沒有足夠資料加以證實，不過國民政府確表現不少善意：如一九四二年四月八日敵產處理委員會決議對各地教堂，注意保護。四月三十日蔣廷黼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明：「（一）在我國之德、義天主教教士，雖為敵國國民，但因係受羅馬教廷派遣，由於我國對教廷之關係，彼輩所受待遇與敵僑略異。（二）天主教之產業並非私有財產，與營商之敵產情形完全不同，因此，吾國須予以保護。況此輩天主教士多久居中國，其對本國之政策已不表同情久矣云云。」保護教士與教產，雖為我國應有之合理處置，但政府特加注意，亦未始非對教廷友好之表示也。六月二十五日行政院順陸字第二四〇號訓令各省市市政府取消集中監護德、義教士辦法，准許自由傳教，發還被佔教產。<sup>20</sup>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教宗陞主教二十五年紀念，國府主席林森特別發電致賀，教宗亦立即覆電致謝，內容無甚新奇之處，但代表的是雙方友好關係更上層樓。<sup>21</sup>

同年六月三日，宋子文自美國華盛頓傳回訊息：「謝壽康使教廷事，頃據駐美教廷代表函稱，已徵得同意。<sup>22</sup>」這份電文已是整個通使談判過程的最後一步，因此自四月初開始的建交模式，應已在此過程中談妥；即中華民國派公使駐教廷，而教廷在華仍維持宗座代表制，蔡寧的身份不予變更。教廷的這種做法很聰明，因蔡寧維持非外交官身份，可避免捲入重慶國民政府與南京偽政府間的爭奪；而這種做法也是與日梵關係相同的。國民政府在六月九日對外國記者正式宣佈派我

<sup>20</sup> 方豪，〈「梵諦岡一瞥」代序〉，〈方豪六十自訂稿〉下，頁二二三—二三九。方豪在一九三八年—一九四一年二月間擔任益世報總主筆，有不少蒐集國際輿論之管道及敏感度。

<sup>21</sup> 同前。

<sup>22</sup> 〈教廷派使案〉，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發電，〈外交部檔案——教廷派使案〉。

駐瑞士代辦謝壽康為駐教廷首任公使，六月十七日明令發佈。<sup>23</sup>

### 三、謝壽康赴任

瑞士與義大利雖為鄰國，但處理後續的通使事宜仍在美國進行。首先是軸心國已控制歐陸，中國是交戰國，匯款有些阻礙；當時的開辦經費必須由美國轉匯瑞士，再轉送教廷。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在美國支持下，可對教廷施加壓力，解決一些困難問題。為確實瞭解中梵建交談判的內容，謝壽康在一九四二年七月，極可能曾有赴美行程。<sup>24</sup>

教廷雖然在一九四二年六月覆電同意謝壽康出使，但教廷遲遲未正式公佈中梵建交事，似乎教廷有拖延之意。拖延的理由可能是不願與日使呈遞國書之日期太接近。國民政府禮貌性的等待三個月後，終於按捺不住，還是透過駐美使館方面向教廷查詢，接洽其事者仍然是宋子文。他在十月十四日發電外交部：「……謝壽康使教廷事，係於六月二十四日正式函知駐美教廷代表，並於同日得該代表復稱即轉電教廷，頃已請其再電通知矣。文。<sup>25</sup>」在國民政府兩度通知後，《羅馬觀察報》在十月二十三日發表中國派使駐教廷事，教廷駐美代表亦將結果轉告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館。

接下來的麻煩事是如何進入梵蒂岡。教廷只是羅馬城中的一個小宮廷，由於二次大戰的關係，

<sup>23</sup> 方豪，〈「梵諦岡一瞥」代序〉，《方豪六十自訂稿》下，頁二二三—二三九。

<sup>24</sup> 〈謝壽康致重慶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一日發電，〈外交部檔案——教廷派使案〉，謝壽康在電文中稱：「如能定得機位，擬於下週首途赴美。」

<sup>25</sup> 〈宋子文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發電，〈外交部檔案——本部與駐教廷謝公使往來電（一）〉。



與義大利有交戰關係的國家，均已將駐教廷使館從羅馬遷入梵蒂岡，而新任的駐教廷公使，必須拿到義大利的簽證，才能從義大利進入教廷。謝壽康早在八月二十日即送教廷館員名單，並請教廷協助辦理經義大利簽證事；由於教廷要求減少館員人數，謝壽康再於十月九日提出請求；但直至十一月初仍無簽證消息。<sup>26</sup>

由於屢無消息，國府方面再請駐美使館向教廷駐美代表洽詢，駐美使館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回電稱：「經即與教廷駐美代表商洽，頃據覆稱，已電促教廷速予簽證，並謂此事需向義大利政府商洽，俾便通過義境，大概因此延擱。」<sup>27</sup>謝壽康則再往教廷駐瑞士使館催促，「據稱教廷政府亦深望職能早日到任，惟義方迄未准予簽證。義方雖不能拒絕，但故意拖延。……」到十二月十日數日，教廷駐美代表公署人員通知，義大利政府已同意通過義境，但同時間教廷駐瑞士使館則尚無消息。十二月十五日，謝壽康去電外交部：「頃駐瑞士教廷使館來函稱教廷國務卿請轉知，義方給予過境簽證，必無問題，特重新聲明。已為正式代請，現候答覆。……」<sup>28</sup>義大利過境簽證事，至此方較肯定。

不過義大利方面當然不會讓交戰國順心如意，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義方指定一月二日晨，派員護送過境，……實際僅有半天，可以作交替準備。」這是故意讓謝壽康無法通知教廷預

26 〈謝壽康致外交部電〉，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七日發電，〈外交部檔案——本部與駐教廷謝公使往來電（一）〉。

27 〈駐美使館致外交部電〉，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發電，〈外交部檔案——本部與駐教廷謝公使往來電（一）〉。

28 〈謝壽康致外交部電〉，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外交部檔案——本部與駐教廷謝公使往來電（一）〉。

作準備。經教廷駐瑞士公使協助與義公使交涉，將時間往後延，義公使再將時間延後兩星期，實際上是三星期後。一月二十二日，謝壽康拿到過境簽證，義方指定一月二十五日過境。<sup>29</sup>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晨，謝壽康偕汪孝熙秘書及僕從抵達羅馬，教廷國務院次長及在羅馬的十九個中國人在車站迎接。略經寒暄後，即乘教廷準備之汽車，逕入梵蒂岡城。謝壽康與秘書住在使館中，由於係臨時安置，大小房間共僅五間，其他各國使館情形類似。<sup>30</sup>一月二十八日謝壽康往見國務卿，呈送國書副本及譯文，當時教廷尚未決定呈遞國書日期。二月十四日又往晤外交部常務次長，日期仍未決定，只是決定在二月二十一日以後，義大利新任大使呈遞國書之前。最後在二月二十五日覲見教宗，呈遞國書。教廷對中梵建交事，希望保持低調，因此謝壽康的頌詞及答詞，均未刊登在《羅馬觀察報》上。

#### 四、教務顧問——羅光

一般外交人員對於教廷外交是相當陌生的，因教廷外交與一般外交有其基本性質的差異。謝壽康亦瞭解這種差異不是短時間之內可以瞭解透徹的，他需要熟悉教廷人士及習慣者予以協助，此人即羅光神父。羅光，一九一一年生，家裡已有數代教友，十三歲入修院，一九三〇年到羅馬，就讀於傳信大學，于斌一九二九年後，即在傳信大學任教，因此在中國人的人際關係中，羅光是于斌的學生。一九三六年二月羅光晉鐸，然後取得神學、法律博士學位。繼于斌和張潤波神父之後，羅光

<sup>29</sup> 〈謝壽康致外交部電〉，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發，〈外交部檔案——本部與駐教廷謝公使往來電（一）〉。  
<sup>30</sup> 羅光，〈羅馬四記〉（台北：華明書局，一九六二年八月初版），頁三一—三二。

亦在傳信大學中教授中國哲學、文學之類的課程。留校擔任教授者，常是中國神職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前三任返國後皆被任命為主教。<sup>31</sup>

基於一種和于斌相同的愛國心，羅光對於中梵建交的問題是相當留意的。第一位他經常請教的對象是剛恆毅，他回憶說：「從一九三六年，我在傳大任教起，直到一九五九年剛公去世的時候，我幾乎每星期一次到他的辦公室或是住家，為留羅馬中國聖職員、中國教會以及中國國民政府和教廷關係，各方面的事向他請示或求助。<sup>32</sup>」

第二位羅光相當尊重的人物是陸徵祥，他在一九三九年七月特別到比利時本篤會隱修院中拜訪陸徵祥，與之共同生活十一日，用口述歷史的方法，記下陸徵祥生命歷程中的點滴。為羅光言，陸徵祥是他在中國外交界的導師，遇有與國民政府的交涉時，他經常請陸徵祥提供意見，也透過陸徵祥的人際網路，在正式的外交談判底下，能有意見私下溝通的機會。

第三個與羅光關係密切的人物就是于斌。兩人既然理念相同，都站在中國教會立場，希望促進中梵友誼，於是經常聯手合作，推動中梵關係發展。早期羅光常扮演于斌助手角色，于斌負責在國民政府聯繫，當有所眉目時，羅光則在教廷為其在各方面探詢意見，整合各種想法，反之亦然。在一九四〇年的特使交涉時，已可看出此種模式。

因此在謝壽康抵達教廷時，羅光是最有資格協助其溝通聯繫的人物。有資料可查者，羅光至遲在一九三九年即已實際參與了中梵建交，因此謝壽康希望聘其任使館之「教務顧問」。他發電給外

31 羅光，〈生活自述〉（台北：台灣學生書局，二〇〇〇年十月增訂版），頁一〇五〇。

32 羅光，〈懷念剛恆毅樞機〉，〈剛恆毅樞機主教使華七十週年論文集〉（台北：主徒會，一九九二年編印），頁一。

交部，「……教廷主辦之傳信大學教授羅光，對於神學及教律研究精良，曾充教宗庇佑十二世加冕，中國慶祝專使團之教務秘書，擬請聘為本館教務顧問。……」<sup>33</sup>「國府方面似乎有些意見，基本上是明瞭教廷外交的特殊需求，因各國使館皆無此例。謝壽康再去電解釋：「至羅事，前查各國駐教使館名單，大半均有教士，或用教務顧問，或用教務諮議名義，倭館亦有兩名。蓋教廷組織禮節法規，均極複雜，非教士難明真相，而義方尚未干涉教士行動，故較為自由。自職抵任所，羅即自動每日來館，熱誠相助，代向教廷各方聯絡，徵覓需用文牘，傳遞秘密情報，頗得臂助，如能破例照准，俾足繼續效力，對於館務必多裨益。」<sup>34</sup>」

在國民政府同意「教務諮議」名義後，謝壽康將此決定通知教廷國務院。羅光回憶，國務副卿孟棟義主教約以兩條件：「第一，在戰時，不列名外交名單，因若列上名單，便不能出梵蒂岡城，也就不能往傳大授課；第二，傳信部限定此種服務不應是長久的，本區主教或傳信部要調動時，立刻可以調動。」<sup>35</sup>」

##### 五、蔡寧任教廷駐華公使以及代表的代表

對日本而言，國民政府用與日本相同的條件和教廷建交，感覺上他們並未佔得上風。於是就將腦筋動到蔡寧身上，蔡寧在交戰的中日雙方，重慶及南京政權間堅守中立，若能使其獲駐華公使身

<sup>33</sup>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八十九。

<sup>34</sup>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九十。

<sup>35</sup> 羅光，〈羅瑪四記〉，頁三一—二。

份，以他駐紮於北平的情形，當然會形成對國民政府不利的外交宣傳。

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初，國民政府接獲訊息，稱教廷將派蔡寧任駐華公使，而蔡寧將派駐河南新鄉監牧區的米幹（Thomas Megan）主教任駐重慶代辦。消息並非從教廷傳來，但有名有姓，似非空穴來風。於是國府方面立即要求謝壽康查證，謝壽康乃往見國務院長馬禮庸尼樞機，「據稱，絕無此事，倘教廷欲派使節，必依照慣例，先向貴國政府徵求同意。……當詢以蔡寧主教，可否逕派米幹為駐渝代辦，馬答蔡寧無此權，於必要時亦只能派個人代表，接洽某種一件問定事宜。……」<sup>36</sup>

除了謝壽康教廷的管道，國民政府隨後也從美國方面查詢；教廷駐美國宗座代表齊孔納尼答覆：「轉詢教廷外長 Cardinal Maglione 復稱，所傳 Zanin 主教及 Monsignor Megan 一節，並無根據。」<sup>37</sup>

此事沒有成局並不代表當時教廷內部無人做此主張，駐日宗座代表馬來拉即曾提議，在日本的中國佔領區，派遣一位宗座代表處理教務。教廷基本上同意了這個提議，曾給蔡寧訓令，命其巡視南京偽政權控制下的傳教區，並設法與南京偽政府有所接觸。<sup>38</sup>不過蔡寧瞭解此事的高度敏感性，他似乎並未有任何實際的行動。

不過蔡寧停駐在平，在重慶方面，教廷之相關事務，顯然需要有人處理。在一九四四年九月，

<sup>36</sup>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三年五月十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九十一。米幹，美國聖言會士。

<sup>37</sup> 〈駐美大使館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發電，〈外交部檔案——教廷派使案〉。

<sup>38</sup> Pierre Blet S.J., *Pius XII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p.131.

重慶代牧尚惟善 (Alois Gabriel Xavier Jantzen) 主教，往訪國民政府禮賓司，稱由於蔡寧在平無法執行職務，「頃奉教廷國務院奉教廷傳諭，電令尚主教代表駐華代表，處理可與重慶交通之各教區教務。」<sup>39</sup>」

謝壽康在事前完全不知此事，他回報說：「教廷外交部對於此事，既無書面，亦未口頭通知。職於日前尚往晤外交部次長，會談甚久，彼亦未提及。」當時于斌主教自美回國，途經羅馬，謝壽康未指名道姓的說：「據關切此事之我國人密告，此事係由傳信部主辦，其人或係為紐約總主教，該主教本擬赴華，慰勞美天主教士兵，一時不能成行，於四月前委託重慶楊主教為美天主教隨營司鐸之精神指導總監。嗣為避免引起在華美籍主教反感，乃請教廷派楊主教為教廷駐華代表兼駐渝代表。」<sup>40</sup>」

于斌在美國與紐約史培爾曼 (Francis Spellman) 總主教時有往還，此一說法有一定之可信度。不過教廷派尚惟善為重慶國民政府控制地區的代表，絕非史培爾曼總主教一方面的行動所能促成。首先尚惟善的名義是駐華代表的代表，並非駐華代表，因此不是像于斌說的，派「楊主教為教廷駐華代表兼駐渝代表」。因此教廷在此一範圍內，並未打破以蔡寧任宗座代表，駐紮北平的模式。而尚惟善只是在考量實際情況後，代表的代表而已。按照外交部的評估，若宗座代表為大使或公使等級，那尚惟善只是代辦等級而已。

39 〈外交部禮賓司簽呈〉，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三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九十四。

40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九十六。楊主教係其姓 Jantzen 的音譯。

其次，尚惟善所帶的證明文件，係由國務院長馬禮庸尼簽署，因此也不是像于斌說的，由傳信部主辦。謝壽康在與國務院次長會談時未談及此事，極可能是國務院方面蓄意隱瞞，要尚惟善往重慶國民政府表明新身份後，再將此事告訴謝壽康。這樣做的原因應該是一年前教廷試探以米幹任駐渝代表失敗後的作法。而尚惟善任駐渝代表，也反過來證明一年前的傳聞並非空穴來風。尚惟善雖是法國人，但與國民政府的互動相當良好，因此派他一個準外交身份，教廷方面可能評估國民政府不至拒絕。

這種模式其實與高德惠主教任偽滿洲國教廷的代表，有類似之處；兩者都是以在地的主教，賦予其與政府交涉之權。不同之處則在於，高德惠與蔡寧之間沒有關係，而尚惟善與蔡寧間則有隸屬關係。謝壽康在從國府外交部得知尚惟善消息後，再向教廷國務院查詢，「據教廷外交特務次長稱，教廷方面因在渝無使節不便，屢次電令蔡寧代表離平赴渝，惟彼身體欠佳，不能長途跋涉，故請特准派楊主教為彼駐渝私人代表，教廷為求事實之便利，未予反對云。職當即詰以教廷外部，對於此事，既已接洽，何以未曾與我商量。彼云教廷辦理此事，手續確有不合，應向貴使道歉。惟本人願再聲明，楊係蔡私人委託，並非由教廷派遣，亦無任何教廷正式名義。<sup>41</sup>」教廷承認了「手續確有不合」，此在教廷外交中相當罕見，因此可以強烈懷疑這代表了其他的意涵。從孟棣義的談話，也可以嗅出，派遣駐華代表的代表是蔡寧不左不右的中國政策下，因應現實而生的產物。

41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九十七。

## 六、庇護十二世中國政策的轉向

二次大戰中，庇護十二世的外交政策相當明確，就是追求和平。因此和中國的關係，必須放在這樣的架構中思考。其次，他專業教廷外交官的背景，使他思考這些問題時，也經常帶有國際關係的角度。這位教宗有強烈企圖心在德義日及英美俄間，磋商可能的停戰方案。因此凡是有可能妨礙往和平方向的作為，他都不贊成；他對兩方經常都保持對等的關係，模糊的態度，避免贊成一方，反對另外一方，前述種種不明確的作法，其實就是因為教廷不願得罪任何一方；而中國問題不僅是中國問題而已，實際上是世界局勢的一環。

因此庇護十二世對中國態度始終友好，只是他不能太明確。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教宗接見謝壽康，談了一小時。內容如下：

「(1)教宗表示對主席十分欽佩，不但為中國教星，亦是世界罕見偉人云，並為中國國民主席部長祝福。(2)對中國政府傳教教士教民政策，極表滿意。(3)對目前中教邦交良好，頗為慶幸，並希望中國勝利後，雙方關係更臻密切。(4)又稱對中國傳教方針，係培植中國司鐸，俾得作最近將來中國主教，改由中國司鐸升任云。<sup>42</sup>」

這些相當具體的談話，表現了庇護十二世的善意；必須瞭解當時梵蒂岡處在相當危險的局面，

42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九十三、九十四。



義大利的法西斯政權已經垮台，德軍在一九四三年九月開進了羅馬，控制了整個城市。而庇護十二世選擇在這個時機召見中華民國公使，長談一小時，讚美中國的領導人，並預祝中國勝利，由此可以看出庇護十二世是不懼威脅的，他心中自有定見。以他豐富的外交經驗，他或許也已感受到，未來戰爭的勝利，將屬於英美這一邊。在此時刻有外交官向教宗建議離開羅馬，但教宗答稱：「我命我全球各主教，固守他的岡位，當國家陷於災禍時，在他們的羊群中作善牧，羅馬主教不願為違背他自己所發命令的首犯。」<sup>43</sup>

在德軍佔領羅馬期間，庇護十二世曾設法庇護猶太人，並照顧難民，然後英美聯軍向羅馬進軍，一九四四年二月，教宗的夏宮岡道爾夫堡兩次被聯軍飛機轟炸，這時岡道爾夫堡收容了不少難民，<sup>44</sup>也有不少難民被炸死。六月四日，美軍開進羅馬，六月五日教宗發表演講：「在這裡，我們曾受許多艱苦，今天，我們重得歡樂，感謝天主及兩方交戰國的善意，因為羅馬已脫離戰爭的可怕，而被救了。為此我們應感謝天主聖母拯救了羅馬人民。」<sup>45</sup>雖然戰爭尚未結束，但明眼人都看的出來，世界大戰的結束只是時間問題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于斌自美抵達羅馬，謝壽康報告說：「于主教在此共留十日，各界印象甚佳，職亦藉機謙請，及開茶會招待教廷重要人物，各教會會長，與教廷有關之名流及外交團，俾于主教便於聯絡。于主教晉謁教皇，長談半小時，教皇對我抗戰情形，垂詢甚詳，並託將其親筆

<sup>43</sup> 黎正甫，〈庇護十二世的生活〉，頁一一九。

<sup>44</sup>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零落孤葉〉，頁三一七—三一八。

<sup>45</sup> 黎正甫，〈庇護十二世的生活〉，頁一二〇。

簽名及所提致敬字句之照片一張，轉呈主席，該件已由彼帶去。<sup>46</sup>」

謝壽康未在電文中提及，于斌此次由美來歐，攜有行政院長孔祥熙致教宗親筆函一封，其文如下：

「庇佑第十二世聖宗閣下：久仰光儀，時深敬慕，辰維政躬安吉為頌。自侵略者激動戰禍以來，人類慘逢浩劫，幸賴 聖宗主持正義，倡導和平，保人類之福祉，維文明之進步，遠企鴻猷，無任欽敬。天主教友在敝國者為數眾多，在于主教及各主教領導之下，皆本聖道正義和平博愛之旨，為國家人類而努力，舉凡社會慈善事業，無不熱心贊助，此皆 聖宗教化有以致之，敝國朝野同深銘感，茲趁于主教邁赴羅馬，晉謁述職之便，特肅寸箋，奉申 敬意，附上小影一幀，聊誌紀念，尚祈 莞納。再戰區各地撫傷救護諸事，亟待進行，茲就箇人棉力所及，捐助美金一萬元，聊盡心意，奉上匯票一張，並祈接收為荷，祇頌時綏

孔祥熙拜啟

卅三、八、廿五<sup>47</sup>」

由於孔祥熙送了教宗照片，因此教宗亦送了蔣主席照片一張以為回覆。信函的內容並不重要，通信的本身代表了雙方來往的頻率增加，以及增進關係的意願。

一九四四年年底，庇護十二世再度接見了謝壽康，他報告說：「頃偕張秘書、羅傭員晉謁教宗，蒙教宗接談十五分，囑向中國國民政府主席暨政府致賀祝福，對我抗戰建國並極表關切。<sup>48</sup>」

46 〈謝壽康致外交部電〉，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發電，〈外交部檔案——本部與駐教廷謝公使往來電（一）〉。

47 〈于斌樞機資料〉手稿。

48 〈謝壽康致外交部電〉，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電，〈外交部檔案——本部與駐教廷謝公使往來電（一）〉。

在此國際情勢愈趨明朗之際，庇護十二世對國民政府也表現出更多、更直接的關懷。

一九四五年八月，于斌自美參加舊金山會議，繞道羅馬回國，八月九日抵達，謝壽康為其安排晉見教宗日期，教宗約於八月十日，「如此迅速，實係其對中國及于之一種特別表示，向例外國主教到此報到後，均需等候多日，方得覲見。<sup>49</sup>」八月十日教宗接見于斌時，「(1)誠懇嘉許慰勞于主教並破例親抱之。(2)再三囑于轉達教宗對中國之同情與眷愛。(3)願策動全中國之公教力量參加中國之建國工作。(4)若有機緣希望與主座晤談，又教宗將以私函囑于轉呈主座，並以紀念品轉呈蔣夫人。<sup>50</sup>」這時可以說是庇護十二世，對中國表達善意的最高峰。于斌在晉見完教宗後，往見傳信部長畢翁地樞機，「短暫交談十五分鐘，然後返謝壽康公使處午餐。」「席間傳日本投降，痛飲香檳以獎。<sup>51</sup>」八月十二日于斌帶著教宗給蔣主席的信件以及給蔣夫人的禮物返國，八月二十五日抵達重慶。現在看來中國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

九月三日，蔣主席回函教宗庇護十二世：

「庇護十二世教宗閣下：

頃由于斌主教轉示八月十二日尊翰，備荷垂注，至為欣幸。得道多助，正義不滅，已由此次世界人類以莫大犧牲，而益證明其為無上之真理。中國在艱苦抗戰之八年中，在華之天主教友，在閣下之精神感召之下，矢誠服務始終如一，為國人所共見，尤為余所欣感。中國誠如閣下所云，遭受戰禍

49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發電，〈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〇三。

50 同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發電。

51 于斌一九四五年記事本。

最深，其對重建人類永久和平之需要與責任亦最大。余願賴上蒼之力，深信閣下對中國所能貢獻盡力於人類和平幸福之工作，必能隨時予以必要之鼓勵與啟示也。余除囑新任駐義公使待遇代辦薛光前君，親遞此函，代達微忱外，並謹向閣下致最高之敬意。

蔣中正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三日<sup>52</sup>」

雙方關係如此密切，似乎進一步提升關係的時刻已經到了。

## 第二節 中國教會改革與雙方通使

### 一、首位中國樞機主教

在中梵外交關係中，去除外在國際情勢的干擾後，教廷所最關切者，主要是中國教會問題。從本篤十五世的夫至大通牒以來，教廷對中國教會的發展方向相當明確，就是建立本地化的中國教會。而有關本地化中國教會的內涵，從庇護十一世開始，主要是以設立國籍代牧區，並選任中國主教為主。但基於現實的考量，由於國籍神職的質量仍有待增進，以及外籍傳教士的反彈，迄抗戰勝利為止，國籍主教在全國主教中的人數仍不及五分之一，感覺上中國天主教的中國味還不夠濃。但若中國教會的領袖是中國人，可能觀感又不相同了。

52 〈蔣主席致教皇庇護第十二函〉，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〇五。

使中國教會領袖由中國人擔任，此為于斌奔走請教宗設立中國樞機主教的原因。在實際權力上，樞機主教除了選任教宗之外，其實和一般主教並無差別。但一般而言，教會內外往往將樞機主教視為一榮銜，視之如教會親王，擁有特殊地位。而其在本國教會，常為一國教會之首席，除了歐美教會外，此時亞洲尚無任何一位樞機主教之設置，故為中國教會言，若能有一中國樞機任教會首席，則中國教會必會予人不同之觀感。

在二次大戰勝負略見分曉時，一九四四年九月，于斌已與謝壽康談及選任中國樞機事。從謝壽康的觀點看來，于斌本人是最佳人選，但于斌怎可能為自己奔走樞機之位，他心中已有最佳人選，就是隱居在比利時本篤會的陸徵祥。<sup>53</sup>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謝壽康與國務院常務次長會談：「……職詢以現歐洲停戰，發表樞機之御前會議，是否即將召集？伊答稱此事現尚渺茫。職乘機表示，中國教區之多為世界第二，吾人極盼能有一樞機。伊謂發表樞機為教宗個人之特權。職復稱中國教士中有被任樞機資格者有數人，如陸徵祥教士，道德學問均為人推重。伊即詢問陸教士之洋文姓名，並抄錄之。<sup>54</sup>」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于斌自美赴歐，他主要先到英國訪問，七月三十一日離英赴法，然後短暫的訪問比利時。他赴比利時的目的，即是與大使金問泗一同拜訪陸徵祥。金問泗報告稱：「于斌主教日前自巴黎來此，談及樞機主教須陸續補選三十一人，我國不妨向教廷及其他有關各方表示以陸徵祥神父提出候選，如獲當選，不獨有裨教務，亦可增高我國國際地位等語。……此次泗偕于主

<sup>53</sup>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集編〉，頁一〇一。  
<sup>54</sup> 同前。

教往晤見，其年齡雖高，精神尚好，倘政府決定提請候選，擬懇電令謝壽康公使向教廷相機進行。泗當同時向駐比教廷大使作非正式表示。……<sup>55</sup>」

金問泗說：「倘政府提請候選。」是不明瞭教宗權限及教廷運作的說法，因選任樞機為教宗自己意願；教宗會考量各種因素，做出適當的抉擇，但若國家政府「提名」某人候選，如此則犯了干涉教宗權限之忌。因此只能私下遊說，提出一使教宗認為合理之人選。外交部贊成金問泗之意見，遂回電稱：「已電謝公使進行，可向駐比教廷大使作非正式表示。<sup>56</sup>」謝壽康感覺外交部似有提名候選樞機之意，乃致電外交部解釋：「……查教宗補充樞機一事，在教律嚴格而論，係其個人特權，人選由其個人決定，在一御前會議宣佈之，是無所謂候選當選。……<sup>57</sup>」

謝壽康對此事頗為賣力，「與教宗姪輩近戚等極力聯絡……復向教廷外部常務次長面談數次，並致函申說，同時又交以陸神父近作，請代呈教宗。八月二十日，且託妥人帶函致駐法錢大使，駐比金大使，密請其相機向教廷駐法比大使及法比樞機溝通。……」而在交涉過程中，樂觀及消極意見均有，最主要的負面意見是：「教廷一般輿論，均感陸神父年齡過高，及傳信部長對此態度冷靜，其理由為中美教士人數不多，且無顯著成績。<sup>58</sup>」

<sup>55</sup> 〈駐比利時大使金問泗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〇二—一〇三。

<sup>56</sup> 〈外交部致駐教廷謝壽康公使、比金問泗大使電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〇四。

<sup>57</sup>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發電，〈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〇五。

<sup>58</sup> 同前。「中美教士」疑為「中國教士」。

九月二十一日，謝壽康再往見國務次卿孟棟義總主教，孟棟義表示：「教宗此次有意多任外國樞機，以表示教廷遷就國際性。」謝壽康乃請其相機進言，並推薦陸徵祥之道德文章。孟棟義雖名為次卿，但一九四四國務院長馬禮庸尼逝世後，庇護十二世並未升補任何人擔任國務卿，因此大部分外交事務皆由孟棟義掌理，他說的話自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sup>59</sup>

于斌積極運作陸徵祥任中國首任樞機，有其不得不然的考量。實際上于斌才是這個時期中國神職人員的首席，不過他在抗戰期中積極支持國民政府的作為，與宗座駐華代表蔡寧的意見不合，也受到部分在華外籍傳教士的攻擊。認為他不夠中立的態度，使得戰區中的中國教會受到更多的迫害；部分外籍傳教士則認為于斌參與政治，與教宗本篤十五世的夫至大通諭有所違背。于斌知道自己不可能被選上，但中國需要一位樞機主教，陸徵祥在本篤會隱修，未實際參與中國教務，外籍傳教士能批評者有限。而其社會地位，不僅受中國、外國外交界尊重，即便是教廷亦頗尊重之。陸徵祥可說是當時中國教會中最具清望之人物，而「樞機位尊，不需多有動作<sup>60</sup>」，若陸徵祥當選，仍能持續發表言論，但無實際行動，亦不致引起外籍傳教士反彈。因此，看來看去陸徵祥都是最佳人選。

不過陸徵祥對此倒是惶恐不已，他已成本篤會士，生活的目的是隱修，沈浸在與天主教談相處的氣氛中；一旦擔任樞機，勢必扯入教會政治中；陸徵祥是半路出家，對教會生態亦不瞭解，也無

59 〈駐教廷謝壽康公使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發電，〈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一〇。

60 原文是一九四四年九月，于斌對謝壽康所言：「樞機位尊，不能多有動作」。恐係于斌對謝壽康抬愛之詞的反應。

興趣。在這些考量下，陸徵祥致函駐法大使錢泰，「誠懇表示不願升任樞機，並推薦于主教。」而在謝壽康眼中，于斌自然是最適合的人選，陸徵祥既然推辭，謝壽康乃去訪問向來與于斌友好的狄瑟朗 (Eugene Tisserant) 樞機主教。狄瑟朗向謝壽康表示：「陸為修士，自當謙讓；于主教年輕，將來可以遞升。……<sup>61</sup>」從狄瑟朗的話中可以聞出，教廷內的部分意見，不以陸于二人擔任樞機為然。

然後謝壽康又拜訪了教義部長 Marchetti 樞機主教，教宗親侍 Macchetti 侯爵，均得肯定答覆。謝壽康對外交部表示：「職對此事，各方均已進行，前後電呈在案，現華棣崗對我之空氣亦佳。……<sup>62</sup>」不過任命樞機係教宗權責，可多方進言，但結果如何是教宗自己決定。十二月十八日，傳信部次長剛恆毅託人來要陸徵祥履歷，謝壽康興奮的以為「此想係為教宗作升任陸神父為樞機的準備。<sup>63</sup>」不過這其實僅代表教宗尚未決定人選，十二月二十四日消息傳出，中國及亞洲地區的第一位樞機主教被任命了，庇護十二世選擇了青島主教田耕莘。<sup>64</sup>

由一封羅光寫給于斌的信中，可以清楚看出其中經緯：「去年田公任樞機消息宣佈後，使館方面很覺到驚訝，事前，謝公使按照主教所定計畫，極力為興老奔走。……迨消息宣佈後，次彭公使向教廷探詢，據說教宗此次選任樞機之原則，在選各國之主教，且興老在國外多年，頗不足代表

61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一二。

62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一三。

63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一四。

64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一四。



中國教會，故未被選。但我等都以為既選中國主教，則名正言順，應為首都主教當選樞機，教廷方面聲稱，南京主教尚年輕，他日當選之機會正多，然其中確實理由，必為傳信部作梗。聖部以為中國第一任樞機，應為衆心所歸，而南京主教頗受宗座代表與傳教士等之攻擊，為敷衍各方，乃選一位誠樸之中國主教。<sup>65</sup>」

田耕莘，山東袁州人，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八日生，一九二九年入聖言會，一九三二年晉升司鐸，一九三四年二月被任命為山東陽穀監牧區監牧，但不具主教職。一九三九年在羅馬，由教宗庇護十二世親自祝聖為主教，並任升格的陽穀代牧區代牧。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改任青島代牧。和于斌、羅光等唸過羅馬傳信大學的國籍神職不同，田耕莘從未出國唸書，個性樸實，平日騎自行車或步行傳教，升任主教後亦然。教廷人士稱之為「道地的中國主教」且有「實際的傳教成績」<sup>66</sup>。而這些相對的比較標準，主要是針對陸于二人所說的。

田耕莘在赴羅馬的安排上沒有與國民政府接觸；由於他是聖言會士，他透過美國聖言會的協助，搭乘美國軍艦橫渡太平洋赴美，然後再與美國的新任樞機主教史培爾曼，乘飛機至愛爾蘭，再經法抵義。當國民政府在找他時，他已乘美國軍艦離開青島了。<sup>67</sup> 由此觀之，他的確是盡量少牽涉進政治圈。

65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

66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一六。此為傳信部長畢翁地樞機所言。

67 〈青島天主堂致南京外交部電〉，一九四六年二月四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一七。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庇護十二世在秘密御前會議宣佈新樞機名單，共三十二人，包括二十個不同國籍。謝壽康報告：「田樞機決定在傳信部舉行應命典禮，由職及剛總主教陪禮。十時教廷外部派員四人送到任命狀，田樞機首請剛主教誦讀任命狀……，嗣用拉丁文致詞，略謂本人德薄，被任為樞機，一人之光榮，實中國公教會，中國全民族之光榮，謹虔誠向教宗致謝忱。公使到任以來對中教關係之努力，及剛總主教對中國教務之指導，亦均深感謝。……」<sup>68</sup>二月十九日，田耕莘晉見教宗，呈送道地的中國土產，「山東花邊綉布一套，教宗詢問中國教務及此次由美來羅馬之經過甚詳。」二月二十日授予樞機小紅帽，然後是後續的各種典禮及各項慶祝活動。

田耕莘在三月十日離開羅馬，在歐洲各地二十餘日，然後赴美接洽教務。六月一日田耕莘抵達上海，六月七日到南京，國府高層此時才和中國首任樞機主教照面。各處拜會活動多由于斌陪同<sup>69</sup>，如果没有這位活躍於政治圈的南京主教引見，相信許多場面都會比較尷尬。然後這時田耕莘已改任北平總主教，可說是名副其實的中國教會領袖了。

## 二、教廷派使交涉

一九四五年四月，屬於斌管轄的南京教區神父方豪，當時在重慶的復旦大學任教，給國民政府蔣主席上書。方豪的身份是神父，未具任何官職，因此只能以私人名義「條陳」。不過他是于斌的

68 〈謝壽康致外交部電〉，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九日發電，〈外交部檔案——本部與駐教廷謝公使往來電（二）〉。  
69 于斌一九四六年記事本。

屬下，又是大學教授，與為蔣主席翻譯《聖經》的吳經熊往來密切，也是浙江人，因為有這些人際關係，這件「條陳」才會由蔣主席轉函外交部長宋子文「參考核辦」。當時于斌亦在重慶，方豪在上條陳前應先和于斌商量過，其實也可以把此條陳內容，視為于斌的意見。其內容如下：

溯自民國卅一年六月我國派駐教廷公使瞬將三載。是不獨為我國歷史上之創舉。亦主席高瞻遠矚之鴻謨。惟年來我國國際地位日高。東亞之戰局亦日利於我。對梵蒂岡之外交。似有一新之必要。爰貢愚見。謹為主席陳之。

一、新時機之來臨。竊查當年我國之與教廷通使。實因日寇先向教廷提出建立正常外交關係之請求。而教廷之所以終於接受其請求者。乃緣彼時日寇侵佔土地頗廣。尤以菲律賓之天主教信徒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教皇為保護教會職權之行使。及教友信仰之自由。不便加以拒絕。惟目前菲律賓已大部光復。我國之反攻為期亦不在遠。盟國海軍且已逕叩日本之門戶。東亞情勢大異曩昔。況歷任教皇對世界未來之集體安全。最為關懷。我國列為舊金山會議邀請國之一。必受教廷重視。故把握此時機加強對教廷之聯繫。洵為刻不容緩之圖。

二、新工作之開展。我國對教廷之外交關係。僅為派駐教廷特命全權公使一人。而日本派駐教廷者。則為大使銜特別代表。地位略高於我公使。按我國雖非天主教信徒眾多之國。但已躋於強國之林。故最近期內必須設法使之升格。方適合我國現時之國際地位。其次則教廷迄今尚無使節派駐我國。此在以往教廷或為顧忌日寇在我國淪陷區之勢力。而目前日寇已瀕於崩潰。反攻亦指日可待。在今日提出此種要求。教廷必無拒絕之理。又其次各國對教廷之外交關係。必包括通使與訂約二項。我國雖有使節派駐教廷。而訂約則迄未實施。誠憾事也。故目前我國對教廷之外交工

作急待開展者有三：（一）我國使節之升格。（二）教廷使節之來華。及（三）雙方締結協定（Concordat）是也。

三、新人選之商榷。按我國應派駐教廷之使節。似以教中人為最宜。蓋各國聯絡教廷其目的之一。即在團結本國之天主教教友。而由教中人出使教廷。必更為全國教友所歡迎。美國為新教徒人數較多之國。然而羅斯福總統派駐教廷之私人代表。乃為美國天主教慈善會會長戴勒先生 Myron Taylor。其一例也。法國雖為天主教國。但現在之法國政府則為各黨各派之混合政府。天主教人為數不多。然本年一月法政府乃任命逃亡於美國之著名天主教哲學家馬利旦 Maritain 為駐教廷大使。又一例也。況與教廷訂約。教中人亦較為熟悉。或謂教中人須聽命於教廷。對政府與教廷之折衝容不甚宜。其實不然。蓋忠蓋謀國實為天主教徒之屬政者之首要本分。因此若得一擁護國策服屬政府之教中人為使節。不特無所抵觸。且可使雙方益相融洽。況教廷所求者必與各國之主權無損。且主席信仰基督。服膺聖經。保護全國教士教友。提倡新生活運動。久為教皇所敬仰。誠能得一教中賢達出使教廷。則相得益彰。行見總牧全世界四億信友之宗教領袖。與統治四億五千萬之國家元首為人類共謀昇平之幸福。豈不懿歟。是否有當。敬乞

審裁。70

就形式而言，這是「長官交辦」事項，並非外交部的專業意見。宋子文任外交部長，但他對與教廷外交應無定見，因與教廷外交的重要性，遠不如與英美法等國關係，而他也會尊重外交部內行之有年的政策。四月二十一日，外交部內的專業意見出爐了。基於外交對等的原則，他們對於教廷

70 〈抄南京教區司鐸，復旦大學教授方豪對梵蒂岡教廷外交事宜條陳〉，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九十八、九十九。

以往的種種作法，表達了不滿的看法，首先是在三十年一月，傳信部秘書長剛恆毅，傳遞了教廷婉拒了訂約通使之議；然後是在單方通使後，外交部令謝壽康「探詢派使駐華事，據當時教廷外交部長馬禮庸尼表示，頗多推托之詞，遷延至今，迄未派此來華；推其原因，顯為不願開罪日本，並對於我國淪陷區域內之天主教徒，恐遭日方虐待而有所顧忌。故在此情勢之下，我方再向教廷提議使節升格。殊非所宜。且現歐亞戰局急轉直下。雙方在教廷之活動。已呈弩末。而歐局消息亦不復賴教廷為傳遞之機樞。我國駐教廷使節之重要性以非昔比。更無自動提議升格之必要。至訂約一節教廷曾婉詞拒絕已如上述。當時我方提議之用意。無非為對教廷表示友好。使彼不致傾向日寇。今則此項顧慮已不存在。且就教約本身言。關於天主教士及教堂權利義務之規定。大多利彼多而利我少。尤以訂約後。遇有教案。教廷必將主張外交保護權。而在無教約之今日。此項問題。並不發生。是遲訂教約於我並無不便。我固無須亟亟採取主動。(二)已派駐教廷使節應以天主教徒充任一節。容俟另行派使時再行斟酌辦理……」<sup>71</sup>

從這外交部內的意見觀察，他們覺得教廷外交是可有可無的；因教廷是蕞爾小邦，還敢傾向日寇，在戰時拒絕中國通使的要求，所以現在應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不要對教廷太客氣。但在外交部案卷中，也曾提及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間，在於斌牽線下，教廷有與我通使之議，但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拒絕了教廷的要求。外交部歐洲司似乎在報告中蓄意漏掉了這一段。

71 〈外交部官員對方豪有關梵蒂岡教廷外交事宜條陳之意見〉，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〇〇～一〇一。

方豪的條陳及外交部內的反應，皆未形成正式的外交政策，故謝壽康等人無從知悉，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謝壽康在于斌晉見教宗後十日，亦往梵蒂岡晉見庇護十二世，教宗向謝壽康表示：「希望戰後與中國發生極親善之關係……」<sup>72</sup>「什麼樣的關係，教宗在外交辭令中不會說定，但其實已經很清楚的表明，是希望超過當時宗座代表的準外交關係的。」

在教宗接見謝壽康的同一天，蔣主席也在重慶接見了方豪神父；蔣主席關心者主要為翻譯《聖經》問題，但方豪必定向蔣主席提出了有關中國天主教發展的意見，這些意見書面化後，就成了九月二十日方豪上蔣主席的第二次建議，內容共有六項；有關中梵關係者在第五項；「關於對教廷之外交關係：我國必須要求教廷儘速派遣駐我國之正式外交使節。且必須為大使資格。我國駐梵蒂岡公使亦升為大使，同時進行訂約。先由熟悉教會內情者，赴羅馬進行初步接洽，然後再由外交部派員會商議約。關於此事豪願盡心效勞，促其實現。」<sup>73</sup>

在蔣主席接見方豪之後，方豪的意見書面化之前，九月十日比利時駐華大使往外交部會晤甘次長，提及使節升格問題：「比大使：近自羅馬方面獲悉中國政府有意將駐教廷使節升格為大使，並將中國各教區主教改任中國人充任，比國政府對此深感興趣，願悉此事是否確定在中國政府進行之中？甘次長：前曾有人建議將駐教廷大使升格為大使，惟政府方面尚未有實行此建議之準備。」

從比國大使的話中猜測，有可能係因中國駐法、比大使曾拜訪各國樞機，不僅在任命中國樞機

<sup>72</sup> 〈謝壽康致外交部電〉，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發電，〈外交部檔案——本部與駐教廷謝公使往來電（一）〉。

<sup>73</sup> 〈抄中國天主教戰後事業暨我國與梵蒂岡關係之建議〉，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〇九。最後這兩句是方豪自己的意見。

事上，亦在使節升格事上請求予以協助，故方有訊息會自羅馬傳出，稱中國政府有升格之意。不過外交部內真實意見仍然保守，在答覆方豪所提出的第二次第五項意見時，有關通使事，原則似已確定：「教廷派使駐華，當無問題，似應由教廷先派正式使節來華，往後再談使節升格問題。<sup>74</sup>」

羅馬方面不會單方面的希望以大使層級建交，並一廂情願的向中國政府提議，教廷方面應有某些情報來源，可證明國民政府內部確有此意。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于斌晉見蔣主席，在其記事本中載：「今日下午五時半在中四路主席官邸晉見蔣主席談半小時(1)譯聖經(2)教廷使節升格(3)田樞機(4)赴各都市宣慰(5)索京地三百畝(6)光啟大學(7)幹部訓練(8)益世報(9)文協農工(10)海外宣傳，亦提馬歇爾、赫爾利。<sup>75</sup>」這些談話有許多與方豪第二次建議內容相同。如果不是于斌在教廷使節升格事上得到了肯定答覆，然後他也聯絡了一些外館以為聲援，羅馬方面是不會肯定的認為國府方面將以大 使層級和教廷雙方換使。

在田耕莘即將接受樞機任命的良好氣氛中，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教廷國務院政務次長達迪尼 (Domenico Tardini) 約見謝壽康：

「重慶外交部。今日下午六時。教廷外部政務次長約往晤談。伊首請正式呈報鈞部。教廷接受中國政府欲教廷派駐華大使之願望。擬不久派大使前往。職答以迄未接到訓令表示此項願望。伊謂據其所得各方報告。中國政府有此願望。教廷極願接受。擬從事使其實現。並擬派蔡寧主教前往。但在未實現

<sup>74</sup> 〈外交部致內政部張部長函稿〉，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集編〉，頁一一一。

<sup>75</sup> 于斌一九四六年記事本。

以前。本人亟願知道貴使之意見。職詢以是否徵求同意。伊謂此非徵求同意。祇係友誼詢問個人意見。答以寧主教在華甚久。身體不好。或需養息。伊謂如此則教廷可另派他人云云。職退出後。即往訪剛總主教。請其注意人選。伊謂教廷必選擇中國歡迎之人。並謂萬一中國不接受教廷提出之人選。而請另派他人。教廷並不丟面。因徵求同意為秘密步驟云云。謹聞。並敬懇電示鈞旨。又此事與中國公教關係極大。可否請通知于主教。是否有當。敬祈鈞裁。職謝壽康。<sup>76</sup>」

從達迪尼的態度可以知道，他以為國民政府是準備以大使層級換使的。謝壽康不方便表示意見，因為他是當事人，他只能以未接到訓令回答。他應該知道，就算不知道也可以猜到，在國民政府方面的推動者是于斌，因此訓令不發下來，還需于斌前往政府方面遊說，這是必須通知于斌的主要原因。

外交部是否將此事告訴于斌不得而知，但在二月二十二日，外交部針對謝壽康報告的內部意見已經做出。「教廷派使。我自可表歡迎。惟派遣大使尚無必要。且我過去對教廷並無互派大使之諾言。至使節人選方面。教廷所提蔡寧主教。因該主教在我抗戰期間。多年駐平。對後方教區。素欠聯繫。似可不予同意。……<sup>77</sup>」這個意見後來就形成決定，告訴了謝壽康，謝壽康告訴教廷國民政府的決定，教廷國務院的回答是：「中國政府初似希望互派大使，現若只欲派公使，教廷亦可照中國政府之意思辦理。」這番話中表現出些許不悅，因為教廷收到了錯誤的訊息，作了錯誤的判斷。從羅光寫給于斌的信中可以得知這些訊息從何而來：「田樞機抵羅馬，第一次往見教廷國務院常務

76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一八。

77 〈對教廷派使來華外交部官員意見〉，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二〇。



次長孟提義時，即表示中國政府希望教廷派大使駐中國。事前，潘薛（按：潘朝英、薛祖恆）兩先生已對孟氏有同樣表示。<sup>78</sup>「潘朝英、薛祖恆在二月十日抵達羅馬，田耕莘在二月十四日抵達，因此教廷國務院從這些人口中聽到相同的訊息，自然認為國民政府的意思就是如此。殊不知田耕莘與國民政府素無往來，他得到的訊息應該是傳自于斌方面，而潘朝英等人則與于斌關係密切。諸種跡象都指向于斌，于斌當然也不會買空賣空，他只是想不到蔣主席的首肯，不敵外交部內部官僚的意見。」

羅光在同一封信中也說教廷對中國政府的態度是不太高興的。「此次對中國政府之表示，雖已立時答應接受，頗尚有所疑慮，主教是否能向外部將全盤事件，加以明確之解釋，使中國與教廷雙方關係走上正軌，然後則可一勞永逸。<sup>79</sup>」

至於教廷駐華使節人選，達迪尼一開始即提示蔡寧，自然是一種希望的表示。但謝壽康當即委婉表明不贊成，未久國民政府亦訓令不予同意。蔡寧未能成為正式使節，主要是因為他在抗戰時期駐平，不左不右的態度所致。蔡寧自己倒是很積極的期望擔任首位駐華公使，日本宣佈投降後，在十月初旬蔡寧就到了重慶，開始與國民政府各部門接觸，十月十三日，蔣主席在官邸宴請蔡寧，作陪者有尚惟善主教、吳經熊、葉秋原等人。<sup>80</sup>于斌在十月九日回南京教區，十月十九日又趕回重慶，在以後的記事本中，于斌也記載了陪同蔡寧訪問政府官員的行程。

<sup>78</sup>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

<sup>79</sup> 同前。

<sup>80</sup> 〈建國初期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國大陸參考資料〉第四冊，頁七二五。

雖然教廷方面在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間即已明白國民政府意向，是不願由蔡寧出任首任駐華公使的，但似乎他們並未將此消息告訴蔡寧。在蔡寧的想法中一定認為，若他不能出任駐華公使，于斌是其中關鍵的角色。但蔡寧在一九四六年五月間至少與于斌碰面三次，完全感覺不出有何尷尬氣氛，所以他直到此時應該什麼也不知道，直到六月十八日，教廷駐華公使人選公佈，六月二十六日，于斌拜訪蔡寧未遇而返<sup>81</sup>，這個閉門羹，最可能的原因應該是認為于斌要為這個結果負責。

蔡寧在辭別中國後，九月抵羅馬。羅光描述了他在羅馬的情形以及羅光對他的觀感：「蔡主教在九月間抵羅馬，留此僅一週，拜謁教宗、傳信部及外交部當局，隨即回鄉休養。在多方所發言論，多係自己辯護之詞，尤其注意詳說本人與中國政府當局，感情融洽，與蔣主席更特別要好，此次被調回國，絕非中國政府有任何表示。總之，中國要人都三番五次希望他回中國，抗戰時期，他本人完全沒有偏袒日本，留住北平，乃係蔣主席曾有所示意，一九三九年的守中立之通函，用意防止袒日袒共，蔣主席因此贈以大勳章。若謂留住北平為失策，此乃無知之談。當田樞機入京，蔣主席歡宴時，沒有給他下請牒，必係有人暗中指示，言談中對總主教常有所影射。光乃謁見剛公，開誠表示對蔡主教之態度有所不滿，剛公很明瞭其中情景，他的結論是：「可以放心，蔡主教與中國傳教之關係已經結束，以後無可影響之處，個人思想無法可變更，這也很可惜。」<sup>82</sup>」

根據羅光的信件，蔡寧所說的許多不是事實，他對於于斌的判斷也不正確。于斌或有可能亦不願蔡寧任駐華公使，但從外交部檔案中可以看出，于斌能直接影響者是蔣中正，而外交部原本就不喜

81 于斌一九四六年記事本。

82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蔡寧，謝壽康亦然，故整個決策過程，並不需于斌曉舌，外交部就自有決定。不過換一個角度看，他對於斌的感覺也沒有錯，當蔡寧發佈勿左勿右公函後，他選擇在中國的不同政治勢力中保持中立，他就已和于斌走上不同的道路；于斌基於教徒愛國的理念，極力支持國民政府，並仍持續拉攏國民政府和教廷的關係，從此兩人就道不同不相為謀了。

### 三、建立中國聖統制

在方豪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給國民政府的書面建議中，第三點是「關於未來首都主教」，第四點是「關於外國教士問題」，其內容如下：

「(三)、關於未來首都主教：于野聲主教功在國家。但限于南京一區不能指揮全國教務。且聞教皇有令其出任教廷某要職之說。而將來首都如在北平。則北平主教亦須由本國司鐸升任。關於此節。我政府可向教廷提出建議。

(四)、關於外國教士問題：天主教採用教區制。每教區之領袖為主教。有最高權力。直接受教廷轄制。互不統屬。且我國惟澳門為正式主教區。餘僅為主教銜之宗座代牧區。故我政府必須向教廷要求將各教區升為正式主教區。主教一律由中國人擔任。仍歡迎外籍教士在中國主教領導下。在我國傳教。此外並須設置首都總主教。以統事權。總主教一職。可由我政府推薦適當人選。<sup>83</sup>」

<sup>83</sup> 〈抄中國天主教戰後事業暨我國與梵蒂岡關係之建議〉，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〇八。

特別是第四點，呼應了教宗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接見謝壽康時的談話，「對中國傳教方針。係培植中國司鐸。俾得作最近將來中國全國主教。改由中國司鐸升任云。」<sup>84</sup>而這也是教廷自夫至大通諭以來，對中國教會的長期目標。方豪的建議中提出了一個具體方案，就是將代牧區改為正式的主教區並由中國人任主教。而這個具體方案在比利時大使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拜訪外交部時亦曾提及，因此這不應僅是方豪希望國民政府與教廷商談的建議而已，這應該是從一九四四年九月于斌訪問教廷時，即在醞釀有關中國教會改革的方案一部分；其中包括了任命中國樞機、教廷與國民政府雙邊通使並升格，以及建立正式主教區，也就是中國聖統制。

因此教廷在規劃任命中國樞機時，相關的配套措施就是設置中國主教區。提出相關計畫的應該是傳信部秘書長剛恆毅，從他任駐華宗座代表開始，他一手推動了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架構，在任傳信部要職後，對中國教務的瞭解，使他成為處理此事的不二人選。雖然由於謙遜的理由，他稱此為庇護十二世的偉大功績，在他的回憶錄中並未提及其功勞；但他詳述了相關的數字及設置的淵源及理由，「所以成立主教聖統的時機，似乎已經成熟，如同在印度和日本都已經成立了。」<sup>85</sup>

這個設計的過程至少好幾個月，必須透過蔡寧去調查、瞭解中國教會的狀況，可能的反應，可能的規劃，微詢相關人員意見，再考量實際的狀況後，最後才由中國的新任樞機向庇護十二世提出請求。教宗也象徵性的接受了田耕莘的申請，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正式公佈成立中國聖統制，大

<sup>84</sup>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九十三。

<sup>85</sup>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零落孤葉〉，頁三七七。施森道認為此事由剛恆毅推動是「想當然耳」。施森道，〈中國聖統制的建立〉，〈慶祝我國建立聖統制五十週年暨紀念六位國籍主教祝聖七十週年會議手冊〉，頁二十六。

致按照中國的行政區，將中國分為二十個教省，設置二十個總主教，七十九位主教，及四十三位宗座監牧。這些宗座監牧區是預備在未來升為正式教區的。<sup>86</sup>

傳信部方面的設計和方豪所提建議在原則上相似，但在實際規劃上，不可能如方豪所說，全中國主教皆由中國司鐸出任。因為一方面中國神職人員的質量仍然不足，另一方面外籍傳教士的反彈將難以避免。在消息正式公佈前，駐教廷公使館已接獲傳信部消息，希望在二十總主教區中，多任命幾名中國籍總主教。謝壽康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特往訪外交部常務次長。依擬田樞機意思轉詢。表示中國希望南京、北平、漢口、廣州主教職務任命或改任國人擔任。<sup>87</sup>」其中北京主教滿德貽 (Paul-Leon-Cornil Montaigne) 在二月十一日以健康因素請辭；于斌是原來的南京主教；原漢口主教希賢 (Eugene Massi) 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病故，公使館方面一直與教廷交涉，希望改派國人出任。而廣州則是另一具有象徵性意義之所在。教廷立即表示願意接受，因此雙方在事前應已有過非正式的意見交換，才會有此一雙方都接受的結果。

羅光做為這些非正式交涉的中間人，他的說法具有最高的可信度。他說：「傳信部於今為中國教務，籌備一根本方案，使中國成立正式教務統序。凡可改為主教區之代牧區，都改為正式主教區，較大之教區，且將改為總主教區。可是眼前中國各省省會教區，俱在外籍教士之手，一旦正式成立教務統序，則總主教將盡為外國人，這不但在中國今後傳教方針上，無所補益，而且反顯出中國主教都做外國主教的下人。故使館方面已多方向教廷要求，南京、北平、漢口、廣州，一併交與

<sup>86</sup> 同前，頁三七四。

<sup>87</sup>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二三。

國籍教士。剛公以為此事可以照辦。<sup>88</sup>」

不過教廷並非全盤照辦，廣州主教魏暢茂（法國人）素具威望，在四月十一日成立中國聖統制的命令中，由其繼任廣州總主教，南京主教于斌如預期繼任南京總主教。但開封、漢口、南昌、福州、北平的總主教均暫時付之闕如。五月十日正式公佈田耕莘接任北平總主教，七月十八日任命保定主教周濟世（國人）任南昌總主教，漢口總主教則由羅錦章（Maurice Rosa）升任。<sup>89</sup>此時二十個總主教區中僅有三個由國人任總主教，不過至少具有象徵性的故都北平和首都南京，都已由國人擔任總主教。

在這些事都告一段落後，謝壽康在卸職之前拜訪孟棟義總主教，這位國務院的常務次長和他說：「各國首都總主教地位極其重要。于總主教原係代理主教。教廷甚重視之。可以不令其繼任。此次教宗特命其為南京總主教。蓋欲褒揚其過去功績。鼓勵其將來對中國全國教務之努力。煩將教宗重視首都總主教之意轉達貴政府。<sup>90</sup>」這番話正可作前三段的小結。孟棟義藉此安慰于斌，也和中國政府表示教廷對首都總主教的重視，而言外之意是教廷也需要顧及外籍傳教士的想法；也要中國政府瞭解，教廷外交的苦衷。只是中華民國外交部，能瞭解孟棟義這些話的意義嗎？

88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

89 趙慶源編著，〈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台南：聞道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九月出版），頁一一八—一三〇。

90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二七。

#### 四、首任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國務院常務次長孟棣義通知謝壽康，謂教廷有意派遣黎培理總主教為首任駐華公使，並徵求國民政府同意。<sup>91</sup>黎培理為法義邊境的摩納哥國籍，父母均為義大利人，生於一八九七年，一九二二年晉升司鐸，然後轉學羅馬額我略大學，獲有教會法博士學位。被選入教廷外交學院，卒業後在一九二五年，派往玻利維亞、愛爾蘭等教廷大使館任館員，一九三四年，升任教廷駐東非英屬殖民地宗座代表，領總主教銜。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後，義大利對英宣戰，英殖民地政府要求黎培理撤退，黎培理乃返回羅馬，任教廷救濟外國僑民事務所主任，訪問被義大利集中之各國僑民，直至被任命為駐華公使。<sup>92</sup>從黎培理的經歷來看，他可說是典型的教廷外交官。謝壽康給他的評語是：「人雖好言，但無甚過失。」

在得到國民政府的肯定答覆後，庇護十二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發表在中國設立使館的正式詔書：

為永久存計由——查羅馬教宗為謀求全體信徒利益，關懷之事至為繁重，尤力圖在各國設置代表，藉以促進教廷與各國間的相互關係。因此，鑒於本教廷與中華民國之共同關係，猶待加強，目前之代表公署必需適宜調整；本宗座認為在遙遠的中華民國，重新部署代表處，刻不容緩。是以，對有關各

<sup>91</sup>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二三。  
<sup>92</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二二九。

端，深思熟慮之餘，主動且真知審斷，決定以本聖座權力，頒發本詔書，設置並成立中國代表處，即教廷公使館，賦予新成立的使館享有凡該級使館之全部及各個權利、待遇、榮譽及特權。此案既經確立，深信本座與中華民國之外交關係，從此正常發展，兩國間有關宗教及國家之事端亦將益趨融洽。茲裁定本詔書之法定效力，持久不變，其內容自必一一付諸實踐。教廷駐中華民國公使館於茲成立。本決定既已完成，此後如有任何個人或其他掌權者擅改觸犯，不論其明知或過失所致，均屬無效，於法不得行使。其他任何事端不得阻止本詔書之施行。

發自羅馬聖伯鐸大殿（恭教宗漁夫國璽）。時在本教宗在任第八年，即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

庇護十二世<sup>93</sup>

蔡寧在九月回歐，黎培理至十二月方抵華履新，此前駐華宗座代表公署一直設於北平，首任的教廷駐華公使館則設在首都南京。在黎培理初抵中國時，他最重要的支持者為南京總主教于斌，他倚賴于斌協助與國民政府的溝通，而教區事務的轉達，不論是外籍主教或國籍主教，也都需于斌的協助。兩人見面的頻率相當高，三五天平均就有一次，而公使館的美籍館員葛理耕神父及華籍館員陳哲敏神父，則更常來總主教公署。<sup>94</sup>

由於中國聖統制初立，同時甫經常年戰禍，各教區需大力整頓，駐華公使館復為新設，為表示對中國教會的支持，教廷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特別撥發一百萬美金為「中國教區事業特別津貼

<sup>93</sup> 〈教宗庇護第十二設立駐華公使館詔書〉，一九四六月四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二五—一二六。  
<sup>94</sup> 于斌一九四七年記事本。



費」。<sup>95</sup> 然後由於國共內戰中，難民激增，教廷也在同年年底特別撥款援助中國難民，總數不明，不過也至少是數十萬美金之數。這些款項都透過教廷駐華使館視需要轉發。

黎培理來中國後，與國民政府頗能相得。主要原因是他執行庇護十二世反共政策，與國民政府立場一致。從教廷觀點出發，無神論的共產黨才是其思想上的最大敵人，而蘇聯及南斯拉夫迫害宗教的作法，也使得教宗在歐戰甫結束之際，即向共產政權提出抗議。<sup>96</sup> 到了一九四八年義大利國會大選時，因共產黨可能獲勝，庇護十二世乃公開向其宣戰，號召有投票權之公民擊敗共產黨，要求義大利天主教徒在四月十八日投票日去投票，否則犯良心重罪；並且應選舉願意擁護神聖法律及教會權利之候選人。<sup>97</sup> 教廷駐華公使要執行教宗意旨，教宗明白宣示反共，黎培理自亦不能後人。

從日後中共大量製造的反黎培理文宣中可以看黎培理的反共行為：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黎培理發佈教廷駐華公使館——蒂字第一號」為公教團體或個人不得參加反動組織」的訓令……「一九四七年，黎培理赴各教區巡視時，積極煽動教徒支持蔣介石反人民內戰。他說：「本人被派駐中國的使命是在協助政府完成「民族復興的工作。」他號召教徒「集中力量與政府密切聯繫。」同年秋，人民解放軍轉入對蔣匪軍的進攻，黎培理緊接美國帝國主義者魏德邁之後，親自趕到北平和瀋陽，並由美軍專機送到長春，五天之後，又飛到當時正被人民解放軍包圍著的

95 〈駐教廷公使館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發電，〈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二九。

96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五年六月三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〇二。

97 黎正甫，〈庇護十二世的生活〉，頁一三〇。

太原，組織天主教的神甫和教徒參加蔣匪的反人民戰爭。<sup>98</sup>」

「一九四八年，國民黨統治區的愛國民主運動日漸高漲，並且逐漸發展到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基地——教會學校的愛國師生員工中來了，這使黎培理大為震驚。於是就在一九四八年他在上海召開了「全國公教教育會議」。為什麼召開這個會議呢？黎培理公開的說是為了「反對共產主義」和「憎恨階級鬥爭」。……<sup>99</sup>」

「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設於上海市岳陽路一七九號，他的前身是天主教教育聯合會。一九四七年，臭名遠揚的帝國主義份子黎培理，鑑於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形勢的迅速發展，為適應「非常時期」，經羅馬指示，改組成立了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在黎培理直接領導下，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印發了大批反動書刊，並指揮著天主教反動組織「公教行動隊」及「聖母侍御團」進行反革命活動。<sup>100</sup>」

這個天主教組織在文化宣傳上經常發表反共言論，出版反共書刊，是中共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團體。他的成員有華理柱 (James E. Walsh) 美國瑪利諾會傳教士。趙玉明 (G. Predost) 加拿大傳教士。高樂康 (François Legrand) 比利時籍聖母聖心會士。梅雨斯 (Charles Meeus) 比利時籍輔助傳教團神父。莫克勤 (William Aedan McGrath) 愛爾蘭高隆龐會士。陳哲敏，中國籍神父。沈士

98 〈帝國主義份子黎培理的罪行〉，〈建國初期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國大陸參考資料〉第三冊，頁四五二—四五三。

99 季音、邵平，〈黎培理——梵蒂岡的陰謀使者〉，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建國初期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國大陸參考資料〉第三冊，頁四六一。

100 〈羅馬的天主教教務協進會〉，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人民日報〉，〈建國初期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國大陸參考資料〉第三冊，頁四七〇。

賢，中國籍神父。董世祉，中國籍神父。<sup>101</sup> 在中共的文宣中，這些人都是帝國主義侵略的打手。

##### 五、第二任中華民國駐教廷公使吳經熊

中華民國第二任駐教廷公使是吳經熊。吳經熊生於浙江寧波，出身基督教家庭，留學美、法、德國，獲有法律博士學位，他有一定的中文根底，但也有和西方知識份子一樣的英文水準，專業復為法律，是民國初年新知份子中的佼佼者。民國二十五年的五五憲草，是由當時不過三十餘歲的吳經熊領銜起草的，可以看出他的程度與能力，已頗為時人所重。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間，他由基督新教皈依了天主教，在這同一時期開始與于斌論交，抗戰以後到大後方，受蔣委員長委託翻譯聖經，到重慶時，經常是于斌辦事處的座上客。一九四四年因日軍逼近，舉家由桂林遷往重慶，每主日又在方豪神父處參加彌撒，並由方豪協助翻譯聖經。<sup>102</sup>

有關譯經在天主教學術中是一種專門的學問，由於聖經最初的版本，猶太人的文化背景，及其後基督教的發展，聖經學者應該要會古希臘文、希伯來文及拉丁文，這對中國學者而言非常困難，因為這些都不是活的語言，吳經熊學通中西，但這三種工具語言也是他的最大障礙，他翻譯聖經主要要是藉由英法版的聖經翻成中文，外籍聖經學者遂因此抨擊他，認為他不夠資格。不過換另一個角度看，外籍聖經學者，或中文造詣不夠的國籍神職，沒辦法用好的中文翻譯，其實也是一大缺陷。

<sup>101</sup> 顧衛民，〈中國與羅馬教廷關係史略〉，頁一八七～一八八。

<sup>102</sup> 方豪，〈吳德生先生翻譯聖經的經過〉，〈方豪六十自訂稿〉下冊，頁一九七七～一九七八。

在吳經熊翻譯聖經的過程中，方豪在拉丁文上提供不少協助，但抨擊仍然不免，吳經熊因此有意赴梵蒂岡，因為梵蒂岡有聖經委員會，對聖經原文有疑義時，可以很容易找到權威的解釋。<sup>103</sup>

所以吳經熊擔任駐教廷公使的主要動機就是翻譯聖經。一九四五年八月，蔣主席已在考慮這方面的問題，不過謝壽康有功於國，沒有理由突然加以調換。到一九四六年七月，因謝壽康法文程度佳，又有長期在歐洲服務的經歷，於是命其參與戰後在巴黎舉行的和平會談，然後順理成章的請其展開新任公使的諮詢工作。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謝壽康往見國務副卿孟棣義，告以將調職歸國，並為派吳經熊繼任徵求同意。「伊答稱此事毫無問題，惟答覆尚須經過相當手續。<sup>104</sup>」

謝壽康固然是一稱職的外交官，但他畢竟對教廷事務具有一種基本上的陌生；同時駐教廷使館，也沒有什麼棘手的國際事務需處理，這時義大利使館亦已恢復，一般僑民問題可由駐義使館負責，駐教廷公使，實際上是清閒之職。教廷對於吳經熊是更歡迎的，首先他的教徒身份，容易在精神上有所契合感，其次他的學者身份，再加上主要目的是翻譯聖經，更使他得到教廷人員的尊重。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吳經熊率全家十六人抵達羅馬，二月十六日晉見教宗，吳經熊以英文致頌詞，這篇頌詞不是一般性的應酬文字，其中的文字表現了吳經熊的文化背景及信仰內涵，以及他如何整合這兩個部分，他在第一段中說：

<sup>103</sup> 同前。

<sup>104</sup>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二六。這封電文內容非常短，或許反應出謝壽康不悅的情緒。

「教廷乃人類精神力量的極致，中華為遠東文明的淵源。中國駐教廷公使的職責，則在使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日形密切，日見穩固。……聖經所述說的加納婚宴，在超性的永遠光明內，或可視為東西文化婚合的象徵。」

「聖上以人類的和平，無論是私人內心之寧靜，家庭之和睦，世界之大同，都靠仁愛而後有成。……中華民族所有歷史，已相當久遠；自身的經驗，已足夠使自己懂得精神勝於物質，正義高於強權。這種信念，薰陶了中華民族，使他每當國運危亡之秋，常能上下一心，臥薪嘗膽，養成「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不老秘訣。……聖上多次申論博愛之道，以「唯有仁愛，方可消弭仇恨，洗滌嫉妒，滅除鬥爭，使人類和平，根深蒂固」(Summi Pontificatus)；而中國傳統道德，亦以「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為出發點，這兩種思想又如乳水相融，毫無隔閡。<sup>105</sup>」

以雙方思想的契合為基礎，吳經熊在此頌詞中特別提及中國教士教民愛國的事實。他說：

「……戰時中國教士教民，為國為民，勤勞服務，尤足令人感念不忘。今後建國時期，這輩教士教民，必仍能不負人民之期望，竭智盡力，再有建樹。聖上曾說過凡為忠實教友，必為國家良民，鄙人希望中國不久能發生一種蓬蓬勃勃的精神復興。那時教會在中華，必將成為富有美葉的樂園，「五穀豐登」，多有收穫。<sup>106</sup>」

這篇頌詞頗受好評，吳經熊的朋友，著名的宣道家布克曼 (Frank Buchman) 博士當時也在梵

105 (吳經熊公使呈遞到任國書頌詞)，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二〇六、二〇七。  
106 同前，頁二〇七。

蒂岡，告訴吳經熊，他一些梵蒂岡圈內的朋友，認為這是二十五年來他們所聽過的最好演講。吳經熊謙虛的說，或許是因為他是一個業餘的外交官，這些思想的來源是「愛的外交」。<sup>107</sup>

吳經熊的學者風範、真誠的態度，深刻的信仰使得他一到教廷就受到注意及喜愛，他龐大的家庭也是原因之一，吳經熊的十三個兒女都和他一起到了教廷，當他們集體出現時，特別引人注意。教宗安排了一次與其家庭會面的時間，同時準備與其家庭合照；吳經熊擔心太過特殊的安排，會引起其他使節側目；國務次卿孟棣義的回答是：「不用擔心，其他使節要有至少十三個小孩才能援用前例。」<sup>108</sup>

抵達教廷並安排妥當後，吳經熊大半的時間都用來翻譯聖經。這時他譯經的主要助手是羅光，羅光回憶說：「我上午到使館辦公，下午也到使館，替吳公使校閱新經譯本。吳公使對於譯經，很下了工夫，所帶來的譯本是第三次抄定本。我把他的譯本，同他種中文譯本，英法義德各種和拉丁文希臘文本相互對照，遇到有不妥的句子便指出，和吳公使商酌，他再三思索，然後把句子改定。<sup>109</sup>」除了下午的譯經工作外，據吳經熊最小的兒子樹德言，他父親也經常利用假期，離家住在某清靜別墅，進行譯經工作。這在一般使館看似不務正業之舉，卻是蔣中正派吳經熊出使教廷的主要目的，教廷中人也覺得理所當然，並因此敬重中國的公使。

吳經熊並不常處理館中瑣事，羅光言：「吳公使一家的人口既然很多，家中雜務繁多，但是

<sup>107</sup> John C. H. Wu, *Beyond East and West*, p.331 (台北:美亞書版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六九年三月初版)。

<sup>108</sup> *Ibid.*, p.332.

<sup>109</sup> 羅光,《羅瑪四記》,頁三一四。

我們倆談話時，談家中雜務很少，談館務也不多；他把這一些事務都信託於我。<sup>110</sup>」吳經熊所注意者為中國與教廷外交之大原則，及影響中梵外交的國際形勢。羅光在館務中扮演要角，並不始於吳經熊，實際上自一九四六年八月後，羅光就有主要影響力。他寫信給于斌說：「謝次彭公使自七月底赴巴黎參加和會後，曾回羅馬兩次，然每次僅留住四天，現尚在法京，使館任務，實際上都由光代理。<sup>111</sup>」羅光這個角色從此一直持續相當長時間。

#### 六、使館升格交涉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吳經熊為使館升格事向外交部呈送意見：

呈為呈請事。竊戰後教廷在國際之地位愈趨重要。不僅能左右分布各國之四億信徒。且其道德上及政治上之力量足以影響世界局勢。故各國類多與教廷互派大使以敦睦誼。年來教廷對於我國至為重視。尤表親善。除任命國籍樞機總理教務外。又建設教會正式統序（*Hierarchie ecclesiastique*）。且復間接向美國疏通。促進援華事宜。籲請美國教民踴躍捐輸。故我國對於教廷之交誼。宜有更進之表示。……綜觀教廷與各國之外交關係。凡互派公使者。均屬小國。竊按國際慣例。因使節等級之差別。公使恒處大使之後。我國為五強之一。而教廷在現在之國際地位又極重要。但雙方祇互派公使。故我國在教廷使節之地位。反落多數小國之後。非惟影響國際地位。抑且引人誤會。以為我國輕視教廷。或以為我國與教廷之關係。未臻密切。竊查我國現時派駐希臘。朝鮮。緬甸。伊朗。玻利維亞。埃及等

<sup>110</sup> 同前。  
<sup>111</sup>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國之使節。均屬大使。而教廷在國際地位之重要性。實不在各國之下。故雙方使節之昇格。似屬必要。亦即曩日通使之初。教廷已有互派大使之議。後教廷國務部向職屢有此項表示。本月二十六日。職為洽商援華事宜。往晤該部政務次長。彼復附帶談及昇格之事。並謂倘我政府能派大使。教廷實引以為榮。惟教廷如派大使。則必須為使團領袖。此係國際習慣。不便破例。設我政府對此認為未妥。則可由我國片面昇格。而教廷駐我國之使館可仍舊不變。又謂雙方使館等級之差別。教廷視為常事。蓋教廷體制特殊。與各國通使。雙方使節之等級不必相同。片面遣使或片面昇格已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竊查教廷大使之為使團領袖。已屬國際慣例。且其職務無關重要。行於各國向無問題。如戰前之德國及現在之法國。均由教廷大使為使團領袖。而英。美。蘇等國對之毫無異議。故如能雙方將使節昇格。實為上策。倘鈞部對於使團領袖問題有所不便。則惟片面昇格。教廷亦所引以為榮。竊職館建議之使館昇格。純為我國對於教廷之友誼及國際地位關係。且為教廷所樂予承受而引以為榮者。絕無個人之企圖也。職前歲受命之際。早無因職位關係而有所猶豫。個人去留更無重輕。且昇格後之首任大使人選。鈞部自有權衡。事關國際地位及促進友誼。伏乞賜察實情是否可行。……112

以吳經熊在國內的身份地位，擔任公使的外交官確有所屈就。不過他既然能不計名份為譯經而來，他的自尊使其不會主動謀求大使職位。而若羅光所稱館務由其負責，並非誇大之詞，則羅光應是策劃使館升格的主要人物，吳經熊只是在適當的時候簽署而已。

教廷在與中華民國雙方通使時，就希望同時升格為大使層級，主要的推動者是中國教會人士，

112 〈駐教廷公使吳經熊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三二—一三三。



而反對者則為中華民國外交部，兩者在國府主席蔣中正間拔河，一九四六年六月，田耕莘返國後，立即再向國民政府呈請使節升格，這次外交部的答覆最能反應外交部真實想法。他們認為：

「(一) 中國多數人民並非天主教信徒。中國政府與教廷之關係，自不能與若干天主教國家相同。(二) 即天主教國家，為尊重政教劃分之原則，亦多有不與教廷互派任何使節者；例如法國是。至於非天主教國家，則大率不派任何使節。(美國總統，在此次戰爭期內，曾派一代表，最近亦已宣告撤回，決不再派)。(三) 我政府如對教廷過分重視，破一切慣例，改派大使，國際間或不免疑我將利用教廷，如某種國際政策之工具。(四) 宗教事宜，本屬內政問題，教徒之保護，原為政府之權責。我如過分承認教廷之地位，積時既久，教廷在中國之代表，及其所屬教會或不免形成一種干涉力量，引起社會之反感，於天主教及中國，均有不利。基於以上考慮，故本部電復表示歡迎教廷派公使來華，但無互派大使諾言。」<sup>113</sup>

從文句中可以看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吳經熊的電文是和一九四六年王世杰的簽呈有針對性的。但其實爭執並不在吳經熊與外交部之間，而是中國教會持續使節升格的嘗試。而在教廷方面，不會如此突兀的和吳經熊提出由中方片面升格條件的，因為外交在原則上是講求對等的，不對等的關係是例外。此必係事先已有人往教廷作非正式溝通，使教廷瞭解外交部立場及不願升格之理由，教廷才會提出片面升格的說法。還要有人必須能先瞭解蔣總統意願，或是能遊說蔣總統同意這種不對等升格之事；然後再讓駐教廷使館人員先進行非正式溝通，默契形成後，再由教廷國務院政務次

113 〈外交部長王世杰呈國府主席蔣中正簽〉，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二四。

長達迪尼與吳經熊正式晤面，表達可片面升格的條件。由諸種跡象判斷，在幕後策劃者為于斌，而在羅馬奔走者則為羅光。

為確保此次片面升格訴求能夠成功，于斌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抵達羅馬，再由羅馬致函蔣總統，謂「教廷歡迎我方單獨升格，吳公使為教廷推重，至為適宜。」<sup>114</sup>蔣中正接電後，立即發函要求外交部配合，這基本上是藉蔣總統之威，迫外交部就範。不過為了緩和這種氣氛，于斌自歐抵美後，也致電外交部長，請求外交部支持。<sup>115</sup>吳經熊在再致外交部電文中提及：「……于總主教曾奉總統命，向教廷商榷使館升格事。……既有上項接洽，我方升格似宜舉辦，以昭信義。」<sup>116</sup>在體察上意後，外交部歐洲司的立場轉而鬆動，表示：

「我國係信教極自由之國家，亦無國教之設立，我如將駐節教廷使節升格，並不受任何信仰傳統及習慣之拘束。且教廷機構特殊，與各國通使，雙方使節等級不必相同。且前英荷派有使節駐節教廷，教廷未遣使節駐節英荷；教廷遣有大使駐節瑞士，瑞士未遣大使駐節教廷。故片面遣使或片面升格已成慣例，不足為奇，亦不影響二國間之平等地位。以教廷今日國際地位重要，對我屢寄同情，我為加強運用，以收爭取國際愛好和平國家實效起見，對教廷希望我方單獨將我國駐教廷公使單獨改升大使一節，用意原屬亟善，似未使固封。」<sup>117</sup>

114 〈于斌致蔣中正電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該電文收藏於輔仁大學校史室。

115 〈于斌致南京外交部長電文〉，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該電文收藏於輔仁大學校史室。

116 〈吳經熊致電南京外交部〉，一九四九年一月九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四一。

117 〈外交部歐洲司簽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三九—一四〇。

外交部禮賓司所最注意者即為關係的合宜及對等，對這種不對等關係，一直持保留態度。他們提出四點意見：

- 「一、將教廷使館原呈所稱歐洲如法、西、葡等國以及南美各國均與教廷互派大使一節，係因歐洲各國多以天主教為國教，且已各有長久之歷史，至南美有西班牙傳統之國家亦多奉為國教。
- 二、兩國派使原應以互派同級使節為原則，片面派使固所常見，而片面升格，則為數極微。
- 三、我如與教廷正式升格，勢須以教廷大使為駐華外交團之領袖，在我方亦似感有不便之處。
- 四、片面升格之事，如我方認為可行，似亦應由教廷電飭其駐華公使正式向我建議提出洽商；并我前擬與菲律賓相互升格一節，前經菲方答復，贊同片面升格，我已不予考慮矣。」<sup>118</sup>

其實禮賓司的意見是很有風骨的，不論其對錯，即使面對總統的壓力，他們仍堅持自己的專業意見。這件片面升格干涉雖然中國教會人士已多方準備，但進行兩個月後卻無疾而終，禮賓司的反對並不是主要原因，中國局勢的劇變才是最重要的原因，支持駐教廷使節片面升格的蔣總統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引退，沒有了這位最重要的支持者，未循正常外交管道進行的使節升格交涉也就不再用再談下去了。

### 第三節 中梵外交關係轉向渾沌不明

118 〈外交部禮賓司意見〉，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四〇—一四一。

### 一、庇護十二世的中國政策：堅守崗位

庇護十二世的中國政策是隨著中國情勢的轉變而制訂的。在正常的情況下，為扶助中華教會的正常發展，庇護十二世積極的發展與國民政府的關係。但中國內戰的局勢，迫使庇護十二世必須思考中國教會的生存及發展，於是制定出「堅守崗位」的政策。必須明瞭這是教廷世界性的政策，當共產勢力在各地擴張時，「堅守崗位」政策一視同仁的適用於所有地方。庇護十二世也有充分的經驗實行這種作法，當他年輕時任駐巴威王國大使時，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混亂中堅守崗位；然後是二次大戰後期，德軍佔領羅馬時，這位新教宗也無畏的留在梵蒂岡。在教會歷史上，這是一種相當普遍的作法，在中梵關係發展的過程中，剛恆毅及蔡寧也用過相同的原則勸勉各地的神職人員。因此為庇護十二世而言，堅守崗位的原則幾乎具有不容挑戰的神聖性，雖然在教會歷史中，其實也有其他形式的作法。

在二次大戰時期，部分對於斌不滿的外籍傳教士，已向教廷告狀，稱于斌不堅守其南京主教牧職。不過教廷當時體認于斌為首都主教，隨國民政府轉移至重慶亦有合理之處，並未對此做太多計較。一九四八年初華北情勢已相當緊張，北平總主教田耕莘樞機曾向教宗申請赴美國一行，但庇護十二世給了一個否定答覆，稱此時不是離開中國的時機。于斌亦認為田耕莘不宜留在北平，教宗既不許田耕莘赴美，換一個方向，到傳信部述職總有其合理性吧。於是函請吳經熊與教廷方面接洽。羅光為此事與傳信部秘書長剛恆毅談話：「光向剛公略述中國時局之嚴重，次謂總主教建議請田樞機來羅馬，德生公使亦讚成此舉。剛公謂田樞機前來函請教宗允其往美國一行，教宗謂此時不可離

開中國，如傳信部今請其來羅，則教宗或將疑余等變換方式，不服其旨意，故難於執行。」羅光向剛恆毅稱田耕莘來羅馬係商洽行動方案，剛恆毅則稱「聖座於中國教務情形，已收得多方報告，毋庸煩樞機一行」，「聖座於行動原則，迭有訓令在案；具體方案，則黎公使、田樞機與南京總主教等可和衷共謀之。光謂如無聖座訓令，黎公使怯於自動，因國內已言其魄力不足矣。南京總主教如自謀領導，則聖座或又將疑其私人之田矣。剛公答謂南京總主教為抗共黨而行動，聖座只有讚成，絕無指斥之言。」<sup>119</sup>

羅光與剛恆毅的談話是非正式的，剛恆毅同情中國教會的立場眾所皆知，因此這次的談話內容是非常坦率的。既然剛恆毅都如此表達，可以看出教廷對要求田耕莘留守北平的決心是非常堅定的。另外從這段話中也可看出，留守崗位和與共產黨對抗是並行不悖的，庇護十二世並無任何與共產主義妥協的打算。

田耕莘終究還是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離平赴滬，在上海他與黎培理發生激烈爭執，黎培理認為中共的勝利只是一時的，他及使館人員不會離開，也不希望主教離開自己崗位。田樞機則認為應保存中國教會命脈，必須將修生及年輕神職撤退。<sup>120</sup>他自己雖然並不反對回到北平，但中華民國政府則認為不宜；往後北平教區的神職亦一再電訊，勸其勿返北平。<sup>121</sup>在多方壓力拉扯下，田耕莘在

119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

120 古偉瀛，〈中國地方教會的萌芽與挫折——烽火中的中梵關係（一九四五—一九五〇）〉，〈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二三〇。

121 〈田耕莘樞機〉（台北：天主教聖言會中國省會，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日初版），頁十四。

十一月十六日抵達香港，他赴港的名義是養病，不過黎培理方面再予田耕莘指令，要求其返回北平；田耕莘十二月十三日動身先赴廣州，停留數日後即赴上海，預備經南京返回北平，但戰局惡化，使他逗留在上海兩個多月，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又轉到香港養病。<sup>122</sup>

有關修士及年輕非必要神職，離開中共控制區域的問題，田耕莘上書教宗及傳信部長力爭「……幾乎全中國的主教們都想將那六百九十位的神、哲學修士和一些年輕的神父撤出中國，可惜，教廷駐華公使不准。他甚至不准人收留由上海教區逃亡出來的傳教士，因此有人稱他是本土教士的劊子手。我曾多次請求他召集主教們和修會會長們開會，但他卻不聽，他處理事情，儼然像全權掌管著中國的教會。他手頭上現有的一筆災難救濟金也不發放。<sup>123</sup>」另一方面，田耕莘亦託吳經熊以公使身份向教宗上書，教廷終於在這點上讓步，於是不少國籍年輕神父及修士修女，才紛紛在一九四九年三四月以後，離開中共控制區域，遷往香港、廣州、台灣、菲律賓，甚至歐美地區避難。

國籍神職中另一位領袖人物于斌，則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再度赴美從事國民外交工作。赴美前先經羅馬，希望得到教廷之支持。按照羅光日後的回憶，庇護十二世託詞不見，其實已反應出教宗對華態度的變化；經過羅光向相關人員疏通，庇護十二世終於還是在十二月十四日接見了于斌。

<sup>122</sup> 蘇若裔，〈中國近代教難史料（一九四八—一九五七）〉，頁四十九—二，田耕莘確實有病在身，但他遲遲不回北平，生病應該是次要因素。

<sup>123</sup> 古偉瀛，〈中國地方教會的萌芽與挫折——烽火中的中梵關係（一九四五—一九五〇）〉，〈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二二—二一。

羅光說明了教宗接見的含義：「總座離羅後，次日羅馬共黨機關報登載 總座玉照，謂繼蔣夫人，往美求援。《羅馬觀察報》後亦登載 玉照，且披露 總座之談話，以示教廷於總座之言行表示同情也。」<sup>124</sup> 吳經熊也寫信給他：「您在羅馬的訪問已經產生了豐富的成果，梵蒂岡的圈內人已瞭解您使命的重要性。……羅光蒙席已經前去拜訪剛恆毅總主教，他們談及我們所說的事，剛恆毅同意我們的觀點。」<sup>125</sup> 剛恆毅在與羅光談話時，詳細詢問教宗接見于斌情形，想必是已經感覺庇護十二世對於斌的態度不若以往親切，猜想教宗或對中國將改變政策。經羅光轉告接見情形後，「彼以總座能親向 聖父陳明出國任務，深以為幸。」<sup>126</sup> 這必然是以黎培理意見為核心，教廷中有一些人認為于斌此時不應出國，理由就和田耕莘一樣，這時應該堅守崗位。不過既然于斌能得到教宗同意，那所有反對意見就都沒有依據了。

這時中國國內局勢已明顯對國民政府不利，行政院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遷往廣州就是一個徵兆。吳經熊遂與剛恆毅商議，請求以于斌為廣州代理主教。<sup>127</sup> 在剛恆毅影響下，傳信部同意這個建議，一九四九年初，中共宣佈于斌為戰犯，吳經熊又向教廷建議在台灣劃分新區，當時台灣仍為一監牧區，尚未劃入中國聖統體制，僅有十數名道明會會士在此傳教。吳經熊的建議是劃分南北二區，然後將新成立區域交給尚未有教區經營的主徒會負責，然後任命于斌為此新傳教區的代理主

<sup>124</sup>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座即總主教，指于斌。

<sup>125</sup> *Letter of John Wu to Archbishop Paul Yu-Pin, December 29, 1948.*

<sup>126</sup>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sup>127</sup> 同前。

教。<sup>128</sup> 剛恆毅也贊同這個提議，向羅光表示「將電黎公使促其速擬方案，因聖部無黎使方案，不便動議也。」剛恆毅電告黎培理後，黎並無動作，至四月份羅光告訴于斌：「剛公近又親筆致函黎使，惜黎使諸事稽延，聖部無如之何。」<sup>129</sup> 黎培理故意拖延，其實是表示他不贊成；而他不贊成的理由，最主要應該是認為于斌應堅守崗位，在所有中國主教皆不准離開其教區時，怎能為于斌一人破例。

除了要求各教區主教堅守崗位外，黎培理自己也要以身作則。當國民政府南遷廣州時，他派公使館的美籍秘書葛理耕跟隨南下，他自己則堅守南京的公使館。國民政府外交部透過駐教廷使館交涉，要求黎培理南下，教廷表面上沒有異議，在吳經熊與孟棣義的談話中，孟棣義表示「原則絕無異議，惟考慮離寧辦法。」<sup>130</sup> 但真實的作法是因「南京外交團共議不遷，而李代總統又主張政府仍留京也。」<sup>131</sup> 四月中共軍隊渡江，南京的外交團為安全計也暫時撤退，只有教廷駐華公使和蘇聯大使留下。黎培理在此時同樣保持了堅守崗位的原則，他知道教廷的反共產立場不會變，他的處境相當不利，但他為中國教會的最大利益考量，勇敢的準備迎接挑戰。

128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

129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三日。

130 〈駐教廷公使吳經熊致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發電，〈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四二。

131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三日。



## 二、吳經熊公使辭職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吳經熊接到行政院長孫科的電報，要他在二月底前趕到廣州，當時國民政府所在地。<sup>132</sup> 吳經熊猜得到孫科電報的目的，是邀請他人閣；他在他的自傳中解釋，他並不是為名位而去，因為當時政治局勢非常險惡，而他又要將他的家庭丟在異地，但是他不願被視為是不能面對挑戰的懦夫，才在二月二十一日踏上回國的路途。二月二十日他寫了一封信給教宗，請求教宗為他祈禱，讓他能以愛、正義及光榮基督與教會的心，無懼的面對他的挑戰。<sup>133</sup>

他乘坐的飛機原本要在香港落地，因濃霧改降上海，因此他在三月初才和孫科在南京見面。孫科要他在司法部長或教育部長中擇一出任，吳經熊選擇了司法部，他向孫科提出了三個條件：任何人不得干預司法獨立；穩定法官的待遇；囚犯教育。孫科一一應允。於是吳經熊到上海去找他的幕僚，他的任命尚未公佈，孫科自己辭職了。<sup>134</sup>

吳經熊說他對此既不高興也不悲傷，因為他只覺得在主的恩寵內確保了道德的勝利。在他返回羅馬前，先去寧波看望他的哥哥，再去奉化拜訪引退的蔣介石，在蔣介石的堅持下，留下一張兩人同時坐在椅子上的照片，吳經熊坐的是左邊的椅子。他將經教廷認可的聖經新約中文譯本留給香港真

<sup>132</sup> John C. H. Wu, *Beyond East and West*, p.334-335.

<sup>133</sup> *Ibid.*

<sup>134</sup> *Ibid.*, p.336-339.

理學會出版，四月二十日返抵羅馬。<sup>135</sup>

回到羅馬的吳經熊立即處理國民政府外交部要求教廷使館遷廣州之事，不過同時間也在思索自己的去留。他到教廷的主要目的是翻譯聖經，現在聖經新約部分已譯完，準備出版，可謂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派遣他出國的蔣介石已引退下野，要聘他擔任閣員的政府又已垮台，他要擔任什麼政府的駐教廷公使呢？他的性向原本就學術味重，政治味薄，在教廷同樣以學者身份受到敬重的法國駐教廷大使馬里旦（Joseph Maritain），為普林斯頓大學的教職，辭去了教廷大使的職務更給了他啟發。當然他也必須考慮現實，他有一個龐大的家庭。

一九四九年春，夏威夷大學給吳經熊寄來一年的訪問教授聘書，這是在一九四八年時就有的約定。在上述各種因素的考慮下，他在五月份向外交部提出辭呈，教宗在這個很湊巧的時機，特別授予他袍劍御侍的榮銜（Papal Chamberlain of Cape and Sword）。他為了節省費用，不擬舉行任何慶祝儀式，但于斌付了他服裝的費用，羅光則付了宴會的費用。吳經熊說他內心充滿了感激的容許他們這樣做了。<sup>136</sup> 按照羅光的說法，吳經熊在六月十五日自拿坡里乘船赴夏威夷。按照吳經熊的說法，他在七月中旬離開了羅馬。<sup>137</sup>

從歐洲看中國的情勢，此時已經呈現出非常悲觀的氣氛。那中華民國駐教廷使館的前途呢？羅

<sup>135</sup> Ibid., p.340-341.

<sup>136</sup> Ibid., p.343。在吳經熊二月回國時，教宗或已做此安排。

<sup>137</sup> 于斌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自美赴歐，按吳經熊說法，是于斌在袍劍御侍的儀式上為其授劍，因此吳經熊說法的可能性較高。

光給于斌寫了一封悲觀的信：「教廷對中華教務，現在尚無任何計畫，日後在事實上承認共產政府，否則看國際情形若何，如各國都承認，教廷或許亦將承認之。駐教廷使館之存續問題，在總座回國後，可請與政府協商，光以為存之為佳，可以不派新公使，可以減少人員。如以光之言為可採，則使館經費每月或減至極低數，政府大約可以設法少發。不然俟列國承認共產政府後，教廷必將承認也。」<sup>138</sup>「羅光當時的看法，教廷基於現實的考量，承認中共政權似乎只是時間先後的考量，保留公使館，只是一種拖延的手段而已。」

### 三、沒有公使的公使館

或有可能羅光的想法形成了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對教廷外交的政策，因為對自己國勢的信心不夠，當吳經熊辭職後，廣州國民政府不願因新公使徵求同意的過程引發波瀾，因此從駐義大利使館調來一等秘書朱英，充任駐教廷使館的代辦，並未立即向教廷提出新任公使的人選。朱英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去電外交部稱已於七月三十一日交接館務。<sup>139</sup>朱英技巧的未提及和誰交接館務，當時吳經熊已往夏威夷，和他交接館務的應是向來負責管理館務的羅光。

不過于斌並不贊成這種消極的作法，兩國外交，既未交惡，豈有自行退讓不派使節之理？于斌在一九四九年赴台，國民政府各部門已有遷台辦公者，于斌向行政院提出建議，請再派謝壽康重任

<sup>138</sup>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

<sup>139</sup> 〈駐教廷代辦朱英致外交部電〉，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四二。

公使，認為謝首任公使時，與教宗及教廷官員關係良好，他重新出使，教廷應無意見。此事外交部於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間向教廷提出，但教廷遲無動靜。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外交部訓令駐教廷使館探聽消息，羅光回憶說：「九月九日，我陪朱英代辦往見達迪義副卿，彼答為避免中共報復，中華民國請緩派使。」<sup>140</sup>在他寫給于斌的信裡說的較為直接，直接決策者是教宗自己。「新使任命事，使館於九月中始奉部令往催，然其時教宗早已決議在先，謂為避免中共藉口撲擊教會，暫緩任命。使館方面多方爭辯，亦無法挽回。」<sup>141</sup>

當時為爭取時間，謝壽康擬在一獲教廷同意後立刻上任，除了在教廷方面得到不利消息外，教廷駐華使館秘書葛理耕至廣州外交部，表示：「由於現在我們處於一種微妙的情形，教廷希望中國政府推遲駐教廷公使的任命。」<sup>142</sup>這件事情在講究尊嚴的外交世界，再一次讓中華民國政府有受辱的感覺；論者往往將責任歸之於吳經熊，認為他未能在國家危難之際堅守崗位，辭職而去，使得中華民國駐教廷使館陷入非常尷尬的局面。<sup>143</sup>其實這件事的決定權在教廷，庇護十二世才是最主要應負責任的人；其次吳經熊在五月份提出辭呈，國內政情混亂，遲遲未提接替人選，耽誤了寶貴的時問，是第二個重要的因素。待于斌力保謝壽康，並向教廷提出後，國民政府在大陸已成強弩之末，

140 羅光，〈對中梵關係的努力〉，《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七二二～七二三。

141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八日。

142 〈外交部代部長葉公超致台北外交部電文〉，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四二～一四三。

143 方豪、杜寶晉均曾做此種表示。

誰能代表中國，自然就必須等到塵埃落定了。因此對吳經熊的抨擊，毋寧是太過苛刻的事後之論。

在國共爭鬥的最後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正式在北京成立。面對極端不利的情勢，在外交上，中華民國政府還是要設法努力，不使各國政府迅速承認中共；特別是教廷仍維持在南京設館，以教廷的超然地位，更有可能成為各國承認與否的風向球。朱英與羅光乃銜命赴教廷國務院，「交涉勿承認中共政權事，彼方負責人謂未接到中共政府成立之通知書，教廷亦未考慮承認中共，因教廷必不承認不保障信仰自由之政權也。」<sup>144</sup>國務院負責人即孟棣義，在庇護十二世的兩位外交副手中，對中華民國素來較友好，不過這番話透露出兩個訊息：首先是教廷正在等待中共的通知，但中共尚未傳送任何消息，這其實也在教廷的意料之中，因教廷反共的立場並未改變。其次是一個條件式，因中共不保障宗教自由，所以教廷不予承認。那中共如果願意保障宗教自由呢？如果中共願保障宗教自由，那當然還要看中共所謂的保障宗教自由和教廷的想法是否相似？那就需要雙方的對話乃至談判了。

這其實反映出了日後中共與教廷五十餘年關係的基本架構：雙方關係的主動權在中共手上，教廷基本上是被動的；教廷基本的立場是宗教自由，因為他最主要關心的是中國教會，只要中共不願給予宗教自由的保證，那也就沒什麼好談的。而代表中華民國的使館，就在教廷與中共的僵持中，暫時保留下來。

一九四九年底至一九五〇年初的駐教廷使館，處於一種相當慘澹的狀況。外交部首則減薪，次

144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八日。

則裁員。原在館中服務的任學勤及謝光迪被辭退，羅光在給予斌的信中描寫了當時的情形：「光以使館薪金數月不到，請傳信部增加大學教學金，剛公答謂礙難舉行，可為羅馬教區教要理以謀生。光思在此教要理，不如絞腹著作為優也。」<sup>145</sup>羅光也感慨的說：「外交和國勢的盛衰，連接很密切，弱國的外交官，不僅是在外交上，費力不討好，在普通的交際上，也受人冷淡。」「以往國勢興盛時，在各種場合裡，是人來找我，而且都很表示親切；政府遷台以後，找我的人很少，遇著我的人，最多表示一點憐惜中國的同情。」<sup>146</sup>」

屋漏偏逢連夜雨，一九五〇年四月，朱英再電外交部，吳經熊時期租用之使館租約期滿，且已易主，新屋主欲拆除重建，不允續租，限五月底搬遷。朱英請求至少匯款美金千元以應付搬遷及押金需求。<sup>147</sup>一國使館情況至如此程度，夫復何言。

#### 四、塵埃尚未落定

在婉拒中華民國派公使接替吳經熊的同時，庇護十二世加強了在中國教會內堅守崗位的要求。從基本的原則看，各教區內的教徒正在遭受苦難，他們的主教、神父怎能離他們而去？從現實面考量，各地主教及神父留守不退，也是一種和新政權示好的表示，雖然這個政權在本質上是反宗教

<sup>145</sup>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七日。

<sup>146</sup> 羅光，〈羅瑪四記〉，頁三一五。

<sup>147</sup> 〈駐教廷代辦朱英致外交部電〉，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八日發電，〈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四五—一四六。

的。在這樣的要求下，中國教會領袖的行為，在教宗看來是不能作為表率，田耕莘在港，于斌由美赴中南美訪問，但于斌已被宣佈為戰犯，情況以田耕莘較典型，他在黎培理多次嚴催下，並未回到北平。原則的層次不說，從現實面來看，教廷或許認為，田耕莘一天不回北平，中共新政府一天不會給教廷任何接觸機會。因此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月間，教宗再下令田耕莘必須回到北平，關於此事中華民國政府立場自然與教廷不同，此時遷台已成定局，自然不希望田耕莘這位具有指標意義的天主教領袖回到北平。羅光亦為此與國務院及傳信部交涉，他說：「田耕莘回平一事，光向剛總主教及孟代國務卿均言之，剛公以事出教宗，彼不便發言，孟公則許以轉達聖父，然均以聖父已有成議，無敢陳辯者，此事本應由傳信部長從中轉圜，然畢部長豈注意此事之影響乎？故吾人只有懇禱天主，光照田公，自知進退之道，免遭魔障之包圍焉。」<sup>148</sup>

于斌可能也接到某種命令或是某位教廷威權人士的意見，要求他雖然是戰犯身份，但還是應回到中國。因此，一九四九年十月，于斌致函羅光，稱結束南美之行後，將返回雲南或四川工作。<sup>149</sup>這其實與于斌之前的規劃不同，由於部分南京教區神職已轉往台灣，吳經熊又為他與剛恆毅商議任台灣新分出區域之代理主教，因此于斌已在台灣有所安排，只因黎培理遲遲不願協助發函申請，故未能赴台。于斌了解了黎培理不願協助他到台灣的理由，於是在必須回到中國的前提下，還能到什麼地方去呢？以他的戰犯身份，那就只能到國民政府還控制的四川或雲南了。

148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八日。

149 〈于斌致羅光函〉，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該件藏輔仁大學校史室。

不過誰也沒料到國民政府兵敗如山倒，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除了少數交通阻絕的地區外，中共軍隊已控制了絕大部分的中國區域，因此強迫于斌回到中國就說不過去了。不過基於現實考量，也不能答應讓于斌到中國對岸的台灣，因此只能要求于斌滯留海外。經過一番安排，一九五〇年二月，于斌決定留在美國，與于斌向來友好的史培爾曼樞機主教同意庇護他。

田耕莘此時滯留香港，進退不得，是庇護十二世中國問題最痛的部分。前津沽大學校長，耶穌會士劉迺仁神父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晉見教宗，欲為田耕莘求情，「謂北平教民俱表示此時田樞機如回任，將不利平區教區，教宗答以樞機應聽教宗之命，而不應從教友之命。<sup>150</sup>」庇護十二世這番話斬釘截鐵，不留顏面，只差沒說出中國樞機不聽教宗之命了。

教宗對于斌的處置和對田耕莘的要求，基本上如實反應了他堅守崗位的政策。在此同時為因應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教會可能面臨的危機，教廷以加速任命國籍主教因應，一九四九年三月三日，從寧波教區分出永嘉國籍教區；四月二十一日，熱河赤峰升為教區，師永禎任署理主教。六月九日，任命段蔭明為四川萬縣教區主教，鄧甘霖為四川嘉定教區主教，雷震霞為山西汾陽教區主教。然後將上海教區分成蘇州和上海兩個教區，任命龔士榮為上海教區主教，龔品梅為蘇州教區主教。七月十四日皮漱石升任瀋陽總主教，十一月三日，張克興任西灣子輔理主教，十一月十八日，李木良任臨清監牧區監牧。由此可以看出，黎培理其時加速本地化中國教會的積極；值得一提的是，台灣分成南北兩區的建議被部分接納了，雖然于斌不能來台灣，但十二月三十日，台北監牧區成立了，一

<sup>150</sup> Archbishop Paul Yu-Pin to Rev. Fr. Augustin Jaensch, February 14, 1950.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七日。



九五〇年一月十三日，剛恆毅積極培養的子弟兵郭若石被任命為台北監牧。然後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八日，山西洪洞成立教區，韓廷弼升任主教，五月三十一日，周維道升任陝西鳳翔教區主教。<sup>151</sup>

在此不利於國民政府的情形下，部分國民政府的外交人員仍企圖改變教廷的外交政策。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中華民國駐義大使于煥吉晉見教宗，他主要是因為「教廷對於我政府擬派遣駐教廷公使一案，迄今尚未同意。……一則為使教宗明瞭我國抗共情形，對我表示同情。一則為請對我擬派遣教廷公使事，早日予以同意。俾增進兩國友誼，藉以鞏固義國不承認中共之信心。<sup>152</sup>」其次是因為「自英國承認中共後，其他如挪威、瑞典、荷蘭、丹麥、瑞士等國均相繼承認，致我在聯合國之國際地位，頗蒙不利，查拉丁美洲共有二十餘國，在聯合國之力量非小，向主反共，對我同情，尤以上屆聯合國會議時，我國支持義國託管前非洲殖民地之要求，主張正義，力維公道，頗得中南美各國之好感，助我良多。倘我國與教廷之使節問題，早日解決，足示教廷對我之好感，因而更可促成中南美各國對我之友誼。<sup>153</sup>」

從教宗和于煥吉的談話，即可瞭解教宗的對華態度。教宗首先詢問「中華民國現況」，于煥吉答稱：「……仍據有較大於丹麥之領土，擁有與澳洲相等數之人民，保有基於民主主義之合法政

<sup>151</sup> 趙慶源，〈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頁一三五—一三七。

<sup>152</sup> 〈駐義大使于煥吉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四六。

<sup>153</sup> 〈于煥吉晉見教宗談話概要〉，〈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四七。于煥吉將教廷外交拉高到國際外交層次，主要目的是在說服國民政府外交部重視看似不起眼的教廷外交。一方面于煥吉有牽制義國外交之企圖，另一方面與于煥國民外交的作為完全吻合，顯示出這些行動極可能是在一個人際網路中交換訊息的。這次事件的過去及未來，于煥與于煥吉的合作關係皆可作為此次事件的旁證。

府，……在軍事上仍保有較諸菲印越泰緬各國常備軍總數為多之精銳陸海空軍，約六十萬人，足以確守台灣為反攻大陸之根據地，且可協助制止共產主義在遠東之侵略。」

「教宗復詢：風聞國軍有以武器資敵及投共之說，是否屬實？焯吉答以過去雖間有其事，緣因為中共向秉其虛偽巧妙之宣傳技術，及第五縱隊之活動，……致若干軍隊盲從叛變，實非我軍力之不逮……」

「教宗再詢美國之軍事及經濟援華，已否全部停止，焯吉告以美國之軍事援助已暫時停止，但經濟援助則仍繼續給予，所望將來之援助能予擴大。……<sup>154</sup>」

由這三段談話可以看出，教宗對退守台灣之中華民國政府，信心明顯不足。

「教宗解釋教廷與羅馬尼亞等國仍互派使節，但並非贊成共產主義。焯吉申稱中國情況不同，蓋大陸上雖為共黨強佔，但戰事尚未終止。……苟教廷不肯同意中國所派之新公使，未免示弱共黨。教宗謂，如教廷繼續不予同意，是否將來有袒護中共之嫌。焯吉答曰然，故仍請早日重新考慮。教宗領首。」

在這段談話中，教宗將教廷的外交原則闡述的非常清楚，教廷若與中國共產黨政府建立外交關係，是基於中國教會的考量，並不代表和共產主義妥協。但他也藉于焯吉的答覆，瞭解中華民國政府立場，因教廷不接受新公使就任，使得中華民國政府相當不悅。

接下來教宗又言：「現時承認中共之國家已達十五。若干大國如美法等均已承認。」

「焯吉聞之甚為詫異，答謂：美法以往雖有承認之宣傳，但絕未成事實。」

教宗不太可能消息錯誤，因此他的問題應是「美法有承認中共之準備」，由此觀之，國際動向也是教宗中國政策的依據。于焯吉

除了談及美法外，又提義大利加入聯合國問題，謂「如承認中共，我國對義之加入聯合國不得不行使否決權。……承允為道義計，為義國之本身利益計，不擬考慮承認中共。<sup>155</sup>」這主要是用與教廷關係最密切的義大利，希望說服教宗採取與其一致之立場。

由於提到聯合國，教宗又詢：「蘇聯在聯合國中迫使中國退出，未知現況何如？」從聯合國再聯想到蔣夫人在美的遊說工作，以及蔣總統的情形，「教宗末詢，蔣總統現在何處？蔣夫人在美，聞未曾洽得美國援助？」「煥吉告以總統現在台灣領導軍民抗共，蔣夫人在美雖未獲美國政府充分之援助，但深得美國人民之同情，尤以離美前之告別廣播詞，感動美國群眾，胡佛前總統等聞之，竟至揮淚，此項廣播詞曾託教廷駐義大使轉呈，如教宗尚未收閱，自當再奉一份。」由教宗的這兩次詢問，他基本上還是對中華民國能否繼續在國際上生存，抱持觀望態度。

最後于煥吉提到主題：「對於我方徵求新公使之同意係屬慣例，務祈教廷考量。」教宗對於他的請求，當場未予明確答案，「提及吳前公使備極讚揚，對其離職至感惋惜。至新任謝公使，當予考慮。並對於于總主教，希其勿多發表言論。」于煥吉回答：「吳前公使雖已離任，但教育文化工作亦頗重要。謝公使久駐教廷，如蒙接受，必能增進雙方邦交。至于總主教為人爽直，心地光明磊落，見義勇為，將有關中國見聞作切實之報導，使各國人士得明真相。其言論悉本人道主義及宗教慈悲之懷。現在美促進華僑教育，對我優秀之青年，裨益非淺。<sup>156</sup>」

<sup>155</sup> 同前，頁一四九。

<sup>156</sup> 同前，頁一五〇。

教宗在緬懷吳經熊及謝壽康兩任公使後，突然提及于斌總主教，表示希望他不要多發表言論。

從其思緒的延續性而言，所謂過多的言論，應與續任公使事有關；也就是說教宗認定于焯吉前來晉見，談恢復公使事，都是于斌的幕後推動，因此將于斌點出，指其係教會人士，應服從教宗之意見。于焯吉也明白教宗話裡含意，於是說明于斌言論具人道及宗教慈悲精神，其實是反問教宗，難道這樣有錯嗎？同時告訴教宗，就是因為教宗的命令，于斌正在美國為留學生及華僑服務，而于斌因服從教宗的命令，所以連台灣也沒去。教宗聽了當然只能「領首稱善，並為我國祝福。<sup>157</sup>」

以外交講求禮貌，注重詞彙的特性而言，這次庇護十二世與于焯吉的談話是異常的坦率且直接，從中華民國外交部的立場看，這表現出教廷相當不友善的態度，因此雖然于焯吉對恢復公使事表示樂觀，謂：「教宗態度懇切，表示友善，允予考慮。<sup>158</sup>」但外交部對復派公使事，意見與于焯吉截然不同，電告于焯吉：「關於恢復我駐教廷公使事，希暫不再提。<sup>159</sup>」這是中梵關係中再一次的低潮。庇護十二世還在等待中國故事的最後結局。

157 同前。

158 〈駐義大使于焯吉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五日發電，〈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五一。

159 〈外交部歐洲司致駐義大使于焯吉電文稿〉，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五一。

## 第五章 庇護十二世後期的對華外交

(一九五〇年—一九五八年)

### 第一節 教廷駐華公使來台與謝壽康回任駐教廷公使

#### 一、國際形勢的變化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努力

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的爆發改變了在台灣中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命運。原本還在觀望的美國政府，基於其自身全球戰略利益的考量，立即宣佈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以後各種軍事及經濟的援助，即開始源源不絕的送來台灣。基於穩定台灣政治的考量，對已完全控制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改變以往的觀望態度。隨著美蘇冷戰的日益嚴峻，五〇年代美國對台灣的中華民國支持也日益增加，這並不代表美國完全認同蔣總統及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方式，但基於防止蘇聯的代言人——中共的擴張，台灣的地位是和南韓、日本及越南同等重要的。在外交上，也是美國首先派藍欽，在八月以代辦暨公使的身份駐台北；以其為首，其他國家才逐漸改變觀望的態度，派遣使節來台。

此時距教宗與于焌吉談話不過三四個月，外交部方面對恢復與教廷關係，意向消極，推動中梵

外交關係發展的動力，來自於遷台的中華教會人士——方豪神父。方豪一九四九年二月來台，應台灣大學之聘，任歷史系教授。一九五〇年三月，蔣總統復行視事，以方豪過去在教會、學術圈及政界的人際關係，面對低迷的中梵外交關係及中國天主教的處境，自然是想要有所匡正及補救。

他透過了一些過去的人際關係求見蔣中正，蔣中正在九月十五日致函方豪，約其次日往見。方豪接函後，立即擬出四端八則之意見書，準備進呈蔣氏。此是方豪第三次上書蔣總統，文章模式亦與前相似，應已醞釀多時，其意見不是突發奇想，其中第三端第七則為「關於改進政府與教廷之關係者」，全文如下：

「天主教為反共最為激烈者，但教廷對台灣亦不予重視，誠不可解。現在第一步擬設法邀請田聘三樞機主教來台，如總統願作一親筆信，由豪攜往邀請，來台諒無問題。豪曾任其秘書二年，自信對此頗有把握。第二步則豪今年本擬赴羅馬朝聖，並向教廷各有關部門為台灣竭力作忠實之報導，冀改變伊等過去之看法。總統如有親筆致教皇之書翰，亦甚願代為齎呈。（其後原有「現教廷中人對於野聲總主教不滿意者甚多，故欲謀與教廷接近，非另託人不可。」，後刪去。）」

當時田耕莘滯留香港，國民政府不願其返北京，教廷不許其來台，教宗震怒於其不聽命令，神父及教友則勸阻回平聲不斷。方豪稱攜總統親筆函往邀田樞機，來台諒無問題，其實是低估了這個使命的難度，也證明他畢竟對中梵間的實質外交尚隔層紗，不盡明瞭。至於後面原提有于斌名字及

1 李東華，〈方豪神父對中梵關鍵關係（一九四五—一九五二）轉折的貢獻〉，〈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二五一。

情形，正式呈文中刪去。一方面可能是顧慮教會及于斌顏面，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其時台北政壇謠傳于斌為所謂「第三勢力」一員，方豪恐牽扯不清之故。

方豪得到蔣總統某種指示或授權後，遂與在羅馬之杜寶晉神父聯絡，請其設法與剛恆毅及高彌肅神父聯繫，商討有關：1. 繼續承認在台之國民政府事。2. 准許田耕莘及于斌赴台服務。3. 派外交官員赴台。有關於外交官員之層級，台北方面或同意低於公使。4. 中華民國公使返任教廷。5. 蔣總統致書教宗，加強聯絡事。方豪之所以不和羅光通信，反而致書當時羅馬中國神職中的第二號人物杜寶晉，係因其對羅光具有某種成見。杜寶晉遂在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回信方豪：

「方大司鐸惠鑒：久仰大名，昔無良緣拜識，今蒙 神父不棄，投書下問，何幸如之！弟拜讀大札，即刻譯成意文，轉示 剛總主教及高彌肅神父（原注：現在教廷外交部任職），同時又與我國駐教廷公使館代辦朱英先生及教會顧問羅光司鐸再三商討，結果分陳如左：

1. 剛、高二公一本其素日愛華精神，聲許盡力幫忙，惟須等候時機。

2. 教廷對 蔣總統始終表示欽佩，對國民政府亦保存擁護心理，並深信共產政府絕對不能持久，惟鑒於公教信徒大都壓在鐵蹄之下苟喘殘生，深恐打草驚蛇、與人口實，猶如火上添油，加速教民的死亡，故對台灣當局不敢明有表示。此種作風，依吾人（原注：華人）看來，固屬無濟於事，但以天下 慈父的立場設想，亦不無有可諒解的婆心。

3. 田樞機與于總主教皆切願往台灣去服務，只受上述情形牽制，不得如願。一年前教廷任命一位新主教，此人在接受新職時，向教宗提出條件，請彼阻止于公政治活動！！此一小例，言之痛心！吾公亦可藉窺全豹。

4. 在接到 神父來信後，羅光司鐸曾特為請見教廷代理國務卿司鐸，得悉教廷已決定派員赴台灣，只因葛里耕告病，人選尚未規定，刻下國民政府如有表示，大可速成其事。

5. 中國公使一節，此間已再三向教廷提出，彼方多有顧慮，未得結果。田樞機在羅馬時曾當面向教宗力請，教宗未肯直接答覆，最後只顧左右而言他……回想吳經熊氏道德學問固屬高尚，當日棄職而走，終為失策。走前亦當妥為善後，做出下文，在當時似乎易如反掌，而時機一過則困難橫生矣。

6. 蔣總統致書教宗，可稱上策。來函最好用中文，由我駐教廷使館轉遞尤妙，以便借題發揮，乘機圓和，可借下月教宗加冕週年（晚到無妨）或別種機會，教宗定有覆書，彼時再請高彌素等從中奔走，望得圓滿結果。<sup>2</sup>

從杜寶晉的覆信中可以看出，教廷此時對中國的政策原則沒有太大的變化，因為考慮中共政權下大陸教會的處境，教廷不願明確表態支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所以謝公使回任教廷，或是田耕莘、于斌赴台服務皆不同意，但可考慮在台設置外交機構，因黎培理仍在南京，這個外交機構應屬於教廷駐華公使館的下級機構。這其實已是教廷對華不變政策的另一種詮釋，應該是導因於美國已派外交人員駐台的影響。同時這些心向中華民國政府的教廷官員及中國神職，都認為可鼓勵蔣總統以信函方式，與庇護十二世加強聯絡。

於是蔣總統乃於教宗加冕紀念日致電祝賀，請駐教廷使館轉送，又電朱英等與教廷國務院商議派代表駐台北之事。駐教廷使館立即就接到教廷國務院覆函稱：「對中國政府祝賀教宗嘉勉之盛

<sup>2</sup> 同前，頁二五二～二五三。杜寶晉猜到方彙致函給他的原因，因此必須表明這不是他的個人意見，亦非他人所可接洽，是團隊合作的結果。



意，極為感激，並表謝意。」朱英又往見國務院代理院長孟棣義，朱英稱：「渠對我政府賀電，亦表謝意，詢問中國情形甚詳，並謂教廷對我政府之態度，始終如一，深盼中國早日解除危難。至派代表駐台事，渠允催候特務次長從早答覆。教廷對此事似正函詢駐華黎培理公使之意見，故遲延尚未正式答覆。」<sup>3</sup>羅光信函中也說：「對於派代表則尚在研究中，光意其必等待詢問黎培理公使之意見也。」<sup>4</sup>

中華教會人士一致認定，當時在香港的使館秘書葛理耕神父，是破壞教廷與中華民國政府關係的主要人物，毛振翔神父就曾經說葛氏：「屢密呈教廷，建議承認中共並阻止田樞機與于主教來台，彼曾奉教廷指令來台設館，但以彼個人對我不友好，數力言來台，對留大陸教友不利，事遂擱置。教廷已有意再派渠來台。……」<sup>5</sup>外交部長葉公超對毛振翔的意見很感興趣，他注意的不是人選問題，而是教廷似乎願意派外交人員駐台，他的想法是「此事可先訓令我駐教廷代辦，向駐教廷外交部表示，此間無教廷代表，遇事接洽頗感不便，以此觀其反應究竟如何。」<sup>6</sup>此事件發生在一九五〇年二月，以後才依此方向進行與教廷派代表駐台之交涉。

一九五一年三四月間，羅光屢次代表中華民國往教廷國務院催促派遣外交人員駐台事<sup>6</sup>；一方面中華民國政府不希望教廷派葛理耕駐台，而朱英及羅光則擔心黎培理的反對意見；從杜寶晉信

3 〈駐教廷代辦朱英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九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五二。

4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5 〈外交部長葉公超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九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四五。

6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

中透露出孟棟義對此事較為支持，而另一位次長達迪尼則需要說服。在這樣的脈絡中，最後教廷做出決策，不特別指派外交人員來台，而是以已在台北傳教的輔助傳教會的齊見賢（Gaspar Gerard-*Y*）神父，擔任可茲聯絡的外交專員（Diplomatic Agent）。中華民國政府對這結果不盡滿意，但在當時惡劣的外交環境中，還是接受了教廷的安排。<sup>7</sup> 教廷這種模糊的外交模式有其先例可循，在偽滿洲國宗座代表的任命很類似，抗戰時期尚惟善出任蔡寧的代表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在這個模糊的安排上，其實也可以看出教廷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關係的逐步改善。

##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驅逐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

從中華民國的立場來看，黎培理留在南京是對中華民國政府很大的傷害，因此必須積極爭取其來台，但是為教廷而言，他考量的不是和那一個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他考量的是中國教會的最大好處。黎培理的處境更是艱難，因為他執行教廷的反共政策，過去在言論及行動上與中共時生不快，但現在必須堅守崗位，面對此一反宗教政府的不友善作為。因此設身處地為黎培理設想，他留在南京其實是相當勇敢的，按人的本性留下來應是百般不願，但他為了中國教會的好處，在堅持信仰的原則下，選擇迎接挑戰。

一九五〇年五月，在中共總理周恩來的策劃下，開始推動所謂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運動」。由於天主教的聖統組織較不易打破，因此首先針對各自為政的基督新教開刀。周恩來說：

<sup>7</sup> 〈駐教廷代辦朱英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五二。

「我認為把宗教與政治全部分離是可笑的……宗教團體應當支持，並協助政府建設新中國……教會應當獨立，成為純粹的中國教會，實行自治自養自傳……」<sup>8</sup>「教會應當自己動手，清除潛伏在教會內的帝國主義份子，……政府在旁自會協助這愛國運動。」<sup>9</sup>

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黎培理意識到這不只是區域性的戰爭，基本上是美蘇對抗的結果，他在七月二日和參加南京天主堂聖母會區會成立典禮的教友說：「形勢已變，黎明前之黑暗已經過去，今年年底定有變化。」<sup>9</sup>這些話反應出黎培理的內心期望，他主觀的認定共產政權不可能長期存在，而韓戰將是改變中國目前處境的良機。這些話也成了黎培理日後的罪狀之一。

一九五〇十二月十三日，四川廣元天主教神父王良佐率領五百教友，發表宣言，響應三自運動。其宣言以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為主，文中有言：「現在我們獨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建立起來了，可是帝國主義者仇視人民翻身，蓄意擴大侵略戰爭，不顧全中國愛好和平人民屢次的警告，把戰火燒到我國東北邊境，轟炸和平城市，殺害無辜同胞，因此我們基於愛祖國愛人民的立場上，堅決與帝國主義者割斷各方面的關係，並肅清親美、恐美、媚美、媚美的思想，自力更生，建立自治、自養、自傳的新教會，不讓教會的聖潔，再受帝國主義的玷污。」<sup>10</sup>

這個廣元宣言當然是中共安排好的，隨後一月十七日，周恩來即在北京召集了四十位所謂天主教領袖，其中多半是教友，正式發動了向天主教的三自運動。開始的時候矛頭都對準了「美國帝國

<sup>8</sup> 竺楨宇，〈愛的考驗——大陸天主教會的英雄史蹟〉（台中：光啟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三月初版），頁十二。

<sup>9</sup>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建國初期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國大陸參考資料〉第三冊，頁四六三。

<sup>10</sup> 羅漁、吳雁編，〈大陸中國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記〉，頁十三。

主義」：「有許多外國的傳教士以傳教為名，實際擔任美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特務工作，這些反革命份子，如果不從教會中清洗出去，勢必危害教會的存在。」但接下來已隱然將教廷與美國帝國主義連在一起，「正由於帝國主義份子長期內操縱著羅馬和美國天主教的高級機關，並且在中國長期內豢養了像于斌之流的罪惡昭彰的反動陰謀家，來控制中國天主教的教務，中國天主教的愛國運動的發展，就不能不經過激烈的鬥爭。……」<sup>11</sup>

接下來教廷就成了攻擊的目標了。二月十日《新華通訊社》登載了所謂南昌教區天主教友愛國宣言：「……和美帝的關係，一刀兩斷，我們應當拒絕樺棣岡的經濟援助，我們應當停止和樺棣岡書信往還，我們應當實行自治、自養、自傳……」<sup>12</sup>三月三十一日，在教廷駐華公使館所在地的南京教區，由所謂七百九十三位教徒發出聯合宣言：

「……我南京等地的教徒一致認為天主教教友和全國人民是一體的，惟有徹底的粉碎帝國主義這一陰謀，才能展開我們新中國的和平建設。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偉大的愛國主義旗幟下，我們天主教徒愛國不甘後人。我們決心擁護這一運動，並且要把我們愛祖國的熱誠貫徹到今後行動上去：服從政府法令，擁護共同綱領，加強工作，努力生產，堅決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教會內的一切勢力和影響。為了達到上述目的，我們必須積極行動起來，實行天主教在中國自養、自傳、自治三大原則，除了在宗教信仰上與教廷保持純宗教的關係外，我們堅決反對教廷干涉中國內政，堅決與它割斷政治和經濟上的關係。加強生產，自籌傳教經費，不仰仗外國的資助；由本國人民自己負起傳教任務，由本籍主

<sup>11</sup> 同前，頁十四、十五。

<sup>12</sup> 竺慎宇，《愛的考驗——大陸天主教會的英雄史蹟》，頁十五。

教、司鐸治理本國教務；不容帝國主義者利用教會進行反人民的活動；在毛主席及各級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努力建設和平、民主、獨立的新中國。……<sup>13</sup>」

黎培理在看到這篇宣言之後，立即向中國各教區主教聲明反對：

「今天，三月三十一日，南京報紙登載了一篇宣言，據說是由本天主教區的神長和教徒們簽署的，我深為悲痛，並急速通知你，宣言製訂時我未曾知悉，我也不能贊同此宣言。我竭力祈求聖神，給一切教友們，尤其給全體神職班，恩賜必要的明悟與勇氣，去明白地洞悉和勇敢地戰勝敵人的詭計，為了慈母教會和教宗的尊榮。<sup>14</sup>」

這個聲言雖然說得有些保留，但已足夠引起中共進一步攻擊教廷的言論，一九五一年四月四日，《人民日報》出現了名為〈梵蒂岡教廷支持帝國主義干涉各國內政的一個鐵證〉的文章。四月二十一日，《光明日報》登載了名為〈梵蒂岡的反動面目〉的文章，都將教廷說成了間諜的中心，執行美國帝國主義政策的附和者。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指黎培理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寄給各教區主教的信是「帝國主義者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鐵證，是羅馬教廷干涉中國內政的鐵證。……全國愛國反帝的天主教教友們和神甫們應當起來，把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肅清出去。……<sup>15</sup>」從此之後在中共控制的媒體上，各種抨擊黎培理的言論反覆大量出現。

<sup>13</sup> 〈建國初期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國大陸參考資料〉第三冊，頁三三八。

<sup>14</sup> 同前，頁四六九。

<sup>15</sup> 同前，頁四六七。

從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六日開始，黎培理及教廷駐華公使館的館員就受到公開的監視。至七月中旬以後即經常受長時間的問話，所有問話都有紀錄，並要在口供上簽字。中共認為聖母軍是秘密的反政府團體，並且認為黎培理是真正的幕後策劃者。九月四日下午兩時半，黎培理及其秘書恩登被召至南京公安局，審訊至晚間十時，所有談話都有紀錄，最後他們宣讀南京軍管區驅逐出境的命令，全文如下：

「查本市摩納哥僑民黎培里 (Antonio Riberi) 係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羅馬教廷」駐中國公使，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來華，一向勾結美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匪幫，堅決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

本市解放後，該僑民繼續進行各種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人民政府的活動，其重要罪行如下：

一、掩護外國特務間諜，進行間諜活動。黎培里曾派遣為美國政府間諜機關服務的意籍傳教士馬迪儒 (Tarciscio Martina) 為其駐北京代表。該馬迪儒在充當黎培里代表後，以宗教職業為掩護，進行反革命間諜破壞活動，並為黎培里連續蒐集和送出關於華北東北軍事情況的情報多件。由已經搜獲的馬迪儒向黎培里所作之間諜情報和馬迪儒的供詞，可以充分證實黎培里在中國の間諜活動。

二、策劃組織反革命的祕密團體聖母軍。黎培里曾派愛爾蘭籍傳教士莫克勤 (William Aedan McGrath) 到天津、桂林、重慶等地，發展聖母軍組織，又指令比籍神父前南京區代主教斐效遠 (A. Palmers) 被驅逐出境)，在南京積極發展聖母軍的組織，而聖母軍組織的任務，則為在我國各地進行反對人民政府的陰謀活動，包括蒐集情報和組織恐怖事件。

三、煽動天主教徒反對人民政府。黎培里曾迭次向中國天主教會發佈敵視我國人民政府的命令及指令，不准中國天主教徒參與愛國活動和人民政府所領導的活動，煽動和脅迫他們敵視人民政府及其法令，並以「摘去神權」、「開除教籍」等手段，威脅天主教中一切有愛國心的守法的主教、

神父和教徒。

上述罪行，均經查獲確實證據，證實黎培里在本市解放以後，仍以宗教為掩護在我國進行旨在危害我國家安全和反對我人民政府的非法活動。各地人民和愛國的天主教徒紛紛請求政府將該僑民驅逐出境。本會為保護國家安全和人民利益，決定將黎培里永遠驅逐出境，並由本市公安局立即執行。此令。（新華社南京四日電）

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於今日發出命令，宣佈將帝國主義份子摩納哥僑民、前「羅馬教廷」駐國民黨反動政府「公使」黎培里永遠驅逐出我國國境。這一命令已由南京市公安局在今日下午十時執行。<sup>16</sup>

九月四日當晚十一時，十二個公安人員押送他們回到公署，在監視下收拾行李，九月五日凌晨，開車赴南京火車站，由公安人員押送至上海。九月七日抵達廣州，九月八日至深圳，作了最後一次檢查，翻查行李後，才准許進入香港。黎培理立即發表一篇書面談話稱：「我對中華民族的愛慕永不改變。我因奉教宗命駐節中國，對中國人民至為尊敬和同情，因此冒著一切困難留駐中國直至如今。這次離華至為悲痛，但我仍將為中國人民以及公教司鐸、修士、修女、教友時常作虔誠的祈禱。」<sup>17</sup>黎培理遂暫時留居香港，繼續處理台海兩岸相關之天主教事務。

<sup>16</sup> 同前，頁四五〇～四五二。

<sup>17</sup> 蘇若喬編，〈中國近代教難史料（一九四八～一九五七）〉，頁五一—二九。

### 三、黎培理來台

中華民國外交部對於爭取黎培理來台未果的種種原因，瞭解得相當清楚。在歐洲司的報告中提及：「關於敦促教廷公使館早日遷台一案，……惟查本案前雖曾迭經交涉，均以教庭藉詞推諉不果，跡其用意，無非在妄冀保全大陸上之大宗教產與教會事業，以致不敢開罪中共，不敢將其駐華使館遷駐來台，近頃中共對大陸上天主教之摧殘，雖已日漸轉劇，但除非其大陸上之教產或教會事業損失殆盡，或國際政局作對我有利之重要轉變時，教庭似仍難斷然放棄其原來政策。」<sup>18</sup>揆諸事實，中華民國外交部的這番評估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九月以前是相當準確的；黎培理要遷駐來台，必須有一重大的國際政局轉變，方有可能實現。

一九五一年九月，黎培理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驅逐出境，這就是重大的國際政局轉變。庇護十二世對黎培理被逐立即作出了回應，在他九月致全球主教的公函中，「明言申斥遠東共黨攻擊教會，提倡組織獨立教會及迫害教士教民之狂暴行為，希望中國與朝鮮早日脫離戰禍，免為邪說所乘。」<sup>19</sup>在庇護十二世撰寫這篇公函時，尚不知黎培理將被逐，但此時黎培理已被軟禁，多位外籍、國籍主教被捕，天主教教務協進會被查封，然後黎培理被逐，公函一出，正應證了其中中共迫害宗教的說法。

中華民國外交部對於中共驅逐黎培理一事之反應相當敏感，在黎培理仍在驅逐過程中時，一九

<sup>18</sup> 〈外交部歐洲司簽呈〉，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外交部檔案——我與教廷關係案（一）〉。

<sup>19</sup> 〈駐教廷公使館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一日收電，〈外交部檔案——我與教廷關係案（一）〉。



五一年九月七日外交部即急電駐教廷公使館：「希查明教廷對此事之反應，連同有關資料，如教廷發表之公報及一般輿論等，一併報部為要。」其時可能朱英臥病在床，羅光不在羅馬，駐教廷公使館僅以一《羅馬觀察報》之報導回覆外交部<sup>20</sup>，外交部方面非常急迫的再電教廷使館，這次說得更清楚：「再查自匪共在大陸上積極發動天主教會之獨立運動，並驅逐黎培理出境以後，教廷前此對匪共所具之顧慮，似已失去存在的理由。希切實查明教廷之反應後，並斟酌相機婉促其將駐華使館正式遷駐來台，並希尊辦具報為要。<sup>21</sup>」

性急的外交部長葉公超得不到駐教廷使館的立即反應，九月十三日即轉向謝壽康探詢，謝氏在十月初回信：「……教廷黎培理公使被匪幫驅逐，聞黎以香港教區屬伊管轄，或竟藉口留港，同時聞亦有謀求赴台之可能。由前之說，則教廷仍未改變政策，由後之說，吾人似應一面表示歡迎，一面提出交換條件，即教廷接受中國使節。日前與野聲總主教談此事，伊同樣主張。……<sup>22</sup>」謝壽康傳達的是不確定的訊息，他其實也沒有可直接獲得教廷訊息的管道。

葉公超至少在香港方面得到了黎培理的直接反應：「渠云渠一向愛中國，本願來台訪問，但恐匪方遷怒國內教友，尤其中國教友，加以殘害，故渠暫時不考慮來台，至將來行動如何，是否來台，當俟羅馬教廷方面之訓令以定行止。<sup>23</sup>」這種說法基本上和黎培理被逐出中國前的說法是一致

20 〈駐教廷公使館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五一年九月十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五九—一六〇。

21 〈外交部歐洲司致駐教廷代辦朱英電文稿〉，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一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六一。

22 〈前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五一年十月初，〈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六二。

23 〈駐港官員梁慶堯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五一年十月六日，〈外交部檔案——我與教廷關係案（二）〉。

的，來台與否，黎培理雖保留了彈性，但他似乎已掌握了教廷的風向。

在此混亂的世局中，教廷原駐中國使館是否遷台，其實是教廷一個次要的問題；教廷代理國務卿孟棟義在十月中下旬才由美國回到羅馬，在決定中國問題前，他其實是在等黎培理的報告。朱英在孟棟義返回後立即往見，報告台灣之進步、穩定情形。「孟氏聞後頗表欣慰」，但他對黎培理是否赴台事，並無肯定答覆，這已經可以聞到不妙的味道。十一月八日，國務院政務次卿達迪尼給予否定答覆，朱英說：「今晨往晤政務次長，促其遷館來台，彼答稱此事實難，因恐中共加重摧殘教會，且黎公使已有新任，教廷與貴政府始終親善，並請諒解。<sup>24</sup>」

根據羅光、于斌、謝壽康等人的觀察，這時在庇護十二世之下，教廷官員中對於是否和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建立關係，基本上分成兩派，黎培理為避免刺激中共，不希望教廷與中華民國太過親近，因此不主張使館遷台；他在教廷中的支持者是達迪尼。孟棟義有同情中華民國的傾向，但他常維持中立；剛恆毅則較孟棟義更支持中華民國，不過一切事情還是要由自兼國務卿的教宗自己決定。雖說教宗仍依黎培理意見不擬將使館遷台，但由達迪尼的話中，已可嗅出教廷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又親善了一些，這是教宗體察國際情勢變化的調整。

教宗針對中國教會日趨苦難的情形，在一月十八日發出「致中國神長信友公函」，在函中教宗說：

「我們見到天主教會，在你們國內，被人描繪的，好似你們是民族的仇敵，因而遭受攻擊。天主教會

24 〈駐教廷代辦朱英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六六。

的神長、聖職人員以及修士修女們，或被迫去離職守，或被禁止執行職務。……既然所討論的，乃是天主和教會的大事，「你等勿以敵眾而萌退縮之意」（斐、一、28）你們應大義無畏，以誠切的祈禱求天主扶助你們的勇氣。你們的困難，你們的憂慮，你們的痛苦，都可作為全燔之祭獻於天主，庶幾天主矜憐，再賜中國教會和平安寧，信仰自由。……<sup>25</sup>」

教宗的這番呼籲是有明確事實的，根據香港《公教報》的統計，在一九五一年年底，在中國有十三位主教被監禁，有四位被軟禁監視，九位被驅逐出境，還有四位主教被捉然後被釋。一九五一年一月九日，美國紐約總主教史培爾曼樞機抵港慰問難民，所見都是被驅逐抵港的神父修女。在中國大陸，各種攻擊天主教教的行動繼續如火如荼進行，在中共的宣傳中，各地修女會辦的育幼院都成了殺嬰、虐嬰的中心，一九五二年五月，北平輔仁大學的校名被取消，歸併於北京師範大學，上海震旦大學公教學生與中共的鬥爭仍在繼續，但情勢日益惡劣；各種教會機構一一被中共接收，中共對外籍傳教士，因考慮國際觀感，尚有所節制，但國籍神父、修女的境況就更可憐了，凡不從命者幾乎全遭監禁，未經審判即被殺害、失蹤、瘐斃獄中者所在多有，數十年中國教會改革所奠定的一點點基礎，幾乎全被摧殘殆盡。<sup>26</sup>

面對這樣持續惡化的情勢，質疑黎培理的聲音開始出現，他這樣委曲求全，保持低調，停駐香港，並沒有使中共迫害天主教教會的步伐減緩；他去台灣與否，和中共迫害天主教之間，似乎並沒

<sup>25</sup> 庇護十二世，〈致中國神長信友函〉，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四〇三。  
<sup>26</sup> 有關此時中國教會情形，可閱〈中國近代教難史料〉。

有關聯性。教廷內也開始出現一種說法：難道中國天主教的情況還能更惡劣嗎？

方豪神父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以巴塞隆納聖體大會副團長的身份首途赴歐；團長人選一直没有確定，原先是邀請被教宗限居美國的田耕莘擔任，但田耕莘以眼疾為由推辭。在留居西班牙國籍神職的運作下，聖體大會籌備當局緊急聯絡于斌，請其出席，于斌知道這次活動有打開中華民國政府國際空間之意味，乃毅然決定前往參加。方豪於五月二十六日赴馬尼拉取得西班牙簽證後，轉往香港，會晤黎培理，力勸其來台，黎氏稱唯教宗之命是從。方豪隨即轉往巴塞隆納參加聖體大會，時于斌自美國紐約前來，羅光亦自羅馬前來。于斌抵馬德里後，與西班牙外長同機赴巴塞隆納，西國外長在機上向于斌應允將促成中西復交，這于斌參加聖體大會意外的收穫。<sup>27</sup>

方豪在八月十日致函外交部長葉公超：

「恭超部長鈞鑒。敬啟者豪隨朝聖團出國瞬逾二月。雖自知身任副團長。在團員中又僅豪一人兼通英法拉丁語言。且以神父及教授身份極受外人重視。故在國民外交方面不敢不為國家稍效微勞。故在西班牙期間盡力協助 野聲總主教。在 謙六（按：于煊吉）大使呈遞國書前夕。又經葡萄牙趕回馬德里。聯合全體僑胞慶祝復交成功。然後飛羅馬謁傳信部 剛主教，談五十五分鐘。訪外交部蒙帝尼主教（即 Secretariat d'Etat）。談四十分鐘。力言教廷公使駐台之必要。均加首肯。剛主教且謂實現當不在遠。蒙氏為常務次長（部長久已虛懸）。臨別囑訪政務次長達第尼主教。彼為決策人。惜達氏在假中。當於返羅馬時。前往拜會。親見 教皇事。亦當在本月二十五日以後。一切均由 朱代辦接洽。並保持密切聯繫。……」

<sup>27</sup>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頁一八六—一八七。

方豪寫這封信時的心情顯得興奮且期待，因為有關教廷駐華使節遷台事，剛恆毅和孟棣義都給了他肯定的答覆，他急著要見教宗及達迪尼，希望能一次克盡全功。日後他也隱約指出，教廷使節遷台，是他在居中牽線。不過事情並不像他想得如此簡單，首先是中共在驅逐黎培理後繼續迫害天主教，已逐漸使得黎培理政策受到質疑；其次，中西復交是一個新的國際變局，中華民國政府迅即派于焄吉在七月十五日左右赴任，這應該才是使得教廷政策轉變的導火線。作為歐洲主要的天主教國家，西班牙恢復對中華民國的支持，必定可以給教廷的外交政策一定的引導與壓力；特別是過去西班牙遲遲不願與中華民國復交的理由之一，即為考慮在中國大陸西班牙傳教士的安危，這點理由是与教廷過去政策相同的。

既然于焄、羅光和方豪都在巴塞隆納，利用中西復交，促成教廷駐華使館遷台，就不可能是由方豪策劃，實際策劃者是于焄。羅光返回羅馬後負責向教廷方面遊說，應該是在六月底七月初已有肯定訊息，于焄則與行政院長陳誠聯繫，陳誠乃在七月十日發函給黎培理：「……本人代表自由中國政府人民對閣下表示十分同情與關切，此後如有退出大陸之教士來台傳教，極所歡迎，亦盼 教廷公使移節台灣，俾便就近照料一切。……」<sup>28</sup>方豪在七月底或八月初見孟棣義及剛恆毅兩人，得到肯定答覆，是因為原則已經同意，磋商過程已經開始，所以才會說「實現當不在遠。」

黎培理接到中華民國行政院長邀請赴台的電文，雖然他的主觀意願並不是如此，但他必須向教廷報告，然後教廷方面就據其報告，要求黎培理將使館遷台。此事不由方豪主導的另一證據是在八

28 〈行政院長陳誠致黎培理電文〉，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六八。

月七日，當方豪還在等待與教宗和達迪尼見面時，教廷即宣佈將台灣加入中國聖統體制，台灣成為中國教會的第二十一個教省<sup>29</sup>，台北升為總主教區，這很明顯是承認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仍代表中國，也是為教廷使館遷往台北預作準備。

可以想像得到，黎培理收到教廷指示後是相當錯愕的，與教廷一定有一番爭論，但黎培理再一次展現了他的服從精神，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他以祝聖郭若石為台北總主教的名義由港赴台，次日，他即往訪中華民國外交部，由次長接見，雙方有一番耐人尋味的對談：

「略事寒暄畢。黎歷述其在大陸所受共匪種種壓迫。歷時甚長。

胡：閣下今後之計畫可 而聞歟。

黎：本人將在此作長期居留。

胡：此來為執行宗教任務。抑復行執行公使任務。

黎：係繼續執行公使任務。因本人從未離開貴國。且教廷與 貴國間迄尚維持外交關係。

胡：既如此。則本部須辦理下述各事。

一、將閣下重新列入駐華外交人員名錄中。呈報政府及通知各有關機關。閣下已在台北設立公使館。

二、此項手續。本部目前是否即可辦理。然後閣下另行通知本部。

黎：請即辦理。

胡：下述各事。亦請閣下趕辦。

29 趙慶源編著，〈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頁一四一。

一、貴館館址應有顯明之標幟。使憲警機關便于保護。

二、即以照會通知本部貴館所有新列之館員。

黎：當即照辦。照會當可于一二日內送達閣下。又按照外交禮節。以公使地位不應往謁 貴國總統。惟未審有無是項機會。

胡：吾人不必太拘泥於禮節。將來閣下將常住此間。以後當為設法安排。<sup>30</sup>」

由這篇談話中可以看出外交部官員的冷淡態度，以及黎培理的不情不願。公使館在這種氣氛中，悄悄遷台。

#### 四、謝壽康返任

黎培理既已來台，相對來說中華民國公使返回教廷，就應不成問題了。羅光在確定黎培理遷往台北後寫信給于斌：「誠如總牧所言，吾人應感謝天主，一年前視為不可能者，今竟成矣！」<sup>31</sup>因為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達迪尼還當面回絕黎培理來台的要求。然後羅光寫道：

「我政府派公使來此，今後似不應多生困難。然不知我外部究尚有意遣使否。因前次長董○○，現次長時昭瀛，皆曾向朱代辦言外部無意派公使來此。謝使之事昔乃由 總牧所提而經行政院決定者，外部提出謝使於教廷後，因不獲覆，為政府名譽計，故多方促教廷早日同意，但近兩年再不提此事，且

<sup>30</sup> 〈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與外交部胡次長談話要點〉，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七〇～一七一。

<sup>31</sup>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於敝館從未有重辦此案之訓令，故朱代辦與光將探詢教廷是否同意我方派公使，且催其自動表示願接受我政府之公使。因據光推測，我外部既有前次之不幸，最近必不再正式自動提出派使之事也。<sup>32</sup>」

由羅光函中可以看出，他擔心的是台灣方面，因為不滿於教廷在過去三年中的態度，可能故意拖延，甚至不派公使駐教廷。而謝壽康是最合適的人選，客觀因素不計，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此人選已在一九四九年提出，教廷並未拒絕，只說暫緩，現在順水推舟，手續最為便利。

問題既然是在外交部，那就需要于斌透過他在政府中的人際關係設法解決。在外交部檔案中可以看到于斌透過范爭波呈請行政院三事，其中第三事就是有關派使駐教廷。范爭波函中應已提及謝壽康為最適當人選，外交部的答覆是：「我派公使駐節教廷事，茲以教廷公使黎培理業已來台，本部亦在考慮進行之中。至人選一節，當專案呈核。<sup>33</sup>」

除了行政院方面，于斌亦託方豪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四日上書蔣總統：「中國樞機主教之產生，中國教會正式建制之成立，謝壽康先生實有大功，我國派駐教廷新公使，仍以謝氏為最適宜。<sup>34</sup>」一月十五日，教廷方面亦已得正式答覆。朱英致電外交部稱：「今晨教廷外部代理部長約職往談，渠謂貴政府前派謝使事，教廷現表示同意，如貴政府希正式答覆，教廷自可正式答覆云。竊以教廷現已遷館至台，又自動同意謝使，此時如我方派使來館，似可增進中教兩國邦交，如何之處，伏乞

<sup>32</sup> 同前。

<sup>33</sup> 〈外交部致行政院秘書處函抄件〉，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七二。  
<sup>34</sup> 李東華，〈方豪先生年譜〉（台北：國史館，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初版），頁八十五。



電示。<sup>35</sup>」現在一切都準備好了，只等中華民國政府的反應了。

台北方面沒有積極的反應，羅光再致函于斌：「……迄今兩週，音信杳然，光固知此事，須經行政院會議通過，又須經總統批准，非一日兩日可決定之事；但據次長時昭瀛迭次之談話，政府素無遣派公使駐教廷之意；又據台方消息，部中頗有數人圖謀駐教廷公使之職，外部或因此遂將此事延擱乎？再或我方因教廷昔曾延擱三年，今亦欲稍加延擱，以顯我方之身分乎？光以為此時辦外交應就實際，派公使駐教廷於我國國際地位有益，則應於此時行之，不宜以意氣用事或人事關係而竟延擱也。望 總座函台北有關之友好，促速進行焉。」羅光的擔憂成了事實，這事不明原因的拖延一年多，看起來外交部是要略顯其身份，以對等的延遲方式對待教廷了。

一九五四年四月，中華民國政府終於決定要徵詢教廷公使人選，可能外交部內部有一些討論，但最後決定的人選仍是謝壽康。朱英接到電報後，立即前往教廷國務院接洽，國務院表示非常歡迎。<sup>36</sup>消息傳到台灣，黎培理竟持反對意見，認為此舉將致中國教會不利，於是往見外交部長葉公超，黎培理說：「貴國派駐教廷之謝公使如即前往教廷工作，難免因此觸怒中共，對於現在中國大陸傳教士之安全，恐有妨礙。未悉謝公使可否稍緩成行？」黎培理的這番說法，以其當時的身份是匪夷所思的，他駐紮在台北，他也承認這是中國的一部分，而現在統治台灣地區的中華民國政府，要派遣一個外交官員去教廷，他竟持反對意見，葉公超的答話很妙：「共黨對宗教素所反對，其反宗教為必然之事，教廷似不需對彼顧慮，且 閣下早經派駐我國，我國與教廷互派使節，亦非自今

<sup>35</sup> 〈駐教廷代辦朱英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七二。

<sup>36</sup> 〈駐教廷代辦朱英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一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七二。

日始，更無庸顧慮，盼閣下以余之意見轉達教廷。<sup>37</sup>」

在教廷四月上旬答覆歡迎謝使後，又通知希謝使在日內瓦會議後再行赴任；日內瓦會議在四月二十六日召開，五月十七日黎培理復直接向外交部長表達反對意見，外交部方面自然產生一種聯想，認教廷是否變卦，因此正式的任命狀遲遲未予下達。駐教廷使館未知在台北方面的變化，只是一直得不到謝壽康何時上任的通知，羅光在給于斌的信中隱約透露了他的焦慮：「謝公使事，部方始終無更通知，本館想其任命狀尚未由總統明令公佈，僅只有行政院之內定耳，彼所謂辦手續大約即是等候任命狀。<sup>38</sup>」

雙方誤會經過一段時間化解，至遲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底，謝壽康回任事終成定局。十月一日，謝壽康乘船赴義大利，十月十二日抵羅馬，十月十五日見孟棣義代理國務卿，十月十六日見達迪尼代理國務卿，經商議後，呈遞國書日期訂於十月三十日。按照羅光的說法，呈遞國書事仍有曲折，教廷藉口謝使係重來任所，不需再行呈遞國書儀式，只由謝使以私人名義晉見教宗即可。<sup>39</sup>羅光「三次晚間和孟棣義副卿商議，採取折衷形式，外面儀式照常，然兩方不公開致詞，報章只登載謝使覲見教宗。這一切難題，都是國務院政務副卿為避免中共的反應。<sup>40</sup>」政務副卿即為達迪尼。他

37 〈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請見外交部長談話紀要〉，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七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七四。

38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四年六月廿八日。

39 羅光，〈對中梵關係的努力〉，〈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七二三。

40 同前。

與孟棣義兩人此時均加上代理國務卿頭銜。

謝壽康返任未久，原駐教廷使館代辦朱英即因心臟病去世。朱英自一九四九年任駐教廷使館代辦以來，即為心臟病宿疾所苦，經常臥病在床，但仍力疾從公。朱英在義大利僑界，頗受愛戴，因其經常予華僑各種必要之協助。卸任前十月四日領洗入天主教，十二月七日去世。<sup>41</sup>他在中華民國政府最危急的時候，維持了與教廷的關係，真可稱之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 第二節 中華教會及教會領袖的苦難

### 一、于斌來台問題

庇護十二世時期，于斌及田耕莘不准來台，亦為教廷對華政策之一。除了不准來台外，其行動亦受某種程度之限制；似乎他們的行動，如與中華民國政府有關，亦需得到教廷方面的許可，方能行動。

一九五〇年二月以後，于斌就被要求以美國為他的活動範圍，教宗訂出一九五〇年為聖年，于斌在一九五〇年七月以朝聖為名到了羅馬；除了兩篇回憶他朝聖的文章外，沒有其他資料可以說明他在羅馬活動的情形，不過他應該會藉此機會略加疏通；他離開羅馬後，他帶著南京教區及衡陽教區十二個修生在義大利海邊避暑<sup>42</sup>，一週後他往西班牙，探望被送往該地的神父、修士及學生，其

<sup>41</sup>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五四年十月三十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七五。

<sup>42</sup> 王愈榮，〈野聲樞機主教與修士們〉，〈教友生活週刊〉，一九九八年八月十六日。

中包括吳經熊的兒子吳祖禹。這些行動應該還算正常，沒有逾越教廷允許的範圍。

一九五二年，巴塞隆納國際聖體大會，于斌原本不準備前往參加，原因即是教廷方面不願意他前去，因此與西班牙籌備單位有默契，不準備發邀請函給他。在遵守教廷命令的前提下，「政府方面雖然一再敦請，駐意大使也專電往邀，西班牙同事方面也三番九次函催，然而畢竟沒有打動于斌主教的心。」直至留西神父，遊說西班牙主辦單位成功，發給于斌邀請函，于斌才藉此機會得以前往。在反對于斌，認為他參與過多政治活動的部分教廷人士看來，于斌促成中西復交更坐實了他們的看法。

受到中西復交部分的影響，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教廷駐華使館遷往台北。在此情形下，于斌以為不准他赴台的命令已無意義，希望教廷能解除禁令。為他從中奔走者是羅光，十一月二十一日，羅光致函于斌：「總牧去台，光極表擁護，必竭力疏通，昨見剛公言之，彼云一切俱須向教廷外部商妥，催光向外部負責人進言，但剛公亦云今後不必怕中共報復矣，因中國大陸教會之遭遇，已不能再惡，已壞至極點。……光思下週往教廷外部，……暗示台方友人告黎使台灣民意要求此事，繼可向教廷報告，不然光言之教廷，教廷必詢黎使意見，苟其一意橫行，則又誤事矣！」<sup>43</sup>

羅光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一九五三年一月份他告訴于斌：「為總座回台事，已初步與教廷外部接洽，然因未見孟棣義代長，無可奉告者。」<sup>44</sup>六月羅光再告訴于斌：「光甚望總主教能去

43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44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台北，已再度與此間接洽，惟尚未得答覆。<sup>45</sup>」對教廷有充分認識的于斌，應該已經知道這種沈默代表的含意，同時間羅光有意推動使于斌擔任海外華僑傳教工作的負責主教，這件事在教廷內亦受挫。經過這些過程，于斌應該清楚瞭解，雖然教廷內有同情中華民國和支持他的力量，但主流仍是阻擋他赴台的。而黎培理雖然必須服從命令將使館遷台，但他仍然認為教廷與在台的中華民國政府關係愈密切，愈是傷害中國大陸的教會。

一九五四年為選舉中華民國總統，于斌赴台的機會來了。于斌具國民大會代表的身份，有選舉總統的義務，且教廷駐華使館既已遷台，邦交國在此選舉總統，教廷亦應贊成。但于斌向教廷申請赴台，遲遲未獲許可；國民大會開議前兩日，當時尚未確定上任的謝壽康致函于斌：「……朝野一致熱烈希望兄返台參加，乃達黎二人，惡意阻礙，議與不議，無不憤慨同情。<sup>46</sup>」達即達迪尼，黎為黎培理，謝壽康的說法不知是有佐證，或僅是理所當然的推測。

無論如何，于斌忽然在二月二十五日自美動身，經過日本轉機，在二月二十八日抵達了台灣，他此行應是在最後關頭得到了教廷的准許；就人際關係而言，極可能是紐約總主教史培爾曼樞機為之向教廷求情。<sup>47</sup>當日為主日，他甫下飛機，即赴中正東路天主堂作彌撒，「彌撒後，前往教廷使館，拜訪黎公使。」可以想見于斌是向黎培理說明他已獲得教廷許可，「下午往國大報告，並參加主席團會議，晚間下榻總主教公署。三月一日，……下午四時半，應總統邀，往士林官邸暢談一小

45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一日。

46 〈謝壽康致于斌函〉，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

47 謝壽康已言當請史培爾曼樞機為于斌說項。

時，報告國際情勢。……于總主教因久未回國，日來格外忙碌。<sup>48</sup>」

的確于斌在台灣行程是非常忙碌而盛大的，與在美為十幾個留學生演講相比，他在台灣每日演講、拜會的行程不斷；在國民大會的議程結束後，台北總教區在三月七日為于斌辦聯合歡迎會，到有教友千餘人。最大的一場是由人生哲學研究會等八個團體聯合邀請，在三軍球場舉行的講演會，共有八千多人參加。自三月七日至四月二十四日，于斌在台演講了至少二十七個場次。四月二十五日，在一再的餞行宴會後，于斌離台赴韓，赴機場送行的有陳誠、張厲生、張道藩、張其昀、黃伯度、俞鴻鈞、谷正綱、黃少谷，蔡培火、蔣經國、白崇禧、王叔銘、錢思亮、嚴家淦等政府要員、社會名流；由送行名單，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于斌返台受中華民國政府及社會重視的程度。<sup>49</sup>

但是換從黎培理的角度看，他已對於斌有成見，于斌又在他的反對下來到台灣，于斌和台灣政界要人如此密切的互動，更證實了他先前對於斌的觀點。三月二十七日，西班牙駐華使館代辦，代表西班牙政府，頒授于斌「聖雷孟柏納福大綬勳章」以表彰他對中西復交的貢獻，這是于斌在一九五〇年後參與政治的第二個證據；四月十一日，中華民國政府在拖延一年多後，向教廷要求謝壽康返任公使，這是于斌影響中華民國政府政策的另一證據。教廷只許于斌短期來台，在臨離去前，于斌竟然說他秋天還要再來台灣，這些話是在沒有經過教廷許可前說出，在黎培理看來，很明顯的是對他及教廷挑釁。離開台灣還沒完，于斌竟然跑到韓國進行國民外交，讓他的老朋友，南韓總統李

48 《教友生活週刊》，一九五四年三月七日。

49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頁一九二—一九四。

承晚接待他。這些事情加在一起，為黎培理而言簡直是忍無可忍，因此他必然給教廷上了一個非常不利於于斌的報告。

究竟于斌被教廷如何斥責或懲罰已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在七月份已準備親至羅馬解釋，羅光委婉的勸他不要來，他說：「總牧如有來羅馬之意，能與孟棣義、達爾棣義兩代國卿，另外與傳信部新次長一談，必可有所獲，然八月時，此三公大約俱不在羅馬矣。……」<sup>50</sup>于斌遂以書函向教宗解釋，似乎教宗對於斌的申訴有諒解表示，羅光和于斌說：「剛公暑假回羅後，光以總座致聖父函及聖父覆示之副本與之，閱後甚為欣慰，謂如此能消去許多誤會也。」<sup>51</sup>教宗雖然有諒解表示，但于斌想再去台灣就不可能了；于斌申請赴台被打回了票，羅光不忍直接告訴于斌，只跟他說：「總牧赴台事，謝使將有函奉告，庶不多言。」<sup>52</sup>而主要的反對者應該是黎培理。

于斌要在一九五四年秋天回台，並不是想再風光的演講拜會，而是此時他心中已有了一個興教救國的大戰略，他要聯絡日本、韓國、菲律賓、越南、台灣的友人，形成一個對抗共產主義的民間聯盟，所以他雖然不能再赴台灣，但一九五五年二月他先往菲律賓，然後再往越南。菲律賓及越南與美關係密切，教廷駐美代表不便阻攔，但教廷的不悅是可以想見的，他們覺得于斌陽奉陰違。于斌確實遵守了禁令，三月二十六日，在結束越南行程後，未經台灣過境，經關島、夏威夷返回了美國。

50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駐西大使于焯吉致于斌函〉，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51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九日。

52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回到美國後沒有多久，「自由太平洋協會」於一九五五年五月成立於紐約河邊道八十六號，雖然于斌僅為衆理事之一，但這裡是他在紐約的家，可以由此看出他是這個民間團體的實際組織者。他只擔任理事是為了避免在教廷內反對他的人，過多的聯想，不過這樣掩飾的效果並不大。這個組織的主要力量，是于斌與韓國總統李承晚、越南總統吳廷琰的私交。<sup>53</sup>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于斌以參加三位曾在中國傳教的西籍主教發起的祈禱會的名義，到了西班牙。除了參加為中國教會的祈禱會之外，于斌見了西班牙外長，為中華民國政府轉達將在聯合國中對外蒙人會問題投下反對票。然後于斌轉往西德，往訪西德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艾德諾和他保證：「對中德關係正在考慮。<sup>54</sup>」

教廷中對於斌有成見的人看來，于斌一九五五年這一連串的活動都是政治性的；他去了菲律賓後，菲國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從總領事級升格為大使級。至於越南，十月二十四日吳廷琰當選總統，越南國王保大退位，雷震遠（Raymond J. de Jaegher）也在此時代表于斌，率溫天錫、郁祖忻等人赴越工作，組織自由太平洋協會越南分會，而雷震遠也成了吳廷琰實質上的顧問。更別說欲蓋彌彰的自由太平洋協會的成立，和西班牙外長，西德總理的晤談，都是明顯的政治活動。因此于斌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赴羅馬後，庇護十二世並未接見他，這無疑是說明教宗餘怒未消，可能更多不利於于斌的報告又已湧進教廷了。在羅馬最歡迎于斌的是重任公使的

<sup>53</sup> 同前，頁三一四。

<sup>54</sup>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頁一九八～二〇〇。



謝壽康，他在十二月十日為于斌舉辦茶會，陞任樞機的剛恆毅也親切的接待他，但他並沒有當面和教宗解釋的機會。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于斌致函給宗座駐美代表齊孔納尼，稱將赴歐，「七月時我將在羅馬。」<sup>55</sup>」當天他就出發往馬德里。他在西班牙時間並不長，六月二十九日到達羅馬後，直至七月十八日一直待在羅馬。從他的記事本中可以看出，他在這段時間除了與謝壽康及國籍神父會晤外，並沒有其他行動。由此可以看出，于斌一心一意求見教宗，但教宗無意接見。然後他赴法參加道德重整運動，回到羅馬後，八月五日由謝壽康陪同，赴 Villa Mondragone Frascati，參加「世界改造運動中心」的主教避靜，八月十日，參加避靜的二十七位主教晉見教宗，數年來于斌求見教宗的心願終於達成。<sup>56</sup>

不過這並不是一次愉快的經驗，據說在晉見前，一位教廷的蒙席將于斌戴的小紅帽摔在地上，但為見教宗，于斌還是撿起帽子然後戴上。按照慣例與教宗見面後，必定留影紀念。于斌回到美國後遲遲不見與教宗之合照寄達，羅光的回覆是：「上次總主教謁見教宗之照片，幾經追問，始知照片底片不清楚，總主教之尊容不成形，似有人故意為之，然亦無法追問詳情。」<sup>57</sup>日後羅光說得更直接：「主持此會的 Angeluci 樞機曾說，教宗看了照片，就把于總主教的部份劃掉。」<sup>58</sup>

<sup>55</sup> Letter of Archbishop Paul Yu-Pin to Archbishop Amleto Cicognani, June 20, 1956.

<sup>56</sup>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頁二〇四～二〇五。

<sup>57</sup>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sup>58</sup> 羅光總主教訪談記錄。

庇護十二世為何反應如此激烈，表面的理由是不贊成于斌參加基督教的道德重整運動，于斌為此還設法向教廷解釋，<sup>59</sup>不過這只是一個成見已形成後的藉口而已，教宗對於于斌的成見才是最根本的原因，不斷湧入對於于斌不利的報告是形成這些成見的理由；從一九五〇年後庇護十二世不接見于斌，于斌竟然還混在衆主教中，強行見了教宗，教宗的不悅是可以想見的。

所以在一九五七年，教廷給了于斌更嚴重的禁足令，不但台灣不准去，所有地方都不准去！六月廿八日，羅光致函于斌：「今年既不來歐，明年必可來矣。明年逢露德聖母顯現一百週年，應組織一中華朝聖團；總主教可發動留歐美之國籍神父，早日開始組織乎。」<sup>60</sup>這是他安慰于斌之詞，至於于斌是否能自由行動，他其實也沒有把握。

## 二、田耕莘回台問題

一九四九年後停留在香港的田耕莘樞機主教，在教廷與中華民國政府的角力中非常為難；因為他的健康不佳，教廷給了他自由決定回北平的時間，但終究是要回去的。一九五〇年間，田耕莘確曾思考過回北京的問題，甚至已買好了到天津的船票，在一些朋友的勸阻下，田耕莘打消了回去的念頭，暫時隱居在九龍的聖德撒醫院，不接見任何訪客。據說他也曾致函周恩來，希望能在獲致某些保證的情況下回到北京，但並未獲得周恩來的音訊。<sup>61</sup>

59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60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61 方若翰神父，〈田耕莘樞機傳〉（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十月初版），頁一〇〇～一〇一。

一九五〇年十月，田耕莘收到來自羅馬的邀請信，請他去羅馬參加聖母肉身升天被斷定為信條的慶祝大典。他身為樞機主教是他被邀請的一個原因，不過這個邀請同時具有另外的含意，因為田耕莘在此之前希望能赴教廷溝通，但教廷方面一直未給他正面的答案，這個邀請函代表教廷已不堅持田耕莘必須返回北京，對於田耕莘的未來有了一些解決的方案，只等待田耕莘到羅馬後，即可有所決定。

關於教廷甚至教宗本人和田耕莘的交談過程，或許將是一個永遠的祕密，不過從田耕莘的行動就可看出最後的決定。十月十九日他飛抵羅馬，十一月一日參加慶祝大典<sup>62</sup>，十二月中旬他離開羅馬，在德國作了一些訪問後，一九五二年二月二日抵達紐澤西波登城（Bordentown）的聖言會會院，然後轉往辛辛那提的善牧醫院為眼睛開刀，最後他留在芝加哥近郊泰克尼（Tecumseh）的聖言會會院，開始了他在美國的流亡生活。

和于斌充滿聲音和活動的流亡生活相比，田耕莘的流亡生活是寂然無聲的。他完全配合修院裡面的作息，他按時參加早、晚課、彌撒，他在其中就只像是一個普通的修士，而不是樞機主教。甚至在進餐時，他也和修士們一起排隊。雖然他已六十歲，他努力學習英語；在經過一番努力後，至少他已可以做些簡短的致詞或演講。他並不是完全和外界斷絕接觸，每月一次，他和在芝加哥唸書的中國神父一起做一天的退省；一九五四年秋天，他給九個中國神父講了七天的避靜；他同時也設法協助這些中國神父們的日常經費；他還和外界有些私人的聯繫，但是他不再組織什麼活動，也不

62 〈駐教廷代辦朱英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外交部檔案——我與教廷關係案〉。

參加他居住地以外，教會內外的活動。<sup>63</sup> 田耕莘所以如此，可能是在他的內心充滿了痛苦與愧疚，除了向天父祈禱之外，別無他法。

一九五四年三月他接到來自北京的訊息，有二十五位神父因為效忠羅馬天主教，反抗中共的命令而被捕。他內心的憂苦再被挑起，他寫道：

「這使我更覺慚愧，臨陣脫逃的逃兵，為軍法所不容；臨難苟免，為正人君子所不為。我今逍遙海外，不能和我的神父們同苦共難，使教友們成為無牧之羊，真是罪該萬死！羅馬聖座雖不定我以罪，但我心中非常慚愧，巴不得一步跑到自己的教區，為信仰流血致命。……<sup>64</sup>」

這些想法田耕莘或想將之付諸行動，猶豫之間，與其親近者當有耳聞。因此當葉公超一九五七年一月赴美時，在紐約即曾聽田耕莘之中文秘書言：「田公預備回北平！」<sup>65</sup> 此事於中華民國政府之外交宣傳相當之不利，葉公超乃準備趁赴義大利時覲見教宗，化解此事。

一九五七年二月一日，葉公超自美抵羅馬；先與義大利簽訂商約，據羅光所言，義大利政府反應冷淡。<sup>66</sup> 但教廷反應不同，「二月三日覲見教宗，教宗以接待外長禮相接，在書室與之談話二十分鐘，然後接見謝公使與使館人員。……」然後葉公超見了代理國務卿、副國務卿，下午六時謝壽康

<sup>63</sup> 方若翰神父，〈田耕莘樞機傳〉，頁一〇三—一〇五。

<sup>64</sup> 同前，頁一〇五。

<sup>65</sup>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

<sup>66</sup>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二六八。

辦的歡迎酒會，「到三百人，有樞機六位。<sup>67</sup>」這一冷一熱正反應出教廷與義大利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的不同態度。

葉公超在面見教宗時，當面請求教宗讓田樞機回台；教宗的回覆很直接：「田樞機常川駐台恐不可能，一俟其康健恢復後，可准其回台一行。<sup>68</sup>」教宗的說法是很有意思的，因為田耕莘是因病離開北平，然後在香港調養；他赴美的官方理由也是養病及治病，所以赴台的先決條件就是病好或否。不過庇護十二世似乎也顯示了他的寬容，在他禁止于斌離開美國之際，他有條件的准許田耕莘在可能的未來可以赴台，畢竟活蹦亂跳的于斌已在一九五四年去了台灣，乖乖待在修院裡的田耕莘總該也可以去一次吧。

葉公超自歐洲再經美回台，經芝加哥時特別去拜訪田耕莘，不知道什麼原因竟然沒有見到；無論如何，他將與教宗談話的情形，用信件留給了田耕莘。<sup>69</sup>既然教宗表示同意可以訪台，田耕莘即向教宗傳信部提出申請，根據謝壽康給葉公超的報告：「田樞機曾兩次向傳信院表示願意赴台觀光，第一次之咨請留中未發，第二次亦久未答覆，弟曾前往傳信院詢問說明田樞機必須赴台一遊之種種理由及 鈞座曾向教宗表示歡迎田公返台訪問，教宗面允予以同情考慮之經過。」但是傳信部在三月七日終於回覆田耕莘：「現無赴台之必要，惟最後仍由教宗決定云。<sup>70</sup>」

67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

68 〈外交部長葉公超致行政院長呈〉，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外交部檔案——田樞機返台案〉。

69 同前。

70 〈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長葉公超函〉，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外交部檔案——田樞機返台案〉。

謝壽康認為教廷中反對田耕莘訪台的代表人物是傳信部長畢翁地樞機主教，「曾任駐東京宗座代表多年，對我素乏同情，其成見甚深，牢不可破。」他反對的理由還是考量中國教會，「目前中共對天主教無甚特別暴行，……若田樞機主教訪問台灣，中共又有藉口加強反教。」為促成田耕莘訪台事成功，雖然傳信部反對立場明顯，但謝壽康決定以外交交涉方式嘗試解決，於是乃在三月二十九日往見國務副卿撒莫勒（Antonio Samoré）。因為田耕莘行動歸傳信部負責，因此國務院的答覆是：「此非一政治外交問題，但貴部長既與教宗談過，今閣下又來接洽，當問明傳信院再秉呈教宗核奪。<sup>71</sup>」傳信部堅持其立場不變，但教宗為自己說過的話負責；四月九日教廷國務院告訴謝壽康：「現教宗允准田樞機訪問自由中國惟 a. 訪問時間不要超過兩個月。 b. 不宜太聲張。 c. 避免政治外交性質。<sup>72</sup>」教宗准許田耕莘訪台的旨意下達了。

在田耕莘方面，四月六日教宗尚未允准前，他很有信心的寫信給葉公超，「莘今日雖在美國養病，而心實在自由祖國，每日祈禱獻祭時，常懇求全能天主恩賜祖國平安，助佑政府早日恢復大陸，拯救苦難中同胞。待莘體力稍壯後，羅馬教會當局定准莘赴自由祖國。」同時在這封信中，田耕莘也表明心跡：「最後敢向座右言者，莘絕不赴赤區大陸，因天主教教義與共產主義，基本冰炭不能相容也。如有人言莘甘願歸返共區者，皆屬無稽之談，請置之不理可也。<sup>73</sup>」

隨後謝壽康和葉公超都先後致函田耕莘，和他報告教宗准許赴台的好消息，並且希望他儘快東

71 同前。

72 同前。

73 〈田耕莘致外交部長葉公超函〉，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外交部檔案——田樞機返台案〉。

裝就道。不過謹慎的田耕莘要等到收到教廷的正式通知後才肯行動，而且既然身體有病，怎麼可能一收到教廷的通知病就痊癒呢？總還要繼續養病一段時間才能出發吧！另外或許他也考慮，台灣即將進入盛夏，以他虛弱的健康狀況，七八月訪問台灣並非明智之舉。於是訪華行程不斷延後，七月十日他終於決定了行程，「將於九月四日自芝加哥起飛，六日至日本，在日逗留數日，九月十三日早可抵台灣。……同行者並有二秘書：一為中文秘書羅光蒙席（羅馬傳大教授），一為英文秘書魏欽一司鐸。<sup>74</sup>」田耕莘及魏欽一的旅費由他們兩人自行籌措，婉謝了中華民國政府的好意；羅光則名正言順的由政府津貼補助。

九月十三日晨五時半，歡迎田耕莘的人群已經擠滿了松山機場，在教會方面有台北總主教郭若石、黎培理公使暨其秘書、藍澤民總主教、牛會卿主教、神職人員及教友不下兩千人；政府官員以葉公超為首，社會人士則有山東同鄉會等不下數百人，誠為少有之盛況。然後九月十四日即前往拜見蔣總統，然後由教育部長張其昀午宴款待，張氏致歡迎辭，「強調天主教精神與我國傳統文化，極為接近，互相印證，我國大公主義，即天主教至公思想，要想撲滅共產主義，必須溝通天主教思想與我國文化。……更以輔仁大學在這方面的貢獻，力主輔仁復學之必要。<sup>75</sup>」田樞機沒有直接回覆，由充任秘書的羅光代致謝詞，可堪玩味的是他的湖南腔，不知有幾人聽得懂。

田耕莘回台最盛大的活動是九月二十二日在三軍球場主禮的中興彌撒。《教友生活週刊》報導稱

<sup>74</sup> 〈田耕莘致外交部長葉公超函〉，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外交部檔案——田樞機返台案〉。

<sup>75</sup> 〈教友生活週刊〉，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

參禮者不下萬人，或有人懷疑此數字誇大，有一封台北總主教公署致外交部的函可為佐證：「……三軍球場方面只許可本教會分發入場證六千張，與參加人數相距甚遠，特請 鈞部代向三軍球場交涉，許可本教會再增添入場證一千六百張，得使本教會教友多有參與機會。……」<sup>76</sup>「教會人數再加上社會各界參與的人數，雖不及亦不遠矣。」

田耕莘在這場中興彌撒中的講道，講的主要是中華文化與基督信仰的相輔相成，兩種觀念的相同一致，並且共同遭受了共產主義的迫害，但現在中華民國光明在望，教友們「一面修行基督的教義，一面敦篤固有的人倫，所以今日中華教友的信德，不僅是羅馬公教會增加了一股新血，中國文化也增加了一股新血，世界大同，或者即肇基於此。」<sup>77</sup>「我因眼疾，停留在國外多年，這次回國，非常感奮，所以舉行大禮彌撒，祝禱國家中興，祈求天主降福，使中華民國的每一個人民都能得到基督的平安。」<sup>77</sup>

田耕莘訪台的條件之一是不不要太聲張，萬人彌撒是否算聲張？另一條件是不要有政治外交性質，從蔣總統以下政府官員的接見、宴會，算不算有政治外交性質？不過這些條件其實也看行動者的自由心證。除了台北的活動外，田耕莘自九月二十六日起南下新竹、台中、嘉義、高雄等地，他孱弱的身體的確不適這種連續的旅程，十月六日在台中因病住進醫院，他出院後仍繼續行程，往花蓮、台東等地巡視教務，十月三十一日，他還在台北華山天主堂為蔣總統做祝壽大彌撒。十一月八日，他在數千教友和數百名政府要員、社會名流的歡送下，離開了台灣，至少教宗的兩個月期限，

<sup>76</sup> 〈台北總主教公署致外交部函〉，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日，〈外交部檔案——田樞機返台案〉。

<sup>77</sup> 〈教友生活週刊〉，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看內容，有可能是出自羅光手筆。



田耕莘嚴格遵守了。

比較于斌在一九五四年和田耕莘一九五七年訪問台灣的情形，基本的形式與經過是類似的。當然于斌的交遊較田耕莘廣闊的多，活動力也強，因此與政府及社會各界接觸的也多，也更受人重視；但田耕莘與政府首長的接觸也不少，因此其活動的本質並無大不同。于斌反共不遺餘力，田耕莘批評中共也不曾退縮，兩者只有演講精彩度的不同，並無內容上的實質差異。甚至可以說，教宗明令在先，不欲田耕莘在台太過聲張，但中興彌撒的規模空前；不要有政治外交活動，但田耕莘與政府官員接觸頻繁。雖說無大差異，但是于斌在台的活動受到譴責，田耕莘在台的活動，則似乎並未引起太多批評。

離開台北後，田耕莘赴菲律賓，短期停留兩天後即飛往羅馬，他住在聖言會總會院，一則是對長途旅行的緊張稍做休息，二則是為了寫訪台的工作報告。十一月底他住進了聖神會修女辦的醫院，因為他心臟不適的狀況又復發了。看來，他的確是力疾從公。傳信部長畢翁地樞機主教和一九五三年升任樞機主教的剛恆毅都來探望他，並且討論台灣教會的情形，然後庇護十二世接見了他。<sup>78</sup>

一般來說，教宗接見樞機主教是稀鬆平常的，但這次庇護十二世的接見是非同尋常的，因為在此之前，田耕莘是處在留美觀察的階段，至少已經有七年之久，田耕莘未見過庇護十二世。兩人見面時，田耕莘向教宗報告台灣教會的狀況，並陳述在台應恢復輔仁大學。教宗如何答覆不重要，因為更重要的是田耕莘在教宗前報告了「自由中國」的教務，教宗不再視田耕莘為一應退隱反省之

<sup>78</sup> 方若翰神父，〈田耕莘樞機傳〉，頁一一七。

人，田耕莘的身份改變了。<sup>79</sup> 然後田耕莘在一九五八年一月間拜會了教廷各部會<sup>80</sup>，這些拜會當然也是有象徵意義的。

於此同時，于斌在更嚴重的限制下留在美國，他南京教區的神父方豪雪中送炭，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月間前往探訪，方豪形容當時的場景：「小樓一角，寂靜如死，拉余常談，喋喋不休，關心祖國，情見乎辭；其時公心之沈重，精神之苦悶，豈外人所能知乎？……<sup>81</sup>」

### 三、中共建立愛國會

在共產黨控制的中國大陸，對天主教的迫害變得越來越嚴重。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將以往所用「獨立教會」及「革新教會」名稱停用，統一改稱「愛國教會」。並且定出愛國教會的基調：天主教的愛國教會可以承認教宗，但要求教宗也承認這個愛國教會。在此之後逮捕神父、修女，驅逐外籍傳教士的過程繼續進行，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已有七十位教區主教被驅逐出境，三十一個教區已無任何神職人員。<sup>82</sup>

針對這樣的情況，教宗在低調處理中華民國駐教廷公使謝壽康回任事宜時，也對中國教會的情況，在十月七日頒佈致中國教會通諭：

79 〈駐教廷公使館致外交部電〉，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發電，〈外交部檔案——田樞機返台案〉。  
80 同前。

81 方豪，〈于野聲樞機之偉大處〉，〈教友生活週刊〉，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

82 羅漁、吳雁編，〈大陸中國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記〉，頁二十六。

「在最近幾年裡，公教在你們國內，環境並沒有改善，反之，變本加厲，對於聖座和忠於聖座的人，污穢攻擊，不遺餘力，代表我們駐華的宗座公使，乃遭驅逐；並且加增陰謀，企圖陷害樸實無識的人。」

「我們明知你們大都忠於信仰，然而也有人，或出於好心，或迫於畏懼，或惑於邪說，最近也加入了仇恨宗教的人，特別是仇恨耶穌基督所創立的教會的人，所發起的陰險運動，服從了他們的謬理。」

「他們故意造謠說：誰不加入他們三自的傀儡教會，便不是真正的愛國份子。然而究其實，簡單點破他們的陰謀，他們是圖謀在你們國內創一個國家教會，可是這樣的教會，已經不是天主教會，因為已經推翻了天主教的「至公特性」；而天主耶穌所立的教會，則超然立在各民族之上，伸手懷抱著一切的民族。天主教會所收的信友，不限於一個民族，一個人種，乃是以基督的神愛，普愛世界的各種民族，各種人種，使他們因基督的神愛，互相團結，如兄如弟。既是這樣怎麼能有人說教會替一個國家，替一個政權，服務奔走，怎麼能逼迫教會破壞教主所立的統一制度，使各國的教會與羅馬宗座脫離關係？羅馬宗座乃基督耶穌的代權伯鐸，世世相傳，直到世末。凡是基督信友的團體，若一旦跟宗座脫離關係，便像葡萄枝自樹上割下了，再不能開花結果。<sup>83</sup>」

一九五五年三月，教廷宣佈開除南京總教區副主教李維光的教籍，「因為他企圖在共黨中國成立一個國家的教會。<sup>84</sup>」四月十七日，教宗把一九〇〇年在河北殉教的五十二位神父及教友宣佈列入真福品；這件事基本上不具有政治意涵，因為之前必須經過長時間調查及申請的過程，中共當

83 〈庇護第十二頒佈中國教會通諭〉，〈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四〇四。

84 羅漁、吳雁編，〈大陸中國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記〉，頁二十九。

時也並未對此事有任何反應，或因係視其為教會內部事務。

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和中共對抗最久的上海教會，從主教龔品梅開始，遭到大規模的逮捕，一個月之間，先後有四十餘位神父，近四十位修士及上千名教友遭逮捕。從此之後，中共在各地成立愛國會，凡是不願參加愛國會的主教、神父皆遭逮捕。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至八月二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天主教第一屆代表會議」，來自全中國二百四十一位「代表」，通過決議：

「中國天主教必須『實行獨立自主』，由中國神長教友自己來辦，在不違反祖國利益和獨立尊嚴的前提下同梵蒂岡教廷保持純宗教的關係；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服從教宗。但必須徹底割斷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關係，堅決反對梵蒂岡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國內政，侵犯我國主權，破壞我們正義的反帝愛國運動的任何陰謀活動。」

「梵蒂岡教廷一貫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為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侵略政策服務。它一方面承認台灣蔣介石集團，派了被我國政府驅逐出境的帝國主義份子黎培理駐在台灣，繼續進行破壞中國的陰謀活動，另一方面又不斷地對我國各教區發出煽動神長教友對人民政府破壞反帝愛國運動的『通諭』和『命令』，甚至以『叛徒』『裂教』的罪名和『摘神權』『棄絕』等手段來威脅打擊愛國的神長教友，力圖把中國教會作為帝國主義反對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工具。」

「我們對此感到無比憤慨，我們堅決反對梵蒂岡教廷這種反動無理的措施。」<sup>85</sup>

由內容可以看出，進行的過程完全在中國共產黨的操縱之下。先由地方發動，中央順應地方民衆需要，召開中央的會議，做成決議，然後再要求所有地方一體遵行。在這種模式下，一九五八年各地的愛國會紛紛成立，然後分別召開「天主教代表學習會或座談會，進行社會主義學習和傳達去年七月間召開中國的天主教代表會議的決議。在中共的報紙文宣中，大多數的中國天主教徒都「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決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只有「少數隱藏在天主教內的右派份子向共產黨向社會主義作了許多惡毒的進攻。」而這些參加會議的人，「列舉事實，向右派份子的反動言行進行了有力的駁斥，並且廣泛地揭發了梵蒂岡的反動罪行。他們指出梵蒂岡不但在解放前一貫敵視中國人民，利用天主教為美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服務，解放幾年來，梵蒂岡還不斷地破壞中國天主教徒反帝愛國運動，挑撥中國天主教徒與全國人民的團結，干涉我國內政，直到現在，中國天主教的許多教區仍由已被中國人民逐出境的帝國份子霸佔著主教的名義。愛國天主教徒絕對不能容忍梵蒂岡的這些罪行。<sup>86</sup>」

接下來武昌、漢口兩教區愛國會決定自立主教，羅光在教廷得到的訊息是：

「三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傳信部接漢口電報云董光清、袁文華被選為主教，將於復活日舉行祝聖禮，傳聖部當即電發董袁兩人，告以選舉無效，不能祝聖，否則祝聖者與被祝聖者俱將受 Excommunicatus」。

「據云李道南主教拒絕行祝聖禮，乃被共黨拘禁，拘禁一週後始允，故祝聖禮改於卸白衣日舉行，聖

部甚注意此事。……<sup>87</sup>」

漢口董光清、武昌袁文華祝聖為主教的儀式，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三日舉行，然後四月二十日永年王守謙、宣化常守彝、西灣子潘少卿和永平蘭柏露在獻縣由趙振聲主教祝聖。不久之後保定王其威、濟南董文隆、南京李維光、天津李德培、上海張家樹、杭州吳國煥、寧波舒其誰、溫州方志剛被祝聖。四月二十六日，《羅馬觀察報》公佈教廷的聲明，該聲明重申教廷聖職部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頒佈的法令：「一位主教，無論屬於何種禮儀或地位，祝聖一位未經聖座提名或核准者為主教，祝聖者及被祝聖者均受到極端保留於聖座的自科開除教籍之罰。<sup>88</sup>」開除教籍已是教宗的最嚴厲處罰，不過這並未對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自選自聖主教產生嚇阻作用。

六月二十九日庇護十二世發表了第三次的致中國教會通諭，他直接點名抨擊了所謂的愛國會，指其表面上懷有崇高的目標，但實際上是詆毀教宗及其代表。愛國會的領導者強迫教友加入，又強迫會員按其指示譴責教宗及其代表。教宗表示，教會向來教導其信徒愛國，但不贊成虛假的愛國主義，因為服從天主應超過服從人。

庇護十二世強調教律，「各地的主教應由教宗自由選任，因此愛國會的主教不享有履行職務之法權，即使領受了有效的神品，但仍屬不合法。這些不合法的祝聖者與被祝聖者，均受到完全保留於聖座的自科開除教籍的處罰。至於愛國會人士辯稱，填補主教空缺是為了照顧教友，庇護十二世反駁說，主

<sup>87</sup>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八年五月二日。

<sup>88</sup> 羅漁、吳雁編，〈大陸中國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記〉，頁五十三。

教空缺是政府的嚴厲措施造成的，而政府則用自選的主教取代了這些被驅逐或監禁的合法主教。認可自選主教的是政府，而驅逐合法主教的也是政府，這種作法，等於是讓無神論者將自己的人選安插在教會內。<sup>89</sup>」

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教宗庇護十二世駕崩，這位自兼國務卿的教宗，必須為教廷這十九年的外交政策負責。在二次大戰結束未久，即有輿論抨擊他在戰時偏袒德義，又在德國屠殺猶太人的慘劇中默不作聲，未發揮教廷正義本色。其實這種說法太苛刻，應該說是戰時的教廷無力與德義抗爭，庇護十二世努力在交戰各國中維持中立，走在鋼索上的教廷外交，稍一不慎即會遭致批評。庇護十二世熟諳國際外交，明瞭世界局勢，最多只能說他在外交上略顯世故，不敢違背世界外交潮流，但還不至於到背離正義及人道原則的地步。

在庇護十二世的外交中，有兩個原則是非常清楚的。第一、善牧不離羊群。第二、不和共產主義妥協。他自己以身作則，在德軍控制羅馬期間，堅守羅馬主教崗位；而他也以此原則要求包括田耕莘及于斌在內的各地主教。在同時堅守這兩個原則的情況下，他在中國的代表黎培理公使，可說是唯一一位未在國共內戰最混亂時，撤離南京的使節。不過不能和中共妥協的立場，其實也早已注定被逐出中國的命運。在維護中國教會的前提下，他不贊成和遷到台灣中華民國政府有太密切接觸，禁止田耕莘和于斌赴台，也導致中華民國外交部對他一定程度的不諒解。不過在此同時，面對共產政權在各地對天主教教會的迫害，他反共的言論也從未停止，對中共也無一點退讓。

89 〈教宗庇護第十二第三次頒發致中國教會通諭〉，〈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四〇六、四〇七。

要瞭解庇護十二世時期的中梵外交，必須把中國教會的生存與發展，善牧不離羊群、反對共產主義這些原則一併考慮進去；還不能忘記教廷外交基本上應符合國際趨勢。而這些考量不論是中華民國政府，或是海峽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不一定能接受的，而這就是造成某些外交齟齬的背後原因。

在庇護十二世去世後八天，教廷中最支持中華民國的剛恆毅樞機也去世了。他是教宗政策的支持者，但他對於中國教會有更深刻的認識，對田耕莘及于斌的處境有足夠的同情及理解。他們的逝去，標誌著一個複雜的、偉大的外交時代從此過去了。



## 第六章 若望二十三世的對華外交

(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三年)

### 第一節 出乎意料的當選談話

田耕莘在庇護十二世去世時，正在醫院中。八月十三日他在波昂遭遇嚴重的車禍，右臂、肩胛骨嚴重受創。他虛弱的身體狀況，使他復原特別緩慢，經常必須忍受著身體的疼痛。他不認為以他的狀況，可以出席選舉教宗的大會。但他不僅代表他個人而已，他是亞洲及中國的第一位樞機主教，他也是處境艱困的中華民國在台灣教會的首席主教，於是各方誠懇催促他去梵蒂岡參加選舉的函件不斷，其中影響他最大的是台灣神職界，以及聖言會總會長的意見，他們都強調他應維護傳教區第一樞機主教的權利，前往參加選舉教宗大典。於是他開始從病床上下來，練習走路，綁上石膏綑帶；他最後決定無論如何要去參加這場選舉教宗的大典。

十月二十三日他搭乘荷蘭皇家航空的飛機出發，航空公司特別為他安排了一個臥鋪，以減少體力消耗。下午兩點五分飛機抵達羅馬，除了教廷的接待人員外，中華民國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聖言會副總會長及于斌總主教都到飛機場迎接。他住進聖神會修女的醫院修養，十月二十五日與醫生及

充任他秘書的王伯尼神父，一起住進梵蒂岡。十月二十八日，威尼斯總主教龍加里（Angelo Giuseppe Roncalli）樞機當選教宗，田耕莘坐著輪椅被送往西斯定（Sixtina）小堂，向新教宗祝賀。教宗看見坐在輪椅上的田耕莘，他走到這位遠東第一樞機的面前，向田耕莘問候。教宗這個特別的舉動使所有樞機都為之感動，這其實也象徵了新教宗對中國問題有了新的思維。<sup>1</sup>

若望二十三世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當選，有些出乎眾人的預料之外；他年歲已高，以往在教廷圈中影響力並不顯著，因此一般懂得教廷外交的人，視若望二十三世為過渡的教宗。不過評論家也有看走眼的時候，這位年高德劭的教宗，竟然宣佈要召開大公會議，邀請全世界各地的主教們共商解決二十世紀天主教面對的問題。這位勇敢的教宗，在中梵關係上，同樣出人意外的，採取比其前任庇護十二世更強硬的態度。

他上任後決定任命新的樞機主教，在宣佈新樞機名單的御前會議上，他特別提到中國教會：

「一如你們所知，長久以來，中國天主教教友都已處於非常困難的境況中，傳教士及福音的和平使者——其中很多是總主教和主教，他們均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控定罪，被投於獄中，最後還被放逐。

即使是那些中國出生的主教，他們傳教的心火熾烈，心神堅定，仍免不了受困囿之苦；還有不少其他的教區主教亦被逐出他們的教區，不然的話，也就在執行他們的牧職工作方面受到阻撓。

那些合法被派往接替被逐者的神職人員，他們的處境跟前者全無分別，只因他們均以良知而拒絕服從命令。

<sup>1</sup> 方若翰神父，《田耕莘樞機傳》，頁一一八—一二〇。

由於司鐸們經常流動，加上煩惱之事不絕而來，也難怪他們的羊群在種種誘惑、威脅、肉體或精神的痛苦之下，就很容易被迫放棄信仰，另為自己訂定天主教以外的教規，並且切斷與聖伯多祿教廷的堅固而神聖的聯繫，不再有服從和基督之愛。

不幸的是，有不少人害怕地上人的命令甚至於害怕天主的至聖審判，他們向迫害者的指令妥協，甚至連褻瀆的主教祝聖亦加以接受。因此，顯然地，這樣祝聖的主教，根本就沒有真正職權，因為沒有「宗座的授權書」，為了這種完全不合法的行為，他們就篡奪了看管基督羊群的牧職，況且還在羊群間帶來了恐懼、混亂和惡表。<sup>2</sup>

對於這樣的情況，他嚴厲的加以指責：

「我們不僅是盼望而已，而且更進一步，我們訓誡與鼓勵的聲音，也應該擴及於那些表現出軟弱、搖擺不定及受驚的人，明確地和他們說，那些侵犯神聖之父權利及位置的人，不幸地開闢了裂教的路。」

「當我們說出『裂教』這一同時，我們的嘴唇燃燒，我們的心受傷，我以教宗至高權威所必須承擔的，承受這加在我們肩上的沈重責任；同時我們藉由被天父所充滿的無限大愛，得以用正直和最多的慈愛，擁抱人類全體大家庭。我們只能懇求全能的天主，因著他的憐憫，他能夠改變這樣一件現在正威脅中國天主教團體的慘事。<sup>3</sup>」

<sup>2</sup>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御前會議提及中國問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集編〉，頁四〇八～四〇九。

<sup>3</sup> Pope John XXIII, *To a Secret Consistory*, 葉辛真翻譯,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the 60 Years of Sino-Vat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p. 65.

基本上若望二十三世的談話承續了庇護十二世對中共的警告，凡是侵犯了教宗任命主教權利之人，無論是祝聖者或被祝聖者，皆自動被科以逐出教會的處罰。在若望二十三世看來，這種自行任命主教的行為，即是裂教。不過，庇護十二世並未用「裂教」一詞，這是非常嚴重的說法，因為這表示不承認中國的愛國教會是天主教普世教會的一員，而於此同時，中國天主教愛國會還承認教宗是天主教的最高領袖。很顯然若望二十三世用了比庇護十二世更嚴厲的態度，換個角度說，外交上的彈性就更小了。

觀察這個時期的教廷人事，國務院長為代理的達迪尼，他已代理了好長一陣子，他的立場素來較顧慮中國教會的情形，新教宗的突然發言，不像是來自於達迪尼的建議。傳信部長是代理的雅靜安（Gregorio Pietro Agagianian），同樣是庇護十二世時期安排的人事，似乎也不至於在教宗新任之際，有如此激進的建議。看來這番裂教的談話，是若望二十三世自己的決定。

在若望二十三世即位的時刻，也是美蘇冷戰的高峰，西方世界反共產主義的氣氛持續熱烈；若望二十三世基於反共產的理念，以及中共對天主教愈益加廣加深的迫害，和中共幾乎無法溝通，在這情況下，他接受了教廷中同情「自由中國」者的意見，採取了和其前任完全不同對待中華民國的態度。

## 第二節 提昇與中華民國外交層級

若望二十三世在發表御前談話時，或許即已在策劃與中華民國改善關係，至遲在十二月，代理

傳信部長雅靜安已有訪問亞洲計畫，其中包括台灣在內。羅光一九五九年一月寫給于斌的信中透露：「傳信部代理部長已決定赴台灣，台灣郭總主教已來電歡迎，然代理部長云，此次赴台係以私人身份赴台視察，故希望外間之應酬不多，且留台之時間亦短，宜聚精會神以觀教務；至於在台灣之節目，則由黎公使與外交部及郭總主教商議決定。代理部長遊台後，將赴日本朝鮮視察。」<sup>4</sup>

雖說是私人訪問，但行程之安排，一定程度上與外交部商議，其實就不算是私人訪問了。在雅靜安訪台之前四天，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日，教廷公佈了更令人吃驚的消息，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將升任駐愛爾蘭大使。

黎培理一九四六年來華，已任教廷駐華公使十二年，時間已相當長，因此調整職務並不奇怪。但是外交圈中均曉得他為顧慮中國教會安危，不欲教廷與中華民國關係太過緊密的立場；教廷要改善與中華民國關係，他是第一塊要搬開的石頭。不過，從另一方面看，黎培理在這十二年中，忠心耿耿執行教宗的中國政策，勇敢的在南京堅守崗位不撤退，被中共軟禁數月然後驅逐出境；所以他不但沒有犯錯，而且還應嘉獎他的付出；他離開中華民國的方式，應該是光榮的升任更榮耀的職務。這或許是發表他擔任愛爾蘭大使的原因。

雅靜安樞機主教在二月二十四日由越南抵台，除了其兩名隨員外，同行的有于斌總主教、雷震遠神父等人。他們都是在越南參加聖母大會後一起來台。在機場歡迎的是外交部長黃少谷，雅靜安和記者表示：「承天主的恩寵，他能來到自由中國，真是感到無限的榮幸和愉快。他此次來到自由

4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五日。

中國，除了巡視教務以外，並將為自由中國祈禱天主降福，賜給平安，並賜智慧與力量俾能為全人類的和平而奮鬥。他並且說，他並要為刻正在大陸受著共匪奴役的中國人民祈禱，求天主賜給他們平安。」這番看似冠冕堂皇的話中，其實隱含著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更肯定的支持。

同一天晚上七時半由副總統陳誠設宴，雅靜安樞機在致詞時說得更清楚「他此次來華，不僅是在視察教務，而且是來看看自由中國的一切進步情形。……前任教宗庇護十二世及現在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都是特別關懷中國的。」他又說：中華民國在英明的領袖領導之下，一定可以完成他們所期望的光明的事業。他在訪華後回到教廷將以在中國所看到的各種進步實況，向教宗報告，並告訴一般教友，他認為這次來華，並不自今日始，他從小就有許多的中國同學和同僚。……」

在雅靜安「私人訪問」以及宣佈黎培理調升後，教廷與中華民國間有關提昇外交層級的磋商大概在三月份以後進行，然後發佈了中華民國駐教廷使館升格的消息。中華民國外交部發佈消息稱：「中華民國政府及教廷政府為增進彼此睦誼與合作起見，經雙方同意將中華民國政府駐教廷公使館自民國四十八年六月十二日起升格為大使館。我首任駐教廷大使一職，業經行政院決定以現任駐教廷公使謝壽康充任，正呈請總統任命中。」<sup>6</sup>

這個新聞稿其實另有玄機，明眼人可以看出，言外之意是，教廷駐華使館仍然維持公使層級。雖然正式的文件中看不出端倪，但在國與國之間講究對等的原則下，既然教廷同意中華民國使館升

<sup>5</sup> 《教友生活週刊》，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sup>6</sup> 《外交部歐洲司參存新聞稿》，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八〇。

格，他們也一定期望教廷駐華使館升格為大使館，沒有升格成功，阻力自然不是來自教廷，而是中華民國政府。從外交部日後的說明中，可以隱約看出，雙方共同升格的障礙，來自於教廷大使的特殊地位。在一份一九六六年的意見中，外交部官員分析：「教廷駐外使節分教廷大使（Nuncio Apostolic）與教廷公使（Internuncio Apostolic），教廷大使派駐於天主教為國教之國家，為外交團之當然領袖大使，教廷公使則派駐於非天主教國家。近年來各國皆趨於互派大使，公使館已日益減少，教廷為適應趨勢，於一九六五年成立「同大使」（Prononce）或「代理大使」制，其地位與教廷大使相當，到任後不要求作當然領袖大使，以之派駐於非天主教國家。……」<sup>7</sup>

在一九五九年中華民國的外交形勢尚稱穩固，除了英國外，非共產的重要歐美國家皆與中華民國保持正式外交關係，在這情況下，無實質利害關係的教廷外交是否升格，就只是一個次要的問題。可以推測，外交部內部的意見一定是教廷外交非第一優先，不需要讓教廷使節升格，然後自然成為首任大使，位置在其他重要大國之前；因此婉拒了教廷駐華使節升格。不過這等原因其實也只是表面，若教廷與中華民國關係一向友好，外交部當亦願說服其他國家接受此一外交慣例；但是在庇護十二世時期，教廷各種對中華民國政府不算友好的行為，外交部相關官員點滴在心，在此關鍵時刻，當然也不會有積極協助的意願。

基本上教廷對中華民國可能反應，事前也應有一定程度理解，於是在接受單方升格條件下，教廷派了與中國素有淵源的高理耀為第二任駐華公使。當時高理耀任教宗駐越南宗座代表

<sup>7</sup> 〈有關中梵雙方公使館升格外交部內意見〉，一九六六年底，〈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八六。

署代理人，「該代理人曾任教廷駐華公使館秘書三年，對我同情，及共匪暴政甚為瞭解，似可予以同意。」<sup>8</sup>

因為升任大使，謝壽康必須再向教宗呈遞國書。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謝壽康向外交部報告：「今晨教廷派來御前袍劍隨從三人，銅錘開道官一人，接任教皇行宮呈遞國書，儀式極其隆重。在會議殿正式接受國書後，教皇請至書房留談十五分鐘，對我國反共進展，甚為關懷，對總統英明領導，尤其佩仰。」<sup>9</sup>這個大使頭銜，為盡忠職守，屢次受命於危難中的謝壽康而言，是一應得的榮耀。

教廷駐華公使高理耀也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抵達台北。他對記者說：「我十分高興回到中國來，我從前在中國時，就為中國人民優良傳統道德而深為感動，我曾一再的為中國人民祈禱。這次奉派來華，我將盡力促進教廷和中國的外交關係。」<sup>10</sup>高理耀的談話和代理傳信部長的雅靜安有一共通點，他們都稱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為中國；在講究詞彙的外交上，這絕非巧合或誤用，這可代表若望二十三世的中國政策，即以台灣為自由中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為目前代表中國的政府。

<sup>8</sup> 〈駐教廷大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八〇。

<sup>9</sup> 〈駐教廷大使謝壽康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八一。

<sup>10</sup> 〈教友生活週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日。



### 第三節 于斌解禁——籌備輔仁大學

在庇護十二世去世後的第三天，于斌在十月九日赴羅馬奔喪，他不過是一流亡的主教，其實沒有非去羅馬的義務。第一種可能是他在庇護十二世去世前已接到來自羅馬的召叫，召他的教長應是代理傳信部長雅靜安樞機。第二種可能是他希望庇護十二世去世後，立即和教廷有所解釋，然後在羅馬晉見了雅靜安。無論如何，在十月九日至十一月四日間，于斌和雅靜安見了面，雅靜安要求于斌對中國傳教問題提出意見，田耕莘也被要求提供意見，至遲在十二月，于斌的意見已送到傳信部，羅光告訴于斌：「總主教送與雅樞機之備忘錄，傳信部已開會研究，俟雅樞機從東方回羅馬後，將有少許之改革。」<sup>11</sup>「自奉露德來示，即呈送田樞機之備忘錄，但據傳信部次長稱，此項備忘錄尚未批到該部，或係尚在國務院也。」<sup>12</sup>有關於斌及田耕莘備忘錄內容無從得知，但傳信部願開會研討于斌之意見，就已經代表此時教廷對於斌已有不同評價。

話雖如此，教廷中反對於斌的勢力仍有影響力。在上述同一封信中羅光建議于斌：「總主教計畫明春訪台灣，如能先赴台灣，再轉日本、韓國、越南各處，或較易避免聖座國務院之異議，因國務卿之態度，想仍如前也。」<sup>12</sup>當雅靜安決定亞洲行程包括台灣後，于斌赴台行程應如何安排，

<sup>11</sup>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sup>12</sup> 同前，當時孟棟義已外放米蘭，達迪尼任國務卿。

羅光仍要于斌小心從事。當時于斌已被邀往越南參加聖母大會，羅光告訴于斌：「總主教既被邀赴越南，當然以陪代理部長赴台為美，此事俟總主教與雅樞機見面後，當面告訴之。如目前通知之，恐彼往詢國務卿，或可生枝節也。」這封信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寄出，羅光所謂與雅樞機見面時，應即為在越南參加聖母大會時。

總之，于斌與雅靜安在參加過越南聖母大會後，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同機抵台，至少一九五七年以來的禁令，在于斌往越南和台灣後已被打破。雅靜安一方面執行若望二十三世的傳信政策，另一方面他自己說他具中國背景，然後在和于斌更多接觸的情形下，也增加了對於斌的理解。於是他決定給于斌辯解的機會。大概是在一九五九年六月間，于斌赴羅馬請求協助在台灣成立天主教大學，雅靜安給他看了一大疊傳信部的檔案，裡面全是控告他的信件，可以想見，大部分內容必是說他太過熱心政治。雅靜安命于斌對這些指控提出說明，于斌遵命行事，寫了一篇報告：

「……這些年來，我的工作可歸納為三類：救災、護教、反共。

一、救災

中日戰爭期間（一九三七—一九四五），為了表明天主教教友是愛國的，我深感有責任救國；我

做的工作：

1. 喚起國際良心（這都獲得了教宗的許可）
2. 救濟災民
3. 勞軍
4. 救護傷殘

## 5. 收容孤兒

### 二、護教

半個世紀以來，國民政府沒有難為教會，但地方政府常有侵犯教會權益的情況，我獲得消息，立刻挺身前去：

1. 抗戰期間，許多德義教士得集中於教堂。
2. 若干教士，因我才免被槍決，如老河口事件等。
3. 戰後，若干教士將受到不利的審判，如吉林的宗座代牧等，因我的努力，使他榮退，教產得免沒收。

4. 許多教會學校得以立案開辦，並請我為董事長。

5. 制憲國民大會時，我運用各方關係，通過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條文。並以行憲紀念日的名義，使聖誕節全國放假。

6. 國民政府遷台後，使政府歡迎黎培理公使來台，謝壽康大使留任駐教廷，神父們能去軍中做演講。

### 三、反共

中共靠宣傳他的無神唯物主義，滲透了知識份子，達成他們的目標。針對此點，我

1. 創辦公教日報及電台，成立益世報網。

2. 在紐約設立中美聯誼會聯絡中美學人，成立留美學生服務處，予以正確輔導。

3. 組織自由太平洋協會，聯合各該地區的人士反共。

我不再繼續，免得我自誇。面對控告我做政治活動，我保持緘默。我願抄錄一段我的主保聖保祿的話：「我慚愧地說：在這方面好像我們太軟弱了。其實，有人在什麼事上敢誇耀，我狂妄地說我也

敢……他們是基督的僕役，我瘋狂地說，我更是；論勞碌，我更多……我成了狂妄的人，那是你們逼我的。本來我該受你們的褒揚，因為我縱然不算什麼，卻一點也不在那些超級宗徒以下。」如果中國的傳教士誇耀自己是基督的使徒，我更有理由是基督的使徒，僅僅是我最後一次訪問台灣期間，作了一百六十次以上的演講，許多地方非一般神父所能去的，向所有的人我宣講福音的精神。你樞機本人也去過台灣，看到政府首長如何優待天主教會。我可以說，對這一切，我的貢獻不少。（實在我不該說的）<sup>13</sup>」

在于斌提出報告，然後陳述應在台灣開辦天主教大學的意見後，雅靜安樞機出乎意料的反應熱烈，並命于斌先往美國聯絡。雅靜安如此支持在台灣開辦天主教大學，理由無他，中共既在中國沒收輔仁大學、震旦大學，那在自由中國，自當建立起高等學府，以成為一個天主教文化的中心，好在上與中共對抗。因此，雖然于斌之後在美國遊說各修會的成绩不算理想，募款亦僅波士頓總主教庫興（Richard James Cushing）答應了十萬美元，但當于斌回羅馬時，雅靜安還是告訴于斌，輔仁大學在台復校是非辦不可，而校長就是于斌。<sup>14</sup>

本文不贅述輔仁大學在台復校的過程，只是必須說明藉由輔仁大學校長的位置，于斌有了到台灣發展的立足之地。從此之後，于斌雖無任何台灣的教區由其擔任主教，但他可以輔仁大學校長的身份，長期的在台灣停駐。過去因擔心刺激中共而不准于斌赴台的政策，在于斌向雅靜安提出報

<sup>13</sup> 龔士榮，〈于故樞機逝世二十週年追思彌撒講道詞〉，〈龔士榮神父訪問紀錄〉（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出版），頁三〇～三十二。

<sup>14</sup>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頁二一五～二一九。

告，教宗給予輔仁大學校長名位後，可說完全改變。

#### 第四節 田耕莘任台北署理總主教

在教廷這一連串改善與中華民國關係，以及加強台灣教會體質的行動中，中國唯一的樞機主教田耕莘的行止，是最具象徵性的。田耕莘應該要回台灣，但安排給他什麼位置，是一個傷腦筋的問題。在台灣新成立的教區中，嘉義教區主教牛會卿是他的山東同鄉，受聖言會培養，嘉義教區的許多傳教事業都與聖言會有關，按理田耕莘到嘉義最受歡迎；但台灣教省的中樞是台北，台北是總主教區，也是中華民國目前的首都，中國教會領袖的最適當位置應該在此，但這裡已經有一位總主教郭若石，他是主徒會士，主徒會也擁有台北總教區的管理權。

雅靜安自台北回到羅馬後，即著手安排此事。他的原則很清楚，田耕莘應該要在台北工作。另一方面，郭若石管理下的台北總教區並不平靜，黎培理對郭若石的財務管理不滿意；郭若石與非主徒會的堂區神父相處也不一定融洽，其中永和堂的張體謙神父在一九五七年還到羅馬狀告郭若石，羅光說：「聖部頗為所動，現已函黎公使詢問詳情。」<sup>15</sup>在經過一些調查後，郭若石在一九五九年秋年決定辭去台北總主教的職務；傳信部並未安排郭若石出路，可以看作是傳信部認為郭若石任台北總主教時處置確有失當。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若望二十三世撤除了主徒會對台北總教區的管

<sup>15</sup>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及張體謙訪談記錄。

理權，將其交付給一般教區神職人員；十二月十五日教宗接受了郭若石的辭呈；這時郭若石總主教不過五十三歲，十二月二十日，田耕莘被正式任命為台北署理總主教。<sup>16</sup> 加上「署理」二字的原因是因為教廷仍認定田耕莘是北平總主教，因此他是以北平總主教的身份，代為管理台北總教區。這時田耕莘已六十九歲，一目已盲，一臂骨折，心臟宿疾一直纏身。

話雖如此，這位半殘廢的樞機主教，對於接任台北總主教卻有一顆雀躍的心。他在離開美國前，鼓勵在美的國籍神職來台，他的談話充分反應了他的心情。他說：

「我一直期待再有許可做福傳工作的機會。現在羅馬要派我去的地方，正是我所嚮往的地方。如果我不去，將來可能沒有機會再去了，因為我已經老了，我希望能死在中國。但在死以前，我還想做點事。在美國沒有真正適合我做的工作。羅馬方面，希望我能說動你們回到自由中國。你們還年輕，而且具有工作能力。假使我們能同心協力，各盡所能，一定能完成一番事業。」

我們必須做好犧牲奉獻的準備，共同承擔民族的命運，為它奉獻出我們的生命，以求為「天主的國」爭取更多的信徒。儘管剛開始時，我們無法立即建造一些大教堂及舒適的教區住宅，但一個好的傳教士不會在乎這些，我們必須能放棄汽車及美食。沒有汽車，就騎腳踏車，假使連腳踏車也沒有，那就走路吧！與別人共住一間簡樸的房子，應不算過分的苛求。一位傳教士唯有能抗拒一切邪惡的本質，不畏艱難，才能追隨基督，以祂為榜樣。信徒們及偉大的傳教士便這樣做了。在台灣的生活或許會艱苦些，但這遠比過著享樂的日子更有意義。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傳福音。一個意圖逃避這個任務的

16 方若翰神父，〈田耕莘樞機傳〉，頁一二三。郭若石生於一九〇六年，死於一九九五年。

傳教士，就是不忠於他的天職。我先到羅馬，待一切就緒後，我會召喚你們。」<sup>17</sup>

郭若石心中雖懷落寞，但他非常慷慨大方的向台北的全體司鐸告別：「凡曾在吾主葡萄園內，以祈禱、以工作，以任何效力方式，與若石有同工之雅者，謹在此同申謝悃。在過去歲月中，若石偶不經心，容或有獲戾之處，干祈諒宥，若石固以人人為友也。今後若石身或遠適，心仍常在諸公左右，異日台北教區教務發揚光大，神職界與教友工作順利，若石拭目以待，樂觀厥成。」<sup>18</sup>

田耕莘在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二日晉見教宗，「教宗於其私人接見室中，與田樞機暢談近二十分鐘，對有關台北及台灣教務種種機宜，指示頗詳。……然後樞機主教代表中國教會向教宗呈獻一個珍貴的禮物；即一象牙雕刻之聖母抱耶穌像。……」<sup>19</sup>他在離開羅馬前向國籍神職人員發表談話：「此次聖座要我工作，我很高興，我願意工作，願意死在任所，工作總比流亡更好。……等我到台北後，要有許多國籍神父回國工作，可能在生活、居處方面許多不便，但是我們要用克苦精神去克服他。」<sup>20</sup>

三月一日晚七時三十分田耕莘抵達台北，在松山機場迎接他的人數，和他一九五七年短期赴台參觀時不相上下。晚間八時四十分立即在台北華山堂舉行就職典禮。這位年邁的樞機或許已感覺他的時日不多，在他致台北總教區司鐸及教友的公開信中說：「……甘願將此殘年病軀，奉獻給仁慈

<sup>17</sup> 同前，頁一二四。

<sup>18</sup> 《教友生活週刊》，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sup>19</sup> 同前，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sup>20</sup> 同前，一九六〇年三月六日。

天主以及祖國同胞；將我剩餘的生命，為天主為同胞，犧牲在這裡。<sup>21</sup>」現在這位中國教會的領袖，歷經十一年的流亡後，終於來到了他認定的中國領土，擔任首都的總主教。

在此同時，中共對忠於教廷的中國神職繼續迫害，已被關押四年餘的上海主教龔品梅被判處無期徒刑，金魯賢等十二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五至二十年。拒絕被驅逐出境的華理柱主教也被以「美帝間諜」罪處二十年徒刑。<sup>22</sup>

## 第五節 羅光及杜寶晉回台

在田耕莘的建議下，鼓勵歐美地區的中國神職人員，回到台灣服務，成了若望二十三世的傳教政策。在這政策影響下，羅光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台南教區主教，杜寶晉被任命為新成立的新竹教區主教。台南教區由高雄監牧區分出，新竹教區由台北總教區分出；同日，高雄監牧區也升為高雄教區，由鄭天祥升任主教。羅光至此時已任使館教務顧問十八年，而杜寶晉任傳信大學秘書長亦有十餘年，兩人是公認在羅馬中國神職中的領袖。

羅光在這十八年中可謂是中梵外交中相當具影響力的人物，他的第一個「靠山」就是傳信部秘書長剛恆毅。他自己回憶說：

<sup>21</sup> 同前。

<sup>22</sup> 同前，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傳信部那時就像我們的家門，時常去，上下人都熟識。去見剛公不用先約時間，普通在上午辦公的時間內，來客排隊，先到先見。剛公和我講話很簡單，有問有答，每事必有答案，絕不拖延。剛公性情直爽，該講的話就講，不轉彎不生氣。……教廷各機構早上八點到下午兩點辦公，下午休息。我下午到剛公住處，他住在傳信部大廈的一戶房間，下午他常坐在躺椅上讀書或寫書。……」

剛恆毅在一九四九年曾有意調羅光進傳信部，剛恆毅一九五三年升任樞機後，曾不具名的將此事告訴羅光。當時羅光「以部內已無一同情中國者，乃央請剛公推薦杜蒙席，俾能由大學調入部內。」剛恆毅回答他：「事不在彼手，如有彼作主必然為之。」繼而嘆曰：「汝知此間只要義大利人羅馬人，余曾推薦一中國人至教廷供職，不蒙採納。」<sup>23</sup>想羅光應已猜到，說的人就是他。

教廷常務副國務卿孟棣義證實了這件事，在羅光的回憶中他說：「一次我見教廷副國務卿孟棣義，孟副國務卿對我說：『傳信部次長剛恆毅總主教向他建議，調我到教廷國務院服務，但國務院體制，來服務者須從低級開始，你資格已經高，不適宜這麼辦。』……」

羅光在教廷的第二個支柱就是孟棣義。羅光在念法學院時，孟棣義教羅光「教廷外交史」課程，因此兩人有師生之誼，在孟棣義擔任副國務卿後，就成了羅光能直接交涉的關鍵人物。羅光說：

「常務副國務卿為教廷最忙的主管。但孟棣義副國務卿仍然規定每星期六上午自十點到二點，接

23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見駐教廷外交團團員，吳經熊公使長於英文，也會法文，但不習慣講；孟副卿正相反，長於法文，也會英文，但不習慣講。吳公使便要我代替他去見孟副國務卿。那時中國正是多事之秋，吳公使要我每星期六都去，按教廷外交團習慣法，大使在公使以先，公使在代辦以先，我算是代吳公使去見，所以在大使和公使以後。每次都等到下午快二點時才能見。每次見時，孟副卿常微笑地握手說：「請看，這是中國。」坐下來，他靜聽我講話。有時，他真疲倦了，閉著眼，但須答覆我時，馬上睜眼答覆。孟副國務卿性情和剛恆毅樞機不同，他為人很謹小慎微，不會亂說一句話，也不多說一句話，說話很講理。我所講的事可以辦，他就答說盡力去做，若不能辦，就不開口，轉變話頭。我就知道所要求的不能做。孟副卿從不直接說不，多不出言傷人。我代替吳公使又代替朱英代辦六年的時間，幾乎每星期六都見孟副卿。謝壽康公使後來升格為大使，則常自己去見副卿，兩人都長於法文。<sup>24</sup>

一九五三年剛恆毅升任樞機，離開傳信部，羅光的一個支柱失去。一九五四年，孟棣義外調為米蘭總主教，教宗意外的並未給他樞機主教的頭銜，羅光在國務院中的支柱也失去了。若望二十三世一九五八年即位後，首批任命的樞機主教，即將孟棣義列為第一名，似乎隱然是為下一位的教宗做準備。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聖伯多祿大殿，親自為羅光、杜寶晉及鄭天祥主教祝聖，這是田耕莘與謝壽康分頭建議的結果。九月五日，羅、杜二人聯袂搭機抵台，分赴台南、新竹行就職大典。<sup>25</sup> 教廷在若望二十三世時期，建設台灣教會的工作，重視與中華民國政府關

<sup>24</sup> 羅光，〈生活自述〉增訂版，頁二九〇。

<sup>25</sup> 〈教友生活週刊〉，一九六一年九月七日。

係的表現，在此時到達了最高峰。

## 第六節 台灣教會神職對若望二十三世中國「裂教」的意見

若望二十三世其實並不像其前任庇護十二世，對共產黨完全不留情面。他在義大利迅速獲得民衆愛戴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其親民作風，另一方面是因為他保持了對左派開放的態度。這位願意在許多方面鬆綁，提出各種可能性的教宗，卻在中國政策上延續了庇護十二世的作法，甚至更強硬，感覺起來，似乎頗有矛盾之處。在缺乏文獻足供探討的情況下，只能說是若望二十三世缺乏對中國事務的理解；而這些誤解來自於一件件中國教會情勢惡化的報導，遂使若望二十三世的解讀與瞭解中國教會者之間的看法，產生了不小的差異。

「自由中國」的神職人員，對中國教會的慘況，比一般教會人士，更多了一分同情。早在一九五五年，庇護十二世的時代，田耕莘即曾致函在香港編輯的《傳教學誌》(Mission Bulletin)，抗議他們對北平教區由他委派的代表李君武神父所做的嚴厲批評。他認為應該替這位主教代表想一想，在那個禁止與外國接觸的情況，北平總教區有數百名的神父、修女、修士、傳教員、教師都需要照顧，要面對中共政府不斷的苛求，還有內部保守派和激進派的衝突。田耕莘認為「不該指責或誹謗失足犯錯的人，而該讓天主寬仁的愛來作裁決。<sup>26</sup>」

<sup>26</sup> 方若翰神父，〈田耕莘樞機傳〉，頁一〇八。

這種「同情的理解」，可說是海外中國神職觀察中國教會心情的寫照，他們中大部分人一方面支持教廷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改善關係，認同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政府；但另一方面他們對中國教會所遇到的問題也充滿了同情，因為他們很容易可以設身處地去設想；如果是我，我有足夠的能力、勇氣、毅力、信心去面對這些棘手的問題嗎？相信許多人的答案都不肯定。

因此當若望二十三世首次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以裂教來稱呼中國教會內一連串由政府發動的對抗教廷的行動時，羅光的觀感是：「……在教宗公函中，第一次對於中國大陸用「裂教」一詞，使吾人心中非常沈痛。」<sup>27</sup>而這應該也是許多中國神職及曾在中國的傳教士共同的觀感。

「裂教」這個詞不斷或明或暗的出現在若望二十三世的談話或文告中，一九五九年一月，若望二十三世發表為緘默教會祈禱文，指出特別需要為中國祈禱：「……主，祢曉得威脅信友靈魂的陷阱；祢知道有言論中傷那些熱切傳播福音真道，推廣不屬於此世神國的神長牧者。有人不斷設法撕裂祢的淨配——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羅馬教會的無縫長袍，欲使地方教會及其聖統，與唯一的真理、權威及救恩的中心——伯多祿的聖座分離。……」五月十四日，教宗在聖神降臨節斥責中共企圖製造裂教。五月十七日，若望二十三世再次提到中國教會：「……中國教會的每下愈況，我們的神子要被迫服從假的牧者，教友亦被迫放棄對基督在世代表的忠貞，而那原是靈魂托庇之所的教會，已一變而為危機暗伏的地方。」<sup>28</sup>「教宗每一次的談話，都使中國神職心中大石的

<sup>27</sup>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sup>28</sup> 羅漁、吳雁編，〈大陸中國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記〉，頁五十七、五十八。

份量加重一分。

若望二十三世的偉業，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開幕，出席教長二千八百五十三位，代表中國的主教有五十七位，其中國籍主教十位，其他為自大陸被逐出的外籍主教。在這強調合一的大公會會議中，十一月二十六日，五十九位中國籍和在大陸上傳教的外籍主教署名向教宗建議，對大陸天主教會不要採用「裂教」一詞。<sup>29</sup>他們的理由是，在教義上，中國大陸天主教會並未採用任何未被羅馬教會接受的教理；也未召開主教會議，宣佈脫離羅馬天主教；他們還是承認教宗為天主教最高領袖，因此不能算是裂教。若望二十三世接受了這個來自中國主教們，包括外籍傳教士和中國神職的強烈建議，允諾以後在談及中國教會時，不再採用「裂教」一詞。他應該也有體會，真正問題的焦點並不在裂教定義的爭論，而是中國大陸教會的苦悶與焦慮。

沒有一位中國大陸教會的主教出席梵二大公會議，不管是否裂教，所謂的中國天主教的確被隔離了；姑且不論被迫學習的馬列學說、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黨領導，至少在禮儀上，中國大陸教會完全沒有跟上梵二本地化改革的步伐。當全世界的天主教禮儀都已採用本國語言時，中國大陸仍繼續使用拉丁文，此點毋寧是對強調中國特色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最大的諷刺。

29 同前，頁六十六。

## 第七章 保祿六世的對華外交

(一九七一年以前)

### 第一節 保祿六世對中共的政策：交談

雖然庇護十二世並不特別栽培孟棣義，但若望二十三世則在一九五九年任命他為首席樞機，似乎正是希望他成為下一任教宗。根據著名天主教文學家祈東 (Jean Guilton) 的觀察，在繼承若望二十三世的選舉中，孟棣義樞機基本上是具有優勢的。他說：

「新任教宗必須是一位不中斷若望廿三世已召開的大公會議的候補者，因為教宗若望決心完成這眾目所矚，這可能影響聖教會未來的偉大會議。僅此情形，選舉的範圍就已受到了限制，何況除孟迪尼樞機而外，又有誰能比他更瞭解若望廿三世的殷望呢？這或許是大公會議期間，教宗若望廿三世讓他居住在梵蒂岡城內的理由，甚至決定於十一月廿三日舉行大公會議，或許出自他的建議亦未可知，總之，他在十二月六日，對於會議的方法與程序的提案只發表過一次意見而已。

其次，新任教宗必須具有領導意大利與天主教界，亦即結合意大利大多數國民與全球教民的能。因為教宗的三重冠冕授與非意籍的主教，或迫使其他西歐主教來統轄羅馬與意大利，為時尚嫌過

早；可是，假若羅馬的意籍主教成為世界的教宗，那麼，他本身必須是世界性的，這是說，他必須通曉世界，也被世界所熟知、接受與尊敬纔是。再者，為了擔任如此重大使命，亦不宜過於老邁，在一九六三年，又有誰能符合上述條件的呢？

此外，新任教宗最好對於教廷事務能瞭若指掌，並且曾經是前任教宗，庇護十一世與十二世執政的協助者，在此方面，被提名的惟有孟迪尼蒙席了。從許多觀察者以及某些預言家們看來，在他生命中有一段遠程是為陞任教宗的準備。因為教宗制度是一種殊恩（*Charisma*），也是一種職務，歷代中雖亦有偶然膺選為教宗，蒙受聖神的助佑而處理萬機的先例，但最好還是精通於行政工作的樞機較為適宜。

其實，上述的種種理由，早已像一抹陰影，一朵烏雲與一把利刃般地預卜未來，故孟迪尼蒙席也覺察到了即將臨至的苦難——這不能倖免的尊位，因為從相反他本人意志的善意人士們看來，他已極有負起這崇高任務的可能。但諺語云：「入場時是個準教宗，出來時仍是位樞機。」的情形，亦不是不可能。我注意到樞機們似乎不願意與論與俗見干涉他們的行為，而寧可以令人震驚的選舉方式來表明他們的自由；我想孟迪尼蒙席在他心靈深處，恐怕也如同山園中的耶穌一樣，顫慄且安靜地祈禱上主能免除他的苦爵吧。<sup>1</sup>

如若望二十三世的期望，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樞機們選出了孟棣義擔任下一任教宗，他取名為保祿六世。在庇護十二世的時代，孟棣義謹慎而忠誠的執行教宗的意旨，不過他的謹慎與忠誠並不代表他沒有自己的外交架構，只是時間還沒到，那時還不是他宣揚理念的時候。

<sup>1</sup> Jean Guilton 著，錢志純譯，《保祿六世對話錄》（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七月出版），頁六十七～六十九。

身為一個有豐富外交經驗的教宗，他必須要誠實的去面對共產國家持續存在的事實。庇護十二世堅信共產國家將在短時間之內瓦解的想法，至少在可見的時間內並未發生。既然他們不太可能突然轉變，那就要思考如何在共產政權的控制下去協助當地的教會。另一方面，共產思想中的唯物論，是與宗教信仰完全對立的，教廷不可能與之妥協。在現實的需要與理念的堅持中間，如何尋求一個適當的態度與方法，必定是保祿六世經常思考的，而他對此應該早已有了答案。

保祿六世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在羅馬傳信公學向師生發表談話，他勉勵中國大陸的主教、神父和教友，在此考驗的時刻仍然應保持心靈的寧靜，也呼籲中共當局以公平的眼光對待天主教徒，「因為作為天主教徒並不減少其對國家的熱愛及忠誠，反而使身為國民的他們與國家的關係更為穩固，也因著他們參與國家的生活，使國家的安全、和平與進步獲得保證。<sup>2</sup>」

這些話其實是老調重彈，庇護十一世就經常談起教友愛國與信仰是正相關的；不過一九五〇年以後，庇護十二世就沒再提過，若望二十三世亦然。因此這種老調仍然有其新意，保祿六世主要在藉此說明，愛國可以與宗教信仰不違背，愛國會也不一定反教廷。

世界局勢的變化，在深諳外交之道的保祿六世眼中，是他思考對華政策的重要憑藉。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仍在擔任米蘭總主教的孟棣義瞭解人類存亡其實在瞬間僥倖渡過，這正是持續對抗不可免的後果。而在他發表關懷中國談話未久，一九六四年一月，

2 (教宗保祿六世向羅馬傳信公學師生發表講話)，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四一一。



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保祿六世也看得出來，這在講求現實的國際外交，將牽動一連串風向的轉變，教廷也不能不正視這樣的發展趨勢。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保祿六世發表「祂的教會」通諭；他如同前任的教宗們一樣譴責共產主義，但和其前任不同的是，他主張與其「交談」，他說：

「為了這種原因，事實迫著我們，猶如迫於無奈的我們的前任教宗們，以及每一個心靈上承認宗教的優越性和重大關鍵的人們，無不譴責那否認天主相反宗教的理論政見；這樣的理論體系，往往同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政府相配合，尤其是無神論的共產主義中表現得清澈見底。可以說，我們既宣判這樣的組織為不合法，就連國家的統治者和他們的信徒亦是罪有應得，他們不單要徹底破壞我們的聖道，並且使用暴力壓迫我們。實際上我們的這些沈痛與其說是法官的宣判罪名，毋寧說是橫遭迫害者的怨訴。

在這種情況之下，進行會談當然是困難的，但是卻不能說這是不可能的，雖然我們內心毫無任何成見，來把那些信徒從這種學說和這種統治的人拒之於會談門外，但為酷愛真理的人，磋商常是可能的，可是因著那些道德上各種阻礙，與他們會談則困難重重，一則因為沒有思想與行動的充分自由，二則在磋商上他們濫用名詞，歪曲詞意，以致不將語辭用來研究和發展客觀真理，而故意專門用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有些事會導致交談的結束，例如緘默的教會，只能以痛苦發言，而她的社會也因壓迫與墮落而同樣發出痛苦的聲音。當我們什麼也不能做，只能聽著荒野裡的哭聲時，我們怎能提供交談？沈默、呻吟、忍耐以及持續的愛，是教會一直能提供的證人，就算是死亡也不能使其緘默。

「但是我們不會在尚未對現世提出宿願前就轉頭不顧，我們的意願是在繽紛多彩及變化萬千的各

種面向，發展及完善我們的交談；這個交談的目的是協助人與人之間和平的動機；用來提供一個方法，好在理性與真誠語言的壯麗光芒中，尋求人類關係的規範；然後以我們的經驗與智慧提供貢獻，能夠使得全人類走向終極的價值。

我們將要開始的交談，將是無偏見的、客觀的和真誠的，將由其自身產生有利於自由和可敬和平的決定。這個交談將排除藉口、競爭、欺騙和背叛；這個交談將會譴責，例如罪行與毀滅、侵略戰爭、征服或控制；這個交談不僅是與各國首領建立關係，同時也是與各國的肢體及基礎建立關係，以使得各國的社會；家庭、個人，以及由此擴散各種機構和每一個靈魂，能夠瞭解，和平的責任及意願。<sup>3</sup>」

從這篇談話中，保祿六世的外交原則很清楚的展現出來：他不會和共產主義妥協，但他將不迴避，甚至將主動與之交談。這樣做的目的是在增進瞭解的基礎上，照顧當地的教會，也是正視共產國家存在的事實，而更重要的，則是促進和平。對長期浸潤於外交領域的保祿六世來說，他為教廷外交確立了一個迄今仍未變的主要方向：促進世界和平。保祿六世雖然安靜、謹慎，但他促進世界和平的決心，絕非僅只於呼籲和平，他會用實際的參與來促進和平。

保祿六世在共產中國存在的現實中，雖然並不準備改變對待共產主義的態度，但已準備在實務上主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談」。他在九月十二日發表談話，名為「在現代地窟中的天主教徒」，延續過去的說法，指責共產國家對天主教的迫害，他說：「最使我們傷心的，莫過於那些我們非常尊敬而又熱愛的國家，他們起初侃侃而談自由與人民，但不旋踵卻又想盡辦法窒息人民實踐

<sup>3</sup> Paul VI, *Ecclesiam Suam,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the 60 Years of Sino-Vat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pp.95-98.

他們的宗教信仰。他們雖不明言迫害宗教，但其實他們是處心積慮要置宗教於死地；他們設置種種障礙，欲使神職人員知難而退。幾時司鐸、神職人員、及教友不願屈從，不肯與政府「合作」，他們就休想履行正常的義務或工作；而且，極權主義地區內一切的組織設施都是被壟斷的，傳播媒介，不管是關乎文化、學術、教育和康樂，都受到限制，為的是硬要把年輕人與教會分開，而向他們灌輸馬克斯主義教條。<sup>4</sup>」

一九六五年十月四日，教宗赴聯合國大會演講，他未指名道姓的說：「你們要設法將分離者召喚回來，同時設法，以榮譽及忠誠的態度，使那尚未參與你們友愛盟約的人加入。你們要行動使得那些仍留在外面的，渴望並堪得大家的信任，然後請你們接納它。<sup>5</sup>」保祿六世是有感而發，美蘇兩國在聯合國中互相掣肘，再加上各國為其本身利益合縱連橫，早已破壞了聯合國「聯合各國」的理想；中共不在聯合國中，是其中最主要不切實際的例子。

其時越戰已進入白熱化階段，美、蘇、中共皆牽涉其中，於是保祿六世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致電越南、蘇聯、美國及中共各國領袖，呼籲他們共同解決越南戰亂。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保祿六世說：「如今中國享有的威望，已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我們懇求你在這新年開始的時刻，為了全中國人民，接納我們在天主面前所提出的呼籲。<sup>6</sup>」這就是保祿六世所謂的「交談」，

<sup>4</sup> 保祿六世，〈在現代地窟中的天主教徒〉，〈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四一三。

<sup>5</sup> *Acta Apostolicæ Sedis*, 1965, p.880, Vaticano。參考江國雄先生翻譯。

<sup>6</sup> Paul VI, Telegram to Chairman Mao,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the 60 Years of Sino-Vat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p.103.

是他主動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擊，雖然中共開始時並沒有什麼反應。

## 第二節 保祿六世維持及增進與中華民國的關係

教廷的天平開始向中共傾斜了嗎？中華民國的外交官員在得到教宗談話的訊息後，難免會做此種猜測。另外隨著法國與中華民國的斷交，同樣也已帶給中華民國更多的危機感，於是以往不重要的與教廷關係，又重要了起來；鞏固與教廷的外交關係，成了中華民國外交保衛戰中重要的一環。

嫻熟於外交的保祿六世當然也知道，他向中共招手的動作會引起中華民國的疑慮。藉著「同大使」(Prononce)制度的推出，保祿六世在一九六六年春，向中華民國政府釋出善意，主動詢問是否願意在不需以教廷大使擔任使節團領袖的情形下，將教廷駐華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sup>7</sup>。教廷提升與中華民國外交層級的建議，無疑是證明了他無意結束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中華民國政府迅速接受了教廷的建議，畢竟在這愈益艱難的時刻，能提升與教廷的外交關係將是對整體外交的一種鼓舞。

駐教廷大使謝壽康將中華民國政府同意的訊息向教廷傳達，不料九月初教廷駐華公使館又傳來負面訊息：「教廷重新檢討中教關係後認為雙方關係密切，原擬改駐華公使為「同大使」(或代理

7 (有關中梵雙方公使館升格外交部內意見)，一九六六年底，〈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八六。

大使)事已無必要。」<sup>8</sup>沒有資料足以瞭解教廷反覆的理由，不過在一九六六年夏天中國大陸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中國政治及社會動盪不安的時候，教廷不願在海峽對岸，有刺激中共的任何動作。

無論如何，中華民國政府仍是積極努力要促成與教廷關係的進一步發展。為中華民國政府遊說教廷的是羅光，他在田耕莘一九六五年因病辭去台北總主教後，一九六六年二月被教廷任命為接任者。不管是在台灣教省的首席身份，或是以往在教廷時期建立的綿密人際網路，羅光都是往教廷遊說的最佳人選。羅光與教宗保祿六世之間長期的情誼，更是他得以往返折衝的最重要憑藉。羅光在他一篇文章中，說明了他與保祿六世在一九六三年以後的往來：

「若望二十三世去世，孟總主教已升樞機，來羅馬參加教宗選舉會，我從台南拍一電報到梵蒂岡給孟樞機，祝他能被選為教宗。孟樞機當選教宗，取名保祿六世。他由國務院副卿以國務院第二號電報答覆我致謝。次年九月三十號梵蒂岡大公會議第三期會議開幕，教宗主禮彌撒，第一次舉行共祭。共祭樞機和主教二十四位，開幕前半月，大公會議秘書處拍電報到台南，說教宗要我共祭。在開大公會議期間，我只同中國的主教們共同晉見一次。大公會議後，我參加傳信委員會整理議案會議，又參加新建立的與其他宗教交談委員會和改訂法典委員會，每年兩次往梵蒂岡開會，通常都有全體委員會共同晉見，我則幾乎每年一次單獨晉見。教宗宮官長很不樂意，按規教區主教除述職以外，不申請晉見教宗。但是宮長知道教宗要見，祇好替我安排晉見時間。晉見時，常談大陸教會問題，和中華民國

與教廷關係問題。<sup>9</sup>」

羅光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抵達羅馬；在他之前，有一國籍神父衛青心亦往羅馬，為中共遊說。衛青心早年自陸路前往歐洲，得于斌協助在巴黎求學，然後在駐法國使館工作。一九五五年左右棄俗修道，因年紀已大，思想固執，遲遲未能晉鐸；但教廷中有一法籍樞機主教狄色朗支持他，終於在一九六五年晉鐸。或許是因中法斷交的衝擊，他認為教廷應儘速與中共建交。羅光在十二月初寫信給于斌說：「衛青心上月曾來羅馬，向傳信部及國務院建議：教廷減輕與自由中國之關係，派人與中共接洽建交，且以狄色朗樞機之蠻力支持，人見教宗。又在中國神父中遊說。教廷中人頗有惑其說，使教廷使館升格事，又增一層困難。生已在各方進行，以破其狂說。<sup>10</sup>」衛青心的行動應只是個人意願，並非中共的授意。在教廷與中共間也尚未建立有效的溝通管道。

在寫信給于斌的次日，羅光晉見教宗，「請將教廷駐華使館昇格為大使館，教宗答說已決定下年元月一日起即昇格。<sup>11</sup>」雖無文獻資料，但可猜想羅光必定立刻將此事告訴新任駐教廷大使沈昌煥，沈大使亦立刻將消息傳回台灣。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式的消息傳出，教廷駐華公使高理耀將升為大使，並向總統呈遞國書<sup>12</sup>。略有波折的駐華使館升格事件就此落幕。

<sup>9</sup> 羅光，〈亦師亦友〉，《生活自述》增訂版，頁二九一。

<sup>10</sup> 〈羅光致于斌函〉，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

<sup>11</sup> 羅光，〈對中梵關係的努力〉，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七二三。

<sup>12</sup> 〈教友生活週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第二節 保祿六世的兩個中國政策

保祿六世的作法看起來是矛盾的，他一方面積極的要與中國大陸交談，另一方面則提昇與台灣的中華民國的關係。這種作法只能用一個原因來解釋：在和平的前提下，他認為兩個中國的概念是可行的。在保祿六世的思維中，台海兩岸的政府都是事實上存在的，在教廷的外交上，他希望將兩者分開，中華民國的問題不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也不影響中華民國。雖然這種想法與現實有差距。

保祿六世的兩個中國政策是隱而未顯的，在目前可見的公開文獻中，他並未明白說過這四個字。不過據一位與保祿六世關係密切的中國神職表示，教宗曾和他說過這個想法，並請他向羅光轉達，希望羅光能與中華民國政府溝通。其實羅光一年至少一次晉見教宗的頻率，保祿六世應該自己也和羅光講過。

首先是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謝壽康重返教廷已十二年，任期已久，一九六六年九月順利的由沈昌煥接任。沈昌煥在此之前擔任外交部長，以健康理由請辭，擔任事務並不複雜的駐教廷大使，是蔣總統的好意；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卸任後擔任教廷大使，想教廷亦覺與有榮焉，並未有何反對意見。在一大本紀念沈昌煥先生的文集中，幾乎找不到幾頁的篇幅描述沈昌煥在教廷的作為，這其中有許多因素，不過在另一方面，也可證明在一九七〇年前，教廷與中華民國關係的穩定。

在這同一個時間，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為紀念首批中國主教祝聖五十週年和中國建立聖統制

三十週年，保祿六世在伯多祿大殿舉行彌撒，為中國祈禱，教宗在講道中說：

「眾人皆知，中國大陸的宗教自由遭遇到非常重大障礙，我們的溝通完全受阻，在大公會議中沒有一個中國聖統制的成員出席過，傳教士全被驅逐，聖教會和教廷均被指控違背中國人民。其實，一切控訴都屬虛構，我們並且可以提出很多方面的實情來加以駁斥的。」

那麼，我們究竟想怎樣呢？說起來很簡單，我們只想恢復與中國人民接觸，就像我們能夠與其他地方的中國人接觸那樣；我們也的確認識到，在遠東和中國大陸以外的世界各地的中國人，他們之中有我們很多超卓虔誠的神子，也有很多熱心蓬勃的團體，由中國的主教和司鐸領導，這使聖教會非常高興。參加這次盛會的中國學生及教友，為我們來說，是一種喜悅，象徵中國教會持續不衰的生氣活力，並使我們充滿安慰和希望。<sup>13</sup>」

然後在台灣那邊，一九六七年九月，高理耀被任命為駐印度大使，十月宣佈新任駐華大使為艾可儀 (Louis Accogli)，一切都在平衡的狀態之下進行。當然也可以用謀略的角度去看保祿六世的作用，他保持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也是他與中共無聲對談的表態，也就是說，中華民國是他與中共談判的資本。這好像是一場競賽，當使用傳統的方法以致被對手壓制時，就需要另謀蹊徑，以重新獲得優勢。

一九六八年十月四日，保祿六世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再度公開要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讓

13 〈教宗保祿六世為紀念中國建立聖統二十週年發表談話〉，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四一五～四一六。



其進入聯合國<sup>14</sup>。在中華民國政府看來，這是一種不友好的表示，不過同年保祿六世的和平日文告，可為他的這個公開聲明作註腳。他說：

「和平主要的基礎是一個新的精神，這個新的精神驅動人與人間的共存、人類新的前景、人的責任和命運，而且還需要做很多的進展促使這個觀點更普遍也更有效，必須有一個新的訓練來教育新一代國與國間彼此的尊重，人與人間的手足之情，族群與族群間的合作，使之能夠進步與發展。為這個目標而建立的國際組織，應該受到大家的支持，為大家所知，也應該獲得適合它們偉大使命的權利和方法，和平日應該尊敬這些機構，賦予它們的工作光榮、信心和希望的感受，讓它們清楚了解到它們重大的責任，並且強烈意識到託付給它們的任務。<sup>15</sup>」

在保祿六世的理想中，聯合國正應是他上述推動和平的國際機構，而藉著讓中共參加聯合國，正可以減少對立，促進和平。他的設想是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並存在聯合國中。

在天平的另一端，保祿六世又做了一件讓中華民國政府及台灣教會滿意的事。田耕莘樞機主教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去世，一般輿論多認為教宗在短期內不致再任命中國籍樞機。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教宗宣佈三十三位新樞機名單，南京總主教，輔仁大學校長于斌名列首位。當年若望二十三世宣佈的首位樞機正是現今的保祿六世，這個位置是有象徵意義的，代表教宗對於斌的肯定，對

<sup>14</sup> 〈法國快報週刊〉摘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外交部檔案——教廷與匪共〉

<sup>15</sup> 輔仁大學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編輯，〈尊重人權，促進和平：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九九年教宗世界和平日文告〉（台北：光啟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初版），頁二。

台灣教會的鼓勵，以及對中國大陸教會的期許。羅光的說法是：「實則由于斌總主教，望重全國，尚未陞樞機，實有冤屈。」現在保祿六世為于斌平反了庇護十二世時期的冤屈。換一個方向看，這也是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再度施加壓力的作法。這或許是曾在米蘭總主教區服務的錢志純神父，晉見保祿六世時，保祿六世問他，對任命于斌為樞機是否滿意。錢志純回答：「十分滿意！」並且告訴教宗：「于斌樞機是教會最聽命的孩子。<sup>16</sup>」教宗的問話是多種涵意的，滿意的包括政府、社會、教會各方面，甚至此事上了台灣年度十大新聞。而錢志純的回話也是有深意的，因為庇護十二世就是認為于斌不夠聽命，才給予了于斌種種限制。

于斌和羅光對於保祿六世的兩個中國政策應該是了然於胸的，不過他們大概沒有勸說中華民國政府的機會，因為中華民國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漢賊不兩立。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的主要盟友只剩下美國；而一九六八年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後，美國的外交思維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保祿六世的外交政策是不能和美國的外交政策相差太多的。

#### 第四節 輔仁大學問題

于斌升任樞機後，輔仁大學校長的這個職位對他樞機的身份來說太小了。輔大係由台灣的中國

<sup>16</sup> 錢志純，〈我所認識的于斌樞機〉，〈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年刊〉（台北：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二〇〇一年二月出版），頁十二。

主教團、聖言會及耶穌會三個單位合辦，聖言會及耶穌會在辦校過程中與于斌時起衝突，現在遂想以此理由讓于斌離開，他們的想法得到教廷駐華大使艾可儀的支持，在修會和大使雙管齊下後，教廷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在一九七〇年三月以前，教廷已通知于斌這個決定，並在尊重于斌的前提下，希望他自己去找適合的接任人選。<sup>17</sup>

另一件事也造成了輔大極大的困擾。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一位在輔大附設國語中心唸書的美籍學生史恩德，在外語學院教室黑板上寫下「蔣匪」二字，經其他學生向教官報告，教官乃轉向安全單位舉發。校方在處理此事時，因發生在聖言會主辦的外語學院，乃由聖言會單位的蔣百鍊神父負責，蔣百鍊不覺此事有何重要，遂將史恩德從輕發落，不准他繼續住在學生宿舍，但仍讓史恩德繼續在國語中心唸書。蔣百鍊不覺有將此事向校長于斌報告之需要，故校長室亦不知其處理情形；然後有人向安全局舉發，認為外國籍的院務長有袒護外籍學生之嫌，而根本原因是三個單位各行其是，校長權力根本不達另兩個單位。在安全局的壓力下，教育部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十日，發函給輔仁大學董事會：「……現設院務長及各學院中分設之教務、訓導、總務等處應立即撤銷，該校教務、訓導、總務三處應與校長合署辦公，由該校校長統一指揮，以專權責，教授授課及訓導活動應遵守國家政策及政府法令，不得違背。再查該校為天主教會所創辦，其協助辦理學校之各修會，目的在以德育教育青年，不應各據一院，破壞我國學制及法令，應嚴予糾正責由該校長迅即商同董事會負責辦理，限本年五月底以前將處理情形具報。如遭遇困難，應報請本部經由外交途徑轉

<sup>17</sup>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頁二五一—二五五。

知教廷，請予糾正，以維我國法令之尊嚴。<sup>18</sup>」教育部函中最後幾句，遂使此事轉變為外交事務。

于斌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六日見艾可儀談輔仁大學事，四月七日抵羅馬，在衆多事務中，輔仁大學問題為其中最主要者。同一時間耶穌會和聖言會方面也在交換意見，他們認為教育部所以會干預，是于斌身邊的人，想利用這個機會剝奪兩修會的權利。五月二十六日輔大董事會召開，教育部高教司周司長帶錄音機出席：「大家都客氣說當然接受教育部揭示，一切按照大學法辦理。……<sup>19</sup>」五月三十日輔大發函教育部：「：甲、取消院務長之設置。乙、取消各院分設之教務、訓導、總務各處……交由校長統一指揮。丙、下學年度起各分處合併於統一處所辦公。<sup>20</sup>」

六月二十八日教廷有關輔大改組的命令寄到，教廷教育部「建議」于斌辭職，並改組董事會，羅光回憶稱：「應讓輔大三單位多有幾位董事，原則上每一單位三名，共九名，主教團保持六名。對於校長辭職，因樞機地位尊高，不必任校長，應任大學監督，這是教會大學的制度。<sup>21</sup>」然後各方要求于斌下台的動作不斷；七月二十五日，教廷以羅光代于斌為校長的命令送達，艾可儀即邀于斌至使館，兩人有相當激烈的談話。七月二十六日，于斌致函艾可儀表明願意辭職；七月三十一日，在臨時董事會中，于斌正式宣布辭職。<sup>22</sup>

18 同前，頁二五〇。

19 羅光，〈輔大內部改組問題日記〉，〈台北七年述往〉（台北：學生書局，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頁一四八。

20 同前，頁一五一。

21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頁二五七～二五九。

22 同前。

另一方面教育部亦風聞于斌將辭輔大校長，他們認為于斌處境應與教育部要求輔大改組有關。七月三十日先邀輔大常務董事聚會，但僅耶穌會單位代表費濟時主教出席；在于斌宣布辭職的同一天，被激怒的教育部發函給外交部，請外交部致電駐教廷大使陳之邁，請其將中華民國政府要求輔大改組及不准于斌辭職之說，轉告教廷主管教育單位。同時社會各界亦開始動員，以蔡培火為首的中央民意代表，發動慰留于斌；士林官邸也傳出話來，稱若于斌不任校長，蔣夫人亦將不任董事長。<sup>23</sup>

陳之邁遵外交部令往洽教廷教育官員，八月五日他報告說：「該部對各國天主教大學向來政策為令其依照各國教育法規辦理；…關於于樞機主教退讓事，對方主動提出，謂已獲解決，惟暫不對外發表。……」<sup>24</sup>在八月五日這一天，教廷教育部從台灣獲得之訊息是于斌已辭職，故稱已獲解決；而陳之邁則將此事定位為教會內部事務，不擬干涉。

不過八月六日這一天，事態有戲劇性的變化。由於社會反應不佳，以及教育部的壓力，中國主教們決定支持于斌續任校長。在這一天召開的董事會中，以六票贊成，四票反對，一票棄權通過慰留于斌。兩名主教成世光、蔡文興去拜會于斌，表達慰留之意，于斌順水推舟接受了慰留。由於教宗同意于斌辭職的電報已經發出，不能更改，因此教廷教育部接到于斌同意留任校長的決定時，以推遲于斌辭職的時間相應<sup>25</sup>，畢竟希望于斌辭職的並不是教廷教育部。

<sup>23</sup> 同前，頁二五八—二六〇。

<sup>24</sup> 〈駐教廷大使陳之邁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七〇年八月五日，〈外交部檔案——輔大易長〉。

<sup>25</sup>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頁二六一。

艾可儀在非常不滿意的情形下，八月二十四日將教廷教育部的命令通知了于斌，但他同時一定用十分強烈的態度，向教廷國務院報告了他的不滿，甚至有可能以去留相爭。因此，教廷副國務卿八月二十七日緊急電召陳之邁往見，陳之邁稱：

「教廷經過最高階層慎重考慮，決定請于樞機讓出輔大校長職務，改任 Chancellor，校長由羅光總主教擔任，于樞機當即表示接受，有案可稽，現聞我教育當局對此措置不表同意，輔大董事會復決議慰留，教廷深感詫異。教廷作此決定，純係為發展教務著想，以于樞機主持大政，而以日常行政交由年事較輕學識湛深之羅總主教負責，並非對於于樞機過去處理校務或個人有所不滿，教廷認為此事極端重要，Most Serious，故將其昇高為我國與教廷兩國之間外交問題，教廷與我國邦交敦睦，過去對於我國國際地位之維護，一再越出通常範圍盡力協助，深盼對於兩國間友好關係，不致有不利影響，故請將教廷立場據實報告鈞長，望能從外交觀點謀致妥善調處方案；稍假時日固無不可，但實質則難變更云云。該副國務卿態度十分嚴肅，強調教廷對此事最高度之關切……」<sup>26</sup>

這是一次非常罕見的外交談話，有可能是教廷國務院的確對輔大校長辭職一事有超乎尋常的反應，但另一種可能性是國務次卿（不知是彭耐里或卡薩羅里中那一位），在接到艾可儀報告後，對中華民國大使做了不適當的談話。這兩位次卿都接任未久，國務卿又任其發揮，難免有盛氣凌人之可能。在談話中所謂「對台灣地位之維護，一再越出通常範圍盡力協助」，顯示出這位國務次卿對過去這十餘年，教廷對中華民國友好的作法，不盡以為然。然後語出威脅，希望中華民國政府慎重

26 〈駐教廷大使陳之邁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發電，〈外交部檔案——輔大易長〉。

考慮，不要讓輔大校長辭職事，影響教廷在其他事上對中華民國的支持。並強調此係外交事務，要中華民國政府不可等閒視之。什麼事情會讓中華民國政府投鼠忌器，必須要慎重考慮的呢？答案很簡單，聯合國的中國會籍問題。對中華民國政府而言，聯合國會籍的重要性，當然超過輔大校長。

這也就是為什麼輔大校長辭職之事，外交部駐聯合國代表團也被扯了進來。當時任職於駐聯合國代表團的沈劍虹為此寫了一份報告給外交部：

「輔大校長一職教育部及中央方面仍有意支持于斌連任，職以該校易長業經教廷決定並經其副國務卿向陳大使提出交涉，為免影響雙方關係，似不宜多加干涉。爰經擬就致陳大使電稿如下：「第一七六號電悉。(一)輔大組織規程已照我國法令修正，深堪欣慰。(二)私立大學校長之任免，依法應由各校董事會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備，輔大易長亦需照此辦理。于校長辭職既經該校董事會決議慰留，教育部亦唯有依法准予備案。(三)我對教廷以往熱忱相助，向甚欣慰，對輔大內部事務，向未加干涉，茲悉于樞機將於短期內前往教廷述職，當可就該校易長有關事項，面商解決。(四)該校擬設 Chancellor，我大學法無此規定，併希婉洽免設。」此稿亦曾酌採教育部意見，現正由鍾部長張秘書長寶樹協議中。……<sup>27</sup>」

沈劍虹夾在外交部、教育部乃至國民黨中央黨部之間，所擬之稿必須符合這另兩單位想法，但又必須在實質上能解決外交問題，其實這件指示，最重要的部份是向教廷表示，政府對於輔大內部

27 〈駐聯合國代表團沈劍虹擬致教廷大使陳之邁電稿〉，一九七〇年九月三十日，〈外交部檔案——輔大易長〉。

「華理柱主教自一九一八年赴華傳教，……今忽被中共政權釋放，可以說是個好消息，而且這位德望相孚的主教為信仰作證，堅苦卓絕，今日得以恢復自由亦屬可喜，這是一個好消息，乃是因為這是中國大陸給予教會及世界的一個意外及空前的事件，我們希望日後那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繼續對宗教自由採取合理的措施，最後由於這個好消息，希望可以激發其他類似的政權也尊重自由，我想到那些可悲可泣的處境，並非有意抨擊某個政權或人物，實在由於愛好和平正義，並表示對受逼害的兄弟姊妹表示同情，請大家為此意向祈禱。……<sup>33</sup>」

敏感的國際輿論立即推測教宗是向中共表示善意，這樣的推測當然會引起中華民國駐教廷使館的緊張，但教廷各方面對他們的查詢時，都說沒有任何改變，的確此時八字都無一撇，還不到任何改變的時候。身體大致復原後，八月二十四日華理柱飛抵羅馬，二十五日晉見教宗，同日舉行記者會，「表示中共制度限制自由絕難同情，惟解放婦女、平等待遇各種族，禁止黃色書刊三項，尚足稱道，記者詢：中共有無如東歐各國容納宗教傾向，渠答稱：將來或有可能云云。<sup>34</sup>」華理柱的答話又增加了想像的空間。

在外界越益猜疑的情況下，保祿六世決定進一步向中共釋出善意，教宗的方式是參加在菲律賓舉行的亞洲主教會議，然後訪問香港，在香港向中共發表談話。在羅馬參加法典修訂委員會的羅光，除了和教宗面談，表明不願接任輔仁大學校長外，也為傳聞中保祿六世將訪香港一事，與教相

<sup>33</sup> 〈駐教廷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四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八六—一八七。

<sup>34</sup> 〈駐教廷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一八八。



為英國殖民地，教宗赴港向中國人講話，有如昔日臥亞為葡國屬地，請教宗從臥亞向印度人講話，印度人必不喜歡。這樣我國政府不滿意，中共也不滿意。若左派人或香港共黨對教宗有惡感表示，實為不好，于斌樞機主張教宗或赴台灣香港，或兩地都不去，副國務卿說他主張都不去，但是教宗願意到香港向中國人講話。<sup>35</sup>」

若羅光所得之訊息無誤，教宗在馬尼拉主教會議後訪港，是他自己的決定，雖然國務院眾人都未必以為妥當，但教宗執意如此，他們也只能以此安排教宗行程。

十月二十三日，在台灣的中国主教團及台北教友上電教宗，希望教宗在訪菲途中蒞台訪問，並請早派駐華大使。十月二十八日，教廷宣佈任命葛錫迪總主教為駐華大使，至少在這部分，平息了中華民國政府及台灣教會的疑慮，也表示了保祿六世兩個中國政策平衡兩岸的作法。十月二十九日，《教友生活》刊出社論——「向教宗呼籲，為教宗祈禱」，可以看做是台灣神職界對教宗訪港的一種強烈意見。該篇社論由方豪執筆，語氣直率，部分內容如下：

「三、欣聞 聖駕即將東來，是否來台，尚未可知。據過去的前例，無論 聖駕巴勒斯坦之行、印度之行、非洲之行等，為表示專誠、從未順道訪問他國，甚至紐約聯合國之行，亦未順道一訪白宮，國際禮儀，固應如此。此次由於適值澳洲慶祝發現二百年，乃決定在菲律賓之行以後，正式訪問澳洲，而澳洲朝野的準備，亦有如菲律賓，熱烈而隆重；我們對於菲、澳兩國之有此殊榮，深願為他們慶賀；但不久以前，突聞 聖駕有香港之行，實感驚訝！香港何地？英國殖民地耳！中國人言之心

<sup>35</sup> 羅光，《生活自述》（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六月出版），頁一四八—一四九。

痛。中國人在香港，至今尚不能為華文爭得法定語文地位，其怨恨可知。況今日香港，又在共產魔影之下，政治言論龐雜，國際間諜充斥，混水摸魚之政客，出沒其間，專以造謠為能事，試問 聖座將何以答左派記者之質詢？何必自取其辱？……試思聖座一旦抵港，雖僅作數小時的勾留，但各報報導，稍一不慎，即有玷 聖座的高潔，而 聖座發言，稍被歪曲，即可釀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聖座能不顧忌及此乎？

香港教會中，少不更事之教友，輕舉妄動之外國教士，偶有天真之想，以為不妨與中共「坐下來談談」者，真所謂「與虎謀皮」，以 聖座之智，對此豈不洞若觀火？

各位教友！事急矣！今日我們在台教友，惟有本愛戴、擁護、尊敬 教宗的立場，虔求 聖神以恩光寵照 教宗，賜以聰明、上智、超見、明達、敬畏、孝愛、剛毅等七恩，在遠東的行程上，做最佳的決定；在表達政見時，能勇敢負起崇正闢邪的責任。<sup>36</sup>」

這篇代表台灣教會的聲音，並未影響教宗的決策，同日，教宗行程公佈，訪港已成定局。十一月八日，教廷國務卿魏堯樞機（Villot Giovanni）代表教宗致函中國主教團，感謝邀請的盛情，但對教宗不能訪台表示歉意。

十一月十二日，同樣由方豪執筆的《教友生活週刊》社論寫的更辛辣，他寫道：

「教宗香港之行，似已成為定局。……教廷最初說：「是為向中國人民表達敬意和愛心。」後來又加上一句：「是為向在大陸的、在香港的和在台灣的全體中國人民致其尊敬與熱愛之忱。」

36 《教友生活週刊》，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 第六節 聯合國中國問題

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的席位已岌岌可危，最主要的關鍵在於美國的態度和教宗的想法前已有非常清楚的表達，他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但不以中華民國退出為條件，他也期望聯合國能成為實現和平的機構，在此前提下，教廷一直發表支持聯合國的言論，甚至捐款支持聯合國的文教及救濟活動。

在此同時教宗與共產國家的交談也獲得了明顯的成果，南斯拉夫總統狄托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廿九日到教廷訪問，稱揚教宗致力和平。同一個時間，教廷國務院官員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與捷克政府官員會商改善關係。四月份匈牙利外交部長也來教廷，此行應不僅只拜會活動而已。五月份波蘭則與教廷接觸頻頻，一時新聞盛傳將有建交行動。九月廿八日，自一九五六年以後一直托庇於美國駐匈牙利使館的匈牙利樞機主教閔真諦，終獲匈牙利政府許可離開，這可視為保祿六世「交談」政策獲得的最高成就。<sup>43</sup>

一九七一年四五月間，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即將訪問中國大陸的消息傳出，國際觀察家已可判斷，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取得中國席位的時間已經不遠。親中共的國籍神父衛青心再在此時投書法國報紙，認為教廷應在中共加入聯合國前與其建立外交關係。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

43 《公教報》，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四月十六日、四月三十日、五月二十八日、十月八日。

團駐歐辦事處亦傳回訊息，稱據報載衛青心正為教廷與中共奔走，中共提出建交兩條件：（一）、教廷召回駐台北之大使並關閉教廷大使館。（二）、承認一九五一年以來自行任命的四十八名主教，並任命皮漱石為中國主教團主席。<sup>44</sup>

教廷新聞處否認了這個報導，「這項報導涉及的是一位衛姓的中國神父，而不是教宗。他說：『我們顯然正遭遇某個人的建議，但是梵蒂岡與此無任何關連。』」<sup>45</sup>，六月十二日，陳之邁亦訪教廷副國務卿，「據告匪偽與教廷至今全無接觸，故談不到被拒情事，外間謠言純屬子虛，正如外傳教宗有意訪蘇絕無其事。」教廷副國務卿的答案其實也有玄機，那如果中共與教廷有了接觸以後呢？

為了表示教廷與中華民國關係仍舊友好，教廷在六月廿一日頒給陳之邁大使大十字勳章，這是教廷頒給駐教廷使節的最高榮譽。<sup>46</sup>自一九六九年三月陳之邁上任以來，他沈穩的外交風格及學者氣質，讓他也頗得教廷官員敬重；這固然是他得到授勳的原因，不過這應該更是一種對中華民國友好的表示。但這友好的表示只是在天平傾斜時用來平衡的微小法碼；七月十八日，尼克森將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前訪問中國大陸的消息傳出，教廷新聞處立即發表談話稱：「任何足以促進世界和平之舉措，皆當為教廷所贊助。」第二天的《羅馬觀察報》亦以期望為題，「申述教廷期望「中」美的接

44 〈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駐歐辦事處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七一年六月七日，〈外交部檔案——教廷與匪共〉。現在看來這個報導的可信度滿高的。

45 〈中央社梵蒂岡七日美聯電〉，一九七一年六月八日，〈外交部檔案——教廷與匪共〉。  
46 〈公教報〉，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

觸對於各民族間合作有所貢獻，進而使基於正義之和平有所裨益。」教宗本人其實還在觀察這個新的世界局勢，他認為「是福是禍尚難得知，教廷自有其立場及願望，此時此地尚非表明之時。」<sup>47</sup>

教廷自有其立場及願望，教宗的目標是以交談促進和平，讓聯合國得以成為締造和平的機構；但美國也自有其立場及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亦然，他們在談判時，主要在爭取本國的利益；為美國而言，他還是重視中華民國，但其重要性已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取得中國席位，當然是以排除中華民國為條件的。在這種情形下，教廷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但同時支持中華民國留在聯合國的想法，在國際現實中，只有前半段有實現的可能。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于斌先在美國參加白宮的早餐祈禱會；九月廿五日到羅馬謁見教宗，于斌手記：「先與千餘人聆聽聖父教訓。……禮畢出堂邀予隨行，接見於另一大廳。談二十分始贈聖牌、念珠而別。1. 因關懷中國甚願與我一見。2. 甚希我國在 C-Z 保住應有地位。3. 將盡力支持自由中國。4. 為解救大陸教友將盡力而為。5. 衛青心之主張毫無根據。6. 既係教友，當知無言，有意見請訪問 Villot 及 Cassaroli。7. 予告將盡力追隨以應大難。」<sup>48</sup> 在第 2、3 點中，教宗表示了在此時仍保持支持中華民國的態度，但在國際上這種表態已沒什麼意義。在于斌所寫的標題 5 中，教宗否認將與中共建交；有趣的是第 6 點，的確台灣的《教友生活週刊》在一九七一年年底似乎完全封口了，表現與前一年完全不同。無論如何，教廷的外交無法違逆國際外交潮流，在必須照顧中國大

47 〈駐教廷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外交部檔案——教廷與匪共〉。

48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頁二八六。

陸教友，以及必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打交道的前提下，在台灣海峽兩岸之間，中國大陸的重要性再次超越了台灣。

始會員國及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華民國，決定退出他自己所參與締造的聯合國。這座聳入雲霄的聯合國大廈刻畫著的痛苦回憶；聯合國的基礎原應建築在公理與正義之上，它原應發揮堅持憲章原則，保障忠實會員國合法地位，維護人類自由的精神力量，以及制裁極權暴力的道德勇氣。現在這座莊嚴的建築所象徵的聯合國正受到暴力的破壞搖撼，隨時有倒塌的危險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華民國犧牲了千萬以上軍民的生命，損失了不可估計的財產。……大戰結束，我國政府懷著悲天憫人的宏願……參與締造聯合國的工作，致力於重建世界之安全和平。因此，中華民國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經明載於憲章第二十三條之中。……凡此事實具在，任何人不能否認我國為聯合國忠實之會員國，故任何排除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合法地位之行為，不僅為撕毀憲章之非法行為，且亦完全否定了聯合國所賴以建立的崇高目標與神聖原則。」

「……有人以為容忍中共進入聯合國是為了「和平」，意在藉此約束中共，此種想法……不僅係幻想，而且極危險。中共……絕對無代替中華民國政府的任何資格。聯合國對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合法地位所作違反憲章之任何決定，均屬非法行為，中華民國政府及全民均絕對認為無效而堅決反對到底。……」。

《中央日報》同一天同一版第一條新聞即刊登蔣中正總統告全國同胞書謂：

「海內外全體同胞們：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竟違反憲章規定，通過阿爾巴尼亞等附匪國家之提案，牽引毛共匪幫竊取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及在安全理事會中的席位，我們本漢賊不兩立之立場及維護憲章之尊嚴，已在該案交付表決之前，宣佈退出我國所參與締造的聯合國。同時聲明，對於本屆大會所通過此項違反憲章規定的非法決議，中華民國政府與全中國人民決不承認其有任何效力。……歷史將能證明，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聲明，實際上就是聯合國毀滅的宣告。……現在我國雖已退出我們

所參與艱辛締造的聯合國，但是我們今後在國際社會中必當仍以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為準繩，繼續為維護國際間公理正義與世界和平安全而勇毅奮鬥。……」。

十月二十七日，義大利當時最大的日報之一，中間偏左的《訊使報》(IL MESSAGGERO)刊登義國各方對聯合國有關中國席位的決定的反應，其中提到義大利政府有關的聲明，指出義大利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被聯合國接納感到滿意，義大利相信北京中國全面加入聯合國和國際生活必將有助於鞏固世界的平衡，並增進亞洲大陸的和平局勢。

該報又報導義大利社會黨和共產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正面反應和積極的看法。義大利執政的基督民主黨右派成員支持美國的重要問題案，但該黨親北京的眾議員維托里諾·哥倫布(Vittorino Colombo)<sup>1</sup>除了對北京進入聯合國表示異常滿意之外，甚至對義大利在聯大投票時投棄權票的作法感到遺憾，他認為義大利因此坐失了取悅北京的良機。義大利社會民主黨原是最支持美國所提的重要問題案的政黨之一，它相信這項問題案必能使中華民國免於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該黨副主席卡里利亞(Cariglia)認為美國的重要問題案之所以失敗，是其策略上錯誤應得的後

<sup>1</sup> 維托里諾·哥倫布(Vittorino Colombo, 1925-1996)係基督民主黨要員，一九五八年開始擔任國會議員至一九九四年，曾任外貿部長，衛生部長，海運部長，交通部長，郵電部長等要職。其個人是一位極虔誠的天主教徒，一向主張以友誼對話方式來改變中共的思想態度。一九七一年首創「義中經濟文化交流協會」及「義中商會」，與周恩來、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李鵬、江澤民均保持友好關係。六四天安門事件前曾多次率領經濟文化訪問團赴中國大陸訪問，為義大利工商業界開創商機，促進雙邊文經交流，亦多次自薦為北京與教廷關係搭建橋樑。被視為中國問題專家的天主教米蘭外方傳教會會士梁作祿(Angelo Lazzarotto)神父是該協會的宗教顧問，積極走親北京路線，以迎合中共思考方式與口味途徑，希冀潛移默化中共。



果，因為正當聯大投票之際，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正在北京訪問，這在客觀上很難令那些不願排除中華民國的國家團結一致。卡里利亞以為中華民國當然不能侈想代表整個中國，但是如果聯合國願意、而且應該保持其完整普遍性的原則的話，則應該重新考慮使中華民國成為普通的會員國的建議。

義大利共和黨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對民主的世界更為開放，所以加入聯合國的時機已經成熟。義大利自由黨書記馬拉戈迪 (Malagodi) 眾議員聲明說：「最近幾年來我們為了遵照聯合國普遍性和有效性的原則，所以一直贊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但也為了同樣的原則理由，我們對中華民國的遭排除感到非常遺憾，這個國家在亞洲大陸是個進步的模範，完全值得國際的尊敬。」義大利極右派的國家社會運動黨參議員年巧尼 (Nencioni) 聲明說：「面對美國的重要問題案，義大利的態度反映出政府的猶豫不決，終致於有意地出賣北大西洋公約的條文和精神所揭櫫的世界戰略。為此，義大利的決定不只是意外的錯誤，更是最近二十年來外交史上的大改變。」

同一天，十月二十七日，義大利當時另一主要日報，中間偏右的《時報》(IL TEMPO) 首版第一條新聞便報導聯合國因北京的進入所發生的大轉變。在這篇兼社論中，該日報劈頭便指出聯合國這一決定必須從它令人不安的結論來解讀，此亦即：「既然共產中國是唯一在國際團體中全權代表中國人民的國家，則台灣豈不是沒有生存的權利，其不正常的處境當非除之不為快。這就是聯合國在法理和道德上雙重醜陋可怕之處；一個如聯合國這樣的組織，自命生於自由的行為，賦與自身以普世性和民主的啟發性的原則，竟把其創建成員國之一、又是極為罕有的模範國、從未觸犯過舊金山憲章條文一個字和其精神者逐出自己門外。」

《時報》社論又寫道：「據說聯合國的作用像國際危機的減壓器一樣，可以避免戰爭的爆發。此說的真實性僅到某種程度而已，因為戰爭的爆發或免除完全不在乎聯合國的立場，而始終由強國操縱。職是之故，則聯合國有關中國的表決當不至於令人過於吃驚。如果民主與自由的課程由那些製造最蠻橫的極權主義哲學的國家在「玻璃大廈」的國際舞台上講授，則我們還能期待甚麼有別於此的後果？」

該社論最後如此結論說：「這是一個危險的先例：聯合國拒絕一個在經濟上全面發展、實現了模範的農業改革的自由國家享有國際公民的權利。這件也得力於許多西方國家、包括義大利在內的落井下石而發生的事，從政治上看是如此地嚴重，因為它給自由世界聯盟體系進一步地埋下了地雷，並在精神道德上令人洩氣，感到屈辱。尤有甚者，這實在是一件毫無用處的舉動，因為與北京的交談並不經由聯合國。」

教廷官報《羅馬觀察報》(L'OSSERVATORE ROMANO)十月二十七日首版以巨大篇幅報導聯合國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消息和各國投票的狀況與反應。只在該文結束之前，以十六行的篇幅，很婉轉地表明教廷對聯合國大會這項決定的反應說：

「要是同意接納人民中國，乃在於期望聯合國組織因為更具普遍性，而有利於在正義中締造和平，一如教宗(保祿六世)一九六五年十月四日在聯合國演講中所祝望的；同樣的祝望也因此感到遺憾，因為身為成員國的台灣的中國政府不能再依據這個各民族的組織(聯合國)的基本原則，在國際集會中有代表存在。」

「尚未參與你們友愛的盟約者」、「那仍然留在外面的」是誰，但是沒有人懷疑教宗所指的正是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不少國家都認為這個共和國的政府統治著將近六億人口，佔全人類的四分之一，不論它的體制為何，於情於理都應該是聯合國的一員，在聯合國內運作自己的國際政治理念，並受聯合國憲章節制。然而，當時佔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認為，只有在台北的它才有資格代表包含中國大陸和台、澎、金、馬的整個中國，因為這個政府是中國國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合法政權，不是靠武裝革命取得的。

其時，國際團體處在東西兩大陣營冷戰對立中，而且局勢相當危急，因為蘇聯集團於四年前，一九六一年，在柏林築起了圍牆，而兩年多之前又發生古巴導彈危機，美蘇核子戰爭有一觸即發的危險。因此，西方陣營某些國家即使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也不敢在聯大會議中明目張膽地支持北京政府進入聯合國。可是自從保祿六世教宗以其世界、至少是西方精神領袖的地位，在聯大發表這樣的演講之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無非提供了一臂之力。隨後數年間，中華民國維護其在聯合國席位的奮戰變得日漸吃緊和艱鉅。

事實上，保祿六世教宗對世界國際的理想，乃是各國各民族都加入聯合國，都在聯合國內有它合法的席位。對中國而論，他固然希望地大人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聯合國內光明正大的一員，他也希望不因為中共的進入而把身為創始國的中華民國剔除在這個國際最大、最崇高的政治殿堂之外，否則就違反這個組織的原始宗旨。

論者以為保祿六世教宗是「兩個中國」論者，其實，這位一直在教廷國際政治事務中肩負決策角色的要員，在出任全球天主教領袖後，仍然沒有改變他要人類共同參與世界命運的初衷。面對中

原本就屬於我的假期，因此我持續在台北缺席，直至一九七三年二月，我被任命為教廷駐新獨立的孟加拉共和國的大使為止。<sup>5</sup>

教廷對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就這樣不聲不響地被架空了。面對在國際團體中無立錐之地的隱憂和抑鬱，中華民國憂心忡忡之情不難想見。但是台灣中華民國的天主教會無法相信共產主義一向視為眼中釘的教廷也東施效顰，與台北斷交。當年十二月十一日台灣中國主教團主席，台北的總主教羅光抵達梵蒂岡，與教廷昔稱「公共事務委員會」的秘書長（即外交部長）卡薩羅里總主教會談，討論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教廷的態度。卡薩羅里總主教表示：教廷駐華大使館為駐中國大使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既不代表中國，則教廷駐台北的大使館可以撤退。羅光總主教與卡薩羅里總主教據理力爭，卡薩羅里總主教說撤館的事尚不可言，然教廷大使將不回任。十二月二十日，羅光總主教覲見保祿六世教宗，陳述胸中積鬱。這位與羅光總主教私交甚篤的教宗告曰：教廷肯定與中華民國保持外交關係，但暫時在政治和教會公開關係方面，要將台灣蓋住，隱藏起來。事隔將近十個月，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教廷始派高樂天（Francesco Colasuonno）蒙席<sup>6</sup>抵台北，擔任公使銜臨時代辦<sup>7</sup>。

<sup>5</sup> 同前，頁十。

<sup>6</sup> 高樂天蒙席後來升任教廷駐莫三比克宗座代表，駐津巴布韋、南斯拉夫、義大利大使，駐俄羅斯官方代表，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擢升為樞機主教，對中華民國處境一向非常同情，二〇〇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去世於義大利巴里（Bari）家鄉。

<sup>7</sup> 《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七二五。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四日，保祿六世教宗首次訪問遠東，途經香港短暫停留數小時，在跑馬場舉行彌撒聖祭，並向中國人發表講話。行前，羅光總主教曾於當年十月中下旬赴羅馬教廷傳信部談有關教宗訪問香港事宜。傳信部次長請羅光總主教寫一份備忘錄，由彼呈給教宗<sup>8</sup>。事隔兩年，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下旬，羅光總主教又赴羅馬，見教廷國務院副國務卿貝內利（Giovanni Benelli）總主教和主持外交的卡薩羅里總主教，建議教廷派葛錫迪大使為駐孟加拉大使，但仍兼駐華大使。貝內利副國務卿說此事可以商量，但卡薩羅里總主教仍為駐華大使館事耿耿於懷，最後也認為葛錫迪大使兼駐華事可供研究。十二月十一日，羅光總主教覲見保祿六世，彼告訴羅光總主教說：「我接到你的信，希望同你談一談。你們的精神不可下沉，不可灰心，你們不要怕羅馬教廷會放棄你們。大使的名銜會保留，大使館也常在。我們是朋友，我們絕對忠信，絕對不會使你們看到自己被遺棄。」<sup>9</sup>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羅光總主教再次覲見保祿六世教宗，並呈一備忘錄，要求三點：一，葛錫迪大使調往孟加拉，仍保留駐華大使名義。二，如教宗往訪澳洲，請在台灣一停。三，四月二十一日亞洲主教團協會將在台北舉行第一次全體大會，請教宗頒賜訓詞並派葛大使回台北參加。教宗的答覆是：他不往澳洲；亞洲主教團協會在台灣召開第一屆會議甚為合宜，因為中國為亞洲第一文化大國，葛大使將到台北參加會議，教宗將致賀電；葛大使將保持駐華大使銜<sup>10</sup>。

<sup>8</sup> 同前，頁七二四。

<sup>9</sup> 同前，頁七二五、七二六。

<sup>10</sup> 同前，頁七二六。

話，不但不表示教廷對其友好敬重，反而顯示教廷對之憂慮。

中華民國的主教們來教廷拜會有關人員時，一觸及中梵外交關係，雙方的關係立刻緊張敏感起來。在中國問題上，教廷外交部的人員對中華民國的主教們常常以釜底抽薪的根本解決途徑相告，但主教們卻期期以為不可。卡薩羅里總主教主張撤回在台北的教廷駐華使館，因為他認為台灣的中華民國不再代表整個中國，他心中的中國是北京政府所統治的那個大陸的中國，而教廷在共產國家的大使館都關閉。因此，宜撤回在台北的駐華使館。

卡薩羅里總主教的閉館論並非捨此換彼，而是此時此刻教廷不希望與海峽兩岸的政府有外交問題上的糾葛。當時教廷的理想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派遣沒有政治性質的宗座代表（Apostolic delegate）駐台灣和中國大陸，以避免予中共以任何政治口實，並讓台灣教內外人士不至於抱怨教廷向中共妥協<sup>12</sup>。在教廷看來，派遣宗座代表駐台灣，這在雙方大概不會有困難。至於北京中國肯不肯接受教宗派他的教會代表駐中國境內，那就不得而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向的說法和作法，都不一定樂意與教廷建交派使，更何況一名沒有外交身份的宗座代表豈能令北京滿意歡迎？幾時台灣海峽兩岸人民和政府之間的歧見糾紛解決，教廷再考慮派遣大使事。

#### 第四節 保祿六世教宗對華的關懷

<sup>12</sup> 教廷一般在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地區派駐宗座代表，以示對地方教會的關懷，並聯絡教廷與地方教會之間的關係。如果教廷自中華民國台北撤使，則立刻派遣總主教身份的宗座代表赴台北是最自然亦最起碼的行動。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事頓令舉國上下陷入難以名狀的迷茫之中，抑鬱之情勝於悲憤。一個月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五日，台灣天主教在台北體育館隆重舉行慶祝中華民國開國六十週年暨台灣教會聖統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祈福大典。保祿六世教宗特派韓國首都漢城的總主教金壽煥樞機主教為特使，前往台北主持彌撒祭典。當時的韓國是國際處境日漸孤立的中華民國的忠實盟邦，兩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處境相若。金壽煥總主教以四十七歲的年紀和于斌總主教同時被保祿六世擢升為樞機，他年輕有為，是當時全球最年輕的樞機主教，更是韓國走向自由民主的象徵性人物，是中華民國台灣天主教的摯友。保祿六世教宗派遣這位樞機主教到台灣主持慶典彌撒，頗有風雨中故人來雪中送炭的意義，因為對類似的祈福紀念慶典，教宗一般不至於派遣樞機主教級人物為特使參禮的。保祿六世在委派特使狀中，要求金樞機主教代表他向于斌樞機主教、台灣全體主教、神父、修會會士修女、以及每位教友致慈父般的問候和祝福，並勉勵他們繼續保持信仰和愛德。教宗並藉著金樞機的口，向台灣教會全體信友保證他對他們的基督之深愛<sup>13</sup>。

一年後，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保祿六世教宗以拉丁文致電台北總主教羅光，祝賀在台北舉行的全國聖體大會。他向全體參與大會的人士致賀意，指出舉行聖體大會不但顯示了台灣天主教會的欣欣向榮，更表現了主教神父們對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所要求的基督信仰生活的革新的關懷。教宗在電文中也邀請台灣每位天主教徒讓整個遠東地區尚未認識基督福音的人士都能聽到他們對聖體的讚頌。最後，教宗希望這次聖體大會能夠給傳播福音的工作注入新活力，他並降福台灣各

<sup>13</sup> *L'Attività della Santa Sede*, 1971, p.481-482, Vaticano.

級政府人員、神職和教友<sup>14</sup>。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星期日中午，保祿六世教宗在羅馬南郊岡道爾夫堡（Castelgandolfo）夏宮接見香港天主教青年會代表團，向他們重複他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四日訪問香港，在跑馬場舉行彌撒時的講道說：「教會事實上就是一個合一與愛的聖事，它的使命就是愛……當我們說到這些簡單而崇高的話時，我們幾乎感受到所有的中國人，不論他們在哪裡，全都圍繞在我們四周。」<sup>15</sup>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去世。其時羅光總主教正在羅馬參加教會法典修改委員會小組會議，他應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陳之邁之請，向教廷國務院洽請派特使赴台北參加蔣中正的葬禮。羅總主教與國務院中國事務負責人艾萬·迪阿斯（Ivan Dias）蒙席、國務院副卿貝內利總主教、國務卿讓·維約（Jean Villot）樞機主教、傳信部長羅西（Agnelo Rossi）樞機主教等洽談無果。蓋教廷從無派遣特使參加任何國家元首葬禮的慣例，頂多由駐在國大使代表參禮。然保祿六世教宗卻在四月七日致唁電給蔣夫人宋美齡和繼任總統嚴家淦，表達他的哀思，並請代向全國人民致意<sup>16</sup>。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保祿六世教宗接見向他賀聖若翰洗者（Giovanni Battista）聖名節日及就職十四週年紀念日的樞機主教團，並向他們暢談教會的生活及教會與各國各民族的關係。他談到全球馬克思主義政權國家負面影響了教會與國家的關係。他說這種政權企圖把人民從它們所謂

<sup>14</sup> Ibid., 1972, p.477, Vaticano.

<sup>15</sup> 參見《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英語部分 p.121、中文部分頁四一七。

<sup>16</sup> *L'Attività della Santa Sede*, 1975, p.120, Vaticano.



的「宗教異化」中解放出來。又說就任這些年來，教廷一直留意與這些馬克思主義政權國家的關係，並委託得力的左右手積極、努力不懈、坦誠、堅定地與這些國家進行談判或對話。令他惋惜的是世界上還有由馬克思主義政權統治的廣大地區至今仍然緊閉門戶，且不說與教廷尋求彼此了解，就連互相的接觸也缺乏<sup>17</sup>。

保祿六世教宗這篇講話所提到的「由馬克思主義政權統治的廣大地區」，雖然沒有明指是誰，但沒有人懷疑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他這番話已經明顯地為這些年來處心積慮、委託得力助手設法與共產國家接觸打交道的行動做了註腳。北京政府之拒教廷於千里之外，尤其令保祿六世教宗疾首。

## 第五節 陳之邁大使

陳之邁大使，一九〇八年生於廣東番禺。國立清華大學畢業，得庚子賠款獎學金公費赴美國留學，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一九三三年遊學美國結束，得清華大學回國川資，取道歐洲返國。回國後歷任清華、北大、南開、中央政校、西南聯大等校教授。後服務外交界，先後擔任駐美公使，駐菲律賓、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教廷及馬爾他等國大使。

陳大使出身書香世家，是一位溫文儒雅、學者型的外交官。他於一九六九年三月抵達羅馬任所

<sup>17</sup>《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四一八。

時，中華民國在羅馬還有駐義大利大使館，由許紹昌大使主持。義大利北部的米蘭城也設有中華民國經濟部國貿局遠東貿易代表處和領事館。因此，駐梵蒂岡教廷大使館的事務比較單純。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義大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華民國撤走駐義大利大使館和領事館，遺下來的館務便由駐教廷大使館兼顧。當時的駐教廷大使亦兼駐馬爾他，所以業務突然增加許多。從此，陳之邁大使一人兼任數職。雖然如此，陳大使仍然沒有改其沉著的心境，義大利北部的事務平日都由米蘭遠東貿易代表處主任萬庚年先生坐鎮，萬主任係陳大使舊日清華的學生，故兩人彼此配合得很好。

義大利既與中華民國終止邦交，陳大使兼管義大利事務當屬非正式，雖然如此，義大利政府和教廷對此都相當諒解。陳大使也是有分寸的人，他的微妙處境並沒有令教廷和義大利政府感到尷尬。故中華民國與教廷、義大利和馬爾他的四邊關係都在極為平靜的氣氛中進行、渡過。

駐節梵蒂岡教廷七、八年後，陳大使已有倦意，加以健康狀況不佳，因此希望卸任回國。但教廷認為一動不如一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希望陳大使勉為其難，繼續留任。然而駐教廷大使一般都更替得很快，平均三年一任，一位駐節五年的大使已經不多，而且必然成為資深大使，何況八、九年的老資格，是以陳大使在外交團中已經成為坐三望二的老大使。當時的外交團長是瓜地馬拉大使，他資格最老，但年將屆八旬，且健康不佳，隨時可能出狀況。坐第二把交椅的是象牙海岸大使，他與本國總統私交良好，有可能隨時回國出任要職。面對教廷外交團這種不穩定的局勢，萬一出了事，陳大使很可能要擔任外交團團長。這對教廷、對外交團、對陳大使都是相當尷尬的事，因為與教廷維持外交關係的國家中，與中華民國保持邦交者不多，到時教廷和陳大使的處境勢必困

Cinese (遺稿 1979, Edizioni Mediterranee)。陳大使本身並不諳義文，其義文著作均由義籍顧問 Bosotto 博士由英文本譯成義大利文。陳夫人倒是講得一口流利的義大利文，英文更不在話下。她身材修長，喜著綠調旗袍或洋裝，在羅馬亦開一部深綠色德國國民小金龜車，自己行動，時而也來使館看陳大使，並坐在館員辦公室沙發上與同仁們閒話家常。陳大使總以「darling」稱之，兩人均以西方禮行見面親吻，並以英語交談。陳夫人一坐下來，拇指和食指間便夾著一根黑色細長的煙管抽起煙來，很像三十年代上海摩登女子，其實陳夫人也幾乎是那個時代的人。使館同仁都以「madam」稱她。

陳之邁大使於一九七八年一月卸任返國，同年十一月八日病逝台北。享年七十有一。陳大使過世後，陳夫人便移居澳洲至今。

## 第九章 中梵關係的山窮水盡與柳暗花明

一九七八年元月～一九八四年二月（周書楷大使任期一）

### 第一節 周書楷出使教廷，呈遞國書，教宗隱約表示對中國的關懷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中華民國行政院院會通過院長蔣經國提議，特任年六十四歲的政務委員，行政院對外事務小組召集人周書楷，接替陳之邁為駐教廷新任大使。當時周大使以其服務外交界四十餘年和歷任政府要職的經驗，對駐教廷新職雖然感到生疏，因為教廷外交與世界任何國家不盡相同，但仍充滿信心，相信以他的歷練必定游刃有餘。有以為周大使出使教廷係大才小用者，割雞焉用牛刀？亦有以為這項安排只是一時的權宜措施者，他日必大有可觀。

次年，一九七八年一月底，周大使抵達羅馬履新，此間華僑與大使館員對這位曾在國內政界和國際外交界風光一時的部長級大使均另眼看待，不敢隨便，咸以部長稱之。

一九七八年二月九日，周大使向保祿六世教宗呈遞到任國書，頌詞內容不外強調中華民族固有的倫理道德價值觀與天主教的教義不謀而合，雙方均重視和平的理念。教宗在致歡迎詞中，除了回

保祿六世去世，全球各地樞機主教急馳羅馬參與喪禮，並即刻入圍，展開選舉新教宗的大事。剛卸台北輔仁大學校長職一週的于斌樞機主教也於八月十日抵達羅馬。教宗喪禮畢，全球樞機主教正準備入圍梵蒂岡西斯汀聖堂，進行秘密選舉教宗事，詎料八月十六日于樞機主教竟也心臟病發，逝於羅馬中華聖母聖心修女會會院內。他的猝逝令周大使著實忙了一大陣。有云：于斌樞機主教頭大臉四方，係帝王像。果真不錯，他的葬禮在舉世無雙的羅馬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內舉行，當時前來羅馬參加教宗葬禮和選舉新教宗事務的全球樞機主教，也都參加了于樞機的葬禮，其極備哀榮之盛況僅次於教宗者。

八月二十六日，梵蒂岡西斯汀聖堂頂上小煙囱冒出白煙，眾樞機主教選出義大利水都威尼斯的宗主教阿爾比諾·魯恰尼（Albino Luciani）樞機主教為教宗，取名號若望保祿一世（John Paul I），表示彼感念前兩任教宗，即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祿六世的關愛和偉大，亦顯示其將承襲這兩位教宗的路線。豈知這位性情溫和、平易近人的教宗竟在當選後三十三天，九月二十八日深夜猝逝。

這接二連三的茶宗去世、喪禮，于樞機的去世、喪禮，新教宗選出和就職，新教宗的去世、喪禮，全球樞機主教在不到兩個月間又再次雲集羅馬選新教宗的驚動全球的種種事件，令仍在適應新環境的周大使疲於奔命，原來梵蒂岡一旦發生事故，其忙碌狀況竟是他始未料及。

選舉新教宗是人人關切的頭等大事，駐教廷使節更無不日夜到處探聽，分析誰將登上伯多祿宗徒的寶座，領導全球十億天主教徒的信仰。周大使自不例外，他遍詢各方人士，希望理出一點有關未來教宗可能人選的頭緒，以便傳回國內外外交部的電報，不至於和結果離譜太遠。周大使亦詢問筆者的看法，請圈出五位呼聲最高的人選。筆者拿起全球一百一十位樞機主教名單，逐一掃瞄一番，

如數圈出五位，第三位是波蘭克拉科夫（Krakow）總主教區的總主教卡洛·沃提瓦（Karol Wojtyła）樞機。十月十六日傍晚，梵蒂岡西斯汀聖堂煙囪終於冒出白煙，半個多小時後，出現在聖伯多祿大殿正面上方陽台上向全球致意的，竟是這位自稱為來自遠方的「卡洛·沃提瓦」樞機主教，他立刻取名號為若望保祿二世。

次日，周大使興匆匆地問筆者如何猜到這位他對我的「圈名」姑妄看之的人選。我其實以告：當時世界冷戰局勢的惡化很可能把人類帶向萬劫不復的絕境；全球共產無神論政權的氣燄高漲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中南美洲幾乎都陷入共產黨或左派勢力的掌握之中；西歐、尤其義大利的共產黨如日中天；西方傳統的思想和信仰價值岌岌可危，天主教這唯一對抗無神論的堡壘正陷入四面楚歌之中。面對這樣的危機，全球樞機主教們必定意識到教會絕對需要一位非常的領袖來領導，而具有這種才能魄力的領袖無法出自當時的西歐或美洲任何國家地區，因為這些國家地區沒有一位樞機主教具有面對共產世界的經驗和魄力。波蘭是全球天主教遭受共產政權壓迫最深、當地教會卻最團結一致、教會生活最興盛、最能形成氣候、敢與共產政府抗爭、天主教徒人數雖然不是最多、有二千七百萬、但所形成的力量全球沒有出其右者的國家。波蘭首都華沙的總主教維辛斯基（Stefan Wysinski）樞機主教是一位有號召力的人選，只不過已愈七十七高齡，恐有心餘力絀之虞，然其得意門生，克拉科夫的總主教卡洛·沃提瓦樞機雖嫌年輕些，五十八歲，卻是與共產政府有相當周旋經驗、深入認識共產思想體制的教會領袖之一。這些條件使卡洛·沃提瓦樞機主教脫穎而出。

周大使聽完筆者這席話，莞爾點頭而去。他想：一位出自共產世界的教宗，對中華民國的立場和堅持必定容易了解。實際上，當時台灣和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無不為此稱幸，咸認此乃「天助我也」！

## 第二節 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對華政策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就職後，給人的初步印象只是新鮮而已，沒有人敢對他遽下定論，大家都靜待他來日的作為。五十四天後，十二月十五日，美國宣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這對中華民國的外交是最嚴重的打擊，令親者恨，仇者快。美國的抉擇對教廷的對華政策亦發生潛在的影響。一九七一年十月下旬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時，即悄然離開台灣回教廷的葛錫迪大使，隨後即以兼駐中華民國之名常駐孟加拉。中美斷交後兩個月，教廷便任命駐孟加拉兼駐中華民國大使葛錫迪總主教為駐南非聯邦共和國大使。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葛錫迪大使終於回到台北辭行，卸下他心酸難過擔任了八年的駐中華民國掛名大使身份，黯然離去。他的告別開啟了教廷對中華民國外交關係新的一頁：一種設館、但僅派臨時代辦（*charge d'affaires ad interim*）、卻不改實質的外交關係。

當時，這位甫來自東歐的年輕教宗對教廷整體外交事務恐未完全掌握，如何因應對華政策或依代理國務卿卡薩羅里總主教<sup>2</sup>獻言裁決。以臨時代辦駐節台北料係卡薩羅里總主教的獻策。若望保祿二世當選後四個月，遠東出了不大不小的事，卻令全世界關懷：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沿中越邊界向越南發動全面攻擊。北京說這是對越南侵略柬埔寨行動的懲罰和教訓。對這

<sup>2</sup> 法籍國務卿讓·維約（Jean Villot）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九日去世，教宗任命國務院公共事務委員會秘書長卡薩羅里總主教為代理國務卿。六月三十日教宗擢升卡薩羅里為樞機主教，並真除國務卿。

場有限戰爭，教廷反應之快出人意料。事發次日，二月十八日，正逢星期天，若望保祿二世立刻在星期日中午例行的「三鐘經祈禱」活動講話中說：「一個新的事件從今天上午便左右每個人的心思：越南和中國邊界也燃起戰事。受苦的是人民，死亡的也是人。為了我們的這些弟兄，我們也虔誠祈禱。」

一個星期後，二月二十五日星期日，若望保祿二世在同一場合中對中越戰事發表更多更深刻的講話，他為中越戰事的加劇感到深痛，他認為生活在基督的愛中的人不能不為戰事所帶來的人命傷亡、財物損失、尤其是老弱婦孺病患所受的驚惶痛苦感到悲哀。教宗強調地理的距離和思想意識型態差異都不能削弱他和每個人的友愛情誼，即使他們不是天主教徒亦無妨，再說，交戰雙方可能也有同是信友者<sup>3</sup>。

若望保祿二世頭兩次公開觸及中國的事是不愉快的。此後他有六個月的時間不再談及中國，直到同年八月十九日他在羅馬南郊岡道爾夫堡夏宮渡暑期生活時，才又出人意料地談起中國。這次的談話可是非同小可，是他、也是歷任教宗第一次如此明顯地向中國教會、特別是向中國北京當局公開講話。他先說：

「過去幾個月，當中越邊界發生戰事時，我們都處在深深不安中，那些戰事不但傷害到那兩個高貴的國家的互相關係，對世界和平也構成威脅。當這個危險消除後，我們立即感謝天主。」

<sup>3</sup> *L'Attività della Santa Sede*, 1979, p.136, 150-151, Vaticano.



接著，教宗把話題轉入中國大陸，他說：

「我們不斷地為這個偉大的中華民族祈求天主，它是全球人口最眾多的民族。在過去，僅有極有限的中國人接受了基督的訓導。至一九四九年，中國信友已超過三百萬，中國聖統也有近一百位主教，其中約四十位為國籍主教。司鐸有五千八百位，其中兩千七百位為國籍神父。中國天主教是一個活躍的教會，並與宗座保持著密切的共融。三十年後，有關我們這些弟兄的消息簡而不詳，但我們從未停止期望能與他們重建在精神上未曾中斷過的直接聯繫。由於缺乏有形可見的關係，他們似乎不存在了，其實他們從未停止以特別的方式臨在我們的祈禱中。我們願盡一切可能，務使今天整個天主教會團體對他們所懷的思念和關懷能促成彼此的接近，進而相會。關於這個問題，難以多說，但有關最近的事實的一些消息或能令人想到對宗教的新的尊重，這使得我們敢於表達某種新的信心。我衷心祝禱能有積極的發展，使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兄弟姐妹享有完全宗教自由的可能。」<sup>4</sup>

若望保祿二世這算是首次真正向北京政府談到天主教在中國大陸的實際問題，他這席不亢不卑的話雖然僅如蜻蜓點水，但已經明顯地指出整個問題的所在和他的心願。次日，八月二十日，據聞卡薩羅里國務卿、教廷駐聯合國常任觀察員若望·凱利（Giovanni Cheli）總主教、天主教耶穌會總會會長佩德羅·阿魯佩（Pedro Arrupe）神父等要員開始在梵蒂岡檢討前年（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國籍耶穌會士朱勵德神父中國大陸之旅的結果<sup>5</sup>。而教廷駐紐約聯合國、駐法國、駐日內瓦

4 Ibid., p. 546; *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la Redazione Centrale* (梵蒂岡電台編輯中心通告), N. 1691, 1979.

5 朱勵德神父一九七九年從美國紐約調至羅馬，任耶穌會總會會長 Pedro Arrupe 神父遠東區參贊，同年六月二十九日從羅馬赴中國上海、北京等地探訪親友與同會會士，實地了解中國大陸狀況。據聞朱神父係拿美國護照進入中國的，

等地代表、以及教廷教會公共事務委員會新任秘書長（即日後的國務院與各國關係部門秘書長，亦即外長）西爾維斯特里尼總主教等，也在那個時期積極展開活動，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華國鋒訪問羅馬時，可能與教廷接觸做準備。毛澤東死後華國鋒時期的中國開始向西方探頭，希望掃除文化大革命的遺毒，打破過去的禁忌，對羅馬天主教會也不多加排拒，而羅馬教廷也認為這可能是個不能錯過的與北京中國建立接觸的良好機會<sup>6</sup>。十一月三日華國鋒抵達羅馬正式訪問義大利，但沒有與教廷接觸。

十二月二十二日，若望保祿二世按照梵蒂岡傳統，接見在羅馬的樞機主教、教廷部會首長及同仁，彼此祝賀聖誕佳節。教宗每在這個機會發表長篇談話，回顧一年來教會的生活經歷，並展望未來的工作使命。這次教宗的談話長達二十四頁，是他就任第一年的工作報告。他強調教會應該在平和的狀況下，在全球各地享有幫助其信友和司鐸的權利。他又說，教會如此要求，只因為它願意協助人，使人生活得更容易，提升人臻於享有人性和超性的尊嚴的境地。教宗在講話中當然也談到中國大陸的教會，他說：

「際此聖誕節將臨之日，我向這個偉大的國家的教會子女和全體成員寄上我特別誠摯的問候與祝賀，再次祝望他們有良好的發展，並使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兄弟姐妹能因此享有完全的宗教自

停留北京期間住宿在美國大使館。彼乃中共統治大陸後首位進入中國大陸的耶穌會士。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病逝台北耕莘醫院。

<sup>6</sup> *Enciclopedia universale FABBRI, di anno in anno 1980, p.216-217, Milano, Italia.*

由。」<sup>7</sup>

到此，若望保祿二世的對華政策大致確立。他比已故的保祿六世更明確、更直接、更中肯地對北京當局表明他對「人」、對「人性尊嚴」、對「宗教自由」的看法和他將努力的方向。的確，這位全球天主教領袖的中心思想是：人是教會的道路。這個思想主導著他今後領導普世教會的一切行動。他所頒佈的第一道通諭，「人類救主」通諭，主題內容就是這個。

### 第三節 鄧以明主教事件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就任第一年中，於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九日和十二月二十二日兩次發表對華政策後，便於次年，一九八〇年開始採取謹慎的投石問路的實際行動，而他的行動也獲得北京當局的善意回應。這年二月二十七日，法國馬賽總主教兼法國主教團團長埃切卡萊（Roger Etchegaray）樞機主教應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邀請，抵達中國作為期十七天的訪問，與中共多方面負責人士進行了廣泛的交談。三月十四日《大公報》報導說：「埃切卡萊樞機主教欣賞中國政府對宗教所採取的現實主義態度，他相信中國將給宗教以應有的地位。他認為雙方正以互相信任的精神，在友誼的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

<sup>7</sup> *Radiogiornale della Radio Vaticana* (梵蒂岡電台每日新聞稿), 22 dicembre 1979, *Il discorso del Papa per gli auguri natalizi, Vaticano*.

十月間，中共任命它所釋放的廣州署理主教鄧以明為廣州主教。不久，又准許他為健康理由赴香港暫居一年。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六日，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展開就任以來第一次遠東牧靈訪問旅行，前往巴基斯坦、菲律賓、美國關島、日本和美國阿拉斯加的阿克雷奇（Anchorage）等地。十八日那一天他在馬尼拉教廷大使館接見海內外中國天主教團體，向他們正式發表他就任以來第一篇以全中國為對象的重要講話。他說：

「在赴亞洲作牧靈訪問途中，能有機會給中國教友講話，我認為這確是一件極有意義、極重要的事。……透過你們在場的各位，我的思想延伸到所有生活在中國的人民；我並懷著喜樂和熱愛，向在這廣大土地上的基督內的每位兄弟姐妹們問候。」

「我，羅馬主教及伯多祿繼承人，若望保祿二世，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名，向在中國的親愛的兄弟姐妹們問候。……旅行到非常接近你們國家的邊界，我亦願向你們說幾句話，距離好似把我們隔離，但事實上，我們卻因主耶穌之名而結合在一起。……我這次來到亞洲作牧靈訪問，其特殊目的就是願意為聖神作見證，也就是來光榮長崎的致命者；並透過他們，我願意向在亞洲所有為耶穌的聖名捐軀的男女殉道者表達我最深的敬意。這些殉道者正證明：基督的福音及祂的教會正活在全世界各民族各國家人民的心靈和思想中，絕不排斥任何一個民族國家。」

「真的，你們的國家正在集中力量，從事建設未來，……我相信中國人民能生活在真正的幸福中。既然一個道地的忠實信徒必定同時是一個道地的優秀國民，因此我堅信貴國的每位天主教徒一定為中國的現代化貢獻出他的一份力量。一個基督信徒，不論他屬於哪個國家，他必對天主忠誠，同時對他的國家和同胞也有極深的責任感和極大的愛心。……一個優良的中國天主教徒忠誠致力於自己國

家的進步，他必定對父母家庭盡孝，對國家盡忠。」

「天主教會常致力於尊重每個民族的傳統精神和文化價值，……它要求你們珍視凡是真實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義的，凡是純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榮譽的。……基督福音不是某一個團體或某一個種族的專有品；福音是向每一個人宣講的，它屬於每一個人。因此，在作一個道地的基督信徒與作一個道地的中國人之間，絕對沒有絲毫的矛盾和不相容的地方。教會……並無任何其他企圖，它只是實踐它的創始者天主所賦予它的使命，它並無政治或經濟上的目的，或任何俗世的使命。在中國一如在其他國家，教會只願意是天主的宣講者而已。教會不企求任何特權，它只要求使那些追隨基督的人能自由而公開地表達他們的信仰，並本著他們的良心去生活。」

「各位親愛的兄弟姐妹們，正因為我感覺到和你們如此接近，我才向你們講了上述那些話，由於人為的因素所導致的歷史過程，使我們在這許多年中無法彼此接觸。……但是我願意你們知道，在目前為止的這一段長時間中，我和整個教會在思想中、祈禱中、真誠的兄弟友愛中、以及牧靈的關切中，常同你們在一起。」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使我們緊緊結合在一起的並不是有形的聯繫或政治性的聯盟，而是對天主聖子及人類救主、以及那位宣講「人人皆兄弟」者的信仰。」

「在此恩寵及改變的時刻，我說：向天主敞開你們的心靈理智吧！天主的上智指引著一切變故，並在這一切變故中實踐祂的計畫。從人的苦難中，甚至從人的軟弱和錯誤中，天主在創造新的成長。我由衷渴望不久將來的一天，我們終於能相聚共晤。」<sup>10</sup>

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講詞，從時機和內容看，都堪稱空前。鄧主教被中國政府釋放，旋又被中

10 參見《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四二一—四二五。

共任命為廣州主教不久，教廷百般思索，如何讓全球天主教領袖向中國大陸教會人士來一次清楚而徹底地表達普世天主教會對他們的關懷，並公正、有禮、不亢不卑地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表明教廷對中國的態度。從上面所節錄的教宗的幾段講話，已經可以看出教宗是多麼坦誠懇切地表露了他對整個中國的心意和祈望。任何善意的人士不能不為這篇講詞所動。

可是中國北京政府對教宗在馬尼拉發表的這篇講話並沒有積極的反應。事實上，中共對這樣的講話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反應，因為內容觸及的事物都與天主教信仰基本內容有密切的關係，而中共對這一切完全陌生，也不相信這一套，要它表明相對的意見無異緣木求魚。難怪它還是委任它的「天主教」發言人，北京的傅鐵山「主教」出面回應。可是傅鐵山這位「天主教人士」能對教宗這篇無懈可擊的講話說甚麼呢？還是那兩句話：「愛國會反對兩個中國政策，除非梵蒂岡先割斷與台灣的外交關係，否則不能與中共達成有意義的交談。」<sup>11</sup>

教宗於二月二十六日結束亞洲行，從日本長崎飛美國阿拉斯加首府安克雷奇返回羅馬時，隨他訪問亞洲的教廷國務卿卡薩羅里樞機主教應他派遣，於二十八日代表他專程飛赴香港慰問正在當地靜養的鄧以明署理主教<sup>12</sup>。事後兩人聯合舉行記者招待會，卡薩羅里樞機主教說：「教宗授命本人代表他特地來港見鄧主教。教宗願意藉著本人的訪問，特地表示他對中國教會和同胞以及對鄧主教的特殊關懷和敬意。在我和鄧主教的簡短晤談中，我們談及共同關切的問題，以及有關宗座和中國

<sup>11</sup> 見梁潔芬，〈中共與梵蒂岡關係：一九七六年～一九九四年〉（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頁三二一。

<sup>12</sup> *L'Attività della Santa Sede*, 1981, p.312, Vaicano.

教會的事情。」

四月三十日，鄧主教飛抵羅馬，教廷國務院教會公共事務委員會中國事務負責人艾萬·迪阿斯蒙席、教廷萬民福音部副秘書長兼主管中國事務的路易吉·吉多尼（Luigi Ghidoni）蒙席、耶穌會總會長阿魯佩神父、他的東亞地區助理拉旭（Robert Rush）神父等到機場迎接<sup>13</sup>。足見教廷對坐監二十二年的鄧主教的敬仰，或許對中共所「任命」的這位廣州「主教」亦有所倚重。當天中午，教宗便接見鄧主教，與之長叙。

鄧主教羅馬義大利之旅後，旋即前往美國加拿大探訪親友。六月六日上午十時，梵蒂岡電台接獲教廷國務院通知，謂教宗已於六月二日任命廣州署理主教為廣州總主教。此時，鄧總主教仍在美加旅行，尚未回到香港。電台便於中午發佈這個消息。梵蒂岡《羅馬觀察報》亦在當天下午出版的隔日報刊登載消息。次（七）日，義大利各報均報導這件事，並加以猜測和評論。一般均集中於這兩點：其一，教廷任命、提升廣州鄧以明署理主教為該教區總主教，必然獲得北京當局首肯。其二，由北京之首肯，可知教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某方面已獲致協議，這將使雙方關係邁向新的里程碑。

豈料教廷對鄧以明主教這項幾乎可以說是「追認」的作法，竟演出中共與教廷之間空前嚴重的外交衝突。照說，廣州教區原法籍總主教魏暢茂於一九五〇年回法國治病後，庇護十二世教宗旋任命鄧以明神父為署理主教。魏總主教於一九五二年病逝法國，鄧署理主教又於一九五八年入獄，直

<sup>13</sup> 同前。

到一九八〇年六月才獲釋。因此，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他被釋後任命他為廣州總主教，這當然合情合理。然而，中共於他被釋那年十月便先任命他為廣州「主教」，其用意為何實在難卜。有說教廷方面任命鄧署理主教為總主教，是對中共的任命予以承認，即承認中共此項任命的效果。料這對中共是一種善意的尊重，對中國人民也是一種榮譽和鼓勵，北京當局對此當感到稱心如意才是，至少可以滿足北京的「自尊心」。豈知後果正好相反，令教廷大惑不解。另有說中共雖然「任命」鄧以明為廣州主教，但教廷認為任命主教乃教廷專有的職權，故即使中共任命，教廷仍然要重新任命，以示正統，使鄧總主教在普世教會內沒有任何可疑之處。因此，即使中共事後發火，暴跳如雷，教廷也無悔不當初之憾。

教廷公佈任命鄧以明為廣州總主教消息五天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控制的愛國會等機構開始對鄧總主教口誅筆伐，發動總攻擊。「中國大陸主教團副團長、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副主席、愛國會副主席楊高堅主教在一個措詞強硬的官方聲明上，對梵蒂岡之任命指為干涉內政。繼而各省各市的愛國會召開會議，抗議教廷單方面委任鄧以明為總主教，並對教廷大加撻伐。第二期的愛國會刊物《中國天主教》……在全刊內四十一篇文章中，十三篇是直接對鄧主教的指責，更有人身攻擊者，隨著表示愛國會一貫的立場是與宗座脫離關係，過去如此，將來也如是。」<sup>14</sup>中國大陸官方教會這種反應與狂熱極端教派份子的作法雷同，絕對不像一個信仰基督的教會團體、即使是愛國會者、應該有的態度。北京傅鐵山「主教」甚至指委任鄧以明為總主教是「第二次的禮儀之爭」<sup>15</sup>。

<sup>14</sup> 參見梁潔芬，〈中共與梵蒂岡關係：一九七六年—一九九四年〉，頁三〇〇—三〇三。

<sup>15</sup> 同前，頁三一—二。



且不論羅馬教廷任命鄧以明為廣州總主教區總主教這個行為從天主教法典看是否合法，甚至是否如中國北京政府所說的「不合法」，究竟教廷這項任命有沒有事先照會北京政府？因為這畢竟是北京大肆評擊教廷的唯一理由。相信教廷是世界上最上在國際外交上周旋最早、也最有經驗的「國家」，它有世界最悠久、超過三百年歷史的外交學院，其處理外交之小心謹慎與設想之周密長遠，恐怕世界少有出其右者。對任命全球各地主教這種雞毛蒜皮、家常便飯的小事，教廷大概不至於有所忽略或出錯。是以鄧以明總主教的任命，很多人都相信教廷必定透過管道事先知會北京。「一名合眾社記者竟然指名道姓說：『梵蒂岡發言人潘奇羅利（R. Panciroli）神父表示，已經諮詢北京當局，且經過它同意任命這位年高七十三歲、坐牢二十二年的老主教。』根據一些秘密的報告稱，在這委任未公佈之前，通過法國駐羅馬大使館，中梵雙方之間有公文往還。最令人難以置信的就是，在委任公佈之前，法國高級外交官們已得知委任消息，而中共方面一口咬定事前一無所知。……但教廷國務院處理中國事務的負責人切利（Claudio Maria Celli）<sup>16</sup> 蒙席透露，在委任事件的前後期，所有由梵蒂岡經義、德、法、美等駐教廷大使遞交中共的書函，都原封不動退回。很可能退回的文件中，有關於委任的通知或意見徵詢的信件。若中國故意拒受函件，那麼梵蒂岡不應獨自承擔後果。」<sup>17</sup>

<sup>16</sup> 切利（Claudio Maria Celli）蒙席後來升任教廷國務院與各國關係副秘書長，即外交次長。一九九五年升任總主教，並擔任教廷財產管理處秘書長，但仍然掌管教廷國務院中國事務。曾多次赴北韓，亦曾至北京談教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問題。

<sup>17</sup> 同註14，頁三一四。

六月二十二日鄧以明總主教返抵香港。同一天，廣東省及廣州市天主教愛國會召開會議，一致決定撤銷鄧主教的廣州教區主教和廣州市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職務<sup>18</sup>。一個月後，七月二十五日，中共在北京南堂擴大舉行「祝聖」五位「主教」的行動。當天下午，中國宗教領袖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國務院副總理楊靜仁在會上對代表講話，表示中共當局不會讓中國大陸天主教會向梵蒂岡屈膝<sup>19</sup>。

相信中共黨中央不至於先徵求胡錦濤先生家屬的同意，才任命胡先生為黨的總書記。而胡先生的家屬若有異議，頂多只能勸胡先生不要接受職務，但絕不能、也無權向中共黨中央抗議或加以謾罵一頓。教廷任命中國大陸主教也是一樣的情景。須知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普世教會是處在全球主教團集體領導的狀況之下，而全球主教團乃是以羅馬教宗為其有形可見的團結一標記。是故教宗任命任何一個地方的主教，乃是以全球主教團的名義任命，而不是教宗有如帝王一樣地專制獨裁，為所欲為，更毫無帝國主義的意味。一個地方教會反對羅馬教宗，不論它有多充足的理由，也不論羅馬教宗有何錯誤，無異與全球普世教會作對，自外於至一、至聖、至公、由宗徒傳下來的天主教會。是以沒有資格再自稱為天主教會。

面對中國北京和它所操縱的愛國會與官方教會的暴烈反彈，教廷沒有任何反應。相信它有啞巴吃黃蓮之苦。畢竟，在歷史上，教廷吃過的暗虧多得很，來自中國大陸的悶棍不足為奇。所遺憾的

<sup>18</sup> 見註8。

<sup>19</sup> 梁潔芬，〈中共與梵蒂岡關係：一九七六年—一九九四年〉，頁三一七。

是它屢屢表示的善意都遭誤解或故意曲解。世界一般正常國家之間的外交往來，即使有不懷好意者，也不至於招致如此的侮辱，何況教廷一向只為對方國家人民的長遠好處著想，豈有帝國殖民主義的意識或意圖。教廷既無經濟實力，更無軍事力量，也不做此企圖。若有誰屢屢以尚有待專家學者研究證明的歷史事件或莫須有的罪名來指控今日之教廷，猶如以中國歷代對遠邦近鄰（西從俄羅斯，東到琉球）的欺壓來指控今日的中國一樣的頑固、幼稚和不識時務。

面對無法理喻的局勢，教廷常以其傳統固有的應對方式，緘默不言，因為損失的不是它，它也沒有可以損失的，而是對方。然基於它本身所負的、而且責無旁貸的謀求人類最終的幸福與和平的使命，它會轉而邀請全球各地的教會共同為這個一時無法溝通的國家和教會的處境祈禱，或透過其他適當的途徑和機會，向這個國家的政府表達心意，希望誤會及早消失，彼此共為謀求這個國家全體人民最大的益處而攜手合作。

#### 第四節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向中國大陸表達心聲，為當地教會祈禱

中國大陸對教廷任命鄧以明為廣州總主教的反應，是教廷始末料及的，也是若望保祿二世就任以來受自中國大陸最凶猛的衝擊，相信教宗為此內心受苦極深。從若望保祿二世就任兩年來教廷與中國大陸可以說是良性互動的關係看來，教廷絕對無意利用任命鄧以明主教之舉來與北京政府過意不去。奈何，當雙方之間只要一方缺乏真誠溝通的善意，再小的摩擦，甚至是善意，也會成為難以

彌補的爭端的絕好藉口。

事實證明，若望保祿二世之前的幾位教宗很少在公開場合提及中國大陸的事物及教會，所以北京當局也很少對教廷有這麼的表態。但這位來自東歐的教宗年富力強，對人類和普世教會有另一種看法，他行動積極，不願失落任何有利於教會合一和人類發展進步的機會。也因為他的創意創舉多，包括對中國大陸的主動建設性行為，因此招致中共反擊的機會也多。鄧以明主教事件只是中共一系列反擊中最明顯的一個而已。當然，教會不同於世界上任何政體或組織機構，教廷不會因為中國大陸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不友善態度而噤若寒蟬。相反的，它會因此更積極的想盡辦法，進行破冰的工作。

一九八二年元月六日主顯節，鄧以明總主教事件息聲半年後，若望保祿二世寫了一封給全球天主教主教的信。這封用拉丁文寫的信在元月二十三日公佈，目的在向中國人民預祝元月二十五日的新春之喜。教宗寫這封信的目的是邀請全世界的主教為中國教會祈禱。信中說：

「可敬的弟兄們……使我們像弟兄般團結一起的基督的愛，以及我身為普世教會最高牧人所肩負的重任，催促我與你們分擔我對中國教會的關切。大家都知道教會在中國的近況，我也確實知道你們各位不斷地為那偉大的國家的兄弟姐妹向天父和主耶穌基督作熱切的祈禱。……的確，當一個團體中無法藉著正常的方法保持彼此的聯繫時，我們常有祈禱的功能，……祈禱使希望的火苗常燃不熄。……因此，我要求你們祈禱，我要求你們在天主聖神內，與生活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的子女連結在一起。數十年來，我們與他們已很少有可見的關係。」

「……使弟兄們在真理和愛內合而為一，這本是聖伯多祿的羅馬宗座的主要任務。……羅馬教宗

主教會合一共融之下，度他們的信仰生活<sup>21</sup>。

教宗結束這台彌撒祭獻之後，按照星期日的慣例，在正午帶領聚集在聖伯多祿廣場的各國信友頌念三鐘經，並發表簡短談話。教宗說，他曾於今年元月寫信給全球主教，邀請他們為在中國的教會祈禱，希望在中國的教會與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普世教會保持有形可見的合一的條件受到保障。教宗又向中國大陸的信友表示，在心靈、情感和祈禱中，全球教會都和他們結合在一起。在整個教會的祈禱中，中國信友從來沒有被遺忘。教宗也趁這個機會再次祝賀全體中國人民繁榮、進步與平安<sup>22</sup>。

若望保祿二世在羅馬梵蒂岡舉行這台彌撒聖祭，立刻遭到中國大陸愛國會的猛烈反擊。愛國會在《新華通訊社》的一篇評論中對教宗為中國大陸教會舉行這項祈禱表示憤慨，指稱教宗詆譏中國教會遭受壓迫，認為教宗邀請全球為中國教會祈禱乃是侮辱、毀謗中國的行為。又說教宗一向對中國教友所表示的友好和關切，無非是欺騙的行徑<sup>23</sup>。

### 第五節 若望保祿二世在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利瑪竇抵華四百週年紀念會中致辭，勾畫出其中國政策

<sup>21</sup> Ibid., p.233-235.

<sup>22</sup> Ibid., p.235-236.

<sup>23</sup> 參見義大利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各大報（*Il Tempo, La Stampa, Il Giorno, Corriere della Sera* 等）。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六點，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蒞臨羅馬市中心宗座額我略大學，發表一篇很長的講話，為利瑪竇抵華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主持閉幕禮。這項研討會是由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和利瑪竇家鄉馬切拉塔（Macerata）大學聯合舉辦的。教宗這篇講話被視為他對外公開宣佈的對華政策的原始藍圖。

這篇長文百分之七十都在介紹利瑪竇如何充實自己的西方哲學、神學、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作為傳教的工具。在一五八二年抵華之後，又開始如何努力研習中國文化和風土民情，設法使西方知識和東方文明融會貫通，進而展示基督福音與中國文化是可以相輔相成、甚至相得益彰的。

講論利瑪竇在中國的生平事蹟之後，若望保祿二世開始做重要的結論，他說：

「利瑪竇神父深信，信仰基督不但不會對中國文化帶來任何損害，相反地，還足以使中國文化更充實，更完美。他的中國徒弟，其中有些日後成為政府要員，顯示他們深信，接納基督信仰不但不牽涉放棄自己的文化，也不減少對自己的國家和傳統的忠誠，而且還使他們給自己的國家提供更多和更有效的服務。」

「教會對每個民族的精神財富都很關心，對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中華民族當然不能不視為一個巨大和單一的實體，一個高尚傳統和生命動力的熔爐，也因此，是個巨大的希望。」

「根據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對話和開放精神，利瑪竇神父的傳教方法至今仍然切合時宜。……他成功地築起一座溝通教會與中國文化的橋樑，儘管誤會和困難曾在過去出現，甚至現今仍在發生，但這座橋樑仍然安全穩固。本人堅信教會正以大無畏的精神，朝著這條途徑走向未來。我們有信心能消除障礙，也能找到適當的方法及妥善的結構去恢復對話，並使之恆常保持。這樣，所有的中國

(Vittorino Colombo)<sup>26</sup> 和耶穌會總會長雅魯貝的諮議朱勵德神父兩人的精心策劃。結果便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意外蒞臨，他不但主持了會議的閉幕禮，更在會議中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講話。……二十年後（二〇〇一年），宗座額我略大學舉辦紀念利瑪竇到北京四百週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表書面講話，引起新聞界的極度驚訝。殊不知人們所驚訝的，竟是教宗上任之初早已宣佈的心願。外人或許不知道，立德神父的三哥勵德神父原是提議教廷與北京政府建交的。」<sup>27</sup>

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利瑪竇抵華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結束後六個多月，即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五日星期天，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在羅馬梵蒂岡聖伯多祿廣場，為天主教慈幼會（salesiani）在華殉道的兩位義大利籍會士主持宣福彌撒大典。這兩位殉道者是雷鳴道主教和高惠黎神父。教宗在列真福品彌撒大典講道中，把他去年在額我略大學利瑪竇抵華四百週年學術研討會中所說的話的精神要點又重複說了一次：

「教會，尤其從利瑪竇抵華後，一直誠心把福音的服務貢獻給偉大的中華民族。兩位殉道者的行動也就是這愛鍊上的一環。捨生致命不僅證明傳教士對天主的愛，也證明他們熱愛他們所服務的人民和國家。羅馬的教會奠基於伯多祿和保祿的鮮血上，兩位新真福所灑的血也不愧為中國教會的基礎。他們愛的見證與服務也顯示福音和中國文化及精神的價值深深相合。」

<sup>26</sup> 參見第八章註一。

<sup>27</sup> 見《滿面春風的僕人：朱勵德神父逝世五週年紀念》（台北：光啟文化事業，二〇〇二年十二月），頁十一。

民族、尤其是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中國，還有甚麼更方便直接的途徑呢？

既然「利瑪竇」是一座通往中國文化內心、尤其是與目前北京當局進行非官方接觸的最可能、也最體面的橋樑，就必須盡量加以發揮利用，以免萬一有朝一日連這座橋樑也被切斷的話，那就真是走投無路了。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七日，教廷國務卿卡薩羅里樞機主教應邀前往菲律賓馬尼拉，在當地主教座堂主持紀念利瑪竇抵華四百週年慶典活動開幕彌撒聖祭，並於前一日，十六日，接受馬尼拉大學（Ateneo de Manila）頒贈榮譽「人性」（Humanities）博士學位。卡薩羅里樞機主教在馬尼拉只發表兩篇正式講話，即彌撒講道詞和領取榮譽博士學位演講詞，後者以前者為依。在講道中，卡薩羅里樞機主教從耶穌基督在亞洲西陲誕生講起，以迄傳教士前往南亞、菲律賓、中南半島、日本和中國傳教為止的簡要歷史，以指出基督福音對亞洲人絕不是外來物。他並引述利瑪竇所翻譯的古羅馬名作家西塞祿（Cicerone）所著的「交友論」（De Amicitia），來說明基督信仰如何不以貌取人，而珍視真實的人性價值，即使非出自基督信仰者，亦然。從友誼而談到愛，他強調愛是傳教士使徒工作產生效果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民族之間合作的秘訣<sup>29</sup>。

同年，一九八三年九月十至十六日，在台灣的天主教主教團和輔仁大學聯合在圓山大飯店和故宮博物院舉行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會議，有八十位國內外專家學者參加，發表四十多篇論文，蔣經國總統發表書面賀辭，前總統嚴家淦蒞臨會場致開幕詞，若望保祿二

<sup>29</sup> 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la Redazione Centrale*, N. 3653, 3654, 9 sett. 1983.



世致賀電。十一月十三日，主教團又在台北中華體育館舉行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慶祝大會，一萬多名教友參加。大禮彌撒中，有四十名望教者受洗，貴賓中有代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教廷萬民福音部秘書長（次長），印度籍的盧杜沙彌總主教，韓國漢城的金壽煥樞機主教，日本大阪的安田久雄總主教，香港的胡振中主教，澳門的高秉常主教，西德主教團代表格伯主教，以及菲律賓主教團主席馬步達總主教等人。

這次慶祝大會，台灣的主教們原來希望教廷派一位樞機主教當教宗特使前來，而且若派米蘭的總主教馬蒂尼（Carlo Maria Martini）樞機前來可能最理想，因為這位樞機主教是耶穌會士，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學者，他是聖經學家，曾任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校長。豈知教廷僅派一位次長級為教宗代表與會，深令台灣主教們不滿。他們認為教廷居然派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務卿卡薩羅里樞機主教前往與利瑪竇不相干的馬尼拉，出席紀念利氏抵華慶典活動，而與利氏有直接關係的台灣的中華民國在舉行同樣、而且更為隆重盛大的兩次紀念慶典活動時，卻只得一名次要官員到場，這有極明顯的輕此重彼的嫌疑。

為此，台灣各教區主教於十一月十三和十四日兩天上午聚集在台北教廷駐華大使館，與教宗特使盧杜沙彌總主教舉行會談，每位主教逐一表達胸中之憤怒。會談後，全體主教在主教團秘書處開會，決定以兩次座談會記錄，由當時主教團主席羅光總主教和秘書長王愈榮主教簽名，作為備忘錄，每位主教對自己的談話亦簽名為證，請盧杜沙彌總主教特使面呈教宗<sup>30</sup>。

30 參見《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集編》，頁七二九。

相信台灣各教區主教與盧杜沙彌總主教談話的內容，當不僅限於教宗為何沒有派遣重量級的首長來台參與慶典的問題，特使級次人選應僅是冰山一角而已，蓋台灣的中華民國上下，尤其是教會人士，對教廷在公開場合對待「台灣」中華民國的態度積怨已久，盧杜沙彌總主教的來訪是積怨爆發的導火線而已。主持教廷外交的卡薩羅里國務卿和他的左右手一向主張關閉教廷在台北的大使館，改派宗座代表，而且限制台灣主教過問中國大陸教會和海外華人傳教的事務<sup>31</sup>。教廷傳媒機構在各方面都盡量避免提「中華民國」，必要時僅以「台灣」稱之。這些態度令台灣政教雙方都極為不滿。其實，教廷的這種態度作法在保祿六世時代已經決定，這位「教宗肯定保持與中華民國之外交關係，但暫時在政治和教會公開關係方面，將台灣蓋住，隱藏起來」<sup>32</sup>。

盧杜沙彌總主教回羅馬後，就把台灣主教們的反應秉告教宗。一九八四年正月二十日，教廷駐華使館代辦吉立友（Paul Giglio）蒙席約見台灣主教團主席羅光總主教，告以正月十六日在羅馬蒙教宗召見並用晚餐，席間有國務卿卡薩羅里樞機主教，教廷教會公共事務委員會秘書長（即外長）西爾維斯特里尼總主教。教宗表示閱讀台灣主教團之簽名記錄，心甚焦慮，決定邀請台灣主教或全體或代表往羅馬與教宗面談。吉立友蒙席請羅光總主教轉告主教團作決議。主教團常務委員會開會，決定由主席羅光總主教、台北教區總主教賈彥文、新竹主教劉獻堂、嘉義主教狄剛、台南主教成世光、高雄主教鄭天祥、花蓮主教單國璽七人赴羅馬。

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和二十七日下午，七位主教與教廷國務院主理外交事務的西爾維斯特里尼總

<sup>31</sup> 同前。

<sup>32</sup> 同前，頁七二五。

主教、萬民福音部（傳信部）秘書長盧杜沙彌秘書長開會，會議由西爾維斯特里尼總主教主持，彼即提議關閉駐台北的大使館，然遭全體主教反對。蓋教廷國務院對台灣主教有一種觀念，即台灣主教們自私，只為自己利益而堅持教廷必須與台灣維持外交關係，從不關心中國大陸教會事，因此，台灣的主教是教廷與中共建交的阻礙。台灣主教們則謂，大陸許多坐監的主教神父都是台灣主教的神長或同學，豈有不關心大陸教會的事？再說，台灣主教奉勸教廷對北京謹慎從事，目的只在提醒教廷不要誤以為中共與蘇聯東歐附庸國一樣，以免陷人後悔莫及的境地。如果教廷能保證其與中共來往建交能解決大陸天主教的問題，則台灣主教必不會反對。

了解台灣主教們的立場後，西爾維斯特里尼總主教即表示不再討論從台灣撤館的事，便把話題轉向應付大陸教會的辦法。羅光總主教於是代表台灣全體主教向教廷提出八項建議，其中第二項是造成國際輿論，使大家明瞭中共的宗教自由非天主教之自由。第四項是加強亞洲真理電台和梵蒂岡電台向大陸廣播。第五項是加強香港教區之忠貞精神。第六項是支持台灣教會培養聖召，預備向華僑和大陸傳教。第七項是讓教廷高級人員訪問台灣。

會後，當晚即由西爾維斯特里尼總主教呈報教宗。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台灣全體主教覲見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座談約半個小時後，教宗便率領台灣七位主教進入一大廳，那裡有旅居羅馬的中國神父、修女、修生和華僑教友約一百人。教宗操英語，發表「橋樑教會」的重要講話，要求台灣和海外華人，包括香港和澳門在內的教會團體，承擔教廷和普世教會與中國大陸教會之間的橋樑角色<sup>33</sup>。

33 同前，頁七二九、七三〇。

## 教宗說：

「今天我們的聚會不是一格偶然的事件，你們常在教宗心內，在教宗的祈禱之中，就像你們常與教宗結合在一起一樣。我知道經由這種精神的聯繫，使得與伯多祿繼承人的共融，成了歸屬於天主教會的準據，同時『按照很古的風紀，全世界的主教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與羅馬主教之間，經常在統一、愛德及和平的聯繫之下息息相通』（教會憲章二十二），繼續成爲一種傳統。」

「你們的來臨，也是去年你們在台灣慶祝利瑪竇神父來華四百週年結論的一部分，同時你們也正在籌備福音傳佈台灣一二五週年的慶祝。這是提醒大家的一次機會，使教會所有的人知道，信仰的生活常要求人根絕、放棄個人的利益，而要有個人的見證。你們和你們的信友都知道這點，因為你們曾面臨過很多的磨難，爲了保持你們信仰耶穌基督的完整寶藏。」

「你們並不願把這種信仰爲自己保留，因爲到你們那裡去的勇敢傳教士，曾教你們要將此信仰傳佈，並讓人分享。因此我對你們的慶祝方向表示滿意，你們並沒有只懷念過去，而決心以更堅實的方

式，將基督和祂的教會宣報給今日的中國人民。」

「因爲你們是中國人並以此爲榮，你們屬於一個偉大的民族，代表著四分之一的人類。中華民族之偉大，不但是由於它的人口，尤其是因爲它的文化和價值。你們也是一個勤勞的民族，你們對今日和明日的人類在和平與福祉方面的影響，是不能忽視的。教會對這樣一個民族，願意把有關天主和人的事與之分享。教會願意向此民族宣報它自宗徒們所領受的真理。」

「你們身爲中國的親愛子民，你們的任務是將信仰的訊息譯成你們遠近的同胞所能了解的語詞。爲教會來說，這不是個新的問題，教會自開始起，就必須知道如何把它的信仰和信仰的表達方式，與其週遭的文化相配合。這樣做，教會不但尊重其文化，而且從它汲取最好的因素。你們所慶祝的，在

你們中間傳教的傳教士們，就是這樣做法。他們同化了你們的富藏，並將他們自己的給予你們，為使在今世所能擁有的唯一寶藏，耶穌基督，能為人所認識，為人所愛。」

「今天，這根棒子已交在你們的手中，……而教會，猶如我在一九八二年紀念利瑪竇的國際會議開幕典禮中所說的，「既然敏於理解每個國家精神的恩賜，則不能不注視到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國人民是一個統一的實體，也是一個擁有崇高傳統及生命活力的融合體，同時它被視為偉大及富有前途的一種希望」。

「在台灣生活的教會特別對此事實開放，它並不故步自封，嘆息過去或充滿恐懼，它祈禱、聖化自己，並努力使聖道流傳而得到光榮。」

「你們在台灣和在海外的天主教教友，你們的美妙任務是做大陸同胞的「橋樑教會」，那裡暫時像埋藏在田裡的種子的其他基督信友兄弟姐妹們將接替下去。畢竟這一切努力和犧牲不會毫無結果，日子快到，那時將以更有形的方式，經由教會所敬愛的整個中國的文化、期望和期待，來宣報並慶祝耶穌。」<sup>34</sup>

當台灣主教們奉命前往羅馬會見教宗時，都有凶多吉少的不良預感，擔心此行可能要聆聽教宗發表與中華民國終止外交關係的決定。因此，每位主教抵達羅馬時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他們抵達羅馬後，除了安排和計畫與教廷各部門會晤的行程節目外，還用了很多時間祈禱，祈求天主幫助他們面對艱困時刻時，有明智的應對之道。據稱主教們在與教廷外交首長等人議論時，語氣和氣氛都極度緊張，有寧可玉碎不願瓦全這種背水一戰的決心，終於說服對方暫時擱置撤館的意念。主教們大

<sup>34</sup> *Acta Apostolicae Sedis*, 1984, p.666-670. (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 頁四二九~四三四, 台灣主教團秘書處譯。

概相信這是他們最後一次機會，維護中梵關係成敗關鍵均在此孤注一擲的危險、甚至攤牌行為之中。

台灣主教們在梵蒂岡與教廷國務院爭論的要點和激烈程度，或可從教宗發表「橋樑教會」這篇講詞中窺探到：教宗向在場的七位主教和教友們強調他們常在他心中；為了避免台灣教會與羅馬的疏遠，教宗重申與伯多祿繼承人共融是歸屬天主教會的準據；教宗召見台灣主教是慶祝利瑪竇抵華四百週年的一部分，何止是派遣一位次長赴台而已；信仰生活要求人根絕和放棄個人利益，主教們不應為自己利益而堅持中梵邦交；中華民族代表四分之一人類，教廷不能坐視；台灣的主教們既然堅持台灣的教會與大陸的教會關係密切，又不願教廷自做主張，因此，台灣和海外華人教會團體就得負起向自己的同胞傳揚福音的重任，擔任橋樑教會的角色。

台灣主教們這次突然應召前往羅馬的前後經歷，頗有山窮水盡和柳暗花明的經驗。在羅馬先後約十天的時日中，每位主教都身心疲憊不堪，事後還有幾位主教病倒。他們所得的結論是：此行最大的收穫是終於能夠與教宗和教廷首長們就困擾多年的中梵關係問題坦誠交談，彼此表達意見和立場。而教宗也認為這樣的交談很有益處，希望將來繼續能有此具建設性交談的機會。據有關神長稱：教宗向七位主教保證，教廷絕不會為了促使浪子（中國）回頭，而放棄忠信可愛的長子（台灣），而且，只要教廷與中共有任何重要來往，必先知會台灣的主教們。而台灣的主教們也深知教宗和教廷對中國的種種嘗試，目的只為使中國大陸的教會早日獲得信仰自由而已。因此，面對這樣的善意和崇高的目的，台灣的主教們認為，只要教廷能夠促使大陸教會自由，他們甚至可以犧牲小我，接受教廷與中國進行建交談判的行動，以玉成好事。

已故高雄鄭天祥總主教當年返台後，於四月三日寫信給筆者說：

「國雄先生台鑑：先後寄來函件均已收閱，謝謝您的關心。誠然，我們上月蒙教宗召見及與國務院重要官員交談，有甚大的成就及效果。雖然我們幾位主教均受感冒之苦（費總主教尚病在醫院），然能為中國教會貢獻棉力，促使教廷對我國維持現有之外文關係，深感欣慰。余想，倘我們不去羅馬，台灣與教廷之關係可能會改變，現在總算安定。雖然外面尚有許多外電謠言，那只是謠言而已，我們不必去顧慮它。未悉您以為然否？現在高雄教區正積極準備五月十三日之慶典，主教團亦正式去函請國務卿來高雄主持大典，不過他係政治家，可能不會來，但是傳信部羅西樞機已對余言，倘國務卿不來主持，他已決定來主持。惟此事尚有待教宗最後之決定，余想不久教廷會作決定，希吾人祈禱！……」。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即教宗委託「橋樑教會」的任務給台灣和海外的華人教會團體七個月後，「中華民國主教團」發表一篇「論中國教會一牧一棧」的牧函，作為對教宗委以重任拳拳服膺的回應。其中第三點有這麼幾段話說：

「本地教會和普世教會互相連繫，猶如一體，互通有無。我們中國教會接受全球其他教會的人力和財力支援，我們中國教會也派有中國神父和修女在別的教會工作，為普世傳教事業每年我們也捐助經費，這是教會唯一和至公的特性，並不是受人或給人的侵略。」

「中國教會傳統地常與教宗連繫，保持從屬關係，這是我們教會的信仰，為保全這種信仰，在大陸的主教、神父、信友，不惜犧牲一切，進勞改營，入監獄，被處死刑。因為若不能和教宗取得連繫，就是信仰不自由，我們必不屈不撓據理力爭。」

「在非常的時代，當事實上中國主教不能和教宗連繫時，主教們有許多自主之權，可以臨時自決，然不能公開否認教宗，破壞自己的信仰。」

「教會和教宗的關係為信仰的連繫，我們信教宗為首領，是信他為教會的首領，不是從政治去看。在中世紀時教宗擁有自己的國家，在歐洲的政壇上常有政治活動。但在十九世紀末葉失去了國家，現有的梵蒂岡市國，僅為一政權獨立的象徵，表示教宗不隸屬任何的國家政府，在國際政壇上絕無其他意義。教宗和各國政府的外交關係，純為謀該國教會的利益，而無任何政治、軍事、經濟、商業等現世利益的企圖。」

「大陸教會人士有人指責教宗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保持外交關係。這種關係不是教宗故意建立，而是原來在南京的公使遭中共驅逐處境，故轉來台灣。當時轉來台灣的大使館很多，後來因著各種不同的利益，許多國家和中共交涉，建立外交關係，乃撤去在台北的大使館。中共要求教宗撤去駐台北的大使館，卻拒絕和教廷先行交涉。教廷按照慣例，不自動撤去使館。而且中共表示，在教廷撤去駐台北使館，即使與教廷交涉，也決不容許大陸天主教會與教宗連繫。這樣，中共自己斷絕了交涉之路。大陸教會人士應明瞭教宗的苦衷，不應抱怨教宗放棄了他們。在中華民國的教會人士也應了解教宗試圖與中共接觸，是為了謀求大陸教會的利益；降低與中華民國的教會之關係，乃是減輕中共對大陸教會的壓力。」<sup>35</sup>

從牧函這幾段話，已經可以看出教廷對華政策的本質、用意和苦衷。如果不從這個角度來了解教廷對海峽兩岸整個中國的關係，則任何評論中梵關係的言論將缺乏根據，淪為膚淺，不著邊際。中梵三角關係過去約三十年憂多於喜的爭論，到一九八四年九月底應該獲得空前的澄清，畫下句點，跨進另一個新的里程。

<sup>35</sup> Ibid. . . 〈教友生活週刊〉，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第四版。



## 第十章 中梵關係的新了解

一九八四年三月—一九九一年四月（周書楷大使任期二）

### 第一節 方接「橋樑教會」棒，即吹來中梵外交突變風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天主教主教團，於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梵蒂岡從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手中接受「橋樑教會」的棒子後，七位主教們在傷風感冒、疲憊不堪的狀況下，先後取道不同國家城市返回台灣。羅光和賈彥文兩位總主教是最後於三月五日離開羅馬返台的。

翌日，三月六日，羅馬大報《時報》首版中央赫然出現一篇報導，標題是〈短期內聖座將在北京設代表〉，副題則為〈梵蒂岡正準備結束與台灣的外交關係，此乃北京與羅馬談判的先決條件〉。文章是該報駐梵蒂岡新聞記者奧拉吉奧·佩特羅西洛（Orazio Petrosillo）寫的。此後三兩天，義大利各日報也紛紛為文報導或評論這個消息。

正當台灣主教們帶著辛苦得來的戰果，欣慰地先後返台之際，從羅馬射來一枚重迫擊砲彈，讓他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大惑不解。原來這位採訪梵蒂岡新聞已有十數年資歷的名記者引用六個證據來支持他自己的論點：其一，元月十六日教宗接見教廷駐華代辦吉立友蒙席，已做此決定。其

教宗邀請台灣主教赴聖京，必為宣佈教廷與中華民國斷交事。其實，教宗是願意和台灣的中國主教交談，使雙方對中國教會的各種問題互相了解，共謀對策，而不是為結束教廷的一項決定。

除了羅光總主教這篇關謠的短文之外，駐教廷大使周書楷也於九日上午前往梵蒂岡，會晤國務次卿馬蒂內斯（Somalo Martinez）總主教，澄清此事。被告之中梵關係沒有任何改變。周大使於是答覆各方記者的詢問，謂《時報》的消息「荒謬，不足採信」，同時寫一封信給《時報》，要求更正。《時報》於九日刊登周大使的抗議書，同一記者又為文解釋，謂周大使的信是外交官正常的反應，可以了解，不足為奇。旅居羅馬數十年，擔任羅馬宗座傳信大學法學院院長的施森道蒙席<sup>1</sup>，也從那年六月七日起，在台北的《教友生活週刊》撰寫四篇〈正視「教廷與中國」〉的長文，分四期刊出，深入剖析羅馬《時報》揣測所引發的問題；更於次年，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在高雄《善導週刊》撰長文，進一步解說中梵關係的實際問題和個中玄妙之處。

此間羅馬和義大利各地，不乏熱衷為教廷和北京搭橋，樂見雙方及早建交的教會和傳媒界人士，他們常認為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和教會係教廷與中共交往的絆腳石，非早日去之不為快。或許此等人士所懷的是一番好意，希望經建交而使中國大陸的教會生活正常化，不再受制於中共。其實，他們並非不知道中共北京的宗教政策，只不過他們情願不去思索這些日後的問題，寧願看中梵外交三角關係的重大突破，以滿足一時的激情，以開眼界，甚或在歷史上留名而已。這是一廂情

<sup>1</sup> 施森道蒙席在傳信大學任教期間，也繼羅光總主教擔任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宗教顧問多年，並一度出任傳信大學副校長。

願、喜好新奇的事物、惟恐天下不亂的心理在作祟。對這些人士的獻言、奔走、倡議，教廷某些人士並非無動於衷，不做美好的憧憬。然有識之士在感謝這些人士的熱衷之餘，亦僅抱姑妄聽之的態度而已。對這空前複雜、詭譎、重要的大事，豈可輕信獻計人士的片面之詞和見地？豈能讓北京一方興風作浪，開盡條件？再說，教廷機要人員儘可進行沙盤演算作業，但最後決策者還是教宗。

報傳教廷將在北京設代表，並結束與台北關係的消息甚囂塵上，尚未落定時，若望保祿二世於三月八日上午十一時便接見教廷萬民福音部（舊稱傳信部）部長羅西樞機主教。據聞，萬民福音部因承認中國大陸二十一個教區的外籍傳教士主教應教宗邀請榮休，乃教宗示好中共之舉，故教宗召見羅西部長，對萬民福音部輕言表示不滿。

兩個半月後，五月二十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趙紫陽起程訪問包括義大利在內的歐洲六國前夕，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中指出：「現階段尚非與教廷改善關係的時刻。即使若望保祿二世在最近的言論中改變了某些立場，但問題仍然複雜，解決問題尚有待時日。」<sup>2</sup>

據聞：趙紫陽有一位叔輩親戚係天主教神父，故其對大陸天主教相當寬容，而這位叔輩神父也因這位侄輩總理而來去行動自如，並為大陸教會解決不少麻煩問題。是以教廷相信趙紫陽執政時期該是與中國北京改善關係的良好時機。詎料一九八九年五月間，中國青年和大學生開始抗議政府貶胡耀邦，並要求政府實行民主自由，旋即發生六月四日的天安門事件，趙紫陽總理被指責沒有魄力鎮壓示威青年，遂遭貶職。從此，他一蹶不振，消失政壇，而教廷所抱的一線希望也因此成了泡影。

2 AGI/API (〈義大利新聞通訊社〉與〈美聯社〉)，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北京電。

這年五月十二日，方於四月間卸任教廷萬民福音部部長職務，轉任教廷財產管理處處長的羅西樞機主教，以教宗特使身份抵台灣，並於翌日在高雄主持台灣開教一百二十五週年紀念慶典活動。羅西樞機主教攜來一封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致中國地區主教團主席羅光總主教的慰勉賀函。函中教宗表示：

「自然地，此時此刻我的心思亦想到生活在大中國另一邊的你們的兄弟姐妹，他們佔幾乎四分之一的人類，我對他們懷著特殊的關注和敬重。但就如你們最近訪問羅馬時，我適時向你們保證的一樣，當教宗向整個中華民族致辭時，他並沒有忘記你們，教宗非常關心地注意與你們有關的事件，他熱愛你們所有的人，並為你們祈禱。我誠盼及早在任何地方、並以外在的方式、重建合一與共融，這對我們作為天主教徒乃是主要的條件，也是我們信仰的特徵。」<sup>3</sup>

前面提及教宗於三月八日接見羅西樞機主教，料必對萬民福音部輕言教宗邀請大陸二十一外籍籍主教榮休係對中共示好的舉動表示不滿。然相信這次召見，亦為告知轉任負責管理教廷財務之新職，並委其為赴台特使。從教宗致羅光總主教函的字裡行間，可以聞出教宗已經警覺到台灣教會對教廷的對華政策的偏畸有所不滿，故教宗特別強調他在談論整個中華民族時，決沒有忘記台灣的意思。巴西籍的羅西樞機主教特別關愛台灣，他的私人秘書，曾任教廷《羅馬觀察報》葡萄牙文版主任，多次告訴筆者，在教宗主持的教廷要員會議中，羅西樞機主教屢次為台灣仗義執言。這次他以

<sup>3</sup> *L'Attività della Santa Sede*, 1984, p.567, Vaticano.

教宗特使身份赴台主持盛典，中華民國政府頒贈大綬景星勳章，台北輔仁大學亦頒以名譽哲學博士學位，此乃對他最起碼的敬意。

## 第二節 教宗與教廷鏗而不捨地向中國大陸敲門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日，若望保祿二世再度起程，經阿拉斯加的費爾班克斯（Fairbanks）至南韓，並赴南太平洋的巴布亞新幾內亞、薩莫亞和中南半島的泰國進行牧靈訪問。這是教宗第二次訪問南韓，目的在為韓國一百零三位殉道真福宣聖。宣聖列品彌撒大典於五月六日星期天上午在漢城的 Youido 大廣場舉行。典禮結束時，教宗照慣例帶領在場的信友頌念「天皇后喜樂」三鐘經，並發表簡短講話。其中，教宗提到中國大陸說：

「在這最大的喜樂時刻，我們不能不想到那些無法前來分享我們的喜樂的親愛的人，他們是生活在這塊土地北部、以及生活在中國的弟兄們，就是經由中國，韓國才認識基督的。我們為他們祈禱，讓他們繼續勇敢地為信德作證。」<sup>4</sup>

同一天下午，教宗在漢城天主教醫療中心為南韓全國天主教牧靈大會主持開幕禮。在致辭中，教宗盛讚十八世紀朝鮮的天主教徒雖然從中國接受基督信仰，卻能保持朝鮮民族固有的本質特色，

<sup>4</sup> 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la Redazione Centrale, N. 1074, 4 mag. 1984.

前外長黃華等要人。他在離開北京飛往廈門之前向記者說：他沒有帶來梵蒂岡與中國愛國會修和的任何訊息，不過他樂意協助在教會與中國文化之間搭建橋樑，因為這是至今看來仍然穩固和安全的途徑。

這個途徑正是若望保祿二世在耶穌會建議下所採取的東進中國的路線。中國北京當局基於政治考量，使教廷相信的這條途徑變得蜿蜒、崎嶇、漫長。辛海綿樞機主教在中國期間，曾試圖要求探望坐監的忠於教廷的上海主教龔品梅，並得答允。詎料時日將至時，突遭婉拒，並允以下次「再」會。

辛樞機主教訪問中國期間雖然態度十分友善，但亦沒有做出令教廷和普世教會難堪的舉動，一切都「中規中矩」。他訪問北京愛國會「主教」傅鐵山時，贈送給他一尊葡萄牙「法蒂瑪聖母像」，沒想到這份禮物引起一陣騷擾驚惶。次日，傅鐵山告訴辛樞機的秘書，下次最好帶別的聖母像相送，因為法蒂瑪聖母顯現時，曾號召世人「反共」。

辛海綿樞機主教返回馬尼拉後一個星期，十一月十一日，教廷官報《羅馬觀察報》刊登台灣中華民國主教團九月二十八日發表的「橋樑教會」牧函，羅馬《時報》記者奧拉吉奧·佩特羅西洛又做文章，指出「台灣主教向共產中國開放，以牧函疏導輿論，為教廷可能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發展鋪路」。一週後，十一月十八日，教廷國務卿卡薩羅里樞機主教在羅馬市中心的「諸聖宗徒」聖殿會晤義大利天主教企業界領導人士聯合會，為該聯合會成立四十週年主持彌撒禮儀，並在聚會後答覆新聞界人士的各種問題。

7 見《公教報》，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附上同一位記者的辯護、揣測和解讀性的文字<sup>8</sup>。

至於教廷國務卿和記者們的那些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的回應是：雖然有關聲明的正式消息尚未傳抵北京，但是中國的立場仍然不變，只要教廷承認台灣並繼續否認中國天主教的身份，則不能有關係的正常化。中共愛國會則暫時對此不發表意見<sup>9</sup>。

一場中梵外交關係小風暴又此趨於平靜。

### 第三節 一九八五年，中梵關係平靜的一年

教宗每年元月中旬總會接見駐教廷全體大使，通常總選在元月十三日，和他們彼此拜年，並在這個機會上發表他對世局的看法和期望。一九八五年元月十三日，若望保祿二世在接見外交團時，也稍微提到中國說：「除了中東和遠東常駐的使館之外，我們不能忘記其他的國家，尤其是巨大的中國，對它教會始終以尊重和關切的心情留意它的期望和活力。」

其實，當時在場的一百多位大使中，也有中華民國駐教廷的周書楷大使，他在教廷年鑑上是中國（CINA）大使，何以教宗說不能忘記中國？其實，在若望保祿二世這位教宗心中，中國、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都是一個巨大的整體。他和保祿六世教宗的看法不盡相同，保祿六世在他當時的國

<sup>8</sup> 見 *IL TEMPO*（羅馬《時報》），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九及廿四日兩版。

<sup>9</sup> 義大利 *ANSA*（《安莎》）通訊社，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北京電。

際局勢下，認為台灣與大陸是兩個分治的中國。但若望保祿二世則願意在觀念上認為中國只有一個，以免中共指控他持兩個中國立場，只不過他也承認當前的中國同時存在著兩個政府而已，這是中國人的內政問題，他不便過問。他當然也希望中國北京有代表在梵蒂岡。台灣中國人的大使代表的是台灣的中國人，台灣的中國人可以關懷大陸的中國人，但不代表大陸的中國，只要海峽兩岸的中華人一天不和睦相處，存有敵意，這個巨大的中華體就是不完整，就有問題，就令他關心。

除了國際外交、宗教人士訪問的活動外，教廷也透過科學技術合作與中國大陸接觸。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由耶穌會士主持的梵蒂岡天文台、羅馬大學以及中國大陸安徽省的合肥大學在羅馬簽署協定，成立「國際相對論天文物理學社」。代表合肥大學簽署的是中國著名的天文物理學家方勵之教授，他曾幾度來羅馬，亦親見過教宗，對教廷印象極佳，並促成中國大陸部分有關學者和學生到設於羅馬南郊岡道爾夫堡教宗夏宮內的梵蒂岡天文台研習。而梵蒂岡天文台也因為與中國天文物理學者的接觸，決定將架設在梵蒂岡天文台的雙倍天文照相儀，由合肥大學負責，遷移到中國新疆，進行天體觀察研究，因為羅馬空氣污染，岡道爾夫堡已不再適合於天體的觀察工作。

歷史上天主教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士，因為對天文物理的知識，而受到中國朝廷的器重，並在朝廷供職，間接地有助於在中國傳播福音的工作。今日，教廷仍然重用昔日的經驗，經由天文物理研究的途徑，與中國大陸接觸。但由於與中國當局交涉困難，北京又擔心教廷和西方學者因此深入中國內陸，甚至涉足新疆國防重地，致使教廷贈送雙倍天文照相儀給中國合肥大學的計畫胎死腹中。教廷隨之將這項觀察研究計畫移至美國阿里桑那州大學圖森（Tucson）的天文觀察台。據聞，後來亦曾擔任合肥大學校長的方勵之教授，曾因對北京處理天安門事件的手法有異議，而與夫人移



「在同一個御前樞密會議中，我也將公佈我在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的御前樞密會議中已經任命的、但保留在我心中的樞密主教，他是上海的依納爵龔品梅主教」。

教宗又說：

「從任命的名單中，有力地反映出教會的普世性。的確，新樞密主教中包括各洲的主教，他們或為宗座服務、或從事牧靈職務均有功。另有人則在艱困的時刻和條件下，為了忠於天主和教會，而付出受苦的高昂代價」<sup>12</sup>。

七月一日，擢升樞密主教大典翌日，教宗在梵蒂岡保祿六世大廳照例接見新樞密主教們和前來參禮的同胞親友，向他們致辭。在提到龔品梅樞密主教時，他說：

「您之參與星期五的御前樞密會議，乃是我就任教宗職之初，在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那次御前樞密會議中的夙願的實現。當時，我覺得整個教會不能不光榮一位在長期受苦和監禁中，以言以行為教會的生活本質作證的人。……閣下之晉升入樞密主教團，乃是對您在與伯多祿保持必要的共融上，所表現的謙虛的恆心毅力的敬意。」

教宗當著近萬人面前又說：

<sup>12</sup> *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 SEDOC* (梵蒂岡電台文件服務處通告), N.1157, 29 maggio 1991.

「藉著光榮您，教廷也光榮中國忠貞的教會。我是以何等虔誠的渴望和愛，留意忠貞的中國天主教團體的生活！我之所以從一九七九年便希望您成為樞機主教團的一員，乃是我對偉大的中國家庭由衷敬重、開放和善意的表示，這個心意至今猶然。我希望這件令整個教會喜悅的盛事，被視為我們渴望促進對話的標記，這樣的對話將有利於世界各民族之間的和諧與和平。……願天主降福偉大的中國家庭。」<sup>13</sup>

上海主教龔品梅從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被中共假釋，到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在羅馬被擢升為樞機主教為止的這六年間，大致在相當平靜的生活中度過。中國北京政府沒有像對待鄧以明總主教那樣地攻擊為難他。照說，教廷對龔品梅的厚待遠比鄧以明為隆重，但北京此番沒有甚麼反應，大概因為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使中共被全球孤立起來，因此噤若寒蟬，不敢非禮教廷。

龔品梅主教獲上海高等法院假釋三個星期後，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美國一家電視拍攝公司應中國電視台之邀，拍攝介紹世界各國風光片集途中，來到梵蒂岡。拍攝人員利用教宗每星期三例行的接見各國朝聖人士的機會拍攝部分景致，教宗也利用這個良好的機會以英語向中國人民致意。他再次表示「天主教會視中國是一個大的單一的事實，是高尚的傳統和生命活力的熔爐，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根源」。又說：

「教會樂見中國人民正在努力推動的現代化和進步。這也是利瑪竇與中國接觸時所懷的心情。我

<sup>13</sup> Ibid., N.1574, 1 luglio 1991.

深信中國的基督信徒，一如利瑪竇一樣，知道以福音所教導的，也是中國數世紀傳統所重視的品德，即正義、愛德、節制、謹慎、信實和忠誠，為自己的同胞的益處貢獻一己之力。我懷著這樣的心情，求天主豐厚地降福中國人民和他們追求幸福、進步與和平的種種計畫。」

若望保祿二世這番充滿敬意和祝福的話，與他一向對中國所表達的心意一致。這個（七）月三日，中國最著名的、因忠於羅馬教宗而坐監三十年的上海主教龔品梅的獲得上海高等法院假釋，可能也令教宗藉這個良好的機會，對中國當局說出這番一向友善、忠實和客氣的話。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在七月三十一日發表聲明表示：中國政府很重視教宗這番話，但因為梵蒂岡仍然干涉中國內政，並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所以梵蒂岡與北京之間的關係不能正常化<sup>14</sup>。

這年（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八日，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接見抵羅馬述職的中華民國台灣的全體主教。他向他們說：

「你們被召成為生命訊息的先驅，你們是以中國人的身份擔任此職，而且你們發現接受信仰絕不意味著要放棄你們的文化，更不是要你們減少對你們國家的忠誠和服務。相反地，信仰激發信徒做更合乎人性和更具專業的貢獻。……就因為你們是中國人，所以你們是中國大家庭天生的福音傳佈者」。

教宗在另一段又說：

<sup>14</sup> AGI/API，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電訊。

「與各位中國地區主教團主教相聚，無法不使我們想起在遼闊的中國大陸上的許多兄弟，他們在同一信仰中團結一致，被召為生命的聖言作見證。這個我所愛的教會一直在我心中，我每天懇求聖神，希望在排除各種不同的障礙之後，能使所期待的完全生活和表達出來，並使共融的時刻早日來臨。……去年我與你們會晤後，我託付給你們在台灣的牧人一個使命，即在台灣的教會應成為大陸中國教會兄弟們的信仰的生活見證。」<sup>15</sup>

## 第五節 教廷萬民福音部召開內部高層及專家會議，討論中國教會問題

教廷負責傳教區傳教工作、所以也負責在中國的傳教工作的萬民福音部，為了解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和宗教狀況，尤其是日漸複雜的天主教狀況，於是部部長董高（Jozef Tomko）樞機主教親自出面，邀請十二位中外專家，於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至六日在羅馬傳信大學舉行閉門會議。教廷國務院主管中國問題的高級人員，如教會公共事務委員會秘書長（外長）西爾維斯特里尼總主教，副秘書長巴基斯（Audrys Juozas Backis）蒙席、主管中國事務的切利蒙席，萬民福音部秘書長（次長）、菲籍的桑切斯（Jose Sanchez）總主教，該部主管中國傳教事務的吉多尼蒙席都列席

<sup>15</sup> 參見 *L'Attività della Santa Sede*, 1985, p.924-925, Vaticano. . . 及〈教宗向中國主教團主教致辭全文〉，《善導週刊》，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日版。

會中似乎有人提出上海「主教」金魯賢的地位與作用。金魯賢是愛國會推選出來的主教，他自稱不屬於愛國會。很多人、尤其是外國人、也都相信他的話，但勞達一神父不以為然，他認為在中國大陸那種政治體制下，一個由愛國會推選祝聖的主教，怎能不屬於愛國會？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有人以為可以「重用」金魯賢來做教廷與愛國會之間的橋樑，因為他們以為金魯賢是中國大陸天主教第三類的領導人，這第三類就是既不屬於愛國會，也不屬於地下忠於羅馬的教會。對這種想法勞達一神父期以為不可，他說金魯賢過去的身份不明，目前負責為中共在海外做宣傳，經常到香港、菲律賓和歐洲各國訪問，為中共說項。

勞達一神父在這項會議之後，回香港寫了一篇長文，刊載在義大利著名的《三十日》月刊（30 GIORNI）五月份一期中，詳細談論三月初在羅馬召開的會議和金魯賢的過去與現在，並駁斥某些人對中國大陸的不了解和一廂情願<sup>16</sup>。

三天會議並沒有事先得到明確的指示，也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的決定。與會專家所提供的消息並不會比教廷萬民福音部所掌握的更多，因為多少年來不斷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消息傳抵教廷，包括這幾位與會專家歷年來前往中國大陸訪問回來後所寫的個別報告。

<sup>16</sup> 30 GIORNI (《三十日》月刊), maggio 1986, p. 70-73。此月刊係義大利天主教在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各方面極具影響力的組織「共融與解放」(Comunione e Liberazione)所創辦，發行人為義大利政界耆宿安德雷奧蒂(Giulio Andreotti)，以多種語言在歐洲和拉丁美洲發行。IL TEMPO，一九八六年四月四日、五月七日。

念性談話之後一個半月，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上午，教廷國務卿卡薩羅里樞機主教依往年慣例，接受義大利天主教企業界領導人士聯合會的邀請，為他們在羅馬市中心的「諸聖宗徒」聖殿舉行彌撒禮儀。禮儀結束後，國務卿照歷年傳統，與新聞界進行非正式談話，回答記者所提的問題。那些問題大都與世界局勢和教廷的外交有關，而梵蒂岡與中國的關係總是記者喜愛發問的題目。這次當然也不例外。記者所提的問題不外：教廷最近與中國有沒有來往接觸？雙邊關係有沒有進展？

對這些問題，卡薩羅里樞機主教的答覆是：教廷與中共愛國會過接觸，但至今尚無顯著的成果。中共與梵蒂岡接觸、對話和改善關係的步調遠比梵蒂岡來得緩慢。但是對中國這樣一個國家來說，三、四年的時間算得了甚麼！<sup>18</sup>

十二月十六日台北《中央日報》第一版有《美聯社》的消息說「教廷與中共接觸」；十八日同一版又登「教廷駐華使館官員強調與我關係不變」。這位官員係教廷駐華代辦畢齊樂（Piero Biggio），彼在回教廷述職時，與當時高雄的鄭天祥總主教在筆者家中小聚時，亦如是肯定。他於一九九九年二月出任教廷駐北歐及冰島五國大使至今（二〇〇三年）。

這個月，義大利對教廷消息動態權威性刊物《三十日》月刊曾刊登一篇對天主教聖母聖心會比國傳教士，在台服務的中國問題專家韓德力神父訪談的長文。文中韓神父表示樂觀地預見教廷在不久的將來可能與中共簽署協定<sup>19</sup>。

<sup>18</sup>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義大利 *IL TEMPO* · *Il Giornale* (《日報》) · *Stampa Sera* (《新聞晚報》) 等報。

<sup>19</sup> *30 GIORNI*, dicembre 1986, p.30-39.

韓德力神父的訪談在先，卡薩羅里樞機主教對新聞界的談話在後，足見教廷與中共的關係不如韓神父預見的那麼樂觀。卡薩羅里國務卿對教廷與中共和中共愛國會的三角關係表示：「事情為我們來說既單純又複雜。說單純，因為只要他們（愛國會主教）接受聖統上的共融即可，別的不要太多的事」。至於有關愛國會某些主教已結婚的事，卡薩羅里國務卿表示：「這些特殊的問題是局勢造成的，真正問題的所在是共融的問題。」記者追問卡薩羅里樞機主教，說他在一九八一年赴香港會晤鄧以明主教的時候即表示：「今日非法之事，明日亦可成為合法者。」此即指中共愛國會主教非法接受祝聖之事。卡薩羅里答說：「是的，我記得曾說過這樣的話。我說那話的意思是要清楚說明一件事，即：一件事若為非法，但並非無效，則客觀地說，是有可能成為合法的。當然，那也需要有善意來接受它才行。」

從教廷國務卿的談話，可以看出教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沒有甚麼奇特難堪的要求，只不過大陸的天主教會和主教們與羅馬教宗在天主教聖統的隸屬關係內共融即可。教廷與中國北京多方試圖接觸、對話、甚至建交，其目的就是教會完整的共融合一。教廷的外交僅是達致這個目標的手段途徑之一而已，但是中共把教廷的手段途徑當作目的來處理。這是雙方關係難以突破的基本障礙。教廷之所以鏗而不捨、從不灰心地願意與中國北京對話，因為它深信只要具備坦誠和彼此信賴的基本態度，則一切都可以從交談中得到了解。再說，中國大陸天主教，不論是地下忠於羅馬教宗的教會團體或地上受中共指揮控制的官方教會，都是受政府壓迫的教會團體。對受迫害的地下教會，教廷絕對不能不日以繼夜地關切。

一九八八年元月十八日，若望保祿二世訪問設在羅馬市中心的義大利外籍新聞機構中心

(Stampa Estera in Italia)，與新聞界人士談到蘇聯和東歐各國受共產黨迫害的天主教會的狀況，他說：

「這裡的教會多少世紀以來一直都表現出對教廷和對羅馬主教的偉大忠貞。這樣的忠貞約束我們、在這個事情上尤其約束我、以同等的忠貞對待處在艱困局勢中的教會，這樣的教會實際上就是地下教會，被認為是非法的，不受到承認的。我們因此面對著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從教宗向國際新聞界隨口講出的這番沒有經過事前準備的話，可以看到身為普世天主教會領袖在中心是如何看待世界各地遭壓迫的天主教會團體，包括中國大陸受壓迫的天主教會，並視他們的處境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sup>20</sup>。

### 第七節 馬尼拉總主教辛海綿樞機二度訪問中國大陸

繼一九八四年十月首度訪問中國大陸之後，菲律賓天主教主教最具影響力的人物，華裔的馬尼拉總主教辛海綿樞機，又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友誼協會邀請，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日率領九人訪問團前往中國大陸進行十天的訪問。

十一月十一日，辛海綿樞機主教在下榻的北京中南海釣魚台賓館，接受中共新任總書記兼中華

<sup>20</sup> Radiogiornale della Radio Vaticana, 18 gennaio 1988.



人民共和國總理趙紫陽的拜訪，兩人交談一個小時，內容觸及北京與梵蒂岡的關係，中國大陸尚有一批未知數目的神職人員坐監等問題。趙紫陽大部分時間都在靜聽辛海綿樞機主教的談話。辛樞機曾要求探望部分遭監禁的神父，但不得要領。

辛樞機主教十一日當天在北京「主教座堂」一項禮儀中宣稱，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促進梵蒂岡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他在會晤趙紫陽之後，亦向一位美國記者說，他曾向趙紫陽提出某些促進北京與梵蒂岡關係和諧與彼此了解構想。根據辛樞機的了解，趙紫陽總理並沒有排斥北京與梵蒂岡建立關係的可能，惟必須理出這個意願的跡象。辛樞機說這些跡象已經顯示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文獻中了。

在前往中國大陸進行第二次訪問之前，辛海綿樞機主教曾在羅馬參加世界主教會議。他說他已經向教宗和教廷有關首長報告過他將再次前往中國大陸訪問，而教宗也祝福他此行。關於北京不斷批評教廷與台灣的中華民國保持外交關係的問題，辛海綿樞機主教向那位美國記者說：台灣的教會將會了解<sup>21</sup>。

辛樞機主教這句「台灣教會將會了解」的話，立刻引起台北新聞界的騷擾，《中央日報》記者谷季柔於十一月十六日打越洋電話向駐教廷周書楷大使探問究竟。周大使告以他當日已經晤見教廷主管外交事務的西爾維斯特里尼總主教，彼告知辛海綿樞機主教訪問中國大陸對中華民國與教廷的關係並無影響，又說辛樞機只代表菲國總統艾奎諾夫人訪問大陸，並不代表教廷。記者也詢問台北輔

21 ANSA 通訊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北京電訊。

大校長羅光總主教有關事宜。羅總主教表示：辛樞機並不能代表中華民國的教民，他的話不能獲得此間教友的同意。羅總主教說他將以私人信函向辛海綿樞機主教說明立場云<sup>22</sup>。

十一月十八日，法國巴黎《世界日報》(Le Monde)報導：「辛海綿樞機主教會晤趙紫陽總理後，覺得梵蒂岡承認台灣的問題在北京與教廷之間已不再構成問題。」這樣的報導立刻又引起台灣天主教人士的不滿。中華民國全國教友傳教協進會立即聯繫各教友團體舉行會商，決議聯名上書教宗，以表達中華民國教友對此事的關切。這份上書於十一月三十日送抵台北教廷駐華使館，請代辦畢齊樂蒙席轉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藉以反映教友的意見和立場。

十一月二十四日，辛海綿樞機主教發表一篇書面聲明略謂：

「我為了教會的好處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去。那裡有三百萬天主教徒處在艱困的環境之下。他們都需要探訪、談話、協助等等。台灣有三十萬天主教徒。我們必須兩者兼顧。……(訪問中國的)構想乃是顯示我們對過去五十年來遭忽略的基督信徒的關懷。對他們教會不能袖手旁觀。解決問題的關鍵就是與政府領導人坦誠交談。……與趙紫陽先生的談話主要集中於宗教問題。台灣問題可以解決。但願這是大家的期望。我從不代表任何人講話，既不為台灣的主教們、也不為梵蒂岡講話，我僅是表示我個人的意見而已。觸及台灣主教們的事，不是我在與趙先生談話時說的，而是在路透社記者的電話訪談中說的，記者問及與台灣現存的外交關係。我說在事情發生之前，必須先進行對話與諮商。……我的愛是為所有的中國人。教會關心所有每個人。」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日，全國教友傳教協會主席歐晉德先生接到教廷國務卿卡薩羅里樞機主教的覆函說：

「親愛的歐先生：很高興能轉告您，教宗已經收悉您與各教友團體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五日寄出的聯名信函。來信表示，因馬尼拉總主教辛海綿樞機的談話，引起了台灣地區教友們的若干反應，希望教宗予以重視；同時，您也就教廷與中共關係間之微妙而複雜的問題，提供許多意見。我願在此向您保證，我們對您的來函十分重視。您在心中表達了台灣絕大多數教友對教廷的忠誠。教宗特別指示我向你們轉達他深切的感激之情，他也懇請你們全體教友，都要在社會及教會中，不斷地為基督和福音作證，教宗並賜宗座特別遐福，祝佑各位。卡薩羅里樞機主教，一九八八年二月三日，梵蒂岡。」<sup>23</sup>

關於辛海綿樞機主教會晤趙紫陽總理後有關中梵關係的談話，北京外交部發言人立刻予以否認，並重申一貫的立場說：梵蒂岡如果願意和北京的關係正常化，就必須採取具體的措施，斷絕與台灣國民政府的外交關係，並終止干涉中國的內政<sup>24</sup>。

辛海綿樞機主教結束二度訪問中國大陸後，即派遣他的得力助手，羅馬耶穌會總會長中國傳教事務負責人，西班牙籍耶穌會士蘇樂康，以及亦陪同辛樞機訪問中國的非籍華裔銀行家高依內斯特(Ernest Go)二人為特使，來梵蒂岡向教廷報告中國行的經過。十二月五日上午，蘇樂康神父覲見了若望保祿二世，但是當天教宗的接見名單中並沒有列出他的名字，顯然教廷不願這事遭宣揚。

<sup>23</sup> 《善導週刊》，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三日。

<sup>24</sup> *Le Monde* (巴黎《世界日報》)，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十二月九日，蘇樂康神父接受梵蒂岡電台訪問說：「辛樞機主教與趙紫陽總理談話時，也談到與教廷的關係。趙紫陽說中國願意與教廷有好的關係。其他的話題也觸及台灣問題，不干涉內政問題，尊重少數宗教問題等……。中國與教廷建立關係提出的條件是必須先解決台灣問題，然後是不干涉內政問題……。」

十二月十三日，教廷國務卿卡薩羅里樞機主教又照往年慣例，應邀在羅馬「諸聖宗徒」聖殿為義大利天主教企業界領導人士主持彌撒禮儀，並與新聞界交談，席間他就辛海綿樞機主教訪問中國大陸的事說：「辛樞機主教是一位好的訊使，他以他的和藹可親衝破許多障礙。」

羅馬《三十日》月刊一九八八年元月份一期刊登長文，談辛樞機訪問中國大陸事，其中提到辛樞機遣來羅馬的兩位特使向教廷保證，中國北京已經願意與教廷進行非正式但直接的對話，而且不再要求教廷先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作為其與教廷對話的先決條件。

元月九日，《義大利新聞通訊社》(AGI)引述梵蒂岡教廷不願透露姓名的高層人士的話說：「梵蒂岡並沒有得到如《三十日》月刊所說的，來自中國的任何有關不要求先與台灣斷交作為與教廷對話的前提的回應」。義大利天主教主教團創辦的《前途報》(L'AVVENIRE)同一天也寫說：「不但梵蒂岡沒有得到任何類似的訊息，就連辛樞機主教尚在北京訪問時，中國外交部已在十一月十四日重申：梵蒂岡必須採取實際措施，割斷與台灣關係。」《三十日》月刊當天立刻澄清說：「它的報導只不過引述辛樞機主教上個月（十二月）派來羅馬的兩位特使向教廷外交事務負責人所說的話而已。」

辛海綿樞機主教懷著一片善心誠意二次訪問中國大陸，這次終於在上海愛國會出面宴請的一次

教廷發言人納瓦羅 (Joaquin Navarro Valls) 博士就這兩位候任的樞機主教說：這兩項任命為未來的時代是精確的選擇，這並不只是象徵性的任命，而是具有實質的意義，是為未來的教會作準備<sup>25</sup>。

胡主教在教宗宣佈任命後，於五月三十一日對香港新聞界表示：他很榮幸能夠協助教宗改善梵蒂岡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他又說：「既為中國人，又身處香港，使我處於較佳的位置，能提供意見。能這樣做，我深感榮幸。」<sup>26</sup>

中國北京對胡振中主教擢升為樞機也做出反應，愛國會副主席湯履道六月四日向《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說：「這件事對中國大陸教會和教廷關係的重建沒有任何不良的影響。中國大陸教會和梵蒂岡還沒有任何關係，胡主教的這項新任命是香港教會和教廷自己的事，我們將不會干涉……我們尊重香港教會的獨立自主權。」<sup>27</sup>

上海金魯賢「主教」對香港天主教實血會修女，嶺南大學政治及社會學系副教授梁潔芬博士說：「教廷冊封他（胡主教）為樞機一事，在將來可能成為一個敏感的問題。據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中明列，中港兩地的民間團體，包括教會團體，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互相平等交往。當胡主教被擢升為樞機後，他將會成為台灣主教團及香港主教之首。但是依中英聯合聲明之規定，他不能順理成章地作為中國大陸主教團之首。似乎教宗有點錯誤理解大陸之實況，一九九七年前擢升胡

<sup>25</sup> 《教友生活週刊》，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六日。

<sup>26</sup> 同前。

<sup>27</sup> 同前，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主教為樞機，藉胡樞機向大陸教會施加壓力。」<sup>28</sup>

胡樞機主教在羅馬接受擢升為樞機後，於七月八日返抵香港。他告訴《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說：「教廷國務卿卡薩羅里樞機主教對他說，教廷與北京在這年年初已經開始進行間接的有關關係正常化的接觸。」不過胡樞機表示，他無法說在這年內談判是否會有突破，因為美國和北京的談判持續了三年之久才達成關係的正常化。雖然如此，胡樞機還是指出：北京與教廷的談判很複雜，因為有愛國會和中國自選自聖主教的問題存在。胡樞機又說：教宗告訴他和香港參禮團，樞機的工作是宗教和牧靈職務，而非政治或世俗任務<sup>29</sup>。

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國大陸天主教愛國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慶祝大陸主教自選自聖三十週年慶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吳學謙對在場的人士說：「中國大陸的宗教事務是中國內部的事，不該受制於外來的干預。」他又說：「唯有梵蒂岡與台灣斷絕所謂的外交關係，並承認中共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而且也停止干預中國內政，包括宗教事務在內，雙方的關係才能改善。梵蒂岡應該在這方面採取具體的行動。」<sup>30</sup>

一九八八年是若望保祿二世制定的聖母聖年，在這一年內，教宗在每個星期日中午帶領信友頌念三鐘經的機會上，都向群眾介紹一個世界聞名的聖母朝聖地。八月二十一日星期日當天中午，教宗在岡道爾夫堡夏宮就向聚集在庭院內外的各國信友介紹了中國上海附近佘山聖母朝聖地。他先簡

<sup>28</sup> 《公教報》，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

<sup>29</sup> 《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三日。

<sup>30</sup> 《教友生活週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要地敘述了這個朝聖地的地理位置、氣候、歷史和建築。由於佘山腳下附近有很多小河流，許多漁民就生活在漁舟上，他們大多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每年五月敬禮聖母的月份，有許多遠近的信友都泛舟前來這個山明水秀的地方朝聖，倍增宗教上的詩情畫意。教宗最後說：

「在這聖母年中，朝聖人士每個月不絕於途地前來此地朝聖。我願意在精神上加入中國信友的朝聖行列，邀請他們為我祈禱。我並和他們一起呈上我對佘山聖母的孝愛之情，同時把我對整個教會，尤其是對在中國的教會的關懷、託付給她。」<sup>31</sup>

## 第九節 教宗致函全球主教談有關中國大陸教會的八點指示

一九八八年春，教廷萬民福音部根據一九八六年三月在羅馬傳信大學召開的、有關中國大陸教會狀況的內部高層研討會結論，以及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馬尼拉辛海綿樞機主教二度訪問中國大陸的報告和其他資料，撰寫了一份三頁的機密文件，寄給中國大陸以外地區與中國大陸教會關係最密切的中國主教們（台灣、香港、澳門）和其他與大陸教會比較有直接關係的主教。同年夏季，教廷該部又將此機密文件寄給義大利每位主教。此後，這份義大利主教們收到的文件竟然在義大利某些刊物披露出來，接著又很快地在香港完全曝光，並在中國大陸引起非常惡劣的反應，同時給中國

<sup>31</sup> *L'Attività della Santa Sede*, 1988, p. 692, Vaticano.

1. 與教宗共融這不僅是紀律上的問題，更是天主教信仰的問題，因此，凡是不宣認、不保持與教宗共融者，不能被視為天主教徒。
2.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官方的章程和聲明文件最近也肯定愛國會原始的意向，放棄與教宗和教廷的基本關係，並把信友團體置於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雖然其要員最近採取的某些立場，似乎顯示態度上的某些改變，而且採取更傾向政治而非宗教的立場，愛國會至今仍設法操縱主教的遴選和祝聖，以及教區團體的活動。為此，一個天主教徒在良心上不能接受愛國會的原則。
3. 愛國會自一九五八年起在中國進行的主教祝聖行為，該被視為嚴重的非法之舉，因為缺乏來自教宗的必要委任命。
4. 沒有受到教宗承認的主教所行的祝聖神父的行為及其所行的祝聖聖事，或許有效。信友們為了神益的需要，可以求助這樣的神父，條件是避免立下惡表的機會和危害信仰的正確觀念。
5. 必須避免任何「聖事上的共融」。「愛國會」的主教和神父不能被允許當眾舉行宗教禮儀活動。
6. 準備晉升司鐸的修生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可以送到愛國會所控制的修院，條件是這所修院的整個方向和所授的培育跟隨教會的訓導和指示。
7. 聖書、禮儀和要理書籍，只有在忠實地合乎教會的教義時，才可以使用。
8. 那些對天主教信仰的正確教義和精神不敢肯定的人，對他們的幫助必須個別審度，視其合作的精神態度而定。

自從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逐漸對外開放，西方人士，包括宗教界人士，尤其是天主教人士，前往大陸訪問的越來越多。這些教會人士到中國大陸的主要目的，是為探訪慰問遭壓迫三十年



之久的忠於羅馬教宗的地下教會的兄弟姐妹。然而，他們並無法接觸到地下教會的教友。北京當局每次派遣專人陪同外賓訪客訪問政府認可的屬於公開教會的機構和人士。因此，西方對中國大陸天主教的實況也無法完全掌握和了解。他們所看所聽的，都是官方教會的一面。而有許多外國人士也善意地和官方教會人士接觸來往，甚至邀請他們到國外歐美訪問，他們也從國外得到無數的財物幫助。相形之下，大陸的開放反而給一向受苦的地下教會帶來更深的精神打擊和孤立，因為讓地上官方教會佔盡他們的便宜。馬尼拉的辛海綿樞機主教兩次受邀訪問大陸，並沒有得到允許探訪地下教會的兄弟姐妹，也無法探望坐監的神父和教友，更遑論法國馬賽的埃切卡萊樞機主教和奧地利維也納的科尼格樞機主教的大陸之旅能有甚麼實質的意義和效果。辛海綿樞機主教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國大陸之行，在上海總算在愛國會的餐會中遇見了遭監禁三十年的上海主教龔品梅，但那時的龔主教已經是被釋放了，而且由愛國會「看管」。至於其他在地位身份上等而下之的教會神長和教友，若期望能在大陸真正光明正大訪問地下教會者，那豈不是異想天開！

再說，不少教會人士，包括神職人員在內，他們對教義和教會法典缺乏正確了解，訪問大陸時，不免言行失當，給教會內外造成極大的困擾和誤會。這都給教會帶來重大的損害。基於這些重要的因素，教廷萬民福音部和國務院負責外交部門聯合撰寫這份機密文件給全球主教們，希望他們也指示本地神職和教友在訪問中國大陸時，應留意這些基本事項。

## 第十節 中華民國政府正式邀請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訪問台灣

這或許也可以稱為中華民國與梵蒂岡教廷外交關係歷史上頭一件的小摩擦。

這一年，若望保祿二世正積極準備四度訪問亞洲太平洋，而且是二度牧靈訪問南韓。過去，教宗三訪亞洲太平洋地區，過台灣門而不入，咸令全球人士驚訝，他們以為教廷大概會超越現世政治的紛爭，不使超性的宗教牧靈職責受制於世俗政治強權。當然，他們也都知道教廷為什麼安排教宗的座機繞道，以避免進入台灣的中華民國所控制的飛航管制區，否則教宗必須向中華民國總統做禮貌上的致電問候，無形中便刺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政治敏感。

然而，教宗也不是不知道他這樣的旅行方式實在彆扭，不合乎情理，不稱心愉快，不合乎教會慈母的尊嚴。為什麼他不能安心地、毫無顧忌地、一視同仁地、不必看強權的顏面地去探望教會的子女呢？來自教廷的理由是：避免北京政府藉口迫害中國大陸的天主教徒。由此可見教廷面對的是個敢於做親者恨、仇者快的事、而且以迫害骨肉以長自己對外威風的政權。面對這種不知如何是好的局面，教宗實在有口難言。

試想，對世界幾乎任何國家地區的社會政治狀況，教宗都能說出中肯的話，即令面對世界首強的美國，他仍能在羅馬、或在美國各地牧靈訪問時，如心所願地、按照人類自然本性和天主教的信仰教義，恰如其分地指出國家政府對人民和對世界人類的義務，以及社會應循的道路和國民應守的倫理道德規範。偏偏面對自稱世界文明古國、歷史悠久、文化發達的中國，他有話而不能直說，這種如梗在喉、憋在心頭數十年的痛苦，實在是當今人類共同景仰的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的終身遺憾。尤其是中國人的悲哀。

為了消解心中的鬱悶，為了釋解中國大陸的困結，這位教宗多次寫信給全球主教，邀請他們為

中國大陸的教會祈禱，他自己更多次在梵蒂岡為中國大陸主持有關的祈禱，或透過他的梵蒂岡電台，直接向中國大陸講話。然而，從公開的消息上，從來看不出北京當局對羅馬教宗誠懇而客氣的談話有甚麼積極良好的回應。這讓人直覺感到北京政府的不可理喻。北京當局或許內心想的和外在表現的不一樣，但是數十年來一向如此，則還能讓世人對它懷抱甚麼希望？再說，教廷也不是洪水猛獸，更不是帝國主義，遑論霸權，有甚麼值得北京政府在政治和國際外交上與它玩弄手法？國際外交的上乘是雙方得益，下乘是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的受害之上，最愚蠢的莫過於雙方蒙受其害。我有時懷疑中國這個民族是不是有問題？

梵蒂岡教廷的外交世界絕無僅有，它只尋求對方真正且持久的利益，它的外交最終目標是對方國家人民的幸福，但以該國的天主教團體為其首要服務的對象。教廷希望每個國家的天主教徒按照基督福音的博愛精神生活，進而成為社會的酵母，帶動整個國家社會的均衡發展和進步。最後，本著己立而立人，己達而達人的大公精神，促進整個世界的和諧與進步。教廷既不貪對方的錢，更不圖對方的勢。如果有國家政權對教廷的這種處世外交原則有所顧忌，那大概是它自己有無可告人的隱憂。如果是這樣，它實在沒有執政的光彩可言。

世界公認的人類精神領袖，羅馬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已經三次蒞臨亞太地區，帶給這裡的居民和平與希望的訊息。但是號稱為最具生活智慧的炎黃子孫，由於自作梗，而無法歡迎這樣一位大公無私的良善牧人光臨，以光耀自己的門面，讓國民沐浴他帶來的恩澤。這實在是全體中國人的一大損失。難道中國人堪當不起教宗的幸臨？

教宗的長途牧靈訪問行程一般都在一年之前便決定。一九八九年十月的南韓與印尼之行早在一

九八八年便定案。這年春夏之交，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向筆者詢及如何面邀教宗訪問台灣。筆者告知事情很簡單，只要國內主教團和國家元首出具書面邀請函即可。但鑒於時間緊迫，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希望教宗一九八九年十月訪問南韓後，南下前往印尼途中，在台灣稍做停留即可，所以筆者建議大使館即刻呈請台北外交部急速著手，請總統府發邀請函，並請主教團派主席或代表，專程飛來羅馬，當面呈請教宗光臨台灣。筆者說：大使或政府要員不一定能夠見到教宗，但是一國的主教團主席或代表要求覲見教宗，教宗絕對會接見。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五日，台北中華民國總統府秘書長李元簇電話約見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校長羅光總主教。十一月七日，羅總主教又往外交部與連戰部長談話一小時，談李登輝總統邀請他攜其親筆書往羅馬，面邀教宗訪問韓國和印尼時，在台灣小停。十二月八日下午，羅總主教往見李登輝總統，談話四十分鐘。次日，李總統親筆信送至羅總主教在天母的牧廬。又次日，羅總主教起程，十日飛抵羅馬，即往梵蒂岡教廷國務院，見教宗府總長，確定覲見教宗時日。十四日，羅總主教見了曾任駐華大使的副國務卿葛錫迪總主教，又見了國務院主管外交的索達諾總主教。十二月十六日，羅總主教覲見了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教宗表情沉重，他說已經看過所呈的邀請函。然而為訪問台灣，時局仍未成熟，因為教廷無論如何說明訪問台灣的理由，中共仍然會認為此舉乃在分裂中國。羅總主教向教宗反覆解說小停方式，但教宗都表示有難言之苦衷，不過將研究一個方法，使雙方都有均等的待遇。此即來日教宗赴韓國時，將飛越大陸和台灣領空，屆時教宗將致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中華民國總統<sup>34</sup>。無奈，義大利航空公司向北京當局申請教宗專機飛越大陸許可時，遭

34 《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七三〇。

中國的政情，並做教廷與中國大陸教會溝通的官方橋樑。教廷這位外交官也來得正是時候，因為中國大陸青年和大學生正開始醞釀民主運動，成千上萬的各地青年正從大陸四面八方湧向北京，一方面為胡耀邦的下台要求平反，另一方面要求中國大陸實施民主政治。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預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命運的可能轉捩點，無奈，這個機運卻落入東歐諸國和廣大的蘇聯手中，間接地為東歐的復活助了一臂之力，而中國卻失之交臂，甚至付出了千百人、甚至上萬人的血肉生命。

## 第十一節 教廷對北京天安門事件的反應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教廷官報《羅馬觀察報》的社論就中國大陸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靜坐北京天安門，要求中共政府改革開放和推行民主政治的示威運動發表評論說：

「全球注意力的焦點集中在被人山人海的青年學生所佔滿的北京天安門。這些青年學生要求政治革新，讓人民有自由和參政的機會。一道人牆堅決地保護著他們免受多次被認為即將來臨的鎮壓。軍方長期以來猶豫是否採取粗暴的武力行動，來制止新一代要走的路。……執政人士也對這事意見分歧。學生們聽到執政人士（或對立的權力派別）加給他們的名號「新革命者」或「反革命者」。……但是學生們首先要求不受到意識型態的利用與合乎時代的政治。這新一代用他們的勇敢、堅決、風格和對民主與開明的渴望，似乎已經寫下了歷史的一頁。他們因此結束了偶像崇拜的時代，他們在對立和受苦中所奔跑的路，不能不發生長遠的影響。」<sup>39</sup>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若望保祿二世起程前往北歐和冰島等五國進行為期十天的牧靈訪問旅行。六月三日至四日夜間，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圍困天安門，並衝進廣場，以槍炮和坦克鎮壓躺在地上睡覺的青年學生，一場血腥大屠殺於是展開，血流成渠，遍地肉漿，天安門天昏地暗，神哭鬼嚎，其淒慘與中共之喪心病狂絕無僅有。六月四日，教宗隨員告知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血洗北京天安門。當時，教宗的機要人員都跟從教宗進行牧靈訪問旅行，無法獲得更多更精確的消息。當天，教宗從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飛往芬蘭首都赫爾辛基途中，隨行記者問教宗對天安門事件許多青年遭屠殺的看法。教宗僅簡單地回答說：

「中國許多青年死亡的消息令我深感情和哀悼。對我們身為基督信徒者，我們希望這些亡魂能夠有助於給這個大的和可愛的民族帶來新的生命。」<sup>40</sup>

六月五日，教宗隨員之一，教廷國務卿卡薩羅里樞機主教在赫爾辛基舉行記者招待會，接受隨行各國記者訪談。被問及對北京天安門慘案的看法時，卡薩羅里樞機主教答說：

「教廷除了新聞報刊和國際通訊社外，沒有特殊的消息來源。無論如何，教宗已經讓人知道他對這個事件的痛苦和憂慮之情。我必須說：這個事件的悲慘狀況越是明確，越叫人痛苦，我該說憂慮越深，越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對所發生的一切，教廷尚無法明確的認識，但教廷認為必須留意並深入研究這個局勢。」<sup>41</sup>

40 *Radiogiornale della Radio Vaticana*, 5 giugno 1989.

41 *Ibid.*, 6 giugno 1989.

我同心，向上海附近佘山朝聖地所敬禮的和平之后、中華聖母瑪利亞祈禱。」

「佘山童貞聖母，進教之佑，請以妳極慈祥之顏垂顧可愛的中華民族。我們，妳的子女，與每個人內心最真誠的善意一致，奔赴妳膝前，為向妳傾訴我們的愛，我們的哀痛，我們的同情，並在如此悲哀的時刻，把那些受苦者、暴力的犧牲者的哀號，以及飢渴慕義者的請求，與乎所有熱愛他們的國家的人的希望，全存放在妳慈母的心坎中。」

「佘山童貞聖母，仁慈之母，請為我們向妳的聖子、人類的救贖主轉求，讓受苦的人找到安慰，並使如此沉重的痛苦不至於白受。請妳也為每位領導這個大國家的人士求得光照，使他們在尋求基於尊重真理、正義和自由的公益時，不至於缺少必要的智慧。我們尤其把偉大的中國青年託付給妳。寬仁、甘飴的童貞瑪利亞，此我等心所願者！」<sup>43</sup>

六月十八日教廷官報《羅馬觀察報》社論以〈中國青年的遭屠殺〉為題，發表長篇評論謂：

「北京悲慘事件的恐怖和許多青春生命在天安門廣場或在首都和其他城市街頭遭扼殺的悲痛，不能、也不可以隨著時日的過去而被淡忘，隨著鎮壓的悲哀進展，那種恐怖和痛苦與日俱增……。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基礎的整個意識型態正在崩潰的事實，今天越來越顯明。……當今眾所承認的共產主義危機的複雜癥結，為個別國家和世界團體來說，其良性和非毀滅性的解決之道，唯有透過全民、尤其是年輕一輩者的參與。……從這方面看，（蘇聯的）改革（perestrojka）和開放（glasnost）是重要的信號。中國青年巨大和持續的示威就與這個信號有關。他們在天安門廣場所要求的，就是自由和全民

43 教廷國務院傳給梵蒂岡電台教宗的三鐘經講稿，見 *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 SEDOC*, N. 1655, 18 giugno 1989. 及 *L'attività della Santa Sede*, p. 505, 1989, Vaticano.

參與的政治革新。……屠殺的恐怖和年輕受害的痛苦不僅嚴重地傷害到不只十億的中國人，而且也傷及其他數十億人類。雖然如此，我們仍然不灰心失望。這是歷史上嚴重的時刻，在這樣的時刻，必須找回聖保祿所指示的力量，「在絕望中仍然懷著希望」( *spes contra spem* )。那些遭殺害的中國孩子，遭坦克碾碎的學生，那些遭烈火焚燒的穿制服的同輩，他們都是可怕的罪行的犧牲者、見證、亦可稱為殉道者。需要挽救人道，需要解救人性，需要重拾那條即使在矛盾和痛苦中，仍能走向遠方那艱難卻可能抵達的目標。此即在絕望中仍然懷著希望。」<sup>44</sup>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連續數日有不少各地青年遭中共軍警單位拘捕並隨即處決。曾在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七年兩度訪問中國大陸的菲律賓馬尼拉的總主教辛海綿樞機，於六月二十二日就中國大陸所發生的事件發表聲明說：「我願意重申我的信念，即自由來自天主，而中國人民渴望自由乃是人性合法的需要。我呼籲中國政府以開敞的心智回應自由的要求，並表現出更大的同情和人性。」辛海綿樞機主教並要求菲律賓政府准許某些中國人以政治難民身份暫時居留在菲國，因為照顧難民乃是菲律賓作為亞洲唯一的天主教國家的使命之一<sup>45</sup>。

一九八九年是當代歷史最重要的分水嶺，東歐共產主義鐵幕和柏林圍牆的倒塌，世界兩極對立不發一槍一砲地化解。一九九〇年元月十三日，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在每年例行的接見駐教廷外交使節團的機會中，向一百一十八位大使發表一篇他任內最重要、最感人的講詞。他說教廷對特別是發生在歐洲的重大改變感到滿意。他說：

<sup>44</sup> *L'osservatore Romano*, 18 giugno 1989, Vaticano.

<sup>45</sup> *Radiogiornale della Radio Vaticana*, 22 giugno 1989.



「一九八九年六月發生的嚴重事件深深令我震驚，自從事件開始，我就代表所有關心人類命運的人說點話，我沒有缺少懷著哀悼的心情，表達真心的祝禱，希望許多痛苦不至於虛擲，但有助於更新這個高尚的國家的生命。」<sup>46</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調動人民解放軍，以坦克槍炮屠殺天安門廣場上難以計數的青年學生的方式，來鎮壓人民對自由民主的渴望的罪行，給這個號稱人民的中國帶來了全球空前的嚴厲譴責和國際的孤立。許多國家召回駐北京大使，也召見駐他們本國的北京大使，質問究竟。全球大多數國家不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往，許多工商企業取消合同，無數文化學術交流活動停辦，中國大陸陷入空前的孤獨。各國對中共的態度完全改變，就連一向親中共的西方左派人士和政黨組織，也對中共的手腕不齒。

一個聲稱走向改革開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陷入難以自拔的絕境。此後數年之久，北京政府在國際上難以抬頭挺胸，各國對北京政府人士也避之惟恐不及。這種冷淡疏遠關係直到公元三千年代的今天，仍然如此；西方世界與中國大陸來往，除了工商貿易、各取其利之外，再也沒有任何個人和公私團體機關對中共抱有好感，遑論景仰幻想如昔日。中共人士當然不再相信他們對人民所宣傳的社會主義，而他們對外宣稱的堅持中國特有的社會主義路線，也只在西方招來恥笑而已。試問西方傳播媒體，包括已經稀有的左派媒體，這十多年來有誰再為中共作俚。中國大陸今日大事發

46 Ibid., 13 gennaio 1990.

展經濟，以及在一些主要城市所凸顯的消費和「唯物」至上的現象，就是最好的註腳。

二〇〇三年六月四日，北京天安門事件十四週年紀念日當天，北京政府仍然拒絕事件受難者母親的要求，不肯澄清事件內容，不願追究屠殺責任，不想為天安門民主運動平反。北京當局至今仍然稱該次示威為「反革命」運動，甚至稱中國經濟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中國之所以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之所以成為國際強國，都拜十四年前封殺了那次民運所賜<sup>47</sup>。

一九八九年時代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的趙紫陽，是個主張改革的溫和派人士，他反對暴力鎮壓青年學生。事件的發生顯示他的勢力佔了下風。的確，慘案平息後，趙紫陽便銷匿政壇，至今不復再出。他的聲銷跡匿使教廷當時所抱的、極有可能與北京改善關係的希望，成了泡影。

## 第十二節 北京天安門事件對教廷與北京關係的影響

一九八九年十月六日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起程東訪，他乘坐的義大利航空公司專機因得不到北京當局的飛航許可，所以繞道北極，多費數小時才抵達大韓民國首都漢城，主持八日星期天在當地舉行的第四十四屆國際聖體大會。大會彌撒結束時，教宗帶領參禮的兩百五十萬各國信友頌念三鐘經，並照例發表簡短講話，其中有一大段觸及中國大陸天主教徒。他說：

「在和我們的母親瑪利亞的這次孝愛交談中，我也提及我們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基督內的兄弟姐妹

47 Ibid., 4 giugno 2003.

們。因著地理上的接近，以及在信仰和文化上的關連，他們非常接近許多聚集在這裡的人。我內心深處始終熱切盼望與這些兄弟姐妹們相會，為向他們表達我對他們的熱忱和關懷，並向他們保證他們是多麼受到其他地方教會的敬重。我一想到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在過去這些年來對基督和祂的教會所表現的忠貞英勇行為，我就深受感動。藉著進教之佑瑪利亞的轉禱，願基督成為他們在種種考驗和日常生活百般挑戰中的安慰。願上主給他們啟發堅定的信念，致力於促進教會團體內修和的艱難工作，並與教會合一的有形可見的原則和基礎、即伯多祿的繼承人，在信仰上共融。願他鼓勵並支持那裡的基督信徒致力追尋公益，並慷慨地為他們的同胞服務，為他們高尚的國家的進步效力。」<sup>48</sup>

十月十一日，若望保祿二世已經在印尼的雅加達訪問。北京政府外交部發言人於是針對若望保祿二世八日在漢城所表示的、願意前往中國大陸探望那裡的教內兄弟姐妹的心願，向義大利《安莎通訊社》駐北京特派員說：「我們已經注意到教宗在漢城所做的聲明。但中國和梵蒂岡之間並沒有外交關係，中國政府為改善關係所定的基本原則也沒有改變。」<sup>49</sup>

十月九日上午，若望保祿二世告別漢城，南下飛赴印尼首都雅加達，途徑中華民國台灣領空，他按照國際外交禮儀慣例，發電報給領空主權國家元首，向他致意。電文如下：

李登輝閣下

中華民國總統

台北

48 教廷國務院傳至梵蒂岡電台教宗英文講詞原稿，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 SEDOC*, N.2415, 6 ottobre 1989.  
49 ANSA 通訊社，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四十六分北京電訊。

當我飛越台灣前往印尼履行我的牧靈訪問之際，

我藉這個機會向您及貴國人民保證我對您們的和平與繁榮的最佳祝禱。

教宗 若望保祿二世 50

教宗出國訪問時，每飛經一個國家領空，必定發電報向那個國家的元首致敬，那是常事，不足為奇。但是教宗這次發給中華民國總統的這封短短七十一個字的電報卻是非同小可。前面已經約略提到，若望保祿二世過去幾次訪問亞太地區時，都設法繞道，避免飛越中華民國飛航管制區，以免必須遵照國際外交禮儀向中華民國元首發電致意，否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藉口教廷承認中華民國並與之保持友善的關係，蓄意分裂中國，而更加拒絕與教廷進行對話、改善關係，甚至進一步迫害大陸天主教人士。

一九八八年春夏之交，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詢及筆者，如何邀請教宗訪問中華民國。筆者告知所以，旋有總統府秘書長李元簇約見台北總主教區前任總主教，輔仁大學校長羅光，而羅總主教又與外交部長連戰談話，更與李登輝總統面談四十分鐘，並攜其親筆函專程飛赴羅馬，覲見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正式邀請他在一九八九年十月前往亞太地區訪問時，順道訪問中華民國台灣。

教宗並沒有接納羅總主教帶去的李登輝總統的邀請，理由就是不願意從中共那裡惹來不必要的麻煩。不過教廷將研究一個對台北和北京都均等、讓海峽兩岸都能感到滿意的方式來進行他的訪問行程。這個方式就是教宗的座機飛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領空，讓教宗有機會按照國際外交禮儀，向海峽兩岸的政府領袖發電致意。

豈料，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發生北京天安門事件，教宗多次對此發表沉痛的講話，希望衆多青年學生所流的鮮血不至於枉然，教廷官報《羅馬觀察報》也多次發表社論，譴責暴力鎮壓，哀悼慘案。九月二日，梵蒂岡發言人納瓦羅博士宣佈，北京當局不同意教宗座機飛越中國大陸領空。於是，教宗不必再考慮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元首發電致意的事。可是教宗從漢城南下飛赴雅加達途中，直接飛經台灣，並照他向羅光總主教所許的諾，向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發電致敬。這是中梵外交關係史上一個彌足珍貴的文件<sup>51</sup>，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讓教宗深感理應如此才合乎自然情理之舉。

### 第十三節 中國大陸地下教會成立忠於教廷之主教團

若望保祿二世教宗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六日結束南韓、印尼和印度洋毛里求斯三國牧靈訪問旅行後一個多月，中國大陸地下天主教受教宗承認的部分主教，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陝西省高陵縣三原教區張二冊村天主堂舉行會議，會中成立主教團。消息來源指出：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在教

<sup>51</sup> 參見《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七三〇；及本書第十章第十節。

廷委任的中國主教中建立聯繫，並給中國整個天主教團體一個有形和一致的領導。

據消息人士稱，三原會議文件說：「我們繼上海一九二四年的主教公會會議後，又召開了主教會議，從此結束了中國大陸教會幾十年沒有統一領導的局面。在目前的形勢下，我們感到這是我們的職責，使我們的領導達到一致，並在我們之間建立聯繫。」

消息來源又說：參與會議的主教們要求他們新成立的主教團完全接受教宗的領導，並維持其與整個天主教會的徹底共融。會議並推選河北保定教區八十二歲的范學淹主教為主席，另推選兩位榮譽主席，即居香港、八十一歲的廣州總主教鄧以明和在美國的八十八歲上海主教龔品梅。又選出三位沒有出席會議的教廷承認的主教為理事<sup>52</sup>。

中國大陸地下教會部分主教成立主教團一事，似乎沒有得到教廷的支持。香港研究中國大陸教會的專家們有認為：可能這件事進行得過於倉促和不謹慎。他認為：對話是需要時間的，中國的主教們應以彼此修和為先。又有人認為：教廷之所以不支持這個主教團，是因為不想刺激中國北京政府和政府所認可的成立於一九八〇年的公開教會的主教團。這位專家指出：地下主教如果願意按照天主教法典賦予各地主教自行組織主教團的規定，成立他們的主教組織，則他們必須先確定是否已得到教宗的同意。但他又表示：教廷可能考慮到如果批准，必將影響到中梵關係的正常化<sup>53</sup>。

中國北京政府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任務之三月九日回答《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所提的、有關大陸新成立的主教團的問題說：中國現時只有三個天主教組織，即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中國天主

<sup>52</sup> 《公教報》，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sup>53</sup> 同前，一九九〇年四月六日。

成立了他們的主教團，並選出保定教區八十二歲的范學淹主教為主席。與會者並要求政府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六條保障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以及第三十五條保障集會自由的權利。<sup>60</sup>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教廷國務院無任所大使埃內斯托·加利納（Ernesto Gallina）總主教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世界法學會議。會中，這位自一九五一年來首位獲得北京發給赴中國大陸簽證的教廷大使發言謂：「我們無法接受一個國家以教會自居，並把教會置於其權下。」這位教廷大使所指的國家無疑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這同一天，香港主教胡振中樞機亦在羅馬覲見了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向他彙報了一年來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的狀況，特別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國的內部局勢。這一天，因為強硬處理天安門事件而佔了上風，並因此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的李鵬，正在莫斯科進行正式訪問，他向外界透露：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也無意和梵蒂岡建立外交關係<sup>61</sup>。

一九九〇年八月九日，義大利《安莎》通訊社自北京報導說：義大利參議員、義大利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義中友好協會主席維托里諾·哥倫布應北京邀請，在中國大陸訪問。他是天安門事件後，第一位義大利人會晤了天安門事件後才出任中共黨總書記的江澤民。彼亦受歐洲團體諸國之託，親往中國大陸了解天安門事件一年後中國的政治局勢和經濟狀況，準備在九月紐約聯合國召開大會時，與中國北京政府重新展開政治方面的接觸。

<sup>60</sup> Ibid., 16 marzo 1990.

<sup>61</sup> *IL SABATO* (義大利《星期六》週刊), 5 maggio 1990, p.89.

江澤民與維托里諾交談時強調：社會主義是中國不會改變的選擇，因為社會主義使中國在受了百年痛苦之後，終於站立了起來。

關於人權問題，江澤民向義大利參議員說：中國沒有政治犯，那些在天安門事件中被捕的人，乃是侵犯法律者。江澤民亦否認外傳趙紫陽將獲平反之說。趙紫陽在天安門事件中因支持青年學生的民主運動而遭貶。

有關北京與教廷的關係，江澤民重複中國一向的說詞，即：梵蒂岡必須先與台灣斷交，而且不干涉中國的內政，然後才有談判的可能<sup>62</sup>。

同一年十月四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長錢其琛在紐約聯合國接受當地《僑報》專訪，談及北京與南韓、以色列和教廷的關係。對與教廷的關係問題，錢其琛指出：「梵蒂岡現在與台灣還有關係，要和我們建交，就必須先與台灣斷交。另外，梵蒂岡始終主張教皇可以干預各國的宗教事務，這一點我們不能接受。它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能有改變，那情況當然不同。」<sup>63</sup>

梵蒂岡干涉中國大陸宗教事務嗎？當然干涉，因為它不干涉，誰有權來干涉？全球天主教是教廷的事務，非天主教權威當局而介入中國大陸天主教事務者，才是干涉他人內政。須知政治的目的在為人民服務，而服務的對象僅限於人民物質生活上的食衣住行，個人和團體的心靈生活在政府過問的範圍，政府沒有權利和義務處理人民心靈和良知的問題，只能提供有利於更佳的心靈生活的

62 ANSA 通訊社，一九九〇年八月九日北京電訊。

63 《中央日報》，一九九〇年十月九日。



環境與條件。中共長期處在嚴重的自卑感中，對自己的權力極度敏感，所以在國際上處處表現得傲慢自大。這種自然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種態度一點也不可愛。

一九九〇年九月十二日，台北《中央日報》報導香港天主教《公教報》署名蔣劍秋神父<sup>64</sup>的一篇文章指出：教廷對中國大陸教會今後挑選主教有兩項指示：第一，一個教區已有一位「地下」主教者，無論這位主教是在坐監或遭軟禁，都不可以再另選一位「地下」主教。第二，一個教區已有一位「地上」主教者，在另選一位「地下」主教之前，必須先與這位「地上」主教溝通；如果這位「地上」主教答應與教廷共融，就不能再另選一位「地下」主教。

蔣劍秋神父的文章又說：教廷駐香港的代表已要求前往大陸訪問的聖職人員和教友，將上述指示轉告大陸教會，因為一些「地下」教友都不知道新的指示，而仍然與「愛國教會」的聖職人員對立。

文章指出：教廷這一最新指示，很明顯地，是在避免一個教區有兩位「地下」主教之事的重演，及鼓勵「地下」主教與「地上」主教加強對話、溝通，以達共融<sup>65</sup>。

教廷這項指示至今仍然有效，而且越來越強調這個原則。中國大陸天主教信友不是人人都堅貞不移：有許多嚴守自己的信仰、忠於羅馬教宗和普世教會的人，他們不畏懼艱難和迫害的精神和態

<sup>64</sup> 蔣劍秋神父，羅馬宗座傳信大學法學博士，施森道蒙席教授的學生，曾在寮國永珍為華僑教友服務，後應邀至台北，主持《教友生活週刊》刊務，採開放作風，文字圓地多爭論性敏感問題，激起不少論戰，遭致批評。不得已，卸

<sup>65</sup> 《中央日報》，一九九〇年九月十二日版。

作，這個工作就是修和。修和必須建立在不可妥協的天主教的信仰基礎上，但是修和也需要諒解、仁愛、寬恕以及共同為宣講天國而獻身。」

最後，教宗向台灣的主教們談及中國台灣和中國大陸兩地教會的關係，他嘉許台灣教會對大陸教會所提供的協助，他說兩地教會不僅信仰相同，血緣也一樣。他要求台灣保證，讓基督的福音藉著中國文化，並在中國文化中，更清楚地宣講出來。教宗邀請台灣主教們代表他向中國大陸的教友表達他的期望，就是不辭辛勞地、耐心地做締造和平的人，教宗惦念他們，天天為他們祈禱！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手製造的中國愛國會，是中國大陸教會無法與羅馬教宗及普世教會在外表有形可見的生活上合一共融的阻礙。中共領導人士屢屢以政治來看天主教和規範與天主教的關係，使得天主教和中共政府難以找到對話的共同基礎。上述教宗向台灣主教們所說的這段話很關鍵：「合一需要準備的工作，這個工作就是修和。修和必須建立在不可妥協的天主教的信仰基礎上。但是修和也需要諒解、仁愛、寬恕以及共同為宣講天國而獻身。」<sup>67</sup>

一九九一年元月十二日，若望保祿二世依每年慣例，接見駐教廷外交使節團，彼此賀年。在這個機會中，教宗一本過去，向一百二十位大使回顧過去一年的世界局勢，並展望未來。這是很特殊的一年，一方面東歐局勢正微妙地朝向良性的方面演變，共產主義正在沒落，新歐洲正在誕生，這令教宗感到無比的欣慰，並對未來懷抱無限的希望。另一方面，波斯灣戰事風雲已出現端倪，以美

<sup>67</sup> *Acta Apostolicae Sedis*, pp.732-737, 1991, Vaticano; *L'OSSERVATORE ROMANO*, 16 dicembre 1990; *Radiogiornale della Radio Vaticana*, 15 dicembre 1990.

英兩國為首的五十萬大軍已經壓境，國際局勢告緊。事實上，五天後，一九九一年元月十七日，波斯灣戰爭即爆發。

在環視世界局勢中，教宗提到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的處境說：

「基督信徒團體生活在極少有利的條件中，……某些教會被禁止圓滿地宣認他們的信仰。……有些侵犯基本權利的行動，特別是在侵犯宣認信仰的權利方面，手腕非常狡猾，不易覺察，卻是非常真實的。……這樣的不寬容對和平是個威脅。」<sup>68</sup>

當時周書楷大使當然也在場，而且是名列前茅，因為像他這樣駐教廷如此資深的大使幾乎是絕無僅有。不過，這也是周書楷大使最後一次覲見教宗，因為他的任期已經屆滿，正在準備卸任回國，離開這個以整個世界的和平和全人類的幸福為唯一關注對象的迷你國度，結束他這新穎、富有內容、但並不太信服、也不甚愉快的十三年駐節教廷外交生涯。

## 第十四節 周書楷大使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中華民國行政院政務委員周書楷被任命為新任駐教廷大使，接替陳之邁大使。周大使於翌年元月底抵達羅馬任所。甫下飛機時，從貴賓室走出來，左手抱著一隻他喜

<sup>68</sup> *L'Attività della Santa Sede*, pp.41-44, 1991, Vaticano; *Insegnamenti di Giovanni Paolo II*, (《若望保祿二世訓導年錄》), pp.78-93, 1991; *Radiogiornale della Radio Vaticana*, 12 gennaio 1991.

愛的棕色北京狗，手指間夾著一支雪茄，滿面笑容地迎向迎接他和周夫人的使館館員和家眷，以及幾位旅居羅馬的神職、修女和華僑。周大使帶深度眼鏡，身材不高，似乎與穿高跟鞋的周夫人齊高。對這位在外交戰場上馳騁四十年的老將，人人都刮目相看。

周大使的官邸仍然是陳之邁大使租留下來的寬敞公寓，位於羅馬帕里歐利（Parioli）區 Via Spadini Armando。這條大巷內一棟大樓的第五層，大小客廳和臥室約有十個，許多使館和大使官邸都設在這個高級地區。陳之邁大使在時，曾在四處牆上適度地掛著他珍藏的山水字畫，他之前的沈昌煥大使也住在這同一棟公寓，環境非常優雅，居高臨下，窗外是一片羅馬松林。

周大使一進新居，便放下手中的小狗，這隻寵物一到陌生的地方，便到處亂竄，周大使發現長此以往，這個官邸將成何體統，於是立刻請使館主事同仁設法買一個讓小狗穿跳不過的障礙物，擱置在起居處和客廳之間的門檻上，做隔離之用。周大使履新後這第一件緊急要事竟讓在外交界已經幹練十足的同事不知所措，他在大街小巷繞了一上午，焦頭爛額，實在不知如何找到現成的東西來圍住這隻北京狗，真有大象鬥老鼠，陷入智窮的困境。筆者建議他到五金行去買個寬約一公尺高約八十公分、青銅或鐵製的壁爐擋火星用的精美金屬網架，相信必可贏得周大使第一個好印象。果然斥資買來了一具，擺在門檻上，竟也雅致且發生作用。這位朋友差點陰溝裡翻船。

周大使伉儷抵達羅馬後，使館同仁和米蘭遠東貿易中心萬庚年主任在羅馬一家義大利餐館二樓為他們洗塵，吃海鮮。席間，周大使致辭，他告訴他的部屬他不來羅馬寫作。也的確，他說到做到，在羅馬十三年多，沒有寫過一本書，除了抗議性投稿信件外，沒有登過一篇文章。周大使上了幾天班之後，叫人把陳之邁大使留下的咖啡色寬敞新式辦公桌換掉，給自己買了一張大約一公尺見

方的傳統式小書桌。桌上除了煙灰缸外，幾乎見不到甚麼。

周大使上班準時，經常著一副獵裝，草黃綠色花格子上裝，深黃綠色褲子，腳上穿的常是咖啡色的膠底軟皮鞋，走起路來沒有聲音。他腳步健捷、輕快，一進使館，必先到每間辦公室探個頭查勤。然後就關進他的辦公室，點起雪茄，吞雲吐霧，有時則抽煙斗。同仁進他的辦公室像是升入雲海一樣。出來後，眼角難免帶淚水，咳嗽一番。周大使對館員，除了稱頌富章為參事外，對其他館員都直呼其名，頗有同僚手足的意味。但周大使也是一個會訓人的長官，他做事認真，愛國心切，不怕得罪人。

周大使每逢參與教廷禮節，必全副「武裝」，把他歷年來在國內外所得的大小勳章全佩帶在燕尾服左胸上，一片錦繡，好不威風，駐教廷一百多位大使中，恐怕沒有一位可與他比擬。他自稱為基督教新教徒，但外表看不出。

以擔任過外交部次長、部長，駐菲律賓、駐西班牙、駐美國大使的經歷和閱歷，周大使怎能適應羅馬這個駐教廷大使館的簡樸相貌。也的確，這個缺乏外表的使館和內在的陳設佈置實在缺乏新氣象，無法振奮人的精神。對一個沒有外患和外交危機的三流國家或許無所謂，反正使館像不像樣沒人在乎。但是像中華民國這種處境的國家，無論如何必須有個能表現出欣欣向榮、樂觀進取、越挫越勇這種氣概的大使館。不錯，到任一年後，周大使便取得外交部同意，另覓適當的新館址。周大使把這件事委託筆者代勞。經過將近半年的尋尋覓覓和多方的建議，終於找到現今這個位於帕里歐利高級住宅區邊緣丘上、一棟高雅大方、屬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建築的六層樓房的第三樓（在義大利稱為二樓，因地面層不算）大公寓，面積大約兩百五十平方公尺，內部寬敞舒適，光線充足，

野。個別國家的內政，教廷絕不過問，除非危及人類的基本人權、尊嚴和倫理道德，則另當別論，因為那已不是單純的內政問題。比方說，政府干涉人民的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這已經超越國家政治的範圍，教廷不會忽視。西方民主國家對法治和政教關係極其清楚，教廷的言行豈能政教混淆不清？

周大使出使教廷後半期，從一九八五年後，便開始與國內立法院和新聞界發生摩擦。立法院外交委員會經常趁他因公務或私事回台北時，便緊迫盯人，要他到立法院報告中梵關係，新聞界人士也不斷找他訪談。但周大使對這一切經常迴避，致使立法委員和報界常常聯合圍剿他，並在國內報章雜誌上撰文惡意攻擊他，挖苦他。其實，國內一般民意代表和新聞界只知以對其他國家的尺度來衡量中梵關係的得失。這也就是中華民國政府有關當局和傳播媒體很難真正認識和了解與教廷的關係的原因。試想，周大使怎能勸說立法院和新聞界應該了解教廷設法與中共接觸的苦衷，甚至幫助教廷與中共交往呢？而中華民國上下千方百計設法阻止教廷與中共交往，並想盡辦法鞏固與教廷的外交關係，這也是天經地義、自然不過的事，任誰也不能批評。犧牲自己以成全敵人，這是哪門子外交啊？一個國家與任何國家交往，都以自己最高的利益為優先考量的對象，誰也不會否認這個外交原則，否則，豈不天誅地滅？

偏偏就有一個、而且是絕無僅有的一個「國家」梵蒂岡教廷，我們不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手段來對待它，否則將陷於不義的境地，就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對待教廷的策略一樣地令人扼腕和不齒。理由何在？教廷越能夠促使中國大陸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越是有助於海峽兩岸的接近與和解，因為宗教信仰自由是人心深處最渴望的需求，是一切人權與人性尊嚴的基礎，當一個國

家、團體或個人知道尊重人權和人性尊嚴時，就不會無理取鬧，不會有動不動就以干戈相威脅的幼稚和鹵莽之舉。再說，教廷是一個對任何國家絕無利益要求的最高主權實體，當一個政府要捐贈金錢給它時，它還會考慮要不要接受，會不會因此而使自己的言論行動受到約束，變得不自由，變得不中立。

與教廷建立外交關係，只有益而無害。當然，這只是對一個愛好自由民主和重視人性尊嚴與生命價值的國家才如此。一個專制極權的政府必然視教廷如蛇蠍，避之惟恐不及，哪有與教廷建交的真實意願？要有，必定是別有用心，否則豈不是為自己埋下地雷？教廷所極力鼓吹倡導的，無非是尊重每個人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這個人權包括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言論、集會結社和行動自由，新聞媒體傳播自由。此外，教廷要求各國政府遵守自然法，遵守人與生俱來的倫理道德規範，追求真理，恪守正義，廣施友愛，因為這一切都是維繫人際和諧與國際和平的必要條件。

然而，這一切並不是教廷發明的，而是根植於人心深處的天賦價值觀，是普遍的生活原理原則。教廷基於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和使命，也就是領導全球天主教會，進而協助全人類找到真正幸福人生的責任，所以才在這滾滾紅塵和唯利是圖的人世中，義無反顧地、不畏懼犧牲地、必要時敢於拋頭顱灑熱血、甘做殉道者地踽踽獨行。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教廷也是由人組成的工作團體，人有其天限，在和世界各國和國際各大小組織機構來往接觸辦交涉時，也有技短、技窮、甚至上當的時候。對教廷，我們或許應該待之如仁慈的母親，則即使母親有了偏差，子女也很容易與之交談，消解誤會。或許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應該視教廷為自己的一部分，視教廷為自己的排難解紛人，視教廷為全人類共有的良知，為人類共有的

精神資產，而不把它當作自己追求私利的工具和夥伴。

周大使出使教廷七年後，國內開始有人質疑他戀棧，於是不斷尋找機會質詢他是否教廷同意中華民國派遣新任大使。周大使的答覆是：駐教廷大使的更換可能影響新大使的派駐，因此，現階段中華民國不宜冒此危險。言下之意，駐教廷大使的更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人以為這是周大使不想調回國的藉口，並據此而予以攻擊。

到底台北有沒有必要調換駐教廷的周書楷大使呢？如果調回現任大使，有沒有無法再派新大使的危險呢？調換周大使是遲早必要的，因為再不調換，就要輪到他擔任駐教廷外交團團長了，這是教廷要避免的，因為與教廷建交的一百多個國家中，與中華民國維持邦交的只有二十幾個，如果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擔任外交團團長，這對大使和對教廷勢必是尷尬的局面。一九七七年，就是因為陳之邁大使資格老，行將出任外交團團長，所以教廷同意台北更換新大使。再說，周大使在羅馬的任務和事務多偏重於與義大利及歐洲其他國家的關係，他必須設法為中華民國打開僵局，尋找與國，甚至為國家的防衛接洽購買武器。這一切常引起中共的不滿和對義大利政府的抗議，並間接控訴到教廷那裡。因此，教廷對周大使並不太欣賞，中華民國勢必要更換大使。

可是台北如果調回周大使，教廷會不會答應接受一位新大使呢？這又是一個矛盾。一九八九年初，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花蓮教區的單國璽主教，率領主教團代表團抵義大利，參與教廷原駐台北代辦畢齊樂蒙席升任大使晉牧大典。祝聖總主教典禮在畢齊樂家鄉薩丁尼亞島舉行，由教廷國務卿卡薩羅里樞機主教親自主持。單國璽主教原計畫趁機在薩丁尼亞與卡薩羅里樞機主教洽談更換周大使事宜。無奈那一天沒有機會。俟典禮結束，大家都返回羅馬後，單主教便前往教廷國



務院拜訪卡薩羅里樞機主教談事。

卡薩羅里樞機主教是外交家，談吐彬彬有禮，非常客氣，但是立場很堅定，他說辦外交講求對等，教廷在台北設代辦，所以中華民國亦宜派代辦駐教廷。周大使要回去退休了，所以台北派個代辦來教廷即可。單主教認為這是教廷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打退堂鼓，隨便丟棄手中與中共談判的王牌。他們兩位談了一個多小時的話，沒有結果。單主教又和教廷國務院負責中國事務的切利蒙席及其他有關人士談，他們還是聽國務卿的話。

單主教想：教廷人員年滿七十五歲退休，卡薩羅里樞機主教屬一九一四年次，今年一九八九年，這位國務卿數來已屆七十五歲退休的年限，即使健康良好，教宗或許可以延他一年。因此，等他一年再說吧！沒錯，一年後，一九九〇年，卡薩羅里國務卿退休。教廷外長安杰洛·索達諾總主教接任。單主教再去教廷和這位比較容易交談的國務卿交涉。但也沒有結果。單主教不得要領，於是又和負責中國事務的切利蒙席談了四次，說明事情的利弊。結果教廷同意中華民國再派一位新大使駐教廷。由此可見周大使先前屢次向國內外交部和新聞界所說的，更換大使可能會發生別的問題之事不假。

一九九〇年三月三十日上午，周書楷大使伉儷覲見了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六個月後，同年九月下旬，中華民國外交部次長房金炎抵教廷訪問，覲見教宗，得教宗當面保證中梵關係正常、穩定<sup>71</sup>。因此，台北外交部決定調換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

71《中央日報》，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六日版。

就。這是教廷國務院和它所屬的機構希望避免的。國務院對這類事務最為敏感，其他部會倒是無所謂，因為它們不辦外交。教廷方面常表示，教廷和中華民國的關係一向很好，並沒有問題。

教廷之所以想盡辦法要和中共接觸交往，並不是因為與台北的關係惡化，而是出於另一種需要，另一種目的。所以，並不是台北方面的官員或立法委員多來梵蒂岡訪問，就會減少教廷與中共尋求關係正常化的意願。如果沒有中共的問題存在，即使中華民國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從來不來梵蒂岡走動，即使駐教廷外交官從來不參加教宗幾乎每個星期都會主持一次的大型禮儀活動，教廷也不會降低它和中華民國的外交層次，更不會與中華民國斷交。

如今，中華民國和教廷都盡了最大的努力，達成更替駐教廷大使的目的。但是新聞界就對教廷答允中華民國更替駐教廷大使一事提出疑問，逼得教廷發言人不得不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發表聲明說：

「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周書楷先生於一九七八年二月九日呈遞到任國書（再說，這位外交官年事亦很高）。在教廷和中華民國之間的正常與友好關係之下，黃秀日作為台北駐教廷新任大使的任命，屬大使更替的正常現象。在目前的局勢下，教廷沒有任何理由不接納委派新大使的要求。然而，教廷也認為其駐台北代表的層次宜保持現狀。為此，將繼續由一位臨時時代辦駐彼方（自一九七九年以還即如此）。從一九八九年起，此項職務委由裴納德蒙席（Mons. Adriano Bernardini）擔任。」

教廷為對方國家派遣和更換大使而發表聲明，這還是第一遭，足見全球新聞媒體對中梵三角關係的注意，也因此，教廷盡量避免類似的事情發生。

## 第二節 中梵外交關係內容的突破與提升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七日，黃秀日大使向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呈遞到任國書，教宗向他發表一篇罕有的文情並茂、內容豐富具體、並明指今後中梵外交關係應循的道路的歡迎詞<sup>2</sup>。這篇講詞改變了五十年來中梵外交關係的理念與作法，這對中華民國尤其如此。筆者在黃大使呈遞國書當天讀到教宗這篇講詞時，心中除了驚訝之外，還有萬千的感慨，為什麼中華民國政府這麼多年來一直沒有真正體認教廷的外交本質，一直沒有站在教廷的立場思考教廷的期望，進而與之合作？疑難不難了解：過去中華民國對教廷的外交總是處在被動的地位和力保關係的消極立場。筆者慶幸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竟能坦誠明言道出中華民國對教廷外交的弊端，並給以指出今後應循的康莊大道。這對中華民國的外交和國際關係不啻是對症下藥，亦是給它開啟一個天窗，使之走出死胡同，邁向新境界，展示新國際關係視野，指出新里程的甦醒劑。對波蘭教宗這份真情和恩情，中華民國將何以為報！

教宗向黃大使所致的歡迎辭，有幾段意義特別深遠。他說：

「當天主教傳入中國之初，它和那裡的文化及道德遺產內容相若，因此產生了深入與豐碩的交流作用。這種作用乃是一種對話，它出自人天生要超越自身與其物質環境的傾向。」

<sup>2</sup> 見筆者受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戴瑞明先生之託，所譯之〈黃秀日大使呈遞到任國書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致歡迎詞〉一文（英譯中），載於《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二二二～二二七。

教宗這段話再次顯示了他處世為人、處理天下事的一向主張、態度和理念。他是一位講求交談對話的人，他深信一切問題都可以經由對話而找到解決之道。對整個中國的內外問題他也始終抱如是觀。

接著，他向黃大使強調：

「貴國文化與福音的相遇在不少困難中開花結果。這個成果顯示在彼此廣泛的了解和追求共同的願望上。一九八八年三月台灣舉行福音傳播大會時，我給當地教會寫信說：接受基督和祂的福音絕不意味著放棄自己的文化或減少對自己國家的忠誠。」

這段話的思想是接著方才那一段而來的，目的在以實際的例子指出與基督的福音交流只有益處，沒有害處。這一點是中共對教廷一向所懷疑恐懼的。

教宗接著說：

「天主教深深致力於它的信仰和貴國豐富的文化傳統之間的對話。教會設法更進一步地了解貴國人民思維和感受的純真方式，俾使教會對天主的崇敬和為人類家庭的效勞，特別是為貧苦者的服務，確實有助於締造一個更公義、更和平的社會。」

啊，這段話就是教廷外交政策和處理國際事務的原理原則和行動指標。一個國家不認識、不了解這點，它實在很難與教廷建交，即使建交，也必定處在同床異夢的狀態中，彼此貌合神離，很難建立水乳交融、有建設性的愉快關係。這樣的外交關係似有實無，毫無意義可言。與教廷建交是基

於一種共同理想，是從利他的觀點出發，來尋求利己。如果企圖以與教廷建交作為孤立、甚至打擊他國的手段，則無異緣木求魚，即使一時得逞，亦難持久。教廷外交的宗旨在謀求眾人、尤其是分裂各方的合一，而非製造分裂，更非加深分裂。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每到一個國家訪問，尤其是到那些飽經戰亂摧殘的國家地區訪問時，他所發表的講話都在呼籲對立的各方彼此對話，彼此寬恕，彼此修和，無一例外。最近，二〇〇三年五月初訪問西班牙，他呼籲內部對立各方對話與修好；六月間先後訪問巴爾幹半島的克羅地亞共和國和波斯尼亞黑塞戈維納共和國，他同樣呼籲這兩個慘遭種族仇恨和戰爭破壞的國家對話修和。教宗並不是不分青紅皂白，盲目地要求他人和好，他首先譴責暴力，要求各方承認自己的過錯，進而請求對方原諒，並以此為基點，雙方開始進行對話，以達致修好。

教宗繼之向黃大使提到：

「今天，特別是在已開發國家中，有一種危險，那就是保存民族共同特徵的歷史記憶逐漸淡化。人們心不在焉，經常覺察不出以過度消費主義為風氣的社會，在失落了展現生活特色的精神價值之後，所產生的不良後果。社會之所以缺乏個性，因為家庭和其他居間團體不再能夠發揮它們的自然功能，無法為它們的成員提供所需要的支持、培育和關懷。因此，教會不論在任何地方的信友團體中或在國際團體上，都設法以提升按照天主肖像所造的每個人的價值觀，和以教育每個人認識發展自己人性潛能的責任與義務的方法，挽回狂瀾於即倒。對社會，教會的唯一目標就是負起照顧基督親自委託給它的人的責任。」

教宗在這段話所提到的已開發國家，指的就是中華民國。這個國家最近三十年來製造了經濟奇蹟，人民生活水準大大提高，臻於富裕的地步。但是就如教宗所說的，人民過度醉心於物質消費享受，社會失落了原始特徵和傳統特色，再也沒有能力好好地開導和培育自己的下一代。這是社會國家步向墮落和衰微的前兆。一個國家陷入這種境地，它若沒有外力的幫助，很難站立起來。西方國家信仰基督，常有教會產生暮鼓晨鐘的作用，社會即使墮落，還有教會的鞭策，予以耳提面命。然而，東方國家，除了少數幾個以佛教為社會信仰外，其餘的均缺乏有力的宗教約束。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一旦墮落，誰也沒有力量扭轉乾坤。基於這點，教宗才冒非天主教國家的大不諱，抱著野人獻曝的善意，貢獻教會挽救社會的良藥。

但是，光是教會提供藥方還不夠，還需要對方的善意合作。因此，教宗又向呈遞國書的黃秀日大使說：

「尊重思想、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乃是人類發展與國家社會享有和諧的基本要素。合理地進行宗教自由原則，將有助於教導國民認識倫理道德與秩序的要求，進而懷著責任感履行自己的義務，回應他人的需要，並與同胞攜手建設進步、正義與和平的結構。」

上面這段話很明顯地指出，一個與教廷建交的國家，必須先尊重基本人權所概念的思想、良心和宗教信仰等自由。在這個前提下，教廷才有與對方國家有效地合作，幫助這個國家克服社會真正進步的障礙的可能。

最後，也是改變中梵外交關係內涵最重要的一段話，就是：

「大使先生，閣下出使教廷的外交使命，在反映倫理道德原則和從事與之有關係的工作上，要比國與國關係上的政治事務為重，那些原則應該領導各民族參與國際生活，並促使他們各自的政府努力正視人類家庭所面對的重大問題。在國際場合上，教廷提供它的善意和忠誠的合作，它在完全尊重世界各民族的主權和特有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自由合法所選擇的政府的前提下，來關心世界各民族的問題、焦慮和期待。」

教宗這番話可是擊中中華民國五十多年來、尤其是自一九七一年十月退出聯合國之後、對教廷外交政策的弊病。這些年來，台北外交部總是處在患得患失的神經緊張狀態之中，處處事事以維護和鞏固中梵邦交為第一考慮。只要教廷與北京之間有任何風吹草動的聽聞，便令駐教廷使館和國內外交部坐立不安，而新聞媒體更是火上加油，致令全國陷入山雨欲來的焦慮之中。殊不知教廷有與衆人為善、絕不樹敵的本質。不論中華民國與教廷邦交如何堅不可摧，教廷仍然要與中共對話，甚至關係正常化，就像現任教宗就職後，即設法並達致與他波蘭祖國共產政權恢復外交關係一樣。一個越是與教廷的理念相悖的國家，教廷越是要與它交往對話，希望拉近彼此的距離，以便調整彼此的焦距，共謀全體人類的福祉。

是以，過去這麼多年來中華民國對教廷的外交策略，到此觀之，確實值得深切反省！中華民國一向視任何友邦與中共的接觸，即對台北不忠實、甚至係出賣朋友的行為。中華民國駐教廷的使節與教廷來往時，總不忘勸阻教廷勿與中國北京交往，否則將自食惡果。然教廷本著天主教教義的最高訓導，泛愛衆生，對行徑越是遠離基督福音精神者，越是希冀與之接觸來往，盼其改弦易轍，走

天主教會與羅馬教宗維持純宗教關係，並確認中國天主教主教團而非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為教會的最高權力機構，同時落實歸還教會產業的措施。」

「一九九〇年，中國大陸流傳著一份名為〈警惕境外宗教的滲透〉的內部文件，文中提及二十個具有強力發射訊號的基督教電台向國內人民播放節目，有些更以當地方言廣播。這一年首兩個月，中國海關搜獲三萬八千本宗教書刊和一千多盒的錄影帶，遊客中亦有被發現從事傳教活動者。」

《中國新聞分析》表示：「儘管如此，中國當局在繼續提倡無神論之下，仍然歡迎海外宗教團體訪問大陸。」<sup>3</sup>

把這份權威刊物所分析的中國北京當局對宗教的政策，與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向黃秀日大使所說的話對比，馬上看出教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思想觀念是如何地南轅北轍。

### 第三節 教廷國務卿索達諾樞機主教接受德國漢堡世界日報訪問，談及中國大陸教會狀況

一九九一年東歐正處在劇烈變化之中，共產政權一如水壩決堤似地迅速崩潰著，人類固然因此而驚喜，卻面對著不可知的未來。這年九月，教廷國務卿索達諾樞機主教接受德國漢堡《世界日報》

3 參閱〈中國：宗教蓬勃發展為傳統政治理論帶來挑戰〉，《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中文版，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四日。



(*Die Welt*) 總編輯曼弗雷德·謝爾 (Manfred Schell) 訪問，談大變化中的世界局勢，從即將解體的蘇聯到東西德的統一，從南斯拉夫的內戰到波斯灣戰爭，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權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問題，無所不談。這篇極長的訪問內容分兩次刊登在九月三十日和十月二日的該報上。

這位總編輯問索達諾國務卿：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沒有可能給天主教徒更多的行動自由和更大的寬容？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教的狀況如何？

索達諾樞機主教答說：

「中國天主教徒繼續處在政府的壓力之下，因為政府要求天主教徒不與教宗及普世教會共融。這當然是對宗教自由的侵犯，因為每個人有權利度自己的信仰生活，這是良心認為應該如此的。中國天主教徒在全國人口中屬極小的少數。在超過十億居民中，天主教徒可能只有五百萬人（我們無法有確實數字）。那些天主教徒非常熱愛他們的祖國，也關懷他們的同胞。可是他們看到自己遭歧視而痛苦，他們希望這種痛苦早日結束。在監獄度過三十年生命的英勇的上海總主教龔品梅樞機，今年六月二十八日來羅馬參與樞密會議，他最近接受義大利一個週刊訪問時說：感謝天主，雖然表面看來，那些脫離普世教會的所謂「愛國會天主教徒」人數更多，實則百分之九十的天主教徒都忠於羅馬。」<sup>4</sup>

三個月後，一九九二年元旦，第二十五屆世界和平日當天，索達諾國務卿又接受梵蒂岡電視中心訪問。問及國際上最令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擔憂的是甚麼問題時，索達諾國務卿在羅列克羅地亞戰事、中東緊張局勢以及中美洲的游擊戰之後說：「在亞洲也有緊張的局勢，在中國（大陸）尤其缺

<sup>4</sup> *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 SEDOC, N.2328, 5 ottobre 1991.*

乏宗教自由。為所有這些人，我們都與教宗同心祈禱。」<sup>5</sup>

十二天之後，一九九二年元月十二日，若望保祿二世在年初傳統接見駐教廷外交使節團新年團拜時，向各國大使談論世界局勢中，談到中國大陸說：

「幅員廣袤的中國特別活躍在世界舞台上。我們希望與它建立有成果的國際合作。對這個具有高度文化並在人力和天然資源上非同尋常的大國，教廷懷著喜愛之情期待它。教廷也努力注意生活在那裡的天主教小團體的生活。教宗鼓勵他的中國子女繼續度忠於福音和忠於基督的教會的信仰生活。他也勉勵他們本著一貫的作風，以慷慨的精神服務他們的國家和弟兄。」<sup>6</sup>

教廷國務卿坦白指出中國大陸的人權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不良狀況，教宗則懷著慈父的心情，關懷並勉勵中國珍視自己擁有的種種天賦資產，好自為之，尤其囑咐中國大陸天主教徒做良好的信友和國民，讓政府確實知道天主教信仰對國家社會的真正建設有益。

十八天之後，一九九二年元月底，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李鵬訪問羅馬和瑞士伯恩之後，應邀出席在瑞士達沃斯 (Davos) 舉行的世界政、經、文化、宗教界頂尖人物的年度座談會。參加這次聚會的包括來自東歐前共產國家和蘇聯解體後各共和國的政界要人，還有日本前首相 (Takehita) 等。天主教義大利米蘭總主教區總主教卡洛·瑪利亞·馬蒂尼樞機主教和李鵬並坐在主席台上。馬蒂尼樞機主教先上台發言，就人權與發展之間的關係指出：「必須尊重人權，尊重工作權利，尊重

<sup>5</sup> *Radiogiornale della Radio Vaticana*, 1 gennaio 1992.

<sup>6</sup> *L'OSSERVATORE ROMANO*, 12 gennaio 1992, Vaticano.

人性尊嚴，尊重自由的價值，特別是最崇高的宗教自由。這些乃是應該引導我們的座標」。

這位享譽國際、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前校長、聖經教授、一度被看好下任教宗最佳人選的學者所說的，雖然沒有指明哪個國家，但在座的國際聞人都知道馬蒂尼樞機主教所指的，正是坐在他身邊的李鵬所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李鵬在羅馬和伯恩訪問時，巧妙地避過有關人權問題的追問，沒想到卻在瑞士達沃斯，當著全球最顯要的人士面前，間接地受到米蘭總主教當面的提醒。

座談會特意安排李鵬繼馬蒂尼樞機主教之後發言。李鵬大肆宣揚近十二年來中國的發展都得力於經濟改革，他強調：「我們的國家的改革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制度的改變，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改良和發展」。馬蒂尼樞機主教認為蘇聯解體的原因在於侵犯人權，李鵬則說：「蘇聯的解體對我們有些影響，但不像許多人以為的，因為中國走不同的政策路線。」<sup>7</sup>

#### 第四節 台灣花蓮教區主教錢志純談

##### 「忠貞教會的見證及教廷的指示」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日，台灣高雄教區《善導週刊》刊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時任台灣花蓮教區主教的錢志純寫的。錢主教是台灣主教中最公開關心中國大陸教會的主教之一，而且是絕對支持「地下教會」者。他這篇文章可以說是羅馬教廷授意寫的，而且事關整個中國天主教會，尤其是中

<sup>7</sup> *La Stampa* (義大利《新聞報》), 31 gennaio 1992.

理、正義及信仰的原則下，請忠貞教會了解慈母教會的牧靈立場。(七)基於牧靈的理由，教廷今後在任命主教上，優先考慮中共政權所接納的適當人選。(八)忠貞教會的修士得以到愛國會辦理的修院受教。至於晉鐸，盡可能請忠貞主教主持。如不能，則可由愛國會主教祝聖，自由地區教會人士得在愛國會修院中教書，但應避免壞表樣，或被誤為是在支持愛國會。」

「以上是教廷神長的指示，他們還說，他們總不鼓勵愛國會，也總不責斥忠貞教會「保守或頑固」。……其實，教宗褒揚忠貞教會，不一定是責斥愛國會或中共政權，只因為他們自己心虛，所以把這善意的行為看作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使羅馬觀察報一反其常，斥中共的評語為「一派胡說」。愛國會也完全跟中共一樣說法，真是不應該，真是極大遺憾！」。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對我說：『東歐共產已完全崩潰，中共亦會改變，不過就目前情形，除了為中國祈禱外，我不知再能說甚麼，做甚麼……你們做吧！……對中共及愛國會，他是非常忍耐……由他這片愛心，我們要勸忠貞教會與愛國會彼此體認同為共產的被迫害者，教宗最近對捷克教會的爭執所採取的明確裁判，愛國會應虛心準備接受同樣的安排。……真是在愛德中實行真理，中國的忠貞教會主教，亦應與捷克的忠貞主教一般，依照教宗的指示，接納懺悔的愛國會神職人員，而愛國會的主教經過個案的審查之後，虛心接受合法長上的安排。我們希望此日及早來臨……』」。

中國大陸愛國會任命的主教中，到目前（二〇〇三年）為止約有百分之八十已經受過個案的

8 《善導週刊》，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日。

審查，成為教宗所追認的主教，另有百分之十正在申請受審查中，其他則保持自己的立場。錢志純主教說得極對，大多數的人也同樣認為，即不論是忠貞教會或愛國會，兩者都遭共產政權迫害和利用。所以，他們雙方應該徹悟這點，進而彼此寬恕，盡棄前嫌，互相接納，同情對方數十年所受的痛苦，珍惜先前所耗費的冤枉時日，從現在起就同舟共濟，不再畏懼任何淫威，不再甘做迫害骨肉的工具，及時在有生之年皈依真理，讓良心找到平安，並煥發出最後的光輝。庶幾，千百萬人所受的苦將不至於枉然，而中國的天主教會亦將重見天日，生活在受尊重和自由之中，並對中國的真正益處和整體的進步做出有效的貢獻。

## 第五節 黃秀日大使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八日上午，教宗府當日教宗接見人士名單中，最後一位是黃秀日大使。名單上這麼寫著：「中華民國大使，台灣政府的代表，由夫人和女兒陪同，覲見教宗辭行」。距呈遞國書當天，任期僅一年八個月。是中華民國歷來駐教廷使節中，任期最短的一位。

黃大使是一位佛教徒，對天主教教義以及全球天主教中心的羅馬梵蒂岡並不熟悉，這是意料中的事。但這一切並沒有阻礙他善盡駐節教廷的任務。他自知對天主教和教廷不熟悉，所以走馬上任後，立刻向各方面有關人士請益，並敦請他們隨時給以協助。由於自從周書楷大使任內，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宗教顧問羅大方蒙席卸任返國後，駐教廷大使館再也沒有聘請宗教顧問，中斷了歷來的傳統，是以，新任的黃大使格外需要羅馬本地熟悉教會和教廷事務的人士的協助和支持。若望保

## 第十二章 教宗重申中梵關係本質 並積極東進中國大陸

一九九三年五月—一九九六年八月（吳祖禹大使任期）

第一節 吳祖禹大使呈遞國書，教宗說明教廷在台設大使館的目的，並重申中梵外交關係的本質

一九九三年五月七日為中華民國駐教廷新任大使吳祖禹先生是個非同尋常的日子，不只因為他出使教廷，向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呈遞到任國書，更因為他步乃先父吳經熊博士四十六年前後塵<sup>1</sup>，做中華民國駐教廷代表。這大概是駐教廷使節史上絕無僅有的佳聞。吳大使呈遞國書時，教宗在致歡迎詞中便提到：「我亦為閣下個人因為步武先尊芳踪而格外感到滿意之事而愉快，他曾在我的先任庇護十二世教宗面前擔任貴國的代表。」

<sup>1</sup> 吳經熊博士一九四六年九月出使教廷為公使，翌年二月十六日向庇護十二世教宗呈遞到任國書，一九四九年七月卸任。

天，梵蒂岡發言人納瓦羅博士也發表聲明：「駐巴格達教廷大使館仍將開門工作，即使有武裝介入這個國家，亦然。教廷的一向傳統是它的外交代表即使在極端危險之下，仍然留在他們被派往的地方，與那裡的人民在一起。」<sup>2</sup>明乎此，任何揣測、臆說或判斷都如隔靴搔癢，不具價值。台北板橋已故毛振翔神父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台北《教友生活週刊》上為文所說的有關黎培理總主教的事，令人啼笑皆非<sup>3</sup>。他是一位好神父，對黎培理總主教事件又是最熱衷，他對教會兩千年的歷史和精神應該了解透徹才是。

至於黎培理總主教為什麼被中共驅逐出境，理由恐怕不只一端：他遲遲不公開承認中共北京政府，因為他相信共產黨如狂風暴雨，很快就會雨過天晴，覆蓋中國大陸的陰霾不多幾時將雲消霧散，化暗為明。據說他還勸其他國家大使也留在大陸<sup>4</sup>，反正共產黨旋風很快就會消失，但是國民政府卻不高興黎培理總主教不但不跟隨政府撤離，而且還勸其他國家的大使留在南京。一九五〇年中共當局發起中國天主教徒「自治、自養、自傳」三自運動，與羅馬教宗和普世教會脫離任何關係。這時已遭中共軟禁的黎培理公使致書全中國主教，邀請他們對中共的行動提高警覺。據稱，黎培理公使亦曾向中共北京政府要求赴北京駐下，就像某些國家的做法一樣，但遲遲沒有獲得北京的許可<sup>5</sup>。黎培理總主教公使的處境是兩難的，他身不由己，唯一的可能就是聽從羅馬教廷的指示，

<sup>2</sup> *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 SEDOC*, N.0370, 14 marzo 2003.

<sup>3</sup> 參見毛振翔，〈歡送駐教廷新大使上任〉，《教友生活週刊》，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sup>4</sup> 參見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二四〇～二四一。

<sup>5</sup> *MISSIONE CINA*, p.165; Bernardo Cervellera, *ANCORA*, sett. 2003.

但羅馬教廷也需要聽取他來自中國的報告。其實，不論如何，中共已經形成觀念，視天主教為西方帝國主義的走狗幫兇，除非跟著中共的意志行事，加入三自運動的「教會」，否則只有轉入地下或離開中國大陸。教廷駐中國公使既沒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沒有承認教廷派駐中國的使節，所以，實際上教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建過交，從未有過外交關係。黎培理總主教遲早會離開中國大陸，這應該是預料中的事。

教宗接著又向吳大使談到教廷駐中國外交代表在被迫撤離中國大陸後，先在香港暫駐，不久又被迎至台灣，於是與台灣因此建立關係的事。從教宗這段話看來，可見教廷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所建立的該是嶄新的關係，與先前在中國大陸的國民政府所建立的是兩回事。在中國大陸所建立的，在客觀環境和條件上與在台灣建立的截然不同。如果有相同之處，僅係政府領導人和其部分人員、以及台灣大部分居民與在中國大陸的屬同種同文化而已。就因為他們大都屬中華民族，所以教宗才向吳大使說：「關係之建立，其最深遠的意義在於教廷渴望與偉大、高尚的中國人民家庭繼續保持密切與友誼的關係」。這還不夠，教宗更進一步指出教廷之所以願意與台北建立外交關係，乃因為「天主教非常賞識中華民國一開始就擁護並促進對全體國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同時也為教會能在不受到干擾與歧視的環境下，推行其精神與人道使命所獲致的成果而感激」。

接著，教宗向吳大使「談到兩個至今猶威脅人類、並置千百萬人於有傷他們真正尊嚴的生活中」的弊端，那就是「戰爭和貧窮」。他說：

「擺在國際團體和各國政府、特別是已開發世界的政府面前的，並不僅是資源問題而已，更是人



宗抵達後，在當地主教座堂會晤馬切拉塔教區的神職人員、修會會士、修女和各堂區教友代表。利瑪竇是西方到中國最著名的傳教士，也是天主教會歷來設法向中華民族傳播福音的最傑出榜樣。教宗向他們談到利瑪竇說：

「在那些過去曾為你們的地方增光的傑出人物中，我樂意提出一位，他是今天整個教會的光明標記，偉大的中國使徒利瑪竇神父。他在傳播福音的工作上，使用了信仰與本地文化結合的勇敢方式，為教會的傳教工作開創了新的有希望的前景。對他的懷念，使我想到中國人可敬的國家，在那裡，利瑪竇曾度過他的大半生，也因此得以深刻認識、敬重和熱愛這個國家。」

教宗繼續說：

「中華民族是個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民族，對福音的宣講不是無動於衷：過去幾個世紀由傳教士播下的信仰種子，已經結出果實。我把那裡的可愛的天主教團體託付給上主，願它即使在很多且嚴重的困難中，仍能繼續表現出忠於基督、忠於教會的光輝榜樣。我也把心中的渴望托給上主，希望有朝一日，但願等待的時期是短暫的，能夠親眼會見那裡的基督信友，為和他們一同感謝上主賜給他們的許多恩典，也為堅固他們身為基督忠信與慷慨的門徒、又是全心致力於國家利益的良好國民所要走的路。」<sup>7</sup>

教宗藉著訪問利瑪竇家鄉的機會，再次向中國大陸講話。來自教廷國務院的指示說：他這篇講

<sup>7</sup> *Radio Vaticana : Comunicazione del SEDOC, N.1441, 19 giugno 1993.*

### 第三節 教廷正義與和平委員會主席埃切卡萊樞機主教應邀赴北京，參與中國大陸第七屆全國運動大會揭幕禮

有誰會想到北京當局對法國籍的埃切卡萊樞機主教情有獨鍾，屢屢邀請他前往中國大陸。他於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以法國馬賽總主教兼法國天主教團主席身份，應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對友好協會邀請，首次赴大陸訪問了十七天。十三年後，一九九三年九月二日星期四，則以教廷正義與和平委員會主席身份，接受中國第七屆全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主席伍紹祖邀請，起程飛往北京參加四日該次運動會的揭幕禮。陪同前往的是教廷國務院與各國關係部門（外交部）的中國官員詹弗蘭科·羅塔·格拉吉奧西（Gianfranco Rota Graziosi）蒙席。教廷新聞室為此發表一個簡短的聲明說：「若望保祿二世就職以來，便利用所有可能的機會向中國人民表示他的敬重，同時向這個大國家的所有天主教徒表達他的關愛。」

次日，九月三日星期五，埃切卡萊樞機主教抵達北京當天，梵蒂岡電台節目部主任隆巴迪（Federico Lombardi）神父發表長篇評論謂：

「埃切卡萊樞機主教北京之行自然引起國際輿論界的注意。的確，這是第一次一位教廷部會首長樞機主教應政府組織的正式邀請，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七屆全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主席伍紹祖的邀請是一項禮貌的舉動，這項舉動在今年八月十九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希望與教廷關係正常化的聲明後，格外具有意義。」

「埃切卡萊樞機主教積極回應的目的，則在再度顯示教廷，尤其是教宗，對整個大中華民族的關注與鍾愛。」

「邀訪的機會是意義深遠的運動會。衆所周知的，中國渴望能在北京舉辦公元二千年世界奧運會。不過，一向以來，運動這件事總是各國人民和平相會的有建設性時刻。為此。埃切卡萊樞機主教在這種場合出現，並不具有談判協商的目的，因為這樣的事務並非他所負責的部門的職權；也不為去訪問中國天主教團體；而只是一種純禮貌的表示，一種對中國人民的關注與友誼；一種會晤與認識的機會；一種表明樂意進一步對話與了解的心願。」

「正因為如此，教廷基於關心中國天主教會及世界各民族和平共存的理由，在不放棄天主教會本質與生活基本原則之下，樂於見到自己與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走上正常關係的前景。」

「當然，這是一條長遠而又需要耐心的道路，教廷方面有意本著與它為教會、為人類服務的使命相符的立場，來繼續走這條路。教廷絕不忘記，甚至以祈禱和精神上的關懷，去嘉勉並支持中國天主教團體堅忍的忠貞。這樣的忠貞，教宗不久以前，六月十九日，在義大利馬切拉塔講話時，曾譽為艱苦中忠於基督和教會的榜樣。」

「教宗在那次講話中也表示了希望前往中國親自會晤那裡的天主教友的心願，這個心願完全表白了牧人對那個教會和那個民族的境遇的關懷；也表白了對今天仍在尋求的關係完全正常化的崎嶇途徑的焦慮，他祝望有朝一日關係完全正常化得以在極清楚又可靠的方式中實現，以便營造使天主教上智所安排的會晤終能如願以償的環境。」

「如此，藉著一個單純的禮貌行動，埃切卡萊樞機主教之行帶去的，是教宗和教會對一個大民

族的無限敬意與鍾愛，以及對中國天主教團體來日得以度安寧生活的期望。」<sup>10</sup>

多麼婉轉、多麼誠懇、多麼不偏不倚的評論啊！梵蒂岡教廷不只一次對中國北京發表類似的言論，每次聽到或看到這樣的言論，心中總會產生中華人民共和國當道人士難以理喻的感覺。

九月四日，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說：埃切卡萊樞機主教是以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伍紹祖的友人身份，應邀參與全國運動會揭幕儀式的，所以這件事與教廷無關。九月五日星期日，埃切卡萊樞機主教在北京天安門人民大會堂會晤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布赫。北京《新華通訊社》稱：這是四十多年來正式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神長中，身份最高者<sup>11</sup>。

九月六日，台北《中央日報》引用《中央社》發自羅馬的消息說：「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日前對教廷正義與和平委員會主席埃切卡萊樞機主教應邀前往中國大陸訪問一事表示遺憾和關切。駐教廷大使吳祖禹說，大使館獲悉消息後，立即前往國務院表示嚴正關切。大使館對教廷第一次正式接受中共邀請，選派樞機主教前往大陸表示遺憾。吳祖禹也向教廷國務院高層人士說，教宗關切中國大陸受難教友之心舉世欽佩，但教宗應利用祈禱，多給大陸教友精神鼓勵，無必要與堅持無神論的共產政權打交道。教廷高層人士對吳祖禹大使的言論表示贊同，他們同時保證說，埃切卡萊樞機主教前往大陸訪問，只是代表教宗關懷大陸上數百萬教友的信仰生活，不會影響中梵兩國的關係。」<sup>12</sup>

九月七日，埃切卡萊樞機主教結束在北京的訪問，臨行前夕發表聲明說：「藉著快速成長的

<sup>10</sup> Ibid., 3 settembre 1993.

<sup>11</sup> ANSA 通訊社，一九九三年九月五日北京電訊。

<sup>12</sup> 參見〈對教廷樞機主教應邀訪問大陸，吳祖禹表示遺憾和嚴正關切〉，《中央日報》，一九九三年九月六日。

跳動，新中國以運動的熱忱投向公元二千年，為證明它願意越來越向人類各民族開放自己」。他強調這次訪問行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天主教會彼此願意對話的有形可見的記號」，他說他發現「對談者都希望翻轉北京和羅馬都難以共同書寫的古代的、或近來各寫各的歷史章節」。這位非外交出身的外交長才又說：「在我停留北京期間，我從未間斷過想念中國天主教友，並為他們祈禱。這是一個發展中的教會，它就像其他地方教會一樣，都因著為信德作證的人所立的榜樣和所受的苦難，而結出豐碩的果實。這個教會有權利獲得普世的祈禱與關懷，以便儘快恢復截至面前為止仍然遭撕裂、但正逐漸在「修好並承認與教宗的關係」中縫合的合一。」<sup>13</sup>

九月九日，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吳建民在每週例行的記者招待會中，低調處理埃切卡萊樞機主教中國之行，但重申北京政府與教廷改善關係的意願。但是他仍然重提北京當局一向的立場，即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教廷必須中止干預中國內政<sup>14</sup>。

台北輔仁大學校長羅光總主教對埃切卡萊樞機主教應邀訪問中國大陸的事，評論說：「骨子裡中共本來不願意和教廷談，也不願意和教廷通使，他只企圖斷絕教廷和我國的國交。教廷為了改善大陸天主教會的境遇，很早就表示願意交談，而且在中共進入聯合國後，教廷就不以中華民國代表中國，不派大使，不來台灣訪問，不任命中華民國樞機，在在避免刺激中共。現在若中共真願意交談，如他們能讓步到教廷最低的要求，准許中國天主教會受教廷節制，和教廷通往來，教廷將會

<sup>13</sup> *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 SEDOC, N.1917, 8 settembre 1993: DECLARATION DU CARDINAL ROGER ETCHEGARAY, Pékin, 7 settembre 1993.*

<sup>14</sup> ANSA 通訊社，一九九三年九月九日北京電訊。

接受中共的斷絕和我國國交的要求。我們在心理上應有這種準備。不過，很難說中共是不是談，是不是讓。」<sup>15</sup>

#### 第四節 若望保祿二世視察教廷新聞室談兩個中國問題

教廷新聞室整建記者招待會議廳完成，命名「若望保祿二世廳」，於一九九四年元月二十四日邀請教宗前往視察。各國駐教廷記者當然不會錯過與教宗會晤的機會，況且教宗還願意接受記者提出問題，當場予以答覆。這是極其難得的機會。有日本記者問教宗：願意和中國人民、中國文化、中國各宗教、尤其願意和在中國的教會建立何種關係？

從教宗的答覆，可以看出教宗並沒有事先準備好要回答這個問題。因此，他的話不是很順暢流利。前後句也不是很連貫。不過從這裡更可以了解教宗本人對這些問題的實在想法。他的答覆大致如下：

「這是很吃重的話題。今天我們知道很多關於在中國的教會的事情，關於官方教會、即所謂的愛國教會的事情。其實應該說是愛國會，而不是愛國教會。可是最近以來，在這艱困、迫害的時期，中國的天主教友人數似乎增加了很多。至於接觸，我們當然不會錯過任何接觸的可能，這些接觸由於佈

<sup>15</sup> 參見羅光總主教，〈教廷與中共的關係：梵蒂岡已作出了許多讓步〉，《公教報》，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轉載自台灣《益世評論》。

滿著兩個中國之間的政治問題，一個是大陸的中國，另一個是中國外邊的中國，也就是台灣，所以變得困難。我在訪問馬切拉塔的時候，就是這麼說的。馬切拉塔是耶穌會偉大的傳教士利瑪竇的家鄉，他為了使基督信仰接近中國文化，並使中國文化接近天主教會，接近基督信仰，做了很多的事。中國人很敬重利瑪竇，很懷念他。他是我們可以接觸的橋樑。我之所以說了那些話，因為有時候衝出口來，過於大膽。其實，要是教宗說他願意到中國去，這已經不足為奇了。要是羅馬的主教說他要去探訪他的本堂區，難道他不想到中國去嗎？有些話總應該說的，一句鼓勵的話，而不是輕率鹵莽的話。大家都等待那些話，而且不只是話，也要有舉動。訪問在中國的教會，這當然是很大的渴望。」

若望保祿二世這段答覆記者的話並沒有見諸教廷官方的文件，想來大概因為教宗的這些話是脫口而出的，沒有經過事先的周詳考慮，一方面語焉不詳，另一方面有些話可能不適合說。因此，教廷不把它當作正式談話，亦不將之對外發表，梵蒂岡電台雖然把錄音下來的話全抄寫出來，但也沒有加以編號歸檔，不視它為官方正式文件。

教宗渴望前往中國大陸，目的在探望四十多年來飽嚙有形無形迫害、備受考驗的天主教徒團體。這是他身為普世教會最高牧人的義務和最深的關懷。無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總是要求教宗先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並不能干預中國教會事務，然後才有踏上中國大陸土地的可能。教宗關心的是宗教事務，北京政府感興趣的則是政治外交。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三日，全球樞機主教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召集，在梵蒂岡舉行第五次樞機團特別樞密會議（Concistoro），主要目的是為積極籌備迎接公元二千年大禧年的來到。上一次類似的會議是在一九九一年四月份召開的。這天上午九時，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親臨主教會議大廳會場致

辭，向全體樞機主教講述這些年來教廷各部門的工作。在談到教廷國務院對外關係時，教宗先提到這些年來，尤其是自從一九八九年東歐發生劇變後，許多前共產國家和其他國家紛紛與教廷建交，到當時為止，計有一百五十一個國家與教廷維持外交關係，就連最難交涉的以色列，也與教廷建交了。於是，接著有這麼一小段說：「至於中國大陸和越南，教廷採取各種不同方式，希望能夠達到關係的正常化。」<sup>16</sup>

教宗這篇向他的全球諮議顧問團發表的講話，當然是經過國務院深思熟慮、百般推敲之後才定稿的。在上面那段短短三句話中，有值得回味的地方。首先，教宗沒有說「中國」，而說「中國大陸」，這意味著教宗不願意把教廷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和教廷與北京中國未來可能的外交關係混為一談，因為教廷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外交關係沒有任何問題，至少在教廷的立場上是如此。這當然是北京不願接受的。但是教宗在向全球樞機主教團致辭時，他的話是最見真情不過的，絕無避諱之處，因為那是對全球天主教會內部最高機構的講話，是對他的顧問團的坦白，很像是國情咨文一樣，其真實度不亞於無意中向記者脫口而出的話。其次，教宗把越南與中國大陸並提，這主要是基於地理位置的關係，但是在雙邊關係上，越南與教廷的關係要比中國大陸與教廷的關係領先十年以上，而且越南沒有明顯的政府建立的愛國會問題，中共製造的愛國會已有將近半百的年紀，其尾大不掉的麻煩確實叫北京部分領導人士煩惱。

<sup>16</sup> *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 SEDOC, N.1095, Apertura della V Riunione Plenaria del Collegio Cardinalizio: Discorso del Santo Padre N.2, 13 giugno 1994.*



## 第五節 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派遣教廷萬民福音部部長董高樞機 主教爲特使，赴台主持紀念子血高維諾抵華七百週年慶典

一九九四年九月八日，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簽署委派狀，派遣教廷萬民福音傳播部（傳信部）部長若瑟·董高樞機主教前往台灣，主持九月二十五日在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舉行的、紀念十三世紀末年義大利籍方濟各會會士孟高維諾來華傳播福音七百週年慶典。

教宗在委派狀中再次表達他對中國天主教信友團體的思念、關懷、讚佩和嘉許，而且重申羅馬教宗在普世教會中的身份地位，希望中國大陸天主教徒度有形可見的信仰共融生活。教宗同時表示希望及早到台灣看訪當地的教會團體。

教宗這篇委派狀內容並不長，但行文中幾處特別重要，值得提出來：

### 第二段：

「紀念若望·蒙高維諾抵達北京七百週年，使我想到當前的中國天主教團體，這個團體乃是第一個在中土樹立起來的教會的延續和成長。」

### 第四段：

「我的確高興，能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內向，向偉大而卓越的中國家庭的天主教子女重申我對他

們的疼愛和敬佩。我心中的確感到我在他們中間，我向他們保證我特別接近那些在各種艱苦中至今仍然保持忠貞的人，他們至今仍然繼續為與伯多祿的繼承人共融的原則作證，即使必須付出既深且久的痛苦代價，亦在所不惜。伯多祿是上主所立的在世代表，是信仰統一及精神共融的永久可見的中心和基礎（教會憲章，十八），誰願意作天主教徒並被認為是天主教徒，就不能放棄這個原則。」

#### 第五段：

「我知道在中國各地有許多熱心的教友團體正在蓬勃地成長。為了履行基督託付給我堅定他們的信德、望德和愛德的使命，我切望促進他們彼此間的忠誠、諒解與修和，並把他們都聚集在那藉著聖神的德能而使我們都維繫在基督內的共融中。在邀請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子女在真理和愛中度這個共融的生活的同時，我祝禱這樣的共融能以日益有形可見的方式彰顯出來。宗教信仰及其實踐乃是一個人負起社會和國民責任的動力之源，在做一位真正的天主教徒和做一位地道的中國人之間，並沒有矛盾和不相容之處。」

#### 第六段：

「我祈求天主，使在台灣舉行的這些慶典能激勵那裡我心愛的教會團體中的主教、神父、會士、修女和在俗教友們。在天主上智的許可下，我願早日去看他們。希望這能鼓舞他們做更忠誠的基督信徒，並更慷慨地協助他們在大陸的兄弟姐妹們。」<sup>17</sup>

<sup>17</sup> Ibid., N. 1667, 26 settembre 1994.

紀念慶典當天，董高樞機主教除了當眾宣讀教宗給他的特使委派狀之外，也在慶典揭幕彌撒禮中發表了一篇證道詞，其中的第二節有兩段話很重要，值得體味，他說：

「按照天主教的信仰，僅侷限於一個國家的『國家』教會是不存在的，也沒有任何教會完全獨立於其他的天主教會團體。散佈在全球各地的地方教會或公教團體，依其創立人耶穌基督的意願，與伯多祿的繼承人有著基本的共融關係，他是合一的基礎，並從羅馬主導普世教會的友愛共融。教會若缺乏這基本的共融關係，就無法圓滿地存在，但這種關係絕不在抑制地方教會主教的職責，反而在促進並加強主教的職責。」

接下來一段說：

「教會是至公的，普世性的，但不是『國家』教會或地方教會（教區）的聯合會。基督親自給教會的個別部分或教區之間一個可見的合一基礎，這個基礎就是這些部分或教區賴以建立的唯一磐石伯多祿。沒有任何人為的力量能給教會任何其他結構。」<sup>18</sup>

負責教廷在全球傳教區推展傳教事務的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這席話雖然是在台北講的，卻是講給中國大陸的教會、特別是公開教會和愛國會、以及北京政府聽的。

18 筆者得自教廷傳信部原稿資料；可參閱《教友生活週刊》，一九九四年十月二日。

## 第六節 香港胡振中樞機主教應邀訪問中國大陸

香港教區主教胡振中樞機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張聲作邀請，於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日率領七人訪問團前往北京、武漢及西安三地訪問八天。

十一月十一日，梵蒂岡電台節目部主任隆巴迪神父對胡樞機主教訪問中國大陸事，給電台下列的指示：

「的確，這是一項重要而且有意義的事，因為這項邀請是官方性的。此邀請應與香港及其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問題有關。胡樞機主教不負有在教廷與中國間作仲人的任務。在我們（電台）這方面，這不是談論「加速對話」的時機，一如許多傳媒所說所做的一樣，因為教廷的立場並沒有改變，而且也因為在這段時期，中國某些地區對待天主教徒還非常嚴酷。教廷方面當然始終渴望對話，但是他的條件是能夠面對並解決在中國的教會問題，這些問題對教廷是基本的。因此，這是良好的機會重提最近教宗為了紀念孟高維諾抵華七百週年慶典，而寫給董高樞機主教的委任狀的幾個要點。」<sup>19</sup> <sup>20</sup>

教廷新聞室主任納瓦羅博士十一月十日曾就胡樞機主教的大陸行發表簡短聲明說：「但願教

<sup>19</sup> 參見本章第五節。

<sup>20</sup> *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 SEDOC, N.2018, 11 settembre 1994.*

如佛教的法師不能由政府干預，否則法師不能真正執行佛教的信仰；如果佛教法師要由政府安排，那是政治干涉宗教的最大恥辱。同樣，天主教主教如果由政府認可，又怎能算是純正的天主教？」。

「梵蒂岡在台灣委任主教，從來未曾聽聞政府予以干涉，在世界其他國家也沒有受到干涉，為什麼大陸政權不但不承認，反要說是梵蒂岡干涉內政？這一點實在令人費解。因此，我們希望大陸政府認真考慮，先讓大陸一切被教宗委任的主教恢復自由，讓大陸的「地上」及「地下」教會得到相同平等的對待和保護，則建交的事才有成功的一天！」。

「胡振中樞機訪京之行，任務確很重大。我們希望他此行能帶回來的，是香港九七後宗教能夠保持自由，香港天主教的一切事業可保五十年不變，同時也期望他能使大陸政府明白，教宗委任主教根本不是干涉內政，讓大陸的教會能夠普遍得到自由，不再遭受禁制與迫害，則九七回歸將是一個充滿希望與歡樂的日子！」。

香港教區週刊這篇社論已經是對胡振中樞機主教應邀訪問中國大陸之行的極好評論，也是對中梵關係和政教關係的原則性界說。

## 第七節

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蒞臨馬尼拉主持第十屆世界青年日，在真理電台二十五週年慶中向中國大陸教友發表  
廣播講話

新聞記者問納瓦羅，來自中國大陸的神父是否將和教宗共祭，納瓦羅答說：

「這完全在於他們個人的意願和（馬尼拉）本地天主教教區當局的決定，教區當局有權要求教會法一向所要求的保證，亦即在必要的情況下，要求宣認天主教的信仰。」

梵蒂岡發言人這兩段話很清楚，第一段在說明教宗不會拒絕來自中國大陸的政府所承認的神職教友團體，但教宗更向留在大陸無法前來與他相會的忠貞的主教、神父、會士教友們表明，他以同樣的慈父情懷想到他們，並說他們為了忠於教宗經常英勇地受苦。第二段話在澄清某些問題，即教廷一向不准全球天主教任何神職人員與中國大陸政府所認可的所謂的官方教會的神職人員一同舉行教會的禮儀。現在有來自中國大陸政府所承認的神職人員要和教宗舉行彌撒共祭，為了避免混淆視聽和可能的不軌意圖，馬尼拉總主教區有權要求那些希望與教宗共祭的、來自中國大陸的神職人員，事先當眾宣發教會法典所要求的信仰宣認，以示對教宗和羅馬教會的忠誠。在這種條件之下參與共祭等禮儀才合乎天主教的正軌。

元月十四日，教宗在馬尼拉亞洲真理電台向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發表一篇重要文告說：

「我切願藉著來到馬尼拉參與第十屆世界青年日的機會，向全體中國天主教徒致特別和摯愛的問候，他們使基督的至一、至聖、至公、由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即信、望、愛的團體，有形可見地臨在中國本土。」

「中國教會親愛的兄弟姐妹們，我深深地體會到你們蒙召為基督信仰作證所遇到種種困難。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論及整個教會的話，與你們的經驗非常配合：教會是在世界的迫害與天主的安慰中，繼續著自己的旅程。」

若望保祿二世從羅馬飛往馬尼拉途中，答覆記者的問話說，他將向中國教會說該說的話。上面節錄出來的大部分講詞，就是教宗要向中國大陸教會團體說的該說的話。這篇講話並不長，但是重要都已經包括在裡面了，可以說是言簡意賅。教宗深切知道中國教會善度基督信仰生活所遇到的種種困難，他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會憲章》第八節的話，恰如其分地指出中國大陸教會的處境「……教會是在世界的迫害和天主的安慰中繼續走自己的旅程」。教宗安慰、甚至激勵中國的天主教徒不要害怕，畢竟基督已經戰勝了世界，而且天天都和他們在一起。

教宗並沒有鼓勵中國天主教徒與現世的權力對抗，更沒有唆使他們度消極的生活。他反而勉勵他們以言行為愛德作證，尤其勉勵一直處在對立中的地下教會和地上教會努力彼此修好，不畏懼外力的壓迫，不尋求僥幸，不玩弄人間的小技巧小聰明，本著基督已經戰勝世界的信念，真心和全心皈依基督，遵照真理在愛德中度信仰生活。

教宗首要關心的是中國大陸地下和地上教會團體的修好與合一。但是教宗再清楚不過地說：「合一不是人間政治或隱晦玄秘的意圖的成果，而是來自內心的皈依，來自真心誠意接納基督為祂的教會所立的不變原則。」這個原則就是教會各部分與伯多祿磐石的實質共融。這個共融正是大陸部分教會，也就是所謂的政府所指使的地上教會，所缺乏的。須知中共政權無法使在中國大陸教會合一，更無法、也無權使在中國大陸的教會與羅馬教宗及普世教會合一，因為那不是人間政治的成果。中共指使的愛國會也不必處心積慮，企圖引地下教會出來歸附地上教會，因為那都是隱晦玄秘的歪主意。

總而言之，中國大陸教會的問題就是教宗清清楚楚所訓示的，真正的愛德不能與真理脫離，所

以必須遵照真理而在愛德中生活。這個真理就是與伯多祿及其繼承人實質地合一。否則，他就不是  
一位天主教徒。香港《公教報》為胡振中樞機主教訪問中國大陸所發表的社論<sup>25</sup>，在教宗這篇講話中  
得到肯定。

這一年八月十九日，台灣地區主教團到羅馬南郊岡道爾夫堡教宗夏宮向若望保祿二世述職。教  
宗囑咐台灣的主教們盡一切努力，使教友產生內在革新和真正傳教精神的效果，確保福音根植在自  
己的文化中，以證實在「真實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國人」之間，不可能存在著對立或不相  
容。教宗也呼籲台灣的天主教徒，以偉大中國人大家庭成員的身份，促進中國大陸天主教團體內的  
修和與共融。教宗表示：既然中國大陸的信友兄弟姐妹們已經開始能夠為教宗祈禱，並且多少承認  
伯多祿的特定職務，那麼還需要多久教宗才能擁抱他們，並堅定他們的信仰與合一呢？<sup>26</sup>

基督宗教常被東方人視為洋教，視為與東方精神文明格格不入的思想。其實，一種文化和文明  
並不是永遠墨守成規的，它們都不斷地在和其他的文化與文明交流，交互影響，產生潛移默化的作  
用，沒有所謂的純中華文化、純日本、純義大利文化，因為這些文化數世紀以來不斷地和鄰近地區  
的文化交融著。正因為這樣，一種文化才能不斷更新，獲得新的生命活力，而不至於沒落，遭淘  
汰。中華文化如此，其他任何文化亦如此。但是當兩個民族因為其他利害關係發生摩擦時，那主導  
內心生活的宗教信仰常首當其衝，被視為衝突的主因，非除之不為快。

<sup>25</sup> 參見本章第六節。

<sup>26</sup> 參見《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四五二—四五三。



基督宗教之於中國，常處在這種關係中，碰到一個視宗教信仰如洪水猛獸的政治意識型態和政權時，那些不源發於本地的宗教，其命運可想而知。基督宗教之不見容於中共，此亦其主要理由之一。教宗因此希望中國人向自己的同胞傳播福音，並以身作則，讓他們看到作一個基督信徒不但不影響作一個真正的中國人，而且還更有助於他們作模範的國民。

天主教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沒有任何問題，教宗希望藉著他們的努力，幫助中國大陸教會團體擺脫政治的干擾和指染，自己修好合一，不要讓政治藉口破壞他們的純正信仰。二十世紀末年，中國大陸天主教會開始覺醒，緩慢地走向內部修和的方向。那裡的教友開始公開為教宗祈禱，承認教宗為教會的精神領袖。若望保祿二世因此懷抱希望，切願早日能直接與他們接觸交往，彼此生活在圓滿的共融中。

## 第八節 若望保祿二世應邀向聯大發表演講，指出同一民族可建立聯邦或邦聯

一九九五年十月五日，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應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Boutros Ghali）邀請，在聯合國慶祝成立五十週年的機會上，在紐約總部以英語向聯合國大會發表重要講演，其講詞亦以法、西、阿拉伯和中文四種聯合國使用的官方語言譯成文件發給在場各國代表，並存入聯合國檔案中。講詞內容反省最近世界局勢的變化及其對人類前途的意義，以及如何建立一個真正自由的文化等問題。演講的幾個主題是：人類共同的產業，人類為追求自由而冒險，民族的權利，尊重差

關於董文學神父，教宗在列聖品彌撒禮儀講道中說：

「在我們今天紀念董文學之際，我們也願意同時紀念過去數世紀在中土為耶穌基督之名作證的所  
有的人。我尤其想到那裡的殉道真福，他們的共同宣聖，一如許多信友所盼望的，可能有朝一日成為  
臨在於這個民族的教會的希望標記，那個民族常在我心中和祈禱中。」<sup>29</sup>

教宗在講道中提到他所關切的在中國的殉道真福集體宣聖的這件事，早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日台灣的中國主教團在羅馬向教宗述職時，即由當時高雄教區的鄭天祥總主教提議，請求教宗把在中國殉道的全體真福一起列入聖品。當時教宗答允照辦。鄭總主教隨即往見教廷冊封聖品部部長，轉達教宗的旨意，部長答允遵辦。但一年後仍未見動靜，鄭總主教於是再往見教廷冊封聖品部部長，部長謂教廷國務院指示：緩議。此一緩便無下文。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日，法國遣使會在華傳教士董文學在羅馬梵蒂岡被冊封為聖人。在此之前，台灣主教團主席，花蓮教區的單國璽主教曾建議教宗，把在中國殉道的所有真福與董文學真福一併冊封為聖人。可惜由於時間太倉促，來不及準備，而無法如願以償。因此，教宗在冊封董文學為聖人之際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在中國殉道的諸位真福一起列入聖品。後來，單主教又多次向教宗請求此事，教宗每次都答允照辦，但都沒能實現。理由是教廷國務院總以為大陸教會事件不宜由台灣主教團出面辦理，以免激怒中共<sup>30</sup>。

<sup>29</sup> 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 SEDOC*, N. 0855, 2 giugno 1996, Vaticano.

<sup>30</sup> 參見羅光，〈對中梵關係的努力〉後記，〈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七三二～七三三。

## 第九節 吳祖禹大使

猶記一九九〇年底，吳祖禹大使奉命前來羅馬，為新成立的台北駐義大利文化經濟學會進行創業維艱的籌設工作。待籌設工作一切就緒後，筆者便在翌年春季一個雨日的上午，未經事先約定，便興匆匆地持著雨傘前往址設薩丁尼亞路（Via Sardegna）的中華民國駐義大利台北文化經濟學會，冒昧拜見吳大使。我們並不相識，但是吳大使很客氣地引我在裝潢簡樸的客廳坐下。我簡單地自我介紹一下，說明自己是慕名而來的，因為從小即仰慕他的先尊吳經熊先生，既然無緣承受教益，能拜見他的哲嗣亦堪足慰。

筆者從小就經常聽到吳經熊這個大名，首先是因為他曾擔任中華民國駐教廷公使，再就是國際知名法學家，又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蒙蔣介石總統邀請，翻譯舊約聖經的聖詠集和新約聖經，對中國哲學鑽研極深，還有一位兒子吳叔平是天主教馬利諾會的會士神父，據稱是一位物理學者，卻在台灣中部山區為原住民從事傳教牧靈工作。所以，這個不平凡的家庭很引起我的好奇與興趣。當時我並不知道吳經熊博士先生還有一位公子在外交界服務。直到吳代表擔任駐紐約總領事後，才偶爾在報章上讀到有關他的消息，知道吳經熊先生原是他的先尊。

吳代表聽了筆者這番「介紹他的父親」的自我介紹後，笑逐顏開。他大概不會想到遠在羅馬，還有一個素不相識的後生對他的先尊和家庭如此地景仰。當時，筆者祝他有朝一日也步其先翁的後塵，出使教廷，則必成佳話美談。與吳代表閒談了將近一個小時，便起立告辭，他好意邀請筆者共

進午餐，但因筆者必須上班，而且不敢打擾浪費他的時間，於是謝辭了。孰料當時純屬禮貌的祝賀，竟在兩年後成真。

吳祖禹大使看來是一位傳統典型的外交官，他出使教廷的外交觀念和做法比較傾向於保守。想來他大概深知中華民國與教廷的外交關係難以突破現今的瓶頸。據聞吳大使一次與教宗懇切談話，教宗坦白告以教廷的對華政策是力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正常化。言外之意，台灣的中華民國與教廷的外交關係，端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教廷的態度而定。換句話說，台灣的中華民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其與教廷的外交關係必須承第三國的眼色，這對堂堂一個國家來說，當然是難以接受、有辱尊嚴的條件和局勢。許多國家為了經濟和政治利益，接受中共的條件，不敢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甚至在國際場合中亦不敢為中華民國仗義執言。教廷為了中國大陸天主教團體的益處，對北京政府亦屢屢善言相待，不願正面譴責該受譴責的事，令人也產生教廷受制於中共的感覺。總之，全世界絕大部分的國家和國際組織，或因為經濟政治利益，或因為教會團體考量，沒有一個敢當面對中共直言不諱。

據聞，身為天主教徒的吳大使，面對這種無力可回天的無奈，心中痛苦難堪，經常生活在中梵斷交的威脅和恐懼中，往往徹夜難眠，久而久之，對他身心健康影響頗大。吳大使不曾放過機會奉勸教廷主事人員勿與中共謀皮，否則必將自食惡果。這樣的勸告對一般國家或許能產生一時的作作用，但對教廷則幾乎可以說適得其反，蓋教廷一向本著兩千年基督信仰的精神，越是危險的地方和難馴的對象，越是它必須前往克服和說服的目標，因為就如天主教會的創立者基督所說的：「不是

健康的人需要醫生，而是有病的人：我不是來召義人，而是來召罪人」<sup>31</sup>。故此，教廷絕不會知難而退，遇到阻礙，它頂多只會暫停，等待有利的時機再行出發，但絕不會打退堂鼓，否則，教會就不成為教會。基於吳大使的勸阻立場，教廷遂不敢將其與北京的接觸告知吳大使，一方面不使他難過，因為教廷很敬重吳大使的家世淵源，另一方面也不願惹來他的抗議，因為這對雙方都是極尷尬的事，比方說一九九六年年初教廷主管中國事務的要員密赴北京談判一事，就不敢事先告知吳大使。但是對一位外交人員來說，消息靈通卻是他的基本任務。

吳大使在羅馬的官邸是黃秀日大使所留下的，他在客廳的玻璃櫃中珍放一幀古老的大照片，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彼先翁吳經熊公使率全家大小十六人與庇護十二世教宗合拍的歷史性珍貴照片，當時吳大使正當英年。每當有賓客來訪，尤其是教廷的樞機主教和要員來官邸做客時，吳大使常以這幀照片相示，看者無不嘖嘖稱奇。但有誰能夠體會吳大使此一時也彼一時的心境！

一九九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上午，吳祖禹大使伉儷前往岡道爾夫堡教宗夏宮謁見若望保祿二世，向他辭行。臨別時，吳大使向教宗表達最後一個願望，即請教宗協助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教宗告以這類事務屬政治問題，宜同國務卿商討。的確，自從一九八〇年代梵蒂岡遭遇義大利米蘭安博羅削銀行（Banco Ambrosiano）倒閉案牽連後，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煩不勝煩，他深恐自己身為教宗的神聖天職遭到塵世事務的污染，已把梵蒂岡屬於塵世的事務都交由國務卿全權負責處理，身為教宗的他只願關心普世教會宗教心靈上的問題，以保持他超然物外、不涉人人間現世事務的身份

31 瑪竇福音第九章十二、十三節。

地位。

吳大使卸下駐節教廷這份重任，為他或可說是一種解脫！返國後即退隱美國加州，安享天年！

天主教會的成員，尤其對本人所特別關心的中國大家庭成員而言，意義特別重大。然而，公元兩千年的意義並不限於全體基督信徒，它更影響到全人類。福音書中的真理與價值在人類道德原則與社會觀念的演進中，扮演著根本的角色，而道德原則與社會觀念的演進幾乎在所有的社會與文化中，都正是有關人類未來前途爭議的焦點。」

教宗闡述大原則之後，他的答詞逐漸縮小範圍且具體化：

「去年，本人在聯合國大會的演說中曾提到：在人類邁進公元二千年之際，吾人目睹全球各地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追求自由，因為自由是人類歷史進化的偉大原動力之一（一九九五年十月五日 No. 2）。在不同文化之下的男女將會更清楚地認識到自由人所擁有的尊嚴之可貴。人們也要求在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中，亦能獲得與此種尊嚴相符的待遇。」

教宗引據權威文獻談到人權、尊嚴及其相關的問題說：

「事實上，聯合國於一九四八年通過的《人權宣言》乃是當代人類良知的最高表現之一，世界各地的人都訴諸此一宣言，以支持較完整的社會參與權。一九九五年三月在哥本哈根舉行的社會發展世界高峰會議中，對該宣言的條文與精神重新莊嚴地予以確認。在會中，各國領袖承諾將以人性尊嚴、人權、平等、尊重、和平、民主、彼此負責與合作、以及對人類不同宗教、倫理價值和文化背景充分尊重為基礎，從政治、經濟、倫理與精神觀點，建立社會發展藍圖（哥本哈根宣言 No. 25）。」

於是，教宗向戴大使談到教會與現實世界的關係說：

「就此而論，政治社會與天主教會儘管互不隸屬，仍可依其特有的屬性，可為同樣一群人類之個人與社會使命效力（參閱梵二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76）。天主教會深知其使命為一宗教使命，非關政治、經濟與社會秩序。因此，教廷並不受限於任何一特定形式之文化或任何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同時，此一宗教使命本身產生了一種功能、一種光與一種能，能夠藉著天主的法律整合及鞏固全人類（同上42）。由於天主教會的普世性，倘人類不同的團體願意信賴教會，並保證維護教會完成其使命的絕對自由，教會可令這些不同的群體間建立密切的關係（同前）。」

最後，教宗談到他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期望說：

「就這方面而言，本人樂於承認，在閣下的國度裡，天主教會享有此種自由，得以其獨特的方式，亦即宣揚真理、正義與團結的方式，為世界人類的福祉而努力。所有的中國天主教徒皆渴望親身參與這項服務的使命。他們只希望能夠自由地為兄弟姐妹及全國同胞的精神與物質進步奉獻心力。本人熱切祈禱，盼望所有中國人能夠信賴天主教會，同時，天主教會也相信，中國人在和平與發展的工作上能夠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造福全人類。」<sup>1</sup>

如果我們仔細研讀和比較若望保祿二世對先前的黃秀日和吳祖禹兩位大使以及這次對戴瑞明大使呈遞國書時的答詞，不難發現教宗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教宗先談基督信仰對整個人類都具有意義和價值；接著談論教會雖與人間大小社團組織性質不同，但與聯合國及國際團體所追求的理想相

<sup>1</sup> 參見《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二四五—二五三原文及中譯文。



同，皆以人性尊嚴、基本人權、正義、和平、倫理道德、以及自由與民主為宗旨。於是教宗希望世間的團體組織信賴天主教的善意和存在功能，彼此攜手，共建人類大家庭的福祉。在這前提之下，教宗對中華民國人民所享的宗教信仰自由感到欣慰，他更為天主教在臺灣得以發揮其服務使命而感到滿意。他相信在台灣的中國人，尤其是天主教徒，無不樂意為全人類的福祉和同胞的精神與物質進步奉獻心力。他更希望在中國大陸的中國人也能信賴天主教會，就像天主教會也信賴他們一樣，大家同心造福全人類。

我們看到教宗的講話不涉入個別國家的政治事務和問題中，他過去告訴黃秀日大使，要把與教廷的關係放在與倫理道德有關的事務上，而不要著眼於兩國之間的政治問題上。這樣的期待和囑咐，也同樣對吳祖禹大使表示過。如今，教宗向戴瑞明大使所說的，更完全集中在人類大家庭整體的福祉上，毫不侷限在雙方表面上意義狹隘的邦交問題上。足見教廷對中華民國的期待是甚麼。戴瑞明大使深切明瞭教宗的心意，所以履新後的作風可以說是一新耳目，他把眼界視線放遠到全球人類共同的命運上，讓這樣的理念來主導他的外交行動。這樣，中華民國在教廷心目中，確實是個工作合作的夥伴。

## 第二節 若望保祿二世聖方濟各·沙勿略瞻禮致在中國大陸教會文告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天主教傳教士保聖方濟各·沙勿略 (San Francesco Saverio) 瞻禮

日，當天上午七時，若望保祿二世教宗邀請旅居羅馬的數位神職教友在他的私用小聖堂參與他舉行的彌撒聖祭，彌撒中，教宗透過梵蒂岡電台，現場向中國大陸天主教團體發表一篇極其重要的文告。聖方濟各·沙勿略在天主教中佔有重要地位，他是傳教使命工作的保護者，天主教傳統稱之為「主保」，又是在利瑪竇之先試圖前往中國傳教，但在進入中國前夕，病死於廣東上川島者。普世教會奉他為聖人，同時也是傳教的主保。教宗選在這一天向中國大陸發表無線電廣播文告，意義重大。

這篇文告基本上是對中國大陸的主教們說的，它的主旨在勸勉那裡的主教們做合乎基督所要求的真正主教，不要為自己的處境尋找藉口，並在準備迎接公元二千年大禧年來到之際，以內部的彼此修和及與教宗所領導的普世教會的共融，作為慶祝大禧年的獻禮。

教宗這篇文告在中梵關係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份量，雖然內容都為宗教性質，但關心中梵關係的學者不能不察。僅列幾段以窺其要義：

教宗要求中國大陸的天主教徒忠貞不二，不可隨異端邪說之波逐流：

「今日所有的中國天主教徒也都要堅持他們所接受的信德，不可屈服於一個與教主耶穌的旨意、與天主教會的信仰、與絕大多數的中國天主教徒的心情及信念不符的教會觀念。否則只會產生足以導致混亂的分裂，這對信仰本身和對信友對祖國的和平與社會進步所能做的貢獻都有害無益。」

教宗接著提到七百年前義大利方濟各會傳教士孟高維諾抵達上都（今北京）傳教的境遇，以及他安心等待數年，讓教宗從羅馬派遣到中國的幾位主教特使抵達上都後，才接受教宗特使祝聖他為

上總的總主教。這暗示著中國大陸天主教會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降，某些神職人員為何不能耐心等待羅馬的訓令，便自以為是地接受被祝聖為愛國會所操縱的地上教會的主教。教宗在無線電廣播中說：

「我知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會雖然有其苦楚和特有的歷史境遇，卻真心願意是個真正的天主教會。為此，應該與基督、與伯多祿的繼承人、與普世教會、特別透過與聖座共融的主教們的職務，保持合一。這是教會在中土建立之初便在中國傳統中生活下來的信仰真理。事實上，蒙德高維諾乃是經由教宗派去的其他主教的手，被祝聖為天主教在中國的第一位主教的，那些主教是銜著宗座的祝聖主教令前往的。」

教宗於是談到擔任主教者所必備的條件和操守說：

「主教在被祝聖時，領受了聖寵和責任。所以，他必須是一位牧者；必須具備人性、道德和精神  
的德行，這些德行使他成為基督託付給他的羊群的表樣和典範。千年來的教會傳統和紀律始終要求主  
教具備這樣的品德。主教又應當是自己所宣認和宣揚的信仰的第一個見證，即使流血捨生亦在所不  
惜，正如從前宗徒們和數世紀以來許多國家和中國的牧者所表現的一樣。主教的使命是在聖統的共融  
中執行他的牧靈工作。由於領受了祝聖，並屬於與伯多祿的繼承人共融的主教團的成員，主教必須以  
言以行清楚地顯示這個共融。這為司鐸和信友在他們的牧者身上認出他們乃是基督的唯一教會的主  
教，也是必要的。」

天主教會在中国大陸遭政權污辱已達五十年，其最狠毒的手法即分化教會團體，使之成為政府

污辱出來的公開教會和遭政府壓迫的地下教會。要依賴北京政府善意解決它一手製造的這種分裂局勢，無異緣木求魚，即使中共願意，其用意可能與教會的大異其趣。是以中國大陸教會的問題，只有賴教會本身自行解決最為妥當。然而，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改變其政治觀念，這樣的解決行動可能還會遭來政府的迫害。其實，有形無形的迫害已經持續了五十餘年，沒有一件事比堅貞不移在今生和後世更具有價值。這個教會內部的解決之道就是地下教會寬大為懷，寬恕地上教會的前非，接納地上教會的神職和教友，與他們修和。而地上教會也必須要有所覺悟，真心皈依基督和基督所創立的唯一教會，服從教會最高元首、伯多祿的繼承人、羅馬教宗的領導，協助並支持地下教會脫離困境，雙方合作，共同爭取天主教信仰所肯定的基本權利。教宗說：

「親愛的主教兄弟們，你們勇敢地盡心領導在中國的天主教信友團體，你們當今的使命特別要表現並促進所有信友之間的圓滿修和。你們是共融的人，這種共融表現在祈禱和生活中與天主的完美共融，表現在與整個普世教會、與全球天主教團及其元首的明顯共融。你們要懷著熱愛教會合一的心情，以謙虛和愛德為包括牧者和信友在內的所有人的修和貢獻心力。只要你們知道去與別人建立基於真理和愛德的對話關係，不管他們由於重大而持久的難處，而在某些方面遠離了天主教的全部真理，這樣的修和是可能的。」

教宗要求在中國大陸的主教們以彼此修和作為慶祝大禧年的獻禮。他說：

「你們身為基督的代表和使者，不為地方政權所左右，自主地在領導地方教會的主教們，你們要採行適當的行動，在精神上準備你們的羊群善度二千年聖年。難道為圓滿的共融和有形可見的合一而

積極努力工作，這不是我們和你們在大禧年獻給主基督的特殊禮物嗎？」

教宗鼓舞中國大陸的所有的天主教徒說：

「我以同樣的信念和來自基督所授予的宗徒使命的責任和信心，勸告中國所有的牧者和信友，以勇敢無畏的精神表達對天主教信仰的真實宣認，以便根據真理在愛德中生活（弗·四，十五）。」

當然，在中國大陸那種環境，光是勸告和勉勵天主教信友該當如何如何還不夠，最主要的還是要說服執政當局，因為中國大陸整個天主教的局勢都是政府一手造成的。解鈴還得繫鈴人，因此，教宗不厭其煩，再次中肯地向北京中南海掌握政權的人士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儘可放心。一位基督信徒能夠在任何政治體制下度自己的信仰生活，只要他按照自己的良知和信仰規則來生活的權利受到尊重即可。為此，我向那些執政人士重複，就如我多次向其他國家的執政人士說過的一樣，不要害怕天主，也不要害怕祂的教會。我甚至恭敬地請求他們尊重每位男女與生俱來的真正自由的權利，好使基督信徒也能夠始終為國家的發展貢獻他們的心力和才幹。」

最後，教宗透過梵蒂岡電台的現場廣播，向中國大陸全體天主教徒說：

「在我們即將慶祝耶穌誕生二千禧年的時刻，教宗懷著信心和好感瞻望中國和那裡的教會，盼望有朝一日，只要天主願意，親自去會晤中國的天主教友，為和他們本著同樣的信德和愛德，同心感謝

天父。」<sup>2</sup>

若望保祿二世向中國大陸天主教徒發表這道文告兩天後，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於十二月五日發表反應說：「梵蒂岡必須終止干涉中國內政，包括藉宗教理由干涉中國內政。中國政府尊重中國人民宗教信仰自由，並保護他們的合法宗教活動。中國願意改善與梵蒂岡的關係，但梵蒂岡必須斷絕其與台灣的所謂的外交關係，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而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sup>3</sup>

### 第三節 中華民國副總統連戰謁見若望保祿二世

一九九七年元月十日，梵蒂岡電台報導消息說：「教廷新聞室主任納瓦羅昨天通知，中華民國（台灣）副總統連戰表示，在他從尼加拉瓜返國途中，希望拜會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接納這個心意，將於元月十四日個別接見這位台灣要員。」<sup>4</sup>

世界各國元首政要來梵蒂岡拜會教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屬於這種「個別接見」，或稱為「私下接見」（private audience），除非是國與國之間的正式訪問，則有瑞士儀仗隊和樂隊歡迎。

<sup>2</sup> *Insegnamenti di Giovanni Paolo II, 2-1996, p.867-873*。參見《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四五三～四五八，及同書英語部分 pp.199-204。

<sup>3</sup> 《法新社》（AFP），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五日北京電訊。

<sup>4</sup> *Radiogiornale della Radio Vaticana, 10 gennaio 1997*。

這類正式訪問每年不過一兩次。再說，教廷彈丸小國，每日卻必須應付全球事務，教宗實在沒有時間可以浪費在迎賓的這些瑣碎的禮節上。因此，不管哪一國的元首或政府總理來訪，絕大多數都以私下個別接見方式進行，為時一般約十五分鐘，至多半個小時。

元月十四日下午兩點，梵蒂岡電台報導消息說：「教宗今天上午接見中華民國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及夫人和隨員一行。這位台灣領導人於昨天晚間從巴黎抵達羅馬。教廷新聞室主任納瓦羅上星期四曾向新聞記者發表簡短聲明說：中華民國副總統表示，希望在從尼加拉瓜返國途中，拜會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梵蒂岡發言人又說：教宗接納這個心意，定於今天私下個別接見連戰。」

報導這項消息後不久，梵蒂岡電台又加上最新消息說：「有關教宗接見中華民國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事，教廷新聞室主任在中午發表聲明說：在接見交談中，提及當前的國際局勢，尤其是亞洲的局勢。會晤結束時，連戰先生交給教宗一份禮品，這份禮品教宗將交給教廷一心委員會，作為協助波斯尼亞——黑塞戈維納（Bosnia - Herzegovina）和非洲大湖區的重建之用。」

連戰副總統呈獻給教宗的這份禮品是一百萬美元。這筆款項以協助世界戰亂地區的重建為目標，為戴瑞明大使對教宗在他呈遞國書時，對他所說的話的積極回應。數月後，教廷一心委員會主席，德國籍的保羅·科德斯（Paul Cordes）總主教，在梵蒂岡電台向工作同仁談該委員會的工作時，提到中華民國政府這筆捐款時說：「我不知道是否應該說這件事，但那一百萬美元的捐獻著實為我們解決了大部分重大的問題！」

那年，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二、十三兩日，若望保祿二世應邀訪問巴爾幹半島慘遭內戰摧毀的波斯尼亞——黑塞戈維納首都薩拉熱窩（Sarajevo），戴大使有榮幸獲得教廷邀請，陪同教宗往訪。

## 第四節 若望保祿二世關懷九七後香港前途

一九九七年元月十三日，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照往年慣例，接見駐教廷外交團，與各國大使互祝新年。在向他們致辭時，教宗談到這年七月一日香港將回歸中國的問題。他說：

「我們等待香港回歸中國大陸主權下的日子的來到。由於生活在這個地區的天主教團體的規模和活力，教廷一方面相信經過耐心的談判而獲致的對差異、對基本人權、對法律的尊重將伴隨往後的日子之外，亦將格外關心留意這個新的時期階段。」<sup>5</sup>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若望保祿二世在香港教區主教胡振中樞機主教歡度其受洗教名聖若翰洗者（St. John the Baptist）節日這天，致函胡樞機，談香港再過一週即將回歸中國大陸的要事。函中說：

「香港七月一日回歸中國，這為中國人民是一個歷史事件，對您受託負責牧靈工作的教區，也是一個重要且意義重大的時刻。因此，應該懷著信德，以祈禱和信賴歷史的神秘引導者全能天主的態度，來度這個事件。香港教會存在已有一百五十六年……這期間它不斷成長，並因為對人們的慷慨服務，而在社會上日益受到敬重。一直以來，香港天主教會是以宣揚由耶穌基督所彰顯的天父的慈愛的

<sup>5</sup> *Insegnamenti di Giovanni Paolo II, 1-1997, p.92-98.*



福音、以及對人和對人類歷史的關注為主要任務，過去如此，將來也將繼續如此。香港教會在各園地進行有效的工作，它的目標是……促進宗教、道德、文化及社會價值。……事實上，教會完成它在世界上的使命，不是受到世俗野心的驅使，而僅是為尋求其唯一的目標，即：在使人友好的聖神的引導下，推展基督的工作，祂來到世界上是為真理作證，是為拯救人類，而不是審判人類，是為服務人類，而不是受人類服務。這個傳播福音和實踐關懷精神的工作不可停頓，甚至還要加強，因為香港教區現在比過去受到更迫切的召回，在中國人民中做「建在山上的城」和「放在燈台上的燈」。在歷史性的新環境下，天主教會的使命是陪伴所有的人在走向社會進步、和平、團結的道路上，獲得更大的益處。我在祈禱中和您及……整個教區、以及所有善心人士緊密相連，我也惦念中國大陸的天主教友，他們此刻正以特殊的方式與他們在香港的信仰中的兄弟姐妹連結在一起。……請您轉達所有生活在這歷史事件中的人士，我保證在精神和祈禱中與他們同在。」<sup>6</sup>

## 第五節 張春申神父教授評中共〈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狀況〉白皮書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日，台北教區《教友生活週刊》登載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教授，耶穌會士張春申神父一篇題為〈中共對梵蒂岡歷史的盲點〉的短文，言簡意賅，不可多得，值得抄錄本書中，供學者參考：

<sup>6</sup> Ibid., pp. 1600-1602.

「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十月十六日發表〈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狀況〉白皮書，其中關於梵蒂岡部分，顯然以強權姿態自立於國際共認的「梵蒂岡外交關係」之外。」

「雖然中共可以堅持梵蒂岡和中國改善關係，須以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為前提等等，但它不能要求改變梵蒂岡外交的歷史與傳統。」

「梵蒂岡是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宣佈建立的，但它的形成卻有極長的歷史。」

「天主教自從君士坦丁皇帝頒佈了米蘭詔書（三一三年）之後，在羅馬帝國不只獲得自由，而且不久之後成為國教。好多因素使它逐漸擁有廣大土地。而羅馬帝國滅亡後，羅馬教宗在義大利半島擔任抗禦蠻族保衛人民的角色。此皆為東羅馬帝國所承認者。」

「第八世紀，義大利半島上的龍巴蠻族勢力強大，羅馬教宗求助於法蘭克王國，加羅林王朝之國王丕平出兵平亂，於七五六年承認教宗司提芬在義大利半島上的廣大領土及其他權力，此即西方歷史上「教宗領土」或「教宗國」之端倪；在歐洲政治舞台上扮演極重要的角色，直到十九世紀。」

「義大利自馬志尼開始，革命紛紛謀求統一，終於一八七〇年趁普法戰爭，法國無力保護教宗國之時，一舉佔據教宗國最後據點羅馬。當時教宗比約第九以囚者自居，抗議義國侵略，產生所謂「羅馬問題」。直到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教宗比約第十一的代表與意國政府墨索里尼總理，簽訂拉特朗條約，正式成立佔地一百零八點七英畝的梵蒂岡中立國。羅馬教宗繼續享有執行教會職務的完全獨立自由，維持與世界各國的外交關係。」

「鑒於歷史的傳承，今日一般所說的梵蒂岡外交，羅馬教宗並非以國家元首身份，而以天主教最高領袖身份與其他國家建立關係。因此梵蒂岡的外交實是羅馬教廷的外交，這是歷史上非常特殊

的一個現象，但又是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所承認的。今日羅馬教宗在各地的大使館，不稱梵蒂岡駐某某國，而稱教廷駐某某國大使館。天主教的最高領袖羅馬教宗，遣派使節與其他國家政府建立外交關係是今日所說的梵蒂岡外交的特質。此又為所有與梵蒂岡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共同承認的。」

「中共白皮書卻強調，中共和梵蒂岡的關係首先是國家關係，只有在國家關係改善後才能談宗教問題。至少應當說這是歷史的盲點，或者不顧國際外交傳統的強權作風。」

「梵蒂岡中立國與眾不同的特徵，是其目標並非如一般國家為了國民的利益，而是為了天主教最高領袖教宗執行信仰上的職務，為了他的獨立與自由。它雖然參加不少國際組織，但不會參加任何政治性會議、協定等等，因為它的目標是宗教的。雖然羅馬教宗在聯合國有代表，但梵蒂岡不是聯合國會員。」

「中共白皮書對梵蒂岡呈露它數十年來始終局限在自設的界線之內，無法進入國際外交的共識。」筆者常認為，中共對領導全球天主教的教廷只有兩種可能的態度：或是根本不了解，或是根本不願意了解。關於前者，那是極其不可能的事，偌大的國家，以其組織之嚴密，人才之衆多，要了解梵蒂岡教廷何難之有？況且中共對教廷已有五十年之久處在敵視和誤解中，世間有甚麼問題五十年無法解釋或解決？果如此，這個世界和人生還有甚麼希望可言？所以，與其說中共不了解教廷和天主教的本質，倒不如說它根本不願意了解。理由是了解了以後，會產生「吃了禁果」的效應，這個效應對以無神主義自居、而且想盡辦法要永久存在的北京政權的後患將是無窮的。

一九九八年元月十日，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在接見駐教廷全體大使，彼此拜年的機會上，照例講述他對世界局勢的回顧與展望。關於中國大陸，他說：「沒有必要強調教宗和他的助手多麼關心留

人員不能訪問教廷？這個理由當然十分充足，問題只在於如何了解教廷的外交關係與其他國家的有所不同。對教廷來說，整天登門造訪並不意味關係的加強，一個國家如何尊重人性尊嚴、如何維護基本人權、如何促進民主自由、如何保證宗教信仰自由，這才是鞏固與教廷邦交的最基本要素。除此之外，教廷對任何國家無所要求。

單國璽主教升任樞機，媒體便揣測這是否教廷與中華民國斷交之前的預兆，因為彼等以為這可能是教廷先給中華民國一個事前的補償。其實，就如前面所說的，樞機主教者，是親王，是教宗的諮議顧問，是極大的榮耀，豈可作為世俗的權謀來玩弄或交易？世間政治或許如此，但在歷史上教廷從不敢玩弄這類卑鄙的手法，教廷常記住耶穌基督的忠告：機警如蛇，善良如鴿。

單國璽主教晉升為樞機後回國不久，在台灣的天主教主教團於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一日在新竹的香山牧靈中心召開一九九八年春季常年大會。會中十六項議案的第十一項是台灣這個主教團的名稱的更改問題。這個主教團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台北舉行會議，由當時教廷駐華大使高理耀總主教主持，與會者包括當時在台灣的十六位主教，其中有十位在中國大陸還擁有教區，例如北平的田耕莘樞機主教，南京的于斌總主教，梧州的唐汝琪主教等等。會議本來想採用「台灣主教團」，鑒於大多數主教在大陸還擁有教區，因此採折衷辦法，稱為「中國主教的區域性會議」，拉丁文正式名稱很清楚：Confœrentia Regionalis Episcoporum Sinarum。換句話說，這是中國主教（在台灣）區域的主教團。但不知為何，後來竟稱為「中國主教團」。

三十年後，這些大陸的主教們都先後謝世，整個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局勢也都改變，因此，再繼續稱呼「中國主教團」實在不妥。為此，在台灣的主教們為了教會內部運作和牧靈工作需要，早在

單國璽主教被擢升為樞機之前，就對全各地教會團體發出問卷調查。收回的二百六十份問卷中，超過百分之五十選擇使用「台灣主教團」或「台灣地區主教團」。教廷國務院表示，希望台灣主教們保留「地區」(Regional)這一詞。這次，台灣的主教們在一九九八年春季常年大會中決議，自即日起，把原來的「中國主教團」更名為「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簡稱「台灣主教團」，但外文名稱不改。

新舊名稱之間，在外文上沒有變動，在中文上則由「中國主教團」(或中國主教區域性會議或中國主教區域性主教團)變為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

對這項更名，有部分人士以為台灣主教團自我降格，把原來的「中國」變為「台灣」，甚至變為「地區」性的，連國家的頭銜都不存在了。另有人揣測，教廷既已擢升高雄的單國璽主教為樞機，作為教廷與中華民國斷交的事前補償，現在台灣的主教們又更改自己的名稱為台灣地區主教團，這豈不是教廷在為即將與北京建交做積極的準備？台灣主教們的解釋是：「天主教會主教團的組成與政治領域沒有絕對相關，以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汶萊為例，當地天主教會就組成「星、馬、汶主教團」，作為教會在該地區的行政組織。台灣天主教目前因為每一位主教所管轄的教區都在中華民國政府所有效統轄的台灣地區，沒有其他地理區域的主教參與在其中，為了在參與普世教會時，恰如其分地代表所轄教區，因此正名為「台灣地區主教團」。」<sup>8</sup>

<sup>8</sup> 參見《教友生活週刊》，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二日有關主教團召開春季大會新聞，及五月三日《天主教在台灣地區主教團聲明》；《四方蒙利一方存疑的主教團更名案》，《公教報》，一九九八年五月三日。

## 第七節 教廷外長陶然總主教向新聞界談教廷與北京的關係

一九九八年四月八日，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戴瑞明代表政府響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呼籲，捐贈五萬美元給教廷，作為透過教會濟助古巴貧病疾苦人民之用，以表達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對人類大家庭的人道關懷。

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曾於這年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應邀前往古巴進行牧靈訪問。返回羅馬梵蒂岡後，他呼籲世界各國和國際團體協助古巴貧困人民的需要。其後，教廷負責教宗慈善援助工作的一心委員會也發出濟助古巴的呼籲。戴瑞明大使本著教宗對中華民國的期許，建議台北響應教廷的人道呼籲，並獲得李登輝總統的積極回應，捐贈五萬美元。

同年四月十六日，教廷國務院與各國關係秘書長，即外交部長，法國籍的陶然（Jean-Louis Tauran）總主教，與教廷駐聯合國常任觀察員馬蒂諾（Renato Martino）總主教，在教廷新聞室主持記者招待會，介紹一本名叫《服務人類大家庭》的書，內容有關教廷在聯合國大型會議中的發言與活動。記者問到教宗訪問古巴後這個國家的情形，陶然外長答說：「你們都看見了，所謂的政治犯及良心犯都被釋放了，教會可以在教堂門口祝福新火（筆者按：此係天主教復活節前夕的重要禮儀）。拉丁美洲國家在聖週五習慣舉行的神聖「葬禮」遊行沒有被允許。對話還在繼續，希望能准許主教們所需要的傳教士進入古巴。對話在開放、互相尊重的氣氛中進行著。我個人相當滿意。古巴當局表示願意遵行教宗在訪問時所規畫的途徑。我們希望能導向成功的結果。」

在座的記者又問到教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陶然總主教先提到美國總統克林頓這年（一九九八年）二月間派去中國大陸訪問的三位宗教領袖之行，然後說：「首先，中國人對時間有不同的觀念，他們從來不匆忙行事。那次（美國三位宗教領袖）訪問的積極面是某些事說出去了，而代表團也能會晤到領導人物。我想中國今日已經意識到「梵蒂岡」——他們從來不稱教廷——作為國際社會中的夥伴的重要性。這是正面的。有關宗教方面，我可以說與教廷的關係正常化還不是優先事務之一。我想聖座應該意識到這點。說到這裡，我們常設法讓門打開著。當然，目前我們無法談具體的行動。我們也無法談開放的記號……除了某些第三者在雙方之間做橋樑……不過我們應該看檯桌上的具體建議。那三位宗教領袖的訪問沒有產生任何具體的結果。」<sup>9</sup>

## 第八節 亞洲主教特別會議在梵蒂岡揭幕，教宗誠盼四川萬縣兩位主教前來羅馬與會

羅馬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為了籌備全球天主教會慶祝公元二千年大禧年，通令全球天主教主教召開以洲為單位的五大洲主教特別會議。亞洲主教特別會議於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日在梵蒂岡揭幕，為期三週。台灣高雄教區主教單國璽樞機被任命為會議的總報告人。全亞洲各國各地區的主教團都受邀選派代表出席會議，中國大陸四川省萬縣的主教段蔭明和他的助理主教徐之玄是大陸地區受邀

<sup>9</sup> 參見王愈榮譯，〈教廷外交部長談聖座外交〉，〈教友生活週刊〉，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九日，及〈三十日〉月刊（30 days），一九九八年第四期，頁十一—十二。

與會的兩位主教。但遲至會議揭幕時刻，這兩位大陸的主教尚未抵達羅馬。

教宗在他主持的揭幕禮彌撒講道中，提到中國大陸的教會說：

「此時此刻我們想到的正是中國大陸的天主教徒和他們的牧人。為了使那個主教團也有代表出席這項主教會議，所以，除了在香港教區工作的主教們之外，我也召集了另外兩位主教，即萬縣的主教瑪弟亞段蔭明和他的助理主教若瑟徐之玄。我希望他們能夠及早來到我們中間，好為那些團體的生命活力作證。」<sup>10</sup>

教宗每次召開全球性或洲際性的世界主教會議之後，必定把會議的結論和建議以「勸諭」(Esortazione) 的形式隆重頒佈，公諸於世，讓普世各地教會了解並奉行。由於要頒佈文獻，教宗必須前往某地，於是當地便有機會迎接教宗的蒞臨，這對當地是一件極為榮幸的事。這次亞洲主教特別會議結束後，眾人紛紛猜測教宗將在甚麼地方頒佈這道文獻，作為會議的正式閉幕。

傳聞中，一般以為香港是教宗頒佈亞洲主教特別會議後的「勸諭」的最理想地點，因為這可能是教宗在公元二千年大禧年之前，終於達成踏上中國土地夙願的機會。再說，教宗曾表示，他最大的渴望是訪問俄羅斯和中國大陸。據稱，教廷曾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羅馬大使館，向北京當局表示教宗前往香港的意願。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六日，香港助理主教陳日君曾在羅馬參與教廷在俗教友委員會舉辦的「主教牧靈關懷工作中的教會組織和新團體」會議。會期間，陳日君主教曾拜訪教廷副國務卿雷

<sup>10</sup> *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 SEDOC, N.0543, 19 aprile 1998.*



別國家的，也有關係到國際團體的；有可喜的一面，也有可悲的一面。其中，破天荒第一次提及台灣海峽兩岸的關係。他說：

「我們也應該對偉大的中華民族以決心，展開台灣海峽兩岸人民的對話而欣喜。國際團體，尤其是教廷，均以極大的關注留意這項可喜的發展，祝望它能有重大的進展，則毫無疑問，必將造福全世界。」<sup>14</sup>

教宗這篇講詞深受美國國會重視，美國聯邦眾議院多納德·佩恩 (Donald Payne) 於是年二月二日提請國會將教宗這篇講詞全文列入國會記錄。多納德·佩恩眾議院向國會這麼說：「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九九年元月十一日，向各國駐教廷大使發表談話，並評析國際情勢時特別提到，教廷欣見台灣海峽兩岸中國人有決心解決兩岸問題，而共同致力於展開對話。國際團體和教廷特別關心進一步的發展，希望也深信這項頗具意義的進展有益於整個世界。」

「的確，我自己非常高興看到台灣盡其最大努力，嘗試著透過和中國大陸的互相了解，達到和平的目標。中華民國的李登輝總統，在他一九九六年就職演說中，就很清楚地表示，他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他希望能到中國大陸做一趟和平之旅。在許多場合中，李登輝總統都說，他非常希望繼續看到台灣海峽的和平與安定。此外，他也常常希望台灣和中國大陸能在民主、自由、均富的原則下協商。事實上，當他於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八日，接見國家關係委員會的幾位成員時，李登輝總統

<sup>14</sup> *Insegnamenti di Giovanni Paolo II, I-1999, p.34-41.*

也一再重申他的願望，希望海峽兩岸的關係快速進展，他並且歡迎北京當局負責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海協會會長汪道涵今年能訪問台灣。」

「為了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與安定，以及重新開始台灣與中國大陸海峽兩岸之間的對話，李登輝總統應該受到讚揚。除此之外，教宗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一日對各國駐教廷大使的演講，特別是他對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切，皆是切合時機和具有洞察力的，也顯示教廷關懷世界的和平。因此，我提議將教宗講詞全文列入國會記錄。」<sup>15</sup>

世界上有誰能以最大的威信、不偏不倚地、別無用心地為海峽兩岸政府的修和說公平的話呢？戴瑞明大使知道這個人就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因此，他在看到台北與北京之間的關係重新走向良性發展之際，特別請求教宗為全體中國人說句鼓勵的話。只有台灣海峽和平安定，中國人才會真正幸福，才會真正受到全世界的敬重，才有助於整個人類的福祉。戴大使的請求沒有落空。

## 第十節 教廷國務卿索達諾樞機主教稱：教廷駐華使館可隨時遷往北京

一九九九年元月間，教廷負責中國事務的要員秘密訪問北京，談教廷與北京建立關係事，當時亦傳出北京最高當局已經決定與教廷建交。事隔幾天，二月十一日，教廷國務卿索達諾樞機主教在

<sup>15</sup> 〈教宗向各國駐梵大使新年講詞列入美國國會記錄〉，〈教友生活週刊〉，一九九九年三月七日。

義大利駐教廷大使館對新聞界宣稱：「教廷駐華大使館，只要可能，不必等到明天，今晚就可以遷往北京。」這一天，對教廷、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三角關係，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暗淡、也最刺激的一日。

對教廷來說，它幾乎是被迫說出了它絕對不願意說的話，即使事實如此；對台灣的中華民國，這意味著教廷不把與它的外交關係當作一回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它第一次被教廷將了死局，如驚弓之鳥，無招架迴避的餘地<sup>16</sup>。

每年二月十一日，義大利駐教廷大使館必在位於羅馬城弗拉米尼亞大道（Via Flaminia）上一座歷史悠久的別墅館址，舉行慶祝教廷與義大利簽署拉特朗條約<sup>17</sup>週年酒會。教廷方面出席這項酒會的，通常都是國務卿，義大利方面則是總統和總理。席間，教廷國務卿總會和義大利元首及政府領導人就雙方的問題和國際局勢交換意見，然後與新聞記者交談。這一年正好是簽署條約七十週年，所以酒會格外隆重。

那晚，索達諾國務卿又對新聞記者說：「教廷駐華大使館原來在北京，所以我們並沒有必要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只要讓這個使館回到原來地方即可。」這段話非常具有世俗外交的巧智，聽來無懈可擊，亦令對方啞口無言，無可奈何，卻是讓人無法嚥下消解的冷酷無情。其實，教廷與中

16 江國雄，〈梵蒂岡電台：中梵關係中教宗每日具體關懷中華民族的見證〉，〈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三八四～三八五。

17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義大利和教廷簽署拉特朗條約（*Patti Lateranensi*），從此義大利承認梵蒂岡教廷是一國際上的主權國家，並進行一八一五年六月九日維也納會議的規定。

華人民共和國從未建過交，何來讓教廷使館遷回北京原地？再說，教廷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似非先前在中國大陸的關係的延續，而是一個嶄新的外交關係，就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一九九三年五月七日接受吳祖禹大使呈遞到任國書時所說的：

「回憶令尊使我們想起貴國人民歷史上一段非常艱困的時期，以及教廷外交代表被迫撤離中國大陸的時刻。當時外交使團在香港暫駐之後，被迎到台灣，關係於是建立，其最深遠的意義在於教廷渴望與偉大、高尚的中國人民家庭繼續保持密切與友誼的關係。天主教非常賞識中華民國一開始就擁護並促進對全體國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同時也為教會能在不受到干擾與歧視的環境下，推行其精神與人道使命所獲致的成果而感謝」<sup>18</sup>。

由此可見把在台北的教廷駐華使館遷往北京，意即與中華民國斷交，而非單純地讓使館回到原來的地方而已。

一天前，二月十日，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要求教廷，如果願意和北京改善關係，就必須和台灣斷絕外交關係。由此可見索達諾樞機主教的話是衝著北京外交部發言人一天前的話而說的，並非單獨事件。從這些對答，可以看出教廷一直視中國為一個整體，教廷在自己的年鑑上始終稱自己駐台北的大使館為駐「中國」大使館，而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也都寫「中國」駐教廷大使館。然而北京可是一直認為中國處在分裂、不統一的狀況中，所以才五十年不斷地要求教廷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

<sup>18</sup> 見本書第十二章第一節，及《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二三七～二三八。

他回答。陶然總主教於一九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以英文作書面答，中國時報六月三日刊出。這項難得的答問值得錄下<sup>21</sup>：

(一)問：閣下是否可向我們的讀者解釋梵蒂岡對中國和對台灣的外交政策？

答：中華民國與教廷的外交關係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六日互換常設外交使團後，才開始有全面和固定的形式：早在一九二二年即已在北京運作的非外交代表的宗座代表團變成教廷公使館，而在羅馬，中國駐教廷的公使館於一九四三年便已開設。

教廷首任駐中國公使黎培理總主教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向中華民國總統呈遞到任國書。他始終固守崗位，即使人民解放軍（一九四九年九月）來到後，亦然：無論如何，他是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遭人民共和國的新政府勒令驅逐後，才被迫離開的。他從上海乘火車到廣州，然後轉赴香港。在香港停留一年後，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黎培理公使必須前往台灣。

(二)問：教廷為何將使館遷往台灣？

答：教廷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個全然陌生的政治問題。處在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爭端動態中，它也無能為力，教廷公使在違反他的意願之下，不得不離開中土。

教廷首要和不斷關切的是台灣海峽兩岸的天主教徒的命運和益處：事實證明，不論台灣政治和宗教當局如何堅持，教廷在台北的公使館直到一九六六年才升為大使館層次。

<sup>21</sup> 這篇答問係筆者根據陶然外長總主教的英文原稿翻譯成的，內容與《中國時報》刊登的中譯文有些微出入，因為陶然總主教曾遺憾《中國時報》的中譯文與他的原文有些不符之處。中國時報譯文亦收錄在《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中，見頁四六四～四六七。

(三)問：教廷欲透過與中國的外交關係達致甚麼目標？

答：對教廷而言，與中國就如與其他國家一樣，外交關係的第一個目的就是促進教會的生活，並藉著對話在國際間推動和平。

與台灣，我們的關係處在彼此尊重之中：由於宗教自由的原則獲得保障，台灣的教會團體非但未曾遇到困難，而且對國家的物質和精神利益作出有效的貢獻。

(四)問：教宗如何看待台灣的天主教會團體？

答：教宗以父親的心腸愛台灣的天主教徒，他完全知道他們的忠誠。為此，他才要求他們做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兄弟們的「橋樑」。基於兩個理由，大陸的天主教徒是他們的兄弟：其一，他們同是中國人；其二，他們都信仰耶穌基督。

教宗知道台灣的信友愛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弟兄們。同樣，台灣的天主教徒也知道教宗愛中國大陸的天主教徒，並感到自己對他們負有責任。對雙方來說，他就像父親一樣。在每個家庭，父親享受子女親近和忠信的喜樂，但他更關心遠離家門、沒有分享全部親情的子女。這就是教宗對台灣海峽兩岸中國天主教徒的態度。

(五)問：教廷對中國大陸天主教徒有何打算？

答：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受到精神關懷的激發，而非政治理由的推動，希望盡一切可能與在中國大陸的天主教會重建圓滿的共融。

與中國實情有關的未來狀況，需要在適當的時機對教廷在台北的臨在做一番新的研究。教宗希望可愛的台灣天主教會團體能夠了解教廷將採行的路線，而這條路線將僅僅是為了在中國的教會的益

處才會採取。同時，教宗希望這一切不要被誤以為教廷對上面所提到的有功勞的團體缺乏重視。

(六)問：這樣的事何時將發生？

答：我相信目前無人可確立日期。這是容易了解的，而且教廷也多次在不同的場合重複過，既然教廷是個特殊的宗教實體，任何變化都必將在與在中國的天主教團體有關的特定宗教問題上達成協議時，才會發生。

\* \* \* \* \*

以上教廷外交工作負責人這篇書面答問是少有的澄清中梵三角關係的文獻，任何對中梵關係感興趣的人士不能不細讀，並加以反思。筆者認為這篇訪談有四個基本要點：

第一：第三個答問所說的，「教廷外交關係的首要目的是促進教會的生活，並藉著對話在國際間推動和平」。這一點可能很難被中共所了解。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出席天主教愛國會成立四十週年紀念會上說：「中梵關係首先是國家關係，只有國家關係改善後才能談宗教問題。」<sup>22</sup> 一九九九年三月八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北京教區「主教」傅鐵山，在出席第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北京團全體討論會時，也向中、港、台記者說：「中梵關係涉及兩個層面，一個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一個是教會與教會之間的關係。當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得到理順，教會與教會之間的關係亦會出現一個新景象。」<sup>23</sup> 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sup>22</sup> 張春申，〈有關教廷與中共建交之說〉，《教友生活週刊》，一九九九年三月七日。

<sup>23</sup> 〈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一九九九年三月十日北京訊〈中國：北京主教稱，台梵關係是中梵關係的障礙，教宗訪港先要北京同意〉。

現尚可接受，如果是政府的政策，甚至是法律的規定，則教廷大可繞過建交的途徑，去和當地教會保持連繫，梵蒂岡廣播電台的使命正是這個。

第二：在第四個答問中，陶然總主教說教宗對海峽兩邊的中國人，特別是天主教徒，都猶如慈父一樣。在每個家庭中，父親總享受子女親近和忠誠的喜樂，但是作父親的更關心那遠離家門、沒有分享全部親情的子女。

這段話的精神出自新約聖經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至三十二節的「蕩子的比喻」。蕩子回頭，慈父寬恕他先前一切的過錯，甚至設宴款待他，大事慶祝一番。慈父的作法卻引起孝順的長子的嫉妒和不滿。教廷面對海峽兩岸的問題，常使用新約聖經中的這段比喻，來向台灣解釋教廷在外交關係上對待台灣的中華民國的態度，希望台灣了解教廷對華政策的苦衷。此亦即教廷為了寬待中國大陸這個「蕩子」，很可能有朝一日會為了這個不肖子，而把駐華大使館從台北遷往北京。屆時還請中華民國上下和台灣教會見諒。

教廷的這個理由是很感人的。可是不論北京政府或中國大陸的天主教會，都不同於福音中所說的蕩子，如果是的話，只有北京政府所扶植的「官方教會」勉強可以如是稱，但條件必須是「官方教會」的人士有回心轉意、皈依羅馬教宗、與普世教會共融的誠心才夠格。任何人都樂見地上公開的官方教會誠心誠意皈依，也知道他們的皈依可能要付出相當的代價，但是為一個真正要走皈依道路的人，不畏懼代價正是誠心誠意的證明。然而，「官方教會」的皈依與否又和教廷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何干？怎麼可以把教廷斷絕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作為交換官方公開教會皈依的條件和賞報？這樣的說詞怎能令人信服？怎會合乎信仰的教義？如果一邊的皈依是用政治條件交換得來的，



其實，應該研究的倒是教廷與北京的關係，而不是與台北的關係，因為問題在中國大陸，而不是在台灣。教廷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與教廷和中共的關係完全不相干，教廷可以視中國為一個單一的實體，但這個實體卻處在分裂和分治的政治狀況中。教廷與在台灣的新中華民國已有五十年堪稱良好的外交關係，如果這個關係需要進行新的研究，那就意味這五十年來的良好關係出現兩種狀況：一是走對了；既然是對的，則需要進行研究如何更上一層樓，以提高和增強目前雙邊的關係。一是走錯了，則必須亡羊補牢。關於後者的假設，雙方都不會承認。

筆者相信，如果教廷亡羊補牢那一天真的來到，台灣的中華民國和天主教會團體將會無可奈何地接受教廷遷館的決定，因為它實在沒有力量反對強勢的擺佈，也不能左右教廷的外交政策，台灣的天主教會團體也將努力按照教宗的希望了解教廷的不得已抉擇，並含垢忍辱地面對不難想像的社會處境。但是筆者也相信，台灣所有的人，包括教會在內，都將很難消解教宗在兩個子女中作選擇的作法，因為既然是精神關懷，為什麼要接受政治的要挾？除非這個作法在短暫的時期過後，給中國大陸帶來良性的轉變，並因此和海峽這一邊產生和陸相處的持久意願。

台灣的天主教徒，甚至台灣全體人民，都渴望中國大陸的天主教會和羅馬教宗重建完整的共融關係。但是本質上，重建這個關係應該和中梵邦交的存廢風馬牛不相及才是。教廷和教會所謀求的是國際關係的合一與協和，北京政府卻五十多年來不改其製造敵意、不共戴天的逆性意識型態。當然，北京對教廷在台海兩岸作抉擇的要求，教廷不一定會照單接受，值得研究變通的途徑很多，這都需要善意和有建設性的交談，否則只會教人覺得被逼上梁山。

第四：在第六答問中，教廷國務院外交負責人陶然總主教表示，梵中台三方關係何時生變，沒

有人知道。但那必定是在教廷與北京就有關中國大陸天主教會團體的宗教問題達成協議的時刻。這仍然是一種以犧牲第三者作為交換條件的極危險賭注，會給教廷留下很多後遺症。

一九九九年九月六日，教廷駐華代辦，印度籍的車納德（Joseph Chemoth）蒙席，在即將離開台北、前往中非共和國和乍得擔任教廷大使之前，接受《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訪問時，也以上述列的陶然總主教給《中國時報》的書面答問的第三和第四答的內容，答覆記者所提的有關中梵台之間的關係問題<sup>27</sup>。車納德代辦在台北時，曾鼓勵台北輔仁大學設立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

十月二十五日，香港一份於年初才發行的中文《太陽報》稱：「中梵對中國主教任命的安排已取得進展，將於今年底建交。屆時會採用越南教會模式，即由越南提名主教，再由梵蒂岡委任」。

次日，二十六日，中國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對《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說：中國願意與梵蒂岡改善關係，但前提是梵蒂岡必須與台灣斷交，以及不能干涉中國內政，包括宗教事務。

十月二十五日，教廷新聞室主任納瓦羅就外傳教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建交的消息發表聲明說：「就如衆所周知的，教廷願意和所有的國家有良好的接觸，所以與中國也是一樣。可是對我們沒有從雙方管道接到的消息，我無法更加明確表示。」<sup>28</sup>

27 《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一九九九年九月七日台北訊〈台灣：教廷駐華代辦調任非洲大使；菲律賓蒙席接任〉。

28 *Radiogiornale della Radio Vaticana*, 25 ottobre 1999.

## 第十一節 中共發出八一七文件，為與教廷建交預鋪天羅地網

一九九九年年初，教廷國務卿索達諾樞機主教發表遷館論後，教廷與中國大陸建交的傳聞不時傳出。是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祕書局發出一份被認為相當重要的第二十六號文件，名曰〈關於在新形勢下進一步加強天主教工作的意見〉，內容是中共有關當局指示全國上下各層單位為教廷與北京建交積極作好準備工作，以免建交後中共在中國大陸的天主教事務上處於劣勢的地位，失去控制權，甚至給中國大陸社會帶來不穩定的現象。這份文件要點如下：

「梵蒂岡不得干涉我國內政，包括不得以宗教事務為名干涉我國內部事務。」「梵蒂岡還會企圖利用中梵關係調整，否定我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重新控制我天主教會。」「當前最緊迫的任務就是要大力加強天主教愛國組織建設，切實抓緊教育轉化天主教地下勢力，維護社會穩定，確保我國天主教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愛國力量手中。」

「高度重視中梵建交期間的維護社會穩定工作，充分估計到可能出現的不安定因素，早研究，早部署，早作預計。」「中梵建交後，羅馬教廷利用合法地位干涉和控制我國天主教會的圖謀要保持高度警惕。」「在天主教地下勢力影響較大地區要作好信教群眾的引導和教育工作，防止出現教宗熱和宗教熱，要堅決制止天主教地下勢力借機舉行大規模集會、示威和遊行活動。」「對建國以後已有定論，近幾年在綜合治理中依法處理的案件，一律不准翻案。」「要防止在中梵建交之際出現修教堂熱。對已拆除的天主教地下勢力，非法修建的教堂，一律不許重建。」「主管部門領導要

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一個一個地做好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工作，面對面地做好信教群眾的工作。」

「不論中梵關係如何發展，都要繼續支持我國天主教堅定不移地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我們的工作目標就是要：抵制和挫敗梵蒂岡利用宗教上的特殊地位操縱和控制我國天主教的企圖。」「愛國會的基本職能是：協助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貫徹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方針；與主教團共同管理教會事務。……：主教團的基本職能：按照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和民主辦教精神管理教務。」

「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是中國天主教的最高權力機構，通過代表會議選舉一會一團領導成員，審議工作報告，制定和修改章程。」「中央統戰部，國家宗教局要指導一會一團健全規章制度。當前要抓緊制定愛國會工作條例和教區管理規定。要調整和加強一會一團領導班子，選調天主教徒知識份子充實中國天主教愛國會，選調神職人員到主教團駐會工作。」「深入做好天主教愛國會人士的統戰工作，切實幫助愛國會組織，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抓緊選聖主教和調整教區。……：主教年齡在七十五歲以上的要儘快配備助理主教或副主教。需要有緊迫感又要嚴格把關，避免給今後工作留下隱患。」

「中梵關係正常化將為解決天主教地下勢力問題提供有利機會，能否利用這個機會，把天主教地下勢力中絕大多數爭取過來，轉化過來，是實現中央戰略決策的重要環節。如果我們不抓緊，被梵蒂岡利用，就會造成被動局面，因此必須採取特殊措施，周密部署，確保工作到位，掌握鬥爭主動權。……：方針是積極爭取，區別對待，轉化多數，孤立少數，使我國天主教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愛國力量手中。……：對天主教地下主教和神父要區別不同情況，一人一策，責任到人。……：要警惕

天主教地下勢力骨幹轉到地上後排擠愛國力量，控制教會領導權，利用合法地位與我對抗。對個別違法犯罪活動的要堅決依法處理。」

「在中梵建交之前，對已具備轉化條件的天主教地下主教，由一會一團機構及時辦理有關手續，承認其主教身份，妥善安排，對願意接受政府管理，但尚不願接受愛國會領導的要作為教育轉化的重點對象，抓緊做好工作。」「對已具備轉化條件的天主教地下神父由省兩會做妥善安排。」「對尚不具備轉化條件的天主教地下主教，要在繼續加強教育轉化工作的同時，採取措施，嚴加控制，防止他們突擊祝聖天主教地下神職人員。」

「中梵建交後要迅速對所有尚未轉化的地下天主教神父做出處理。由一會一團發出通告，要求在一定期限內向省兩會報名備案，由各省按照一人一策的原則，有針對性地進行考核，視表現情況分別做出處理。」「對長期與政府對抗，經反覆做工作，仍拒絕與政府合作者，無論梵蒂岡是否承認其主教身份，我均不予承認。」「對尚未轉化的天主教地下神父，由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在該地集中教育，進行甄別。分別安排到一會一團指定的神哲學院進行培訓，期限不得少於一年。」

「對我不承認其神職人員身份的地下主教神父，各地要採取分工包幹，責任到人的辦法加強教育，嚴格控制。對煽動擾亂違法活動的，由公安機關堅決依法處理。」「對天主教地下勢力舉辦的地下修道院、修女院宣佈解散，對表現好的修生、修女，送神哲學院修女院繼續學習，表現不好的遣返原籍。」<sup>29</sup>

<sup>29</sup> 以上摘錄自《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七〇五—七一一；《教友生活週刊》，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版。

從上面引述的諸多段落，可以看出中共對與教廷建交懷有相當的恐懼感，惟恐建交會給中國大陸帶來內部社會的不穩定，使中共失去對天主教會的領導和控制。但是中共又不能拒絕與教廷建交，因為一方面可能可以用來消滅地下教會的勢力，一方面也回應世界許多國家領導人對中共的屢勸告，希望北京與教廷建交，並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權。最後，也可以逼教廷斷絕與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使台灣在世界上更為孤立。

根據一九九九年中國的形勢，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是願意和教廷建交的，但是中國北京國務院宗教局局長葉小文並不支持江澤民的看法，因為如果按照江澤民順應國際情勢的看法做，宗教局必將失去它在整個中國大陸的絕大部分權益。為了調和兩種不同的意見，於是出現這份八一七文件。文件剛出現時，有人懷疑是偽造的，可能是地下教會偽造的，甚至是台灣政府偽造的，目的在阻止或破壞教廷與北京建交的可能。後經證明該文件屬實。

從八一七文件的內容可以肯定中共有意並積極準備和教廷建交，因為中共建國數十年後，發現宗教、尤其是天主教，雖經長久嚴厲迫害，依然存在，因此不得不改變對付天主教的策略，以綏靖的手法代替迫害的手段。而教廷也發現中共並沒有如昔日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的想法，以為共產黨席捲大陸只不過是一陣風暴而已，雨過很快就會天晴。畢竟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天安門上那一建國宣佈，一晃已經數十寒暑。為此，與中共直接打交道或許是唯一解決中國大陸天主教問題的途徑。中共為了擔心建交後可能出現意料不到的狀況，因此火急地積極進行鞏固大陸愛國會的職能，處心積慮地設法轉化地下教會的力量，使之加入愛國會的組織。至於那些不聽從政府指揮的，將予以個別進行思想教育，必要的話，「繩之以法」。

羅馬這邊也有教會人士以為教廷或許宜與北京建交，使地上教會在獲得羅馬教廷承認之後，能夠光明正大地向政府爭取教會固有的尊嚴和權利。至於地下教會人士，亦宜全力支持地上教會，兩者彼此合作，形成一致的力量，在宗教信仰上不與政府的宗教政策妥協，公開敢與政府抗爭。事實上，大陸某些地區的地上和地下教會團體也正在嘗試這條路，他們之間漸漸走近，設法消除前嫌，彼此合一。不過這是一種冒險的理想，若要行得通，還得靠地下和地上教會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敢於向中共細如微血管的控制系統挑戰。有這可能嗎？

中共在八一七文件中不斷強調中國天主教會必須獨立自主自辦，這也是該文件種種手腕措施的最終目標。對此，國籍神學家，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教授張春申神父表示：「中國教會自己鑄定的獨立自主自辦原則是受到政府宗教政策支配的版本，不論在教會官方文件中，或一些國家領導人口中，意義特殊，難與梵二大公會議的教會學符合。它無非由此肯定：在獨立主權的中國，宗教事務如同內政，全在政府的指導與管理之下。所以有時也能讀到中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一類的話。因此必須注意中國教會的獨立自主自辦版本，幾乎也是政府的版本。」<sup>30</sup>

## 第十二節 台灣天主教團體因應中梵外交關係生變

正當北京與教廷建交傳聞遍掃大陸各地之時，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底，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擬

30 《教友生活週刊》，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轉載自張春申，〈獨立自主自辦原則之檢討〉，香港《鼎》雙月刊。

乎是受強權擺佈、待宰的羔羊，對自己的命運沒有主控權，其哀鳴令人憐憫之至。所謂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忠！這兩封公開信間接而婉轉地指出教廷故意忽視台灣人民的尊嚴和獨立自主，助長中共對台灣的威脅和壓力。他們深深感到自己只因為也是中國人，而莫名其妙地成了犧牲品。我們可以列舉幾段，來看他們的悲哀心境，而對這樣的心境，慈母教會無論如何是不能充耳不聞的：

公開信第一段便說：

「今年甚至已經從國務卿口中知道，遲早，教廷會把駐在台灣使館遷移到北京去。事實上，台灣教友都了解這一天總會來到，我們也逐漸了解，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對教會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台灣雖然處境尷尬，總是體諒教宗的用心良苦，只是過程中我們感受到教廷忽略台灣近年來逐漸凸顯的國家地位與主體性。我們認為，忍辱負重如果可以帶來和平與正義，我們應當勇敢承擔痛苦，但是，中國政府用藉著與教廷建交來打擊與侮辱台灣，只因為我們不向它的權威低頭，這讓我們必須向您與全世界發出不平的聲音。」

另一段說：

「過去幾十年來，我們接受了因為不讓大陸上的兄弟姐妹遭受更嚴厲的鎮壓，教廷與台灣的關係必須低調處理，但是，這幾年下來我們發現，教會為了拯救在中國大陸被迫害的兄弟姐妹，低調處理台灣關係並沒有換來人權、正義與和平，反而被一心想用羞辱和挫折逼迫台灣投降的中國政府，用來當作侮辱台灣的工具，這樣子的結果，除了嚴重傷害了台灣教會所有教友的心，也將對於教會在台灣



正在研擬建交公報」；又說：「中共與教廷在過去一年中，在中共駐羅馬大使館談判達二十次之多，教廷方面由切利總主教主導談判，他正等待北京正式出面邀請，訪問大陸。」然這篇報導也說：「但在中共中央及羅馬教廷方面，對相互承認仍存在不同意見，所持立場甚至針鋒相對。」<sup>31</sup> 法國《費加洛日報》這篇發自北京的報導可信度多少不得而知，但是教廷經常透過法國和義大利駐教廷大使館與中共接觸溝通，這是很多內幕人士知道的事。

如果再看比利時籍聖母聖心會會士韓德力神父這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新加坡《天主教新聞週刊》所發表的〈中國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二〇〇〇年成為朋友〉一文所預言的：「如果外交關係正常化了，梵蒂岡派一位公使或大使到北京，而人民中國的大使要到梵蒂岡，取代台灣的大使。……這個突破大概不會在明天出現，但一定在二〇〇〇年出現，這為中國天主教的確是一突破，在中國，官方和地下教會的團體將結合為一，公開的，正式的為教會及政府所支持」，那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對台灣的中華民國和那裡的天主教會團體來說，簡直是大勢已去！

不過據稱：《費加洛日報》刊出這個消息之後，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戴瑞明曾立即與教廷的切利總主教連繫、面會。教廷表示：與中共並沒有具體接觸，所謂的關係正常化也沒有進展，雙方既無接觸，何來關係有所進展？<sup>32</sup>

<sup>31</sup> 參見〈中共與梵蒂岡秘密談判建交內幕〉，《中央社》，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記者鄭明智巴黎專電。

<sup>32</sup> 參見〈教廷：未與中共具體接觸〉，《中央日報》，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謝幸吟台北訊。

### 第十三節

二十世紀教宗致中國大陸天主教徒最後一個訊息：

千禧年前夕教宗致中國天主教徒書（聖言成了血肉）

一九九九年對當代中梵關係史來說，大概是最具戲劇性的一年。從年初起，斷交建交風聲疊起，浪潮逐漸高漲，直到年度即將結束之前，仍然居高不下。

這年十二月九日，教廷發表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是月三日簽署的、致天主教澳門教區主教林家駿的一封信，對建立已有四百二十四年歷史的澳門教區，將隨著澳門領土於十二月二十日的正式歸還中國，而隸屬於中國北京治下表達關懷之情。茲摘錄比較重要的幾段供參考：

「澳門教區的成立原為應付東亞傳播福音的需要，它的範圍起初包括中國及其毗鄰的國家和附近的島嶼。所以，它的歷史和那整個地區、尤其和文化悠久的中國的傳教史，有錯綜複雜的關係。在過去四個世紀的滄桑中，你們在澳門的教區團體一直是教會通往中國的門戶，那是天主上智給你們安排的任務。如今，你們即將正式成為在中國的教會，你們的任務不免有所改變，要在中國環境中深化你們的傳教使命，特別也要為零星生活在那個國家的遼闊疆土上的許多主內兄弟姐妹們作精神上的模範和支柱。」

「貴教區的歷史文化傳統富有重要價值。澳門不僅是向中國傳播福音的門戶，而且也是基督文明的一個前哨，及其與遠東文明的交流點。那裡，在一五九四年，即葡萄牙航海家初次抵達後才三十九

各自的生活環境中宣認耶穌基督是主，堅固他們對耶穌的信仰，為活出祂所帶給我們的新生命。若要如此，則非有選擇的內心自由及不惜放棄某些事物的勇氣不可。正如我在《降生奧蹟》詔令裡所說的，這原是跨越聖門的真正意義。」

「當祂（耶穌）誕生時有關於祂所說的話，耶穌在生命中逐一予以實現：祂給窮人傳報救恩的喜訊，向被奴役者宣告自由，給憂苦者帶來喜樂。」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你們知道，依照天主上智的奇妙安排，救恩的喜訊很早就傳揚到你們的國家。早在第五、第六世紀，敘利亞的幾批修道者，經過中亞細亞，把耶穌的聖名帶給了你們的祖先。在古都長安出土的景教碑，今日仍歷歷可數地記述著那自從公元六三五年以來展開的轟轟烈烈的傳教運動，那運動標誌了景教的正式傳入中國。雖然那次的福傳在幾個世紀以後漸告衰微，但是當大部分的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尚未認識基督之前，基督的福音已經傳給了你們的祖先這個事實，的確足以令你們感謝天主並引以為榮。」

「很早就傳揚開的福音訊息，到今日並沒有失去它的現實性，它仍在邀請和催促你們把它傳給還沒有接受它的人們。原來，不論從前或今日，在中國或在別的國家，基督信徒的生活都要符合福音的訓導，你們也要在你們身上表現道地的福音精神，也要在你們的生活環境中為基督做出光明的見證。為此，各位兄弟姐妹們，請你們大家重振精神，去向今日的中國人民傳揚救恩的福音吧！」

「我曉得，面對這樣偉大而艱辛的使命，你們不免覺得能力不足，但是你們知道基督已戰勝了世界（若·十六，33），有祂會在你們身邊幫助你們。親愛的司鐸、修女和在俗教友們，你們應該在你們的牧人的指導下，並與他們的共融中，精心修訂你們的牧靈計畫，盡量強調有關宣講基督和傳揚祂的教導的事務，特別注意青年人的世界。」

「再說，大禧年的慶典又是一個良好的機會，讓我們記得教會在各時代的人群中走過的路途，這

條路上有的是辛勞、痛苦、眼淚和血。你們也在走這樣的路途，你們中殉道者的血是結出許多道地基督信徒的種子。這麼多的主教、司鐸、修士、修女和在俗教友所奉獻的慷慨見證令我驚嘆不已，並為此而讚頌天主。看來，在有些地區這考驗的時期至今尚未終止。」

「於此準備慶祝大禧年之際，請你們不要忘記聖經和教會的一個傳統規定，它要求人們在聖年裡寬免彼此的債務，彌補不正義的行為對別人所造成的損失，並與鄰人修和。」

「我熱切期望你們依來自聖神的內在啟發，寬恕彼此的怨嫌，彼此接近，互相接納，打破藩籬，超越能使你們分離的一切。不要忘記耶穌在最後晚餐中所說的：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

「我聽說，你們願意以你們彼此之間以及與伯多祿繼承人之間的合一，來作為慶祝大禧年的最貴重禮物，我高興極了，因為這樣的決定肯定是天主聖神的果實，是祂引導教會走上那並不容易走的修和與合一的道路。」

「身為中國的好國民和基督的忠實信徒，你們愛護你們的國家，你們愛護本地和普世教會。……你們人數雖少，卻要做有利於你們國家的醞釀善良的酵母，要做天主許諾給所有人的救恩的記號和工具。」

「說到這裡，我再擴展視野，也看看生活在中國大陸以外的所有華裔天主教徒，……我祝頌他們各自在天主上智給他們安排的生活崗位上，發揮光和酵母的作用，並對中國大家庭所有的兄弟姐妹們在主內的合一提出貢獻。」

從上面所摘錄的幾段，不難看出教宗這篇大禧年前夕致中國大陸天主教徒的文告純粹是宗教性質的。教宗知道大陸的天主教徒如果要按照他的文告去做，可能還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就如他在文

告中所說的：

「教會在各時代的人群中走過的路途有的是辛勞、痛苦、眼淚和鮮血。你們也在走這樣的路途，你們中殉道者的血是結出許多道地基督信徒的種子。這麼多的主教、司鐸、修女和在俗教友所奉獻的慷慨見證令我驚嘆不已，並為此而讚頌天主。看來，在有些地區這考驗的時期至今尚未終止。」

為了減輕、甚至避免中國大陸天主教徒可能因此而遭受的痛苦考驗，教宗於是再次為大陸的天主教徒說誠懇的話：「身為中國的好國民和基督的忠實信徒，你們愛護你們的國家，你們愛護本地和普世教會。……你們要做有利於你們國家的醞釀善良的酵母。」教宗過去每次向中國大陸講話時，總免不了要這麼強調，他在為中國天主教徒向北京政府辯白。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容不下它的人民也服從另一個權威，熱愛另一個領袖的，要是這樣的服從和熱愛程度超過對中共黨和政府的情感，北京當局豈能不怒？因為中共把人民和國家視為他們的囊中物，是共產黨自己奪取和獨佔的私有產業，怎能容許他人分沾！中國人民若愛別於中共的其他的政府或組織團體如梵蒂岡教廷和教宗者，這就犯了不忠貞的大忌，豈可容忍？這幾乎是每個共產政權共有的特徵。難怪中共北京把全國人民從生至死的一切都置於黨和由黨所領導的政府的控制之下。

這一年，一九九九年聖誕節，中國大陸政府認可的官方天主教主教團也發佈一封二千禧年牧函，強調教會要與中國社會主義相適應。其中第二節「歷史的回顧」部分為他們成立愛國會大加辯護，並譴責西方部分傳教士為其本國政治利益和侵略政策服務，致使中國教會長期處於半殖民地狀態。文中又指出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西方教會出於對自身政治利益的考慮，作出了

與新生的人民政權相對抗的錯誤選擇，站在與新中國人民的對立面。於是，中國廣大的神長教友經過近八年的深思、祈禱，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天主教第一屆代表會議，認為愛國是天主的誠命。為了愛新中國，建設新中國，會議一致決定成立天主教自己的愛國組織「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其宗旨是協助政府貫徹宗教政策，堅持愛國愛教原則。中國教會正是由於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才挽救了中國教會，使中國教會得以生存和發展<sup>35</sup>。

也的確，大陸官方公開教會領導人士為了適應他們所處的政治環境，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教會」的生存，所以才寫了這封應景的「牧函」。這是可以理解的。

#### 第十四節 教廷外交部次長米廖雷蒙席談對兩岸政策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駐教廷十個亞洲國家的大使館，包括中華民國大使館在內，和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聯合，在該大學大講堂舉辦「文明間之對話」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哲學教授，名學者沈清松博士，應中華民國駐教廷戴瑞明大使和駐教廷亞洲外交團團長，菲律賓的德維拉大使的邀請，專程來羅馬赴會，並發表論文。做客羅馬期間，沈教授經教廷正義與和平委員會主席，越南籍的阮文順總主教的安排，拜訪了教廷國務院與各國關係部副秘書長，即外交次長切萊斯迪諾。

<sup>35</sup> 參見《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香港訊〈中國：公開天主教會主教團二千年禧年牧函〉。

米廖雷 (Celestino Migliore) 蒙席<sup>36</sup>，兩人就中梵關係問題彼此交談約四十分鐘。沈教授回國後，寫了一篇〈教廷外交部次長談兩岸政策〉的交談記錄，刊於台北《聯合報》上<sup>37</sup>。由於米廖雷蒙席是教廷國務院要員，所以他有關中梵關係的談話自然值得重視。茲將沈教授的交談記錄錄之如下：

沈教授（以下簡稱沈）：一方面，我們希望中國大陸進步，有更多的民主與自由，尤其是有更多的宗教自由。另一方面，我們也很珍惜台灣現有自由民主的生活，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可以說是傳統中華文化最成功、最先進的實驗室。然而，我們必須不斷生存發展，才能給予整個中國一個發展的典範。外交關係對於我們目前的生存與發展，有著絕對的必要性。就此而言，我們不希望梵蒂岡在與中國大陸接觸的過程中，傷及與台灣的關係。也希望梵蒂岡在與中共接觸時，要以促成他們宗教自由的進步為原則。梵蒂岡的外交作為不應是為外交而外交，而應該是漸進的、工具性的、並有益於促成中共的宗教自由。

米廖雷蒙席（以下簡稱米）：你說得好，可是你可以確定，一旦兩岸發生戰爭，日本或美國會協防台灣嗎？

沈：這雖不是我研究的領域，但據我所知，日本或美國在國際事務上仍公開宣佈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更何況，如中共決意攻打台灣，即使美、日想介入台海事務，也無法阻止中共。

36 切萊斯迪諾·米廖雷蒙席已在二〇〇三年初由教宗晉升為總主教，並派赴紐約聯合國總部擔任教廷駐聯合國常任觀察員，接替已升任教廷正義與和平委員會主席雷納托·馬蒂諾 (Renato Martino) 總主教的職務。後者已在二〇〇三年十月廿一日晉陞為樞機主教。

37 《聯合報》，二〇〇〇年二月十九日第十四版。

米：中國大陸會對台動武嗎？

沈：我不確知此事，但我想除非台灣在有外力或無外力介入宣佈與中國分離或台灣獨立，否則應不至於走上動武的路子，因為這對雙方都不利。

米：台灣會從中國分離或獨立嗎？

沈：在台灣的確是有一定比例的人口主張分離或台獨，當中共強硬時，比例反而增加；當中共溫和、講理時，比例又會降回來。但是，一般而言，老百姓都想保有當前民主自由的生活與經濟、政治、文化的蓬勃發展，如果由於與中共的統一會失去這些，則會感到失去生活的意義；然而，我們也不願特別去做出與祖先所來自的土地斷根、絕然分離的抉擇。

米：既然如此，那麼兩岸究竟是會走上修和的道路。就教廷而言，我們只想促進大陸的宗教自由，並保護其中一千萬的信徒。聖座一直對台灣很好，新近也為台灣祝聖了一位新樞機，也就是單國璽樞機。不過教廷與台灣的關係已經很久了，可是台灣的教友數目一直没有增加，反而逐漸減少。相反的，中國大陸有很多信徒，而且他們已經為了信仰受苦很多年了。

沈：教友數目是信仰的問題，信仰是心靈的投入、是恩寵，而不是量的問題，不能用多寡來比較。也不能因為其他的羊群，而犧牲現有的羊群，如果硬要這樣，這是不正義的。

米：我們知道，也因此我們的作法不是相斥性的，我們不會在與北京建立邦交的同時，放棄對台灣的關係。我們可以依據國際法，按照當年維也納公約的許可，派一位總主教層級的宗座代表，常駐台灣。



沈：那麼台灣駐在梵蒂岡的使節呢？

米：這我們不會主動取消，我們一直有台灣的大使派駐。將來迫不得已則可能改變方式。我們沒有時間表，因為問題在北京，不在我們。

沈：從最近中共對待法輪功的情況看來，顯示中共在宗教方面的認知與政策還未成熟到能真正尊重宗教自由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教廷在與其接觸時應該更為謹慎，而且在外交作為上，應該更強烈顯示教廷重視宗教自由與愛護教友的原則，甚至藉著對有宗教自由的台灣示好，以顯示之。因為中國人基本上都尊重有原則的人，而且如此一來你們才有談的依據。

米：這我們了解。也因此，我們還沒正式談。

沈：在這種情形下，可否先做一些對台灣好一點的事情。第一，可否在教廷的公開文件中讚揚台灣在中華文化方面的成就，並希望大陸以此為榜樣，進而朝向自由、民主方向進步。

米：這點我們可以考慮。

沈：其次，可否提高對台的外交層級，並多樣化對台外交的形式。

米：目前已經不能再提高對台的外交層級，至於在多樣化對台外交形式方面，我們可以做得更多，像最近正義與和平委員會在台召開國際會議這類事情便是。其實，教廷給予台灣一位樞機，已經是對台灣最好的肯定。只要是具體可行的建議，都歡迎寫信來供我們參考。

\* \* \* \* \*

從上面所錄的這篇交談，可以看出教廷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相當有原則，而且考慮

也不如外界所擔憂的那麼不周。中共北京五十年來對教廷與之建交所提的兩大條件沒有更改，即先與台灣斷交，建交後亦不得干涉中國內政，而中國的內政包括宗教信仰。中共以此要挾教廷，欲陷教廷於不義。但是從教廷外交要員，例如陶然外長和米廖雷次長有關對華政策的訪談，似乎都顯示教廷不願沾上這個足以令它洗刷不淨的歷史大污點。

教廷外交次長與沈清松教授的交談要點是：教廷對海峽兩岸的外交政策不是二選其一、具排斥性的抉擇，不是顧此得去彼的斷腕措施；不會主動要求台灣撤館，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可能只會改變維持關係的方式；教廷不會急著與北京建交，一如很多人推測的教廷將在公元二千年派大使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教廷沒有時間表，也根本不知道哪天會與中共建交；至於教廷與台灣的外交關係層次，將維持現狀，但可以藉著其他方式彌補外交關係不完美的缺陷。

## 第十五節 教廷開始公開關懷台灣的天災人禍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台灣發生有史以來最具破壞性的地震，芮氏七點六級，人命和物質損失不可計數，災難最嚴重的地區為台中、南投、埔里一帶。教廷梵蒂岡電台當日以教廷頭條新聞報導，並附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慰問電函。

教廷對世界各地發生的嚴重天災人禍，經常都由教廷國務卿署名，代表教宗致災區天主教會領導人，表達關懷之情。唯獨台灣歷來發生類似災難時，教廷幾乎都閉口不言，至少不公開表示關懷。一般人咸認教廷的作法乃在避免給中共以譴責教廷對中華民國友善的藉口。而教廷的這種態度

於是年中共中央下達的〈八一七文件〉。據這份文件的內容顯示，中共乃是為了積極準備在公元二千年與教廷建交，所以先下手為強，企圖在與教廷建交之前，便已完全控制整個中國的天主教會。

上面所提《信仰通訊社》的消息又說：「原先預定祝聖十二位主教，而祝聖禮儀是用來與羅馬教宗慣常在元月六日這天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祝聖主教的典禮唱對台戲，為肯定顯示中國天主教獨立於羅馬。豈料北京這項祝聖典禮在官方公開教會與政府和愛國會之間製造了更深的鴻溝。有許多事實如此證明。」

這些事實即：「北京全國修院有一百二十名修生集體叛離祝聖典禮。……參禮人數不到兩百人。……通常在這樣的機會中，參禮信友人數總在數千。某些被迫參禮的教友說，整個祝聖禮儀過程更像是一個喪禮。……被祝聖的五位主教分別是：閩東教區三十九歲的詹思祿助理主教，保定教區七十四歲的蘇長山助理主教，唐山教區三十七歲的方建平助理主教，南京教區三十六歲的陸新平助理主教，長治教區七十一歲的靳道遠主教。」<sup>42</sup>

北京這項沒有經羅馬教宗許可的祝聖主教儀式舉行前兩天，元月四日<sup>43</sup>，教廷發言人納瓦羅博士已經向新聞界發表聲明說：「我必須表示教廷的驚訝和失望，因為這個決定竟在多方面聲稱教廷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很有希望之際發生，這個舉動只能帶來妨礙這個進程的阻礙。」

<sup>42</sup> *Fides News*, 7 gennaio 2000: CINA-VATICANO: Ordinazione episcopale a Pechino "un fallimento" per governo e Associazione Patriotica.

<sup>43</sup> *Radiogiornale della Radio Vaticana*, 4 gennaio 2000, p. 3.

教廷聖教法典解釋委員會榮休主席溫琴佐·法焦洛 (Vincenzo Fagiolo) 樞機主教和義大利西西里島首席主教，巴勒莫 (Palermo) 總主教區的總主教薩爾瓦多雷·德喬治 (Salvatore de Giorgio) 樞機，均在元月七日針對北京祝聖新主教的行為發表聲明說：「任命主教必須要有教宗的委任，沒有這項委任，不能祝聖主教。在中國的教會長久以來處在實際的裂教局勢之中。這種違反規律的局勢已經拖延許久。」<sup>44</sup>

香港的中國教會觀察家認為：「在頻傳中梵關係漸有曙光之際，中國公開教會倉促選舉和祝聖大量主教，可能嚴重損害中梵對話。……他們對這次祝聖大批主教並不感到意外，因為自九九年十月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和中國天主教會愛國會向全國各地教區發出一封通告，鼓勵有需要的教區選舉和祝聖主教。……香港教區陳日君助理主教一月四日於曼谷向天亞社說，這次祝聖顯示中國並沒有意思與梵蒂岡修和，他說他們應該等待。他強調，梵蒂岡會願意讓步和妥協，但不是屈服，而將事情成為既定事實（在沒有梵蒂岡參與下祝聖主教），清晰顯示他們並沒有誠意與梵蒂岡達成談判協議。」<sup>45</sup>

二〇〇〇年二月十一日，義大利和梵蒂岡簽署拉特朗條約七十一週年紀念日，教廷國務卿索達諾樞機主教出席義大利駐教廷大使館每年舉行的酒會。會中他向新聞界人士說：「教廷相信中國

44 *LA STAMPA*, 8 gennaio 2000, p.8; *La Repubblica* (義大利《共和國日報》), 8 gennaio 2000, p.11.

45 《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二〇〇〇年一月七日香港訊〈中國：中國教會觀察家警告，倉促祝聖主教可能會損害中梵對話〉。

政府有意與教廷對話，因此教廷等待相關的具體表示，可是教廷不了解中國某些舉動的意義，比方說中國政府強行祝聖主教。」

索達諾樞機主教又說：「教廷與中國政府有一種非官方的溝通形式。為此，教廷對中國既然願意和我們對話，卻又以既成事實使局勢變得複雜這件事感到奇怪。……無論如何，我們相信一個如此大的國家，又有如此高尚的文化，該當能夠承認許多中國人既能做個中國人、同時也能做個天主教徒的自由。」<sup>46</sup>

## 第十七節 北京又將擅自任命並祝聖主教，教廷提出四點警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朱鎔基於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七日起程，前來歐洲訪問保加利亞、德國、盧森堡、荷蘭、義大利和比利時等國，為期兩週。七月五日至九日在羅馬訪問。行前，他於六月十九日在北京中南海接受歐洲最重要的財經日報、義大利《太陽二十四小時》(Il Sole 24 ore)和義大利最大的通訊社，《安莎》(ANSA)通訊社的採訪。這是朱鎔基於一九九八年三月出任總理以來，第一次訪問義大利。

朱總理向記者表示：他此次訪問義大利，到目前為止未有安排會晤梵蒂岡官員。但是他也表示：中國要求教廷與台灣斷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權，並接受台灣是中國的

46 ANSA 通訊社，二〇〇〇年二月十一日晚間八點十九分電訊。

一個省份。

據《太陽二十四小時》報導稱：朱鎔基的態度似是表示北京與梵蒂岡雙方在這問題上已達成諒解。報導又說：朱鎔基表示，另一個阻礙雙方關係的問題是宗教自由被利用為政治工具，而中國當局堅持不能藉宗教自由來干預中國的內政。他說中國正與梵蒂岡在討論原則問題。

據《太陽二十四小時》報導：在北京與梵蒂岡關係問題上，主教任命這棘手的問題近期已有所進展，例如在處理山東及浙江省的祝聖主教事宜上<sup>47</sup>。朱鎔基說：這些問題解決後，教宗可以來中國訪問。

一位中國教會觀察家六月二十二日在香港對《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說：這是朱鎔基第一次公開談到中梵問題，他似乎承認主教任命不再是干預中國內政的事情。這位觀察家又說：北京在中梵關係上看來較以往寬鬆，顯示在建交問題上有願意讓步的跡象。他估計越南主教的任命模式會較容易獲北京政府採納，並相信中梵之間的障礙很快會獲得解決<sup>48</sup>。

正當朱鎔基總理接受義大利新聞媒體採訪時，北京天主教愛國會亦在積極準備六月二十五日浙江杭州主教祝聖的事宜。這位即將被祝聖的公開教會主教並沒有獲得教廷批准，但是他的祝聖禮似乎是在霸王強上弓的情況下硬要進行，企圖迫使教廷不得不接受或事後追認既成的事實。

豈料教廷大不以為然，於祝聖前夕發表嚴重聲明，警告中國大陸政府和愛國會不要貿然行事。

47 山東陽穀教區主教兼臨清監牧區宗座署理趙鳳昌在教廷批准下，於二〇〇〇年五月七日由三位教廷承認的主教聯合祝聖。在此之前的二〇〇〇年中，亦有河北滄州教區、浙江寧波教區的主教在教廷許可和北京政府的認可下被祝聖。

48 《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三日羅馬訊〈中國：總理朱鎔基確認北京與教廷保持交談〉。

這項四點聲明由梵蒂岡發言人納瓦羅博士於六月二十四日星期六宣佈，內容如下<sup>49</sup>：

就各方所提出的、有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即將祝聖主教的消息，謹發表下列幾點聲明：

第一點：就如眾所周知的，沒有宗座的授權而祝聖主教，對教會的共融是一個痛苦的創傷，對聖教法典的紀律也是嚴重的侵犯。

第二點：由於這種觸及教會本身體制結構的行為的嚴重性，所以聖教法典才對行祝聖禮的主教和接受祝聖者訂立特殊的制裁處分。

第三點：在沒有與伯多祿的繼承人共融之下祝聖主教，乃進一步阻礙中國教會已經艱困的生活，以及全球天主教徒都渴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教廷之間舉步維艱的關係的正常化。

第四點：面對中國政要近日所聲明的與教廷對話的意願，這樣的局勢只能令人驚奇。

杭州教區愛國會按照既定計畫，於六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八點半，由三位教廷沒有承認的主教，即江蘇海門教區的郁成才「主教」、江西南昌教區的吳仕珍「主教」、江蘇南京教區的陸新平「輔理主教」祝聖了未經教廷批准的七十一歲的曹湘德神父為「主教」<sup>50</sup>。

兩天後，北京外交部以書面回答《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所提的問題說：教廷若想改善中梵關係，就要表現出誠意和拿出實際行動，而不應該動輒發表甚麼聲明，以制裁相威脅。此舉與改善中

<sup>49</sup> *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 SEDOC, N. 1064, 24 giugno 2000: Dichiarazione di Navarro Valls su notizie di prosime ordinazioni episcopali n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sup>50</sup> 《公教報》，二〇〇〇年七月九日第二十二版。

陪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朱鎔基訪問羅馬的北京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七月七日在羅馬對記者說：中國總理朱鎔基訪問義大利首都羅馬期間，沒有與梵蒂岡接觸。又說：即使中國與梵蒂岡建立外交關係，中國的愛國教會仍會繼續存在。她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教廷建立外交關係，只在教廷與台灣斷交時才實現。她表示：中國愛國教會的存在是肯定的。愛國教會的制度，包括任命主教，將不會改變。梵蒂岡不應該以宗教為藉口干涉中國的內政<sup>55</sup>。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三日逢當年天主教最大節慶復活節之前的聖枝主日，當天浙江杭州教區主教座堂竟然取消舉行全天的三台彌撒聖祭。杭州教區「主教」曹湘德當天到市外一座聖堂舉行彌撒，所以不知他的主教座堂到底發生甚麼事。此後兩三天的平日彌撒也都取消。曹湘德「主教」說，週末神父們開會討論時，並沒有邀請他出席。他說他也不知道發生甚麼事情，神父們若不舉行彌撒，他也沒有辦法。

曹湘德是在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未經教廷准許，並在教廷警告不得接受之下，接受政府任命，由三位教廷不承認的非法主教祝聖為杭州教區的「主教」<sup>56</sup>。

55 〈即使中梵建交，愛國教會繼續存在〉，《公教報》，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三日第廿二版。

56 〈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二〇〇〇年四月十七日香港訊〈中國：華東杭州教區內部問題，取消聖枝主日彌撒〉。



## 第十八節 教廷千禧年中央委員會主席埃切卡萊樞機主教赴北京參加「宗教與和平」會議

二〇〇〇年九月十二日，教廷公元二千年大禧年中央委員會主席，法國籍的埃切卡萊樞機主教，應義中文化協會「天下一家」邀請，飛赴北京參加該協會主辦的「宗教與和平」專題研討會。會議從九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在北京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舉行。

行前，教廷新聞室主任納瓦羅博士應有關方面要求，就埃切卡萊樞機主教北京之行發表聲明說：

「有人向我問及羅歇·埃切卡萊樞機主教參加義中文化協會於九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在北京社會科學院舉行的「宗教與和平」專題研討會的意義。樞機主教是以個人名義參與的，他沒有肩負任何外交性質的使命。他要是有些甚麼接觸，都不能被視作對現有教會結構的承認。樞機主教此行僅僅是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去年十二月八日致全體中國天主教徒的信函的邏輯意義中進行的，信函說：我聽說你們願意以你們彼此之間以及與伯多祿繼承人之間的合一來作為慶祝大禧年的最貴重禮物，我高興極了，因為這樣的決定肯定是天主聖神的果實，是祂引導教會走上那並不容易走的修和與合一的道路。」<sup>57</sup>

<sup>57</sup> Vatican Information Service: bollettino N. 0530, 12 settembre 2000.

答：沒有人可以否認某些積極的跡象，這些跡象顯示教會團體是在天主聖神的助佑下正在成長。但是也有一些嚴重的消息令人擔心不安。雖然如此，歷史的進展是無法阻止的，身為基督信徒，回顧教會兩千年的歷史，最明白這個道理。福音教導我們注目基督，展望將來。基督昨日、今日、明日，是歷史的主宰，祂死而復活的逾越奧蹟是教會日常生活的中心。

問：教宗將二千禧年的慶祝事宜委託給您，您這次去中國，是否有助於堅強那個內部分裂又受到來自政權外在壓制的教會的信德呢？

答：這個大禧年必須是大家共同努力走向一個和好的教會、一個能被人認出是傳揚福音、為全體中國人民服務的教會的好年頭。我想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去年十二月八日頒佈的寫給全體中國天主教徒的文告說：「我聽說你們願意以你們彼此之間以及與伯多祿繼承人之間的合一，來作為慶祝大禧年的最貴重禮物，我高興極了，因為這樣的決定肯定是天主聖神的果實，是祂引導教會走上那並不容易走的修和與合一的道路。」

問：這麼說來，您到了中國，要怎麼去幫助那裡的天主教徒呢？

答：目前還不知道。自從二十年前初次訪問中國以來，我每天晚上都在為中國人民和中國的教會祈求天主。我願意我能帶給他們每個人一線希望。我很明白，我在中國的說話和行動都有被人曲解或利用的危險。可能會有接觸不能被視作對現存教會組織的承認。我的唯一願望是要向所有的人證實一個誠懇而堅決的對話意志，但毫不隱瞞基督所建立的教會的真理。我把我的一切託付在天主手中，也託付在所有中國天主教徒的信任和友愛的祈禱中。

\* \* \* \* \*

埃切卡萊樞機主教於九月二十一日結束他的第三度中國大陸行，返抵羅馬，並於二十五日再次接受梵蒂岡電台節目部主任隆巴迪神父的專訪。訪談內容如下<sup>59</sup>：

問：樞機主教，您的中國行似乎與原先預見的不同，而且超出了行前所說的個人性質……

答：可以這麼說，也可以不這麼說。我此行的主要目的當然是參加「宗教與和平」專題研討會。這項會議很成功，因為氣氛很好，在歷史與神學方面的交流也很認真。會議之後，在我面前敞開的是一條全新的旅途，我也希望在天主恩寵的幫助之下，像一位大禧年的使者在天主教徒之間推動修好一樣，冒險走一趟。由於修和是在中國的教會必須面對的最大挑戰，而大禧年，就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經常提示的，是從事各種大膽的使徒工作和懷抱各種心靈期望的大好時光。回來以後，我更相信中國教會迫切需要合一的見證，這在中國在走向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改變之際，尤其如此。必須看看浦東新上海，以便了解明日的中國。它那令人眼花撩亂的現代化，更教人感到中國需要在精神方面進補。

問：樞機主教，新聞通訊社說您從北京到上海，一路上都是由教廷不承認的愛國會作嚮導……

答：我在羅馬動身之前已經清楚地說過，我的一舉一動不能被解釋為對官方教會組織的認可。

59 羅歇·埃切卡萊 (Roger Etcheberry) 樞機主教 11000 年九月二十五日接受梵蒂岡電台節目部主任隆巴迪 (Federico Lombardi) 神父訪談樞機主教專用信箋，原文為義大利文。

可能，問題可能會用完全客觀和平靜的態度來討論。然後，又有列聖品之日和中國國慶日不巧相逢的意外。那些選擇十月一日列品的人士只想到傳教主保小德蘭，但我肯定這個選擇絕無挑釁或報復的意味。身為中國好友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絕不會如此小氣地做這種無聊的事。但願有朝一日利瑪竇神父也能被列入真福品。教區方面的列品程序已經完成。這位十六世紀明智的耶穌會士活在中國人心中，受中國人愛戴。二十年前我曾在北京他的墓前祈禱。這一切無不令我們希望早日有個對話的可能，使一個真正的中國的天主教會能夠起飛，好像一條美麗的龍從東方躍起，成為普世教會完整的一部分。

\* \* \* \* \*

## 第十四章 教廷與北京關係急轉直下

### 和極思補救

二〇〇〇年十月～二〇〇三年九月（戴瑞明大使任內二）

#### 第一節 教宗梵蒂岡聖伯多祿廣場為中華一百二十殉道真福宣聖與中共的攻訐

公元二千年大禧年三月十日星期五正午，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在梵蒂岡宗座大樓御前會議大廳主持公開樞密會議，有三十三位樞機主教和三十六位總主教及主教參與。會中宣佈衆多位男女真福將被宣佈為聖人聖女的案件，其中包括中國一百二十位殉道真福。教宗並決定於同年十月一日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廣場為中國這批殉道真福舉行宣聖大典。與他們同時列入聖品的還有嘉諾薩仁愛女修會蘇丹籍修女巴基達真福（Josephine Bakhita），西班牙修女耶穌聖心瑪利亞·若瑟·桑喬·德格拉（Maria Giusepa del Cuore di Gesu rancho de Guerra）真福和美國修女加大利納·德雷克塞爾（Katherine Drexel）真福<sup>1</sup>。

<sup>1</sup> L'OSSERVATORE ROMANO, 11 marzo 2000, Vaticano.

宣聖消息一出，全球華人教友，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無不欣喜若狂，深慶中華教會終於也有衆多的聖人聖女。不過，中國大陸教會的歡慶很快就聲銷跡匿，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認為中華殉道的宣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大侮辱，是大不敬。

天曉得，原來很多人還以為這下子中國北京政府該當滿意、雀躍才是，而且宣聖的日期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一國慶當天，這不是天作之合，給北京賞盡了光彩嗎？豈知這次又犯了中共的大忌，因為中共視這些即將被宣聖的、生活在公元一六八四年至一九三〇年間的殉道者，是出賣中國的叛徒，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和幫兇，是強姦殺人、犯了滔天大罪、罪有應得的歹徒。中共當局表態後，大陸教會主教神職教友噤若寒蟬，一股莫名的痛苦憋在胸壑，無法釋去。

中共原來指望愛國會人士主動表態，對梵蒂岡教廷進行口誅筆伐，不料愛國會和官方教會人士並沒有膺命行事。數個月過去，北京發現毫無動靜，於是唆使一批御用文人依樣畫葫蘆地寫了八大篇似是而非的文章，向教廷和這些準聖人聖女發動機槍掃射式的總攻擊，局勢於九月達到高潮。這些執筆人中還有不少曾經寫過推崇羅馬的文章呢！

九月二十日，北京外交部和愛國會發表措辭嚴厲的聲明，譴責梵蒂岡教廷宣聖計畫嚴重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損害了中國的尊嚴，中共方面不會容忍梵蒂岡的做法<sup>2</sup>。

面對中國北京的攻擊和譴責，九月二十二日教廷梵蒂岡電台四十個語言節目部，包括華語節目部，發表這樣一則消息說<sup>3</sup>：「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將於十月一日在羅馬聖伯多祿廣場主持隆重的列

<sup>2</sup> 英國 BBC World Service, 20 Sept. 2000.

<sup>3</sup> *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 SEDOC, N.1473, 22 settembre 2000: Canonizzazioni del 1 ottobre: briefing del direttore della Sala Stampa, Navarro Valls.*

聖品大典，這次被列入聖品的是中國一百二十位致命真福。這些真福的生平年代不同，介於一六八四年到一九三〇年之間。這些真福中，首批被提出列真福品案件的有五位，他們是在一八九三年由良十三世教宗批准進行審查的。最後兩位致命真福列品案件則在一九八三年結束審查，前後共九十年之久。」

消息繼續說：「一百二十位即將列聖品的真福中，八十七位是中國人，其他三十三位則是西班牙、法國、義大利、比利時與荷蘭的傳教士和修女。中國真福中有八十三位是在俗教友，外籍傳教士修女中有六位主教、十九位教區神父和會士神父、一位修士、七位修女。」

消息結束說：「為了十月一日的列聖品大典，中國大陸有許多負面的反應，教廷新聞室主任九月二十二日在記者招待會中駁斥種種爭論，他說教廷選定十月一日列聖品大典，根本沒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有任何關係，教會選定這一天，純粹想到十月份是傳教的月份，而教會最大的傳教主保聖人之一，聖女小德肋撒的瞻禮紀念日正是十月一日，這位聖女生前經常為中國的傳教工作祈禱。再說，中國教會的成長有賴於外籍傳教士的貢獻。基於這種種與中國傳教有密切關係和積極意義的因素，教會決定在十月傳教月份的第一天，舉行有史以來第一批中國真福列聖品大典。」

九月二十六日，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和官方愛國教會又對教廷發出兩項惡毒的攻擊，迫使教廷新聞室主任不得不再次發表有關的聲明。梵蒂岡電台華語節目部於同一天發表另一篇較長的有關消息<sup>4</sup>說：

<sup>4</sup> Ibid., N. 1499, 26 settembre 2000: Dichiarazione di Navarro Valls sulla presa di posizione del governo cinese in merito alle canonizzazioni del 1 ottobre p. v.

廷把那些犯下滔天大罪的人冊封為聖人呢？如果歷史事實真的被歪曲，那麼為什麼中國民間和宗教團體在一八九三年良十三世教宗冊封這一百二十位致命者為真福時，不提出抗議呢？」

消息報導納瓦羅博士最後一段聲明說：「列聖品本身無意對複雜的歷史時期下判斷，在那些時期，這一百二十位致命者大都蒙召做出最崇高的見證。列品大典反而要在教會和全球善心人士面前，使他們對基督、全人類的救主的信德光耀於世。」

十月一日，羅馬陰雨，就像大禧年中教宗多次在星期日主持隆重禮節時遇到風雨一樣，中華宣聖大典如期舉行。與中華殉道真福一同列入聖品的還有美國、蘇丹和西班牙三位女真福。來自全球各地的參禮朝聖人士達十萬之眾。與教宗共祭的樞機主教、總主教和主教有五十二位之多，台灣高雄教區的單國璽樞機主教、其他教區的總主教和主教、香港教區的湯漢輔理主教都在列。來自全球各地的華人教友約有四千名，盛況空前。

按照教廷的傳統，舉行宣佈真福或宣佈聖人大典時，祭台上方必當懸掛真福或聖人的肖像。但是這次宣聖時，卻沒有中華聖人肖像呈現在世人眼前。據台灣地區主教團宣聖委員會的解釋，那幅耗資四百萬台幣，於一九九六年選聘台北輔仁大學藝術系李健儀教授費時一年餘精心繪製的宣聖畫像，可能因為其中人物畫面都太小，在聖伯多祿廣場參禮的人士無法從遠處端詳他們的聖顏儀容，所以沒被掛上。這也當然，一百二十個人擠在一張大約三、五平方公尺的畫面上，怎能看得出來，再說，這些人物也都是畫家憑想像畫出來的，與真實的人物無關，只是象徵的意義而已<sup>5</sup>。於是，

<sup>5</sup> 參見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宣聖委員會主編，《忠義千秋》中華殉道宣聖專輯（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七月九日初版）。



些事蹟發生在幾個世紀之間和中國歷史上一些複雜和艱困的時代，現在舉行的禮節儀式不是為那些歷史階段做評斷的適當時刻；這樣的評斷可以，也應該在另一個場所進行。今天，教會舉行這個隆重的宣聖大典，目的只在承認那些致命者的勇敢和言行一致是我們每個人的表率，這對高尚的中華民族是一種榮耀。」

教宗也特別表揚了在中國殉道的三十三位外籍傳教士的精神，他說：

「他們遠離家國，設法生活在中國人的環境中，他們懷著愛心學習中國人的生活習性，只希望向中國人宣講基督，並為中國人服務。他們的墳墓就在那裡，這幾乎意味著他們永遠屬於中國，他們固然有人性的不足，卻真正地熱愛這個國家，為這個國家耗盡一切精力。富格辣主教回答那位握著劍、準備殺他的總督說：「我們從未傷害任何人，相反地，我們幫助了很多人」。」

教宗這段講道有三句話是針對中國北京對宣聖事件的攻擊而說的，亦即「這些事蹟發生在幾個世紀之間和中國歷史上一些複雜和艱困的時代，現在舉行的禮節儀式不是為那些歷史階段做評斷的適當時刻；這樣的評斷可以，也應該在另一個場所進行。」

在哪個場所進行呢？宣聖大典翌日，教宗接見前來羅馬參加宣聖大典的海內外華人信友們，向他們說：

「有人片面和不客觀地閱讀歷史，只在他們的傳教工作上看到缺陷和錯誤。如果真有其事，則我

們為他們請求寬恕。其實，有誰沒有缺點？……一百二十位致命者為優秀的中華民族是個光彩，教會冊封他們為聖人，絕不是要給那個時期下歷史評斷，更無意為當時有些政府給中華民族的歷史帶來沉重負擔的作為申辯。教會所要的只是為表揚中國這些良好的子女的英勇忠誠，他們不被兇殘的迫害所嚇倒。當我想到中國大陸所有的教友此時此刻與我們密切結合在一起時，我更感到欣慰。」

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逼得不得不在宣聖次日，就公開為新聖人們在傳教工作上可能有的缺陷和錯誤請求寬恕。這也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事，從未聽過羅馬教宗為宣福宣聖而向誰請求原諒，更未聽過有某個國家的政府因為教會宣聖而對教廷大肆攻伐。這些年來，教廷不知宣福宣聖了多少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西班牙內戰中，為信仰而殉道的人士，如果西班牙真要像中國北京一樣，發動全國謾罵普世教會和教廷，則西班牙豈不歲無寧日？更何況教宗每為西班牙那個時代的殉道者宣福宣聖時，西班牙政府無不派遣政府大員專程來梵蒂岡參禮，因為他們為此引以為榮，其他任何國家和政府亦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的問題在於凡事從自己的政治好惡角度和利益看，並以政治為納百川的大海，一切都必須以政治為歸宿，以中共的馬首是瞻。這就是中共一直以來與世界上軌道的國家格格不入、並使中國大陸人民被視為異域人的致命傷。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知改，善莫大焉！中國古聖先賢這句至理名言的核心在「善莫大焉」：一個知過而改的人，他就成了大善的人。大善者非聖人，則何？現世人生有誰沒有人性的缺陷和過失，基督信仰所重視和推崇的乃是最後時刻的皈依，一如懸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向祂右邊那個同樣懸在十字架上知過而改的強盜所說的一樣，一個在最後關頭知道及時痛改前非，棄邪歸正者，

天主教會咸認他為聖賢，堅信他已獲得永生的救援。佛家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同樣的規勸和人生價值觀。

上面所提的教宗請求寬恕的，就是你我都有的人性自然的缺點。其實，要不是迫不得已，根本沒有必要還麻煩教宗在全世界面前提出這個粗淺得幼稚的道理來。十月二日當天上午，聽到教宗向中國人說明這個小道理時，筆者幾乎慚愧得無地自容。

但這次教宗請求寬恕的時間和地點似乎不是他所說的，為歷史階段做評斷的時刻和場所。看來，這樣的評斷要托給有關的學者來研究，並找出適當的機會和場所發表見解。這樣的一個構想可能已開始在醞釀。

## 第二節 羅馬額我略大學舉行利瑪竇抵北京四百週年學術會議，教宗向中華民族請求寬恕和諒解

教宗所預期的、為中國殉道聖人所處的歷史階段做評斷的機會和場所終於來到了。二〇〇一年十月間，分別在北京、香港和羅馬舉行三項紀念利瑪竇抵北京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的國際研討會於十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在北京理工大學舉行，由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聯合舉辦，題目是「相遇與對話：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學術研究會」，探討外交與傳教、宗教與科學、藝術、歷史記載、地理歷史、傳教方法與草根階層的反應等八個專題。香港的國際研討會於十月十三日至十七日舉行，由香港城市大學跨文化研究

知道：天主教會願意再次提供謙虛和無私的服務，以造福中國的天主教徒和這個國家的全體居民。」

教宗又明確指出：

「今天的天主教會也不向中國和它的政府要求任何特權，教會只希望恢復對話，以便達到彼此尊重 and 互相深入認識的關係。」

教宗強調：

「可惜，歷史告訴我們：教會的成員在中國的行為並非絕無過失，這是人性及其行為有限的苦果，更是受到艱困局勢的約束所致，這些局勢及複雜的歷史事件與彼此衝突的政治利益有關。」

教宗進一步提到在中國發生的禮儀之爭和政治捲入宗教的後果說：

「連神學之爭也不缺乏，它激怒人心，給傳播福音的工作帶來重大的困擾。在現代歷史的某些階段，出自歐洲列強的「保教權」有不少次也限制了教會行動的自由，損害了教會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這些局勢和事件影響了教會的進展，阻礙了教會專心為中華民族的益處而履行其創立者耶穌基督所託付給它的使命。」

教宗此地間接指出教會本身也是歐洲殖民列強的受害者，他於是表示：

「我為過去的這些過失和有限深深感到遺憾，對這些事情竟在不少人心中造成了天主教對中華民

教宗的這個舉動被大部分的人看作是教廷對中國北京政府的善意回應，因為北京當局強烈攻擊教廷於二千年大禧年十月一日在羅馬宣佈中華一百二十位殉道真福為聖人。北京以反殖民帝國主義為號召，一向視這些被中國朝廷或義和團所殺的中國天主教徒和西方傳教士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所以認為他們的被殺當屬天經地義。但是在這件事上非常接近教廷的人士說，教宗道歉的對象主要的還是中國天主教徒，因為教宗願意中國天主教徒因此在國內能夠抬頭挺胸，理直氣壯，不要被看扁。

其實，教宗的道歉和請求寬恕早在一年前宣聖的機會中已經清楚地表達過，尤其是在宣聖次日接見中華朝聖人士時所發表的那篇講話中，說得最清楚。這次他在額我略大學所說的，並沒有超出一年前所說的範圍。教宗本著大禧年的傳統精神，已經代表天主教會向很多國家的人民請求寬恕原諒。他的這種舉動令全球人士驚奇和感動。至於教宗為昔日傳教士在中國可能鑄下的過錯請求寬恕一事，教廷內部高層人士不見得全都贊同。教宗原先就有向中國人民致歉的心意，但不太肯定是否要表明，而且應該如何表明。後來有人提議說，既然教廷與中國北京因為大禧年宣聖事而中斷了對話關係，如今教廷希望恢復對話，何不趁額我略大學國際研討會的機會，向中國人民表示歉意，並請求寬恕？這個建議被教宗採納了，但教宗道歉的對象是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天主教徒。

二十五日下午研討會結束時，教廷公教教育部秘書長（次長），前額我略大學校長，皮陶（Giuseppe Pittau）總主教興匆匆地回答新聞界的問話說<sup>10</sup>：「只要北京願意，教宗明天就可以同

<sup>10</sup> ANSA 通訊社，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七點十三分電訊。

中國達致圓滿的協議；政治問題可以解決，甚至已經有了技術上的解決之道。」他又說：「要是中國人說他們願意在明天就打開外交關係，教宗會接受，如果他們要教宗去北京，教宗會去。教宗已經想好解決現有問題的技術途徑。關於主教任命一事，也已經有了技術上可能解決的方案，只要時機一到，將向北京提出建議。沒有任何因素可以分離我們。」

這位教廷高級官員不知從那裡得到這樣肯定的消息，但因為他的身份關係，這席話驚動了世界傳播媒體。再說，中華民國駐教廷戴瑞明大使當時也在場，皮陶總主教口出這樣的話也實在沒有禮貌，對戴大使和他所代表的國家的尊嚴缺乏尊重。事後經追問，他答說兩年前教廷國務卿索達諾樞機主教已經如此向新聞界表明過了。事後據稱教廷國務院就這事向皮陶總主教表示不快。

台灣高雄教區單國璽樞機主教說：「教宗的講話強調對話的重要。他希望目前中斷的與北京的對話能夠重新展開。但沒有提到很快就要建立外交關係。我們希望中國政府對教宗的話有積極的反應，但需要等待。在台灣，我沒有看到負面的反應。我們總是尊重教宗的思想。我們知道他愛中國人民，對受迫害的中國教會他特別關心。教宗擔心，這是很正常的事。這並非第一次教宗表示他渴望接近中國。可是如果中國政府繼續保持共產主義的政治意識，將很難與教廷有外交關係。不過，這也得視教廷的態度。下一步就得看看北京的反應。必須等待。」<sup>11</sup>

單樞機又說：「其實要道歉的是那些西方霸權國家，但中國從未要求那些國家道歉，反而譴

<sup>11</sup> *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 SEDOC, N.2415, 25 ottobre 2001: Reazioni al messaggio del Papa al convegno su Matteo Ricci.*

責教廷，要教廷對那些西方國家在中國所犯的過錯承責。」<sup>12</sup>

應邀參加這項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中華民國駐教廷戴瑞明大使，會後向記者說：「若望保祿二世完成了一項傑出的舉動。他向中國人請求寬恕。他不僅僅表示歉意而已。這是更有意義、更特殊的一步。我們必須記住，教宗是唯一向中國人請求寬恕的人。沒有任何侵略過中國的西方國家做過類似的舉動。我們樂意促進中國與梵蒂岡的對話。」<sup>13</sup>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光滬教授表示：「（教廷與北京）關係的正常化將給雙方帶來益處，很多人將會如此承認。如果中國想要穩定並解決官方教會和地下教會之間的問題，唯一的途徑就是關係正常化。良好的希望是有的，但非短期內，而是長久後才能實現。最大的阻礙在於共產黨內某些成員的保守態度。」<sup>14</sup>

中國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在二十五日記者招待會中說：「中國方面將仔細研究（教宗）這篇講話。中國始終願意改善與梵蒂岡的關係。到目前為止，中國一向強調至今仍然有效的兩個原則：其一，梵蒂岡必須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整個中國的唯一代表。台灣不可從中國領土分割出去。其二，梵蒂岡不可利用宗教來干涉中國內政。」<sup>15</sup>

12 〈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羅馬訊〈中國：單國璽樞機回應教宗向中國道歉一事，並討論中梵關係〉。

13 同註11。

14 同前。

15 同前。

十月三十日，中國北京外交部在仔細研究教宗的講話後終於表態。該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在例行的記者招待會中說<sup>16</sup>：「雖然教宗對歷史上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所犯的過錯要求中國寬恕和原諒，但是，由於教宗沒有明確為去年「封聖」的事道歉，因此，雙方的接觸仍有「障礙」。中國要求教宗採取進一步「切實行動」，消除中梵改善關係的障礙，為中梵恢復對話、恢復接觸創造一個有利的氣氛和環境。」

孫玉璽說：「教皇上週對歷史上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所犯的過錯表示惋惜和遺憾，並且向受到傷害的中國人民請求寬恕和原諒，我們認為這是一種積極的表示。但是在教皇的致辭中，還沒有對傷害中國人民的「封聖」事件作出明確的道歉。我們對於這一點表示遺憾。」

孫玉璽又說：「梵蒂岡去年不顧中國的強烈反對，堅持「封聖」，給中梵關係設置了新的障礙，使中梵接觸在很大程度上停滯下來。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解決。梵蒂岡應該非常清楚甚麼是實際行動。」

至於中國要梵蒂岡採取甚麼實際行動，孫玉璽說：「凡是有利於改善關係的行動，都是實際行動，梵蒂岡方面非常清楚應該拿甚麼實際行動，我們的兩點原則也非常明確。」

《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十一月二十八日香港訊報導說：「義大利《新聞報》十一月二十四日刊登中國外交部部長唐家璇的訪問。唐家璇表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必須為去年十月一日宣聖一百二十位中華殉道者致歉，中梵方可以恢復外交關係。」「這是中國一直以來只是提出中梵建交的先決

16 〈中國外交部：教宗沒有明確道歉，中梵接觸仍有障礙〉，《聯合早報》，北京特派員周銳鵬二〇〇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報導。



條件為梵蒂岡與台灣斷交和不得干涉中國內政後另一項新條件。據報導說，唐家璇表示，中梵關係沒有正常化的責任不在中方。他說，十月二十四日教宗公開為以往西方傳教士對中國所犯的錯誤道歉是具建設性，可是他沒有為去年封聖一事請求寬恕。他（唐家璇）指出：封聖事件令中國人民非常不滿，我們要求教宗道歉，梵蒂岡也很清楚我們的立場。」

《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同一消息報導說：「香港嶺南大學副教授耶穌寶血女修會梁潔芬修女在十一月中對《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說，中國是藉封聖事件為中梵關係設置新障礙。中國領導層正面對過渡期，相信中梵關係在一、兩年內仍會膠著，直至領導層穩定下來。她說：若中國要求道歉，那便應該向直接侵略中國的殖民國家指出，但現在中國不要求這些曾侵略中國的國家道歉，卻要求梵蒂岡道歉。」

《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同一消息引述香港一位中國教會觀察家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話說：「若教宗再次向中國道歉，便是雙腳跪在中國政府跟前。他指出：現在他單膝下跪，仍然會被視為很偉大，但若他雙腳下跪，便不再是偉大人物。他繼續說，看來中梵關係正常化的機會十分渺茫。」

香港教區兩位主教認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向中國人道歉的訊息，表達了他對教廷與中國交談的開放和友好態度<sup>17</sup>。然而陳日君主教也認為，儘管教宗就過去一些傳教士在中國的過失道歉，但是中梵建交的前景並不樂觀。陳主教十月二十五日對《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表示，教宗承認過去

17 《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六日香港訊（中國：香港主教認為教宗道歉顯示梵蒂岡願意與中國交談）。

人因著你們才有可能聽到宣聖的真正實情和它所具的深刻的宗教意義。」<sup>25</sup>

## 第五節 陷入低迷、膠著中的教廷與北京的關係

中共建國五十多年來，特別是進入聯合國以後，它與羅馬教廷之間的關係雖然起伏不定，時高時低，時熱時冷，但總的說來，在溫度上應該是逐漸上升。這種活絡的關係主要顯示在彼此越來越多、但不一定真實了解的對話和接觸上。然而，這種關係並不意味著互相間真正的逐漸接近，有時甚至正好相反，彼此因為認識對方而發現互相間的巨大差異：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九年這三年間雙方的頻繁接觸和間接的對話，使教廷與北京的建交已達呼之欲出的地步；然而二〇〇〇年元月六日和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兩次私自祝聖官方地上教會主教，還有十月一日教宗的中華殉道宣聖，使頗為熱絡的關係頓時凍結起來。對這種戲劇性的劇烈變化，教廷國務卿索達諾樞機主教和梵蒂岡發言人納瓦羅博士都公開表示感到莫名其妙！<sup>26</sup>

中共二〇〇〇年元月六日的非法祝聖主教，其目的是為即將與教廷建交做完全的部署，但教廷則視為費解的挑戰；六月二十五日杭州的再次非法祝聖主教，逼使教廷向中國大陸發表嚴重警告；十月一日教宗的中華殉道宣聖大典原是要給全球的中華人一項榮耀，但北京認為羅馬天主教所

<sup>25</sup> *Radiogiornale della Radio Vaticana, Radio Vaticana: La voce che porta Cristo oltre l'ideologia e la diplomazia*. 29 settembre 2000.

<sup>26</sup> 參見本書第十三章第十六、十七兩節。

一句很重要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儘管放心，一位基督信徒能夠在任何政治體制下度自己的信仰生活，只要他按照自己的良知和信仰規則生活的權利受到尊重即可。」<sup>27</sup> 問題就出在這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基督信徒國民的良心和信仰生活權利不放心，所以就不會尊重那個權利。

## 第六節 教廷間接設法恢復與北京對話

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美國總統布什到羅馬南郊岡道爾夫堡教宗夏宮拜會若望保祿二世教宗，並與教廷國務卿索達諾樞機主教和教廷外長陶然總主教會談。七月二十四日中國官方的英文《中國日報》報導說，教廷國務卿希望美國能藉其在中國的特殊經濟和政治地位，協助游說中國與教廷直接溝通。當天在場的還有布什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賴斯 (Rice Condoleezza) 女士<sup>28</sup>。

七個月後，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國布什總統抵達北京訪問，當天立刻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江澤民主席舉行會談。會後隨即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聯合記者會。會中布什和江澤民都沒有談及宗教問題，也沒有提到他們是否討論了中梵關係。不過抵達北京前一天，布什在南韓漢城的記者會中表示，當他與江澤民會晤時，會促請中國與梵蒂岡對話，並尊重宗教自由。

然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賴斯在布什和江澤民會談後的新聞簡報會上說：布什與江澤民的閉門

<sup>27</sup> 參見本書第十三章第二節。

<sup>28</sup> 《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七日香港訊〈中國：梵蒂岡官員促請美國總統協助中梵對話〉。

會議內容觸及具爭議性的中梵關係。布什促請江澤民認真考慮與宗教團體及宗教領袖展開對話，並特別提及與梵蒂岡及達賴喇嘛對話的重要。

二月二十二日，布什訪問中國大陸最後一天，他在向中國全國直播的演說中說：「宗教自由不是甚麼讓人害怕的東西，反而應該受到歡迎。宗教信徒是好公民，不會對治安構成威脅。」布什總統這幾句話與教宗屢次向中國教會講話的內容和語調很相似。

這年十月，日本東京總主教區榮休總主教白柳誠一樞機前往中國大陸進行正式訪問，他是教廷與北京關係惡化後，第一位正式訪問中國大陸的教會要員。

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總主教麥卡里克（Theodore McCarrick）樞機前往北京進行三天私人性質訪問。這已經是他第五或第六次訪問中國大陸。上一次是在一九九八年二月份，當時他以美國紐瓦克（Newark）總主教區的總主教兼美國天主教主教團國際政策委員會主席身份，受克林頓總統委託，與美國一位基督教和一位猶太教領袖組成代表團，到中國大陸考察宗教自由狀況，會見了國家主席江澤民、宗教事務官員和宗教領袖。這次，麥卡里克樞機主教也會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即主管農業、民族和宗教事務的回玉良，而身兼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的北京教區「主教」傅鐵山，也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待他。

中國官方《新華通訊社》七月二十八日報導說<sup>29</sup>：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傅鐵山主教二十八日會見到訪的美國華盛頓總主教麥卡里克樞機時，曾表示：「香港

29 《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二〇〇三年八月一日香港訊〈中國：北京主教告誡香港教會人士為中梵關係添複雜因素〉。

天主教會個別人的言行背離了普世教會的行為準則，影響了香港社會的穩定，也損害了香港天主教會的形象。……我作為中國天主教的主教，對此表示擔憂，不希望因為某個人的不當言行，為中國與梵蒂岡改善關係增添新的複雜因素。」傅鐵山「主教」批評的對象顯然是香港的陳日君主教。次日，七月二十九日，《新華通訊社》又報導說<sup>30</sup>：麥卡里克樞機主教與中國官員和宗教領袖談及改善中梵關係的問題，他同意傅鐵山主教的看法，認為改善中梵關係仍需努力，而且宗教不應與政治混為一談。

麥卡里克樞機主教回到華盛頓後，他的發言人蘇珊·吉布斯 (Susan Gibbs) 七月三十一日以電子郵件，向《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更正北京《新華通訊社》的報導說<sup>31</sup>：「實際上，麥卡里克樞機主教在中國的時候並沒有做任何公開的講話或接受傳媒訪問。因為這次是私人探訪，他覺得在公開場合說話並不恰當。」

從北京官方傳媒的報導，似乎北京當局在借用美國麥卡里克樞機主教的訪問，讓外界以為是教廷主動積極在謀求與中國恢復對話。當然，教廷從來不與人交惡，頂多也只是靜默不回應而已。這種靜默不作聲的態度表示教廷處在反省沉思的狀態，它願意讓塵埃落定後再看清事態局勢，以便調整步伐，重新出發。不過在這期間，教廷也讓其他教內外人士去和北京接觸，探聽中南海的行情。

二〇〇〇年元月六日、六月二十五日和十月一日所發生的事件，致使教廷與北京中國之間的

30 《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二〇〇三年八月六日香港訊〈中國：美國樞機的回應與中國官方媒體報導不符〉。  
31 同前。

關係陷入空前的低潮。但是在這前一年年底，由於中共中央對內發佈第二十六號文件，也就是所謂的八一七文件，教廷於是凍結主動與北京的對話和接觸，進入沉思階段。有關教廷和普世教會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遂由梵蒂岡電台華語部代勞，但是教廷的門仍舊敞開著，它隨時願意接受北京恢復與它有建設性的對話關係。

在這靜默沉思時期，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僅在有機會上從梵蒂岡向中國大陸教會和人民發出一點小小的善意和關懷的訊息，例如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教宗在第十屆世界主教會議閉幕禮彌撒講道中說：「我願意向中國大陸的主教們致特別的問候，他們的缺席並不阻止我們在想念和祈禱中，感到在心靈上與他們接近。」<sup>32</sup>

大約一個月後，十二月二十二日，教宗在每年年終例行的接見教廷樞機主教和其他要員，與他們互祝聖誕節的機會中，回顧一年來的教會與世界局勢說：「在最近舉行的紀念耶穌會傑出會士利瑪竇神父抵達北京四百週年的儀式中，我特別親切地想到可愛的中國人民。我並沒有忽略這條道路目前仍然存在的艱難和痛苦，但是在此我要重申我深切的信念，即彼此的認識和在可能情況之下的共同祈禱，乃是走向了解、關懷與和平的最好途徑。」<sup>33</sup> 二〇〇三年二月二日星期日中午，教宗在帶領梵蒂岡聖伯多祿廣場上的各國信友做例行的三鐘經祈禱時，特別向全球華人、越南人和韓國人

<sup>32</sup> *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 SEDOC*, N.2419, 27 ottobre 2001: *Omelia del Papa nell'Eucarestia di chiusura della X Assemblea Ordinaria del Sinodo dei Vescovi* N. 5.

<sup>33</sup> *Ibid.*, N.2737, 22 dicembre 2001: *Discorso del Papa alla presentazione degli Auguri natalizi degli Em.mi Signori Cardinali, della Famiglia Pontificia e della Curia Romana* N. 5.

祝賀春節，他說：「昨天，二月一日，是千百萬人，特別是中國人、越南人和韓國人的陰曆新年，他們在這一天過家庭親情的節日。對他們我重複最近在世界和平日所提出的賀意：願新年是和平的時期，這個和平以人心四個明確要求為基礎，即真理、正義、愛和自由。我虔祝我親切的問候能抵達他們每個人的心。我的祈禱每日都陪伴著他們。」<sup>34</sup>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羅馬教宗每年元月接見駐教廷外交使節團，彼此拜年時，在他長篇的致辭中，幾乎每次都談到中國，這一年，二〇〇三年元月十三日講話中，卻沒有提到。不過，他有這麼一段話說：

「保障每個人實際享有宗教自由這個屬於個人和社會的自然權利，乃是國家的利益所在。我曾經說過：當信徒感到他們的信仰權利受到尊重，看到自己的信友團體在法律上受到承認，他們就會懷著更大的信念來與他們生活其中的社會的共同計畫合作。基於此，你們就會了解到為什麼我做從亞洲到歐洲所有生活在暴力和不寬容之下的基督徒的代言人的理由。」<sup>35</sup>

教廷與北京恢復對話關係並不難，因為一直以來雙方的關係都處在這種斷斷續續、時冷時熱的狀態中。難的是找到並建立共識。北京政府認可的上海教區「主教」金魯賢二〇〇二年三月三十日對《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說<sup>36</sup>：由於中國和梵蒂岡都不互相了解，中梵建交的可能性很低。教廷

<sup>34</sup> Ibid., N.0150, 2 febbraio 2002: *Parole del Santo Padre all'Angelus e al dopo Angelus*.

<sup>35</sup> Ibid., N.0036, 13 gennaio 2003: *Discorso del Santo Padre al Corpo Diplomatico*.

<sup>36</sup> 《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九日上海訊〈中國：教會與政府人士否認近期中梵關係改善〉。

二〇〇二年九月，香港特區政府推出諮詢文件，探詢香港各界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問題的意見。諮詢文件一出，立刻引起全港人的關切。香港天主教會更是站在市民和社會團體立場，對第二十三條表示存疑，並不斷透過媒體發表意見。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幾乎被視為當地教會抗議這條法律草案的象徵。

香港《公教報》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報導：該年十二月四日至十日，中國國務院宗教事務局訪問團到香港訪問當地六個宗教團體，包括天主教在內。抵達前兩天，香港天主教陳日君主教獲通知，北京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表示，訪問團不會訪問香港天主教。

該報導又說：二〇〇〇年十月，教廷將一百二十位中華殉道者宣聖，遭北京強烈反對，當時任助理主教的陳日君主教則為教會立場辯護。此後，中國官員一直迴避與香港教區領袖接觸。近期，陳主教亦以教會領袖身份，批評香港政府按《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為反顛覆罪立法。

《公教報》二〇〇三年二月十六日報導一篇訪問陳日君主教的談話，其中最後一個問題問：「聽說有內地教會人士說中梵建交正在談判中，而陳主教你可能是建交的大障礙，不過你也說了準備引退以成其美事。這報導準確嗎？」陳主教回答說：「按本人所知，近來沒有談判的跡象。至於本人準備引退不是本人主動提出講的，是被記者問及如果中梵建交需要我引退，我的答案當然是『非常樂意』。」

《公教報》二〇〇三年元月二十六日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一文中說：「諮詢文件所提出的所謂『七宗罪』建議，引起社會及教會廣泛的關注，擔心政府會借『維護國家安全』之名，壓制人民的基本權利及自由。其中，政府建議把『組織或支援被禁制組織的活動』列為罪行，此舉必定



現。」

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紀念日，「香港天主教團體支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假維多利亞公園小山丘涼亭舉行「民主中國」祈禱會，席間邀請了香港主教陳日君分享。陳主教發表談話如

下<sup>40</sup>：

「十四年前在天安門廣場及附近，年輕的同胞為爭取民主自由、為喚醒祖國的領導們，灑下了鮮血。我們百萬多香港市民頓然記得了自己是中國人，行了出來，以歌聲、以眼淚響應了他們。」

多謝支聯會每年組織燭光晚會，為大眾市民供給機會，刷新記憶。正如十四年前我們天主教徒的隊伍在出發遊行前作了祈禱，今天你們也以祈禱準備心靈參加晚會。

為基督徒歷史始終是教恩史，每個生命是巴斯卦（逾越）的延續，義人的血和基督的犧牲一起奉獻到天父前，為兄弟姐妹們帶來新的生命動力。我們不只是來追悼亡者，他們是殉道者，我們來歌頌他們，我們來瞻仰他們的榜樣，承受他們的遺志。

這幾個月來，基本法二十三條的如此立法，使我們清醒覺悟，原來追求祖國的民主自由，我們該從香港做起，一國兩制、宗教自由已不是理所當然，需要我們奮力爭取。

讓我們抬頭望著天父身邊的天安門烈士，望著那一百二十位册封聖品的殉道者，及那無數為信仰、為真理捨生的無名英雄，向他們許諾我們不會辜負他們的期望，向他們一樣做個有骨氣的中國人，不怕強權，和平堅持維護人的尊嚴，維護那天父所賜的基本人權。

40 〈民主中國祈禱會，陳日君主教分享詞〉，《公教報》，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五日。

主背後的「道德力量」。北京為了削弱民主力量，第一步是要使教會遠離民主運動。」<sup>45</sup>

《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八月六日引述中國官方《新華通訊社》七月二十九日的報導說，美國華盛頓麥卡里克樞機主教訪問北京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天主教主教團辦事處時，北京一名天主教主領袖說：「我們從香港天主教界的朋友那裡得悉，最近香港天主教會有個別人已成為各界矚目的「政治明星」，其作秀的風頭甚至超過演藝界的明星，不符合其宗教身份。」教會人士和學者都把中國教會領袖這些評語解讀為對香港教區陳日君主教的攻擊。陳主教一向對香港政府有關宗教自由和人權等政策作出批評。

香港《公教報》二〇〇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引述《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的報導說：美國聯邦政府轄下的獨立機構「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八月八日發表聲明，宣佈取消原定八月初的訪華活動。聲明稱，中國政府在委員會出訪兩星期前「強烈勸阻」他們訪港，其後更「堅持」訪問團剔除香港行程，使委員會不能接受。

報導引述該委員會主席麥可·揚 (Michael K. Young) 的話說：「這顯示中國前所未有地控制外國與香港接觸，違反了「一國兩制」的理念，令人關注香港回歸中國僅僅六年之後，自治已出現很大疑問。」

香港嶺南大學副教授，寶血會修女梁潔芬在同一報導中說，中國此舉是要將對香港教區陳日君主教的不滿提升至國際層面。她說，陳主教經常公開批評政府，特別是引起七月一日五十萬人上街

向人民的意見、向民主讓步，且不論它的真正意向為何。希望這樣的讓步是由衷尊重民意、以民意為歸宿的表現。果如此，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希望已出現曙光！

## 第八節 游刃在矛盾與困難交錯縱橫中的中華民國與教廷的關係

話說中華民國、教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這部「三國誌」，自從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海峽兩岸一進一出聯合國而揭開序幕之後，三十二年來由於北京單方面的堅持，致使「分久」並沒有走向「必合」的歷史軌道。在整個人類大歷史中，三十二年也不過是彈指，但對一代和個人僅有的一生來說，卻是忽視不得的半輩光陰。誰有權利強制一個人、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甚至半個世界，按照他或數個人的意志生存？誰沒有權利在尊重他人的生存權利下，自由選擇自己所願意的內外生活方式？面對歷史洪流，人生固然如朝露，轉瞬即逝，但也正因為生命的短暫和絕無僅有，就更顯得彌足珍貴，豈能虛擲？豈能遭莫名的擺佈？至今三十二年的中梵三角關係，不為經濟政治物質利益，只求每個人的那點人性尊嚴受到尊重。可是這三十二年的光陰，從整個大中華角度來看，似乎是虛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者沒有以其絕對優勢的條件，促成台梵中三方以「人」為本、足以流芳百世的「合」，令人扼腕！

往者已矣，來者猶可追！如果海峽兩岸的人民，尤其是執政者，能夠超越狹隘的政治意識局限，參考十年前東、西兩德和捷克與斯洛伐克的人民及政府那兩種高瞻遠矚、羨煞全球的開明智

慧，則困擾北京多年的中梵關係必定可以迎刃而解，而海峽兩岸四地的中華人也將從此享受精神和物質的幸福生活！

中梵三角關係三十二年來，從台北與北京的拉鋸戰，逐漸走向北京仍然威脅台北與教廷，而台北則尋求與教廷共同關懷中國大陸的路線。教廷一貫的外交政策是絕對不對立，不樹敵，因為它兩千年的經驗告訴它對立只能逞一時之快，但永遠解決不了問題。基於這個理由，教廷外長陶然總主教才說教廷沒有敵人，沒有與人對話的困難，它無時無刻不準備與人對話。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是一件令全體中華人都感到欣慰和榮幸的事，因為海峽兩岸案的政府至少找到排除不共戴天的宿怨的途徑。兩個月後，二〇〇二年元月十日，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在例行年度接見駐教廷外交團的講話中，特別提到這件盛事說：「從去年十一月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代表團都並列世界貿易組織席位。但願這個良性的發展有助於使彼此接近的種種艱辛努力開花結果。」<sup>48</sup> 教宗的這項賀意是他接納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戴瑞明進言的成果。

二〇〇二年元月二十二日，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接見前來羅馬述職的越南全體主教，向他們發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講話，可供任何一個對教廷的本質模糊不清的個人或政府參考。其中一段說：

「教會基於它的角色和職權，故絕不與政治團體混為一談，亦不繫於任何政治體制，正因為如此，政治團體和教會各自獨立於自己的範圍。然而，它們兩者都必須為了人的益處而善盡本身特定的

48 *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 SEDOC, N.0024, 10 gennaio 2002: Discorso del Papa al Corpo Diplomatico N. 2.*

使命，這樣的服務要是雙方能夠進行健康的合作，必將更有效果。為能實現此理想，教會期待政治團體完全尊重教會的獨立和自主。」<sup>49</sup>

教宗接見越南主教團一個星期後，元月二十九日，也接見了前來述職的中華民國台灣天主教主教會團。這次，教宗在向台灣主教們發表的講話中，一反過去以整個中國教會為主、台灣本地教會為輔的架構，再三強調台灣教會的生活和使命，僅在講話結束之前，提及台灣教會基於與中國大陸有共同的文化、精神和歷史價值觀，所以亦關心大陸的兄弟姐妹，並努力推動中華大家庭全體天主教友的彼此了解、和好及友愛。<sup>50</sup>

教宗講話重心的改變可能與台灣本地教會的反應有關，因為自從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教宗把肩負中國大陸教會與普世教會之間的橋樑任務托給台灣和海外華人教會之後，台灣各地教會和全球天主教許多大小修會大量把注意力轉向中國大陸。一時，大大小小的精神和物質支援從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名義和途徑、源源不絕地輸進大陸，幾乎架空了台灣本土教會的人力和經濟資源。本來在成長上已經舉步維艱的台灣教會，更因此而陷入停滯的狀態。再說，中國大陸在某些方面稍為開放之後，援助中國大陸教會的財力、物力和人力也從歐美各地源源而到，中國大陸不少地方的教

<sup>49</sup> *Radiogiornale della Radio Vaticana*, 22 gennaio 2002: *Attività della Santa Sede*.

<sup>50</sup> 江國雄，〈梵蒂岡電台：中梵關係中教宗每日具體關懷中華民族的見證〉，〈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三八四，參見〈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頁四九九～五〇四。Radio Vaticana: *Comunicazione del SEDOC*, N.0131, 29 gennaio 2002: *Discorso del Papa ai vescovi di Taiwan al termine della visita ad limina*.

會團體甚至比台灣本地教會更為寬裕。再說，大陸很多真正需要濟助的苦難教會團體，反而得不到甚麼益處。教宗對台灣主教們的講話或能產生亡羊補牢的作用。

約一個半月後，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九日，中華民國副總統呂秀蓮女士飛赴匈牙利首度布達佩斯參加「國際自由聯盟」第五十一屆年會，途徑羅馬，趁便參訪梵蒂岡。是日，全球天主教聖若瑟（St. Joseph）節慶，梵蒂岡假日，但教廷外長陶然總主教和外次米廖雷蒙席特別在外長官邸熱情接待呂副總統一行，彼此就中梵雙邊關係交換意見，咸認雙方對維護人權與宗教自由之理念一致，應加強合作。

七十天後，五月三十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簡又新暨夫人抵達羅馬，展開他二月一日就任新職後首次正式訪問教廷的活動。在兩天訪問活動中，首先拜會了教廷負責教宗及全球天主教慈善事業協調工作的「一心」委員會主席，德國籍的高德士總主教。高德士總主教感謝中華民國政府最近捐贈一萬美元濟助聖地耶路撒冷「主誕堂」受困的神職與難民，並希望今後中梵雙方繼續加強合作，濟助世界上受苦難的人民。高德士主席總主教曾於二〇〇〇年代表教宗訪問台灣，慰問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大地震災民，前後共捐贈十萬五千元賑災。

五月三十一日，簡又新部長先拜會教廷醫療牧靈委員會主席洛薩諾·巴拉甘（Lozano Barragan）<sup>51</sup>總主教，感謝天主教會歷年來對台灣貧病醫療服務方面所作的貢獻。這位墨西哥籍的教廷部會首長也感謝中華民國大力支持該會每年主辦的國際醫療會議。簡部長特別感謝教廷在中華民國

51 洛薩諾·巴拉甘總主教與中華民國關係良好，已在二〇〇三年十月廿一日被擢升為樞機主教。

灣高雄教區主教兼台灣天主教團團長單國璽樞機、戴瑞明大使、陳方中教授、韓德力神父、沙百里神父等，筆者忝列末座，發表〈梵蒂岡電台：中梵關係中教宗每日具體關懷中華民族的見證〉一文<sup>54</sup>。會後，輔仁大學歷史學系並將十七篇論文彙集成書，名為《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於同年十二月底出版。

關於第三計畫，邀請專家學者撰寫一部沈昌煥出使教廷以還的中梵外交關係史專書一事，台北外交部已委託台北輔仁大學進行一項研究撰寫此書的計畫方案。筆者多年來已有意撰寫一部中梵外交關係史，並不斷為此做準備，但苦於當代許多重要史料尚未解密，又缺乏充分時間前往各地查尋資料，故遲遲未能動筆。二〇〇二年九月《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問世，筆者久所盼望的有關史料大致均已具備，因此決定著手進行撰寫，並得駐教廷戴瑞明大使的鼓勵。

鑒於外交部已委託輔大進行這項撰寫研究計畫，而且輔大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主任陳方中教授業已與吳俊德先生合作，將一九七〇年以前有關中梵建交解密的文獻收編在《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中，故一九四二年中華民國與教廷建交迄一九七〇年這段中梵外交關係史，若由史識豐富、史學修養精湛的陳方中教授執筆，必定更能駕輕就熟。

事經駐教廷戴瑞明大使熱心聯絡協調，筆者亦於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上旬應邀赴台北輔仁大學參加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之便，與陳教授初次面商。雙方咸認合作撰寫此一具有歷史見證意義的專書實為美事，故均樂意攜手合作，共襄盛舉。於是，兩人異地分頭撰寫中梵

54 《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三七三～三八八。

為那些歷史階段做評斷的適當時刻，這樣的評斷可以，也應該在另一個場所進行。」<sup>56</sup>

教宗所說的適當時刻和另一個場所，於一年後，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在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舉行的紀念利瑪竇抵北京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出現了。在這次研討會中，教宗除了向那些感到被傳教士的言行所傷害的中國人民道歉並請求寬恕外，又再次強調：

「歷史真理的追求必須從容、公正、徹底。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應該由學者們去進行。在座諸位了解中國情況，請也參與，提出貢獻。我保證教廷常準備著在這研究工作上與大家合作。」<sup>57</sup>

一年又五個月後，在羅馬傳信大學舉辦的這次有關天主教在中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更清楚地顯出它乃是響應教宗在中華殉道宣聖日所表達的期望的另一次實現，希望繼續探討西方帝國主義侵華、傳教士在華傳教、以及中國人民的反應之間的複雜情結和真理。

主辦傳信大學這次研討會的單位曾邀請許多曾在中國傳教的男女修會參加，但各方響應似乎不很踴躍。有來自台北、香港、巴黎和義大利幾個城市的傳教士和學者參與，會中發表了十八篇論文：台北輔仁大學耶穌會士房志榮教授談〈中國人如何論耶穌會傳教士〉（*Che cosa dicevano i cinesi dei missionari gesuiti*）；台北西班牙籍道明會會士山樂曼（Miguel Angel San Romam）講〈十九世紀福建省的道明會士〉（*La presenza dei Domenicani nella Provincia del Fujian nell'Ottocento*）；

<sup>56</sup> 參見本章第一節。

<sup>57</sup> 參見本章第二節。



灣的外交處境，總統無法親自前來向教宗申賀，才特派夫人以總統特使身份抵教廷，向教宗致敬。信函中，陳總統並提到教宗倡議的和平四大支柱：真理、正義、仁愛和自由。他說，台灣十分樂意支持教宗的和平四大支柱。而台灣在親身經歷長期軍事威脅所帶來的恐懼下，認為台灣海峽的和平只有在兩岸都尊重與遵守這個準則時，才能維持，才能達到和平的最終目標。

基於天主教會的人道精神，並感念過去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援助，陳總統夫人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捐贈十萬美元給教廷一心委員會，響應教宗對伊拉克重建的關注和濟助的呼籲。

陳總統夫人個別與教宗見面交談後，全體隨員也都意外獲得上台向教宗握手致意的機會，並合照留影。真是皆大歡喜！

原來，駐教廷戴瑞明大使早為安排陳總統夫人訪問教廷事已經費了兩個多月的心神。在覲見教宗一事上，教廷國務院表示宜避免廣告宣傳作用，而且人數限制比較緊一些。通常一國元首或政府領袖來訪時，身邊隨員能趨前與教宗寒暄者不過五、六人，而且要由元首或總理當面向教宗介紹覲見者職稱。當然，國務院有諸多的考慮，而且在這方面一向以謹慎為前提，一切循規蹈矩，按照國際外交禮儀安排行事，一板一眼，遇事比較不能靈活運用。同時，國務院也不希望因此而惡化教廷與北京目前的僵局關係。鑒於國務院的原則，戴大使在尊重之餘，也轉請教宗府（*Prefettura della Casa Pontificia*）首長協助，務使陳總統夫人的訪問達到最理想完美的境界。事實上，訪問的結果超出任何人意料之外，連教廷國務院也感到驚奇。

陳水扁總統夫人這次歐洲行，先到德國柏林參與「天子之寶」展覽開幕禮。這項展覽展出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四百多件宮廷文物。在羅馬停留三夜四天之中，陳夫人也獲得羅馬國際政治愛德協



ISBN 957-05-1835-9 (644)

54207000



9 789570 518359

全

平裝

NT\$

550